

托洛茨基  
十月革命的领导人之一  
苏联红军之父 苏共党内最大的反对派首领

*L. Trotsky*

托洛茨基：

# 我的生平

T R O T S K Y

[苏] 列夫·托洛茨基 著

赵 泓 田娟玉 译 郑非凡 校





WILEY

上架建议：人物传记

ISBN 978-7-208-07328-9



9 787208 073289 >

定价 40.00元

易文网：www.ewen.cc

Trotsky


托洛茨基：

我的生平

T R O T S K Y

[苏] 列夫·托洛茨基 著

赵 泓 田娟玉 译 郑异凡 校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托洛茨基:我的生平/(苏)托洛茨基著;赵泓,田娟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ISBN 978-7-208-07328-9

I. 托... II. ①托...②赵...③田... III. 托洛茨基(1879~1940)—自传 IV. K835.12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7)第123288号

责任编辑 周 峥  
封面装帧 王晓阳

托洛茨基:我的生平

[苏]列夫·托洛茨基 著  
赵 泓 田娟玉 译  
郑异凡 校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c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635×965 1/16 印张 34 插页 4 字数 465,000

2007年9月第1版 2007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6,000

ISBN 978-7-208-07328-9/K·1371

定价 40.00元

## 译 序

迄今为止，托洛茨基仍然是个争议人物。他的革命活动和理论主张，始终受到世界各国研究人员的重视。研究苏联历史、苏共历史和国际共产主义史，托洛茨基都是无法回避的人物。可以不同意他的观点，但不能无视他的存在！

《我的生平》实际上是托洛茨基的一部回忆录。就列宁的同时代领导人而言，这几乎是唯一一本重要领导人的回忆录，他所记述的是20世纪最初30年的历史。这段历史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特别是布尔什维克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时期，涉及当时的革命活动，十月革命，布尔什维克党执政以及党内斗争等重大事件。关于这段历史的知识，过去都是《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提供的，其中有大量不实甚至伪造的东西。托洛茨基的回忆录以当事人的身份，依据他所掌握的历史资料，从另一个视角给我们描绘了这段历史的过程，这是弥足珍贵的。在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人中还未见有同样的回忆录，他们多数人还没有活到写回忆录的年龄就被杀了。只有布哈林于1937至1938年在狱中写了一本自传体小说《时代》，不过，第一，这是用文艺的笔法来写的，有艺术虚构的成分；第二，没有能够写完，只写到20世纪初。可以从中了解俄国的社会，但对了解党的历史，作用不大。当然，以后还有一些苏共领导人写了回忆录，如赫鲁晓夫、米高扬、戈尔巴乔夫等人，但那是以后的事了。

托洛茨基是一个非常注意搜集资料的人，他自己写的文件都留有副本，到他手中的材料，他也会留下副本。列宁逝世后，号召交出列宁的各种文件，托洛茨基交出了他所拥有的列宁文件，作为交换得到文件的副本。托洛茨基被驱逐出国的时候，被允许随身带走所拥

有的档案资料。此举一定令斯大林后悔不已，因为后来托洛茨基在外国依据这些资料写了大量揭露斯大林的文字。正因为他拥有大量资料，并且他写作此书时离所写的有关事件发生的时间很近，本人又博闻强记，所以此书提供的资料和说法有较大的可信度。他所提供的档案文件，得到苏联解体前后解密档案的证实。在严格保密的苏联时代，托洛茨基在《我的生平》以及其他著作中所披露的历史资料，是西方“苏联学”、“列宁学”和“斯大林学”的重要资料来源。

当然，任何自传或者回忆录都受作者本人的思想、观点、立场的影响和制约，不可能是纯客观的记录。托洛茨基的自传也同样如此。特别是他写作此书时，同斯大林的争论正处于方兴未艾之际，他必须为自己辩护，必须反驳斯大林，因此他关于党内和国内事件的记述，立场观点是极其明确的。不过此书的价值也正在这里。在当时的苏联，反对派的声音是受到压制和限制，甚至封锁的，反对派被打倒了，但是人们并不知道他们的真正观点和主张。托洛茨基的回忆录，给人们提供了关于联共党内斗争的另一种说法。

正因为如此，托洛茨基自传一问世立即引起世界各国的广泛注意，各种文字的译本纷纷出版。在中国也同样如此。1930年，即此书俄文版在柏林出版的那一年，中国就出现了由上海新生命书局出版的石越翻译的《托洛茨基自传》、春秋书店出版的成绍宗翻译的《我的生活》。1933年神州国光社出版了刘镜园翻译的《托洛茨基自传》，此译本于1941年以《我的生活》的书名由新生命书局再版。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这些版本都不全，有的只有上册，没有下册，有的有前部而缺后部，除刘镜园的译本是参考俄文翻译的，其余版本都是从英文、法文转译的，译文质量较差。1941年春燕出版社出版了何伟（郑超麟）翻译的《托洛茨基自传》，这是根据1933年作者删节本翻译的，译文通顺，重要的内容都有了，是解放前出版的质量较好的译本。新中国建立后出过两个译本。一本是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0年出版的《我的生平》，是根据英文版转译的。还有一本是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6年出版的由石翁、施用勤翻译的《托洛茨基自传》。

我们早就有意翻译托洛茨基的这本重要著作,但直到 20 世纪 80 年代中央编译局图书馆才从国外购得此书的俄文版,我们觉得有必要出一本译文准确,不仅可供阅读,而且可以放心引用的中文版本。华东师范大学的同志借去此书,组织翻译,并约我校订全书的译文。在 1989 年的炎热夏天完成了全书的校订工作。但因种种原因此书没有能够如期出版,译稿在京沪两地转了十多年,承蒙上海人民出版社接受译稿,终于能够了却一件心事。在此谨对为此书的翻译、出版不懈努力的同志和出版社,特别是周尚文教授,表示深切的谢意。

《我的生平》只写到 1930 年前后,此后有十多年的经历为空白。这次周尚文教授特意为本书补写了《生平》以后的作者经历,相信会有助于读者对托洛茨基的全面理解。

郑异凡

2006 年 6 月 6 日于北京

# 目 录

序言.....	1
第一章 扬诺夫卡.....	7
第二章 邻居。第一个学校.....	28
第三章 家庭与学校.....	40
第四章 书籍和最初的冲突.....	55
第五章 乡村和城市.....	71
第六章 转折.....	83
第七章 我的第一个革命组织.....	92
第八章 我的头几次狱中生活.....	101
第九章 第一次流放.....	109
第十章 第一次逃亡.....	117
第十一章 第一次侨居国外.....	123
第十二章 党的代表大会和分裂.....	131
第十三章 回到俄国.....	144
第十四章 1905年.....	152
第十五章 审判,流放,逃亡.....	162
第十六章 第二次流亡和德国社会主义.....	174
第十七章 准备新的革命.....	190
第十八章 战争爆发.....	201
第十九章 巴黎和齐美尔瓦尔得.....	210
第二十章 驱逐出法国.....	219
第二十一章 穿越西班牙.....	224
第二十二章 在纽约.....	235



第二十三章	在集中营·····	244
第二十四章	在彼得格勒·····	251
第二十五章	关于诽谤者·····	262
第二十六章	从7月到10月·····	272
第二十七章	决定性的一夜·····	281
第二十八章	1917年的托洛茨基主义·····	288
第二十九章	当政·····	293
第三十章	在莫斯科·····	305
第三十一章	布列斯特谈判·····	317
第三十二章	和平·····	331
第三十三章	在斯维娅日斯克的一个月·····	345
第三十四章	专列·····	359
第三十五章	保卫彼得格勒·····	370
第三十六章	军事反对派·····	381
第三十七章	军事战略上的分歧·····	394
第三十八章	向新经济政策过渡及我同列宁的关系·····	403
第三十九章	列宁卧病·····	411
第四十章	不肖徒辈的阴谋·····	427
第四十一章	列宁逝世和权力转移·····	438
第四十二章	党内斗争的最后时期·····	452
第四十三章	流放·····	470
第四十四章	驱逐·····	488
第四十五章	不给签证的地球·····	496
附录:托洛茨基的流亡生涯(1929—1940年)·····		511
译后记·····		532

## 序 言

我们的时代回忆录又多起来了，也许比任何时候都要多。这是因为有话要说。时代越是富有戏剧性，越是峰回路转，对过去的历史的兴趣就越加浓烈。风景画艺术不可能在撒哈拉大沙漠里产生。像我们这样的“坎坷不平”的时代产生一种要求用积极参与者的眼睛来回顾昨日和已经非常遥远的往日。自从上次战争以来，回忆录文学的巨大发展可以在这里得到解释。也许，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要写作本书的原因。

作者积极的政治活动的暂时中断才使本书有可能问世。君士坦丁堡是我生活中未曾预料到的一个阶段，尽管它并不是一个偶然的阶段。我在这里暂住（这不是第一次），耐心地等待着事态的发展。一个革命家的生活没有一点“宿命论”是根本不可能的。不管怎么样，君士坦丁堡的这个间歇是一个最合适不过的时机，可以在情势允许继续迈步之前回顾一下过去。

最初我为报纸写了一个传略，并打算到此为止。在这里我要指出，我无法从自己的避难所看到传略是以何种形式送到读者手中的。但每一件工作都有自己的逻辑。我只是在完成给报纸写的传略后才开始考虑这个题目的。那时我决定写一本书，篇幅要大得多，并全部重新写过。在最初给报纸写的传略和本书之间只有一个共同之处，这就是它们都叙述同一个对象，在其他方面这是两个全然不同的作品。

我特别详细地叙述了苏联革命的第二个阶段，这一阶段的开端是与列宁患病以及开展反“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同时发生的。不肖徒辈争夺权力的斗争，正如我竭力展示的，不仅仅是个人的斗争。它展

示了一个新的政治篇章：对十月的反动和准备热月政变<sup>①</sup>。人们常常问我：“您是怎么失去权力的？”从这里可以自然而然地得到回答。

一个革命政治家的自传必然要涉及一系列理论问题，同俄国在某种程度上也同全人类的社会发展相联系的理论问题，特别是同被称之为革命的危机时期相联系的理论问题。自然，我不可能在这里全面分析这些复杂的理论问题。所谓“不断革命论”在我个人生活中起了重大作用，更重要的是，现在对东方各国具有极端的迫切性，但它在本书中也只像一支遥远的旋律。如果读者感到不满足，我只能对他们说，研究革命本身问题的应是另一本专著的内容，在那本书里，我要对最近几十年的经验作出最重要的理论总结。

※ ※ ※

由于我这本书涉及不少人物，同这些人物为自己或者为自己的党所作的有关本人的描写不尽相同，其中许多人会认为我的描述缺乏必要的客观性。报刊上已经发表的片断招来了某些异议。这是不可避免的。可以毫不怀疑，即使我能够用我的普通的生活照片来作传（我根本不想这么做），它还是会唤起对由书中所叙述的当年冲突所引发的争论的反响。但是本书不是我的生活的毫无激情的照相，而是我生活的组成部分。在本书中我继续进行我毕生从事的斗争。夹叙夹议；在叙述时，我自卫，还频频出击。我认为这是使自传成为在某种更高意义上的客观自传的唯一方法，也就是使它更准确地表达人物、条件和时代。

客观性不是要佯装不偏不倚，用这种态度口是心非地议论朋友和敌人，把不便于直接说出来的东西间接地暗示给读者。这类客观性只不过是斯文的骗局，仅此而已。我不需要这种骗局。既然我必须谈自己（还没有人能不谈自己而写成自传的），那我就没有理由隐瞒自己的好感和反感、自己的爱和恨。

这本书是争论性的。它反映了那个完全建立在矛盾之中的那个

---

<sup>①</sup> 热月政变原为 1794 年 7 月 27 日法国资产阶级反革命政变，此处系借用这个名词。——译注

社会生活的动态。学生对老师的不礼貌行为；在温文尔雅掩盖下沙龙式的出自妒忌的挖苦话；不间断的商业竞争；在技术、科学、艺术、体育等所有园地上的疯狂竞赛；议会争吵，这些争吵内含深刻的利害冲突；报刊上每天不断的激烈斗争；工人罢工；枪杀游行示威者；文明的邻居相互在空中投掷大炮弹；我们地球上几乎无休止的内战火焰——所有这一切都是不同形式的社会“论战”，从日常的、每日不断的、正常的，尽管很紧张，却几乎感觉不到的论战，直到非常的、爆炸性的、火山般的那种论战。这就是我们的时代。我们和它一起成长，同呼吸，共生。如果我们想时时刻刻忠于我们的祖国，我们怎能不论战呢？

※ ※ ※

但还有另一种更为起码的准则，这就是叙述事实时要认真负责。正如最不调和的革命斗争应当考虑到地点和时间的状况一样，最富有争论性的作品也应当注意物与人之间的恰当位置。我希望，我不仅在总体上，并且在局部上都遵守这个要求。

在某些情况下（诚然，这种情况为数不多），我以对话的形式来叙述谈话。谁也不会要求逐字逐句地再现多年以前的谈话。我也不打算这么做。有些对话倒是更具有象征性质。但任何一个人在生活中都会有过这样的时刻，某次谈话会非常鲜明地印在他的脑海里。通常你会不止一次地向自己的亲人和政治朋友们叙述这样的谈话。因此这些谈话能牢牢记住。自然，我指的首先是政治性的谈话。

这里我要指出，我一贯相信自己的记忆。回忆所提供的东西曾不止一次地受到客观的检验，成功地经受了检验。不过，这里需要作一个保留。如果说我的地形记忆很差（音乐记忆就更不需说了），而视觉记忆，还有语言记忆属中等，那么思想记忆则大大超过中等水平。而在这本书里，思想、思想的发展以及人们为这些思想而进行的斗争实质上占主要地位。

诚然，记忆不是自动记数器。它很少是无私的。它往往把不利于生命本能（监督记忆）的事件排除出去或埋藏起来，这多半是出于自尊心。但这已是“心理分析”批评的事，这种批评有时是敏锐的和有益的，但更经常的是任性和专断。

不用说，我坚持用文献来监督自己的记忆。不管在使用图书和档案上我的条件多么困难，我还是尽可能去核对所需要的重要情况和日期。

从1897年开始我主要是用笔杆子进行斗争，因此，我一生中的文件在长达32年的时间里几乎不间断地在出版物上留下了痕迹。从1903年开始，党内的派别斗争充满了个人插曲。我的对手们和我一样都不吝攻击。这一切也都在出版物上留下了刀疤剑痕。从十月革命时起，在年轻的苏维埃学者和一系列机关的研究工作中，革命运动的历史占重要地位。从革命档案和沙皇警察局档案里搜寻出所有有意思的材料并加上详细的事实说明予以出版。最初几年，当还没有什么东西需要隐匿或伪造时，这一工作进行得非常认真。由国家出版社出版的《列宁全集》和我的部分著作，每卷都有几十页的注释，含有关于作者活动和相应时期的事件的不可替代的事实材料。所有这一切自然减轻了我的工作，有助于编写出准确的年谱，避免事实错误，至少是大的错误。

※ ※ ※

我不能否认，我的一生过得非同寻常。然而，究其原因与其说在我本人，不如说更多地在于时代环境。自然，也需要有某些个人的特点，以完成我所完成的那些好的或令人不快的工作。但在另一种历史条件下，这些个人的特点也可能潜存着，就像人的倾向和激情在社会环境不需要时潜存着一样。然而另一些目前正受到排挤和压制的品质却有可能发挥作用。客观存在高于主观的东西，并最终作出决定。

大约从17至18岁开始，我就进行自觉的学习和积极的活动，经常为某种思想展开斗争。我个人生活中没有任何事件其本身是值得公众注意的。我的一生中所有多少算得上不平凡的事实，都是与革命斗争相联系的，并因而具有意义。只是由于这一原因才有理由出版我的这本自传。

但是由此作者又遇到了困难。个人生活的事实和历史事件的内容非常紧密地交织在一起，以致很难把它们相互分开。同时，这本书毕竟不是历史著作。选取事件不是根据它们的客观意义，而是取决

于它们和个人生活的联系。如果评定个别事件和各阶段缺乏应有的比例,那么作为一本历史著作,是很不高明的。自传和革命史之间的分界线只能凭经验来确定。在历史研究著作中不必掺进传记,然而必须给读者提供社会发展的事实。我在这里的出发点是认为读者已了解重大事件的基本轮廓,只需对他们简略地提一下历史事实及其前因后果就行了。

※ ※ ※

本书问世时我正好 50 岁。我的生日和十月革命节正好是同一天。神秘主义者和毕达哥拉斯的门徒们可以由此作出随便什么结论。我自己只是在十月革命 3 年之后才发觉这一有趣的巧合。9 岁以前我一直住在偏僻的农村。在中学读了 8 年书。中学毕业一年后第一次被捕。对我来说,就像对我的许多同龄人一样,监狱、流放、流亡国外就是大学。我在沙皇监狱里关过两次,约 4 年;第一次被沙皇流放近两年,第二次是几个星期;两次从西伯利亚逃脱。两次侨居欧美各国共约 12 年,两年在 1905 年革命之前,差不多 10 年在革命之后。大战期间,我被霍亨索伦的德国缺席判处监禁(1915 年),次年从法国驱逐到西班牙,在马德里监狱短期关押后,在警察监视下在卡迪斯逗留了个把月,然后被驱逐到美国。在那里我得知发生了二月革命。1917 年 3 月从纽约回国途中我被英国人逮捕,在加拿大的集中营关押了一个月。我参加了 1905 年和 1917 年的革命,在两次革命中都担任了彼得堡苏维埃主席。我直接参加了十月革命,是苏维埃政府的成员。作为外交人民委员,我和德国、奥匈、土耳其和保加利亚的代表团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进行了和约谈判。作为陆海军人民委员,我用了 5 年左右的时间组织红军并重建了红色舰队。在 1920 年我还同时领导了混乱不堪的铁路网。

然而我的生活内容——除国内战争年代外,主要是从事党务和写作活动。国家出版社于 1923 年着手出版我的文集。除早先出版的 5 卷军事著作外,共出版了 13 卷。1927 年停止出版,这时对“托洛茨基主义”的压制变得特别厉害了。

1928 年 1 月我被现在的苏维埃政府流放,在靠近中国的边境度过

了一年，1929年2月被驱逐到土耳其，现在在伊斯坦布尔写这篇序言。

就是从这篇简要的叙述中看，也不能说我过得很单调。相反，从转折、意外、尖锐的冲突和起伏的数量来看，可以说，我的生活充满“奇遇”。然而，可以说，就志趣而言，我并不是一个猎奇者，我倒很有学究气和保守习气。我喜爱和珍视纪律和制度，完全不是为了发怪论，而是事实如此，我应当说，我不能容忍杂乱无章和破坏。我曾是个非常勤奋和认真的学生。在以后的生活中我保持了这两种品质。在国内战争的年代，我在自己的专列上走过了相当于绕赤道数圈的路程，那时我对用新的松木板做成的每一个新的栅栏都感到非常高兴。列宁知道我的这个癖好，曾不止一次友好地拿它开玩笑。一本有新思想的写得很好的书；优美的文笔，可以向别人传达自己思想的文笔，对我来说，从来是，现在仍是最珍贵的、最亲切的文化成果。我从未放弃学习的愿望，我的一生中多次出现过一种感觉，觉得革命妨碍我系统地从事研究工作。然而，在我的有意识的生活中，几乎有三分之一世纪的时间完全用来从事革命斗争，而如果我能从头开始的话，我将毫不犹豫地走同样的道路。

我不得不在流亡中写下这些文字，这已是三度流亡了，这时候我的许多亲密朋友塞满了苏维埃共和国的流放地和监狱，他们曾坚决地参加建立这个共和国。他们中间某些人正在动摇、退缩，向对方屈服。一类人是由于道德沦丧；另一类人是由于在错综复杂的局势中不能独立地找到出路；第三类人则是由于物质惩罚的逼迫。我已经两次经受过大规模地抛弃旗帜的事：1905年革命失败之后和世界大战开始时。根据生活的经验，我深知什么是历史的涨潮和退潮。它们服从于自身的规律。光是急躁是无法加快它们的替换的。我已习惯于不从个人命运的角度来观察历史前景。认识所发生的事情的规律性，找到自己在其中的位置，这就是革命家的首要职责。与此同时，这又是一个不把自己的任务局限于今天的人所能获得的最大的个人满足。

列·托洛茨基

1929年9月14日于普林占坡

## 第一章

# 扬诺夫卡

童年往往被认为是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候。都是这样的吗？不，只有少数人的童年是幸福的。把童年的理想化来自特权人物的旧文学。生活在遗产殷实和有良好教育的家庭之中，享受爱抚，尽情玩乐，过着有保障的、富足的、无忧无虑的童年，回想起来那生活道路的起点就像洒满阳光的林中绿茵。文学中的达官贵人或者颂扬达官贵人的平民们，把这纯属贵族对童年的评价视作典范。相反，绝大多数人，在回首往事时，看到的却是饥寒交迫、仰人鼻息的阴暗的童年。生活鞭打弱者，又有谁比孩子更弱呢？

我的童年没有饱受饥寒之苦。我出生时，家庭已经很富足了。但这是从贫穷往上爬，并且不愿意中途停步的那种人的多苦多难的富足。所有的筋肉都高度紧张，一切打算都为着劳动和积蓄。孩子们过着俭朴的生活。我们不觉得短缺，但生活也没有给我们以慷慨和爱抚。我的童年既没有洒满阳光的林中绿茵，就像极少数人的生活那样，也不像许多人的童年，大多数人的童年那样挣扎在充满饥饿、暴力和屈辱的黑暗深渊之中。这里是在农村、是在偏僻角落里的一个小资产阶级家庭里的灰色的童年，这里有辽阔的大自然，但是风尚、眼界、兴趣却是贫乏而狭隘的。

我幼年所处的精神环境和我往后自觉的生活所经历的那个环境，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这不仅是由于隔着几个十年的时间和若干国家的空间，并且还由于隔着重大事件垒成的山岭以及不易察觉、但对个人来说并不是微不足道的内心的倾圮。在开始起草这



本回忆录时，我不止一次地觉得，仿佛我描绘的不是自己的童年，而是旧日在遥远国度的旅行。我甚至想以第三人称来为自己作传。但这种假定的形式很容易变得像小说，这正是我竭力想要避免的。

虽说两个世界是矛盾的，个性的统一却会通过某些潜在的途径从这个世界转到另一个世界。总的说，这也就是人们对传记和自传感兴趣的原因，它们由于某种原因在社会生活中占有较为广泛的地位。因此我试图较为详细地叙述自己的童年和学生时代，不做任何预测，对任何东西也不做预先决定，也就是说，不为预先做出的结论去剪裁事实，原来是什么就是什么，只论述我记忆中所保存的那些往事。

有时我觉得，我记得如何吸吮母亲的乳汁。其实，我不过是把婴儿身上看到的情景挪到自己身上而已。我曾依稀记得，我一岁半时在果园苹果树下玩得入迷的场面。但这一回忆是不足信的。记得最清楚的是这样一件事：我和母亲到博布里涅茨的家里，那里有一个两岁的小女孩，他们称我为新郎，称小女孩作新娘。孩子们在大厅的油漆地板上玩耍。后来小女孩不见了，小男孩一个人站在五斗柜旁，他就像在睡梦中那样发呆，母亲和女主人走进来。母亲看看男孩，然后再看看他身旁的一泡水，后来又看看小男孩，责备地摇摇头，说：“你真不害臊……”男孩看看父亲，看看自己，然后又看看那泡水，仿佛在看与他毫不相干的东西。

“没关系，没关系，”女主人说，“孩子们玩得太久了。”

小男孩既不感到害臊，也不认错。那时他几岁？应是两岁，但也可能是三岁。

差不多就在那时候，我和保姆在花园散步，碰上一条蛙蛇。“你看，廖瓦，”保姆指着草地上发亮的东西说，“一只鼻烟壶埋在土里。”保姆拿了根棍子去挖掘。她自己大概也未必超过16岁。鼻烟壶伸展开来，变成一条蛇，发出啞啞声在草地上爬行。“哎唷！哎唷！”保姆叫喊起来，抓住我的手拼命地跑。可我跑不快。后来我上气不接下气地说，我们以为在草地上找到了一只鼻烟壶，可原来却是一条蛙蛇。

我还记得小时候在“白”厨房<sup>①</sup>里的一幕情景。父亲和母亲都不在家，厨房里，除了几个女仆和厨娘外，都是客人。来度假的哥哥亚历山大也在这儿转来转去。他用双脚站在木墩上，就像踩高跷，在厨房的泥地上长时间地跳舞。我要哥哥把木墩让给我，想站上去，却跌下来，哭了，哥哥把我扶起来，吻吻我，把我抱出厨房。

我大概4岁的时候，有人把我放在一匹大灰马上，这匹马像绵羊那样温顺，没有鞍，也没有马勒，只有一根缰绳。我又开双腿骑着，双手抓住马鬃。母马安静地把我驮到梨树旁，从树枝下走过，树枝正好碰到我的肚子。我还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就顺着马的臀部往下滑，扑通一声跌倒在草地上，疼倒是不疼，只是莫名其妙。

我小时候几乎没有买来的玩具。只是有一次母亲从哈尔科夫给我带来一只纸做的马，还有一个球。我和妹妹一起玩自己做的布娃娃。有一次，菲尼亚姑姑和拉伊萨姑姑，就是父亲的姐妹，用碎布给我们做了几个布娃娃，菲尼亚姑姑用铅笔画出眼睛、嘴巴和鼻子。我觉得布娃娃做得很出色，直到现在我还记得。在一个冬天的晚上，伊万·瓦西利耶维奇，我们的司机，用硬纸板剪了一个有窗户和轮子的车厢，用浆糊粘好。来过圣诞节的哥哥们立即声称，这样的车厢马上就可以做出来。他先把我的车厢拆散，拿来尺、铅笔和剪刀，画了很久，可他照图剪出来后，却做不出车厢。

亲戚和熟人到城里去时不止一次地问我：从伊丽莎白格勒或尼古拉耶夫给你带点什么？我眼睛发亮，要带什么呢？大家帮我出主意。有人建议带一匹小马，有人主张带书，有人说带彩色铅笔，也有人说带溜冰鞋。我说要一双“帕鲁加利法克斯”冰鞋，我从哥哥那儿知道这个名称。那些答应给我买东西的人刚刚跨出门坎，就把自己的诺言忘了，而我一连盼了几个星期，往后便由于失望而苦恼了好久。

在房前小花园里，一只蜜蜂落在向日葵上。蜜蜂会蜇人，需要小心，我摘了一片牛蒡叶子衬着用两个手指尖捉住蜜蜂。我突然感到一阵无法忍受的疼痛。我哭叫着跑过院子到作坊里去找伊万·瓦西

<sup>①</sup> 指给老爷做饭的厨房。——译注

里耶维奇。他替我取出蜂刺，在指尖上抹些止痛药水。

伊万·瓦西里耶维奇有一只罐子，里面盛满浸着毒蜘蛛的葵花油。这是治虫蜚的良药。毒蜘蛛是我和维佳·格尔托巴诺夫一起捉的。捉时，在一根线上拴上一小块蜂蜡，放进洞里，毒蜘蛛便伸出爪子抓住蜂蜡并粘在上面，以后只要把它放进空火柴盒里就行了。不过，捉毒蜘蛛大概是大一点的时候的事。

我记得大人们在漫漫冬夜的谈话，他们喝着茶，谈论着扬诺夫卡是什么时候，怎样买下的，那时候孩子中谁多大，以及伊万·瓦西里耶维奇是什么时候来干活的。母亲说：“廖瓦是从农庄带来的。”她狡猾地看了我一眼。我推想后说道：“这就是说我是在农庄出生的？……”“不，”他们对我说：“你是在扬诺夫卡这里生的。”

“那妈妈怎么说我是带来的呢？……”

“这是妈妈说着玩的。……”我不满意，觉得这个玩笑真奇怪，但是我不吭声，因为我在大人们脸上看到知情者所特有的笑容，而我很不喜欢这种笑容。就从这谁都懒得动弹的冬日茶余饭后的回忆中，我得出一些事情的发生时间。我生于10月26日，因而我的双亲是在1879年的春天或夏天从农庄搬到扬诺夫卡来的。

我出生的那年正是第一次用炸弹攻击沙皇制度的那一年。在这之前不久，产生了一个恐怖主义政党——民意党，它于1879年8月26日，也就是在我出生前两个月，判处了亚历山大二世死刑。11月19日发生了炸沙皇列车事件。于是开始了一场严酷的斗争，它导致1881年3月1日刺杀亚历山大二世，同时也使“民意党”本身灭亡。

在这之前一年，俄土战争结束了。1879年8月俾斯麦奠定了奥德联盟的基础。左拉在这一年发表了一部长篇小说，其中未来的协约国组织者，那时的威尔士亲王，被尊称为对轻歌剧歌唱演员的精辟的鉴赏家（《娜娜》）。普法战争和巴黎公社失败后，在欧洲掀起的反动风潮还没有减弱。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已沦入俾斯麦的“非常法”之中。维克多·雨果和路易·勃朗在1879年向法国议会提出大赦公社社员的要求。

我在扬诺夫卡出生并度过了自己一生中的最初9年，但无论是

议会辩论，还是外交事件，甚至连炸弹的爆炸都没能将其余波传到扬诺夫卡村来。在赫尔松省和全新罗西亚辽阔的草原上，小麦和羊的王国按特殊的干法过活，它以辽阔的空间和闭塞的交通顽强地抵挡着政治的侵入。只有草原上的无数荒冢仍留在这里，成了民族大迁移的路标。

我的父亲是农民，起初是小农，后来成为大农。他小时候和全家一起离开了在波尔塔瓦省的犹太人聚居地，到南方的自由草原上寻找幸福。在那些年代，赫尔松省和叶卡捷琳诺斯拉夫省约有 40 个犹太农户移民区，约 25 000 人。犹太农民不仅在权力方面（1881 年以前），而且在贫困方面都同一般农民一样。我父亲靠不知疲倦的，对自己对别人都是残酷无情的劳动来实现原始积累，往上爬……

在格罗莫克列伊移民区，出生登记本不很准确，好多是事后登记的。当我需要进中学时，发现我还不到读一年级的年龄，于是就在出生登记本上将我的生年从 1879 年改为 1878 年。因此我的年龄总是有两种算法：官方的和家庭的。

我一生的最初 9 年几乎没有离开过父亲的庄子。这个庄子是从一个叫扬诺夫斯基的地主那里买来的，所以叫做扬诺夫卡。扬诺夫斯基老头行伍出身，后晋升为上校，在亚历山大二世时承蒙上司的恩典，在赫尔松省荒无人烟的草原上挑选了 500 俄亩<sup>①</sup>的土地。他在草原上用麦秸盖起土屋，还有同样简单的院内建筑。然而他经营无方，上校死后全家迁居波尔塔瓦。父亲向扬诺夫斯基买了 100 多俄亩土地，还租了 200 来俄亩。我清楚地记得那个上校的妻子，干瘦的老太婆：她一年来一两次收取地租，同时看看是否一切正常。父亲通常派一辆带篷的弹簧马车去车站接她，在大门口放一张椅子，让她下车时方便一些。父亲的敞篷轻便的四轮马车是后来才有的，那时还养了几匹拉车的公马。给上校妻子这个老太婆煮了鸡汤和嫩鸡蛋。上校的妻子同我的姐姐在花园里散步，用瘦削的指甲从树干上抠下凝结了的树脂，要人相信，这是最好吃的东西。

① 一俄亩等于 1.09 公顷。 译注

播种面积扩大了，马和牲畜的数量增多了。开始试养美利奴羊，但不成功。猪倒养了很多，它们自由自在地在院子里跑，翻掘周围的地皮，也把花园给彻底毁了。经营很精心，不过用的是古老的办法。什么领域有利可图，什么领域会亏损，只能凭肉眼估算。由于同样的原因，很难确定产业的规模。一切资财都在土地里，在麦穗里，在粮食里，粮食在谷囤里或转运到港口。有时在喝茶或吃晚饭时父亲突然记起：“啊，您给记上，我从经纪人那里收到1300卢布；给上校的妻子寄去660卢布，给了杰姆鲍夫斯基400卢布。再记一笔，春天在伊丽莎白格勒还给了菲奥多西娅·安东诺芙娜100卢布……”账目大体上就是这样记的。然后父亲慢慢地，但顽强地爬上去。

我们就住在老上校建造的那个土房子里，屋顶盖着麦秸，房檐下有无数的麻雀窝。墙上有很深的裂缝，在这些裂缝里出现了游蛇。它们有时候被当作蝰蛇，曾用茶炊里的开水浇过，但没有用。低矮的天花板每逢大雨就漏水，特别是在穿堂，泥地上放了碗和脸盆接水。房间很小，窗户又暗，两间卧室和孩子住的房间都是泥地，生了许多跳蚤。餐室铺了地板，每星期都要用黄沙擦洗一次。主要的房间被庄严地称作大厅，地板是油漆的。上校妻子就在这里下榻。房子周围的园子里长着锦鸡儿、红白色的玫瑰。院子根本没有篱笆。已经是父亲建造的泥墙大瓦房里有作坊、厨房和仆人的下房。旁边是“小”木仓，过去是“大”木仓，再过去是“新仓”，都盖着芦苇。为防雨水渗漏而使粮食发霉，粮仓都用石头垫高。在炎热和严寒的季节，狗、猪和家畜都躲在粮仓下面。母鸡也在那儿找个安静的地方下蛋，我常常爬进去在石头之间拾取鸡蛋——大人是爬不进去的。每年有鹤群栖息在大粮仓顶上，它们高高地仰起红喙子，吞食游蛇和青蛙——这真是可怕！游蛇的身子从鸟嘴里蠕动着，仿佛是蛇在鹤肚子里吃鹤。

粮仓隔成许多小间，储放着发出芳香的新收的小麦、粗芒的大麦、光滑透亮的亚麻籽、黑中透蓝珍珠似的油菜籽、又薄又轻的燕麦。孩子们玩捉迷藏时，如有尊贵的客人在场，就可以藏到粮仓里去。我爬过谷仓的小围墙，再爬上麦堆顶，然后从另一边滑下去。双肘和双膝都埋在向四面流淌的小麦里；满鞋（往往是破鞋）满怀灌满了麦子。

粮仓的门关着，门上挂一把锁装样子，并不锁上——这是游戏规则的要求。我躺在凉爽的粮仓里，埋在谷物中，呼吸着植物的粉尘，谢尼亚·B. 或者谢尼亚·Ж. 或者谢尼亚·С. 或者莉莎姐姐，或者别的什么人在院子里走来走去，寻找躲藏的人，但怎么也无法找到埋在新收小麦里的我。

马厩、牛棚、猪圈和鸡舍在房子的另一边，都是用树枝、干草再加上粘土马马虎虎建成的。离房子百来步的地方有一口井。它后面是浇灌菜园子的池塘。每年春汛都把“坝堰”冲毁，每次又重新把它加固起来：用干草、泥土和牲口粪。池塘旁的小丘上有一个磨坊。木棚子里安装了一台 10 马力的蒸汽机和两台磨粉机。在我童年的最初几年，母亲在这里度过了自己大部分劳动时间。磨坊不仅为本庄同干活，而且也为周围地区服务。农民们从 10 至 15 俄里<sup>①</sup>外把谷物运来，并支付十分之一的面粉作为磨粉的报酬。在大忙时节，快到打场的时候，磨坊昼夜 24 小时干活。我学会写算后，有时候也得给农民过秤并计算应付多少报酬。庄稼收割后，磨坊便关闭了，蒸汽机用来脱粒。不过，后来装了固定的发电机，用砖瓦建造了磨坊的新房子，主人的土屋子也被铁皮屋顶的大砖房所代替。但这一切是我快 17 岁时发生的事。在最后一个假期里，我为未来的房子计算了窗户之间的距离和门的尺寸，但怎么也算不出来。后来我返乡时看到了石头打的基础。那房子我始终没住过。现在那里是一所苏维埃学校。

在磨坊里农夫们有时要等上几个星期。住得近的把口袋留下排队，自己就回家了。而远处来的农民则住在大车上，遇到下雨便睡在磨坊的粮食袋上。

有一个来磨粮食的人丢了马笼头。有人看到一个外来的男孩子老是在别人的马匹旁边打转转。人们跑去搜查了他父亲的大车，在干草里找到了笼头。男孩子的父亲，一个大胡子，脸色阴沉的农夫，朝东方画了个“十”字，发誓说这是该死的坏蛋小子自己想出来的，他要为此宰了他。但是大家不相信这个父亲。这庄稼汉抓住儿子的衣领，把

<sup>①</sup> 1 俄里等于 1.06 公里。——译注

他摔倒在地，用偷来的笼头接他。我从大人们背后瞧着这个场面。那小子叫喊着并对天发誓说以后再也不敢了。叔叔伯伯们毫无表情地站着，无动于衷地对待少年的号叫，他们抽着自制的卷烟，嘟哝着说，这庄稼汉是假打，只是做做样子，应当也揍这个父亲一顿才好。

在板棚和禽畜栏后面是谷仓。有几十俄丈<sup>①</sup>长的大屋顶，有的是芦苇的，有的是干草的，都是直接架在地上，没有墙。粮食小山似地堆在谷仓里，遇下雨或刮风，就在那里过风车或筛子。谷仓外是打谷场，人们在那儿脱粒。过了一条干涸的河床是完全用畜粪垛起来的牲畜栏。

我的整个童年生活是和上校的土屋子以及餐室里的老式沙发联系在一起。我坐在有红木镶面板的沙发上，喝茶、吃饭，同姐姐玩布娃娃，后来还坐在那里读书。沙发套有两处破了。靠伊万·瓦西里耶维奇坐椅的那一头破洞小一点；靠父亲这边，我常坐的地方破洞大一点。“该用新的呢子重做一个沙发套了。”伊万·瓦西里耶维奇说。“早该做了，从沙皇遇刺的那年起我们就没有做过沙发套了。”母亲答道。父亲则自我辩解说：“你们知道，一走进那个该死的城里，就东奔西跑，车钱又贵，总想快点回庄子来，这就把要买东西全都忘了。”

餐室的低矮的天花板下横着一根梁，是一根白色的大圆木，上面摆放着各种各样的东西：盛着食物的盆子——这是防猫偷吃；钉子、绳子、书本、用纸作塞子的墨水瓶、笔尖生锈的旧钢笔。没有多余的笔尖。有时好几个星期我用餐刀为自己削木头笔尖来临摹旧画报《田地》上的马的插图。接近天花板的烟道的突出部是猫的住处。它在那里生养小猫，当那里太热的时候，它就衔着小猫勇敢地往下跳。高个子客人从桌子后面站起来往往会把头撞在梁上，因此提醒客人们：“当心，当心。”并指指上面的天花板，已经成为习惯。

客厅里最引人注目的东西是一架古钢琴，它占据了四分之一以上的房间。我还记得这个东西的来历。15至20俄里外的一个破产

① 1俄丈等于3俄尺或2.134米。——译注

的女地主搬到城里去了，变卖了全部家具。我们从她那里买下了一张沙发、三把弯木椅子和一架旧的古钢琴，弦都断了，一直丢在仓库里。买这架琴花了16卢布，装在四轮大车上运回扬诺夫卡。在工场检修这架琴时，在音板下面发现两只死老鼠。冬天钢琴在作坊里摆弄了好几星期。伊万·瓦西里耶维奇为它洗刷、胶合、打磨，他弄到琴弦，给它绷上并调好音。所有的琴键都修整一新，于是客厅里响起了琴声，尽管声音不响亮，可还是令人倾倒。伊万·瓦西里耶维奇把自己那神奇的手指从手风琴的音键转到古钢琴的琴键上，演奏了卡玛琳斯卡娅·波尔卡和“我亲爱的，奥古斯丁”。姐姐开始学习音乐。有时哥哥也乱弹一阵，他在伊丽莎白格勒学习了好几个月的提琴。最后，我照着哥哥的提琴谱，用一个手指头在琴弦上弹奏。我没有辨音力，我对音乐的爱好是盲目的，并且在这方面毫无才气。我们的邻居莫伊娜·哈里东诺维奇·M·斯基用自己的一只适于在音乐会弹奏的右手在这台古钢琴上表演。每逢春天，院子便成了泥潭。伊万·瓦西里耶维奇给自己做了一双木套鞋，说得准确些，是厚底靴，我兴奋地从窗口看到他比平时几乎高出了半俄尺。不久，庄子里来了一个老马具匠。看来，谁也不知道他的名字。他八十多岁，是一位尼古拉时代（尼古拉一世）的士兵，在军队服役了20年。他身材魁梧，宽肩膀，须发皆白，步履艰难地走到作为自己流动工场的谷仓。“腿没劲了，”老爷爷已经抱怨了近十年。然而，他那双有皮革味的手却比老虎钳还有力。手指甲就像象牙做的琴键，指尖非常尖利。

“要我让你看看莫斯科吗？”老爷爷对我说。当然，我想看。老爷爷用两个大拇指夹在我的耳下，他那可怕的指甲掐得我疼又恼。我双脚乱蹬，要求他把我的放下。

“你不想看就别看，”老爷爷说。尽管我不高兴，但没有走开。

“喂，”老爷爷说，“你爬梯子到粮仓去，看看阁楼上在下什么。”我觉得这是圈套，拿不定主意。原来，在阁楼上是小磨粉工康斯坦丁和厨娘卡秋莎。他们两人都长得很漂亮，很快活，也很勤快。“你什么时候和卡秋莎结婚？”女主人问康斯坦丁。“我们



这样也很好，”康斯坦丁回答说，“结婚得花 10 个卢布，不如给卡佳买双鞋。”

草原的夏天炎热而又紧张，掀起了夏收的劳动高潮，这种“夏收大忙”一直延伸到离家很远的地方，在这以后，早秋季节来临了，可以对一年苦役般的劳动作个总结了。脱粒在热火朝天地进行。活动中心移到了谷仓后面的打谷场上，它离家约四分之一俄里。打谷场的上空弥漫着乌云般的麦秆的尘灰。脱粒机的滚筒叫着。磨粉工菲利普戴着眼镜站在脱粒机的滚筒旁，他那黑胡子上蒙上一层灰色的尘埃。从大车上给他送来一捆捆麦子，他看也不看一眼便把它们接过来，解开草腰儿，把麦捆打开，放到滚筒上去。滚筒抓住一大抱庄稼后就像狗抓住骨头似地嗥叫起来。脱粒机上的逐秸器就像耍把戏似地把麦秸甩出去。滑稽(糠秕)从旁边风管里吐出来。然后用大车把它运到干草垛上去，我就站在大车的尾板上，手抓住缰绳。“看着点，别摔下来！”父亲喊道。但我已经跌过十来次了，有时摔在麦秸上，有时跌在滑稽上。打谷场上空乌云般的灰色尘埃越来越浓，滚筒轰鸣着，麦壳落进衬衣，飞进鼻孔，弄得人直打喷嚏。“喂，菲利普，轻一点！”当脱粒机突然响得太厉害时，父亲便在下面警告说。我把大车掀起，它突然滑脱，重重地压了下来，压在我的手指上，痛得我两眼发黑。我悄悄地爬到一边去，不让人看到我在哭，然后跑回家去。母亲把凉水浇在我手上，把手指包扎起来，但疼痛没有减轻。手指肿起来，折腾了我好几天。

一袋袋小麦堆满粮仓，一层层地擦在院子里，上面盖上防雨帆布。主人常常来到筛子旁，站在两根竿子中间，教大家如何用筛子簸净糠秕，然后用手抖一抖，一颗不剩地把簸净的麦子倒到麦堆上。在避风的棚子下和粮仓里，风车和选谷机不停地转动。麦子收拾得干干净净，准备上市了。

收购商来了，他们随身带着装着铜器和秤的精心油漆过的箱子。他们检验麦子，开价，付定金。大家非常客气地接待他们，请他们喝茶，吃甜面包干，但不卖给麦子。他们财力单薄，父亲已无需走这条做生意的路了，他在尼古拉也夫有自己的经纪人。“让它搁着吧，”父

亲回答说，“麦子又不要东西吃。”过一个星期，收到从尼古拉也夫来的信，有时还有电报：麦价一普特涨5个戈比。“瞧，又拾到一千卢布，”父亲说，“这些钱不争是得不到的。”但也会有相反的情况：麦价下跌了。世界市场的神秘力量也找到通往扬诺夫卡的道路。父亲从尼古拉也夫回来阴郁地说：“看来……怎么说来着……阿根廷今年抛出了大量的粮食。”

农村的冬天是宁静的。真正干活的只有磨坊和作坊。佣人们一大抱一大抱地搬来干草生火，干草撒了一地，随即又把它们扫干净。把干草塞进炉子，瞧着它熊熊地燃烧起来，真是好玩。有一次，格里戈里叔叔发现我和妹妹奥莉雅呆在餐室里，屋内烟气氤氲，一片蓝色。我在房间里晕头转向，不辨东西，随着叔叔一声喊，我就晕倒在地。冬天我们常常呆在家里，特别是在父亲出门的时候，这时所有的家务都落到母亲身上。有时，在暮色苍茫中我和妹妹相互紧偎着坐在沙发上，张大了眼睛，一动都不敢动。有时，一个巨人带着寒气走进昏暗的餐室，一双大毡鞋吱吱作响，身穿翻领大皮袄，戴一顶便帽，双手戴了手套，胡须上都是小冰条，在黑暗中用大嗓门说道：“你们好。”我们一起缩在沙发的角落里，不敢回答他的问候。于是巨人点燃了火柴并在角落里发现了我们。此人原来是邻居。有时餐室里的那种孤独实在无法忍受了，我就不顾严寒，跑到外面去，打开门，跳上一块石头（门前一块扁而平的大石头），我在黑暗里一次又一次地叫喊：“玛什卡，玛什卡，到餐室来，到餐室来。”因为玛什卡这时有自己的事情：在厨房、下房或别的地方。母亲终于从磨坊里来了，点上灯，拿来了茶炊。

晚上，我们通常就呆在餐室里，直到睡着。餐室里人们进进出出，有的取钥匙，有的还钥匙，在桌子旁作出各种安排，为明天的工作做准备。在这样的时候，我，奥莉娅妹妹、莉莎姐姐，有时还有女仆，过着自己的生活，这是一种以大人的生活为转移并受他们支配的生活。有时，某个年长的人说的话唤起我们某种特别的回忆。我对妹妹使使眼色，她强忍着吃吃地笑，年长的人中有人漫不经心地瞧瞧她。我又使一个眼色，她想藏到桌布下面去笑，结果额头撞到了桌子

上。这感染了我，有时也感染了姐姐，她保持着一个13岁女孩的自尊心，在大人和小孩之间随机应变。如果笑声过大，我就不得不钻到桌子下面去，在大人们的脚中间悄悄地溜出去，踩了猫儿的尾巴，冲到隔壁名叫儿童室的小房间去。几分钟以后，一切又重新开始，笑得手都发软，连杯子都拿不住。脑袋、嘴唇、双手和双脚，浑身都溶化在笑声里。“你们怎么啦？”精疲力竭的母亲问道。两个生活圈子，上一代的和下一代的在一瞬间融合在一起了。大人们带着问号瞧着孩子们，有时是善意的，更经常的则是带着几分怒气。于是突如其来的笑声会猛烈地爆发出来。奥莉娅又把头藏到桌子下面，我一头栽进沙发里，莉莎咬着下嘴唇，女仆则躲在门后面。

“都去睡吧！”大人们说。

但我们没有走，躲在角落里，生怕彼此的眼光相遇。妹妹被抱走，我则常常在沙发上睡着。有人把我抱在手里，朦胧中有时我会大喊大叫。我仿佛觉得有几只狗把我包围了，或者一条条蛇在下面咝咝作响，或者有几个强盗把我抢到森林里去。孩子们的恶梦惊动了大人。他们边走边安慰我，拍拍我，吻我。就这样从笑到人睡；从睡着到恶梦；又从恶梦到惊醒。我重新入睡已经是在温暖的卧室，躺在羽绒被褥里了。

冬天毕竟是一年中全家团聚的季节。父母几乎整天不出家门。哥哥和姐姐从学校回来过圣诞节。星期日伊万·瓦西里耶维奇浑身上下洗得干干净净，刮了胡子，拿着剪刀和梳子开始给父亲理发，然后是给实科中学学生萨沙理，接着给我理。萨沙问：

“伊万·瓦西里耶维奇，您会理加波尔式发型吗？”大家抬起头来望着萨沙，他讲述了在伊丽莎白格勒一位理发匠给他理了个漂亮的加波尔发式，可第二天他却为此受到学监的严厉申斥。

理过发以后大家坐下来吃午饭，父亲和伊万·瓦西里耶维奇坐在桌子两端的圈椅里，孩子们坐在沙发上，母亲坐在对面。伊万·瓦西里耶维奇在结婚之前是和主人们一起吃饭的。冬天饭吃得比较慢，饭后大家闲谈，伊万·瓦西里耶维奇抽着烟并吹出一个个奇怪的烟圈。有时候让萨沙或莉莎大声朗读。父亲坐在暖炕上打瞌睡，人

们就在这里找到他。晚上，有时打牌——玩捉傻瓜，总是大喊大笑，有时还发生小小的争吵。特别开心的是骗父亲，他玩起牌来漫不经心，输了就笑，妈妈则不同，她牌打得好，经常激动，警惕地看着，以防哥哥骗她。

从扬诺夫卡到最近的邮局有 23 公里，离铁路则超过 35 公里。从这里离官府、离商店、到中心城市都很远，离重大的历史事件则更远。这里的生活完全靠农业劳动的节奏来调节。除了世界谷物市场的价格，其余的一切都无关重要。那年代农村是没有报纸和杂志的；这要到后来，当我成为实科中学学生时才出现。收到信，这是很难得的事。有时邻居从博布里涅茨取来一封信，往往在口袋里揣上一两个星期。收到一封信是件大事，收到一封电报则是场灾难。

人们对我解释说，电报是通过电线传来的，然而我亲眼看到的却是一个骑马人把电报从博布里涅茨送来的，为此还要付给他两个卢布 50 戈比。电报是一张纸，就像信一样，在上面用铅笔写着字。它怎么能用电线传送呢，难道用风吹吗？人们回答我说，用电。这就更糟了。有一天，阿勃拉叔叔向我作了这样的解释：“电流顺着电线走，把符号记在带子上。重复一遍。”我重复道：电流顺着电线走，把符号记在带子上。“明白了？”“明白了。”“那怎么后来变成信了呢？”我问。我是指从博布里涅茨来的电报纸。“信是单独发的，”叔叔回答。我困惑不解，如果“信”是用马传送的，要电干什么。但叔叔发火了：“别提信了，”他喊道，“我给你解释电报，而你总是同我谈信。”就这样问题并没有弄清楚。

波利娜·彼得罗芙娜来我们家作客。她是博布里涅茨的一位年轻太太，戴着很大的耳环，额上披着一卷刘海。后来妈妈送她去博布里涅茨，我跟她们一起去。当我们经过 11 俄里处的一个土岗时，有几根电报线的电线杆，电线在嗡嗡作响。“电报是怎么走的？”我问母亲。“你问波利娜·彼得罗芙娜吧，”母亲不知怎么回答，“她会给你解释的。”波利娜·彼得罗芙娜解释道：“带子上的符号等于字母，报务员把它们抄在纸上，再由骑马的人把这纸送出去。”这清楚了。“那么电流是怎么走的？什么也看不见。”我瞧着电线问道。“电流在里

面走，”波利娜·彼得罗芙娜回答，“所有这些电线像个导管，电流在里面流动。”这也明白了。我久久地感到满足。4年以后我听物理教师讲电磁流体时，我倒觉得反而不好懂。

父亲和母亲在辛勤的操劳中难免有些摩擦，但总的来说，两人是和睦相处的，尽管他们是不同类型的人。母亲出身于城市小市民家庭，这个家庭瞧不起手脚皴裂的庄稼人。但父亲在年轻时很漂亮，身材匀称，有一张刚毅有力的脸。他积聚了一笔财富，使他有可能在近年内买下扬诺夫卡。一个年轻的妇女从省城被抛到草原上的一个农村，没有能立即适应农村的艰苦条件，然而她却因此完全进入了一个劳动的天地，并且此后几乎有45个年头没有离开过。这个婚姻所产生的8个孩子中，养活了4个。我是倒数第5，4个夭折，死于白喉和猩红热，死者几乎无声无息地死去的，就像生者无声无息地活着一样。土地、牲口、家禽、磨坊都要付出全副精力。季节的更迭中，农事一浪接一浪，家庭的眷恋被抛在后边。家中没有温存的柔情，特别是在早年。但在母亲和父亲之间有着深深的劳动联系。满身面粉的母亲刚刚走近大门，父亲便吩咐：“给母亲搬张椅子。”女主人还没进家门就喊：“玛什卡，快摆茶炊，主人就要从地头回来了。”他俩都非常清楚，精疲力尽是什么滋味。

父亲无论在智力还是在性格上都高于母亲。他比较深沉、自制、有分寸。他有一种罕见的好眼力——不仅对事物，而且对人。父母一般很少买东西，特别是在早年——父亲、母亲都善于节约每一个戈比——但该买什么东西，父亲从来没有出过错。呢子、帽子、皮鞋、马匹或者机器——他对商品的质量的一切方面有很高的识别力。“我不爱钱，”后来他对我说，好像为自己的吝啬辩解，“但我也不愿没钱，要钱时没有钱，那是灾难。”他说得不规范，把俄语和乌克兰语混在一起，而乌克兰语占优势。他根据举止、面容、习气来评价人，并且极为准确。

母亲生育了许多孩子，加上繁重的劳动，有一段时间病倒了，便送她到哈尔科夫找教授诊治。这样的旅行是件大事，作了很长时间的准备。母亲积了钱，存了几听黄油、一袋甜面包干、炸鸡等等。以

后要花很大一笔开支。请教授看病每次得付3卢布诊金。大家谈论这件事时，也同客人们谈，说时手往上指，脸带意味深长的表情。这里既有对科学的敬重，又有为此行如此昂贵而抱怨，同时也为能够支付这么一大笔钱而骄傲。大家焦急地等待母亲回来。母亲穿了件新连衣裙回来了，在扬诺夫卡餐室里显得特别漂亮。

孩子们还小的时候，父亲对他们比较温存、随和。母亲却常常发脾气，有时毫无道理，只不过是累了或家务事不顺利而拿孩子们出气。那些年，我们觉得向父亲要点什么比较容易得到。但是随着岁月的流逝，父亲变得严厉起来。原因是生活艰辛，随着事业的扩大，操心事也不断增多，特别是在19世纪80年代的农业危机下，再就是孩子们使他感到失望。

漫长的冬日，草原上的雪从四面八方封住了扬诺夫卡，积雪高过窗户，这时母亲喜欢读书度日。她坐在餐室三角形的小暖炕上，两只脚搁在椅子上，或者在早来的冬日黄昏降临时，坐到放在结了冰的小窗子旁的父亲的圈椅上，低声读着从博布里涅茨借来的破旧的小说，一面用那操劳的手指指着一行行的字。她常常把词句搞混，遇到结构复杂的句子就结结巴巴地读不出来。有时孩子向她提示一下，就会使她对读过的东西作全然不同的理解。但她顽强地、不知疲倦地读着，在冬天宁静的日子里，在外屋就可以听到她有节奏的低低的读书声。

父亲到年迈时才一个音节一个音节地学识字，为的是至少能读出我的书名。1910年当他顽强地想要看懂我的那本关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小册子时，我在柏林感到无比激动。

十月革命时，我父亲已是一个非常富裕的人了。母亲已于1910年去世，但父亲活到苏维埃政权时代。在国内战争紧张的时期，南方长期烽火连天，政权不断更迭，一个75岁的老人不得不步行几百公里到敖德萨寻找一个临时栖身之地。作为一个大私有者，红军对他是个威胁；又因是我的父亲而遭到白军的迫害。苏维埃军队肃清南方之后，他才有机会赴莫斯科。自然，十月革命夺去了他积攒的一切。他有一年多的时间管理莫斯科郊外一座不大的国营磨坊。当时

的粮食人民委员瞿鲁巴<sup>①</sup>喜欢和他聊经营方面的事情。父亲因伤寒死于1922年的春天，当时我正在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作报告。

伊万·瓦西里耶维奇·格列平干活的作坊是扬诺夫卡非常重要的地方，最主要的地方。他是在20岁的时候，也就是我出生的那年来干活的。对所有的孩子们，其中包括年岁大的，他都称呼“你”，我们对他则称“您”和尊称伊万·瓦西里耶维奇。他要服兵役时，我父亲和他一起去了，他们购买了一个什么人，于是格列平就留在了扬诺夫卡。他是个十分能干的人，长得也很漂亮，留着暗褐色的小胡子和法国式胡须。他的技术很全面：能修蒸汽机，干锅炉方面的活，车金属和木质圆球，铸造铜质轴承，制作弹簧马车，修理钟表，为钢琴调音，为家具蒙面，制造出一辆完整的自行车，只有轮胎做不了。我在上预备班到一年级之间就是用这辆车学会骑自行车的。一些德国移民把播种机和割捆机送到工场来修理，请伊万·瓦西里耶维奇陪他们去购买脱粒机或蒸汽机。他们向父亲请教生产经营问题，向伊万·瓦西里耶维奇请教技术问题。工场里还有一些帮工和学徒。在许多事情上我是这些学徒的学徒。

我不止一次地在作坊里车螺帽和螺丝。这项工作给我以满足，因为马上可以明显地看到手下的成果。有时我在光滑的石钵上研磨颜料。但很快就感到厌倦了，我一再问，好了没有？伊万·瓦西里耶维奇用手指揉一下油质混合物，摇摇头。于是我把石钵让给了一个学徒。

有时，伊万·瓦西里耶维奇坐在工作台后面角落里一只小工具箱上，抽着烟看着远方，也许在思索，也许在回忆，也许什么也不想，就是在休息。在这种情况下，我就从一旁悄悄地向他靠近，开始亲昵地捻捻他松软的黑褐色小胡子，或者仔细地察看他的双手——这是

<sup>①</sup> 瞿鲁巴·亚·德(1870—1928年)。—189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曾任粮食人民委员、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中央执委会主席团委员及党中央委员等职。—译注

一双出色的、非常独特的工匠的手。双手的皮肤上布满黑点，这是凿磨盘时嵌进去的一些极微小的碎片。手指像树根那样坚韧，但一点也不僵硬，指尖稍大，活动自如，大拇指能往后弯成弓形。每个指头都是有意识的、按自己的方式生活和行动，而它们合在一起又组成一个神奇的劳动组合。尽管我年龄小，但我看到并感觉到，这只手拿起锤子或钳子来同别人的手不一样。左手大拇指上有一道环形偏斜的疤痕。在我出生的那一天，伊万·瓦西里耶维奇用斧头时劈着自己的手，手指头几乎吊在一层皮上。父亲偶然看见这个年轻的机匠把那只手放在板上，准备把手指头干脆剁掉。“住手！”他喝道，“手指会长好的。”“您认为会长好吗？”机匠问，接着便放下斧头。手指真的长合了，又好使了，只是向后弯时不能像右手拇指弯得那么厉害。

伊万·瓦西里耶维奇把一支老式的别丹式步枪改制成猎枪，现在他要校准了：大家轮流打灭几步远的蜡烛。但不是每一个人都打中。我父亲不经意走进来。当他举枪瞄准时，双手发抖，不知怎么枪也拿不稳。然而他一枪就把蜡烛打灭了。他在任何事情上都有一副好眼力，伊万·瓦西里耶维奇也明白这一点。他们从来没有互相责备过，尽管父亲总是以主人的身份同别人说话，常常申斥和纠正别人的错误。

在作坊里我从来不会没事干。我摇动灰坑门的把，这是伊万·瓦西里耶维奇自己设计的，送风机看不到，因为它装在顶间，这使所有的来访者感到惊讶。我转动车床直至精疲力尽，特别是在用合欢木车槌球的时候。那时作坊里的谈话一次比一次有趣。这里并不总是循规蹈矩的，说得准确些，根本就不循规蹈矩。我的见识不是一天天，而是时时刻刻在扩展。福玛讲他工作过的那些田庄，讲男女地主种种奇闻轶事。应当说，他对他们并没有什么好感。磨粉工菲利普则回忆自己的军队生活。伊万·瓦西里耶维奇常常提出问题，打断谈话和作补充。

司炉雅什卡，有时又是锻工，是个忧郁的、火红头发的人，三十岁光景，工作总干不长。好像有什么事抓住他，他有时在秋天，有时在春天不见了，过了半年又重新露面。他不常喝酒，但喝起来便是狂



饮。酷爱打猎，但因为喝酒把枪都卖了。福玛说，有一次雅什卡在博布里涅茨光脚来到一家小铺，双脚沾满黑泥，给自己从枪口装弹药的单筒猎枪买火帽，故意把盒子撒落，再捡起来，同时用大脚踩在火帽上把它带走了。

“福玛在扯谎吧？”伊万·瓦西里耶维奇问。

“干吗扯谎，”雅什卡回答，“那时我一个戈比都没有。”我觉得这种弄到所需要东西的办法很好，值得仿效。

“我们的伊格纳特回来了，”女佣玛莎说，“但顿卡没来，她回家去过节了。”司炉伊格纳特之所以被叫做“我们的”为的是和驼背伊格纳特相区别，在塔拉斯来之前驼背伊格纳特是领班。“我们的”伊格纳特应征去服兵役。伊万·瓦西里耶维奇曾亲自给他量胸围并说：“他们决不会要你的。”新兵接受委员会让伊格纳特住了一个月的医院进行检查。他在那里结识了城里的工人，决定到工厂去碰碰运气。伊格纳特脚蹬城里的靴子，身穿羊皮短大衣，前襟还绣着彩色的花纹。伊格纳特整整一天都呆在工场里，给大家讲城市、工作、秩序、车床和工资的情况。

“自然，工厂嘛……”福玛若有所思地说。

“工厂不是作坊。”菲利普补充。

于是大家沉思地瞧着作坊的上方。

“车床多吗？”维克多急切地问。

“车床林立。”

我听得连眼都不眨，就像从前想象森林那样想象着工厂：上下左右、前前后后，什么都看不见，全是一架架的机器，伊格纳特腰束皮带呆在这些机器中间。伊格纳特还有一只手表呢，大家轮流赏玩一番。晚上，主人和伊格纳特在院子里走着，跟在他们后面的是管家。我也在那儿，一会儿在父亲身边，一会儿在伊格纳特身边。“嗯，那吃饭花钱吗？你买面包吗？买牛奶吗？要付房租吗？”

“那当然，一切都要花钱，”伊格纳特承认……“不过工钱不一样。”

“我知道工钱不一样，不过你的全部工资都花在吃饭上了。”

伊格纳特不动摇地争辩说：“在半年里我毕竟添了一点穿的，给自己买了一只表。瞧，表就在口袋里装着。”他又掏出手表来。这个论据是难以反驳的。主人沉默起来，然后问道：“你不喝酒吗，伊格纳特？那儿周围都是教师，他们很快就会教会你的。”

“我甚至没有必要去尝尝伏特加是什么味道。”

“嗯，怎么样，伊格纳特，要把顿卡带走吗？”女主人问。

伊格纳特朝旁边笑了笑，有点内疚，但不回答。

“嗨，我知道了，知道了，”女主人说，“看来你已经勾搭上城里的放荡女人了，说实话，你这个骗子。”

伊格纳特就这样离开了扬诺夫卡。

孩子们是不准到下房去的，可是谁能管得住呢？下房总有许多新鲜事儿。很长时间，厨娘是一个颧骨突出、塌鼻子的女人。她的丈夫是一个牧人，一个老头，半边的脸已经瘫痪。他俩被叫做“喀查普”<sup>①</sup>，因为他们是从内地省份来的。这对夫妻有一个8岁的女儿，蓝眼金发，非常可爱。她对爸妈经常对骂已经习惯了。

星期天，姑娘们常给小伙子捉头上的虱子，或者相互捉虱子。两个塔吉扬娜，一个高个的，一个小个的，并排躺在下房的一堆干草上。小马信阿法纳西是管家普德的儿子和厨娘帕拉斯卡的兄弟，他横坐在他们中间，把两只脚架在小塔吉扬娜身上，而身子则靠在高个子塔吉扬娜身上。

“瞧，好一个穆罕默德，”管家羡慕地说，“可你是否该去饮马了呢？”

这个红头发的阿法纳西，还有黑头发的穆因佐克总是使我不得安宁。每当我分发苹果或稀饭时，一定会传来嘲弄的声音：“廖瓦，你和我们一起吃午饭吧。”或者说：“廖瓦，向你妈妈给我们要点鸡肉来。”我感到不好意思，默默地走开了。快到复活节的时候，给工人们烤柱形大甜面包，画彩蛋。拉伊萨婶婶是画彩蛋的能手。她从同乡那里带来几只彩蛋，送给我两只。在地窖后面的斜坡上，大家在玩滚

<sup>①</sup> 革命前乌克兰沙文主义者对俄罗斯人的蔑称。——译注

鸡蛋，让蛋相互碰撞，看谁的结实。我来到时已经要结束了，只剩下阿法纳西一个人。“漂亮吗？”我问，给他看画有图案的彩蛋。“还不错。”阿法纳西以无所谓的态度回答。“你想碰一碰看谁的结实吗？”我不敢拒绝他的挑战。阿法纳西把蛋碰得咔嚓响，我那只彩蛋的顶部裂开了。“就是说，这是我的了，”阿法纳西说，“好，现在拿另一只来。”我顺从地拿出第二只彩蛋。阿法纳西又碰了第二个蛋。“这也是我的了。”他利索地拿起两只彩蛋走了，连头也不回。我目瞪口呆地看着，想大哭一场，但事情已无法挽回。

一年到头不离开田庄的长期工人不多，多数是临时工，在大忙时节有几百人，有基辅人、切尔尼戈夫人、波尔塔瓦人，他们受雇到圣母节，即10月1日之前。在丰收年份，赫尔松省要吸收20万至30万这样的工人。在夏季的4个月里，收割工人可收入40至50卢布，妇女是20至30卢布，伙食除外。他们露宿田野，雨天则以干草垛为家。午饭是素的红甜菜汤和稀饭，晚饭是黍米粥。从来不给肉吃，几乎只给植物油，而且数量极少。有时会因此闹起风潮来。工人们离开割过的庄稼地，聚集在院子里，俯卧在粮仓背阴的地方，一双双尽是裂口、被麦秆刺伤的双脚朝天弯着，他们等着。于是给他们送来酸奶或西瓜，或半袋石斑鱼（里海鲤鱼干），他们便重新去干活，还常常唱着歌。这样的事在所有的田庄里都发生。有些强壮的晒得黝黑的老收割工，已连续十来年到扬诺夫卡，他们知道一定会有工作的。他们能得到几卢布的补贴，有时还得到一杯伏特加，因为工作进度是靠他们掌握的。有些人领着全家人，从外省徒步出发，走上整整一个月，吃的是大块面包，在市场上过夜。有一年夏天外来工人普遍得了夜盲症。他们在暮色中慢慢地前进，伸出双手探路，在农村作客的母亲的侄儿把此事给报纸写了一篇报道，地方自治局发现了这篇报道并把它寄给检查员。大家非常喜爱这位“记者”，但父母却有点见怪，他自己也不高兴。然而任何不愉快的后果都没有发生：检查机关查明，这种病是缺乏脂肪引起的，几乎全省都有，因为到处提供的都是同样的伙食，有的地方更差。

在作坊厨房后院，在我面前展现的生活同家里全然不同，要广阔

得多。生活的影片是没有尽头的，而我那时才刚刚开始。小时候，我的在场谁也不感到不方便。谈话无所顾忌，特别是当伊万·瓦西里耶维奇或者管家不在场的时候，他俩毕竟一半属于统治者。在铁匠的熔炉或厨房炉灶的火光下，我所看到的父母、亲戚和邻居常常是一种全新的面貌。许多谈话永远留在我的脑海里。许多谈话也许奠定了我对待现代社会的态度。

## 第二章

# 邻居。第一个学校

离扬诺夫卡一俄里，也许不到一俄里，是杰姆鲍夫斯基家族的田庄。父亲租了他们的土地，和他们有着多年的业务联系。庄园主是非奥多西娅·安东诺夫娜，一个年老的波兰女地主，从前当过家庭女教师。在第一个富有的丈夫去世后，她和比自己小20岁的管家卡齐米尔·安东诺维奇结了婚。菲奥多西娅·安东诺夫娜早就不和第二个丈夫住在一起了，而他依旧管理着庄园。卡齐米尔·安东诺维奇是一个高个子、留着小胡子、嘻嘻哈哈、吵吵嚷嚷的波兰人。他经常坐在我们一张椭圆形的大桌子旁喝茶，一遍又一遍地大声讲述鸡毛蒜皮的小事，一再重复某些语词并不停地敲指头。

卡齐米尔·安东诺维奇有一个不错的养蜂场，离马厩和畜栏较远，因为蜜蜂受不了马的气味。蜜蜂从果树、洋槐、油菜和荞麦上采蜜，到处飞舞。有时，卡齐米尔·安东诺维奇亲自给我们带来用餐巾包着的两只上下合盖着的盘子，盘子中间是浸在透明的金黄色蜂蜜中的一块蜂房。

有一次，伊万·瓦西里耶维奇带着我到卡齐米尔·安东诺维奇那儿去要几只鸽子来养。卡齐米尔·安东诺维奇在一所空荡荡的大房子拐角处的一个房间里招待我们喝茶。在一只带有潮味的大盘子里放着奶油、奶渣和蜂蜜。我用一只小茶碟喝茶，听着他们慢吞吞地谈话。“我们来晚了？”我悄悄地问伊万·瓦西里耶维奇。“不，等一下，”卡齐米尔·安东诺维奇回答说，“得让它们在屋顶下歇下来，那儿鸽子多得很。”我都发困了。终于，我们手拿着灯，爬上仓库的阁

楼。“喂，现在小心点。”卡齐米尔·安东诺维奇对我说。阁楼又长又暗，屋椽纵横交错。散发着耗子、灰尘、蜘蛛网和鸟粪的气味。灯熄灭了，“它们就在这里，你们抓吧。”卡齐米尔·安东诺维奇悄悄地说。说完，难以描述的事情开始了。漆黑中，爆发了震耳欲聋的闹声：阁楼复活了，刮起了一阵旋风。一瞬间我觉得这世界的末日仿佛来到了，一切都毁灭了。我好不容易慢慢地清醒过来，耳际听到紧张的喊声：“还有，到这儿来，到这儿来……装进口袋……接着它。”伊万·瓦西里耶维奇背着口袋，在返回的路上，他的背上似乎在重演阁楼上的那场情景。我们在作坊的屋顶下造了一个鸽子棚。我一天爬上十几次梯子给鸽子送水、送黍子、小麦和面包屑。一星期后在一个窝里发现了两只鸽蛋。但我们还来不及好好体验这件事给我们带来的满足，鸽子却一对接一对地飞回老家去了。只剩下一对剪去翅膀上毛的鸽子，但一个星期后它们翅膀上的毛长好了，也就离开了建得很漂亮的、有走廊连接的鸽子窝。养鸽子的试验也就到此结束。

父亲在伊丽莎白格勒郊外向特一茨卡娅太太租了田地。这是一个寡妇，年近四十，颇有个性。有一个神甫在她那儿供职，是个鳏夫，他喜爱音乐、打牌，还有许多其他嗜好。特一茨卡娅太太带着鳏夫神甫到扬诺夫卡来修改租赁条件。我们腾出客厅和隔壁房间供他们下榻，用油鸡、樱桃酒和樱桃馅饺子款待他们。午饭后我留在客厅里看到神甫坐到特一茨卡娅太太的身旁，在她身边说着什么非常可笑的事情。他撩起长袍，从条纹裤的口袋里掏出镶着花字的银烟盒，点上一支烟，灵巧地吐出一个个大烟圈。在太太不在场时，神甫说她只读小说的对话。大家都出于礼貌地笑着，但不议论，因为大家知道，神甫会把一切都告诉太太的，而且还会添油加醋。

父亲和卡齐米尔·安东诺维奇一起向特一茨卡娅租田。那时卡齐米尔已经丧妻，他本人也突然变了样：斑白的胡子不见了，身上出现硬领、领带、别针，口袋里装着女士的照片。卡齐米尔·安东诺维奇尽管和大家一样也嘲弄格里戈里叔叔，但却向他吐露所有心事，并从信封里掏出照片给他看。“您瞧，”他对惊喜若狂的格里戈里叔叔说，“我对这个女主人说：‘夫人，您的两片嘴唇是专为接吻而生的。’”

卡齐米尔·安东诺维奇和这个女人结了婚，但婚后过了一年或一年半，他突然死了，是在特茨卡娅庄园的院子里被一头公牛用角挑死的……

离扬诺夫卡 8 俄里是弗一泽尔兄弟的庄园。有几千俄亩土地，房子像座宫殿，富丽堂皇，有许多客房，有台球房和其他设施。弗泽尔兄弟俩列夫和伊万，是从父亲季莫菲伊那里得到这一切的，这些遗产逐渐花完了。产业在管家手里，尽管用的是复式簿记法，还是亏空。“您别看达维多·列昂诺维奇住在土房子里，他比我富。”有时弗一泽尔哥哥谈到我父亲时这么说，这些话传到父亲耳朵里时，父亲显然感到满意。有一次，弟弟伊万和两个猎人骑着马，肩背猎枪，带着一群白色猎犬走过扬诺夫卡。这种情况扬诺夫卡从来没见过。“这样打猎，他们很快就会把遗产打光的。”父亲随后不以为然地说道。

赫尔松省的这些地主家庭都盖有必然败落的印记。他们变迁极快，并且越来越朝着一个方向，即败落的方向变，尽管他们的组成是各种各样的：有世袭的贵族，有因工作获得封赏的官吏，有 1881 年前买得土地的波兰人、德国人和犹太人。这些草原家族中的许多家族的创业者就本身而言都是出色的、走运的人，而按本性说又都是凶恶的掠夺者。不过这些人我一个也不认识，他们在 80 年代初就都死了。他们中的许多人从半个戈比起家，胆大妄为，无法无天，攫取大量财富。其第二代已经是在新兴的贵族环境中成长，操一口法语，打台球，过着放荡的生活。海外竞争引起的 80 年代的农业危机，无情地打击了他们。他们像树上的枯叶那样凋落了。第三代产生出许多半破产的二流子，毫无用处的人，心态不稳定的过早的废人。

格尔托潘诺夫家族是贵族败落的最纯粹的见证。一个大村和整个乡都用他们的姓称为格尔托潘诺夫斯卡。有一个时期整个地区都属于这个家族。现在这个老头还剩下 400 俄亩土地，但它们都已经被抵押或再抵押了。我父亲租下这片土地，租金交到银行。季莫菲伊·伊萨耶维奇（格尔托潘诺夫）靠给农民们写禀帖、状纸和书信为生。他到我们家来作客时总是在袖子里藏着烟叶和砂糖，他的妻

子也是这样。她口沫飞溅地讲述自己的童年，讲述女奴、钢琴、丝绸和香水。他们的两个儿子几乎都是文盲，小儿子维克多在我们的作坊里当学徒。

离扬诺夫卡五六俄里的地方有一家地主——犹太人姆斯基。这是一个古怪乖僻的家庭。莫伊谢·哈里顿诺维奇老头，60岁左右，受过贵族式的教育，讲一口流利的法语，会弹钢琴，懂得点文学。他的左手不听使唤，而右手，据他说，可以为音乐会演奏。他那不事修剪的指甲就像响板一样敲在古钢琴的琴键上，从奥金斯基的波格涅兹舞曲不知不觉地转到李斯特的狂想曲，一下子又滑到《少女的祈祷》上去了。这样的跳跃也经常发生在他的谈话里。有时老头突然停止演奏，跑到镜子前，如果近旁没人，他就用卷烟从各个不同的方向去燎自己的胡子，用这种办法加以梳理。他不停地抽烟，好像很难受地喘着气。他的妻子，一个肥胖的老太婆，已经约有15年不讲话了。他的儿子达维德35岁左右，是个自杀未遂者，脸上总是绑着一条白绷带，绷带上露出一只眨巴着的红眼睛。他在服役时骂了一个军官，军官打了他，达维德打了军官一记耳光便跑到营房企图开枪自杀。子弹穿过脸颊，因此脸上总是绑着一条白绷带。严厉的惩罚威胁着这个士兵。那时，这个王朝的开山人哈里顿老头还活着，他有钱有势，是一个识字不多的暴君。他把整个省份都搅动起来，为自己的孙子取得无责任能力的鉴定。不过，这也许跟事实相差无几。达维德从那时起便带着那张被打穿的脸颊和一张疯子的身份证过活。

姆斯基一家继续留在我的记忆里，在我小时候，莫伊谢·哈里顿诺维奇还乘着由良种马拉的四轮轻便马车出行。很小的时候，大约四五岁，我和哥哥曾到姆斯基家里去过。花园很大，维护得很好，甚至还养着孔雀。我还是头一次看到这种很稀罕的禽鸟，奇妙的头上有一只小皇冠，童话般的尾巴上有许多漂亮的小镜子，脚上有距。后来，孔雀连同别的许多东西都不见了。花园四周的篱笆破旧不堪，果树和花草被牛羊糟蹋殆尽。莫伊谢·哈里顿诺维奇到扬诺夫卡来坐的是农民的马拉大车。他的儿子们试图重整庄园，但不是按地主的方式，而是按农民的方式。“我们要买几匹劣马，像勃朗



施坦那样，每天早晨去练马。”“他们什么也搞不成的。”我父亲说。为了买“劣马”，达维德去了伊丽莎白格勒的集市，他在集市上走来走去，以一个骑兵的眼光细细端详，最后买回三匹马。他很晚才回到村里，屋子里挤满客人，都穿着单薄的夏装。阿勃拉姆举着灯跑到门廊去看马，一群女士、大学生和孩子跟着他。达维德立刻感到自己是内行，解释每匹马的优点，特别是按他的说法，像小姐的那匹马。阿勃拉姆摸摸胡子，重复道：“马儿是不错……”最后是野餐。达维德脱下一位可爱的女客的一只鞋子，斟满啤酒，捧近唇边。

“难道您真要喝？”那位女客问道，由于惊讶或者由于高兴，她飞红着脸。

“既然我向自己开枪都不怕……”这位英雄回答，接着便把鞋里的啤酒倒进嘴里。

“你最好别吹自己的业绩。”总是不声不响的母亲出人意料地作出反应，她是一个虚胖的女人，家务事都压在她身上。

“您这是秋播小麦吗？”阿勃拉姆·姆一斯基问我父亲，以显示他的能干。

“那自然不是春播小麦。”

“是尼科波利卡？”

“我这是秋播的。”

“我知道是秋播小麦，不过它是哪个品种：是尼科波利卡还是基尔卡？”

“我不知道有秋播的尼科波利卡，也许有人有，但我没有。我只有桑多米尔卡种。”

这种努力就这样毫无结果。一年后土地又重新租给我的父亲。

德国移民组成了一个特殊的集团。他们中间有的就是富翁。他们的家庭生活方式很严厉，儿子们很少被送到城里去，姑娘们通常在田间劳动。与此同时，他们的房子是砖砌的，有红绿色铁皮屋顶，马是良种的，马具完整无损，弹簧马车就叫做德国大车。离我们最近的是伊万·伊万诺维奇·多伦，一位好动的胖子，赤脚穿一双皮鞋，粗

糙的脸颊上长着硬毛，头发斑白，总是乘坐画有艳丽的花儿的美丽马车，套着乌黑的公马，马蹄敲打着土地。像多伦这样的人是不少的。在他们之上的是一个叫法利茨菲因的人物，绵羊大王和草原上的康尼特菲尔什坦。

无数牲畜蜿蜒而行。“谁的羊群？”“法利茨菲因的。”盐粮贩子运来粮草。“给谁的？”“给法利茨菲因。”三套马拉的彩色雪橇驮着堆得像金字塔似的皮毛，奔驰而过，这是法利茨菲因的管家。有时突然有一队骆驼经过，它们的样子和吼声使你吃惊。只有法利茨菲因拥有骆驼。法利茨菲因有美国的公马，瑞士的公牛。

这个家族的创业者，当时是法利茨，而不是菲因，在奥登堡公爵那儿当牧羊人。官方拨给公爵一批巨款用以繁殖美利奴绵羊，他欠下了约一百万卢布的债，但一事无成。法利茨买下了产业，他不是按公爵的方式，而是按牧人的方式管理。他的羊群就像他的牧场和庄园一样不断扩大。他的女儿嫁给了养羊专家菲因。两个养羊家族就这样联合在一起了。法利茨—菲因的名字听起来就像几万只羊蹄声声，就像无数只羊的咩咩声，就像草原上背着长鞭的牧羊人的叫喊和唿哨声，就像无数牧羊犬的吠叫声。无论在炎夏，还是严冬，整个草原上都充满了这个名字的声音。

我的最初五年过去了。我的经验增多了。无论在小小的穷乡僻壤，还是在世界舞台上，生活都充满了各种不可思议的事，不懈地进行着各种各样的组合，事件一个接一个地向我袭来。

有一个女工被从地头抬回来，她在一块割过的庄稼地里被腹蛇咬伤了。姑娘哭得好伤心。人们把她那条肿胀的腿紧紧地捆绑到膝盖以上，把它浸在一桶酸奶里。姑娘被送往博布里涅茨的医院里，从那儿又回来后她工作了。她在被咬伤脚上穿上一只又脏又破的袜子，工人们都称她为小姐。

一只公猪把喂养它的小伙子的额头、肩膀和一只手咬伤了，是一只新买来的大猪，用来改良猪群的。小伙子吓得要死，像孩子似地啜泣。他也被送进了医院。

两个年轻工人站在运麦捆的大车上，相互掷铁叉玩。我盯着这个场面，铁叉刺入了一个小伙子的腰部，他哀号着倒下了。

这一切发生在一个夏天里。没有一个夏天不出事的。

一个秋天的夜里，磨坊的整个木建筑都被刮到池塘里去了。木桩早已腐烂，在暴风下木板墙像船帆一样被刮走。锅驼机、磨粉机、粗谷研磨机、分碎机矗立在废墟上。木板下磨坊的大老鼠不断地窜来窜去。

我总是偷偷地跟着担水人到地头去捉黄鼠。要仔细地往洞里灌水，不要太快，也不要太慢，手拿棍子等着皮毛紧贴在一起的湿漉漉的鼠头在洞口出现。老黄鼠要顽抗一阵，用臂部堵住洞口，但灌下第二桶水便投降了，出来送死。打死的黄鼠要斩下脚爪，串在线上，因为每打死一只黄鼠，地方自治局可奖给一个戈比。从前要求出示尾巴，但滑头的人把一张鼠皮割成十条尾巴，于是地方自治局就改为凭脚爪付钱。我总是浑身泥水地回去。家里并不鼓励这种冒险活动，他们更喜欢我坐在餐厅的沙发上临摹盲人俄狄甫斯和安提戈涅<sup>①</sup>。

有一次我和母亲乘雪橇从附近的城市博布里涅茨回家，那刺眼的白雪、摇摇晃晃的雪橇使我睡着了。转弯时雪橇翻了，我栽倒在地，毛毯子和垫草压在我身上。我听到母亲惊慌的呼唤，但我无法回答。马车夫——这是一个新来的年轻人，身材高大，头发棕红——把毯子掀开，找到了我。我们又重新坐下来，继续前进。但我开始抱怨，我冷得背上起鸡皮疙瘩。“起鸡皮疙瘩？”年轻的棕红色胡子的马车夫转过身来，露出一副坚实而雪白的牙齿。我瞧着他的嘴巴说道：“是的，您知道，像是鸡皮疙瘩。”马车夫笑着说：“没关系，快到了！”接着便赶那匹浅黄色的马。第二天夜里，这个马车夫和那匹浅黄色的马一起不见了。庄园里一片混乱。立即组织了一支追查队，由大哥率领去追赶。他给名叫摩茨的马备了鞍，保证要狠狠地治一下盗马贼。“你先赶上他。”父亲忧郁地对他说。追赶的人追了两天两夜。哥哥抱怨有雾，使他没能追赶上盗马贼。就是说，那个漂漂亮亮、快

<sup>①</sup> 均为希腊神话中的人物。——译注

快活活的小伙子居然是个盗马贼！还有一口雪白的牙齿！

我热得难受，辗转不安。手、脚、头都搅在一起了，它们在膨胀，顶到了墙壁和天花板，但冲不出这些障碍了，因为障碍出自内心。我喉咙疼痛，浑身发烧。母亲看了看我的喉咙，父亲也看了看。他们不安地交换了一下眼色，决定在我喉咙上涂一种蓝色的粉末。“我怕廖瓦得了白喉。”母亲说。“要真是白喉，”伊万·瓦西利耶维奇回答，“他早就躺在长凳上了。”我模糊地猜想，躺在长凳上就意味着死了，就像妹妹罗佐奇卡死的时候那样。但我不相信这会轮到我身上，因此我平静地听着他们谈话。最后决定把我送到博布里涅茨去。母亲不太相信宗教，但星期六决定不到城里去。伊万·瓦西利耶维奇和我一起去。我们住在小塔吉扬娜那里，她是我们过去的女佣，后来嫁到了博布里涅茨。她没有孩子，因此也就没有传染的危险。沙图诺夫斯基医生看看我的喉咙，量了体温，然后像通常那样，说现在还什么都不知道。女主人塔尼娅给我一只啤酒瓶，瓶里面是用木棍和小木片搭成的小教堂。手脚不再使我讨厌，我病愈了。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是新时代开始之前不久。

事情是这样的：阿勃拉姆叔叔，一个老利己主义者，他一连几个星期都不理睬孩子们，突然在一个好时辰把我叫去并问道：“你说，直接说，现在是哪一年？不知道？是1885年！重复一下，记住！以后我要问的。”这是怎么回事，我无法理解。“是的，现在是1885年，然后将是1886年。”文静的堂妹奥莉加说。我不相信，如果时间有自己的名字，那么1885年就会永远存在，也就是说像大门口代替门坎的大石条，就像磨坊，就像我自己一样非常长久地存在下去。奥莉加的妹妹别佳不知道相信谁好。三个人都由于进入了新的领域而感到惶惶不安，就像很快打开一个通过黑暗房间的大门，那里没有家具，只有空洞的回声。最后我不得不屈服，大家都站到奥莉加的一边。这样，在我的意识中第一个用数字作的纪年，便是1885年。它结束了混沌的时间——我生命的史前时期，从这时起开始了纪年。当时我6岁。对俄国来说，这是个歉收、危机和首次出现一批大工潮的年份。但是它只以其不可思议的名称使我震惊。我不安地力图找出时

间和数字之间的神秘联系。然后开始了年份的交替，起先很慢，后来就越来越快了。但8和5这两个数字在它们中间就像个老前辈，就像个族长。它是我的纪元之始。

有过这样一件事。我坐上了台阶前的一辆大车，在等待父亲的时候，拿起了缰绳。几匹年轻的马立即狂奔起来，驰过房屋，驰过粮仓，驰过花园，驰过没有道路的田野，直奔杰姆鲍夫斯基的庄园。背后是叫喊声，前面是壕沟。马没命地飞跑，直到沟前才来个急转弯，几乎把大车掀翻，然后纹丝不动地停在那里。马车夫在后面追，他后面是两三个工人，然后是父亲在跑，再后面是母亲在叫喊，姐姐则完全绝望了。甚至在我扑向父母的时候，母亲还在继续喊叫。无需隐瞒，吓得脸如死灰的父亲打了我两记耳光。我甚至并不感到委屈，因为一切都是异乎寻常的。

大约就在这一年，我和父亲到伊丽莎白格勒去了一次。我们一清早动身，不慌不忙，在博布里涅茨喂了马，傍晚到达夫舍瓦雅（出于礼貌，人们把它叫做什维瓦雅）<sup>①</sup>，在那儿等到天明，因为城郊有强盗行劫。世界上没有一个首都——无论是巴黎还是纽约，像伊丽莎白格勒那样，后来给我留下如此深刻的印象——它的人行道、绿色的屋顶、阳台、商店、警察和系线的红色气球。我一连几个小时张大眼睛观看这文明的面貌。

纪元开始后的一年我开始上学。有一天早晨，我睡醒后，很快洗了脸（在扬诺夫卡洗脸总是很快的），想着新的一天，首先想着掺牛奶的茶和黄油面包，我走进餐室，母亲和一个陌生人坐在一起，此人个子瘦削，淡淡地笑着，似乎在奉承讨好。从母亲和陌生人那瞧着我的样子可以明白，谈话同我有点关系。

“廖瓦，去问好，”母亲说，“这是你以后的老师。”我有点胆怯，但不无兴趣地看了一下老师。教师和蔼地与我打招呼，每一个教师在家长面前都是以这样温和的态度和自己未来的学生打招呼的。母亲

<sup>①</sup> 俄语“夫舍瓦雅”意为多风的。——译注

当着我的面结束了事务性谈话：以多少卢布、多少普特面粉为学费，教师负责在移民区的学校里教我俄语、算术和古犹太语的圣经。不过科目的范围很模糊，因为在这方面妈妈不内行。我喝着奶茶，已品味到我未来命运的变化。

星期天父亲把我送到移民区。移民区位于小山谷的两旁，一边是犹太人居住区，另一边是德国人居住区。两个区完全不同。德国人居住区中房屋整齐，一部分是瓦房，另一部分是草房。马车高大，奶牛肥壮。犹太人居住区里是破旧的小木房，破烂的屋顶，瘦弱的牲口。

说来奇怪，第一个学校没留下什么印象，我第一次写俄文字母的石板、教师手上那只弯曲的干瘦的食指，齐声朗读圣经，惩罚某个有盗窃行为的学生——这都是模模糊糊的片断，朦朦胧胧的点滴，没有任何鲜明的印象。例外的也许只有教师的妻子，一个胖胖的高个子女人，她有时突如其来地闯入我们的学校生活。有一次，在上课时，她向丈夫抱怨，新买的面粉有一股气味，而当教师把自己尖尖的鼻子伸向她手里的面粉时，她把面粉全撒到他脸上。这就是她开的玩笑。男孩子们和女孩子们都笑了起来，只有教师很不高兴。当他满脸面粉站在教室中央时，我很同情他。

我住在善良的拉希拉婶婶那儿，却看不到她。在这院子里，在这主房里，是阿勃拉姆叔叔主宰一切。他漠不关心地对待自己的侄儿和侄女，我有时却受到特别看待，他把我叫去，请我啃带骨髓的骨头，一边说道：“这骨头，直说吧，给我 10 个卢布也不给的。”

叔叔的房子几乎就在移民区的入口处。在对面的一端住着一个瘦高个子、皮肤黑黑的犹太人，他享有偷马贼和干暧昧勾当能手的名声。他有个女儿，名声也不好。离偷马贼家不远住着一个帽匠，用机器制帽，这是个年轻的犹太人，留着火红色胡子，他的妻子来找耽搁在阿勃拉姆叔叔家里的移民区政府视察员，控告偷马贼的女儿夺走了她的丈夫。看来，视察员帮不了忙。有一天我从学校回来，看到一群人沿街拖着一个年轻女人——偷马贼的女儿，那群人喊呀、叫呀，还向她吐唾沫。这个像圣经中听说的场面我一直没能忘怀。几年之

后，阿勃拉姆叔叔和这个女人结了婚。这时候，根据移民们的决定，她父亲已作为危害社会分子被发配到西伯利亚去了。

我以前的保姆玛莎在阿勃拉姆叔叔那儿帮佣，我时常到厨房去找她，她是和扬诺夫卡联系的体现。客人们，有时是些迫不及待的客人来找玛莎，那时他们便悄悄地让我出去。一天早晨，我和家里的所有孩子们获悉玛莎生下一个孩子。我们既高兴、又不安，在角落里窃窃私语。几天后我母亲从扬诺夫卡来，到厨房去看望玛莎和她的孩子。我跟在母亲背后。玛莎额上低低地包着头巾，一张宽阔的长凳上侧身躺着一个小小生命。母亲看看玛莎，然后看看孩子，责备地摇摇头，什么话也没有说。玛莎默默地眼睛看着下面，然后瞧一瞧孩子，说道：“你看，一只小手放在脸颊下面，就像大人似的。”“你可怜他吗？”母亲问。“不，”玛莎假装说，“睡吧，心肝。”“你撒谎，你可怜他……”母亲温和地反驳说。一个星期以后孩子神秘地死去了，就像他来到人世那么神秘。

我常常离校到乡下去，在那里每次要呆上一星期或更长一些时间。在同学中间我和谁都不亲近，因为我不会说犹太语。学习只持续了几个月。这大概就是关于学校的记忆如此之少的原因所在。但舒菲尔（这是格罗莫克列伊的那位老师的名字）还是教会了我读和写，而这两种技能对我以后的生活是很有用的。因此我一直怀着感激之情回忆我的启蒙老师。

我开始读一行行铅印的字句。我抄写诗歌，还自己写诗歌。后来我又和自己的表兄弟谢尼亚·日一斯基着手办杂志。然而，新的道路也是荆棘丛生的。我刚刚懂得写作技巧，它已经在诱惑我了。有一天，我一个人呆在餐室里，开始用印刷体字母记录那些我在作坊、厨房听到的，而在家里不讲的特别的话。我意识到我在做不应该做的事情，但正因为这些话是禁止讲的，所以更有诱惑力。我决定把这不幸的字条放在火柴盒里，再把它埋在粮仓后面的地里。我还没有把自己的文件写完，姐姐走进了餐室，对它发生了兴趣。我从桌上抓住小纸片。母亲跟着姐姐进来了。她们要我拿纸拿给他们看。我羞得要死，便把纸丢在沙发背后。姐姐想把纸捡起来，我歇斯底里地

大喊：“我自己去捡。”我钻到沙发下面，在那儿把纸撕得粉碎。我眼泪汪汪，非常失望。

大概是在 1886 年的复活节（因为我已经会写字了），晚上喝茶的时候，一群化了装的人闯进了餐室。事情非常突然，我吓得倒在沙发上。人们安慰我，于是我贪婪地听着马克西米利安沙皇的故事。在我面前第一次展出了一个由戏剧演出的幻想世界。当我知道上兵出身的工人普罗霍尔饰演主角时，我大为惊服。第二天午饭后我带了铅笔和纸钻进下房，要求马克西米利安沙皇对我口述自己的独白，普罗霍尔推托不干。但我缠住他，要求他，恳求他，不放他走。最后，我仍坐在窗子旁，在凹凸不平的窗台上记录马克西米利安沙皇押韵的台词。还不到 5 分钟，父亲向门里看了一下，他看到窗户旁的场面很严厉地说：“廖瓦，回房间里去。”我在沙发上伤心地直哭到晚上。

我写诗，写平庸的诗句，这些诗句也许表露了早年对话词的爱好，但肯定没有预示写诗的发展前途。姐姐知道我的诗歌，通过姐姐，母亲也知道了，而通过母亲，父亲又知道了。他们要我给客人朗诵自己的诗。我感到非常难为情，拒绝朗读。他们劝我，起先还和颜悦色，后来有点恼火了，最后是威胁。我常常逃走。但大人们还是坚持。我眼里含着泪水，心怦怦跳动着朗诵自己的诗，念到借用的诗句或不协调的韵脚时，总感到不好意思。

但是，我用各种方式已经尝到知识树上的果实。生活不是一天一天，而是一小时一小时地在扩大。一条条的线从餐室有窟窿的沙发上延伸到另一个世界。读书在我生活中揭开了新的纪元。



### 第三章

## 家庭与学校

1888年我的生活中出现了几件大事。我被送往敖德萨学习。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那年夏天，母亲的一个28岁的侄子莫伊谢·菲利波维奇·什宾采尔到乡下来住，这是一个既聪明又善良的人，像那时人所说的，当时他有点“倒霉”，没能从中学升入大学。他做一点记者工作，也搞一点统计工作。他因肺结核病到乡下来疗养。大家叫他莫尼亚，无论在才能还是在品性方面，他的母亲和几个姐妹都为他自豪。我们全家对他也很尊重。听说他要来，大家都很高兴。我也暗自高兴。当莫尼亚走进餐室里，我站在所谓“儿童室”（拐角处的一个小房间）的门坎后，对是否朝前走犹豫不决，因为我两只皮鞋张开了两个大口。这并不是因为穷——那时家里已非常殷实，而是因为乡下不讲究，工作过于劳累和家庭需求水平不高。“你好，孩子，”莫伊谢·菲利波维奇说，“到这儿来……”“您好！”孩子回答，但身子没有动。人们带着歉意的笑容向别人解释是怎么回事，于是他快活地使我摆脱了窘境——把我抱过门坎，紧紧地拥抱。

午饭时，莫尼亚成了注意的中心。母亲把最好的菜递给他，问他是否好吃，再把他喜欢吃的东西递给他。晚上，牲畜被赶进畜栏，莫尼亚对我说：“走吧，去喝鲜牛奶。你去拿几只杯子……亲爱的，手指捏住杯子的外面，不要捏里面。”我从莫尼亚那里知道了早先不知道的许多东西，如怎样拿杯子，怎样洗脸，某些词怎样发音，为什么喝刚挤出来的牛奶对肺部有好处。什宾采尔散步、写作，玩儿柱戏，教我算术和俄语，为我上一年级作准备。我非常喜欢他，但又感到不安，

因为从他身上可以感觉到某种较为严格的规矩，这是城市文明的因素。

莫尼亚对乡下的亲戚和蔼可亲，常常开玩笑，用柔和的男高音唱歌。但他的情绪很快又会因什么而变得忧郁，他坐着吃中饭时沉默寡言，显得孤僻。大家不安地瞧着他，问他怎么啦，是不是病了。他简短而又含糊地作答。只是在客人快要结束乡下之行时，我才模模糊糊地猜到其中的原因——莫尼亚对乡下的某种粗暴或不公正行为感到吃惊。不是因为岳父姑母是特别苛刻的东家，不，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这么说。对待工人和农民的关系怎么也不会比别的庄园坏，但也好不了多少。而这意味着，这种关系的性质是沉重的。有一次管家用长鞭抽打一个牧人，只因为牧人把马儿留在水边直到傍晚。莫尼亚看到这些情景脸色发白，愤愤地说：“多么卑鄙！”我也感觉到这确实卑鄙。我不知道，要是莫尼亚不在，我是否会有这种感觉。我想，会有的。但不管怎样，在这方面他帮助了我，仅此一点就足以使我对他终生怀有感激之情。

什宾采尔准备与敖德萨公办犹太女子学校校长结婚。在扬诺夫卡谁也不认识她，但大家相信，无论作为学校的校长还是未来莫尼亚的妻子，她必定是个出色的女人。家里决定，明年春天送我到敖德萨，就住在什宾采尔家里，并去中学读书。移民区的裁缝给我做了一些衣服，一只大箱子放了几罐油，几瓶果酱和其他给城里亲戚的小礼物。大家长久地告别，我哭得很伤心，母亲哭了，姐妹们也哭了，这时我第一次感觉到扬诺夫卡和扬诺夫卡的一切对我是多么珍贵。我们在草原上乘马车去车站，我一直哭到上大路的转弯处。我们从新布格站乘火车到尼古拉也夫，在那里转乘轮船。轮船的汽笛声叫得我背上发麻，同时又像在预告新的生活。但这只是布格河，大海还在前面。许多、许多东西都在前面。瞧，这是码头，马车夫，波克罗斯基胡同，女子学校的古老的大房子还有它的女校长。先是一位年轻妇女，然后是一位年纪大的女人——她的母亲，从上到下把我打量了一番，然后亲吻我的额头和脸颊。莫伊谢·菲利波维奇和往常一样开着玩笑，询问扬诺夫卡的情况，问到了所有的居民，甚至他所熟悉的

奶牛。但奶牛对我来说，现在已是意义不大的动物，在这种上流社会里我甚至羞于谈到它。住宅不大，他们在餐室的一个角落挂上帘子让我住。我在这儿度过了学校生活的最初四年。

我立即整个地处于那有吸引力、但又是要求严格的规矩约束之下，这种规矩我在乡下已从莫伊谢·菲利波维奇那儿感受到了。家里的生活制度不很严厉，但却很有规律，正因为如此，起初我觉得很严厉。9点钟就应当上床睡觉。只是随着我升到高年级后，睡眠时间才往后推。他们逐渐教给我早上要问好；要保持手和手指的清洁；不用刀去叉食物；永远也不要迟到；女仆送上饭菜来要表示感谢；不要在背后说人家坏话。我发现有几十个词在乡下认为是不容置疑的俄语，实际上并不是，而是不纯的乌克兰语。每天都在我面前展现文明环境的新的—角，它比生活中最初9年度过的那个环境要文明得多。在古典文学的魅力和戏剧的魔法面前，甚至作坊也开始变得暗淡和失去自己的吸引力。我成了小小的市民。但有时乡村仍在意识中鲜明地闪现，并且像失乐园似地吸引着我。那时我就会思念家乡，来回走动，用手指在玻璃上写向母亲问好的话，或者伏在枕头上哭泣。

莫伊谢·菲利波维奇家里的生活是俭朴的，收入勉强够用。这位—家之主没有固定的工作。他翻译希腊悲剧并注解，为儿童写故事，钻研史洛塞和其他历史学家的著作，打算编纂直观的年表，还帮助妻子管理学校。后来他开办了一个小出版社，最初几年困难重重，后来才得到迅速发展。过了10至12年，他成了俄国南方最著名的出版家，拥有一家大印刷厂和私人住宅。我在这个家庭里生活了6年，这6年正好是出版社创业的最初几年。我熟悉了排字、改版、拼版、印刷、折页和装订。校对是我所喜爱的消遣。我对刚刚印好的纸张的爱，起源于那遥远的学生时代。

就像通常在资产阶级、特别是在小资产阶级家庭里—样，女仆在我的生活中起了虽不显著，却是不小的作用。第一个女仆达莎和我建立了特殊的、秘密的友情，她把自己的各种秘密都告诉了我。午饭后，大家都去休息了，我就悄悄地溜进厨房。在那里达莎抽空给我讲自己的身世和自己的初恋。达莎走后是一个从日托米尔来的犹太妇

女，她和丈夫离婚了。“他是那么穷凶极恶。”她对我抱怨说。我开始教她识字。每天她花半个多小时坐在我的书桌旁，想弄清字母和它们在词里的联系的秘密。这时家里有了婴儿，雇了个保姆。我代保姆写信，帮她向去美国的丈夫诉苦。我按照她的要求用了最阴沉的笔调，然后补充说：“只有我们的婴儿是我生活的阴暗天空中一颗明亮的星星。”保姆极为高兴，我自己也得意地高声朗读这封信，尽管结尾部分写到要他寄美元的事使我感到窘迫。然后她请求说：

“现在还有一封信。”

“给谁？”我一面问，一面准备创作。

“给表哥。”保姆有点犹豫地回答说。这封信也谈到了忧郁的生活。关于星星则什么也没有说，信的结尾是说她同意到他那儿去，如果他希望她去的话，保姆刚拿了信离开，我的那个学生——女仆就进来了，显然，她在门口偷听。“他根本不是她的表哥。”她气愤地悄悄地对我说。“那是谁呢？”我问。“就那么回事……”她回答说。这就促使我去思考人际关系的复杂性了。

吃中饭时，范妮·索洛莫诺夫娜带着一种特殊的笑容对我说道：“作家，你不想再喝点汤？”“什么？”我吃惊地问。“噢，没什么。要知道，你代保姆写信，因此你就是作家了……你在信上怎么写的：‘阴暗天空中一颗明亮的星星’——真是作家。”她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

“写得不错，”莫伊谢·菲利浦维奇安慰我说，“不过，你知道，别再给她写信，还是让范妮自己代她写吧。”

人生混乱的一面不为家庭，也不为学校所承认，但它并不因此而不存在，它是强大的，无所不在的，足以引起一个10岁小孩的注意。学校的教室，住宅的前门，都不允许他进去，但他却在厨房找到了自己的通道。

1887年规定，犹太人进入公立学校的比例为百分之十。进中学几乎是毫无希望的，除非有“门路”或者行贿。实科中学与古典中学的区别是，实科中学不上古典语言，而比较注重数学、自然和现代语言。“比例”也扩展到实科中学。但上实科中学的人少，因此进入这种学校的机会就多一些。在刊物上对古典教育和实科教育进行了长

期的争论。保守主义分子认为古典主义能养成学生遵守纪律的习惯，说得准确些，他们希望童年时死读希腊文的公民在以后的生活中能忍受沙皇制度。自由派也并不拒绝古典主义，古典主义是自由主义的同胞兄弟，因为它们都发源于文艺复兴时代，同时又都鼓励实科教育。我上学的那个时候，这场争论已经平息了，因为发布了一道专门的通告，禁止讨论两种教育制度的优劣问题。

秋天，我报考了圣保罗实科中学一年级。我的入学考试成绩很一般：俄语3分，算术4分。这个分数是不够的，因为“比例”要求作极为严格的挑选，而行贿则自然使事情更加复杂化。结果我被录取在附属于公立学校的私人开办的预备班里，在这里犹太人升一年级尽管是按“比例”的，但比较外考生有优先权。

圣保罗实科中学原先是所德国学校。它是路德教区为敖德萨和整个南方的无数德国人开办的。尽管圣保罗中学享有国家规定的权力，但由于该校只有六个年级，所以要进入高等院校还要到其他实科中学上七年级，这种做法显然就是要在最后一年级除去剩下的那点德意志精神。不过，在圣保罗中学里，这种精神已一年一年地减少。德国学生不到半数，德国的教职员也被坚决地排挤走。

在学校里，最初几天过的是苦日子，后来才成为欢乐的日子。我上学时穿了一身新缝制的制服，戴一顶黄色镶边的制帽，帽子上还有一个引人注目的金属帽徽，帽徽上有两个三叶形图案，中间夹着用花体写的校名缩写字母。我背着一只新书包，里面装有漂亮封面的教科书和好看的文具盒，盒里放着削得极尖的铅笔、新的钢笔和橡皮。我兴高采烈地带着这辉煌的行装，走在长长的乌斯宾斯基大街上，使我高兴的是，到学校去的路并不远。我觉得，所有的行人都惊叹不已，而有些人也许还妒忌地瞧着我那出色的装备。我也带着信任的目光很感兴趣地打量着所有迎面而来的一张张脸。但完全出乎意料的是，迎面来了一个13岁左右的瘦高个的男孩子，看来是在工场干活的，因为他手里拿着一个铁制工具，他在离我这个穿着华丽的学生两步远的地方停住，把头往后一仰，大声地咳了一下，使劲地向我那崭新的上衣肩上吐了口痰，轻蔑地瞧了我一眼，什么话也没说就走过

去了。是什么驱使他这么做的？现在我明白了。一个穿着破衬衫，赤脚穿一双破烂不堪的鞋子的不幸孩子，要完成老板交付的脏活，而老板的那些儿子却穿着漂亮的校服，于是他就把对社会的不满发泄到我的身上。但那时我还不会作概括。我用栗树叶把肩膀擦了又擦，一种无可奈何的委屈感在我心中翻腾，怀着沮丧的心情走完了剩下的最后一段路程。

第二个打击又在学校的院子里等待着我。“彼得·巴甫洛维奇，瞧，又是一个，”学生们喊道，“也穿着制服，倒霉的预备班学生。”怎么回事？原来预备班被认为是私立学校，因此预备班学生是严禁穿制服的。彼得·巴甫洛维奇，一个黑胡子的学监对我解释说，必须把帽徽摘去，把帽边除掉，把金属小牌拿下来，并用普通的骨制纽扣换下有老鹰图案的扣子。这是我遭到的第二个不幸。

这一天学校里没有课，德国学生，还有许多别的学生一起聚在路德派教堂里，学校就是以这个教堂命名的。我立即处于一个矮壮的男孩的保护之下，他是预备班的留级生，知道所有的规矩，他让我和他一起坐在教堂的板凳上。我第一次听到风琴的声音，它那颤动的声音充满了我的心灵。随后出来一个身材高大，刚刮过胡子，穿着白色镶边外衣的人，他声音宛如起伏的波浪在教堂里回荡。听不懂的语言使庄严的布道演说增强了十倍。“那讲话的是谁？”我激动地问。“他就是宾涅曼牧师，”卡尔松给我解释说，“他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是放德萨最聪明的人。”“他说的什么？”“嗯，还不是老一套，”卡尔松解释道，他的劲头已经小得多了，“应当做个好学生，要勤奋学习，对同学要和气……”这个大颧骨的宾涅曼的崇拜者原来是一个懒汉，一个好打架的人，课间休息时经常把别人打得鼻青脸肿。

第二天得到了安慰。我立即在数学方面表现出色，书法也抄写得很好。罗坚科老师在班上表扬了我，给了我两个5分。这使我不再计较衣服上的那些骨制纽扣了。低年级的德语是由校长赫里斯季安·赫里斯季安诺维奇·什凡涅巴赫本人教的。这是一个头发梳得很光亮的官员，只因是宾涅曼的女婿，所以能身居高位。赫里斯季安·赫里斯季安诺维奇一开始就检查学生的手，他发现我的手很干

净。然后，当我工工整整地抄写黑板上的作业时，校长表示赞许，给了我5分。这样，正式上课的头一天，我从学校里带回三个5分，就像带着珍贵的宝贝直奔波克罗夫斯基胡同，不是行走，而是奔跑。

就这样，我成了一名中学生。我总是早早地起床，匆匆地喝早茶，把用纸包好的早点塞进大衣口袋，奔向学校，赶去做晨祷。我从未迟到过。我安静地坐在座位上，注意地听讲，仔细地抄写黑板上的作业。在家里，我勤奋地做功课。我按时睡觉，以便第二天早晨能匆匆喝完茶，跑到学校去，唯恐赶不上做晨祷。我顺利地从一个年级升到另一个年级。在街上遇见老师时我总是毕恭毕敬地向他们鞠躬行礼。

在一般人中间，怪人占很大比例，而在教师中怪人的比例尤其高。看来，圣保罗中学教师的水平，在中等以上。这所学校被认为是好学校，这不是毫无根据的，它校规严格，苛求，管束一年比一年紧，特别是校长的权力从什凡涅巴赫转到尼古拉·安东诺维奇·卡明斯基手里以后。他的专业是物理，而其本性则是仇视人类。他从不正眼看待和他谈话的人。他穿一双橡皮底的鞋，无声无息地在走廊和教室里走动。他用一种小而干哑的假声说话，不用提高嗓子就能使人感到畏惧。从外表上看，卡明斯基很稳重，但内心里从来没有摆脱积存的愤怒状态。甚至对待优秀学生他也是采取一种武装中立的态度，他对我的态度也是这样。

作为一个物理学家，卡明斯基发现了一种能证明波义耳—马略特气压定理的专门仪器。每当仪器演示之后，总有两三个学生故意悄声说道：“瞧，多棒！”这时就有人抬起点身子，似乎有点迟疑地问道：“那么准是这个仪器的发明者呢？”卡明斯基就会漫不经心地用那像伤风似的假嗓子回答说：“我制作的。”大家互使眼光，而那些得两分的学生则尽可能响地发出赞叹声。

为了推行俄罗斯化，用卡明斯基换下了什凡涅巴赫，同时文学教师安东·瓦西利耶维奇·克雷扎诺夫斯基出任学监。这是一个留着火红色大胡子的狡猾家伙，神学校毕业，非常喜欢收受礼物，稍稍有点自由派情调，善于用假仁假义来掩盖自己的不良用心。得到学监

的任命后，他立即变得更严厉和保守了。从一年级起各班的俄语都归克雷扎诺夫斯基教。我因文法正确，喜爱语言而受到他的青睐。他按惯例，每次都向全班朗读我的作文，并给我打了“5”的分数。

数学老师尤尔钦科是一个身材矮壮而冷淡的人，城府很深，绰号叫“宾久日尼克”，这在放德萨土语里是“赶货车的车夫”。尤尔钦科对所有的人，从一年级到最后一个年级，都称呼你，对用词并不讲究。他以一贯的粗鲁无礼获得某种敬畏，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当孩子们明确获悉尤尔钦科收受贿赂时，这种敬畏也就消失了。不过，其他教师也以不同形式收取过贿赂。成绩差的学生，如果他是外地来的，就寄住在他最需要的教师家里。如果是本地学生，他就出高价请对他最有威胁的教师给他补课。

第二个数学教师叫兹洛特吕斯基，和尤尔钦科正好相反，是一个瘦个子，蜡黄的脸上是针刺般的小胡子，眼珠浑浊，行动疲惫，有如半睡半醒。他往往在教室里咳嗽吐痰。大家都知道他有着不幸的爱情，知道他为何纵饮作乐。他是一个不错的数学教师，但他的眼睛总看不上学生，看不上课程，甚至看不上数学本身。几年以后，他用剃刀割断喉管自杀了。

我和这两个数学老师的关系是融洽的，因为我的数学不错。在实科中学毕业班时，我甚至还打算去钻研纯数学呢！

教历史课的老师叫柳比莫夫，大高个儿，很神气，一只不大的鼻子上戴着一副金边眼镜，丰满的脸上长着一圈刚毅的青年人的胡子。只是在他笑起来的时候，才突然让我们这些小孩子也看得清清楚楚，这个人的神气劲是装出来的，他意志薄弱，胆小怕事，内心总有什么东西折磨着他，害怕人家知道或会知道他的事。

我对历史的兴趣与日俱增，尽管这种兴趣是很模糊的。我逐渐扩大自己的学习范围，抛开可怜的官方教科书，去看大学教程或大部头的施洛塞尔<sup>①</sup>的著作。我对历史的迷恋，无疑包含有角逐的成分，

<sup>①</sup> 施洛塞尔(1776—1861年) 德国自由派历史学家，著有19卷本《世界通史》。马克思曾用过读书的资料。——译注



我费脑子背熟许许多多无用的名字和细节，为的是有时使教师处于难堪的境地。柳比莫夫控制不了课堂。有时他在课堂上会突然发火，怒气冲冲地环顾四周，寻找仿佛是讲他坏话的悄声低语的学生。全班就会惊奇地戒备起来。柳比莫夫还在一所女子中学教书，那里也发现这个人很古怪。最后柳比莫夫精神病发作，悬窗自尽。

大家都像怕火一样害怕地理教师茹科夫斯基。他像自动绞肉机似地对付学生。在上课时，茹科夫斯基要求保持一种根本无法做到的安静。他常常打断学生的叙述，凝神静听，就像一头猛兽在谛听远方危险的声音那样。此时大家都知道，这意味着：不要动弹并尽量屏住呼吸。在我的记忆里，只有一次茹科夫斯基稍稍放松一点缰绳，这好像是在他生日的那一天。有一个学生对他说了点半私事性质的话，也就是与功课没有直接关系的事，茹科夫斯基忍住了。这本身就是一件大事。善于拍马的瓦凯尔马上站起来，咧着嘴说：“我们大家都说，柳比莫夫远不如茹科夫斯基。”茹科夫斯基立即绷紧脸色来。“这是什么话？坐下！”一种只有地理课常有的那种特别的寂静立即笼罩着整个班级。瓦凯尔像挨了重重的一拳，坐下了。一张张责备的或厌恶的脸从各个方向转向他。“我起誓，真是这样。”瓦凯尔低声回答，他还希望打动地理教师的心，他在地理教师的心目中印象不好。

斯特鲁威是德语专职教师。他是个德国人，身材魁梧，肥头大耳，大胡子一直垂到腰际。此人一双几乎是孩子般的小脚支撑着仿佛装满了好心肠的肥硕的躯体。斯特鲁威是一个极为诚实的人，他为自己学生的成绩欠佳而烦恼不安，他劝导他们，并为每个只能得2分的学生感到难过，他从不给学生打1分。他竭力不使一个人留级，还安排自己厨娘的侄子，就是刚刚提到的瓦凯尔入学，不过这孩子缺乏才能，也不大招人喜欢。斯特鲁威有点滑稽可笑，但总的说来，他是个让人喜欢的人。

教法语的是古斯塔夫·萨莫伊洛维奇·比尤尔南德，瑞士人，身材瘦削，从侧面看去，体形扁平，就像用夹板夹过似的，有点秃顶，两片发育的令人不快的薄嘴唇，尖尖的鼻子，额上有个X形的神秘的

大伤疤。大家都一致讨厌比尤尔南德，这是有原因的。他有消化不良症，上课时总要吃几块糖果什么的，他把每个学生都看作自己的敌人。他额头上那个伤疤经常引起猜测和假想。有人说，古斯塔夫年轻时曾进行过决斗，对手用花剑在他额头上划了个叉叉。几个月以后这个说法遭到否定。他没有决斗过，而是做了一次外科手术，用额头上的皮去修补鼻子了。学生们仔细地察看了这位法文教师的鼻子，勇敢一点的学生甚至说，可以清楚地看到缝合的针眼。一些头脑冷静的聪明人则解释说，这是他童年时的意外事故造成的：他从楼梯上跌下来摔伤了。但这个解释被否定了，因为它过于平淡无奇，并且要把比尤尔南德想像成一个孩子，那是根本不可能的。

老看门人在我们生活中起了不小的作用，他是一个沉着的德国人，名叫安东，长着一脸威严的斑白的络腮胡子。在处理迟到、留下来不给中饭吃以及关禁闭室之类的事上，安东只管执行，但实际上却拥有很大的权力，因此必须和他保持友好的关系。不过我对他持无所谓态度，他对我也一样，因为我不是他的主顾，我准时到校，我的书包整理得井井有条，学生证肯定放在上衣左边的口袋里。但每天都有几十个学生落到安东手上，他们要用各种办法使他手下留情。至少对我们大家来说，他是圣保罗实科中学的台柱之一。当我们假期回来，得知安东老头由于爱情和妒忌而枪击了另一个看门人的18岁女儿，因而被关进了监狱，我们真是惊奇万分。个别人的灾难就这样进入有条不紊的学校生活和当时整个使人筋疲力尽的社会生活，并且每一次都给人留下过分的印象，有如旷野的号叫。

圣保罗教堂附设一所孤儿院。从我们学校的院子里划出一个角落供其使用。孤儿院的孩子们穿着洗净的蓝色帆布服装出现在院子里，一张张不高兴的脸，闷闷不乐地在自己的一角游荡，然后没精打采地沿着楼梯回去。尽管院子是共同使用的，没有用任何东西把孤儿院的一角隔开，实科中学学生和被称为“有教养的孩子”却是两个完全封闭的世界。我有一两次试图与穿蓝帆布服装的孩子们交谈，但他们却抑郁地勉强作答，接着便急忙忙回到自己的那一边去。因为严格规定他们不得过问实科中学学生的事。所以我在这个院子

里玩了7年，却连一个孤儿的名字都不知道。每逢新年，宾涅曼牧师大概是按照简本圣礼书给他们祝福的。

院子里靠近孤儿院的地方立着各种各样的运动器材，如吊环、爬杆、垂直的梯子、倾斜的梯子、秋千、双扣等等。我进学校不久，看到孤儿院有一个男孩子做过一个动作，我很想学着他的样子做。我登上垂直的梯子，用脚钩住上面的横木，头朝下，伸手抓住最下面的梯级，然后双脚一蹬，想在空中翻转180度，再平稳地落在地上。但是我没有及时松手，翻身时整个身子都撞在梯子上。结果胸口被撞伤，呼吸困难。我像虫子一样蜷曲在地上，抓住旁边孩子的脚，便失去了知觉。这以后我对体育活动就比较谨慎小心了。

我很少上街，去体育场运动和到户外去玩。这一切我到暑假里在农村加以弥补。我觉得城市是专为上学和读书而建立的。孩子们在街上打架我认为是可能的。然而，引起打架斗殴的导火线是从不会少的。

古典中学的学生服装是银纽扣并有纹章，因而他们被叫做青鱼，而黄铜纽扣的实科中学学生则被称为熏鱼。有一次我回家时，在亚姆斯卡娅大街上一个又瘦又高的中学生一直跟着我，问我：“你们的熏鱼什么价钱？”这个商业性问题没有得到回答，他用肩膀轻轻地碰我。“您干吗缠着我？”我气喘吁吁地用客气的口吻问他。中学生慌张起来，考虑了一下，然后问道：

“您有弹弓吗？”

“弹弓，这是什么东西？”我反问道。

这个瘦高个中学生默默地从口袋掏出一个小玩意：绑着橡皮筋的树枝，还有一块锡。“我从窗口打屋顶上的鸽子，然后用油炸。”我惊奇地瞧着这位新结识的朋友。这种事我觉得不无兴趣，但总觉得不妥当，并且在城市这种环境里有点不成体统。

许多男孩子在大海里划船，在防波堤上钓鱼。我可完全没有体会过这些乐趣。令人奇怪的是，尽管我在海边度过了7个年头，但那时候大海在我生活中没有任何地位。在此期间我一次也没有去划过船，没有去钓过鱼，总之，只有在去乡下和回来时才见着大海。卡尔

松星期一来校，鼻子晒得脱了一层皮，并夸耀他昨天在船上钓到许多鲑鱼，但这些欢乐对我来说是遥远的，与我无关。那时我还不是个打猎和钓鱼迷。

在预备班里，我和一个医生的儿子——柯斯佳·P. 最要好。柯斯佳比我小一岁，矮个子，表面上不声不响，但既淘气又滑头，有一双机灵的眼睛。他非常熟悉城市，在这方面大大胜过我。他并不勤奋，而我却从第一天开始就得5分。柯斯佳在家里老是谈自己的新朋友。结果，柯斯佳的妈妈，一个干瘦矮小的女人来找范尼娅·索洛莫诺芙娜要求说：“能不能让两个孩子在一起学习？”我参加了协商，协商后决定同意我们在一起。在两三年的时间里我们坐在一张课桌椅上。后来柯斯佳留级了，我们就分开了。不过，以后我们还保持联系。

柯斯佳有一个上中学的姐姐，比他大两岁。姐姐有几个女朋友，她们又有兄弟。姐妹们学习音乐，兄弟们则死缠着自己姐妹的女朋友。每逢过生日，父母就邀请一些客人。于是就造成一个充满好感、竞争、跳舞、游戏、妒忌和敌对的小天地。这个小天地的中心是富商A一家。他们和柯斯佳的家在同一幢房，同一层楼上。住房的走廊通向院里的同一个阳台，有意无意的会晤就在阳台上进行。A家里的气氛同我所习惯的什宾采尔家里的气氛完全不同。在那里经常有许多男女中学生来来往往，他们在母亲纵容的微笑下练习着如何献殷勤。在谈话中，常常提到谁对谁有好感。我对这个问题总是表现出极大的蔑视，不过那是十分伪善的。“当您爱上某一个人时，您必须告诉我。”14岁的女中学生，A家的姐姐指点我说。“我不会干这种事的，所以我可以答应您。”我以稍带高傲的自尊感回答说，我已经二年级了，我知道自己的身份。两星期以后，姑娘们表演活画。妹妹举起一只手表演夜，背景是一块黑头巾，上面点缀着用银纸做的星星，“您瞧，她多美。”姐姐轻轻地碰碰我说道。我瞧了一下，内心表示同意，突然出现一个念头：履行诺言的时候到了。接着姐姐审问似地对我说：“您没有什么要对我说的吗？”唉，我垂下眼睛回答说：“有。”“她是谁呢？……”

但我难以启齿。她建议我说第一个字母，这要容易一些。姐姐叫安娜(Анна)，妹妹叫别尔塔(Берта)。我说的字母表示第二个字母，而不是第一个字母。

“Б？”她失望地重复道，谈话便到此为止。

第二天和通常一样，我去找柯斯佳一起做功课，从院子里走到三楼长长的走廊里。在楼梯上我就看到姐妹俩和母亲坐在自己门前的走廊里。当我走到离她们几步远的时候，我感觉到针一般的讽刺目光刺透我的全身。妹妹没有笑容，相反，把视线移到一边去，并表现出一种极为冷漠的神态。这立即使我确信，我被出卖了。母亲和姐姐向我伸出手来，他们的表情显然在说：“这家伙，我们现在知道了，你那一本正经的后面藏着什么。”而妹妹伸出一只像块小木板的手，看也不看我，对我的握手也不作出反应。这以后我还要穿过一段走廊，当着这些折磨人的女性的面转个弯走到头。在这一段时间里，我一直觉得背上犹如针刺。在这种闻所未闻的背叛之后，我决定和这些阴险之徒完全断绝往来，不去找他们，忘记他们，把他们从自己的心目里永远抹去。很快来临的假期帮了我的忙。

我突然发现我是近视眼。我被领去看眼科医师，医生给我配了一副眼镜。不能说这使我伤心，不管怎样，眼镜增加了我的派头。我不无满足地预感到戴着眼镜出现在扬诺夫卡的情景。但眼镜对于父亲来说则是无法忍受的，他认为戴这种东西是装腔作势和摆架子，一定要我放下眼镜。我告诉他我看不清黑板上写的字和路上的招牌，但无济于事。在扬诺夫卡我只能偷偷地戴着眼镜。

我在乡下毕竟要勇敢得多，放手得多，也更有办法。我仿佛从肩上卸下了城市的规矩。我一人骑马到博布里涅茨，当天傍晚回到家里。这一共有50公里的路程。我在博布里涅茨的大街上戴上眼镜，相信给人们留下了印象。在博布里涅茨只有一所市立的男子学校，最近的一所中学在50公里外的伊丽莎白格勒，同时在博布里涅茨还有一所初级女子中学，这些女中学生的伙伴都是市立学校的男生。然而夏天情况却发生了变化，中学生和实科中学生从伊丽莎白格勒回来，以华丽的制服和文雅的举止排挤了市立学校的男生们。对抗

是激烈的。受委屈的博布里涅茨学生组织起一帮帮打斗的团伙，不仅动用棍棒和石块，而且还动刀子。有一次我在一家熟人的花园里安静地坐在一棵桑树上吃桑椹，吃得津津有味，不料栅栏外飞来一块相当大的石头砸在我的头上。这事闹了很久，也并非不流血的争斗中的一个小小的插曲，这场争斗只是由于特权阶层离开博布里涅茨回校上学才告中断。在伊丽莎白格勒情况却是另一种景象。在学期中古典中学学生和实科中学学生在街头，在姑娘的心田中占有统治地位，但是一到夏天大学生们从哈尔科夫、敖德萨和更远的大学城回来，便立即把中学生们排挤到角落去了。对抗在这里也是激烈的。女中学生们的背信弃义简直无法形容，但通常斗争是用精神的剑进行的。

在乡下我打槌球和玩九柱戏，指导游戏和对姑娘们说不礼貌的话。在农村我学会了骑自行车，车子全部是伊万·瓦西利耶维奇制造的。由于有了这个经历，后来我才敢于到敖德萨自行车赛场上去练习。不仅如此，在乡下我还独立地驾驭套上二轮马车的纯种公马。那时在扬诺夫卡就已经有很好的、供乘骑用的马。我建议勃罗茨基大叔——一位啤酒酿造工人去兜一会儿风。“你会不会把我摔下来？”大叔问，按性格他是不愿于大胆冒险的事情的。“您说哪儿话，大叔！”我以一种愤慨的口吻说道，大叔叹了一口气，顺从地在我背后坐下。我驾着车越过谷地，经过磨坊，走上刚刚由夏天的雨水冲刷过的道路。枣红马想大步奔跑，使它生气的是却要上山，于是它突然狂奔起来。我拉紧缰绳，双脚顶住脚踏板，尽量抬高身子，不让大叔看到我正在拉紧缰绳。但这匹公马很有自尊心。它的年龄只有我的三分之一多一点，今年四岁。枣红马怒气冲冲地拉着二轮马车往山上跑，就像一只猫竭力要把系在尾巴上的罐头盒甩掉一样。我感觉得到我背后的大叔已停止抽烟，呼吸越来越急促，准备提出最后通牒了。我坐得更牢固些，给枣红马放松缰绳。为了使自己充满信心，我用舌头发出嗒嗒的声音，和着优美的马蹄声。当枣红马又想奔驰时，我就用安抚的口吻对它说，“小宝贝，别淘气了。”同时更从容地展开双臂。我感觉到大叔已平静下来，重新抽起烟来。游戏是玩赢了，尽

管我的心跳得很厉害，就像枣红马奔驰那样。

回到城里我又重新受到各种规矩的约束。做到这一点我无需做很大努力。游戏和体育让位于书籍，偶尔也去看戏。我听命于城市，却几乎和它没有接触。城市生活几乎完全与我无关。就连一些成年的居民也竭力不把头伸出窗外。在警察统治的俄国，敖德萨也许是警察统治最厉害的一个城市。城里的首脑人物是行政长官，原海军少将泽连诺伊第二。他身上既拥有无限的权力，又有无所顾忌的气质。流传着无数关于他的笑话，敖德萨人悄悄地传播这些笑话。在那些年里，国外有一家私人印刷所出了一本描写海军少将泽连诺伊第二功勋的故事集。我只见过他一次，并且只看到他的后背。但这对我已足够了。市行政长官挺直身子站在自己的马车上，用沙哑的嗓音满街骂人并向前挥舞着拳头。举手敬礼的警察和手拿帽子的管院子的人在他面前鱼贯而行，而窗帘后面则是一张张惊惶的脸孔在张望。我拉了一下书包的带子，加快脚步回家。

每当我想在记忆中再现少年时代官方俄国的形象时，我就会看到市行政长官的背影和他那挥舞的拳头，听到那沙哑的、辞典都不收的骂人话。

## 第四章

# 书籍和最初的冲突

不仅在学生时代，而且在往后的少年时代，大自然和人们在我的精神生活中所占的地位都少于书籍和思想。尽管我是农村出身，却不是个很关心大自然的人。直到后来，不仅是童年，而且是少年时代过去以后，我才注意和了解大自然。长期以来，人们就像闪电在我意识中一掠而过。我瞧着自己和书本，而在书本里我寻找的还是自己或自己的未来。

我是从1887年开始读书的，这时莫伊谢·菲利波维奇来到扬诺夫卡，带了一批书来，其中有托尔斯泰的一些通俗作品。最初，读书与其说是一件乐事，不如说是件苦差使。每一本新书都有一些新的障碍：不懂的语词，莫名其妙的人生关系，现实和幻想的模糊界线。大部分不懂之处无人可问。我茫茫然，拿起来，放下去，又重新拿起，既有对知识的半信半疑的欢乐，也有对无知的惶恐。我当时读书的情景犹如黑夜行车在草原的路上：车轮的吱吱声同人声相间，沿路的篝火在黑暗中闪烁，一切仿佛都熟悉，同时又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什么人在车上，车上载着什么，甚至不明白，你自己往哪儿去，是向前还是后退。也没有人会像格里戈里叔叔那样来给你解释：这是我们的盐粮贩子在运小麦。

在放德萨挑选书籍的余地要广阔得多，还有细心的好意指导。我开始如饥似渴地读书。别人只得强迫我去散步，而在散步时我还在体会读过的内容，并急着回去继续阅读。晚上我总是恳求再给我一刻钟，哪怕5分钟，以便把一个章节读完。每天晚上总要为此发生



一点争执。

被激起的希望和掌握一切的海求，在不知疲倦地阅读中得到了满足。以后生活所提供的有趣的和动人的、欢乐的或悲哀的一切早已在阅读中感受过，有如一种暗示，一种诺言，一种用铅笔或水彩仔细勾画的精巧画稿。

我在敖德萨生活的最初几年，每天晚上的朗读安排在做完家庭作业和上床睡觉之间，这是愉快的一小时，或者确切些说，半小时。莫伊谢·菲利波维奇通常谈普希金或涅克拉索夫的作品，更经常地是谈涅克拉索夫的作品。但是到了规定时间，范妮·索诺蒙诺芙娜就说：“廖沃什卡，你该睡了。”我恳求地看着她。“孩子，你该睡了。”莫伊谢·菲利波维奇说。“再谈5分钟。”我恳求，于是又给我5分钟。这以后我就吻他们一下，带着我还能听一整夜朗读的心情离去，但我的脑袋一碰着枕头就睡着了。

一位远亲，八年级女学生索菲娅到什宾采尔家来住几个星期，以躲避自己家里发生的猩红热。这是一位非常有才能和博览群书的姑娘，不过，她缺乏独创，性格软弱，因此很快就枯萎了。我对她非常赞赏，每天都在她那里发现越来越多的新知识和新品质，不断感到自己的微不足道。我为她抄写考试提纲以及做一些小事。因此，饭后，当大人们去休息时，这位八年级女生就和我一起出声地读书，然后又一起写作讽刺长诗《月球旅行》。在这次创作中我老是赶不上。只要我提出什么微不足道的建议，她作为一位年长的合作者便抓住我的思想，迅速加以发挥，提出方案，毫不费力地一直牵着我走。预定的六个星期过去了，索菲娅回去了，我感到自己又长大了一些。

在我认识的最出色的家庭中，有个叫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瑟切夫斯基的人，他是一位老记者，浪漫主义作家，是南方著名的莎士比亚通及其解释者。他是位才华横溢的人，可又嗜酒如命。由于他狂饮滥喝，他对人，甚至对孩子都有一种负罪感。他年轻时就认识范妮·索洛蒙诺芙娜并称她是范纽什卡。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第一次见到我就非常喜欢我。他问我们学校的情况，给我出了一个题目：把普希金的《诗人和书商》同涅克拉索夫的《诗人和公民》作比较。我发

呆了。后一个作品我连读也没读过，而主要的是我在作为作家的瑟切夫斯基面前感到胆怯。作家这个词本身对我来说就是高不可攀的。“我们现在就来谈这一切。”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说，于是立即就谈起来，他谈得很漂亮。“懂了吗？现在你就写吧。”他让我坐在书房里，给了我普希金和涅克拉索夫的作品、纸和笔。“我不行，我写什么呢？”我困窘地小声对范妮·索洛蒙诺芙娜发誓说。“你别激动，”她回答，并抚摸着我的头，“你怎么理解就怎么写，这就得了。”她有一双柔和的手和一副柔和的嗓子。我稍稍平静了一点，也就是说好歹克制住自己受惊吓的自尊心，开始写了。约莫过了一个钟头，我被叫去回答。我拿了一张写满字的大纸，怀着学校里从未有过的战战兢兢心情交给了作家。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很快地浏览了几行，眼睛发出明亮的火花看着我，激动地喊道：“你们听听，他是怎么写的，真是个好样的。”接着便念起来：“诗人和他喜爱的大自然生活在一起，大自然的每个声音，无论是快活的还是忧郁的，都在他的心坎里引起了共鸣。”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把一只手指指向上方，“瞧他说得多好！大自然的每个声音——听到了吗，——无论是快活的还是忧郁的，都在诗人的心坎里引起了共鸣。”这句话那时就这样深深地刻在我的心里，一辈子都忘不了。

吃中饭时，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开了很多玩笑，又是回忆，又是讲故事——他从他准备好的酒杯里汲取了灵感。他时时越过桌子看看我并感叹道：“这一切你描绘得多么好，让我来吻吻你。”于是他开始用餐巾使劲把胡子和嘴唇擦干净，从椅子上站起来，摇摇晃晃地绕着桌子走来。我坐着，就像灾难临头似的，是令人高兴的，但又是灾难。“站起来，廖沃什卡，迎上去。”莫伊谢·菲利波维奇低声教我说。饭后，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背诵了一首讽刺作品《波波夫的梦》。我全神贯注地看着灰白的胡子，从这些胡须下冒出了如此有趣的诗句。作家的半醉状态丝毫也没有降低他在我心目中的威望。孩子是拥有很大抽象能力的。

有时，在黄昏前我和莫伊谢·菲利波维奇一起散步，在他情绪好的时候，我们谈论各种各样的事情。有一次，他给我讲述了他非常喜

欢的歌剧《浮士德》的内容。我贪婪地捕捉其中的故事，幻想着什么时候能听到舞台上的歌剧。根据讲故事人的口气我感觉到事情已经接近微妙的地步。我为讲故事人不安，也担心不能继续听下去。但是莫伊谢·菲利波维奇克制住自己，继续讲道：“在婚前生了一个孩子……”越过了这条界线，我们俩都变得轻松了，故事也就顺利地讲完了。

我躺在床上，脖子裹着绷带，给了我一本狄更斯的《奥立弗·特维斯特》解闷。病房里医生的第一句话就是一个女人的手上有没有戒指，这使我摸不着头脑。我便问莫伊谢·菲利波维奇：“这是什么意思？与戒指有什么关系？”“而这，”他犹豫地回答说，“没有结婚就没有戒指。”我回想起《浮士德》。在我的想象中奥立弗·特维斯特的命运由于一只戒指，由于一只并不存在的戒指展开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禁区通过书本闯入了我的意识，许多通过偶然的、常常是粗鲁和低级下流的形式听到的东西，现在通过文学作品得到概括，变得文雅起来，上升到一个较高的水平。

这时，不久前问世的托尔斯泰的《黑暗的势力》激动了思想界。人们意味深长地谈论着它，但却莫衷一是。波别多诺斯采夫<sup>①</sup>奏准沙皇亚历山大三世禁止该剧在剧院上演。我知道莫伊谢·菲利波维奇和范妮·索洛蒙诺芙娜在我去睡觉以后又在隔壁房间里谈了这个剧本，我隐约听到说话的声音。“可以让我读吗？”我问。“不行，亲爱的，你太小了。”他们这么坚决地回绝我，我也就不再坚持了。不过，我发现在我熟悉的一个书架上有一本薄薄的新书。我趁大人不在的时候，分几次读完了托尔斯泰的这个剧本。它对我的影响，显然不像我的两位监护人担心的那么大。对于像掐死孩子和骨头发出碎裂声的谈话等那些最悲惨的场面，我并未看作是可怕的现实，而是看作书本的虚构，看作舞台所需的杜撰，也就是说，实际上完全没有理解。

假期里我在高达天花板的一只木橱里，在哥哥从伊丽莎白格勒

<sup>①</sup> 康·彼·波别多诺斯采夫(1827—1907年)——沙俄国务活动家、正教院总监，亚历山大三世执政时期掌管朝政。——译注

带来的那些旧书堆里意外地发现了一本小册子，打开一看，觉得其中有不平常的和神秘的东西。这是一份由于性犯罪杀害了一个少女案件的审讯报告。我在一种心惊肉跳的状态下读完了这本夹杂着医学和法律细节的小书，就像黑夜来到森林里，在半阴不暗的月光下，在幽灵似的树丛中，找不到出路。但这个印象很快就消失了。在人的心理上，特别在孩子的心理上，有自己的缓冲器、制动器、安全阀和减震器构成的庞大而精良的系统，以防止过于强烈的或不适时的震动。

我第一次上剧院是在上预备班的时候，这是非同寻常和无法形容的。我是在学校的门卫格里戈里·霍洛达的陪伴下去看乌克兰的戏剧的。我坐着，脸色变得非常苍白（这是后来格里戈里告诉范妮·索洛蒙诺芙娜的），并且被无法克制的快乐所折磨。在幕间休息时我没有离开座位，唯恐漏看了什么。最后演出了独幕轻松喜剧《带长号的房客》。紧张的戏剧在这里以开怀大笑结束。我在自己的座位上笑得前仰后合，接着又全神贯注地看着舞台。在家里，我转述了《带长号的房客》，并添油加醋，想引起我刚才所经历的笑声。但大失所望，没有达到目的。

“看来，你根本不喜欢《纳扎尔·斯托多利亚》？”莫伊谢·菲利波维奇问。听了这话我感到内心的责备。我想起了纳扎尔的苦难，说：“不，这是一出非常好的戏。”

快上三年级时，我到敖德萨郊外当工程师的舅舅的别墅里小住，还看了一场业余演出，我们学校的学生克鲁格利亚科夫在戏里扮演仆人。这是个肺部不健康的、脸上长满雀斑的孩子，有一双聪明的眼睛，但完全是个病人。我非常喜欢他，恳求他和我一起演一出戏。我们选中了普希金的《吝啬骑士》。我演儿子，克鲁格利亚科夫演父亲。我完全服从他的领导，整日背诵普希金的诗句。这多么甜美而又令人激动啊！但很快一切都成了泡影，克鲁格利亚科夫的父母由于他的健康不佳而不允许他演戏。开学后他只在最初几个星期到学校去。我每次都在门口处等他，以便回家的路上和他一起谈论文学。但不久克鲁格利亚科夫就完全不见了。我得悉他病了。几个月以后传来消息说，他因肺结核死了。

我被戏剧的魅力吸引了好几年。后来我又迷恋于放德萨为之骄傲的意大利歌剧。六年级时，为了搞到钱去看戏，我甚至出去兼课。在几个月的时间里我默默地爱上了一个花腔女高音，她有一个神秘的名字，叫朱泽皮娜·乌格特，我觉得她好像是从天上暂时降临到放德萨剧院的舞台上来的。

我是不该看报纸的，但是在这一点上我没有非常严格的规定。渐渐地随着某些让步，我给自己争得了读报的权利，主要是读小品文。放德萨报刊兴趣的中心是戏剧，主要是歌剧，最重要的社会舆论，作为群体大体上也是根据对戏剧的爱好划线的。只有在这一领域，报纸才得以显示出气质一类的东西。

那时一颗新星——小品文作家多罗舍维奇高高升起。他在短短的时间里成为令人瞩目的人物，尽管他写的是一些小事，而且常常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但他是一位不容置疑的天才，他用形式大胆而实质上又不伤人的小品文，仿佛在洋连诺伊第二压抑下的放德萨带来了一股新鲜空气。我每天急不可待地打开晨报，寻找多罗舍维奇的名字。无论是温和的自由派父亲们，还是那些还没有来得及成为激进派的孩子，那时都对他的文章发生了浓厚的兴趣。

我对文艺的爱好从小就开始了，时强时弱，而总的来说，无疑是越来越强。作家、记者、演员是最使我神往的世界，这个世界只对那些最优秀的人才开放。

在二年级时，我们办了一本杂志，关于此事我曾多次请教过莫伊谢·菲利波维奇，他甚至给起了个刊名，叫《点滴》。其用意是圣保罗实科中学二年级向文学的海洋贡献自己的点点滴滴。我以这个题目写了一首诗，作为纲领。杂志里登了一些诗歌和短篇小说，大部分是我写的。一位爱画画的同学为封面设计了复杂的图案。有人建议把《点滴》给克雷扎诺夫斯基看看，这个任务由和克雷扎诺夫斯基住在同一个住宅里的 IO. 承担下来了。他出色地完成了这个任务，他从自己的座位上站起来，走近讲台，果断地把《点滴》放在上面，有礼貌地鞠了个躬，然后以坚定的步伐往回走。大家都屏声静息。克雷扎诺夫斯基看了一下封面，用胡须、眉毛做了一下鬼脸，然后默默地读着。教室

里鸦雀无声，只有翻阅《点滴》的沙沙声。然后克雷扎诺夫斯基从讲台上站起来，非常热情地宣读了我的《一滴纯净的水》。“写得好吗？”他问道。“好！”大家异口同声地回答。“好是好，”克雷扎诺夫斯基说，“就是作者不懂怎样作诗。嗯，你知道，什么是扬抑抑格吗？”他对我说，他猜出了没怎么掩饰的笔名后面的作者。“不，不知道。”我承认。“好，那我就讲讲。”克雷扎诺夫斯基放弃了几节语法课和句法课，给二年级的学生们讲解短长格诗式的秘密。“而至于杂志，”最后他说，“最好还是别办，也不需要文学创作的海洋，就让它当作你们的练习簿。”因为学校里不允许办杂志。但问题却以另一个结局解决了。我那平静的读书生涯突然被打断了，我被开除出圣保罗实科中学。

※ ※ ※ ※

我从童年时代起生活中就有过不少冲突，用法学家的话说，冲突是由于为被践踏的权利而斗争引起的。与同学们的交往和断交也往往出于这种动机。要一一列举各种小插曲那得花很多时间，但在学校里发生过两件较大的事。

最大的冲突是二年级时我同比尤尔南德间的冲突，大家叫他法国人，其实是瑞士人。在学校里，德语在某种程度上和俄语不相上下。相反地，法语的状况却不太好。多数学生是在学校里首次接触法语的，而对德国移民来说，学法语尤其困难。比尤尔南德发动了针对德国人的战争。被他选中的牺牲品是瓦凯尔。他学习确实较差，是最后一名。但这一次，如果不是全班的话，至少也是大多数人有这样的印象。这一天比尤尔南德整天怒气冲冲，吞服了双倍的助消化的糖。

“我们给他开个音乐会。”同学们悄悄地说，互相使使眼色，碰碰胳膊。我不是跟在大家的后面，也许还是站在前列的。这样的音乐会过去有时也举行过，特别是用来对付过图画老师，此人凶恶而愚蠢，大家都不喜欢他。开音乐会的意思是给教师送行，当他向门口走去时，大家齐声号叫，却都闭着嘴，使他无法看清谁参与了合唱。我

们这样欢送过比尤尔南德两次，但是轻轻地偷偷干的，因为我们都怕他。但这一次干得坚决果敢。法国人刚刚把点名册夹在腋下，一侧就开始发出号叫，声音像波浪一样一直传到门旁的课桌。我也竭尽所能。比尤尔南德一只脚已跨出门外，很快转过身来，奔到教室中央，脸色铁青，和敌人面对面地站着，两眼射出怒火，但一声不吭。课桌后面的男孩子们，尤其是坐在前排的，尽量做出一副无辜的样子；后排的学生慢慢地整理书包，好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比尤尔南德站了半分钟，便发狂似地转身向门口走去。他那燕尾服的后襟像帆篷似地鼓起。教室里又一次发出声音一致的热烈的号叫声欢送法国人，一直把他送到很远的走廊里。

下一堂课之初，比尤尔南德、什凡涅巴赫和班监迈耶尔来到教室。班监由于两眼突出，额头宽大、头脑迟钝而被叫作“公羊”。什凡涅巴赫讲了几句类似开场白的话，小心翼翼地绕过俄语动词的时态和名词变格的暗礁。比尤尔南德则渴望复仇。迈耶尔以突出的双眼逐一查看学生的脸，把较为顽皮的孩子叫起来，一边说道：“你肯定参加了。”有些人不承认，另一些人不作声。他用这种办法把10至15个孩子留在教室里，“不给中饭吃，”有的留一小时，有的留两小时。其余的孩子都放走了，我也在其中，尽管我觉得把学生叫起来时，比尤尔南德用审视的眼光看着我。我没有采取措施争取解脱，但也没有白首。离开班级时我颇感遗憾，我觉得和大家一起留下要快活得多。

第二天早晨我去学校时，昨天的事已经大半忘掉了。同班受罚的一个学生在大门口遇见我，“听着，”他对我说，“你要倒霉了，昨天达尼洛夫向迈耶尔告发了你，迈耶尔把比尤尔南德叫来，后来校长也来了，他们追问，你是不是主谋。”

我心慌意乱。班监彼得·巴甫洛维奇恰好就在那里，他对我说：“到校长那儿去。”班监在大门口等我以及他对我说话的语气，预示着大事不妙了。我向门卫问清了路，便朝我所不知道的校长室所在的那条走廊走去，站在门口。校长在我身旁走过，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一下，摇摇头。我半死不活地站着。校长又从办公室走出来，只说了

声：“好，好。”我明白，实际上大大不好。几分钟以后，教师们开始从隔壁的教师办公室里走出来，多数人都匆匆忙忙到自己的教室去，没有发现我。克雷扎诺夫斯基做了一个狡猾的鬼脸来回答我的鞠躬，鬼脸的含义是：“你出事了，我可怜你，但毫无办法。”比尤尔南德嘛，在我有礼貌地鞠躬以后，径直朝我走来，可怕的胡子从我头上垂下来，摊开双手说道：“二年级的第一名学生却是个道德败坏的人。”然后站住吐了一口浊气，重复道：“道德败坏的人。”便转过身去，走掉了。过了一会，“公羊”也来了：“瞧你这个家伙，”他带着明显的满足说：“我们要你好看的。”于是立即开始对我进行长时间的折磨。他们不让我回教室，教室也不上课了，那里在进行审问。比尤尔南德、校长、迈耶尔、学监卡明斯基组成了一个关于道德败坏案件的最高审讯委员会。

事情原来是这样开始的：在被留下不让吃饭的学生中有人对迈耶尔说：“把我们留下不公正，叫喊的人倒放了。B. ①唆使别人叫，自己也叫，可放他回家了，卡尔松也知道。”

“不可能，”迈耶尔回答，“B. 是个好孩子。”但卡尔松，就是把教德萨最聪明的人皮涅曼推荐给我的那个人，却证实那个学生的说法，还有几个学生也跟着他加以证实。于是迈耶尔就把比尤尔南德叫来。由于得到上面的鼓励和怂恿，同时又有别人的榜样相互影响，班里告密的学生达 10 至 12 人。

大家开始回忆：去年在散步时 B. 说了校长点什么；B. 悄悄地对谁说了些什么；B. 参加了针对兹米格罗茨基的音乐会；瓦凯尔，整个事情都坏在他手里，谄媚地说：“大家知道，古斯塔夫·萨莫伊洛维奇给我打一分时，我哭了，而 B. 向我走来，把一只手放在我肩上说：别哭，瓦凯尔，我们给督学写封信，让他把比尤尔南德赶走。”“给谁写信？”“给督学写信！”“不可能！”“那你说什么了？”“我当然什么也没说。”达尼洛夫附和说：“是的，是的，B. 建议给学区的督学写信，但为了不被开除都不签名，大家轮流一人写一个字母。”“好啊，原来如此，”比尤尔南德气得接不上气地说，“每人轮流写一个字母？”审问了

① 托济茨基原姓勃朗施坦的第一个字母。 译注



所有的人，一部分孩子不管是不是事实，统统断然否认。柯斯佳·P.就是其中的一个，他看到好朋友，第一名学生受到陷害而伤心地哭了。告密者们宣称这些坚定的否定者们是我的朋友，用以破坏他们的声誉。班上一片惊慌。多数人噤若寒蝉，沉默不语。达尼洛夫在班上扮演了第一小提琴手的角色，这是他从来没有扮演过的，是空前绝后的。我站在靠近校长室的走廊上，在一个擦得发亮的黄书柜旁，就像一个罪行严重的国事犯。一些主要的证人依次被叫来和被告对质。结果是我被送回家去。

“回去告诉你的父母，让他们到学校来一下。”

“我的父母离得很远，在乡下。”

“那就让你的监护人来吧。”

昨天我还是个无可争议的第一名优秀生，而且高出第二名很多。甚至迈耶尔也没有怀疑到我。而今天我却一落千丈，那个以懒惰和下流闻名的达尼洛夫在全班和学校当局面前践踏我。发生了什么事？是我过于积极地保护了一个受欺侮的人，而这个人同我并不亲近，他本身也并不使我同情？是我过于信赖全班的团结一致了？不过，当我回到波克罗夫斯基胡同时，我还顾不上去总结。我心脏紧缩，哭丧着脸，眼含泪水哽咽地把全部经过告诉了两位监护人。他们自己尽管也很担心，但还是尽可能地安慰我。范妮·索洛蒙诺芙娜去找校长，找学监克雷扎诺夫斯基，找尤尔钦科，向他们解释，用自己的教学经验去劝说。这一切都没让我知道。我坐在角落里发愁，那只有没有打开的书包放在桌子上。就这样过了几天。这件事是怎样了结的呢？校长说：将召开教务会议，来全面研究这个问题。这听起来很严厉。会议举行了。莫伊谢·菲利波维奇去打听决定。我十分焦急地等着他回来，比后来等沙皇法院判决还要感到不安。传来楼下大门的熟悉的敲门声，登上铁梯的熟悉的脚步声，餐室的门打开了，同时，范妮·索洛蒙诺芙娜从另一个房间迎出来。我轻轻地拉起一点窗帘。“开除了。”莫伊谢·菲利波维奇的语气非常疲倦。“开除了？”范妮·索洛蒙诺芙娜又气喘吁吁地问了一句。“开除了。”莫伊谢·菲利波维奇低声肯定说。我什么也没有说，眼睛向莫伊谢·菲

利波维奇和范妮·索洛蒙诺芙娜扫视了一下便回到自己的窗帘后面去了。夏天，范妮·索洛蒙诺芙娜到扬诺夫卡来作客，她讲了我当时的情况：“当‘开除’这个词说出来时，他的脸色顿时发青，我真为他害怕。”我没有哭，但我憔悴了。

在教务会议上曾为三种开除办法展开了争论：无权入任何学校；无权入圣保罗实科中学；有权回实科中学。决定采取最后一种办法，最轻的办法。我极为不安地想着父母将怎样来承受这件事。我的两位监护人做了力所能及的一切来减轻打击的分量。范妮·索洛蒙诺芙娜给姐姐写了一封详细的信，指点通知双亲的办法。在学年结束前我留在敖德萨，和通常一样放假后再回去。

在漫长的夜晚，待父亲和母亲就寝后，我扮演着教师和学生的角色，给姐姐和哥哥讲所发生的一切。哥哥和姐姐对自己的学习生活记忆犹新。与此同时他们都像长辈那样瞧着我，对我讲的故事时而摇头，时而哈哈大笑。姐姐由笑变为流泪，把头埋在桌子上哭了好久。后来决定让我到一个地方去作客一两个星期，趁我不在的时候姐姐再把一切告诉父亲。她自己对这个使命也感到害怕。在哥哥学习遭到挫折之后，父亲的功名心便集中在我身上。最初几年他的期望得到完全的成功，可突然一切都完了……

一个星期后，我和朋友格里沙，也就是莫伊谢·哈里东诺维奇的孙子和音乐会的得力助手，一起作客回来，我立刻明白，大家一切都知道了。母亲殷勤地欢迎格里沙，但装出一副完全没有看见我的样子。相反地，父亲却做出似乎什么事也没有发生的姿态。只是几天以后，在一个炎热的日子，当父亲从田里回来，在凉爽的外屋里休息时，突然当着母亲的面问我：“你给我说说，你是怎样对自己的校长打招呼的？是这样，把两只手指塞在嘴里？”他自己做着样子，突然笑了起来。母亲惊奇地一会儿看着父亲，一会儿看着我。她脸带笑容，又含气愤：竟可以这样轻松地谈论如此可怕的事情吗？但是父亲继续审问道：“你做给我看看，你是怎样打招呼的？”接着更加开心地笑了。不管他多么难过，看来，有一个念头还是令他高兴的，那就是他的后裔，不顾第一名优秀生的称号，胆敢对身居高位的长官打招呼。我向

他保证说没有打呼哨，而只是平静地、完全是无害的号叫，但全是枉然。父亲坚持说是打呼哨。最后以母亲的哭泣而告终。

整个夏天我对考试几乎没有做准备。这件事使我暂时失去了学习的兴趣。我度过了一个不平静的夏天，经常发生争吵。考试之前两个星期回到放德萨，但在这儿学习也没有劲。准备法文考试大概花的时间最长。但考试时比尤尔南德只提了几个简单的问题，其他的老师提的问题就更少了。我被接受读三年级。在那里我遇到的大多数还是那些同学，有出卖我的，有保护我的，也有保持中立的。这件事在好长时间里决定了个人交往。我和许多人不开话，也不打招呼，但是和那些在困难时支持我的人则更加亲近了。

这就是第一次在某种意义上的政治考验。围绕这一插曲形成了三派：告密者、妒忌他人者为一方；坦白诚恳和大胆勇敢的孩子为一方；还有中立的、不稳定的、不坚定的中间群众——这三派在以后的年代里远没有消失，在以后的生涯中我在形形色色的条件下不止一次地遇到过他们。

※ ※

※ ※

街上的雪还没有完全清除，但天气已经暖和了。屋顶、树木、麻雀已经呈现出春色。一个四年级学生从学校回来，他打破常规，手里拎着书包的小皮带，因为挂钩扯掉了。长大衣使人感到是多余的、不需要的和沉重的，只会使人满身大汗。疲惫也随之而来。男孩子以新的眼光观看周围的一切，首先是自己。春天的阳光激起一种感情，觉得有一种东西比学校、督学和不正规地挎在背上的书包，比学习、下棋、吃饭，甚至比读书和看戏，比全部日常生活都要强有力得多。由于这高居于个人之上的从未体验过的、要求绝对服从的东西，忧郁笼罩着这孩子的整个身心，浸透到骨髓并引起感到困倦的甜甜的痛苦。

他回到家里，脑袋嗡嗡响，太阳穴充满痛苦的音乐，他把书包丢在桌子上，往床上一躺，不知不觉地在枕头上哭了起来。为了给流泪

找到理由，他开始回忆书本里的和个人生活中的不幸场面，就像火上加油一样，于是他哭着、哭着，流着春愁的眼泪。那时他 14 岁。

这孩子从小生一种病，医生在正式的诊断书上称之为慢性肠胃粘膜炎，在他的一生中这种病总缠着他。他得经常吃药和遵守饮食制度。神经冲动几乎总要影响到肠道。四年级时疾病曾恶化到无法上课读书。经过长期而无效的治疗之后，医生判决说：送病人到乡下去。

那时我接到医生的判决书与其说是伤心，倒不如说是满意。但还要得到父母的同意，得请一位补习教师到乡下去，以免荒废一年的学业。这意味着要一笔额外的花费，而扬诺夫卡是不喜欢额外花费的。不过在莫伊谢·菲利波维奇的帮助下，事情终于安排妥当。找到一位昔日的大学生 T，当补习教师。这是一个有点虚荣心、有点幻想、健谈和缺乏性格的人，属于受过一半高等教育的失败者之类的人。他写诗，其中有两首甚至在放德萨的报纸上发表过。这两份报纸他总是带在身上，并且非常乐意拿出来给人家看。他和我的关系曾热过一阵，后来日趋恶化。起初 T 同我十分亲昵，千方百计要成为我的朋友。出于这一目的，他给我看一个叫克拉夫季娅的照片，给我讲了他俩的复杂关系。后来他突然变卦了，要我以学生对老师的尊敬态度对待他。这阵混乱的结局很不好，以激烈的争吵和完全决裂告终。但和补习老师的这段插曲却并非毫无所获。不管怎样，这位两鬓斑白的人信任我，把自己和那个照片上给人以深刻印象的女人的关系的秘密都告诉了我。我觉得自己又长大了一些。

在高年级，文学课由克雷扎诺夫斯基改为加莫夫讲授，这是一个还很年轻，略为发胖，高度近视和病态的淡黄头发的男子，对自己的课毫无热情。我们无精打采地跟着他一章一章地念下去。此外，加莫夫还很不认真，对批改我们的作业一拖再拖。五年级规定一年内写四篇课外“作文”。我对这些“作文”的兴趣日益增大。我不仅读了教师指定的参考书，而且还读了一系列其他方面的书，摘录了事实和引文，改写和摘取我所喜欢的句子，总之，我入迷地写作，并且不总是单纯的抄袭。还有几个学生也不把作文视为畏途。整个五年级都激

动地(有些人惶惶不安地,另一些人则怀着希望地)等待着对自己的作文的评分。但是评分没有下来。第二季度也没见到评分。第三季度我交了一篇写满整本练习簿的作文。一星期过去了,两星期过去了,三星期也过去了,关于我们的作文依然杳无音讯。我们小心翼翼地提醒加莫夫。他支吾搪塞地作答。雅勃隆诺夫斯基也是一个勤奋的写作者,在下一堂课上直截了当地问加莫夫:为什么我们无法知道我们的作文的命运?这些作文本身到底怎么样?加莫夫粗暴地打断他的话。雅勃隆诺夫斯基并不屈服。他紧锁双眉,开始神经质地拉扯桌面,提高嗓门重复道,不能这样工作。“我建议您住口并坐下。”加莫夫回答。但雅勃隆诺夫斯基没有坐下,也没有沉默。“劳驾请您从教室里出去。”加莫夫冲着他喊道。我和雅勃隆诺夫斯基的关系早已恶化。二年级时的比尤尔南德事件使我更加小心谨慎了。但这时我觉得不能沉默了。“安东·米哈伊洛维奇,”我说,“雅勃隆诺夫斯基是对的,我们大家都支持他……”“不错,”大家齐声说道。加莫夫起先不知所措,接着就大发雷霆。“这是怎么回事?”他喝道,连声音都变了。“我自己知道什么时候做和做什么……你们别命令我。你们破坏秩序……”我们触到了他的痛处。

“我们想看自己的作文,仅此而已。”第三个人站起来说。

加莫夫失去常态了。“雅勃隆诺夫斯基,滚出教室去。”雅勃隆诺夫斯基一动不动。“走吧,走,你怎么啦?”大家从四面八方提醒他。雅勃隆诺夫斯基耸耸肩膀,转动着黝黑的脸上那双眼睛,皮鞋敲击着地板走出了教室,用足力气把门乓地一声关上。下一堂课开始时,卡明斯基穿着自己那双胶皮底的鞋子毫无声息地走进了教室,这也不是什么好兆头。教室里一片寂静,校长就像酒喝得过多似的,用嘶哑的假嗓子作了简短但严厉的训斥,以开除相威胁。接着便宣布惩罚:将雅勃隆诺夫斯基关禁闭一昼夜,操行打“3”分;把我关禁闭一昼夜;第三个抗议者则关12小时。这就是我求学道路上的第二次坎坷。这一次,事情没有造成更严重的后果。加莫夫再也没有把作文还给我们,我们也就不再关心它们了。

就在这一年,沙皇死了。这似乎是一个重大的、难以置信的事

情,但又很遥远,犹如发生在异国的地震。无论是我,还是我周围的人,对生病的沙皇并不同情,对他毫无好感,对他的死也不感到悲哀。当第二天我来到学校时,那里像是笼罩着无缘无故的惶恐。“沙皇死了。”学生们相互转告,不知道还可补充些什么,也不知道怎样来表达自己的感情,因为他们不知道这感情本身是什么。然而他们知道,将不上课,因而暗自高兴,特别是那些没有准备好功课或者害怕被叫上黑板的人。看门人把所有来校的人都打发到大礼堂去,那里正准备祈祷。戴着金边眼镜的牧师说了几句应景的话:当父亲死去的时候,孩子们哀痛,而当全民的父亲死去的时候,则更加悲痛。祈祷持续了很久。这既枯燥又难受。接着,命令大家左臂戴黑纱,用黑纱蒙住帽徽。其余一切照旧。

在五年级,学生们已经开始交谈关于高等学校、关于选择往后道路的想法。谈得最多的是入学考试,彼得堡的教授们如何严厉,都提些什么样的难题,以及彼得堡有些什么样的帮助考生临时应付的专家。老考生中有这样一些人,他们年复一年地到彼得堡去,落榜了,又重新准备,又重蹈覆辙。想到这些未来的考验,许多人的心两年前就凉了。

六年级没有发生什么不寻常的意外事件。大家都想快点度过枯燥乏味的学校生活。毕业考试很隆重,在礼堂里举行,有教育区派来的大学教授参加。校长每一次都郑重其事地打开从督学那儿拿来的纸袋,里面放着书面试题。试题宣读后便传来一片惊叹声,好像大家一下子被浸入冰水之中。由于神经紧张,总觉得题目是根本答不出来的。但做下去却发现,事情并不那么可怕。在规定的两小时快结束时,教师们帮助我们欺骗教育区。我做完考题后并不交卷,而是根据与学监克雷扎诺夫斯基的默契留在礼堂里,给那些不顺利的人抄递小条了。

七年级被认为是补习性质的。圣保罗中学里没有七年级,所以要转到别的中学去。在这间隙的时间里,我们成了自由民。在这种情况下,每人都为自己准备了普通服装。在领到毕业证书的那天,我们一大群人晚上在夏季花园里集会,那里轻佻的女歌手们在露天舞

台上唱歌，学生们是严禁到那里去的。大家都系上领带，桌子上是两瓶啤酒，嘴里叼着香烟。我们自己心里也深恐太大了。第一瓶酒还没有来得及打开，班监维利格尔姆就出现在我们的桌子边了，此人因嗓音像羊叫，外号“山羊”。我们都本能地站起来，大家心里都有点紧张。但事情却很顺利。“你们已经在这里了？”维利格尔姆带着惋惜的口吻说，并宽厚地握握我们的手。我们当中 K. 最年长，小指还戴着戒指，他毫不拘束地请班监和我们一起喝啤酒。这已经有点过分了。维利格尔姆庄重地拒绝了，并匆匆地告别，去寻找越过花园大门，跨进禁区的其他学生们。我们便放心大胆地喝啤酒了。

我从预备班开始在实科中学度过的七年里也有过欢乐。但看得出来，苦多于乐。总的来说，对于中学所留下的记忆如果不是黑色的，也是灰色的。在学校所发生的一切事件——既有快乐的，也有痛苦的事件之上的，是冷酷无情的制度，是官僚的形式主义制度。很难叫出哪怕是一位我能真正怀着爱戴之情去回忆的教师。然而我们的学校是不差的，它还是让我学到了一些东西：它给了我基础知识，培养我进行系统工作和遵守外部纪律的习惯。这一切都是以后所必需的。这学校与自己的直接使命相违背，在我身上播下了仇恨现存制度的种子。无论如何，这些种子并没有撒在不毛之地上。

## 第五章

# 乡村和城市

在乡下我度过了一生中的最初的9年，哪儿也没有去。在往后的7年时间里，我每年到这儿来度夏天，有时来过圣诞节和复活节。我和扬诺夫卡以及其周围的一切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一直生活了将近18年。在童年的最初年代，乡村的影响是巨大的。在以后的时期里，它同城市的影响进行了斗争，并在城市面前全线败退。

乡村使我熟悉农业、磨坊和美国的捆麦机。乡村使我和庄稼汉、和各地到磨坊来的人接近，和更遥远的、肩上挎着大镰刀和口袋，从乌克兰各省来做工赚钱的那些庄稼汉接近。后来，乡村的许多东西仿佛被淡忘了，在记忆中被抹掉了，但在生活的每个转折关头却会浮现出来，有些还很有帮助。

农村以实物展现了贵族衰落和资本家暴发的各种形态。它揭示了在自然的粗野的人际关系在许多方面，从而使人更鲜明地感觉到另一类型的文化，即层次更高，但更为矛盾类型的文化。

第一个假期让城市和乡村在我的意识里进行了一场对比。我以急切的心情回家，高兴得心怦怦跳。我竭力要再看到所有的人，并向大家显示自己。父亲在新布格接我，我向他出示自己得到的5分并解释说，现在我上一年级了，我需要一套正式的制服。我们乘车连夜赶路，由年轻的管家赶车。在草原上，特别在小山谷里散发着潮湿的寒气，我被裹在大斗篷里。我为环境的变换、旅行、回忆和各种印象所陶醉，不知疲倦地谈学校，谈浴室，谈自己的朋友柯斯佳·P.，谈戏剧。我滔滔不绝地谈着，起先谈《纳扎尔·斯托多利亚》，后来又谈



《带长号的房客》。父亲听着，时而打盹，时而醒来，满意地哈哈大笑。年轻的管家不时地转过头来，看看东家：瞧，这真是一个有趣的故事。凌晨，我睡着了，到扬诺夫卡才醒来。我觉得家舍小得可怜，乡村的小麦面包是灰色的，整个农村的日常生活既亲切，又陌生。我对母亲和姐姐们讲了看过的戏剧，但已不像夜里讲给父亲听时那样带劲了。在作坊里我找到了维佳和达维德，几乎认不出他们来了，他们长高了，结实了。但我在他们眼里也成了另一个人。他们立即对我称您，我表示了抗议。

“哟，那有什么？”肤色黝黑、瘦削和文静的达维德回答说，“现在您是有学问的人了。”

那时，伊万·瓦西里耶维奇已经结婚。把仆人的厨房给他改成住房，和作坊连在一起，而厨房则迁到作坊后面新的土窑里去了。

但是问题不在这里。在我和与我童年相联系的东西之间，有某种新的东西像一堵墙似地矗立在那儿。一切依旧，又不尽然。人和事物仿佛被偷换了。当然，一年中有某些东西确实是变样了。但变得更多的是我的眼光。从这第一次回乡就发现某种我和家庭之间格格不入的东西，起初是在琐碎小事上面，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越来越严重和深刻。

城市和乡村所给予的双重影响浸透了我的整个学生时代。在城市里我感到自己在同人们的关系上要平等得多，除了个别的，但很激烈的冲突，像与学校里的法国人或与语文教师的冲突之外，家规和校规的管束是一视同仁的。其原因不仅在于什宾采尔家里的生活方式——那里充满着合理的严格要求和较高的个人关系的准则，而且也在于城市生活的整个制度。不错，它的矛盾怎么也不会比乡村的矛盾少，相反地，会更多，但在城里矛盾较为隐蔽、有序和规范。不同阶级的人只是在事务范围内接触，其后就互不照面了。在乡下，大家都互相看得见。一个人对另一个人奴隶般的依赖性就像旧沙发里的弹簧那样裸露着。在农村，我的心情极不稳定，爱争吵。甚至对范妮·索洛蒙诺芙娜也是如此，她到乡下来作客并小心翼翼地站在母亲或姐姐的面前时，我也常常和她争吵，有时还要对她说些不礼貌的

话,尽管在城里我和她不仅关系良好,而且还相当亲热。有时,冲突是由一些小事引起的。但某些更大的冲突却常常就是这些小事酿成的。

我穿上刚洗过的帆布制服,束一条带有一块小铜牌的皮带,白帽上一只黄帽徽在太阳下闪闪发光,真是神气极了。这应该让大家瞧瞧。我和父亲乘车到田间去,那是收获越冬小麦最紧张的时刻。割麦的领班阿尔希普是一个神情忧郁,同时又很温和的人,他正领着11个割麦人和12个打捆的女人沿着丘陵割过来。12把镰刀割着越冬小麦,空气异常紧张。阿尔希普穿一条用一粒角制纽扣扣的裤子。打捆的妇女穿的是破烂的裙子或粗布衬衫。从远处传来的割麦声仿佛是炎热的空气发出的声音。

“好,让我看看小麦怎么样。”父亲说着从阿尔希普那儿拿过镰刀,站到他的位子上。我激动地看着。父亲做着简单的、做家务般的动作,仿佛不是在干活,而只是准备干活,步伐轻快而带试探性,好像是在寻找一个落脚点,以便挥镰。镰刀在他手里简单地飞舞,一点也不矫健,甚至显得不很稳定,然而他割得很低,非常整齐,每次镰刀一挥,割下的麦子就笔直地排成一行。躺在他的左边。阿尔希普眯着一只眼睛看着,不用说,显然非常赞赏。其余的人则有各种不同看法,一些人似乎表示赏识,看来,东家确实精明能干。而另一些人则不以为然,他给自家割麦是割得不错,但也不过是做给大家看看的。我也许没能用确切的语言来说明这一切,但我尖锐地感觉到人际关系的复杂。父亲到另一块地里去以后,我也试图试试镰刀。

“您抓住镰刀宽的一端,用宽的一端割,尖的一端让它去,别使劲往下压。”

但由于激动我甚至弄不清这宽的一端在哪儿,挥第三刀时镰刀尖已插入地下。

“哎哟,这样割,镰刀很快就毁了,”阿尔希普说,“向您父亲学学。”

我感觉到一个黝黑的和满身尘土的捆麦女人一双嘲弄的眼睛。于是我急急忙忙地从割麦的队伍里挤出来,头上还戴若有帽徽的帽

子，汗水从帽沿直往外流。

“还是到妈妈那里去吃蜜糖饼干吧。”我背后传来穆图佐克的挖苦话。我了解这个黑得像靴子似的割麦人，他在扬诺夫卡干活已第三年了，是个移民，机灵鬼，说话粗鲁无礼，去年有时故意当着我的面讲东家的坏话，但这些话又是一针见血的。我喜欢穆图佐克的机灵和勇敢，与此同时，他那放肆的挖苦嘲弄却又激起我无可奈何的憎恨。我想说一些话来使穆图佐克归顺到我这边来，或者相反，用命令的语言来打断他的话头，但我又找不到这种语言。

从地里回来，我看到家门旁有一个赤着脚的女人。她靠墙坐在石阶旁，而不敢坐在石阶上。这是有点傻的牧童伊格顿托克的母亲。她是从7俄里外来取一个卢布的。但家里空无一人，没有人给她钱。她得等到晚上。当我看到这个贫穷和顺从的化身时，我的心好像有什么东西挤压着似的。

一年以后情况并未好转，而是相反。一天我打完槌球回来，我在院子里遇见了父亲，他刚刚从地里来，疲劳而又恼怒，浑身尘土，他后面是个农民，光着沾满黑泥的双脚。“看在上帝面上，把牛放了。”他请求说，并发誓再也不让牛到田里去了。父亲回答说：“你的牛吃了10戈比的庄稼，造成的损失是10卢布。”农夫一再恳求，他的苦苦哀求里透出一股仇恨。这个场面震撼了我，使我浑身颤抖。在梨树之间的一块场地上玩槌球时战胜姐妹们的那股高兴劲立刻被极度的失望所代替。我从父亲的身旁溜过去，悄悄地走进卧室，伏在床上忘其所以地哭了起来，尽管我已持有二年级的学生证了。父亲经过外房到餐室，农夫啪哒啪哒地跟到门口。传来说话的声音，然后农夫离去了。母亲从磨坊回来，我听到她的声音，又传来准备开饭的盘碟声，母亲呼唤我的声音……我没有反应，继续在哭，终于从泪水中获得一种快感。门打开了，母亲向我俯下身来问道：

“你怎么啦，廖沃奇卡？”我没有回答，母亲和父亲悄悄地说了些什么。

“你是为了这个农夫吗？我们把牛还他了，也没有收他的罚金。”

“我完全不是为了这件事。”我伏在枕头上回答说，我为哭泣的起

因感到不好意思。

“没有收他的罚金。”母亲继续坚持说。

这是父亲猜到我忧伤的原因并对母亲说了。父亲只要看上一眼，就能看清很多东西。

有一次，东家不在，一个粗鲁、贪婪、无耻的警察要求检查工人的证件。他发现两张过期的，便马上把证件的持有人从地头叫来，宣布逮捕押送回乡。一个是老头，褐色的脖子上有一道道深深的皱纹，另一个是年轻人，老头的侄子。他们扑倒在外屋，干瘦的膝盖跪在泥地上，先是老头，随后年轻人也跟着，把头叩到地上苦苦哀求：“做做好事吧，别毁了我們。”满头大汗的健壮的警察玩着军刀，喝着从地窖给他送来的冷牛奶回答说：“我只有在节日里做好事，而今天是平常日子。”我犹如坐在火盆上，扯着嗓子说了点表示抗议的话。“年轻人，这与您无关！”警察厉声地、一板一眼地说道。而姐姐用手指给我做了一个警告信号。警察把两个工人带走了。

假期里我时常当记账员，也就是和哥哥、姐姐轮流在账册上登记雇工姓名、雇用的条件和给某人的实物或现金报酬。我常常帮父亲和工人们算账，这时我常常爆发短暂的冲突，由于工人们在场，我们压低嗓音。算账时我们从来不搞欺骗，但对合同条件的解释却总是非常苛刻的。工人们，特别是年岁大一些的，发现男孩子是倾向于他们的，这使父亲恼怒。

在激烈的冲突之后，我便带了本书离家外出，有时连午饭也不回来吃。有一次在这样的争吵之后，我在田野里遇到了一场雷雨。雷声隆隆不断，大雨滂沱。草原成了泽国，闪电从四面八方向我袭来。我高一步、低一步地走着，浑身湿透，鞋子啪哒啪哒地响，帽子像水龙头一般哗哗流水。当我回到家时大家都默不作声，斜着眼睛看我。姐姐给我换了衣服，让我吃饭。

假期后通常是父亲陪我一起回城。在换车时，我们不雇搬运工，自己拿东西。父亲拿重一点的，我看着他的背影和被拉得很直的双手，知道他很吃力。我怜惜父亲，就尽量多拿一些。有时带了装有送给放德萨亲戚的乡下礼物的大箱子，就只好雇搬运工。父亲付钱很

吝啬，搬运工不满意，生气地摇摇头。我总是为此感到痛苦。当我一个人出门而不得不找搬运工时，我很快就花光口袋里的钱，并不安地瞧着搬运工的眼睛，唯恐给得不够。这是对父母家里吝啬的反叛，我一辈子都是如此。

无论在乡村还是城市，我都生活在小资产阶级的环境里，那儿主要的努力在于牟利。在这方面无论是童年的农村，还是我学生时代的城市，都与我格格不入。牟利的本能、小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和眼光——这一切我都竭力推开，一辈子如此。

在宗教和民族领域，城市和乡村并不相互矛盾，相反地，还从各个方面相互补充。父母家不信教。最初是由于习惯还不知不觉地保持一点表面现象，遇重大的节日父母到移民区的犹太教堂去，每逢星期六父母不做针线活，至少在公开场合是如此。但就是这点宗教仪式也随着孩子们的成长和家运的兴旺而逐年减少。父亲从年轻时起就不相信上帝，后来当着母亲和孩子们的面公开谈这件事。母亲认为回避这个问题为好，而且在必要的时候还举目望天，默默祷告。

然而，我七八岁的时候，信奉上帝还似乎是天经地义的事。有一次，来了一位客人，父母在他面前像通常一样夸奖儿子，要我把画拿出来看，朗读诗歌。客人问我：

“上帝是怎么回事？”我毫不犹豫地回答：“上帝是人。”但客人摇摇头说：“不，上帝不是人。”

“那上帝是什么呢？”我也问，因为除了人我只知道动物和植物。客人、父亲和母亲带着窘迫的笑容面面相觑，就像当孩子们对一向深信不疑的老生常谈开始感到动摇时，大人们常常表现出来的那种样子。

“上帝，这是神灵。”客人说。现在是我带着茫然的笑容瞧着大人，要在他们的脸上看出他们是不是和我在开玩笑，但不是，不是开玩笑。只好信从。我很快就习惯于上帝是神灵的說法。正像一个小野蛮人所做的那样，我把上帝和自己的“灵魂”联系在一起，称它为心灵，同时我已经知道，这种学说叫做泛灵论。

在第一次度假时，有一天我睡在餐室的沙发床上，同大学生 3

谈起了上帝，他是到扬诺夫卡来做客的，睡在沙发上。这时我对上帝是将信将疑，也没有特别地去管它，但也愿意有个明确的答案。

“人死后灵魂到哪里去了呢？”我伏在枕头上问道。“人睡着的时候，它又到哪儿去了呢？”他接着回答。“嗯，那毕竟……”我表示抗议，一面竭力不让自己打瞌睡。“而马死的时候，它的灵魂又到哪儿去了呢？”<sup>3</sup> 向我进攻。这一回答使我非常满意，我便平静地入睡了。

什宾采尔的家里是完全不信教的，如果不把他们的老太太姑妈算在内的话，不过她算不了什么。然而父亲喜欢我读原本的圣经，这是他做父亲的虚荣心的一个方面，所以我在放德萨请一位非常有学问的老人补习圣经课。我们的功课一共持续了几个月，但一点也没有使我坚信祖先的信仰。我在老师对课文的解释中发现有某种模棱两可的色彩，便小心地、以外交的口吻问道：“如果像某些人想的那样，认为没有上帝，那么世界会怎么样呢？”

“嗯。”我的老师回答。“那您可以把这个问题问他本人。”老人就这样巧妙地表白了自己的态度。我明白了，这位神学教师也不相信上帝，我终于感到满足。

实科中学由不同民族和不同信仰的人组成。分别由东正教神父、新教牧师、天主教神父以及犹太神学教师讲授“神学”课。牧师是大主教的侄子，大家都说他是娘们的宠儿，他年轻，有一头金黄色头发，长得就像客厅里悬挂的基督像那么漂亮，蓬松的金色头发下面戴着一副金丝眼镜，总之，漂亮得不得了。上宗教课之前，学生们要分开，异教徒得走出教室，有时得在神甫面前走过。他瞧着走出去的学生，总是露出一副特殊的面孔，表现出蔑视的表情，是一种温和的、真正基督教徒的宽容表情。“您上哪儿？”他问走出去的人。“我们是天主教徒。”那孩子回答。“噢，是天主教徒，”他轻轻摇摇头重复说，“好，好，好……那你们呢？”“我们是犹太人……”“犹太人，犹太人，好，好，好……”天主教神父像个黑影似的来到天主教徒那里，他总是依墙而来，又悄悄地消失，因而在这些年里我始终没有看清他那刮光胡须的脸。一个姓齐盖利曼的心地善良的人用俄语问犹太学生圣经

和犹太人的历史。对这些功课谁也没有认真看待。

民族因素在我的心理上并不占据独立的地位，因为在日常生活中很少感觉到它。1881年限制法颁布以后，父亲诚然已不能再买田地了（而他是很想买地的），而只能以租地作掩护。但这一切很少触及到我。作为一个富裕的土地占有者的儿子，我与其说属于压迫者，还不如说属于特权阶层。家里讲的是俄罗斯—乌克兰语。不错，犹太人上学是有比例的，我因此失去了一年时间。但以后我一直是第一名，我没有直接感受到这种限制。在学校里没有直接的民族歧视。不仅学生，而且教师也是多民族组成的，这在很大程度上阻止了民族歧视。然而隐秘的沙文主义还是能感觉得到的，而且有时会公开表现出来。历史教师柳比莫夫寻根问底地访问一个波兰学生关于波兰人在白俄罗斯和立陶宛迫害东正教徒的情况。那个名叫米茨凯维奇的黝黑瘦小的孩子脸色铁青，站在那儿紧咬牙齿，一言不发。“嗯，您怎么啦？”柳比莫夫流露出明显的满足，鼓动道：“您干吗不作声？”有一个学生忍不住了：“米茨凯维奇本人就是波兰人和天主教徒。”“啊……啊……”柳比莫夫显然是故作惊奇地拖着声调说，“我们这里是不分的……”

我同样强烈地感觉到历史教师对波兰人隐蔽的卑鄙行为，法国人比尤尔南德对德国人凶狠的挑剔态度，以及牧师对“犹太人”的轻轻摇头。民族不平等大概是对现存制度不满的潜在推动力之一，但这一动因完全消融到其他不公正的社会现象中去了，不仅没起主要的作用，而且一般来说也没起独立的作用。

一般高于局部，规律高于事实，理论高于个人的经验，这些感觉很早就在我身上产生了，并且逐年得到巩固。城市在我的世界观的形成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当学过物理和自然的孩子们就“不吉利”的星期一或穿越马路的牧师发表迷信的见解时，我就会感到非常愤慨，觉得思想受到屈辱。我不顾一切地想使他们抛弃可耻的迷信。

在扬诺夫卡人们花很长的时间绞尽脑汁地对梯形的土地进行测量，而我用了欧几里得几何花了两分钟就算出来了。但我的计算结

果与“根据实践”得出来的结果不相吻合，因此大家不相信我。我拿出几何课本，以科学的名义发誓，大动肝火，说粗话，但我看到大家并不相信，于是我陷入了绝望。

我和我们乡下的机匠伊万·瓦西利耶维奇发生了激烈的争吵，他不想放弃制造永动机的希望。他觉得能量守恒定律是同他的事不相干的杜撰。“那是书本，而这是实践……”他说。我觉得难以理解，也难以忍受，人们为了习惯的谬误或荒唐的幻想而竟然可以抛弃不可动摇的真理。

后来，一般高于局部的感觉成了我写作和政治方面的不可分割的部分。死板的经验主义，在事实面前，有时只是在想象的、往往是被错误理解的事实面前无所遮蔽的卑躬屈膝，使我感到厌恶。我从事实中寻找规律。自然，这不是一次地导致作出过于匆忙和错误的概括，特别是在年轻的时候，进行概括时既缺乏书本知识，又缺少生活经验。但在毫无例外的所有领域里，我觉得只有掌握一般这根线时，才能够前进和行动。成为我一生精神核心的社会革命激进主义，就是在理智上对舍本逐末、经验主义，对思想上不定型、理论上未概括的一切东西持势不两立的态度中成长起来的。

我试图对自己做一番回顾。这个男孩无疑是自尊心很强、脾气急躁，也许还是很乖僻的。在进学校时他对同龄人未必有优越感。不错，在乡下，大人们总是在客人们面前夸耀他，但在那儿无人可以和自己作比较，而到扬诺夫卡来的城里孩子总是有一种不可企及的优越感，即他们是中学生了，年龄也大一些，因此，只能从下面往上瞧他们。但学校是激烈竞争的舞台。自从他成为名列前茅的学生，并且第二名学生离他还有一段距离，从这时候起，这个扬诺夫卡出身的孩子便感觉到他可以比别人更强。接近他的那些孩子都承认他的优势地位。这不能不影响到他的性格。教师们也都称赞他，而有些教师，像克雷扎诺夫斯基，甚至还极力荐举他。总的说来，教师们对他虽说很好，但却是冷冰冰的。学生们则分成两派，有热情的朋友，也有敌手。

这个男孩并不拒绝自我批评。甚至对自己非常挑剔。个人的知



识和个人的性格特征并没使他感到满意，年岁越长，这种不满也越厉害。他严厉地揭穿自己所说的假话，他也常常责备自己没有读过别人蛮有把握地提到过的书。当然，这是和自尊心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要成为一个更优秀、更高深、更博学的人的想法，常常使他心头作痛。他思考人的使命，特别是自己的使命。

有一天晚上，莫伊谢·菲利波维奇在我身旁走过，郑重地问我：“怎么样，老弟，你在考虑人生问题吗？”我的监护人时常用这种诙谐的修辞，讥讽的戏剧性的语气。但我全身血往上涌。是的，我正在思考人生，只不过我不会用这个词来表达对未来的充满孩子气的惶然不安。我觉得我的监护人在偷听我。“看来，我说中了。”他换了另一种全然不同的语调说，轻轻地拍拍我的肩膀，便回房间去了。

什宾采尔家里有什么政治观点吗？莫伊谢·菲利波维奇的政治观点是人文主义背景下的温和的自由主义——对社会主义有一种模模糊糊的同情，又带有点民粹主义的和托尔斯泰主义的色彩。他们几乎从来不谈政治，特别是有我在场的时候。可能是怕我对同学们讲什么不必要的话，招来祸害。当在大人们的言谈中偶尔听到革命运动的事件，例如：“这是在亚历山大二世被刺的那年，”——这听起来就像是极遥远的过去，就像是说：这是在哥伦布发现美洲的那一年。我周围的环境是一个不问政治的环境。在学生时代，我既没有一定的政治观点，也没有这种需要。但我本能地持反对派倾向，对现存制度、不公平现象和专横有极深的恶感。这是从哪儿来的呢？是从亚历山大三世时代的环境，从警察的横行霸道、地主的剥削、官吏的贪污受贿、民族的限制，从学校里和马路上的不公正，从和农家孩子、仆人、工人的亲密联系，从作坊里的交谈，从什宾采尔家的人道主义精神，从读涅克拉索夫的诗歌和其他种种书籍，从整个社会气氛中来的。这种反对派情绪在和两个同班同学：罗泽维奇和科洛格里沃夫的交往中表现得最为明显。

弗拉基米尔·罗泽维奇是一位上校的儿子。一度曾是班上的第二名。他要求父母允许他邀请我星期天到他家去。他们接待我并不热情，但礼貌周到。上校和上校的夫人和我谈得很少，却有点像是在

审查。我在罗泽维奇家里呆了三四个小时，有几次触及某种令人格格不入、感到不安，甚至敌对的东西；这是稍稍提及宗教或当局的时候。在这个家里有一种保守的笃信宗教的气氛，我觉得这简直是给我当胸一拳。弗拉基米尔的父母不准他来找我，于是我们的来往就断了。第一次革命后黑色百人团<sup>①</sup>分子罗泽维奇在放德萨很出名，此人大概就是这个家庭的一员。

和科洛格里沃夫发生的事则更加激烈，他一下子就跳上二年级，是在下学期，他在班上作为一个外来人，以高个子和笨拙而引人注目。他特别勤奋，样样东西都死记硬背。头一个月他完全是在死背。有一次，地理教师把他叫到地图前，科洛格里沃夫没等老师提问，便立即开始说：“耶稣告诫世人。”原来，地理课之后是神学课。科洛格里沃夫对我这个优等生不无敬意，我在和他的交谈中，有时对校长，有时还对某人说了些批评性的议论。“难道可以这么议论校长吗？”科洛格里沃夫真诚地带气愤地问。“为什么不可以呢？”我带着更加真诚的惊奇反问。“要知道他是长官。如果长官命令你倒立着走，你就得倒立着走，而不是批评。”他就是这么说的。这种坏透了的公式使我大为吃惊。那时我没有想到，这孩子只不过是重复显然在自己农奴主家庭里所听到的话。尽管我还没有自己的观点，但我感觉到有些观点我是无法接受的，就像我无法吃生了蛆的食物一样。

在与俄国政治制度悄悄敌对的同时，不知不觉地把外国，把西欧和美国理想化了。根据听到看到的零星材料，加上猜想，形成了一种高度文化的观点，这种文化所有的人都能平等地享受，无一例外。稍后，理想的民主观念又和这个观念联系在一起。年轻的唯理论说，如果某一事物能被理解，那就意味着是能够实行的。因此，迷信能够在欧洲存在，教会可以在那儿起巨大作用；美国可以压迫黑人，似乎都是不可思议的。这种理想化是不知不觉地从周围小市民——自由派那里感染来的，甚至后来当我已经接受革命观点后还保持着。如果

①：俄国1905—1907年革命中出现的黑帮组织。 译注

在那年代我听说(如果能够听到的话)号称社会民主党政府的德意志共和国允许保皇党人避难,却拒绝革命者避难,我大概会大吃一惊的。幸运的是,从那时起,我对许多事情已不再吃惊了,生活除去了我身上的唯理论,教会我辩证法。甚至赫尔曼·米勒<sup>①</sup>都不能使我吃惊。

---

<sup>①</sup> 赫尔曼·米勒(1876—1931年)——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人之一,曾任外交部长,签署过《凡尔赛和约》。1928至1930年任德国总理。 译注

## 第六章

# 转 折

从19世纪中叶开始,俄国历史的发展可以以十年为期来计算。60年代(克里木战争<sup>①</sup>之后)是启蒙时期,我们的短暂的“18世纪”。下一个十年知识分子也企图从启蒙思想中作出实践的结论;他们从到民间去做革命宣传开始,而以恐怖主义告终。70年代主要是作为“民意党”<sup>②</sup>的年代而载入史册。一代优秀知识分子牺牲在炸药斗争的战火之中。敌人守住了自己的所有阵地。接踵而来的80年代,这是衰退的十年,悲观、绝望和进行宗教与道德探索的十年。然而在反动势力的庇护之下,资本主义力量却在悄悄地发展。90年代带来了工人罢工和马克思主义思想。新的浪潮在新世纪的头10年达到顶峰:这就是1905年。

80年代是以正教院总监波别多诺斯采夫为标志的。他是专制政权和万物不变论的经典作家。自由派认为他是不重生活的地道的典型官僚。但并非如此,波别多诺斯采夫对潜在的人民生活内部的矛盾的估计比自由派要清醒得多,认真得多。他明白,如果螺丝钉松动,那么压力就会从下面把社会的整个屋顶掀翻,到那时,不仅波别多诺斯采夫,而且被自由派看作文化和道德基础的一切统统都将化为灰烬。波别多诺斯采夫的眼光比自由派看得深远。如果历史进程

① 即1853—1856年俄国与土耳其、英、法等国为争夺在近东的统治地位的战争,又名东方战争。——译注

② 民粹派革命的恐怖组织,民意党人刺杀了沙皇亚历山大二世,该党于80年代被沙皇警察摧毁。——译注

比亚亚历山大三世和尼古拉二世的鼓舞者全力维护的拜占庭制度更为强大，那不是他的过错。

在消沉的 80 年代，当自由派觉得一切都停顿的时候，波别多诺斯采夫感到脚下是海啸和地下无声的震动。在亚历山大三世在位时最平静的年代，他并不平静。“过去难，现在难，可悲的是将来还是难。”他对自己的亲信写道。“我精神上的重担没有放下，因为我每时每刻看到和感觉到现在的时代精神是什么样的，人都变成什么样的人了……把现在和往昔相比，我们感觉到生活在另一个世界，一切都倒退到原始的混乱中去了——而我们置身于这种动荡之中，深感自己无能为力。”波别多诺斯采夫活到了 1905 年，见到曾让他惊恐万状的地下力量冲出了地面，整个旧建筑物的基础和坚固的围墙出现了第一道深深的裂缝。

一般认为，国内政治转折的正式年份是 1891 年，这一年发生了歉收和饥荒。新的十年不仅俄国的注意力集中在工人问题上。1891 年德国社会民主党通过了爱尔福特纲领。教皇莱奥十三世<sup>①</sup>发布了关于工人状况的通谕。威廉醉心于社会思想，其中混合着狂妄的无知与官僚的浪漫。沙皇与法国的接近保证了资本大量涌入俄国。任命维特为财政大臣开创了工业保护主义的新纪元。资本主义的蓬勃发展产生了以其可怕的征兆而使波别多诺斯采夫惶惶不安的那个“时代精神”。

首先在知识分子圈子里出现政治活跃的动向。年轻的马克思主义者越来越多地、越来越坚决地采取行动。同时，沉睡的民粹派开始苏醒了。1893 年第一本合法的马克思主义著作问世，是司徒卢威写的。那时我才 14 岁，同这些问题还不沾边。

1894 年亚历山大三世逝世。如同在这种情况下常见的那样，自由派希望在继承者那里得到支持。继承者却把他们一脚踢开。年轻的沙皇在接见地方自治局人士时把立宪的希望称之为“毫无意义的

<sup>①</sup> 莱奥十三世(1878—1903年) 罗马教皇。他为了镇压革命工人运动，力图在世界各地建立由梵蒂冈领导的天主教政党和工会。——译注

幻想”。这一讲话刊登在所有的报纸上。而口头传说是，沙皇校读过的稿子上写的是：“无根据的幻想”。但是由于激动，沙皇说得比想说的更为粗暴。这时我 15 岁。我本能地站在毫无根据的幻想一边，而不是站在沙皇一边。我模模糊糊地相信，通过逐步改善可以使落后的俄国接近先进的欧洲。我的政治思想当时就到此为止了。

放德萨是个多民族的、五光十色而又熙熙攘攘的商业城市，但在政治上比其他中心城市大大地落后了。在彼得堡、莫斯科、基辅，学校里已出现许多社会主义小组，而放德萨还没有。1895 年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去世，俄国各城市的大学生和中学生小组都作了纪念恩格斯的秘密报告。这时我已经 16 岁了，但是我还不知道恩格斯的名字，对马克思也未必能说出些什么所以然来，也许我对他还一无所知。

在学校里我的政治情绪属模糊的反对派，仅此而已。学校里还从来没有当着我们的面谈革命问题。人们悄悄地传说：在捷克人诺瓦克办的私立体育馆里常有一些小组在聚会，以后在这里进行了逮捕，正因为此事，在我们学校教体育的诺瓦克被辞退了，由一个军官代替他。我在什宾采尔家认识的那些人都不满意现存制度，但认为它是牢固的。最大胆的人也只幻想过几十年后实现立宪。关于扬诺夫卡，那就没有什么可说了。当我中学毕业后带着模糊的民主思想回到乡下时，父亲立即警觉起来，带着反感说：“这再过三百年也不会实现。”他坚信改良主义者的努力是徒劳的，并为儿子担心。1921 年父亲逃过白军和红军的危险后来到了克里姆林宫找我，我开玩笑地对他说：“记得吗，您说过，沙皇制度还要存在三百年？”老人狡黠地含笑用乌克兰语回答说：“这次算你的真理占了上风……”

90 年代初知识界中的托尔斯泰主义情绪在消失，马克思主义在向民粹主义的进攻中取得越来越多的胜利。这场思想斗争在各种倾向的出版物中都有反响。到处都在谈论自称唯物主义者过于自信的年轻人。而我直到 1896 年才首次接触到所有这一切。

在我身上出现过同 80 年代消极的意识形态紧密联系着的个人道德问题，在这时期，“自我修养”对我来说与其说是一种思潮，不如

说是精神成长的有机需求。然而，自我修养立刻遇到一个“世界观”问题，这个问题又引起根本的抉择：民粹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不同流派的斗争引起我的注意要比国内总的思想转变晚几年。当我涉足经济科学的基础知识并给自己提出俄国是否应当经过资本主义阶段这个问题时，老一辈马克思主义者已经找到与工人联系的道路并成为社会民主党人了。

当我走到第一个大十字路口时，我在政治上的准备是很不够的，即使对那时一个才 17 岁的人来说也是如此。一大堆问题既不遵循必要的次序，也不管先后，一下子全都摆在我的面前。这些问题太多了。我辗转不安。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生活已在我的意识里堆积了大量的对社会的反抗情绪。它是些什么呢？是对受欺侮者的同情和对不公平的愤怒。后一种感情好像尤为强烈。从童年起，在我的所有日常生活印象里，人类的不平等以罕见的粗鲁和赤裸裸的形式出现，不公平常常是露骨地不受惩罚，人的尊严步步受到践踏。只要回想一下对农民的鞭笞就够了。这一切还在接受任何理论之前就尖锐地感觉到了，这些印象的堆积具有很大的爆炸力。也许正因为如此，有一段时间我似乎有点犹豫，不想从我生活的第一个时期所观察到的一切中作出必要的重要结论。

但是在我的成长中还有另一面。在两代人交替的时候，死人常常拉住活人。俄国革命者那一代人就是这样，他们的青年时代是在 80 年代的压抑气氛下度过的。尽管新的学说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但在实践上马克思主义者常常受制于 80 年代的保守情绪，不能表现出大胆的首创精神，不能克服障碍，却把革命推迟到渺茫的未来，社会主义被看作是几个世纪演进的事业。

在像什宾采尔这样的家庭里，早几年或晚几年政治批评的声音会响亮得多。但我遇到的却是最沉默的几年。家里几乎不谈政治，对大问题则绕过去。在学校里也是如此。我无疑从 80 年代的这种气氛中接受了许多东西。后来，当我已经成为一个革命者的时候，我发觉自己不相信群众的行动，对革命抱书本上的和抽象的，因而也是怀疑主义的态度。我不得不同自己身上这些东西作斗争——用思

考、读书，而主要的是用经验，直到战胜心理上的因循守旧的因素为止。

有祸必有福。也许还正因为我不自觉地从身上 80 年代的残余，所以有可能较为认真地、较为具体和较为深刻地对待群众行动的根本问题。只有战斗中获得的東西才是牢固的。然而，所有这一切已属于本书最后一些章节的内容了。

七年级我已经不在放德萨，而是在尼古拉也夫上学。这个城市更具有外省的特色，学校的水平也要低一些。但在尼古拉也夫的一年（1896 年）却是我青年时代转折的一年，因为我给自己提出了在人类社会里的地位问题。我住的那个家里有几个成年的孩子，他们已经有点卷入新思潮。值得一提的是，最初我在谈话中坚决抨击了“社会主义乌托邦”。我扮演了一个曾经沧海的怀疑主义的角色。在回答政治问题时我怀着一种优越感使用讽刺的语调。我的女房东惊奇地瞧着我，甚至把我当作自己孩子们的榜样（诚然，并不很有把握），这些孩子比我年长，思想左倾。但从我这方面来说，这只是为自己的独立见解而进行的力不相称的斗争。我力图避免命运使我碰上的那些年轻社会主义者对我个人的影响。这种力不相称的斗争总共持续了几个月。社会上的那些思想比我强有力得多。并且，在我的内心深处非常想去服从这些思想。在尼古拉也夫生活了几个月之后，我的行为有了根本改变。我抛弃了故意做出的保守主义，并急剧向左转，其速度之快使我的一些好朋友吓坏了。“怎么回事？”我的女房东说，“就是说，我白白把您当作我孩子的榜样了。”

我荒废了功课。从放德萨带来的知识已足以维持一个优等生的正式地位。我越来越多地旷课。有一次，学监到住所来找我，调查我不上学的原因。我感到极大的侮辱，不过学监倒很客气，看到我住的那家和我的房里都井然有序，便和和气气地离开了。在我的床垫下藏有好几本非法的小册子。

除了倾向于马克思主义的青年外，我在尼古拉也夫遇到几个在警察局监视下的原流放者，这是民粹运动衰落时期的二流人物。社会民主党人还没有从流放地回来，他们刚发配走。两股相迎的潮流



激起了思想的漩涡。我也一度卷入这个漩涡之中。民粹主义发出陈腐的气味。马克思主义则以所谓“狭隘性”而使人不敢接近。由于急不可耐，我企图凭感觉来抓住思想，但要抓住它们也不那么容易。我身边找不到一个能够作为可靠支柱的人。而且每一次新的交谈都使我得出痛苦、委屈和失望的结论：我太无知了。

我结识了一个园丁，名叫什维戈夫斯基，原籍捷克。在他身上我第一次看到一个阅读报纸，读德文书，了解古典作家，并自由地参加马克思主义者与民粹派争论的工人形象。他在花园里有一间小木屋，这是来访的大学生、原流放者和当地青年聚会的地方。通过什维戈夫斯基可以弄到禁书。在流放者的谈话中有时提到民意党人的名字：日利亚鲍娃、彼罗夫斯卡娅、菲格涅尔，他们已不是传说中的英雄，而是活生生的人，认识他们的不是这些流放者，就是他们的老朋友。我曾经有过这样的感觉，我作为一个小环节连结到一条大链条中去了。

我贪婪地读书，担心一辈子的时间都不足以行动做好准备。阅读是神经质的，无耐性的和杂乱无章的。从上一时代的非法小册子到约翰·司徒亚特·穆勒的《逻辑学》，《逻辑学》还没有读到一半，便又去读利波尔特的《原始文化》。我感到边沁的功利主义是人类思想的最高成就。有几个月我感到自己是一个顽强的功利主义者。沿着这条思路我又迷恋上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现实主义美学。还没读完利波尔特的著作，我又转到米涅的《法国革命史》。每本书都单独地存在着，不成体系。为形成体系而进行的斗争是紧张的，有时甚至是狂暴的。与此同时，我摒弃马克思主义，部分原因还是因为它是完备的体系。

同时我开始读报，不是像在敖德萨那样读，而是从政治的角度去读的。那时莫斯科自由派的报纸《俄罗斯新闻》享有很高的声誉。我们不是读它，而是研究它，包括毫无创造性的教授式的社论直到科学小品。外国的通讯报道，特别是来自柏林的报道是这家报纸的骄傲。通过《俄罗斯新闻》我第一次获得了关于西欧政治生活，特别是关于议会政党的概念。现在很难想象我们看到的倍倍尔，甚至叶甫盖

尼·里希特的讲话时的那种激动的情景。我至今记得达申斯基向走进议会大厦的警察说的一句话：“我是加里西亚三万工人和农民的代表，谁敢碰我！”同时我们想象了这位加里西亚革命者的高大形象。可悲的是议会制的戏剧舞台无情地欺骗了我。德国社会主义者的成就、美国的总统选举、奥地利议会的吵架、法国保皇党人的阴谋诡计，这一切比我们每个人的个人命运更吸引我们。

那时和家庭的关系变坏了。父亲到尼古拉也夫出售谷物时，通过某种途径知道了我新结识的人。他感觉到，危险在逼近，但还是希望靠父亲的权威之力来予以防止。我们有过几次激烈的谈话。我为自己的独立自主，为选择道路的权利进行了不妥协的斗争。事情的结局是我放弃家庭的资助，离开自己的学生宿舍，搬到什维戈夫斯基那里和他一起住。这时他租了另一个园子，小木屋宽敞一些了。在这里我们六个人在一起过着“公社”的生活。夏天，我们又增加一两个得肺结核病的大学生，他们是来呼吸新鲜空气的。我开始教课。我们按斯巴达人的方式生活，不用床单，喝自己煮的没味的清汤。我们穿蓝色的短上衣，戴圆草帽，持黑色手杖。在城里的人们都认为我们参加了秘密帮会。我们杂乱无章地读书，激烈地争论，满腔热情地展望未来，真是自得其乐。

过了一段时间，我们建立了一个旨在民众中传播有益图书的团体。我们募集经费，购买廉价的出版物，但不善于散发它们。在什维戈夫斯基的花园里有一个雇工和一个学徒干活。我们首先把教育的热情倾注在他们身上。但那个雇工却是个化装的宪兵，他是被专门派到我们花园里来暗中监视我们的。他叫基里尔·特霍尔日夫斯基。他还拉学徒与宪兵搭上关系。这孩子拿了我们一大叠大众读物送到宪兵队。开场显然不顺利，但我们坚信将来会成功的。

我为放德萨的民粹派出版物撰写了一篇反对第一家马克思主义杂志的争论文章。文中有许多格言、引文和毒辣的话，而内容却相当单薄。我把文章邮寄了出去，过了一个星期又亲自去听回音。编辑透过一副大眼睛，颇有好感地瞧着有一头蓬松的浓发、嘴上没毛的作者。文章没有问世。谁也没有因此蒙受损失，我自己失得更少。

当选举产生的公共图书馆管理处把年费从5卢布提高到6卢布时，我们认为这是企图抵制民主，为此敲起了警钟。一连几个星期我们都在为召开一个全体图书馆成员大会做准备。我们把所有自己的民主主义口袋都翻遍了，一卢布半卢布地收集在一起，用这些钱来吸收更加激进的图书馆新成员，其中好多人不仅没有6个卢布，而且也没达到章程所规定的满20岁的年龄。我们把加入图书馆的申请书变为激烈的抨击性文章的集子。在年会上两派人干了起来：一派是官吏、教师、自由派地主和海军军官；另一派是我们民主派。我们全线大胜：我们恢复了年费5卢布并选出了新的管理处。

我们到处奔走，决定按互教互学的办法建立一所大学。听课的大约有20人。我教社会学。这听起来很值得骄傲。我全力以赴地准备我的课程。头两课非常成功。这以后我立即感到自己的资源已经耗尽。第二个讲师是讲法国革命，他没讲几句就语无伦次了，他只好答应提供讲稿。自然，他没有履行诺言。这一事业便到此结束。

于是我和这第二位讲师，索科洛夫斯基兄弟中的哥哥决定写一个剧本。为此目的我们甚至暂时脱离公社，躲进一间谁也不知地址的房间。我们的剧本以两代人的斗争为背景，充满社会倾向性。尽管两个剧作者对马克思主义半信半疑，然而剧本中的民粹分子是一个残废人，而充满朝气、清新和希望的却是年轻的马克思主义者。这就是时代的力量！剧中的浪漫成分表现在被生活搞得筋疲力尽的老一代革命者爱上了一个女马克思主义者，但她却以关于民粹派的失败的一席颇为无情的话给以回报。

为写剧本做了大量工作。有时候我们一起写，相互启发，相互修改，有时我们把场景分解，每人一天时间里写好一场戏或者独白。应该说，独白真不少。晚上索科洛夫斯基下班回来，这份工作使他能自由自在地推敲修改被生活搞得筋疲力尽的那位70年代人物的怨言。我则从课堂或什维戈夫斯基家回来。主人的女儿给我们端来茶水，索科洛夫斯基从口袋里拿出面包和香肠。两位剧作家在<sup>1</sup>与世隔绝的神秘地方紧张地工作，度过晚上的剩余时间。第一幕我们写得很完整，甚至还规定了收场时的效果。其余几场，一共是4场戏，就

只有草稿了。不过，我们越往下写，对这项工作的热情就越冷淡。过了一段时间我们得出结论，应当取消我们的秘密房间，剧本则放到将来去完成。一包手稿由索科洛夫斯基带到另一个住宅去了。后来，当我们关在放德萨监狱时，索科洛夫斯基曾试图通过自己的亲戚寻找这包手稿。也许他有过一个念头，认为可利用流放时间来加工剧本。但手稿没找到，它消失得无影无踪。很可能，保管手稿的房东在两个倒霉的作者被捕以后认为还是将它付之一炬为好。对此我也安然认命了，因为在我以后不总是平坦的生活道路上，我还丢失了许多更有价值的手稿。

## 第七章

# 我的第一个革命组织

1896年秋天我还是回到了乡下。但事情只限于与家庭的短暂妥协。父亲希望我成为一个工程师。而我还动摇于非常向往的纯数学和逐渐抓住我的革命之间。每当触及这个问题总要发生一场尖锐的家庭危机。大家都脸色阴郁，感到难受，姐姐默默地流泪，谁也不知道怎么办。在乡下作客的舅舅是一位工程师，敖德萨的一家工厂主，他劝我到他那儿去暂住。这毕竟是走出死胡同的一条临时出路。我在舅舅家里住了几个星期。我们争论利润和剩余价值问题。我舅舅赚取利润的本领胜过解释利润的本领。我入数学系读书一事也搁置下来了。我生活在敖德萨并在寻找着。寻找什么呢？主要是寻找自己。我偶然结识了一些工人，弄到了非法书籍，给技工学校的高年级学生上课，作秘密报告，和马克思主义者争论，还是不愿认输。我乘最后一班秋季客轮到了尼古拉也夫，还和什维戈夫斯基一起住在花园里。

恢复了原来的生活。我们讨论最近出版的激进刊物，争论达尔文学说，模模糊糊地准备着和等待着。是什么东西直接推动我们开始革命宣传的呢？对此很难回答。是内部的推动力。在我经常来往的知识界中，谁也没有进行真正的革命工作。我们意识到在我们喝茶时没完没了的清谈和革命组织之间横着一条鸿沟。我们知道，和工人建立联系需采用极端秘密的活动方式。这个词我们是严肃地、怀着敬意，甚至是神秘感说出来的。我们毫不怀疑，我们最终将从喝茶转向秘密活动，但是谁也没能明确说明，这将在何时和如何进行。

在为迟迟不采取行动辩护时我们彼此常常说：得做准备。而这也未必不对。

不过，空气显然在起变化，它使我们急剧地走上革命宣传的道路。这种变化并不是在尼古拉也夫本地直接出现的，而是在全国，首先在首都出现，但我们这里也感觉得到。1896年在彼得堡爆发著名的纺织工人的群众性罢工。这给知识分子增添了勇气。大学生由于感觉到强大的后备军的觉醒而变得勇敢起来。在夏天，在圣诞节和复活节，有几十个大学生来到尼古拉也夫，他们带来了彼得堡、莫斯科和基辅的斗争余音。有几个人被开除出大学，这些不久前的中学生则带着斗士的光环回来。1897年高等女校学生维特罗娃在彼得堡要塞自焚。这个始终没查清的悲剧震惊了所有的人。在大学城里发生一场风潮。逮捕和流放更加频繁了。

我是随着“维特罗娃事件”的示威活动参加革命工作的。事情是这样的，我和我们公社的一位年轻成员格里戈里·索科洛夫斯基一起在街上走着，他是一个年龄与我相仿的青年。“该是我们开始行动的时候了，”我说。“该开始了。”索科洛夫斯基回答说。“不过，怎么开始呢？”“问题就在这里：怎么开始？”“应当去找工人，不要等谁，也不必去问谁，只要找到工人，开始干。”“我想，是可以找到的，”索科洛夫斯基说，“我认识一个林荫道的看守人，一个福音会会员，我这就去找他。”

索科洛夫斯基当天就到林荫道去找这个福音会会员，但那人早已不在了。有个妇女在那里，这个妇女有一位熟人，也是信徒。通过这个我们不认识的妇女的熟人，索科洛夫斯基当天就认识了几个工人，其中有一个叫伊万·安德烈耶维奇·穆欣的电工技师，很快成了组织的主要人物。索科洛夫斯基找到人后兴冲冲地回来：“瞧，这些人，这才是真正的人！”

第二天，我们五六个人坐在一家小饭馆里，留声机在我们头上疯狂地唱着，使外人听不见我们的谈话。身材瘦削、留着三角胡子的穆欣调皮地眯着聪明的左眼，友善地，但小心翼翼地瞧着我这嘴上没毛的脸，他狡猾地停停讲讲，对我作了详尽的解释：“福音书对我来说在

这件事情上像只小钩。我从宗教开始，再转到生活。前几天我用豆子向史敦达派教徒揭示了全部真理。”“怎么用豆子揭示真理？”“很简单：我现在把豆子一粒粒放在桌子上，喏，这是沙皇，在他周围我再放上一些豆子；这是大臣、大主教、将军，还有贵族、商人，而这一堆豆子是普通人民。现在我问：沙皇在哪里？他指指中间。大臣在哪儿？他指指周围。我怎么问，他就怎么回答。好，现在停一下，”伊万·安德烈耶维奇说，“现在等一下，”他把左眼完全闭了起来并停顿了一下，“现在我用手把这些豆子搞乱，喏，你猜猜看，沙皇在哪儿？大臣们在哪儿？他说，现在谁能认出他来？如今你找不到他了……就是这么回事，我说，你现在找不到他了，所以我说，应当把所有的豆子都搞乱。”

我听伊万·安德烈耶维奇讲话时，甚至兴奋得浑身出汗。这才是真格的，而我们却自作聪明，在猜测，在等待。留声机在转动，这是秘密活动；伊万·安德烈耶维奇用豆粒推翻了阶级机制，这就是革命宣传。

“只是怎样把他们搞乱，让苍蝇吃掉他们，问题是不是在这里？”穆欣已经换了另一种语调说话，用两只眼睛严厉地瞧着我，“要知道这不是豆子，是不是？”现在已经是他在等待着我的回答了。

从这天起我们便埋头于工作。我们没有年长的领导人，自己的经验也不足，不过我们好像从来没有遇到过困难，也没有出现过惊惶失措。一件又一件事情势不可挡地进行下去，就像在小饭馆里与穆欣的谈话那样。

19世纪末俄国的经济生活急剧地向南方转移。一家又一家大工厂在南方建立起来，其中有两家建立在尼古拉也夫。1897年在尼古拉也夫约有8000名工厂工人，还有约2000名手工业工人。工人们的文化水平和工资都比较高。文盲只占微不足道的比例。与官方东正教进行卓有成效的斗争的宗教分化运动在某种程度上处于革命组织的地位。由于没有大的动乱，尼古拉也夫的宪兵队还在平静地睡大觉。这对我们来说是再合适不过的了。如果严密地布置特务，那我们在最初的几个星期就会遭到逮捕。但我们是先锋，在这方面占了

便宜。我们只是在惊动尼古拉也夫的工人之后，才惊动了宪兵。

在和穆欣及他的朋友们认识时，我自称利沃夫。这第一个秘密活动的谎言对我来说是非常不容易的：“欺骗”为了如此美好的大事业而相识的人是痛苦的。但是利沃夫这个化名很快就和我紧紧地结合在一起了，并且我自己也习惯了。

工人们自发地加入我们的行列，好像早就在工厂里等候我们了。他们带来了朋友，有的还带来了妻子，几个上了年纪的工人带了儿子来一道参加小组。不是我们找工人，而是他们找我们。我们这些年轻而又没有经验的领导人很快就被卷入了由我们发起的运动中去了。每句话都会引起反应。在宿舍，在森林，在河上举行的秘密报告会和座谈会都有 20 至 25 人或更多的人参加，占多数的是技术水平高收入也不错的工人。尼古拉也夫造船厂那时已实行 8 小时工作制。这些工人对罢工不感兴趣，他们寻求社会关系中的正义。有些人把自己叫做洗礼派教徒、史敦达派教徒、福音派教徒。但这不是独断的教派。工人们只是脱离东正教，洗礼派是他们革命道路上的一个短暂的阶段。在我们交谈的头几个星期，他们中间的一些人还常常使用教派的说法，常和早期基督徒的时代相比。但几乎所有的人很快就放弃了这种用语，而年轻一些的工人则拿这些用语来放肆地取乐。

有几个最卓越的人物到今天还活生生地出现在我的眼前。细木工科罗特科夫戴一只圆顶礼帽，爱开玩笑逗乐，会写诗，早已同神秘主义决裂。“我是个唯理者。”（唯理论者）他郑重其事地宣布。塔拉斯·萨维利耶维奇是个老福音派教徒，孙子都有了。当他第一百遍谈到早期的基督徒也像我们这样秘密集会时，科罗特科夫打断他说：“我把你的神学——瞧，就这样！”接着他从头上摘下圆顶礼帽，怒气冲冲地扔到树丛中去了，然后，他站了一会，便去寻找自己的帽子。这件事发生在林中的沙地上。

许多有新的感受的工人开始作起诗来。科罗特科夫写了《无产阶级进行曲》，开头是这样的：“我们是阿尔法和奥米伽<sup>①</sup>，是头和

① 希腊语第一个字母 A 和最后一个字母 Ω。——译注



尾。”涅斯捷连科，也是个木匠，和儿子一起参加了亚历山德拉·利沃芙娜·索科洛夫斯卡娅的小组，写了一首关于卡尔·马克思的乌克兰民歌。大家合唱这首民歌。但涅斯捷连科本人的结局却非常不好：他和警察局搞上了关系，向当局出卖了整个组织。

年轻的粗工叶菲莫夫是一个蓝眼睛、淡褐色头发的大个子，出身于军官家庭，很有文化，甚至博学多识，但生活在城市的最底层。我是在流浪汉的小食铺里找到他的。叶菲莫夫在港口做搬运工，不喝酒，不抽烟，稳重而有礼貌，但在他身上有某种秘密，使他显得阴沉，尽管他只有21岁。不久，叶菲莫夫告诉我，他似乎认识一个民意派的秘密组织，建议我们和他们会见。于是我、穆欣和叶菲莫夫三人在“俄罗斯”小酒馆喝着酒，听着唱机震耳欲聋的音乐，等待着。终于，叶菲莫夫用眼睛示意我们看一个留着商人胡子的结实的大个子。“是他。”这个人在一张单独的小桌子上喝了很久的茶，然后站起来，穿上外衣，机械地在圣像前划了个“十”字。“瞧，这就是民意派分子！”穆欣悄悄地叹道。“民意派分子”回避与我们相识，通过叶菲莫夫转达了含含糊糊的解释。这件事始终是个谜。叶菲莫夫不久用煤气自杀身亡。也许这个蓝眼睛的大个子不过是密探手中的工具，但也可能更坏……

以电工为职业的穆欣在自己住宅里安装了复杂的报警系统，以防警察袭击。穆欣27岁，有点咯血，有着丰富的生活经验，有充分的实际知识，在我心目中他几乎是个老头了。穆欣终身是个革命家。他第一次被流放以后接着便是新的监狱生活，然后又是新的流放。23年之后，在哈尔科夫举行的乌克兰共产党代表会议上又遇见了他。我们久久地坐在角落里，畅叙往事，回忆某些插曲，相互转告那些同革命的黎明期有联系的人物往后的命运。穆欣在这次代表会议上被选入乌克兰党的中央监察委员会。他的一生完全无愧于此任。但是代表会议后不久，穆欣便一病不起。

我和穆欣认识后，他立刻介绍我和他的一个朋友，也是教派分子的巴宾科认识，巴宾科有一所小房子，院子里种有苹果树。巴宾科是个跛子，动作慢条斯理，从不饮酒，他教我用苹果代枰柠檬泡茶喝。

巴宾科曾和其他人一起被捕，坐了很长时间的牢，后来又回到尼古拉也夫。命运把我们完全分开。1925年我偶然在一张报纸上读到，前南俄工人协会成员巴宾科住在库班。这时候他的双腿已经瘫痪。我设法让这位老人转到叶先图基去治疗——在1925年这对我来说已经是不容易的了。他的双脚又能行走了。我到疗养院去拜访过巴宾科，他并不知道托洛茨基和利沃夫是同一个人。我们又一道喝苹果泡的茶并回忆往事。不久以后他听到托洛茨基是一个反革命分子时，一定会大吃一惊的！

有过许多有趣的人物，这里不能一一列举。有一些非常好的青年，文化水平很高，毕业于造船厂附属技术学校。领导只要稍一提示他们就明白了。因此，革命宣传比想象中所描绘的更容易被人接受。工作的高效率使我们感到惊奇和陶醉。我们从关于革命活动的故事中得知，受宣传而相信的工人，通常为数不多，一个革命家能吸引两三个工人，这成绩就不错了。在我们那里已经参加和愿意参加小组的人数实际上是无限制的。缺少的只是领导者和宣传品。领导者们把唯一的一本破旧的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的手抄本相互传来传去。这本书是在敖德萨由不同的笔迹抄下来的，其中有不少遗漏和失真的地方。

不久我们自己开始写作。这也是我写作工作的开端，它几乎是同革命工作同时开始的。我写传单或文章，然后用印刷体誊写一遍以供胶印。那时人们还没想到会有打字机。我极其仔细地写印刷体字母，认为使甚至识字不多的人都能毫不困难地读懂我们誊印的传单是一件光荣的事情。每一页都需写两个多小时。有时我整个星期都没伸过腰，只有在开会和小组活动时才中断。然而，当听到从工厂、车间传来的消息，说工人们是如何贪婪地阅读、相互传递和热烈讨论印着浅紫色字母的秘密传单，这时一种满足感就油然而生。他们想象传单的作者是一个有力的人物，他深入到所有工厂，了解车间里发生的事情，并且在24小时以后已经用新的传单来回答所发生的事件。

起初我们深夜在自己房间里制作胶版，印制传单，派一个人站在

院子里守望。打开着的炉子里准备好火柴和汽油，以便在出现险情时把罪证烧毁。这一切都想得十分天真，但是尼古拉也夫的宪兵那时并不比我们高明。后来我们把印刷所转移到一位上了年纪的工人家里。这位工人在车间的一次不幸事故中双目失明了。他毫不犹豫地把手住宅让我们使用。“对瞎子来说，到处是监狱。”他常常安然一笑地说。渐渐地我们把大量甘油、明胶和纸张集中到他家里。我们在夜里工作。一间弃置的房间，头顶天花板，真是一派破落的可怜样子。我们在铁炉上煮革命的溶液，然后把它浇到白铁皮上。瞎子比大家更有信心地在半明不暗的房间里走动，帮助我们。当我们从胶印机上把刚印好的纸张揭下来时，一位年轻的男工和一位女工虔诚地相互望着。如果从上面以“清醒的”目光来看这群在昏暗中围着可怜的胶印机忙碌的年轻人，那么他们打算推倒一个强大的、统治了若干世纪的国家岂不使人觉得是一种贫乏的幻想？然而这种打算却在一代人的时间内实现了：从这些夜晚到1905年只有8年，到1917年也不满20年。

口头宣传好像没有笔头宣传那样使我感到满意。知识不足，也不善于有效地运用这些知识。我们还几乎没有进行过真正意义上的演说。只是有一次“五一节”，在树林里，我不得不做类似演说的讲话，这把我弄得十分狼狈。每句话在说出来之前我都觉得虚假。但是在小组的谈话，有时还不错。总之，革命工作在紧张地进行。我同敖德萨建立并发展了联系。晚上我到尼古拉也夫码头用一个卢布买了一张三等舱的船票。躺在靠近烟囱的轮船甲板上，头枕着上衣，身盖着大衣。早晨在敖德萨醒来，就到我们熟悉的地方去。第二天夜里又在轮船上度过。这样，我的旅行就没有浪费一点时间。我在敖德萨的关系出乎意料的多。在公共图书馆的门口我认识了一个戴眼镜的工人：我们相互仔细地看了一下，就彼此都明白了。这是排字工艾伯特·波利亚克，是后来著名的党中央印刷厂的组织者。和他的结识成了我们组织生活中的一个新阶段。几天以后我把一箱子在国外印制的秘密出版物带到尼古拉也夫。这都是崭新的宣传小册子，封面色彩鲜艳夺目。我们一次又一次地打开箱子，欣赏自己的宝贝。

小册子很快散发出去了，我们在工人中的威望也大大提高了。

在交谈中我偶然从波里亚克那里得知，冒充工程师并早就在我们中间厮混的技术员施连采利是一个老奸细。这是个愚蠢和惹人厌烦的人，戴一顶别有帽徽的制帽。我们本能地不信任他，但是有些人有些事他还是知道一点的。我把施连采利请到穆欣的住处，在那里我不点名地详细叙述了施连采利的历史，这使他完全失去了自制。我们警告他，如果他出卖我们，就马上予以处决。显然，这起了作用，因为有三个月的时间我们平安无事。然而，在我们被捕以后，施连采利却在作证时提供了大量的证据。

我们把组织称为“南俄工人协会”，打算把其他城市也拉进来。我按照社会民主主义精神起草了联盟的章程。行政当局企图阻止我们在工厂发表演说。我们便在第二天发表宣言给以回击。这场决斗不仅激发了工人，而且还激发了广大城市居民。满城都在谈论给工厂送去大量传单的革命者。四面八方都在说起我们的名字。但是警察局行动迟疑，他们不相信“花园里的孩子”能组织这样的运动，认为在我们背后有更有经验的领导者。看来，他们怀疑那些老流放者。这给了我们两三个月以上的时间。对我们进行的监视虽过于明显，但宪兵们最终会查清一个又一个小组。我们决定离开尼古拉也夫几个星期，分散到四面八方去，以便扯断警察的线索。我只好到乡下双亲那儿去，索科洛夫斯卡娅和弟弟则到叶卡捷琳诺斯拉夫去，如此等等。与此同时，我们毅然作出决定，万一发生大规模搜捕，不要躲藏，而要让他们抓去，这样，宪兵就不能对工人说：“领导人把你们给扔了。”

在我动身之前，涅斯捷连科要求我直接交给他一包传单，他约定夜晚在墓地后面见面。地上积着厚厚的雪，月光如洗。墓地后面是一片旷野。我在约定的地点找到了涅斯捷连科。但正当我悄悄地把拿来的一包传单交给他时，从墓地墙边走出一个人来，从我们身旁走过，碰碰涅斯捷连科的胳膊肘。“这是谁？”我惊奇地问。“不知道。”涅斯捷连科一面瞧着离去的背影，一面回答说。那时他已经和警察局有联系，但我脑子里根本没有怀疑他。

1898年1月28日进行了大搜捕，共有200多人被捕。进行了摧残迫害，有一个被捕的士兵索科洛夫吓得从监狱二楼的走廊上往下跳，还好只受了重伤。宪兵们把另一个关押的列万多夫斯基折磨得精神失常。还有好些受害者。

在被捕者中间有好多人是无意中被捕的。一些我们曾寄予希望的人离开了，甚至出卖我们。相反地，有些不引人注目的人却表现得很坚强。一个50岁左右的德国人、车工奥古斯特·多伦不知为什么被捕并且还关了好久，他总共只来过小组一两次。他表现得很出色，满监狱地唱欢快的，诚然，不总是很正经的德国歌曲，还用蹩脚的俄语开玩笑，鼓舞青年们的士气。在莫斯科解犯羁押监狱里我们同住一间牢房。多伦劝说茶炊向他靠近，然后以这样的对话结束：“你不想来，那多伦就到你那儿去！”尽管这种表演天天重复，大家还是好心地笑了。

尼古拉也夫的组织遭到残酷的打击，但没有消失。另一些人很快接替了我们。无论是革命者还是宪兵们都变得有经验一些了。

## 第八章

# 我的头几次狱中生活

在1898年1月的大搜捕中我不是在尼古拉也夫，而是在大地主索科夫尼克的庄园里被捕的，那时什维戈夫斯基在他那儿当花匠。我从扬诺夫卡赴尼古拉也夫时路过那儿，带了一大皮包手稿、宣传画、信件等各种各样的非法材料。夜里什维戈夫斯基把一包危险的材料藏在菜窖里，清早去种树时他把这包东西取出来，准备交给我继续工作。不巧这时宪兵突然出现了。什维戈夫斯基赶紧在穿堂把这包材料扔在水桶后面。他还悄悄地告诉在宪兵监督下给我送饭的女管家，要她把那包东西取走藏好。这个老太婆就把它埋在花园的雪地里。我们满以为这些文件不会落入敌人的手里了。春天到了，冰雪融化了，长出的青草又把这包被春水浸得膨胀的材料掩盖了起来。那时我们还在狱中。夏天来了，有个工人在地主的花园里割草。他的两个男孩也在花园里玩，偶然发现了这包东西，就把它交给父亲。这个工人把这包材料带到老爷家里，这个自由派地主怕得要死，马上把这些文件拿到尼古拉也夫，交给一个宪兵上校。手稿上的笔迹成了好几个人的罪证。

尼古拉也夫的古老监狱不适合关押政治犯，何况人数又如此之多。我和一个名叫雅维奇的青年装订工关在一间牢房里。这间囚室很大，可关三上来人，没有任何家具，也不暖和。门上开着一个方形的大洞，外而是直通院子的走廊。那是1月的严寒季节。他们把草垫铺在地上给我们过夜，一到早晨6点钟就把草垫取走。起床和穿衣服是件痛苦的事。我和雅维奇穿上大衣，戴上帽子，穿上胶皮套靴肩并肩地坐在地上，背靠着稍稍还有点热气的炉子再打一两个钟点

的瞌睡。这大概是一天中最幸福的时刻。没有把我们叫去审讯。我们从一个角落到另一个角落来回跑动取暖，我们忘情于回忆、推测和希望。我开始和雅维奇一起学习科学知识。就这样过了三个星期。后来起了变化。叫我带了东西到监狱办公室去，接着把我交给两个身材高大的宪兵，由这两人用马车把我押解到赫尔松监狱。这是一幢更加古老的建筑。牢房宽敞，但钉有粗铁条的狭窄的窗户关得严严实实，几乎把光线都遮住了。这是完全、绝对和暗无天日的孤独生活。既不给放风，也见不到邻人。从那扇为过冬而关死的窗户里，看不到任何东西。我没有收到狱外的东西。因此我既没有茶叶，也没有糖。一天给囚犯供应一次稀汤，作为中饭。一份加盐的黑面包是我的早饭和晚饭。我经常长时间地自问我是否有权牺牲晚餐来增加早饭的份额。早晨多吃的论据到了晚上就变成是毫无道理和有罪的了。吃晚饭时我就憎恨吃早饭的那个人了。我没有替换的衬衣，三个月来我一直穿着那一身衣服。我没有肥皂。监狱的寄生虫要把我活活地吃掉。我给自己安排了功课：沿对角线走一千一百一十一步。那时我刚过19岁。这里的孤独是绝对的，我虽然后来坐过二十多次牢，但这样的孤独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没有经历过。我既没有书也没有铅笔和纸。牢房不通风。只要看看副狱长来找我时的表情，就知道牢房里的空气如何了。我经常一边啃着监狱的面包，一边沿对角线走来走去，一边作诗。我把民粹派的《棍棒歌》改编为无产阶级的《机器歌》。我编了一首革命的喀马林歌。这些写得很平常的诗后来却非常流行。现在还把它们重印在歌本上。但有时那孤独还是使我寂寞得发慌。于是我咬紧牙关，穿着那双破鞋再数一千一百一十一步。第三个月的月底，当监狱的面包、草垫和虱子，像白天和黑夜那样，成了我生活的牢牢组成部分的时候，一天晚上，看守给我送来堆积如山的来自一个神奇世界的东西：清洁的衬衣、被子、枕头、白面包、茶叶、糖、火腿、罐头、苹果、桔子，而且是又大又漂亮的桔子……就是现在，31年之后，我在列举这些珍品时还不能不感到激动，并责备自己漏掉了果酱、肥皂和梳子。“这是母亲给您送来的。”副狱长对我说。那时尽管我还不善于猜测别人的心理，但根据他说话的声调，我立刻明白，他受了贿赂。

不久我被送上去放德萨的轮船，关进一所单人牢房，这所监狱是几年前用最新技术建造的。蹲过尼古拉耶夫和赫尔松的监狱之后，放德萨的单人牢房对我来说是个理想的场所。敲墙壁、传字条，“打电话”，通过窗户直接叫唤……总之，通信业务几乎从不间断。我用敲墙壁的办法把自己在赫尔松所作的一些诗歌传给邻居，他们则给我传送消息作为回报。通过窗口我从什维戈夫斯基那儿及时获悉宪兵已得到我那包文件。需要说一下，那时候我们还没有像几年以后那样拒绝提供口供。

在全俄春季大破坏之后监狱里人满为患。1898年3月1日，在明斯克召开了社会民主党成立大会，这时我还在赫尔松监狱。大会只有9人参加，而且立即淹没在大逮捕的浪潮之中。几个月以后已经再没有人谈起这件事了。但是它的后果却影响到整个人类的历史……大会通过的宣言描绘了这样一幅政治斗争的前景：“……在欧洲，越往东去，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就越怯懦和卑鄙，落在无产阶级身上的文化和政治任务就越巨大。”宣言的作者是不无名气的彼得·司徒卢威，此人后来是自由主义领袖，再往后是教会和君主主义反动的政论家，这一事实真是历史的讽刺。

到放德萨监狱的最初几个月，我没有收到外界的书籍，不得不满足于监狱的图书馆，它主要是那几年的保守的历史杂志和宗教杂志。我如饥似渴地研究了这些杂志。我了解了新旧时代的所有教派和所有异端，东正教祈祷仪式的全部优越性，反对天主教、新教、托尔斯泰主义、达尔文主义的最好论据。我在《东正教评论》上读到：基督教意识喜欢真正的科学，其中包括作为信仰的理性近亲的自然科学。巴兰的驴<sup>①</sup>同先知进行辩论的奇迹从自然科学的观点来看也是驳不倒的：“要知道，鸚鵡，甚至金丝雀都会说话。”尼卡诺尔大主教的这个论断在我脑际萦绕了好几天，有时在梦中也把我缠住。对魔鬼或恶魔，对他们的头目，魔王，对他们黑暗的魔鬼王国的研究，每次都以其几千年的胡编乱造使年轻的唯理论思想感到震惊，从某一点上来说，还有

① 巴兰的驴是圣经神话中的故事，美索不达米亚魔法师巴兰的驴能操人语。  
译注



点赞叹。关于天堂，关于天堂的内部结构以及关于天国所在地的广泛而详细的研究，其结论令人伤心地感到：“没有关于天堂在哪里的确切指示。”我在茶余饭后，在散步的时候一再重复这句话。关于天堂极乐世界的经度没有标明。一有机会我就和宪兵士官米克林进行神学方面的争论。米克林贪婪、虚伪、凶狠，博览神学方面的书籍，极端的虔诚。他带了一串钥匙在咚咚作响的铁楼梯上奔上跑下，一面哼着赞美诗。“就因为一个词，因为把圣母说成基督之母这个词，”米克林开导我，“异教徒阿里的肚子就胀破了。”“那为什么现在异教徒的肚子都完好无损呢？”“现在，现在……”米克林委屈地回答，“现在时代不同了。”

姐姐从乡下来，根据我的要求给我带来了四种外文版的福音书。依靠在学校里学过的德语和法语，我一行一行地读英文和意大利文的福音书。这样，几个月后我大有进步。然而，需要说的是，我学语言的能力是不强的。就是现在，我也没有一门外语是精通的，尽管我在欧洲各国住了很久。

在和亲属会面时，犯人被安置在一个狭小的木头笼子里，用两道栅栏与探访者隔开。父亲头一次和我会面时，以为我在关押期间一直站在这只狭小的匣子里，内心的震动使他讲不出话来。在回答我的问题时，他那苍白的嘴唇无声地颤动。我永远忘不了他那张脸。母亲来时事先已对她介绍了我的情况，所以她比较平静。

世界大事的消息零零碎碎地传到我们这里。南非战争几乎没有触动我们，我们还是地道的外省人。英国人和布尔人<sup>①</sup>的斗争，我们主要是从大资本必然战胜小资本的观点给予解释的。轰动一时的德雷福斯案件<sup>②</sup>有时以其戏剧性而引起我们很大的兴趣。有一次我们听到一个传闻，说法国发生了政变，恢复了皇权。我们感到一种无法洗刷的耻辱。宪兵们在铁板的走廊上和铁楼梯上不安地奔跑，想制

① 非洲南部荷兰移民的后裔。——译注

② 德雷福斯案。——1894年法国反动军间谍告法国总参谋部犹太血统的军官A·德雷福斯充当德国间谍，法政府在缺乏证据的情况下判处德雷福斯终身苦役。围绕此案导致了一场政治危机，1899年在舆论压力下，德雷福斯获释，1906年恢复名誉。——译注

止我们的敲击声和喊声。他们以为是因为又给了我们变质的中饭。不，是监狱的政治犯激烈地抗议法国君主制的复辟。

神学杂志上刊登的关于共济会<sup>①</sup>的一些文章引起了我的很大兴趣。这奇怪的流派是从哪里冒出来的呢？我问自己。马克思主义会如何解释它呢？我较长时间地抵制历史唯物主义，而持多种历史因素论。人们把自己的社会活动的不同方面称之为因素，并赋予这一概念以超社会性质，然后迷信地把自己的个人社会活动解释为这些独立力量相互作用的产物。这些因素是从哪儿来的，也就是说他们在哪些条件的作用下从人类的原始社会发展起来的，官方的折中学派就不管了。我在牢房里欣喜若狂地读了原意大利黑格尔学派的马克思主义者安东尼奥·拉布里奥拉<sup>②</sup>的两篇著名的论文，这是偷偷带进监狱的法文本。和不多的拉丁作家一样，拉布里奥拉掌握了唯物辩证法，不是在他显得软弱无力的政治方面，而是在历史哲学领域。在他那出色的不求甚解的叙述中实际蕴藏着真正深刻的理解。拉布里奥拉出色地收拾了高居在历史的奥林匹斯山<sup>③</sup>之上、从那里主宰我们命运的多因素理论。我读他的书尽管已过去30年了，但他的总思路还牢牢地印在我的记忆中，就像经常唱的套句那样：“思想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这以后我觉得俄国多因素论的理论家：拉夫罗夫、米哈伊洛夫斯基、卡列耶夫等人太无力了。很久以后，我怎么也弄不明白，一些马克思主义者怎么会受到德国教授施塔姆勒<sup>④</sup>那

① 共济会原系石匠的组织，18世纪初产生于英国的宗教道德运动，在许多国家（其中包括俄国）的资产阶级和贵族阶层中传播。其名称、组织和传统来自中世纪骑士和秘密结社的传统。共济会会员希图建立一个全世界的秘密组织，以达到其他全人类联合在宗教兄弟同盟之中的乌托邦的目的。18至19世纪初影响最大。反动的和进步的社会运动均与共济会保持联系。 译注

② 安东尼奥·拉布里奥拉（1843—1904年） 意大利哲学家、理论家、马克思主义宣传家，90年代起成为马克思主义者。曾参加意大利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主要著作有《唯物史观概论》（4卷，1895—1925年版）。 译注

③ 奥林匹斯山 希腊神话中以宙斯为首的诸神所居之地，也是奥林匹斯众神集合的地方。 译注

④ 施塔姆勒（1856—1938年） 德国法理学理论家，马尔堡新康德主义学派的代表，接近于讲坛社会主义。主张法律对经济，对国家来说是第一性的。 译注

本内容贫乏的著作《经济与法》的影响，这本书企图把从变形虫到我们，再从我们往下传的伟大的自然——历史和历史的河流纳入永恒范畴的封闭圈之中，而这种封闭圈实际上只不过是书呆子脑子里的活动过程的印记而已。

正是在这个时期我对共济会问题产生了兴趣。我在几个月时间里十分用心地读共济会历史的书，这些书是城里的一些亲戚和朋友给我弄来的。为什么从17世纪头25年起，一些商人、画家、银行家、官员和律师把自己叫做石匠并恢复中世纪行会的仪式？为什么要戴这种奇怪的假面具呢？我渐渐地明白这幅图画的含义了。老的行会不仅是生产的组织，也是道德和生活的组织，它从各个方面控制城市居民的生活，特别是建筑业中半手工业者和半艺人的行会。行会经济的解体意味着刚刚离开中世纪的社会道德的危机。新道德的形成要比旧道德的解体缓慢得多。因此出现了人类历史上一个十分常见的现象，即力图保持那些历史进程早已挖出其社会基础——在这里就是生产一行会的基础的道德规范形式。行动的共济会变成了思辨的共济会。但和往常一样，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为了他们自己而力图保持过时的道德和生活的形式，在生活的压力下却获得了全新的内容。在共济会某些派系内，例如在苏格兰的派系里，是直接的封建反动分子占优势。在18世纪共济会的形式在一系列国家里充满战斗的启蒙派和照耀派<sup>①</sup>的内容，他们起了革命先驱的作用，而其左翼则转为烧炭党。路易十六和发明断头台的吉约旦医生都属于共济会。在德国南部共济会具有鲜明的革命性质，而在叶卡捷琳娜的皇宫里却是贵族官吏等级的假面具。参加共济会的女皇把共济会会员诺维科夫流放到了西伯利亚。

如果说现在在有廉价成衣出售的时代，已经没有人再去穿祖父的长礼服了，那么在思想领域里长礼服和钟式裙还占据很大的地位。尽管祖母的枕头和被子散发着霉味，思想的用具总是一代一代往下

<sup>①</sup> 照耀派音译为“伊留米纳特”，是1776年在巴伐利亚成立的秘密团体，共济会的一派，由不满国王专制制度的市民和贵族反对派组成。——译注

相传的。就连那些被迫改变自己观点实质的人也常常把新观点塞进旧形式中去。我们生产技术中所发生的变革比我们思维技术中的改革大得多,后者宁愿织补和翻新而不想推倒重建。这就是为什么法国的小资产阶级的国会议员在努力以某种人与人之间的道德联系的东西去同现代关系涣散的力量相对抗时,除了系上白围裙和以圆轨或铅锤武装自己之外,找不到更好的办法。他们本人这样做的时候并不打算去建造新的大厦,而只是钻进早已建成的国会或内阁的大厦。

由于监狱里发新笔记本时,要收回写过的本子,所以我弄来一本上千页的本子专门用于对共济会的研究,用蝇头小楷从许多书上摘抄文字,并在其中插进我自己对共济会的看法和对历史的唯物主义理解。这一项工作大体上进行了一年左右。我写了某些章节,誊抄在偷送进来的本子上,传给其他牢房的难友们看。对此我们有叫做“电话”的非常复杂的系统。如果收件人的牢房离我不远,他就在一根绳上系一件重物,手握重物尽量往窗棚外伸出,并使之旋转。我则按照事先敲墙约定的办法,把一把扫帚伸出窗外,也尽可能伸得远一点,重物缠住扫帚后,我就把它拉进来,在绳端系上我的手稿。如果收件人很远,那传送就要经过一些中间站,当然,难度就更大一些了。

我在放德萨监狱的后期,由宪兵军士乌索夫签字证明的那本厚厚的笔记本里已蕴藏着丰富的历史知识和深刻的哲学思想。不知道今天能否照原样发表。我同时从不同领域、不同时代和国家中了解了太多的东西,因此我担心在自己的第一本著作中一下子要说的东西太多了。但我认为,基本思想和结论是正确的。那时我已感到自己已站稳了脚跟,并且这种感觉随着工作的进展而增强。为找到这本厚厚的本子,我现在也愿意出很大的代价。这本本子伴随着我流放,诚然,在那里我中断了对共济会的研究,转而研究马克思的经济体系。我逃到国外以后,亚历山德拉·利沃芙娜从流放地通过我父母把这本本子交给了我,他们是1903年到巴黎来看我的。在我秘密回俄国时,这本本子就和我为数不多的流亡档案一起留在日内瓦,成了《火星报》档案的一部分,这《火星报》档案成了使它夭折的坟墓。

我在第二次从西伯利亚逃往国外以后曾试图找回自己的这一著作，但毫无结果。看来，保管档案的那位瑞士女房东把它用来生炉子或派别的用场了。我不能不责备这位可敬的女人。

我在牢房里靠非常有限的图书对共济会进行研究，此事对我很有好处。在这之前我还没有看过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著作。安东尼奥·拉布里奥拉的著作是抨击性哲学小册子。读这种著作需要我所没有掌握的知识，我不得不用猜测来代替。读完拉布里奥拉的著作，我脑子里装满了一大堆假设。对共济会的研究对我来说乃是对个人假设的检验。我没有揭示什么新的东西。我得出的所有方法论结论已有人做出并用于实践了。但我是靠摸索得出这些结论的，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是独立得出的。我想，这一点对我以后的思想发展是有意义的。我在监狱中所作的那些有待检验和论证的猜测，后来我发现在马克思、恩格斯、普列汉诺夫、梅林的著作中得到了证实。我并不是以教条的形式来一下子接受历史唯物主义的。辩证法第一次在我面前出现时不是个抽象的概念，而是我在力求弄懂的历史进程本身中找到的活动的发条。

那时国内开始闹风潮了。在这里，历史辩证法也工作得好极了，而且在实践上是在非常广泛的范围内进行的。大学生运动采取了示威游行的形式。哥萨克人鞭打大学生，这引起自由派的愤怒，因为他们的子女受了欺侮。社会民主党同工人运动越来越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变得更巩固了。革命不再是知识界专有的事业。被捕的工人的数量在增加。监狱尽管很挤，呼吸却轻松一些了。第二年年底我们南俄协会案得到判决：四名主要被告流放东西伯利亚4年。我们还要在莫斯科解犯羁押监狱待上半年多，这倒是我努力进行理论研究的时机。在这里我第一次听到列宁的名字，仔细地研究了他不久前出版的一本论述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书。在这里我写了一本关于尼古拉也夫工人运动的小册子并设法送出监狱，此书不久就在日内瓦出版。夏天我们被从莫斯科解犯羁押监狱解走。接着又是一站站的监狱，直到1900年秋我们才抵达流放地。

## 第九章

# 第一次流放

我们沿着勒拿河顺流而下。水流缓缓地推动着几只载着犯人和押解队的平底船。夜里很冷，我们盖的皮大衣早晨都结上了霜。沿途每到指定的村庄就留下一两个犯人。我记得在水上航行了三个星期左右才到达乌斯季-库特村。我和一位与我关系密切，因尼古拉也夫案而被流放的女犯一起在这里登岸。亚历山德拉·利沃芙娜在南俄工人协会中位居首位。她对社会主义十分忠诚，大公无私，这使她享有无可争议的道德威望。共同的工作把我们紧密地联结在一起。为避免流放时被分开，我们在莫斯科解犯羁押监狱里结了婚。

村里约有百来家农舍。我们住在村边，周围是森林，下面是河。沿勒拿河往北有金矿，整条勒拿河都闪耀着黄金的光辉。从前在乌斯季-库特的最好时光是以疯狂的酗酒和抢劫掠夺著称的。但在我们那个时候，村子十分安静。不过酗酒依然存在，我们那家农舍的房东夫妇就经常喝得烂醉。生活愚昧，缺乏生气，与世隔绝。夜里尽是讨厌的蟑螂的沙沙声，它们爬满桌子、床铺，甚至爬到脸上。有时不得不搬出去住一两天，以便在零下30度严寒中敞开大门。夏天，小蚊蚋折磨人。它能把迷失在森林里的牛咬死。农民们把抹上焦油的马鬃做的网罩在脸上。春天和秋天，村子一片泥泞。然而，自然风光却很美。不过在那些年里我对它却无动于衷。我似乎舍不得把注意力和时间花在自然风光上。我住在森林和河流之间，却几乎没有留意过。书籍和个人的事务把我的时间都耗光了。我研读马克思主义著作，把蟑螂从书页上赶走。

勒拿河是流放犯过往必走的一条大水道。流放期满的人就在河里乘船回南方。各流放点之间的联系几乎没有中断过，它们的数量和革命浪潮同步增长。流放犯们交换发展成理论文章的信件。经伊尔库茨克省省长准许，从一个地方迁移到另一个地方比较容易。我和亚历山德拉·利沃芙娜往东迁到 250 俄里外的伊利姆河畔，那儿有一些朋友。我在此地一个百万富翁的商人那里当了短时间的办事员。他的毛皮仓库、小铺子、小酒馆遍布广大地区，其面积相当于比利时和荷兰的总和。这是一个封建巨商。他把在他辖下的几千个通古斯人称之为“我的通古斯小子”。他不会签名，只会划“十”。他整年过着齐畜鬼的生活，却在下诺夫哥罗德的集市上成千成万地挥霍。我在他那里干了一个半月，有一次我把一俄磅<sup>①</sup>铜绿写成一普特，并把这笔巨额账单寄往遥远的小铺子。我的名声扫地，被解雇了。我们又回到乌斯季-库特。这是一个严寒的冬天，温度降到 44 列氏度。马车夫戴着手套揭下马脸上的冰块。我膝盖上抱着才 10 个月的女孩。她透过套在她头上的一只毛皮筒子呼吸，每到一站我们就提心吊胆地把这个外罩从她头上揭下来看看。旅途总算顺利。但我们在乌斯季-库特没有住多久，几个月后省长准许我们稍往南迁，住在上连斯克，这里也有我们的朋友。

老民粹派是流放地的贵族，他们多年来用各种办法安顿下来了。年轻的马克思主义者则形成一支特殊力量。我在的时候，一些偶然从群众中冒出来的罢工工人已陆陆续续来到北方，他们常常是识字不多的人。对这些工人来说，流放是学习政治和文化的不可替代的学校。正像在人们被迫聚集在一起的地方常有的那样，思想分歧常因一些无谓的争吵而复杂化。一些个人的，特别是浪漫色彩的冲突常常具有戏剧性，还有人因此自杀。在上连斯克我们曾轮流看守一个基辅大学生。我在他桌上发现有一些闪闪发亮的金属碎屑。后来弄清楚了，他在用铅制作猎枪用的子弹。我们没有保护好他，他把枪口对准心脏，用脚趾扣动了扳机。我们默默地把他安葬在山冈上。那时

<sup>①</sup> 1 俄磅等于 409.5 克。——译者注

我们还羞于发表演说,好像感到有些做作。在所有大一些的流放区都有自杀者的坟墓。某些流放者已融合在周围环境里,特别是在城市。另一些人则变成酒徒。正如在监狱中一样,只有紧张的自修才能在流放地得救。需要说一下,几乎只有马克思主义者才进行理论研究。

在那些年里,在宽阔的勒拿河的水道上我认识了捷尔任斯基、乌里茨基等在后来起巨大作用的革命家。我们热切地等待着每一次新的聚会。在一个漆黑的春夜,在泛滥的勒拿河畔围坐在篝火旁,捷尔任斯基用波兰语朗读自己的诗作。他的脸和嗓音都很漂亮,但诗并不高明。这个人的生活本身就是一首最严酷的诗。

到乌斯季·库特不久,我就为伊尔库茨克的《东方评论报》撰稿。这是由一些流放的老民粹派创建的合法的外省报纸,但偶尔也落入马克思主义者之手。我从写农村通讯开始,激动地等待第一篇稿件的发表,我得到编辑部的支持,后来我转向写文学批评和政论。为了起一个笔名,我打开一本意大利语辞典,看到一个词 antidoto<sup>①</sup>,于是在很长时间里我就用安季特·奥托这个笔名发表文章。我开玩笑地对朋友们解释道,我想把马克思主义的解毒药注入合法报刊。报纸突然把我的稿酬从每行两个戈比提高到四个戈比。这是成功的最好证明。我写过评论农民、俄国古典作家、易卜生、豪普特曼<sup>②</sup>和尼采、莫泊桑和埃斯托尼耶、列昂尼德·安德烈耶夫和高尔基的文章。我夜以继日地坐着,涂涂改改,寻找需要的思想或恰当的语调。我成了一个作家。

1896年我还企图挡住革命思想,而1897年我已在从事革命工作,但还在抵挡马克思主义理论,从那时起我走了一段相当长的路程。到流放时,马克思主义已最终成为我的基本世界观和思维方法。如今,在流放中,我试图从我所学到的观点出发去解决人类生活的所谓“永恒”问题:爱情、死亡、友谊、乐观主义、悲观主义等等。在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环境里,人们的爱、恨和希望是不同的。正像树木通

① 意为解毒药。——译注

② 格哈特·豪普特曼(1862—1916年)——德国剧作家。——译注



过根须从土壤中吸收养分来供给花朵和果实一样，人也从社会的经济基础中为自己的感情和思想——哪怕是最“崇高”的——吸取养分。我那时论文学的文章实质上只涉及一个主题：个人和社会。在不久之前，这些文章合在一起出过单行本。如果让我今天来写的话，无疑会用另外一种写法，但我不会作任何实质性改动。

官方的或合法的俄国马克思主义这时经受了剧烈的危机。现在我从活生生的经验中看到，新的社会要求如何肆无忌惮地把本来用于其他目的的料子拿来替自己制作思想制服。90年代以前俄国知识分子大部分热衷于否定资本主义和把农民村社理想化的民粹主义。然而资本主义在到处敲门，它许诺知识分子未来会获得各种物质福利和发挥巨大的政治作用。知识分子中的资产阶级需要马克思主义的尖刀来割断与令人厌恶的过去联系在一起的民粹主义的脐带。因此马克思主义思想在19世纪的最后几年得到了迅速和胜利的传播。但是马克思理论刚刚完成这一任务，就已经使知识分子感到束缚了。要证明资本主义发展方法的进步性，辩证法是好的。但是在资本主义本身开始遭到革命的否定的地方，辩证法便被看成是束缚人的东西并被宣布为过时了。两个世纪交替的时期正是我坐牢和流放的时期，这时俄国知识分子经历了一个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普遍批判的时期。他们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历史辩护，同时又抛弃了对它的革命否定。无政府主义的民粹派知识分子通过这种迂回的道路变成了自由派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欧洲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不管其质量如何，如今在俄国找到了广阔的销路。爱德华·伯恩斯坦成了从社会主义转向自由主义的闻名的向导之一，就足够说明这一点了。标准哲学越来越成功地排挤唯物辩证法。正在形成中的资产阶级社会舆论需要有坚定的准则，不仅用以反对专制官僚的专横，而且也用以反对革命群众无法无天的行为。康德虽然推翻了黑格尔，但他也没有站住脚。俄国的自由主义来得晚了，并从一开始就坐在火山口上。绝对命令对它来说过于抽象而且是一种不可靠的保障。对付革命群众需要有更加厉害的行动手段。先验论的唯心主义者变成了东正教的基督徒。政治经济

学教授布尔加科夫从土地问题上修正马克思主义开始，继而转向唯心主义，最后穿上了神甫的长袍。顺便说一下，发展到穿上神甫的长袍只不过是几年以后的事。

在20世纪初年，俄国是社会思想的大实验室。我对共济会历史的研究足以使我理解思想在历史过程中所起的服务作用。“思想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我重复拉布里奥拉老人的话。现在的问题已不是纯科学的兴趣，而是选择政治道路。对马克思主义的全面修正帮我、也帮许多青年革命者，集中思想去思考并把自己的武器磨得更加锋利。我们之所以需要马克思主义，不仅是为了清算民粹主义——它对我们的影响并不大，而首先是为了在资本主义自己的领地上开展反对资本主义的不可调和的斗争。反修正的斗争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政治上锻炼了我們。我们渐渐成了无产阶级革命者。

在这个时期我们碰到了来自左面的批评。在鞑北的一个流放地里，好像在维柳伊斯克，住着一个名叫马哈伊斯基的流放者，他后来很快出了名。马哈伊斯基是从批评社会民主党内的机会主义开始的。他的第一本揭露德国社会民主党内机会主义的胶印小册子，在流放区里获得好评。第二本小册子是批评马克思的经济学体系的，并作出一个出人意料的结论，说社会主义是一种建立在职业知识分子剥削工人基础上的社会制度。第三本小册子以无政府工团主义精神否定政治斗争。在几个月的时间里，马哈伊斯基的著作成了勒拿河一带流放者注意的中心。这些著作对我来说是一种预防无政府主义的强效疫苗，无政府主义在口头上很有否定一切的气势，但其实际结论却毫无生气，甚至显得怯懦。

我第一次遇见活生生的无政府主义者是在莫斯科的解犯羁押监狱。这是一个名叫鲁津的国民教师，他性情孤僻、沉默寡言，态度生硬。在监狱里他总是喜欢同刑事犯们在一起，饶有兴趣地听他们讲谋杀和抢劫的故事。他不喜欢谈论理论。只有一次，我硬逼他回答在自治公社里将如何管理铁路时，鲁津才回答说，在无政府主义下我干吗要乘火车呢？这一回答对我来说已经足够了。鲁津试图把工人拉到他一边去，于是我们进行了一场不无敌意的暗斗。我们同路抵

达西伯利亚。春汛时鲁津决定乘小船横渡勒拿河。他喝得醉醺醺，并向我挑战。我同意和他一起去。在泛滥的河里漂浮着原木和动物的尸体，有不少漩涡。我们横渡时不免忐忑不安，但总算顺利地完成了。鲁津阴沉地给了我一个口头证明：一个好同志，或类似的说法。我们的关系缓和了。不过，不久他就被送到更北的地方去了。在那里几个月以后他用刀子扎了一个县警察局长。这个局长倒并不坏，伤势也不危险。在法庭上鲁津声称，他并不是针对局长个人的，而是要通过这个局长来回击一下国家的专横。结果他被判处服苦役。

在冰天雪地的西伯利亚流放区里，流放者在热烈讨论俄国农民的分化、英国的工联、绝对命令对阶级利益的态度、达尔文主义与马克思主义，这时候在政府内部一场意识形态的斗争正在进行。圣正教院在1901年把列夫·托尔斯泰革出了教门。所有报纸上都刊载了圣正教院的文告，宣布托尔斯泰的六大罪状：(1)“否定圣三位一体中之上帝”；(2)“否定死而复活的神人基督”；(3)“否定圣母分娩前无垢受孕，分娩时是处女”；(4)“不承认阴间生活和因果报应”；(5)“否定圣灵的天惠”；(6)“嘲弄圣餐仪式”。大胡子白头发的总主教们、他们的鼓舞者、波别多诺斯采夫以及所有其他国家栋梁，这些人都认为我们革命者不仅是罪犯，而且是极端的狂热分子，他们自己则是有全人类历史经验为依据的清醒思想的代表——就是这些人要求伟大的现实主义的艺术家用无垢受孕和通过圣饼传递的圣灵。我们读了又读托尔斯泰邪说的清单——每一次都非常惊奇地在心里对自己说：不，依据全人类经验的是我们，代表未来的是我们，而高高在上的那些人不仅是罪犯，而且是躁狂病患者。我们坚信，一定能摧毁这所疯人院。

旧的国家大厦四面八方都在摇摇欲坠。大学生在斗争中仍起着先锋作用。受急躁情绪的驱使，他们开始采取恐怖行动。卡尔波维奇和巴尔马舍夫<sup>①</sup>开枪刺杀后，所有流放者就像听到警报信号那样

<sup>①</sup> 卡尔波维奇于1901年刺杀教育大臣波高列波夫，巴尔马舍夫于1902年刺杀内政大臣。——译注

受到震动。大家对恐怖策略展开了争论。流放者的马克思主义者略经犹豫后表示反对恐怖主义。我们说，化学炸药不能代替群众。单枪匹马的人物不把工人阶级发动起来，会在英勇的斗争中丧命的。我们的事业不是刺杀沙皇的大臣，而是用革命去推翻沙皇制度。社会民主党人和社会革命党人之间的分界线就在这里。如果说监狱对我来说是理论上定形的时期，那么流放则是我政治上自我抉择的时期。

这样过了两年。在这期间，彼得堡、莫斯科和华沙的桥下流水依旧。运动开始从地下转入城市的街道。在一些省份农民开始行动起来。在西伯利亚铁路沿线建立了社会民主党组织。他们和我接上了关系，我替他们写宣言和传单，间隔三年之后，我又重新投入积极的斗争。

流放者们都不想再躺在自己的流放地，逃跑成风。不得不安排一个逃跑的先后次序。几乎在所有村子里都能遇到一些在童年时就受到老一辈革命者影响的农民。他们秘密地用小船、火车和雪橇把政治家运出去，一站一站地往下传送。西伯利亚的警察局实际上也像我们一样无能为力。幅员辽阔既是它的盟友，也是它的敌人。要抓到逃跑的流放者是很困难的。但逃跑者也有很大的可能淹死在河里或冻死在原始森林里。

革命运动广泛地传播开来，然而，它仍然是分散的。每一个地区，每一个城市都各自进行斗争。沙皇政府却占有行动统一的巨大优势。那时许多人都痛感需要建立一个集中的党。我就这个题目写了一个报告，其复制件在各流放点广为流传，还展开热烈的讨论。我们觉得我们在国内和国外的志同道合者没有很好地思考这个问题。但是他们思考了并采取了行动。1902年夏天我通过伊尔库茨克得到了几本书，硬书皮里面塞满了印在极薄的纸张上的在国外出版的最新报纸。我们得悉，国外创办了马克思主义的报纸《火星报》，其任务是建立一个由职业革命家组成的集中的组织，它有铁的行动纪律。收到一本日内瓦出版的列宁的著作《怎么办？》，全是谈这个问题的。我立即觉得，我的手抄报告、报纸文章和为西伯利亚联合会写的传单

在巨大的新任务面前显得渺小和闭塞了。需要寻找另一种活动场所。要逃跑。

这时候我们已经有两个女孩，小的才四个月。在西伯利亚条件下生活是不容易的。我的逃亡势必加重亚历山德拉·利沃芙娜的负担。但她用了一句话把这个问题挡开：“应当走”。对她来说，革命义务压倒所有其他的考虑，首先是个人的考虑。当我们认清了伟大的新任务时，她第一个提出让我逃亡的想法。她扫除了这条道路上所出现的所有疑问。在我逃亡以后的几天时间内，她成功地对警察局隐瞒了我的出走。在国外我很难得和她通信。后来她遭到第二次流放。再往后我们只是偶尔相会。生活把我们分开了，但我们的思想的联系和友谊是牢不可破的。

## 第十章

# 第一次逃亡

秋天即将来临，道路泥泞是个大威胁。为了加快我的逃跑，决定把两批出逃的人合并为一批。一个农民朋友答应领我和马克思著作的女译者E·T.一起逃出上连斯克。在夜空下的田野里，他在大车上像运货物似地用干草和蒲席盖在我们身上。与此同时，为了从警察局那里赢得两三天时间，在我的住处用被子盖上一个草人，装作病人。赶车人按西伯利亚方式，也就是说，以每小时20俄里的速度载着我们飞奔。路上坑坑洼洼，背部不知撞了多少下，身边女旅伴在克制地呻吟。路上换过两次马。在抵达铁路之前，我就和这位旅伴分手了，以免一旦出现疏忽和危险而危及另一人。我顺利地坐进了车厢，伊尔库茨克的朋友们给我带来一箱子浆过的衬衣、领带以及其他标志着文明的东西。我手里拿着一本格涅奇契译成俄文六脚韵诗的《荷马史诗》。口袋里装着一张署名托洛茨基的护照，这个名字是我随意写上的，没料到它竟成了我以后一生的名字。我沿着西伯利亚铁路西行，站上的宪兵漫不经心地把我放了过去。一些身材高大的西伯利亚妇女在沿线各站卖烤鸡和烤乳猪、瓶装牛奶、成堆的烤面包。每一个车站都像是西伯利亚丰富物产的展览会。一路上全车厢的人都边喝茶，边吃便宜的西伯利亚油炸饼。我读着六脚韵诗，想象着国外生活。在逃跑中没有发生任何带有浪漫色彩的事情，只不过是不断地喝茶而已。

我在萨马拉下车，那时候国内的（就是说不是国外的总部）《火星报》总部就在这里。其领导人是化名克莱尔的工程师，他现在是国家

计划委员会主席克尔日扎诺夫斯基。1894至1895年在彼得堡的社会民主组织的工作中和西伯利亚流放期间，他和他的妻子是列宁的朋友。1905年革命失败后不久，克莱尔与成千上万其他人一起离开了党，作为一个工程师在工业界占有显著的位置。地下工作者们抱怨说，他拒绝提供原先连自由派都曾提供过的帮助。中断了10至12年之后，克尔日扎诺夫斯基回到了党内，那时候党已取得政权。这是目前作为斯大林最重要支柱的广大知识分子阶层所走过的一条路。

在萨马拉，可以说我正式参加了《火星报》组织，用的是克莱尔给我起的化名“笔杆子”；这是对我在西伯利亚当记者时的成绩的肯定。《火星报》组织重新建立了党。1898年3月在明斯克召开的第一次代表大会，没有能建立起集中的党组织。大逮捕破坏了在各地还缺乏必要基地的年轻的机构。此后革命运动便围绕着各个分散的中心发展，带有地方色彩。与此同时，其思想水平也下降了。社会民主党人在争取群众的斗争中把政治口号推到后面。产生了所谓“经济派”，这一派别依靠的是蓬勃发展的工商业和罢工运动。19世纪末爆发了危机，它加剧了国内的对抗，推动了政治运动。《火星报》为建立一个集中的革命政党同地方“经济派”进行了坚决的斗争。《火星报》的总部在国外，它保证了组织在思想上的稳定，这种组织是由把理论和实践任务紧密联结在一起的所谓“职业”革命家组成的。那时火星派的成员大部分是知识分子。他们为争取各地社会民主党委员会和筹备能确保《火星报》的思想和方法获胜的党的代表大会而斗争。可以这样说，这是革命组织的第一张蓝图。这个组织不断发展并得到锤炼，实行进攻和退却，同工人群众建立越来越密切的联系，并向他们提出越来越广泛的任务，终于在15年之后推翻了资产阶级，夺得了政权。

受萨马拉常务局的委托，我访问了哈尔科夫、波尔塔瓦和基辅以会见一些革命者，他们有的已经加入《火星报》组织，有的还有待我们去争取。我回萨马拉时没取得什么成效；同南方的联系还没有很好地建立起来；哈尔科夫的地址已失效；在波尔塔瓦我遇到的是地方主义。呆一呆就走，什么也搞不成，需要进行艰苦的工作。列宁与萨马拉常务局有频繁的书信往返，他催我到国外去。克莱尔给我提供路费，并

对如何越过卡缅涅茨—波多利斯克附近奥地利边界给了必要的指点。

在萨马拉车站开始了一连串与其说是可悲，不如说是可笑的奇遇。为避免引起宪兵们的注意，我决定在最后一分钟上车。一个名叫索洛维约夫的大学生负责给我占位置，带着一只手提箱等我——此人现在是石油辛迪加的领导人。我在远离车站的田野里安详地散步，眼睛则看着表，突然听到第二次铃声。我发觉告诉我的发车时间不对头，就拼命跑起来。那个忠实的在车厢里等我的索洛维约夫，在车子开动后只好手拿着提箱跳到铁路上，站上的管理人员和宪兵围住了他。一个在火车开动以后飞奔而来、气喘吁吁的人（这就是我）的狼狈样子引起了大家的注意。宪兵威胁索洛维约夫要作违章记录，但后来只是把我们两人大大嘲笑一通了事。

我顺利地到达边境地区。在最后一个车站警察要我出示护照。当他表示我那伪造的证件毫无问题时，我真感到惊奇。领导非法越境的是一个中学生，如今他是一位著名化学家，领导苏维埃共和国的一个研究所。这位中学生同情社会革命党人。当他从我这里得知我属于《火星报》组织以后，态度便急转直下，换成一种严厉的指责的口吻说：“您知道吗，最近几期《火星报》上展开了反对恐怖主义的不体面的论战？”我刚准备进行原则性的争论，中学生愤怒地补充道：“我不带您越境了！”这一论据之突然使我深为震惊。然而这是完全合理的。15年以后我们不得不手执武器去推翻社会革命党人的政权。但在当时我还顾不上历史的前景。我争论说，不能为了《火星报》上的一篇文章来惩罚我，最后我声明，没有带路的人我就不走。中学生缓和下来了。“好吧，”他说，“就照您的办吧，不过您到了那儿，告诉他们，这是最后一次了！”

中学生把我安置在一个单身商品推销员的空屋里过夜，这个推销员要第二天才回来。我依稀记得，房子已被主人锁上，只好跳窗进去。夜里，突如其来的灯光把我惊醒。一个戴圆顶礼帽的小个子陌生人一手拿着蜡烛，一手拄着拐杖，正俯身打量着我。天花板上一只很大的礼帽的影子朝我移过来。“您是什么人？”我气愤地问道。“哪有这样的道理”，陌生人悲哀地回答说，“他躺在我的床上还要问我是



什么人！”很清楚，在我面前的是房子的主人。我试图向他解释，他应在第二天才回来，但毫无用处。“我自己知道什么时候回来！”他不无理由地回答。情况变得复杂起来了。“我知道，”主人一面喊，一面依旧照着我的脸，“这是亚历山大搞的把戏，我明天找他谈去！”我乐意地支持这个想法，所有误会的罪魁祸首是不在场的亚历山大。后半夜我还是在推销员那儿度过的，他甚至还宽厚地请我喝茶。

次日早晨，中学生和我的房主作了一番吵吵嚷嚷的解释，然后把我交给了布罗德村的走私者。整整一天我是在一个乌克兰人的干草棚里的干草堆里度过的，他请我吃西瓜。夜里他在雨中把我领过边界。我们在黑暗中走了很久，还常常绊倒。“嗯，现在您趴在我背上，”领路人说，“前面是水。”我不同意。“您无论如何不能湿漉漉地往那边走。”乌克兰人坚持说。我不得不趴在那人背上来完成这次旅行，但皮鞋里还是灌满了水。约一刻钟后我们在一家犹太人的农舍里把衣服烤干了，那已经是在布罗德村的奥地利一侧。在那里，人家要我相信，这个带路人故意把我领到深水中，以索取更多的钱。而乌克兰人则在分手时诚恳地教我提防犹太佬，说他们喜欢索取三倍的高价。我的钱当真很快就花光了。夜里还得走8公里的路去车站。沿着边界有一条通往公路的一两公里长的路，已被雨水冲得非常泥泞，既艰难，又危险。一位犹太老工人让我坐在一辆两轮马车上。“总有一天我的脑袋要掉在这种生意上的。”他嘟哝道。“为什么？”“士兵在吆喝，如果你不回答，他们就开枪。瞧，那就是他们的灯光，今天很走运，夜里天气很好。”夜确实非常好，秋夜黑得深不可测，劈头盖脸的雨下个不停，马蹄下的泥浆在吧嗒吧嗒作响。我们上了山坡，轮子打滑了，老头用嘶哑的压低的嗓音赶马，轮子卡住了，两轮车越来越向一边倾斜，突然翻倒。这是10月的泥水，又深又冷。我直挺挺倒在泥地上，半个身子陷了进去，并且把夹鼻眼镜也给丢了。但最可怕的是在我们跌倒的时候传来一声刺耳的尖叫，叫声就在我们身旁的什么地方，这是绝望的呼叫，求救的哀鸣，对上苍神秘的呼唤。在这漆黑的雨夜里真是不可思议，是谁发出这种神秘的呼声，如此富有表现力但又不是人类的声音？“它要把我们给毁了，我告诉您，”老

头绝望地嘟哝道，“它要把我们给毁了……”“这是什么呀？”我屏息问道。“这是只公鸡，真该死，一只公鸡，是女主人让我交给拉比宰了过安息日的……”刺耳的叫声现在是有规律地一阵阵传来。“它把我们给毁了，这里离哨所只有两百步，士兵会马上冲出来的……”“把它掐死！……”我怒不可遏地说。“掐死谁？”“公鸡！”“我到哪儿去找它？它让什么东西给压着了……”我们俩在黑暗中爬着，双手在污泥中搜索。雨从天上倾泻而下，我们在咒骂公鸡和命运。终于，老头从我的被子下解救了这只倒霉的牺牲品。感恩的公鸡立即不作声了。我们一起使劲把两轮车扶起来，继续前行。在车站上我烤了三个钟头，在火车来到之前，把全身弄干净了。

钱兑换以后发现，我的钱不够乘火车去目的地——我要去苏黎世找阿克雪利罗得。我买了一张到维也纳的票，到那儿再看着办。维也纳最使我感到惊异的是，尽管我在学校里学过德语，但谁的话我都听不懂，大多数行人也听不懂我的话。但终于使一个戴红帽子的老人明白，我要找《工人报》编辑部。我决定向奥地利社会民主党领袖维克多·阿德勒本人说明，俄国革命的利益要求我马上到苏黎世去。向导答应带我到要去的地方，我们走了一个钟头，发现报社两年前就搬到另一个地方去了。我们又走了半个钟头。门房对我们说，不接待。我无法给向导钱，肚子又饿，而主要的是我要到苏黎世去。楼上下来一个不太客气的高个子先生，我就向他打听阿德勒。“您知道今天星期几吗？”他板着脸问我。我不知道。乘火车、坐大车、在推销员家里、躲在乌克兰人的干草棚里、夜里和公鸡斗，这使我忘了日子。“今天是星期天！”高个子先生一板一眼地说，接着就想走过去。“不管怎样我要见到阿德勒。”于是我的交谈者就以在喧哗声中对全营官兵下命令的口吻回答我：“告诉您，阿德勒博士星期天是不会客的！”“但是我有重要的事情！”我固执地回答。“哪怕您的事情有十倍的重要也不行，明白吗？”这就是奥斯特利茨，<sup>①</sup>是编辑部里令人畏

<sup>①</sup> 奥斯特利茨，弗里德里希(1862-1931年)——奥地利社会民主党领袖之一，该党中央机关报《工人报》主编。——译注

惧的人物，他说起话来，就像雨果说的，总是暴跳如雷。“即使您带来消息说，听见吗？你们的沙皇被杀了，你们那里开始革命了，听见吗？您也无权打扰博士星期天的休息！”这位先生如雷的噪音给我以深刻的印象。但我觉得他还是在胡说八道。星期天的休息不可能高于革命的需要。我决定不屈服，我需要到苏黎世去，《火星报》编辑部在等着我。此外，我是从西伯利亚逃出来的，这多少也有点分量。我站在楼梯的下面，拦住这位粗暴的交谈者的去路，我终于达到了目的。奥斯特利茨告诉了我所需要的地址。那个向导陪我找到了阿德勒的住所。

出来见我的是一位个子不高，背拱得几乎像个驼背的人，他脸色疲倦，眼泡发肿。维也纳正在进行邦议会的选举，阿德勒前天在几个会议上发表演说，夜里又写文章和宣言。这是一刻钟后我从他的儿媳妇那儿听说的。

“请原谅，博士，我打扰了您星期天的休息……”

“说吧，说吧……”他说着，表面上很严厉，但语气并不吓人，而是在鼓励我。这个人的每一道皱纹都透出智慧。

“我是俄国人……”

“嗯，这您不必告诉我，我已经猜出来了。”

我向博士讲述在编辑部门口的谈话，他用眼光敏捷地打量着我。

“是这样吗？是这样对您说的？谁会这样做呢？高个子？大声嚷嚷？这是奥斯特利茨。您说，他大声嚷嚷？这是奥斯特利茨。您别太认真。如果您从俄国带来革命的消息，夜里您也可以按门铃找我……卡佳，卡佳，”他突然叫起来。他的儿媳妇走进来，她是俄国人。“现在你们谈起来就方便一些了。”他说着离开了我们。

我往后的旅程有了保证。

## 第十一章

# 第一次侨居国外

1902年秋天，我从苏黎世取道巴黎，到达伦敦，那应是10月的一个早晨。我用连说带比划的办法雇了一辆马车，按纸上所写的地址找到了预定的地点。这地方就是列宁的住处。还在苏黎世就有人告诉过我，要敲三下门环。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来给我开的门。她大概是被我的敲门声从床上叫起来的。这是凌晨，任何一个较习惯于文明的社会生活的人都会在车站上静静地坐上一两个钟头，而不会在天不亮的时候来敲人家的门，但我身上还充满了从上连斯克逃跑时的那股子劲。在苏黎世我也是以这种野蛮的方式去打扰阿克雪里罗得的，不过不是在凌晨，而是在深夜。列宁还睡在床上，他脸上露出既亲切又理所当然惊讶的表情。我和他的第一次会见和第一次谈话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进行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和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都已从克莱尔的信里知道了我的情况并在等我。所以我受到这样的迎接：“笔杆子来了。”我马上诉说了自己关于俄国的一些印象：“南方的联络工作很薄弱；哈尔科夫的秘密接头地点已失效；《南方工人报》的编辑部反对合并；偷越奥地利边界的工作掌握在一个中学生手里，而他不愿帮助火星派。这些事实本身并不给人以鼓舞，然而对未来的信心却绰绰有余。”

就在当天上午或者是第二天，我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逛了伦敦。在一座桥上他指给我看威斯敏斯特教堂，还有其他一些值得看的建筑物。我记不得他原话是怎么说的了，但语气是这样的：“这是他们著名的威斯敏斯特。”“他们”的意思当然不是指英国人，而是指

统治阶级。列宁在谈到某些文化珍品或新的成就，谈到英国博物馆丰富的藏书，谈到欧洲大报的消息，或许多年以后谈到德国的大炮或法国的飞机时总含有这种语气。他们有本领制造或者拥有这些东西，他们做出了或者取得了这种成就，但他们总归是敌人！他说的时候一点都没有加重语气，而更多地是用他的嗓音表达出来的。在列宁的眼睛里，统治阶级的看不见的阴影仿佛笼罩着整个人类文化，对他来说，这种阴影就像白昼那样实在。我那次大概对伦敦的建筑并不表现出很大的兴趣。我从上连斯克一下子越出国境，第一次到了国外，我只是走马观花地领略维也纳、巴黎和伦敦的风光，还不能顾及像威斯敏斯特这样的“细节”。而且列宁自然也不是为了观光而领我去逛街的。他的目的是借此了解我和悄悄地进行考试。而这场考试确实是“全面”的。

我讲述了我们在西伯利亚的争论，主要是关于集中制的组织问题；谈了我关于这个问题的书面报告；关于我在伊尔库茨克和一些老民粹派分子的激烈冲突，我在那里待了几个星期；关于马哈伊斯基的三本小册子，等等。列宁善于倾听。“而在理论方面情况怎么样？”我告诉他，我们在莫斯科解犯羁押监狱集体钻研了他的《资本主义在俄国发展》一书，而在流放中研究了《资本论》，不过只到第二卷。我们勤奋地根据第一手材料研究了伯恩斯坦和考茨基之间的争论。在我们中间没有伯恩斯坦的拥护者。在哲学领域里我们醉心于波格丹诺夫的书，他把马赫—阿芬那留斯的认识论与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那时，列宁也觉得波格丹诺夫的书是对的。“我不是哲学家”，他有点不安地说，“但普列汉诺夫尖锐地指责波格丹诺夫的哲学，把它看作是隐蔽的唯心主义的变种。”几年以后，列宁就马赫—阿芬那留斯的哲学写了一本巨著；他作出了和普列汉诺夫基本相同的评价。在谈话中我提到，列宁在关于俄国资本主义的书中所分析的大量统计资料给流放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可这不是一下子做出来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有些不好意思地回答。看来他对年轻的同志们对他在主要的经济著作中所付出的巨大劳动的评价感到高兴。至于我的工作，这次谈话只是最

一般地谈了一下。当时的打算是，我在国外待一段时间，看看出版的文献著作，了解周围的环境，再瞧着办。我打算，过一段时间无论如何还是要秘密地回俄国去干革命。

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把我带到几个街区后面的一幢楼房里，这里住着查苏利奇<sup>①</sup>、马尔托夫<sup>②</sup>和《火星报》印刷厂的厂长布柳緬费尔德。在这里为我找到一个房间。这幢住宅是按照英国的一般方法安排的，房间分上下格局，而不是安排在同一层楼上；女主人住在底层的房间，房客们住在楼上几层。还有一个公用房间，大家在那里喝咖啡、抽烟和进行无休止的谈话，房间里乱七八糟，这是查苏利奇搞的，但马尔托夫也有份。普列汉诺夫第一次来访后，就把这个房间叫做狗窝。

我生活中短暂的伦敦时期就这样开始了。我开始如饥似渴地阅读已出版的各期《火星报》和由《火星报》编辑出版的《曙光》杂志。这些刊物办得非常出色，把深刻的科学性同革命热情结合了起来。我爱上了《火星报》，为自己的无知而感到惭愧，因此竭尽全力想尽快消除这一缺点。不久我开始为《火星报》撰稿，起初写了一些短文，后来写起政论性文章，甚至社论。

也是那时候，我在白教堂做了一个报告，在那里我和俄侨的元老柴可夫斯基<sup>③</sup>还有一个已不年轻的无政府主义者切尔克佐夫进行了交锋。这两位可敬的长者用来攻击马克思主义的论据竟如此幼稚，真使我感到惊讶。记得回家时我洋洋得意，连脚下的人行道都感觉不到了。为我和白教堂以至整个外部世界联系的是一位伦敦的老住户阿列克谢耶夫，他是俄侨，马克思主义者，接近《火星报》编辑部。他向我介绍英国的生活，向我提供各种各样的知识。阿列克谢耶夫

① 维·伊·查苏利奇(1849-1919年) 俄国女革命活动家，早年是民粹派分子。1883年是劳动解放社的组织者之一，1903年起为孟什维克。 译注

② 尔·马尔托夫(1873-1923年) 俄国革命家，孟什维克领袖之一。1895年曾参与创建和领导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 译注

③ 柴可夫斯基，尼·瓦(1851-1926年) 俄国革命民粹派分子，后为社会革命党人，人民社会党人。十月革命后是一些反革命政府组织的领袖和成员。 译注

对列宁极为尊敬，他对我说：“我认为，对于革命来说，列宁比普列汉诺夫更重要。”我当然没有把这话告诉列宁，但我对马尔托尔说了，他什么也没有回答。

有一个星期天我随同列宁和克鲁普斯卡娅一起到伦敦的一所教堂去，在那里社会民主党的群众集会与唱赞美诗交替进行。讲演者是一个从奥地利回来的排字工人。他讲了社会主义革命。然后大家站起来唱道：“万能的上帝，你让世上既没有国王，也没有富人吧。”我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也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当我们走出教堂时，列宁就此发表看法说：“在英国的无产阶级中有许多革命性和社会主义的因素，但所有这一切都是和保守主义、宗教以及偏见结合在一起的，而且怎么也冲不出去并普及开来。”

从社会民主党的教堂回来后，我们在寓所（两间一套）的小厨房兼餐室里吃中饭。和往常一样，他们笑我一个人回不了家；我不善认路，由于喜欢系统化，我把这一毛病称之为“地形呆小病”。后来我在认路方面有所长进，然而那是来之不易的。

我在敖德萨监狱里学得的一点点英语在伦敦期间几乎没有提高。我太关注于俄国事务了。英国的马克思主义没什么意思。那时社会民主党的思想中心在德国，我们密切注视着正统派与修正派之间的斗争。

在伦敦以及后来在日内瓦，我和查苏利奇及马尔托夫见面的机会比和列宁见面的机会多。在伦敦，我和马尔托夫、查苏利奇住在同一个寓所里，而在日内瓦，通常同在一家小餐馆里吃中饭和晚饭，我们一天要见几次面，而列宁是有妻室的，因此除了专门的会议外，每次和他见面就是小小的事件了。马尔托夫喜欢过浪漫而又无规律的生活，这种生活方式是和列宁完全格格不入的。他知道，时间尽管有其相对性，却是一种绝对的财富。列宁把大量时间花在英国博物馆的图书馆里，他在这里从事理论研究，通常也在这里为报纸写文章。在他的协助下，我也得以进入这座殿堂。我有一种吃不饱的饥饿感，我在大量的书籍里狼吞虎咽。但不久我不得不前往欧洲大陆。

我在白教堂作了几次“试验性”的演讲之后，就带了一份报告稿

被派往布鲁塞尔、列日、巴黎。我的报告内容是捍卫历史唯物主义，反击所谓俄国主观学派的批评。列宁对我这个题目很感兴趣。我给他看了我的详细提纲，他建议把报告稿加工整理成一篇文章，供最近一期《曙光》杂志用。但是我没有勇气和普列汉诺夫等人的纯理论文章排在一起发表。

不久，一份电报把我从巴黎召回伦敦。打算派我秘密回俄国，因为国内诉说遭到失败，人手不够，要求我回去。但我还没回到伦敦，计划已经变了。那时住在伦敦的捷依奇<sup>①</sup>对我很好，他告诉我，是他“袒护”了我，他证明说，“年轻人”（他对我不用别的称呼）需要在国外住一段时间学点东西，列宁也同意这个意见。能在俄国的《火星报》组织里工作，是很诱人的，但是我更乐意再在国外留一段时间。我回到了巴黎，那里与伦敦不同，有许多侨居的俄国大学生。各革命政党为了影响大学生而彼此展开激烈的斗争。下面是娜·伊·谢多娃<sup>②</sup>那时的回忆片断。

“1902年秋，巴黎俄国侨民区的报告会很多。我所属的《火星报》小组先是见到马尔托夫，后来又见到列宁。同‘经济派’和社会革命党人进行了斗争。我们的小组里谈论着有一个年轻同志要来，他是从流放地逃出来的。他来到前民粹派分子、现在已加入《火星报》的叶·米·亚历山德罗娃的住所。我们年轻人都很喜欢叶卡捷琳娜·米哈伊洛夫娜，饶有兴趣地听她讲这讲那，并接受她的影响。当《火星报》的那位年轻工作人员来到巴黎时，叶卡捷琳娜·米哈伊洛夫娜委托我打听一下附近有没有空房子。我住的那座楼里有一间空房，每月租金12个法郎，但房间狭小阴暗，像个囚室。当我这样形容时，叶卡捷琳娜·米哈伊洛夫娜打断我：‘好了，好了，用不着描绘了，房间不错，就让他住进去吧。’这个年轻人（没有告诉我们他姓什么）在这个房间安顿下来以后，叶卡捷琳娜·米哈伊洛夫娜问我：‘怎么

① 列·格·捷依奇(1855-1941年) 俄国革命家、劳动解放社成员，后为孟什维克。十月革命后脱离政治活动，从事出版普列汉诺夫遗著等工作。——译注

② 娜·伊·谢多娃，侨居巴黎的俄国大学生，后成为托洛茨基的第二个妻子。——译注



样，他在准备自己的报告吗？”“不知道，想必是在准备吧，”我回答说，“昨天晚上我上楼时听见他在房间里吹口哨。”“请告诉他，叫他别吹口哨，而要好好准备。”叶卡捷琳娜·米哈伊洛夫娜很希望“他”讲演成功。但是她的担心是多余的，讲演非常成功，侨民们欣喜异常，年轻的火星派分子超出了人们的期待。”

我对巴黎的了解要比伦敦仔细得多。在这方面是受了娜·依·谢多娃的影响。我生长在农村，但接近大自然却在巴黎。在这里我面对面地看到了真正的艺术。我理解绘画就像理解大自然一样，是很费劲的。谢多娃在后来的札记中写道：“他对巴黎的总的印象是：‘很像放德萨，但放德萨更好一些。’这个荒唐的结论说明他完全投身于政治生活，而别的事情只有在它们强迫他去注意时，他才把它们当作摆脱不了某种令人讨厌的东西去接受。我不同意他对巴黎的评价，还要嘲笑他几句。”

是的，事情正是这样。我是以一种固执的、对抗的态度进入世界中心这种环境的。开头我“否定”巴黎，甚至企图不予理会。实际上这是野蛮人自我保护的斗争。我感觉到，为了接近巴黎并真正理解它，需要耗费我太多的精力。而我有自己的领域，非常苛刻的、不允许进行竞争的领域，这就是革命。我是逐步地、很吃力地去熟悉艺术的。我以一种抗拒的态度去对待卢浮宫、卢森堡宫和各种展览。我觉得鲁本斯太肥胖和自满自足；普维斯·戴·夏万又太晦暗和清心寡欲；卡里列的肖像画面色调昏暗，言不尽意而令人不快。对雕刻和建筑艺术也是这样。实质上，我抗拒艺术是和当年抗拒革命，后来抗拒马克思主义，在好几年里抗拒列宁和他的方法一样的。1905年革命很快中断了我对欧洲及其文化的了解过程。只是在第二次侨居国外时我才接近艺术——欣赏，阅读，还写点东西。然而始终没有超过初步涉猎的阶段。

在巴黎我听过饶勒斯<sup>①</sup>的演说，这是瓦尔德克—卢梭时期，此时

① 饶勒斯，让·（1859—1914年）——法国社会党领袖之一，历史学家，哲学家。——译注

米勒兰<sup>①</sup>任邮政部长、加利费任军事部长。我参加过盖得派组织的街头示威游行,和其他人一起起劲地高喊针对米勒兰的各种难听的口号。饶勒斯在这段时期没有给我留下应有的印象,我过于凭直觉感到他是敌人。只是几年以后我才器重这位杰出的人物,但一点也没有缓和自己对饶勒斯主义的态度。

应大学生中马克思主义派的坚决要求,列宁要在高等学校里讲三次关于土地问题的课,这所学校是由从俄国各大学里被驱逐出国的一些教授组织的。自由派教授们要求这位令人不快的讲师尽可能不要陷入争论之中。但列宁根本不受约束,而且在第一堂课里一开头就说,马克思主义是革命的理论,因此就其实质而言是争论性的。我记得,在上第一堂课之前,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非常激动。但是一上讲台就控制住了自己,至少外表上是如此。来听他报告的加姆巴罗夫教授这样向捷依奇表述了自己的印象:“一位真正的教授!”显然,他认为这是最高的赞誉。

我们决定请列宁看一场歌剧。这事委托谢多娃去安排。列宁挟着他去上课时用的那只公文包来到歌剧院。我们一群人坐在价格便宜的楼座。除了列宁、谢多娃和我,似乎还有马尔托夫。这次看歌剧留下的完全不是音乐方面的回忆。列宁在巴黎买了一双皮鞋,他觉得小了点。正好我的鞋也亟需更换。我就穿了列宁的那双皮鞋。最初我觉得正合脚,去剧院的路上走得也挺好。可是在剧院里我已经感到事情不妙。归途上我受够了罪,而列宁却一路上毫不留情地开我的玩笑,因为他穿这双鞋已受了几个钟头的罪。

我从巴黎出发完成了到布鲁塞尔、列日、瑞士和几个德国城市向俄国大学生作报告的任务。在海德堡我听了库诺·费舍<sup>②</sup>老人的报告,但我没有被康德主义所诱惑。我对标准哲学本能地感到格格不

① 米勒兰,亚·艾·(1852—1943年)·法国政治活动家、律师。曾领导法国社会主义运动中的机会主义派。1899年入阁,历任政府部长、总理(1920年)和法兰西共和国总统(1920—1924年)。——译注

② 费舍,库(1824—1907年)·德国哲学史学家,黑格尔主义者,教授。——译注

人。如果附近是鲜嫩多汁的青草，那怎么会去选择没味的干草呢？……海德堡素有俄国唯心主义大学生的窝巢之称。他们中间有阿夫克森齐耶夫<sup>①</sup>——未来的克伦斯基手下的内政部长。我在那里在为捍卫唯物辩证法的斗争中曾折断过不止一把刀剑。

---

<sup>①</sup> 阿夫克森齐耶夫，尼·德（1873—1943年）——俄国社会革命党领袖，1917年任临时政府内务部长，1918年任乌法督政府主席，后流亡国外。——译注

## 第十二章

# 党的代表大会和分裂

列宁出国时 30 岁，已经完全成熟。在俄国，大学生的圈子里，在一些最早的社会民主主义小组里，在流放地，他都居于首要地位。他不会不感觉到自己的力量，因为他所能接触到的人和与他一起工作的人都承认他的力量。他出国时已经具备渊博的理论知识和丰富的革命经验。在国外，等待着的是与“劳动解放社”合作共事，首先是与普列汉诺夫共事，这是一位马克思主义的杰出阐释者，几代人的导师，他以理论家、政治家、政论家、演说家闻名欧洲，并同欧洲有广泛的联系。和普列汉诺夫齐名的还有两位大权威：查苏利奇和阿克雪里罗得。把维拉·伊万诺芙娜推向前列的，不仅仅是她的英雄的历史。她是一位受过广泛教育，特别是历史教育，具有罕见的心理直觉力的极富才智的人。当时劳动解放社通过查苏利奇与恩格斯老人保持联系。普列汉诺夫及查苏利奇和罗曼语系的社会主义者有极为密切的联系，阿克雪里罗得和他们不同，在劳动解放社里代表了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思想和经验。不过，在那些年代普列汉诺夫已经开始进入衰落时期。革命临近了，这使他衰退，却赋予列宁以力量。普列汉诺夫是整个活动具有思想准备的性质。他是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家和辩论家，但不是无产阶级的革命政治家。革命越是临近，普列汉诺夫就越是失去立足点。他本人不会不感觉到这一点，这也是他对青年一代容易发火的原因。

列宁是《火星报》的政治领导人。马尔托夫是报纸的主要政论力量。他写起文章来轻松自如，滔滔不绝，就像他说话那样。那时马尔

托夫对他的肩并肩的亲密战友列宁已经感到不快，他们还是用“你”相称，但在关系方面已明显地流露出冷淡。马尔托夫更关心的是当前，是当前大家所关注的事情，是手头的文字工作、政论、消息和谈话。列宁则立足于当前，同时又把思想伸展到明天去。马尔托夫有无数的、常常是机智的猜测、假设、建议，但他常常很快又把这些东西给忘了；而列宁则是取他所需要的东西，并在他需要时去取。马尔托夫的思想精致脆弱，使列宁不止一次不安地摇头。当时不仅尚未明确形成不同的政治路线，而且这种路线尚未显露出来。后来，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分裂时，火星派分化为“强硬派”和“温和派”。众所周知，这一称呼在最初时期很流行。它证明，如果说还没有明确的分界线，那么在立场态度上，在坚定性上，在进行到底的准备上已经有了分歧。关于列宁和马尔托夫，可以说，在分裂之前，在代表大会之前，列宁是“强硬派”，而马尔托夫是“温和派”。他俩也都知道这一点。列宁很器重马尔托夫，但经常用批评的、略带怀疑的目光看他，而马尔托夫觉察到这种目光，感到苦恼，常常神经质地耸耸瘦削的肩膀。他们见面谈话时，已经没有任何友好的语调，也不开玩笑，至少我看到的是这样。列宁说话时并不正视马尔托夫，而马尔托夫的眼睛则在奔拉下来的、永远不擦拭的夹鼻眼镜后面显得呆板而无表情。当列宁和我谈到马尔托夫时，在他的口气中有一种特别的意味：“怎么，是尤里说的？”在说尤里的名字时有一种特殊的音调，稍稍有点加强，好像在警告：“人是不错，甚至非常好，就是太软弱。”无疑，维拉·伊万诺芙娜·查苏利奇对马尔托夫也有影响，她不是在政治上，而是在心理上使他脱离列宁。

列宁把同俄国的联系集中在自己的手里。编辑部的秘书是他的妻子，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克鲁普斯卡娅。她处在整个组织工作的中心，接待来的同志，给要离开的同志以指示并作出安排，建立联系，给秘密接头地点写信、编制密码和译解密码。在她的房间里几乎总是可以闻到纸张烤焦的气味，那是把密写信件加热显影的缘故。她常常用温和执着的语气抱怨人们写得太多，或者把密码搞乱了，或者把化学墨水写重叠了，等等。

列宁力图在日常政治组织工作中保持最大限度的独立性，避开那些老头子，首先是普列汉诺夫，列宁和他在各种问题上，特别在制定党纲草案上，曾发生过尖锐的冲突。列宁起草的与普列汉诺夫的草案相对独立的最初的草案，遭到后者的尖锐批评，而且使用了格奥尔基·瓦连京诺维奇在这种场合所惯用的高傲讥讽的语调。然而，这当然不会使列宁垂头丧气，也不会吓倒他。斗争很有戏剧性。查苏利奇和马尔托夫扮演中间人的角色，查苏利奇代表普列汉诺夫，马尔托夫代表列宁。两位中间人态度非常和气，此外，他们之间也很友好。维拉·伊万诺芙娜，据她自己说，对列宁说：“若尔日（普列汉诺夫）是一条灵猯<sup>①</sup>，撕咬一阵就放下了，而您是一条虎头狗<sup>②</sup>，死咬住不放。”维拉·伊万诺芙娜在告诉我这一段对话后补充说：“他（列宁）对此很喜欢，‘死咬住不放？’他满意地再问一次。”接着，维拉·伊万诺芙娜和善地模仿列宁的声调和咬不准的“P”或“П”的发音。

所有这些尖锐的交锋是在我到国外之前发生的。这是我没有料想到的，也不知道编辑部在处理我的问题上矛盾更为尖锐。在我来到国外四个月之后，列宁写信给普列汉诺夫：

“1903年3月2日（巴黎）。我向全体编辑部成员提议增补‘笔杆子’为编辑部的享有一切平等权利的成员（我认为，对增补来说，需要的不是多数，而是全体一致的决定。）我们非常需要第七名成员，既是为了表决的方便（6是偶数），也是为了充实力量。‘笔杆子’为每一号报纸写稿已不止一个月了。总的说来，他正干劲十足地为《火星报》工作，作报告（而且取得很大成绩），等等。就时事问题的评述专栏来说，他不但对我们十分有用，而且简直是不可缺少的。毫无疑问，他是一个才华出众的人，一个有信念、有干劲的人，这个人是有发展前途的。在翻译和写通俗读物方面，他能做不少工作。

“可能提出的反对理由是：（1）年轻；（2）最近（可能）就要回俄国去；（3）文笔（没有引号的）带有杂文腔，而且过于花哨，等等。关于

① 一种跑得特别快的猎犬。——译注

② 一种猛犬。——译注

(1)我们不打算把‘笔杆子’安排在独立的工作岗位上,而是安排在编委会内。在编委会中他也会成为有经验的人。党内的人、派别内的人所具有的嗅觉;他毫无疑问是有的,而知识和经验则是可以获得的東西。他将努力钻研和工作,这也是毫无疑问的。为了把他完全争取过来并鼓励他,增补是必要的。

“关于(2),如果‘笔杆子’熟悉了所有的工作,那么他也可能不会很快就走。如果他走了,那么,他同编委会在组织上的联系和对编委会的从属关系,并没有什么坏处,而是有很大的好处。

“关于(3),文体上的缺点不是大毛病。他会改进的。目前他正在默不作声地(和并不非常乐意地)接受‘矫正’。在编委会中将展开争论,进行表决,‘所作的指示’将更为明确,更具有约束力。

“因此,我提议:(1)全体6名编辑部成员对于把‘笔杆子’完全增补进来的问题进行表决;(2)如果他吸收进来,那下一步就要最后确定编辑部内部关系和表决程序,并制定明确的规章。这对我们是必要的,对代表大会来说也是重要的。

“附言:我认为把增补的事搁下来是非常不妥当和不合适的,因为就我所知‘笔杆子’对他一直‘悬在空中’,大家总是把他当‘小青年’看待(他感觉到是这样),早就非常不满了(当然没有直接表露出来)。如果我们不马上吸收‘笔杆子’,而他就要,比如说,一个月后回俄国去的话,那么我确信,他会把这一点理解为我们显然不愿意吸收他到编辑部来。我们就可能‘失手放走’,而这将是非常糟糕的。”<sup>①</sup>

这封信我自己也是在不久前才看到的,这里几乎全文引用了(删掉一些技术上的细节),因为它非常能说明编辑部内部的情况、列宁的情况以及他对我的态度。在我背后所进行的在我参加编辑部问题上的斗争,正像我已经说过的,我一无所知。列宁说我似乎对没有参加编辑部而“非常不满”,这是不确实的,一点也不符合我那时的心情。实际上这种想法我一点也没有。我对编辑部的态度就像学生对老师的态度。那时我23岁。编辑部最年轻的编委马尔托夫比我大

<sup>①</sup> 参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4卷第333—335页。——译注

7岁。列宁比我大10岁。命运使我与这一群杰出的人物如此接近，我感到高度的满足。从他们中的每一个人身上我都能学到很多东西并正在努力地学。

列宁根据什么说我不满呢？我想，这不过是策略手段而已。列宁的整封信都是在竭力证明和说服，以达到自己的目的。他有意以我可能会产生的不满和我可能离开《火星报》来吓唬其他编委。这是他的一条补充论据，如此而已。关于“小青年”的论点，也属此类性质。捷依奇老人常用这个称呼叫我，而且只有他一人如此。但是捷依奇在政治上对我没有，也不可能有任何影响，而我和他的关系恰恰是非常友好的。列宁用“小青年”这个论据只不过是提醒那些老人必须把我看作政治上成熟的人。

在列宁的信发出10天以后，马尔托夫写信给阿克雪里罗得：“1903年3月10日于伦敦。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建议我们把把我们熟悉的‘笔杆子’吸收进编辑委员会，享有全权。他的写作工作表现出无可怀疑的才能，就倾向而言他完全是‘自己人’，完全献身于《火星报》的利益，由于出色的口才已经在这里（国外）产生很大影响。他演说非常出色，再好也没有了。无论是我还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都确信这一点。他有学问而且还在勤奋学习。我完全赞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建议。”在这封信里马尔托夫只是列宁的忠实回声。但他没有重复关于我不满的理由。我和马尔托夫住在一幢住宅里，紧挨着，他可以就近观察我，并没有发现我急不可待地想成为编辑部的成员。

为什么列宁如此坚持我必须参加编辑部呢？他想取得稳固的多数。编辑部在一系列重要问题上都分成对等的两派：老人们（普列汉诺夫、查苏利奇、阿克雪里罗得）和年轻人（列宁、马尔托夫、波特列索夫）。列宁毫不怀疑，在许多十分尖锐的问题上我将和他站在一起。有一次，当需要反对普列汉诺夫时，列宁把我叫到一边，调皮地说：“让马尔托夫发言好一些，他会抹稀泥，而您只会大砍大杀。”显然，他发现我脸上露出某种惊奇的神色，便补充道：“我倒是喜欢大砍大杀的，不过这一次对付普列汉诺夫还是抹稀泥为好。”



列宁关于让我进编辑部的建议由于普列汉诺夫的反对并没有实现。更糟的是，这一建议成了普列汉诺夫对我极不友好的主要原因，他猜测列宁在寻找坚实的多数来反对他。编辑部的改组问题被推迟到代表大会上去解决。然而，没有等到代表大会的召开，编辑部便决定吸收我参加编辑部的会议，有发言权。普列汉诺夫表示坚决反对。但维拉·伊万诺芙娜对他说：“可我要把他带来。”她当真把我“带来”参加下一次会议。我不知道事情的内幕，而当格奥尔基·瓦连京诺维奇以一种温文尔雅的冷淡（在这方面他是能手）和我打招呼时，我真不知所措。普列汉诺夫对我的不友善态度持续很久，实际上从来没有消失过。1904年4月马尔托夫在给阿克雪里罗得的信中谈到关于“对这个人（问题涉及到我）的私人的、降低他（普列汉诺夫）的身份的不高尚的憎恨。”

列宁的信中提到的我那时的文风是很有意思的。它在两个方面是正确的：一是大家知道的过于修饰的文风，二是我很不愿意接受别人的修改。那时我大约干了两年的文字工作，文风问题在我的工作中占有很大的和独立的地位。我刚刚开始品尝语汇的滋味。就像刚长牙的孩子感到需要对牙床摩擦，甚至把不太适宜的东西也放进嘴里啃那样，在我长出写作的牙齿的时期，我也独立自主地寻求词汇、习语和比喻。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的文风才得到洗炼。为形式而进行的斗争既不是偶然的，也不是表面的，而是符合我内心的、精神的进程的，所以毫不奇怪，尽管我很尊重编辑部，但却本能地保持自己正在形成的写作个性，防止那些完全成熟，但风格迥异的作家的干预……

那时，预定召开代表大会的日期临近了。同时，编辑部又最终决定迁往瑞士，迁往日内瓦，因为那儿生活费用比较低，与俄国的联系也容易一些。对此，列宁很不乐意地同意了。谢多娃写道：“我们在日内瓦安顿在两个顶楼式的小房间里，列·达·<sup>①</sup>为筹备代表大会忙得不可开交。我则准备去俄国从事党的工作。”代表大会的首批代

<sup>①</sup> 托洛茨基的简称。——译注

表到达了，接着便和他们不断地开会。筹备工作的领导无疑属于列宁，尽管并不总是那么明显。部分代表是带着怀疑或自己的要求来的。准备工作花去了大量时间。在一次次的会议上党章占重要地位，其中在组织方案中重要的一条是中央机关报（《火星报》）同在俄国活动的中央委员会的相互关系。我是带着编辑部应当“服从”中央委员会的思想到国外来的，这也是大多数俄国火星派分子的看法。

“那不行，”列宁反对我的意见，“力量的对比不是那样。他们怎样从俄国来领导我们呢？不行……我们是一个稳定的中心，我们在思想上比他们强，我们要从这儿领导。”

“结果不成了完全是编辑部专政了吗？”我问。

“那有什么不好？”列宁反驳道，“在目前情况下应当如此。”

我有点不同意列宁的组织计划。但我万万没有想到，党代表大会在这些问题上爆炸了。

※ ※ ※

我得到了西伯利亚联合会的委任状，我在流放期间与该联合会有密切联系。我是和图拉的代表乌里扬诺夫医生，也就是列宁的弟弟，一起去参加代表大会的。为了不让“尾巴”跟踪，我们不是从日内瓦，而是从下一个僻静的小站尼昂出发的，快车在那里只停半分钟。我们装作老实的俄国外省人，不在上车的月台上等车，而当特别快车开到时，我们爬过缓冲器直奔车厢。但是我们还没进车厢，火车便启动了。站长看到缓冲器之间有两个乘客，便吹响警哨。列车停下了。我们一进入车厢，列车员就要我们明白，他一生中第一次见到这种头脑不清的人，因停车要罚我们 50 法郎。我们则要他明白，我们一句法语也不懂。实际上不完全是这样，但这一招很有用：这个胖胖的瑞士人又向我们嚷嚷了三分钟，就不再打扰我们了。他这样做也是明智的，因为我们没有 50 法郎。后来在查票时，他才又对别的旅客发表自己对这两个不得不从缓冲器上爬下来的先生的侮辱性的看法。这两位不幸的列车员并不知道，我们是坐车去建党的。

代表大会在布鲁塞尔工人合作社所在地的人民之家开幕。供我们开会的一个仓库极为隐蔽，里面堆放着一包包羊毛，因此我们遭到

无数跳蚤的攻击。我们把它们称之为被动员来向资产阶级社会进攻的安舍尔<sup>①</sup>的大军。会议实在是一种肉体的折磨。更坏的是，代表们在最初几天就发现后面有人紧紧地跟踪。我是用素不相识的保加利亚人萨莫科甫利耶夫的护照住下来的。第二个星期的一个深夜，我和查苏利奇从一家名叫“金雉”的小饭馆出来，碰上敖德萨代表3。他眼不看我们，悄声说道：“你们后面有密探，分开走，密探将盯住男人。”3在对付密探方面是个大专家，在这方面，他的眼睛就像天文仪器。他住在“金雉”近旁的一座楼上，把自己的窗户当作瞭望哨。我立即和查苏利奇告别，直往前走。我口袋里是一张保加利亚护照和5个法郎。密探是一个瘦高个，扁平鼻子的佛拉芒人，他跟在我后面。已经是半夜了，街上空空荡荡。我突然转过身来问道：“先生，这是什么路？”佛拉芒人弄得不知所措，背靠在墙上。“我不知道。”他无疑在等着开枪。我继续往前走，沿着林荫道一直往前走。什么地方时钟敲了一下。我遇到第一条横向的胡同，便转弯走进去并全力奔跑。佛拉芒人跟在我后面。于是深夜里两个不相识的人一个跟着一个在布鲁塞尔的街道上奔跑。就是现在我还记得他的脚步声。我绕着街区跑了一圈，重新把佛拉芒人引到林荫道上。我们两人都感到又累又恼火，阴郁地继续往前走。街上停着两三辆马车。雇一辆车是无济于事的，因为密探会雇另一辆车。我们继续往前走，没有尽头似的林荫大道似乎已经走完了，我们已走出市区。在一家不大的夜间小餐馆旁停着一辆马车，我跑几步跳上了车。

“走吧，我有要事！”“您上哪儿？”密探留神地听着。我说了一个公园的名字，那里步行到我家只要5分钟。“100苏！”“去吧！”马车夫紧拉缰绳。密探冲进小餐馆，接着又和一个侍从走出来并把自己的敌人指给他看。半小时以后我已经在自己的房间里了。我点起蜡烛，发现床边的小桌上有一封写着我保加利亚姓名的信。有谁会给我向这里写信呢？原来是请萨莫科甫利耶夫先生于明天早晨10点钟带着护照到警察局去。就是说，另一个密探在前一天已经盯过我

<sup>①</sup> 安舍尔，比利时社会党领袖之一，以从事合作社运动著称。——译注

了，因此这林荫道上的整夜追逐，对两个参加者来说都是毫无好处的练习。这天夜里其他代表也收到这样的邀请信。那些到警察局去过的人都得到一张在24小时内离开比利时的书面命令。我没有到警察局去，而是直接去伦敦，代表大会已改在那儿开了。

那时柏林主管俄国密探的加尔京格向警察厅报告说：“布鲁塞尔警察局对大量外国人的到来感到惊奇，并且怀疑他们10个人是搞无政府主义阴谋的。”而加尔京格本人也使布鲁塞尔警察局感到惊奇，其实他的真名叫海克尔曼，是一个被法国法院缺席判处苦役的搞恐怖活动的奸细，后来成为沙皇保安局的将军，并以假冒的名字成为法国荣誉军团勋章的获得者。而加尔京格则是从奸细口托米尔斯基医生那儿得到消息的，这个口托米尔斯基从柏林赶来积极参加了代表大会的组织工作。但这一切只是在几年之后才被揭露。看来，所有的线索都掌握在沙皇政府手中，然而，无济于事……

代表大会期间，《火星报》的主要干部之间的矛盾暴露出来了。开始看出“强硬派”和“温和派”了。分歧最初集中在党章第一条上：谁可以成为党员？列宁坚持主张把党和秘密组织等同起来。马尔托夫希望那些在秘密组织领导下工作的人都可成为党员。这一矛盾没有直接的实际意义，因为两种方案都只授予秘密组织的成员以表决权。然而存在两种不同的倾向是毫无疑问的。列宁想建立一种定形和清楚明确的党内关系。马尔托夫则倾向于建立一种比较松散的组织。在这个问题上结成的派别决定了往后代表大会的整个进程，包括党的领导机构的组成。在幕后进行着争取每一个代表的斗争。列宁不遗余力地设法让我站到他那一边去。他和克拉西科夫一起同我进行了一次长时间的散步，在散步时他俩竭力要说服我，说我和马尔托夫走的不是同一条路，因为马尔托夫是“温和派”。克拉西科夫对《火星报》编辑部的成员们作了很不礼貌的评论，这使列宁皱起了眉头，而我感到震动。在我对编辑部的态度上还有许多青年人易动感情的地方。这次谈话不但没有把我拉过去，反而把我推开了。分歧还不很清晰，大家都在步履艰难地试探着，引用的都是些无足轻重的因素。于是决定召开一次火星派骨干分子会议来加以澄清。但是在

推选会议主席时就已经产生了困难。“建议推选你们的便雅悯<sup>①</sup>。”捷依奇说，他在寻找一条出路。这样，我就不得不开主持这次火星派的会议，就在这次会议上，决定了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之间未来的分裂。大家的神经紧张到了极点。列宁呼地一声把门关上，离会而去。这是唯一的一次我亲眼目睹他在尖锐的党内斗争中失去了自制力。局势更为尖锐化了。分歧在代表大会上公开化了。列宁为争取我到“强硬派”一边去，又作了一次努力，他派女代表3和自己的弟弟德米特里来找我。他们和我在公园里谈了几个小时。两位使者怎么也不想放过我，“我们有命令，无论如何要把您争取过来。”最后我断然拒绝跟他们走。

分裂的爆发对代表大会的所有参加者来说都非常突然。列宁这位在斗争中最为积极的人物没有预见到分裂，也不希望分裂。双方对爆发的事件都感到极为沉重。列宁在代表大会之后因神经紧张病了几个星期。谢多娃在札记中说：“列·达·几乎每天从伦敦写信来，这些信越来越令人不安，终于在一封谈到《火星报》分裂的信里，绝望地告诉我说，《火星报》不再存在了，它死了……《火星报》的分裂使我们极为痛苦。列·达·从代表大会上回来后不久我就带着代表大会的材料赴彼得堡了，这些文件用极小的字写在很薄的纸上，夹在拉鲁斯法文辞典的硬封面里。”

为什么我在代表大会上要站在“温和派”一边呢？在编辑部的成员中我与马尔托夫、查苏利奇和阿克雪里罗得最为接近。他们对我的影响是毫无疑问的。代表大会前在编辑部里已经有细微差异，但分歧还没有定形。我对普列汉诺夫是敬而远之，经过最初的、实际上是次要的冲突之后，普列汉诺夫就非常不喜欢我了。列宁对我的态度非常之好，但在我看来，如今正是他在危害编辑部，而对我来说，编辑部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并且必须用《火星报》这个迷人的名字来称呼它。关于编辑部分裂的想法我觉得简直是一种亵渎。

革命的集中制是一条严厉的、需绝对服从和要求很高的原则。

① 便雅悯是《圣经》中犹太族长雅各最小的儿子。 译注

它对个别的人和昨天的志同道合者的集团常常采取残酷无情的态度。在列宁的语汇里频繁地出现不可调和的和无情的这些词不是没有道理的。只有摆脱了一切卑俗的个人考虑的高度革命目的性，才能证明这种个人的残酷无情是正确的。1903年事情仅仅在于把阿克雪里罗得和查苏利奇排除出《火星报》编辑部。我对他俩不仅怀有敬意，而且还有个人的感情。列宁也高度赞扬他们的过去。但他得出结论，认为他们越来越成为通向未来路上的障碍，因而他作出组织上的结论：把他们从领导岗位上撤下来。对此我无法容忍。我整个身心都反对把这些终于走到党的门槛旁的老人无情地驱除出去。我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同列宁决裂就是出于这种义愤。我觉得他的做法是不能允许的，可怕的和令人愤慨的。然而，这种做法在政治上却是正确的，因而在组织上是必需的。同停留在准备时期的老人们决裂毕竟是不可避免的。这一点列宁比其他人明白得早。他还试图保留普列汉诺夫，把他同查苏利奇和阿克雪里罗得区别开来。但事实很快证明，这一尝试毫无所获。

因此我和列宁分手似乎是在“道德的”，甚至是私人的基础上发生的。但这只是表面现象。实际上分歧的基础具有政治性质，它不过是在组织领域里暴露出来。

我认为自己是个集中主义者。但毫无疑问，在那个时期我还不完全清楚，一个革命政党要引导千百万群众投入反对旧社会的斗争，需要多么强化的和绝对服从的集中制。我的青少年时期是在反动没落的气氛中度过的，这种气氛在敖德萨又多延续了5年。列宁的青少年时代则属于民意派时期。那些比我年轻几岁的人是在新的政治高潮的形势下接受教育的。1903年伦敦代表大会之前，革命对我来说充其量还多半只是抽象空洞的理论。列宁的集中制对我来说还不是出自清晰地和独立思考过的革命概念。而我认为，要求由自己理解问题并从中作出一切必要的结论，这一向是我精神生活中必须绝对服从的要求。

代表大会上之所以爆发尖锐的冲突，除了刚刚初具轮廓的原则性的方面外，还由于老人们的眼光对列宁的成长与意义的错误评估。

在代表大会期间和代表大会之后，阿克雪里罗得和编辑部其他成员除了对列宁的做法感到愤怒之外，还有一种莫名其妙之感：他怎么能决心这样做呢？“要知道，他不太久之前到国外来还是个学生，他的举止也像个学生。这自信心是从哪儿突然冒出来的呢？他怎么能决心这样干的呢？”老人们议论说。

但列宁能下决心。对此他需要使人确信，在临近的革命形势中老人们没有能力直接领导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战斗组织。老人们，而且不仅是老人们，都错了；这已不只是一位杰出的工作人员，这是一位领袖，一位目的非常明确的人，可以认为，他完全感到自己是一位领袖，当他与老人们，与老师们肩并肩地站在一起的时候，他相信自己比他们更有力量，更为重要。当聚集在《火星报》旗帜下的人们认识还相当模糊的时候，只有列宁一个人完全而透彻地预见到明天和明天的严峻的任务、残酷的冲突和无数的牺牲。

在代表大会上列宁争取到了普列汉诺夫，但并不可靠；与此同时，他失去了马尔托夫，而且永远失去了他。看来，普列汉诺夫在代表大会上感觉到了什么。至少，他那时对阿克雪里罗得谈到了列宁：“他是罗伯斯庇尔<sup>①</sup>一类的人物。”普列汉诺夫本人在代表大会上很少起令人羡慕的作用，只是有一次我耳闻目睹他全副精力投入工作：这是在代表大会的党纲委员会会议上。他头脑里装着清晰的、经过科学考虑的党纲方案，他相信自己，相信自己的知识、自己的优越性，眼睛闪耀着快活的嘲讽的火花，留着灰白色的扎人的胡子，作出稍带戏剧性的、但生动和富有表现力的手势，普列汉诺夫坐在主席的位置上就像博学和智慧的焰光照耀着人数众多的会场。

孟什维克的领袖马尔托夫是革命运动中最富悲剧性的人物之一。马尔托夫是一位有才能的著作家，机敏的政治家，一个富有洞察力的人物，他远远高于他所领导的思想流派。但他的思想缺乏勇气，他的洞察力缺乏意志。敏锐不能取代它们。马尔托夫对事变的第一

<sup>①</sup> 马·玛·罗伯斯庇尔(1758—1794年) 法国大革命时期雅各宾派的领袖，革命政府首脑(1793—1794年)。——译注

个反应总是显露出革命的意向,但他的思想得不到意志的支持,很快就会泄气。我和他的接近没有经受住日益迫近的革命的最初一些重大事件的考验。

不管怎样,第二次代表大会是我一生中的一个重要路标,仅就它使我和列宁分离好多年来说,也是如此。今天在总体上回顾过去的一切时,我对此并不感到遗憾。我再次走向列宁比其他许多人都晚,但我是在思考了革命、反革命和帝国主义战争的经验之后,按照自己的道路走向列宁的。因此我回来比那些“学生们”更坚定、更认真,他们在列宁在世时重复着列宁的言词和手势,但不总能恰到好处,而在列宁去世之后他们都成了一群平庸的不肖徒辈和敌对力量手中的不自觉的工具。



## 第十三章

# 回到俄国

和第二次代表大会少数派的交往为时极短。会后的最初几个月里，少数派中就开始出现两条路线。我主张设法尽快与多数派统一，我把分裂看作是一场大的插曲，仅此而已。对另一些人来说，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分裂是向机会主义发展的出发点。

整个1904年对我来说是在政治上和组织上与孟什维克的领导集团的不断冲突中度过的。冲突围绕两个问题展开：对自由主义的态度和对布尔什维克的态度。我主张毫不妥协地反对自由派争取群众的企图，与此同时，也正因为如此，我更加坚决地要求社会民主党内的两派联合起来。9月份我正式声明脱离少数派，实际上从1904年4月起我就已经不参加他们的组织了。这一时期我离开俄国侨民到慕尼黑去度过了几个月，那时慕尼黑被认为是德国最民主和最优美的城市。我比较了解了巴伐利亚的社会民主党，慕尼黑的美术馆和《天真的人》周刊的漫画家们。

还在党代会开会期间整个俄国南部就已掀起了声势浩大的罢工运动。农民骚动变得越来越频繁。大学里沸腾了。日俄战争暂时阻止了运动的发展，但沙皇政府军事上的溃败很快就成了强大的革命推动力。舆论界勇敢起来了，恐怖行动频繁发生，自由派也活动起来，发动了宴会运动。革命的基本问题十分尖锐地提出来了。对我来说，社会材料开始真正地充实抽象概念了。孟什维克，特别是查苏利奇，越来越把希望寄托在自由派身上。

还在代表大会之前，在“兰多利特”咖啡馆举行的一次编辑部会

议之后，查苏利奇就以在这种场合所特有的既胆怯又固执的声音抱怨我们对自由派的攻击搞过头了。这是使她最为难过的事。

“您瞧，他们多么努力。”她说时眼睛并不正视列宁，但她针对的首先正是列宁。“司徒卢威要求俄国的自由派不要与社会主义决裂，否则德国自由派的可悲的命运就会威胁着他们，而应该以法国激进社会党人为榜样。”

“那就更应当揍他们。”列宁高兴地笑着说，好像在逗维拉·伊万诺夫娜。

“这算什么，”她失望地喊道，“他们迎着我们走来，可我们揍他们！”

在这个问题上我完全站在列宁一边，这个问题越是往后越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自由派的宴会运动很快就陷入了死胡同，就在此运动期间，1904年秋，我提出了“往后怎么办？”的问题，我的回答是：出路只有实行总罢工，然后是无产阶级起义，无产阶级应当领导人民群众反对自由主义。这加深了我和孟什维克的分裂。

1月23日（1905年），我外出作报告后回到日内瓦，在火车里一夜未睡使我精疲力尽。报童卖给我一张昨天的报纸。报上说工人要游行到冬宫去请愿。我断定它还没有举行。两个小时後我走进《火星报》编辑部。马尔托夫极端激动。“没有举行吧？”我问他。“怎么没有举行？”他冲着我喊。“我们整夜坐在咖啡馆里，读着最新的电报。难道您还不知道？喏，喏，喏……”于是他塞给我一张报纸。我浏览了十来行关于流血星期日的电讯。一股无名的怒火涌上心头。

我不能再留在国外了。代表大会后我与布尔什维克已无联系。而在组织上我已脱离孟什维克。我只好单枪匹马地行动了。我通过几个大学生弄到了护照。和妻子一起赴慕尼黑——我妻子是1904年秋重返国外的。帕尔乌斯把我们安排在他那儿住。在那儿他读了我写的论述1月9日以前事件的手稿，心情大为激动。“事变完全证实了这一预测，现在谁也不能否定总罢工是斗争的基本方法。1月9日是第一次政治罢工，尽管它披上了僧侣的长袍。需要的只是补充一点，俄国的革命可能导致工人民主政府执掌政权。”帕尔乌斯根据

这个思想为我的小册子写了序言。

帕尔乌斯无疑是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的一位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他自如地掌握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视野广阔，注视着世界舞台上发生的所有重大事件，加上他那大胆的思想，雄健有力的文笔，这就使他成为一位真正出色的作家。他的早期著作使我接触到许多社会革命问题，使我把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从遥遥无期的“终极”目标彻底变成我们时代的实际任务。然而，在帕尔乌斯身上总是有点癫狂和不可靠的东西。别的不说，这个革命家还有一个完全出人意料的梦想——发财致富。在那些年代他也是把这一梦想同自己的社会革命观联系在一起的。他抱怨说：“党的机关僵化了，甚至倍倍尔的头颅里也难以装进东西去。我们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需要办一份大型的，同时用三种欧洲语言出版的日报。但这需要钱，需要很多的钱。”在这条虎头狗的沉重而肥胖的脑袋里，社会革命的思想同发财的思想纠缠在一起了。他曾试图在慕尼黑办一个私人出版社，但结局非常可悲。后来帕尔乌斯动身赴俄，参加了 1905 年的革命。尽管他思想机敏，富有首创精神，但他完全不具备领袖的品质。1905 年革命失败后他就进入了堕落时期。他从德国迁到维也纳，又从维也纳迁到君士坦丁堡，他在那里时发生了世界大战。战争立即使帕尔乌斯发了财，他参与了军需品交易。同时他公开以德国军国主义具有进步使命的辩护人身份出现，和左派彻底决裂，成为德国社会民主党极右翼的鼓舞者之一。不用说，从战争爆发时起我不仅与他断绝了政治关系，而且也断绝了私人关系。

我和谢多娃从慕尼黑来到维也纳。那时国外的侨民形成一股返俄的洪流。维克多·阿德勒忙得不可开交：要给侨民们搞钱、护照、通讯联络的地址……他家的一位理发师给我化了装，因为在国外的俄国暗探对我的外貌已非常熟悉。

阿德勒对我说：“我刚刚收到阿克雪里罗得的电报，他说加邦<sup>①</sup>

<sup>①</sup> 格·阿·加邦(1870—1906年) 俄国神父，沙皇保安局奸细。1905年初他煽动工人向沙皇请愿，使工人遭到血腥屠杀。后被工人战斗队处死。——译注

已到国外来并自称社会民主党人。可惜……如果他永远销声匿迹，倒会留下一曲美丽的传说。在国外他将成为一个可笑的人物。您知道，”他补充说，眼光一闪，似乎在减轻他嘲讽中的刻薄性，“这样的人与其作为党内的同志，还不如作为历史的蒙难者为好……”

在维也纳我得到刺死谢尔盖大公的消息。事件层出不穷。社会民主党的报刊把眼睛转向东方。我的妻子为了到基辅去安排住所和取得联系先走了。我带了一张退伍准尉阿尔布卓夫的护照于2月份抵达基辅，在这里一连几星期从一个住所搬到另一个住所，最初住在一个连自己的影子都害怕的年轻律师家里，后来借住在一位工学院教授家里，然后又搬到一个自由派寡妇家里。我甚至一度藏身于一家眼科医院。护士根据主治医师（他了解我的历史）开的医嘱，给我洗脚，滴无害的眼药水，使我很尴尬。我不得不双重保密；我偷偷地背着护士写传单，因为她为了不使我的眼睛疲劳，对我看管得非常严格。在巡查病房时，教授摆脱开一个不可靠的助手，而带了一名他所信任的女助手进入我的房间，快速地锁上门并放下窗帘，好像在检查我的眼睛。这以后我们三人便小心翼翼地，但开心地笑了起来。“有香烟吗？”教授问。“有。”我回答。“够吗？”教授问。“够了！”我回答。我们又笑了起来。检查眼睛便到此结束，而我又埋头写自己的传单。这种生活使我感到很开心。只不过在那位和蔼可亲的护士老太太面前我觉得很不好意思，因为她是那么认真负责地为我洗脚。

那时基辅有一家著名的地下印刷厂，尽管周围遭到无数次的破坏，但它却在宪兵将军诺维茨基的鼻子底下存在了好多年。1905年春天我的传单就是在这家印刷厂印刷的。但篇幅大一些的号召书我就交给在基辅相识的年轻工程师克拉辛。克拉辛是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委员，在高加索有一家设备精良的大型地下印刷厂归他领导。我在基辅为这家印刷厂写了一系列的传单，这些传单印得非常清晰，这在秘密条件下是很不寻常的。

党和革命那时都非常年轻，无论在人员方面还是在办事方面，看起来都很缺乏经验和不周到。当然，克拉辛也没有完全摆脱这些缺陷。然而，在他身上已经有某种坚决、果断的东西和“行政才能”。他

是一名有一定资历的工程师，有职业，而且干得很好，对他评价很高，比起当时的青年革命者来，他的交际很广，认识各种各样的人。在工人区，在工程师的住所，在莫斯科自由派工厂主的豪华宅第，在作家协会，克拉辛到处都有自己的熟人。他善于把这一切都结合起来，他拥有别人所无法达到的开展活动的实际可能性。1905年克拉辛除了参加党的一般工作外，还领导一些极为危险的部门：工人战斗队，采购武器，制作爆炸物，等等。虽然克拉辛见多识广，但在政治上，以及在一般生活上，却是个急功近利的人。这是他的一个长处，也是他的致命弱点。长年耐心细致地积蓄力量、政治上的严格训练、对经验作理论研究——不，在他身上没有这方面的天赋。当1905年的革命没有如愿以偿时，克拉辛便专心于电工学和一般工业。克拉辛在这方面的表现也是个杰出的实际人才和一位有特殊成就的人。无疑，他的工程师活动的巨大成就给了他过去年代革命斗争所给予他的个人的满足。他对十月变革既敌视又困惑莫解，把它看作是注定要失败的冒险。在很长时间里他不相信我们有能力收拾破坏的国家。但后来广阔的工作机会吸引了他……

对我来说，1905年与克拉辛的联系确实是宝贵的。我和他约定在彼得堡见面。秘密接头地点我也是从他那儿得到的。第一个和主要的接头地点是在康斯坦丁诺夫炮兵学校，找主任医生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利特肯斯，命运使我和他一家有着长时间的交往。1905年那令人忐忑不安的日日夜夜，我不止一次地躲藏在扎巴尔干大街上利特肯斯的住宅——炮兵学校的大楼里。有时军校的院子里和它的楼梯上从来也没有见过的一些人当着值班守卫的面到主任医生的住所来找我。但是下层军人对主任医生都怀有好感，没有人去告密，所以一切顺利。医生的大儿子亚历山大，18岁，已经是党员了，几个月后在奥尔洛夫省领导了农民运动，但是经受不了精神的震荡，病倒了，最后不治身亡。小儿子叶夫格拉弗那时还是一个中学生，后来在国内战争中和苏维埃政权的教育工作中起过重大作用，但在1921年在克里木被匪徒杀害。

我是用地主维肯季耶夫的身份证公开住在彼得堡的。在革命的

圈子里则以彼得·彼得罗维奇的名字出现。在组织上我没有参加任何一派。我继续和克拉辛合作，那时他是布尔什维克调和派分子，由于我当时的立场，这使我们更加接近。与此同时，我与孟什维克的地方小组保持联系，这些小组推行非常革命的路线。在我的影响下，小组持抵制第一届立法咨询杜马的观点，并与自己的国外中心发生了冲突。不过，这个孟什维克小组很快就垮掉了。它的一个活跃成员多勃罗斯科克，人称“金丝眼镜尼古拉”，原来是一个职业奸细。他知道我在彼得堡，也认得出我的脸。我的妻子已在森林里举行的五一集会上被捕，必须暂时隐蔽起来。夏天我到了芬兰。对我来说，那里是一个暂息的地方，这段时间里我从事紧张的写作，也作短暂的闲游。我贪婪地读报，注视一些党的组建，剪报，把一些事实分门别类加以整理。在这期间我最终形成了对俄国社会内部力量和俄国革命前景的看法。

我那时写道：“俄国面临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土地问题是这一革命的基础。能引导农民去反对沙皇制度和地主的那个阶级和政党将掌握政权。无论是自由主义还是民主知识分子都不能做到这一点：他们的历史时期已经过去了。无产阶级已经占领了革命的舞台。只有社会民主党才能通过工人引导农民跟自己走。这在俄国社会民主党面前揭开了早于西方国家获得政权的前景。社会民主党的直接任务是完成民主革命。但在取得政权以后，无产阶级政党就不能局限于它的民主纲领。它将不得不走上采取社会主义措施的道路。它在这条道路上能走多远，不仅取决于内部的力量对比，而且还取决于整个国际形势。因而，基本的战略路线要求社会民主党在为争取对农民的影响而与自由主义进行不调和的斗争的同时，在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就给自己提出执掌政权的任务。

关于革命的总的前途问题是同策略问题紧密联系着的。党的中心政治口号是立宪会议。但革命斗争的进程提出了由谁和怎样召开立宪会议的问题。从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人民起义的前景可以得出建立临时革命政府的结论。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作用应当保证它在临时政府中的决定性作用。党的上层对这个问题有很

大的争论，其中包括我和克拉辛之间的争论。我写了一个提纲，其中证明革命对沙皇制度的完全胜利将意味着要么建立依靠农民的无产阶级政权，要么直接加入这一政权。克拉辛被这种坚决的提法吓住了。他接受临时革命政府的口号和我起草的政府工作纲领，但不赞成预先决定社会民主党在政府中占多数的问题。我的提纲就以这样的形式在彼得堡印出来，而克拉辛则要在预定5月份在国外召开的全党代表大会上为这个提纲辩护。然而全党代表大会没有举行。克拉辛在布尔什维克代表大会上积极参与关于临时政府问题的讨论，提出我的提纲作为对列宁的决议案的修正。这段插曲在政治上是如此有意思，因此我不得不援引第三次代表大会的记录。

“至于列宁同志的决议案，”克拉辛说，“我认为它的缺点正是在于它没有强调临时政府的问题，没有足够鲜明地指出临时政府和武装起义之间的联系。实际上临时政府是作为人民起义的机关由人民起义推举出来的……其次我发现决议案中还有一个错误的观点，似乎临时革命政府只有在武装起义最终胜利和专制制度垮台之后才会出现。不，它正是在起义过程中产生的，它最活跃地参加起义，并以自己的组织作用保证起义的胜利。以为只有在专制制度彻底垮台的时候社会民主党才可以参加临时革命政府，那是幼稚的；别人从火中取出栗子之后，谁也不会想到与我们分享这些栗子。”这几乎全是我提纲中的话。

列宁在主旨报告中是从纯理论角度提问题的，他对克拉辛的提法深表赞同。他是这样说的：“总的说来，我同意克拉辛同志的意见。我是写文章的，自然注意问题的提法。克拉辛同志非常正确地指出了斗争目的的重要性，我完全同意他的意见。不指望占领为之而战的据点就不能作战……”

决议案作了相应的修改。在最近几年来的争论中，第三次代表大会关于临时政府的决议几百次地被用来与“托洛茨基主义”对立。那些斯大林意识形态的“红色教授们”并不知道，他们作为列宁主义的典范而摘引来反对我的词句，正是我写的。

※ ※ ※

我在芬兰生活的环境很少使人想起不断革命：小山、松树、湖泊、秋天洁净的空气、安静。9月末我深入到芬兰更远的地方，搬到湖畔森林里的一幢孤零零的 Rauha 公寓，这个名称芬兰语的意思是安静。秋天，这幢大公寓完全空了。一个瑞典作家和英国女演员最近住了一阵子分文未付便扬长而去。老板到赫尔辛福斯追他们去了。老板娘患重病躺着，心脏靠香槟酒维持跳动。不过我从来没有见过她。老板还没有回来，她就死了。她的遗体就在我住的房间楼上。老侍从到赫尔辛福斯找主人了。只留下一个男孩服务。早早地下了一场大雪。松树披上了一层银装。疗养所死一般的寂静。男孩子到地下室的厨房去，我的上面躺着死去的老板娘。只我一个人，一片 Rauha——安静。既没有人，也没有声音。我写作和散步。晚上邮差送来一叠彼得堡的报纸，我一张接一张地翻阅，就像狂风侵入打开的窗户一样。罢工在发展，在扩大，从一个城市蔓延到另一个城市。在寂静的公寓里报纸的沙沙声在我的耳朵里就像雪崩的轰鸣声。革命在全力进行。我叫男孩子结了账，雇了一匹马，离开了“安静”去迎接雪崩。晚上我已经在彼得堡工学院礼堂里作报告了。



## 第十四章

# 1905年

十月罢工绝不是按计划开展的。它是由莫斯科的印刷工人开始的，后来平息下来了。各党派安排在1月9日（公历22日）“流血星期日”一周年之际发动决定性战斗。这就是为什么我不太着急，而是在芬兰的避难所里完成了自己的工作。但偶尔的，而且已经平静下来的罢工突然波及到了铁路，于是又蔓延开来。从10月10日开始，罢工已经在政治口号之下举行，并从莫斯科向全国扩展。世界还未曾有过这样的总罢工。在许多城市里，在街头发生了与军队的冲突。但总的来说，十月事件停留在政治罢工的水平上，没有转向武装起义。然而专制制度惊惶失措，退却了。10月17日（公历30日）颁布了立宪宣言。诚然，受了打击的沙皇政府仍然掌握着政府机器。根据维特<sup>①</sup>的说法，政府的政策“集怯懦、盲目、阴险和愚蠢之大成”，这比任何时候都明显，但革命还是取得了最初的，不完全的，但却是大有希望的胜利。

还是那个维特在晚些时候写道：“1905年俄国革命中最严重的问题，当然是……农民的口号：给我们土地。”可以同意这一点。但维特接着又说：“我不认为工人苏维埃有特别的意义。它也不具有这样的意义。”这仅仅表明，官僚中的这位最杰出的人物也不懂得那些事件的意义，对统治阶级来说，这些事件是最后的一个警告。维特死得

---

<sup>①</sup> 谢·尤·维特(1849—1915年) 1905年10月至1906年4月任俄国大臣会议主席。——译注

很及时，他不必修正自己关于工人苏维埃意义的观点了。

我在十月罢工的高潮时刻到达彼得堡。罢工的浪潮越来越扩散开去，但有一个危险性，由于没有一个群众性的组织来领导，运动会一事无成地夭折。我从芬兰回来时带来一个选举产生的非党组织的计划，每1000名工人选一名代表。我在回来的那天从著名作家、后来的驻意大利苏维埃大使约尔丹斯基那里得知，孟什维克已经提出选举产生的革命组织的口号，每500人选一名代表。这是正确的。在彼得堡的部分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坚决反对选举产生的非党组织，他们担心它会与党竞争。工人布尔什维克则根本不担心。布尔什维克上层对苏维埃的宗派主义态度一直持续到11月列宁回到俄国时为止。总之，关于列宁不在的情况下的“列宁主义者”的领导可以写成很有教育意义的一章。列宁的才华远远高出自己最亲密的学生们，以致他们感到只要有列宁在，永远没有必要去独立解决理论问题和策略问题。在关键时刻他们离开列宁就束手无策。1905年秋天是如此，1917年的春天也是如此。在这两个关键时刻以及在许多其他历史意义较小的时刻，广大党员比这些自以为是半个领袖的人物更有把握正确路线的嗅觉。列宁从国外姗姗来迟是布尔什维克派在第一次革命的事变中没能取得领导地位的原因之一。

我已经提到，谢多娃在森林中举行的五一集会上被骑兵逮捕。她坐了大约半年牢，后来被送到特维尔受监视。十月宣言颁布后她回到彼得堡。我们以维背季耶夫的姓租了一个房间，房东原来是一个交易所的投机商人。交易所很不景气，许多投机商不得不紧缩自己的住房来出租。每天早晨送报人给我们送来所有的报纸。房东有时向我妻子借去看，他谈着，把牙齿咬得咯咯响。他的事业越来越糟。有一次他直接闯进我的房间，使劲挥舞着报纸。“您瞧，”他喊道，手指指着我刚发表的一篇文章《彼得堡管院子的人，早上好！》，“你们看，他们已经找到管院子的头上来了，要是我碰上这个坏蛋，瞧我就用这个把他给毙了。”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支手枪，在空中挥舞着。他，一副精神病患者的模样，在寻找同情。妻子带着这不安的消息赶到编辑部来找我，得找一个新的住所，但没有时间去找，只能听任命

运的安排。我们就这样在这个绝望的交易所商人那里一直住到我被捕。幸好无论是房东还是警察，始终不知道姓维肯季耶夫的人到底是谁。我被捕后，甚至没有对我的住所进行搜查。

在苏维埃我用的是扬诺夫斯基的姓，这是我诞生的故乡的名称。发表文章时则用托洛茨基。我为三家报纸工作。我和帕尔乌斯一起主办一份名叫《俄罗斯日报》的小报，把它变成一个供大众阅读的战斗机关报。在几天时间里印数从3万份增加到10万份。一个月以后报纸的订数达到50万份。但印刷技术无法赶上报纸订数的增长。最后报纸被政府查封，我们才算摆脱了这种矛盾。11月13日我们和孟什维克联合办了一个大型政治机关报《开端报》。报纸的发行量不是逐日增长，而是每小时都在增长。布尔什维克的《新生活报》由于列宁没有参加，办得平平常常。相反，《开端报》取得了巨大成就。我认为，半个世纪来它比任何出版物更接近于自己的经典样板——马克思在1848年创办的《新莱茵报》。加米涅夫是《新生活报》编辑部的，他后来告诉我，有一次他乘火车，看到车站上出售刚出版的报纸的情景。人们排成长长的队伍等着从彼得堡开来的火车。他们只需革命的报纸。“《开端报》！《开端报》！《开端报》！”队伍中人们喊道。“《新生活报》！”接着又是“《开端报》！《开端报》！《开端报》！”加米涅夫承认：“那时我懊丧地对自己说：是的，他们《开端报》写得比我们好。”

我除了为《俄罗斯日报》和《开端报》写作外，还给苏维埃的正式机关报《消息报》写社论，还写了许多号召书、宣言和决议。第一个苏维埃存在的52天工作忙得不可开交：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开不完的群众大会，还有三家报纸。我们怎么在这漩涡里生活的，连我自己也不清楚。但过去的许多事情似乎都是不可思议的，因为记忆里失去了活跃的因子；你以旁观者的立场来看自己。而我们在那些日子里是非常积极的。我们不仅在漩涡里转，而且还制造了这种漩涡。一切都在忙乱中进行，但并不坏，有些事还干得很好。我们的责任编辑，一个老民主派瓦·M·赫尔岑斯坦博士有时穿了一件无可挑剔的黑色长礼服到编辑部来，他站在房间中央，以关怀的眼光看着我们的

忙乱景象。一年以后他被迫为报纸的革命狂暴行为负责，其实他对报纸没有任何影响。老人没有宣布同我们划清界限，相反，他眼含泪水向法庭诉说，我们在编辑这份最受大众欢迎的报纸时是怎样在公务间隙吃干硬的小馅饼的，这是门卫从附近的面包店里买了用纸包好后送来的。为了没有获胜的革命，为了侨居国外的兄弟，为了这些干硬的小馅饼，老人坐了一年牢……

后来维特在回忆录中写道，1905年“俄国的绝大多数人都像发了疯似的。”保守分子觉得革命是集体的神经错乱，只是因为革命使社会矛盾“正常的”疯狂达到了极端。人们不愿在大胆的漫画里认出自己来。然而现代的全部发展使矛盾强化，紧张化，尖锐化，使矛盾变得难以忍受，从而促使绝大多数人“发疯”。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疯的大多数人就把紧身衣套在英明的少数人身上。也正是由于这样，历史才向前推进。

革命的混乱同地震或水灾全然不同。在革命的混乱中立即开始形成新的秩序，人们和思想自然而然地按照新的中心分类。那些被革命推翻和扫除的人觉得革命是十足的发疯。对我们来说，革命是一种亲切的自然现象，尽管是非常不安定的自然现象。一切都各得其所，各有其时。有些人还有其私生活，恋爱，交新朋友，甚至去看革命的戏剧。帕尔乌斯非常喜欢一出新讽刺剧，看后立即为朋友们买了50张下一场的戏票。需要说明的是，他在头一天拿到了一笔稿费。帕尔乌斯被捕时在他口袋里搜出50张戏票，宪兵们为这个革命之谜绞尽了脑汁，他们不知道，帕尔乌斯干一切事情都是大手大脚的。

苏维埃把广大群众都发动起来了。工人们全都支持苏维埃。农村骚动迭起，朴次茅斯和约签订后，从远东回来的士兵中间也发生骚乱。但近卫军团和哥萨克部队仍很顽固。革命胜利的所有因素都已经具备，但这些因素还没有成熟。

10月18日，宣言发表后的第二天，在彼得堡大学前站了好几十个还没有从斗争中冷静下来和陶醉于最初胜利的人。我从阳台上向他们叫喊说，不要相信不彻底的胜利，敌人是不会妥协的，前面就是

陷阱，我把沙皇的宣言撕得粉碎，让纸片随风飘散。但是此类的政治警告只在群众的意识中留下轻微的疤痕。他们需要经过大事变才会吸取教训。

我由此想起了在彼得堡苏维埃生活中的两件事。一件是10月29日城市纷纷传说黑色百人团准备大屠杀。直接从工厂来参加苏维埃会议的代表们从主席台上把工人们制作的对付黑色百人团的各种武器样品展示给大家看。他们挥舞着芬兰刀、铁指套、匕首、铁鞭，但这一切与其说是感到忧愁，不如说是高兴，大家甚至有说有笑。他们似乎以为，只要做好反击的准备，问题就解决了。他们中间的大多数人都没有认识到这场斗争是生死搏斗。12月事变教会他们懂得了这一点。

12月3日晚上，彼得堡苏维埃被军队包围，所有的出入口全被封锁。我从执行委员会开会的大厅厢座向聚集在下面的几百名代表喊话：“不要抵抗，也不要把武器交给敌人。”武器指的是手枪。开会的大厅已被近卫军步兵、骑兵和炮兵团团包围，工人们开始捣毁自己的武器。他们用毛瑟枪敲勃朗宁手枪和用勃朗宁手枪敲毛瑟枪，干得很熟练。但这听起来已不是10月29日那样有说有笑了。在金属撞击的丁当声中，在被捣毁的金属的咯吱声中，可以听到无产阶级咬牙切齿的声音，他们第一次彻底认识到要推翻和粉碎敌人，还必须做更艰巨、更无情的努力。

十月罢工的局部胜利，除了政治意义外，对我来说还有无可估量的理论意义。不是自由资产阶级的反对党的运动，不是农民的自发起义，不是知识分子的恐怖行动，而是工人罢工第一次使沙皇政府屈服。无产阶级的革命领导权作为无可争辩的事实表现出来了。我认为，不断革命论经受住了第一次重大的考验。革命清楚地向无产阶级展示了夺取政权的前景。不久来临的反动年代已经不能使我从这一立场后退。我据此也对西方作出自己的结论。如果俄国年轻的无产阶级有这样的力量，那么在先进国家无产阶级革命力量将是什么样的呢？

卢那察尔斯基以其固有的粗枝大叶和不精确的作风后来对我的

革命观作了如下的说明：“托洛茨基同志（在1905年）站在这样一种立场上，即两种革命（资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尽管互不相同，但却是相互联系着的，因此我们面临着不断革命。人类的俄国这部分通过资产阶级的政治变革进入了革命时期，这样，俄国以至全世界在完成社会革命之前就再也不能走出这个时期了。无可否定，托洛茨基同志提出这些观点，表现了他的远见卓识，尽管他弄错了15年时间。”

关于弄错15年的批评，后来拉狄克也重复过，但并未因而变得更深刻一些。在1905年，我们的所有前景和口号都是立足于革命胜利而不是失败上的。我们那时没有实现共和国，没有实现土地改革，也没有实现8小时工作制。那么提出这些要求是否意味着我们错了呢？革命的失败破坏了所有的前景，而不仅仅是我所论证的前景。问题不在于革命期限，而在于对革命的内部力量的分析和对它的总发展的预告。

在1905年革命中我和列宁之间的相互关系是什么样的呢？他去世后官方的历史重新改写，并且1905年也被说成是两种因素——善与恶的斗争。事实是怎样的呢？列宁没有直接参加苏维埃的工作，没有在苏维埃发表过演说。不用说，他注视着苏维埃的每一个步骤，通过布尔什维克派的代表影响它的政策，在自己的报纸上反映苏维埃的活动。列宁没有一个问题与苏维埃的政策有分歧。与此同时，正如文件所证实的，苏维埃的所有决定，也许某些偶然的和不大重要的决议除外，都是由我起草，由我先送到执委会，然后再以执委会的名义送交苏维埃讨论的。在成立由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代表组成的联合委员会后，又是我以联合委员会的名义在执行委员会上做报告。在这种情况下没有发生过任何冲突。

第一任苏维埃主席是我从芬兰回来的前夕选出的，他是年轻的律师赫鲁斯塔廖夫，一个偶然参加革命的人物。赫鲁斯塔廖夫担任主席，但不起政治领导作用。他被捕以后选出了一个由我领导的主席团。苏维埃的一名相当著名的参加者斯韦尔奇科夫在回忆录中写道：“苏维埃的思想领导者是列·达·托洛茨基。苏维埃主席诺萨

尔·赫鲁斯塔廖夫更像块挡箭牌，因为他自己没有能力解决任何原则问题。他有病态的虚荣心，他憎恨列·达·托洛茨基，正是因为他不得不常常去找他请教和指示。”卢那察尔斯基在回忆录中写道：“我记得，有人当着列宁的面说，‘赫鲁斯塔廖夫这颗星正在陨落，现在，苏维埃里的有力人物是托洛茨基。’列宁似乎在一刹那变得不大高兴，然后说：‘那有什么，托洛茨基是以自己不倦的和出色的工作赢得这一点的。’”

两个编辑部的关系非常友好。它们之间没有任何争论。布尔什维克的《新生活报》写道：“《开端报》第一期出版了，我们对战友表示祝贺。第一期上引人注目的是托洛茨基同志对罢工的精彩描述。”要是它们在相互斗争的话，是不会这样写的。斗争确实不存在。相反地，这两家报纸还相互保护，反对资产阶级的批评，《新生活报》在列宁到来之后已为我那篇论述不断革命的文章辩护。两家报纸以及两个派别都奉行合并的方针。布尔什维克的中央委员会在列宁的参与下一致作出决议，其精神是，分裂总的说来只是在流亡环境下的产物，革命事变已经摧毁派别斗争的任何基础。我在《开端报》上捍卫这条路线，只有马尔托夫在消极抵抗。

在第一个时期孟什维克在群众压力的影响下竭尽全力向左翼看齐。只是在反动派的第一次打击之后他们才开始转向。1906年2月，孟什维克的领袖马尔托夫在给阿克雪里罗得的信中抱怨说：“瞧，已经两个月了……我无法完成已着手写的任何一篇作品……不知是神经衰弱还是心理疲劳——但是我无法驾驭思想。”马尔托夫不知道自己的病叫什么。其实，这病的名字是很清楚的，这就是孟什维主义。在革命时代机会主义首先意味着张皇失措和无法“驾驭思想”。

当孟什维克们开始公开表示后悔并指责苏维埃的政策时，我在俄国报刊上，后来在德国报刊上和罗莎·卢森堡主编的波兰杂志上为苏维埃的政策辩护。在这场捍卫1905年革命方法和传统的斗争中，诞生了我的起初名为《革命中的俄国》的书，此书后来在许多国家以《1905年》的书名多次再版。10月变革之后这本书不仅在俄国，而且在西方的共产党内部曾作为正式的党课教材。列宁逝世后，一场

精心策划的反对我的运动开始了，我的这本论1905年的书也成了攻击的对象。起初，只限于微不足道和毫无价值的个别的批评和挑剔。但是渐渐地批评变得大胆起来，添油加醋，牵强附会，越来越复杂、越来越厚颜无耻，他们越是要用这种批评来掩盖自己心虚的噪音，调门就喊得越高。于是就以倒填日期的办法编造了一个在1905年革命中列宁路线和托洛茨基路线斗争的神话。

1905年的革命在国家的生活中，在党的生活中，在我个人的生活中都是一个大转折。这是一个趋于成熟的转折。我在尼古拉也夫的第一次革命工作通过摸索获得了外省工作的经验。然而这些经验并未消失得无影无踪。也许，在所有往后的年代里，我都没有机会像在尼古拉也夫那样与普通工人们如此亲密地交往。那时我还没有任何“名气”，没有什么东西把我和他们隔开。俄国无产者的基本类型永远留在我的意识里。后来我所遇到的几乎只是这些类型的变种。在狱中我差不多是从基本常识开始学习革命的。两年半的监狱生活和两年的流放，使我有机会打下革命世界观的理论基础。第一次侨居等于上了一个大型政治学校。在一些杰出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家的指导下，我在这里学习了从巨大的历史远景和国际联系中去看待各种事变。在我快结束侨居生活时，我脱离了两个领导集团：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我是1905年2月回到俄国的，而其他一些侨居国外的领导者则直到10月和11月才回来。在俄国同志中没有一个人可资我学习请教的。相反地，我自己却处于教师的地位。风暴之年的事变一个接一个地出现，需要当机立断。笔下的传单一写好就送往地下印刷厂。在监狱和流放中打下的理论基础，在侨居国外时掌握的政治方法，现在首先有了直接的用武之地。在事变面前我感到很有信心。我懂得事变的内在机制（至少我有这种感觉），我能想象这些事变对工人的意识所起的作用，我也预见到明天的基本特点。从2月到10月我参与事变的方式主要是写作。10月我一下子卷进了巨大的漩涡，此漩涡对个人来说乃是最大的考验。一切决定只能在火线上作出。在这里我不能不指出，这些决定在我看来都是不言而喻的东西。我不管别人会怎么说，我很少有和别人商量……



切都在匆忙中进行。后来我以惊讶、陌生的感觉注意到，每一次大的事变都使孟什维克中最聪明的马尔托夫措手不及并陷入六神无主的境地。我没有去想(对自己进行考试的时间太少了)，但我还是本能地感觉到，我的学生年代过去了。说它们结束并不意味着我毋须再学习。不，强烈的学习要求和愿望贯穿我的一生。但以后我是像教师而不是像学生那样去学习了。我第二次被捕时是26岁。捷依奇老人承认我成熟了：在狱中他庄重地不再称呼我为年轻人，而是叫我的本名和父名。<sup>①</sup>

在前面我已经引用过而现在已成禁书的《剪影》中，卢那察尔斯基对第一次革命的那些领导人做出了这样的评介：“他(托洛茨基)在第二次被捕时在彼得堡无产阶级中间的声誉极高，而由于他在法庭上的极端优美的(?)和英雄的(?)表现，他的威望更高了。我应当说，在1905至1906年所有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中，托洛茨基无疑是最有教养的，尽管他还年轻，在他身上很少有那种流亡者的狭隘性的印记，我已经说过，这种狭隘性当时甚至影响到列宁。托洛茨基比其他人更加感觉到什么是夺取国家政权的斗争。在声望这个意义上来说他从革命中获得的東西最多：无论是列宁还是马尔托夫实际上什么也没有赢得。普列汉诺夫由于表现出半立宪民主党的倾向而名声大减。从这时起托洛茨基已名列前茅。”这几行字是1923年写的，现在读起来特别含有深意，因为卢那察尔斯基今天写的(不很“优美”，也不很“英雄”)正好是完全相反的东西。

没有直觉，也就是说没有下意识的感觉，是办不成任何大事的，这种直觉由于理论工作和实际工作而可以得到发展和丰富，但它必须是天性中所固有的。无论是理论修养还是实践的经验都不能替代政治洞察力，这种洞察力使人能分析局限，从整体上对形势作出评价，并能预见到它的今后发展。这种能力在急剧变动和转折的时期，也就是在革命的条件下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我觉得1905年的事件发现了我身上具有这种革命的直觉，并使我在往后的岁月里很有信

<sup>①</sup> 俄国人称呼本名和父名，有尊重对方的意思。——译注

心地依靠这种直觉。在这里我要指出的是，我所犯的错误的，不管它们有多大（我犯过一些重大错误），总是只涉及一些次要问题，如组织问题或策略问题，但不是基本问题，不是战略问题。在估计总的政治局势及其革命前途上，平心而论，我不能说自己犯过严重的错误。

在俄国生活中，1905年革命是1917年革命的总演习。在我个人生活中这次革命也具有同样的意义。我满怀信心地坚定地参加了1917年的事变，因为对我来说这些事变只是因1905年12月3日彼得堡苏维埃成员被捕而中断的革命工作的继续与发展。

逮捕是在我们发表了所谓财政宣言的第二天进行的，这个宣言宣布了沙皇政府在财政上必然破产，同时断然警告说，胜利的人民不会承认罗曼诺夫王朝的债务。工人代表苏维埃在宣言中指出：“君主专制制度从来也没有得到人民的信任，也没有得到人民的授权。因此我们决不偿还沙皇政府公然进行反人民战争中所欠的债务。”数月后法国交易所又借给沙皇7.5亿法郎新的贷款，以此来回答我们的宣言。反动派和自由派的报刊嘲笑了苏维埃对沙皇财政和欧洲银行家们所作的无力的威胁。后来他们竭力要把宣言给忘了。但它却提醒他们宣言的存在。沙皇政府日积月累所造成的财政破产和它的军事上的覆灭同时发生。后来，革命胜利之后，人民委员会于1918年2月10日发布法令，宣布废除沙皇所欠的全部债务。这个决定至今仍然有效。那些断言仿佛十月革命不承认任何义务的说法是不正确的。革命是承认自己的义务的。它在1905年10月2日所承担的义务，在1918年2月10日实现了。革命有权提醒沙皇政府的债权人：“先生们，我们曾及时警告过你们！”

在这方面也跟所有其他方面一样，1905年准备了1917年。

## 第十五章

# 审判,流放,逃亡

第二轮监狱生活开始了。比起第一轮来,这一次要好受得多,而且条件比八年前要好得多。我在“十字”监狱关了一段时间,然后关进彼得保罗要塞,最后送到判前羁押所。在发配西伯利亚之前,又把我们转送到解犯羁押监狱。以上加在一起一共是15个月。每一个监狱都有自己的特点,你需要去适应这些特点。但讲述这些东西太乏味了,因为尽管各有特色,但所有的监狱都是很相像的。又有时间进行系统的学习和写作了。我从事地租理论和俄国社会关系史的研究。关于地租理论这个大部头的但没有完成的著作,在10月变革后的初期丢失了。对我来说,这是丢失关于共济会的著作后的一次最重大的损失。对俄国社会史的研究成果是《总结与展望》一文,这是那个时期对不断革命论所作的最完备的论证。

转到判前羁押所之后,律师们得到允许可以来看我们。第一届杜马使政治生活活跃了起来。报纸说话又大胆一些了。马克思主义的出版物也活跃起来了。又可以写战斗的政论文章了。我在狱中写了不少文章,律师们把稿子装在公文包里带出去。我那本小册子《政治舞台上的彼得·司徒卢威》就是在这时期写的。我埋头写作,连监狱的放风我都觉得是个讨厌的负担。这本旨在反对自由主义的小册子,实际上是反对机会主义的批评,为彼得堡苏维埃、莫斯科的12月武装起义和整个革命政策辩护的。布尔什维克报刊对这本小册子大加赞许。孟什维克报刊则一言不发。几个星期里小册子就发行了几万本。

和我关在一起的徒·斯韦尔奇科夫后来在他那本《革命的曙光》一书中叙述了这段监狱生活：“列·达·托洛茨基一口气写了《俄国和革命》一书并一部分一部分地送出去打印，他在书中第一次（不确切！——列·达·）明确提出如下思想：在俄国开始的革命不达到社会主义制度就不能结束。他的‘不断革命’理论（人们这样称呼这一思想）那时几乎没有人赞同，但他坚持自己的立场，并且那时就已经看到世界各国资本主义经济解体的征兆和社会主义革命相对临近……”

斯韦尔奇科夫继续写道：“托洛茨基的囚室很快变成了一个图书室。人们给他送来所有多少值得注意的新书，他读这些书，从早晨到深夜整天写作。他对我们说：‘自我感觉好极了。我坐着，工作着，并且确实知道，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把我逮捕了……在沙皇俄国的境内这是一种非同寻常的感受，是不是？……’”

我阅读欧洲的古典文学作品作为休息。我躺在监狱的单人床上，享受着读书的乐趣，浑身感到极大的满足，就像一个美食家品尝名酒或者吸着芬芳的雪茄那样。这是美好的时刻。我研究古典文学的痕迹——题词和引文，在那个时期我所写的政论中随处可见。那时我第一次接触法国小说大师们的原文作品。小说的艺术首先是法国的艺术。虽然我的德语比法语也许好一些，特别在掌握科学术语上，但我阅读法国小说却感到比德国小说容易一些。直到现在我还是非常喜欢法国小说。就是在国内战争期间，我在火车上也总要挤时间读些法国文学的新作。

总之，我不能抱怨自己的监狱生活。对我来说这是一所很好的学校。我带着几分伤感离开彼得保罗要塞与世隔绝的单身牢房——那里是如此安静，如此寂无声息，正是从事脑力劳动十分理想的地方。相反地，拘留所人满为患，忙乱嘈杂。有不少是死囚，因为那时全国掀起了一股恐怖活动和武装剥夺的浪潮。由于第一届杜马召开的缘故，监狱的制度比较自由，白天囚室不上锁，可以一起出去放风散步。我们着迷似地一连几个钟头玩跳背游戏。那些判处死刑的人和其他人一起跳，弯下腰来让人家跳。我妻子一星期来探望我两次。

值班助理对我们交换信件和文稿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其中有一个上了年纪的对我们特别好。我应他的要求，送给他一本我写的书和题了词的照片。“我的几个女儿都是高等女校的学生。”他高兴地悄声说并神秘地使了使眼色。在苏维埃政权下我又遇到过他，并在饥饿年代尽力帮助过他。

帕尔乌斯和捷依奇老人常在院子里散步。我也常常参加进去。我们三个人还在监狱的厨房里合拍过一张照片。不知疲倦的捷依奇想出了一个集体越狱的念头，并轻而易举地争得帕尔乌斯赞同，还执意邀我参加。我不同意，因为即将举行的审判的政治意义吸引了我。然而卷入这个越狱计划的人太多了。监狱图书馆是越狱行动的中心，看守在这里找到了一套钳工工具。诚然，监狱当局把这件事情悄悄压下了，因为他们怀疑工具是宪兵们偷偷放在那里的，目的是借此改变监狱的制度。不过捷依奇的第四次逃跑毕竟不是在监狱里实现，而是到了西伯利亚才实现的。

12月失败之后党内的派别分化又急剧地恢复了。杜马的解散重新提出了所有的革命问题。我就这些问题写了一本策略方面的小册子，列宁把这本小册子拿到布尔什维克的出版社里出版了。孟什维克已经在全线发出解除警报。然而，在监狱里派别关系却还没有像外面那样尖锐，这就使我们有可能就彼得堡苏维埃写一本集体著作，参加写作的还有几位孟什维克。

对代表苏维埃的审判是在9月19日开始的，那时斯托雷平战地法庭刚刚开张不久。法院大厦的院子和附近的几条街道变成了军营。彼得堡的所有警察力量都被发动起来了。但是审判本身却是相当自由的：反动派想彻底败坏维特的名声，揭露他的“自由主义”以及他对革命的软弱态度。传唤了约400名证人，其中有200多人出庭作证。工人、工厂主、宪兵、工程师、仆人、居民、记者、邮电官员、警察局长、中学生、市杜马议员、管院人、参议员、流氓、议员、教授、士兵，在一个月的时间里像接受检阅似地排成长长的一串，依次被传讯。在法官、检察官、辩护人和被告（特别是被告）盘问的交叉火力下，他们一件件一桩桩回忆工人苏维埃的活动。被告们作了辩护。我谈了

武装起义在革命中的地位。这样,主要目的就达到了。参议员洛普欣 1905 年曾在警务厅里开设揭露大屠杀的印刷厂,当法庭拒绝我们传唤他的要求时,我们中断了审判,迫使他们把我们送回监狱。辩护人、证人和旁听者也随我们退出。法官和检察官们面面相觑。他们在我们缺席的情况下作出判决。关于这一罕见的长达一个月的审判速记记录迄今没有公布,大概已经找不到了。审判中的最重要部分我在《1905 年》一书中作了叙述。

审判时我的父亲和母亲都来了。他们的思想感情是矛盾的。已经不能用孩子的任性来解释我的行为,就像我住在尼古拉也夫时在什维戈夫斯基的花园里干的那样。我是报纸的编辑、苏维埃主席,是有点名气的著作家。这使老人家感到高兴。母亲和辩护人谈话,竭力要从他们那儿听到关于我的更多的令人愉快的事情。在我讲话时,我讲的意思她无法完全听懂,她只是在无声地哭泣。当 20 个辩护人来和我一一握手时,她哭得更厉害了。在这之前有一个律师要求审判暂停一下,理由是全场过于激动。此人就是亚·谢·扎鲁德内。他在克伦斯基的政府里当上了司法部长,并以叛国罪将我投入监狱。但这是 10 年以后的事了……在休庭时两位老人用幸福的目光看着我。母亲相信,我不仅会被宣判无罪,而且还能获得什么嘉奖呢。我要她相信,应做好去服苦役的准备。她惶恐和困惑不解地把目光从我身上移到辩护人身上,竭力想弄明白这怎么可能。父亲脸色苍白,一声不吭,既感到幸福,又感到痛苦。

我们被剥夺了所有的公民权并判处流刑移住。这是比较轻的判决。我们本以为要服苦役的。但流刑移住完全不是我第一次受到的行政流放。流刑移住是无期的,任何逃跑的企图都要受到追加三年苦役的处罚。在服苦役之前还要加罚鞭打 45 下,但在两三年前这一加罚已取消了。

1907 年 1 月 3 日我写信给妻子说:“我们在解犯羁押监狱已经两三个小时了。我承认,我非常不安地告别了我在‘拘留所’的囚室。我对那个完全可以进行工作的单人囚室已经相当习惯了。我们知道,在解犯羁押监狱里我们要被安排在公共囚室里,还有什么比这更

令人讨厌的呢？而接下来是押解路上的我所熟悉的肮脏、嘈杂和混乱。谁知道，我们得花多长时间才能到达流放地呢？又有谁能预言，我们将在何时回来？要是能像以前那样在 462 号囚室里读书、写作和——等待……就好了。

“今天没有预先通知就突然把我们转送到了这里。在接待室里强迫我们换上囚衣，我们怀着小学生那样的好奇心来完成这个仪式。我们互相观赏换上的灰色的裤子、灰色的粗呢料上衣和灰色的帽子。但是背上没有传统的囚衣标记。我们被允许保存自己的衬衣和鞋子。我们这乱糟糟的一大群人穿上了新装拥进了囚室……”

可以保存自己的鞋子对我来说具有不小的意义：在鞋掌里有一张精致的护照，而在高高的鞋跟里藏着金卢布。我们所有的人都被送到离北极圈还很远的奥勃多尔克耶村。从奥勃多尔斯克离铁路线有 1 500 俄里，离最近的电报局有 800 俄里，邮差每两星期来一次。每逢春天和秋天道路泥泞的季节，有一个半月到两个月的时间邮差根本不来。一路上采取了罕见的保安措施。彼得堡的押送队被认为是不可靠的。事情也确实如此，有一个在我们囚犯的车厢里站岗的上官，亮着出鞘的军刀，向我们朗诵新的革命诗歌。在邻近的一节车厢里有一排宪兵，他们每到一个车站就把我们的车厢包围起来。与此同时，监狱当局对我们却非常客气。革命和反革命的天平还在摇摆，还不知道谁胜谁负。一个押解军官先出示了自己长官的一道手谕，允许他不给我们戴手铐，而按法律是要带上的。1 月 11 日我在路上给妻子写了一封信：“如果说军官既客气又彬彬有礼，那押解队就更不用说了；几乎全队人都读过关于我们的审判案的报告，对我们极为同情……士兵们到最后一分钟还不知道他们押送的是谁和押送到什么地方去。士兵们根据突然把他们从莫斯科调到彼得堡的预防措施推断，是要他们把犯人们押解到施吕瑟尔堡去处决。在‘拘留所’的接待室里我发现，押解队员们非常激动，奇怪的殷勤，有种负罪的样子。进了车厢我才知道原因。当他们知道，在他们面前的是‘工人代表’，仅仅被判流放，他们很高兴。在押解队之上的宪兵队根本不进我们的车厢。他们担负外围的警戒：在车站上包围车厢，在打开

的门旁站岗,而主要的任务,看来是在监视押解队员们。”我们沿途发的信是由押解队员秘密投放到信箱的。

我们乘火车到秋明,再由秋明改乘马车。12名流放犯却派了52个押解士兵,还不包括队长、警官和警察。共用40辆雪橇来运载我们。从秋明经过托博尔斯克道路沿着鄂毕河伸展。我给妻子写道:“最近我们每天向北行进90至100俄里,也就是说几乎一个纬度。由于这种不间断的行进,文化(如果这里有文化可言)的落差就显得特别触目。我们每天向那寒冷和野蛮的王国迈下一个台阶。”

经过了几个接连不断的伤寒传染区,我们走了33天的路程于2月12日到达别辽佐沃,彼得大帝的战友缅施科夫公爵曾被流放此地。我们在别辽佐沃停留了2天。离奥勃多尔斯克还有500俄里左右。我们自由地散步,当局不怕我们从这儿逃跑。往回走只有一条路,沿着鄂毕河,顺着一条电报线路走;任何逃跑者都会被追上。在别辽佐沃有一位被流放的土地测量员罗什科夫斯基,我和他讨论了逃跑的问题。他告诉我,可以试试走直接朝西的一条路,沿着索西瓦河,往乌拉尔方向,乘鹿车到采矿场,再到波戈斯洛夫斯基矿场乘窄轨火车到库什瓦,在那里和彼尔姆铁路线相接。而从那里即可到彼尔姆、维亚特卡、沃洛格达、彼得堡、赫尔辛福斯……然而沿着索西瓦河没有道路。出了别辽佐沃立即满目荒凉。在绵延几千俄里内没有警察局,没有一个俄罗斯居民点,只能偶尔见到奥斯加克人的帐篷,电报根本不通,一路上连马匹也见不着,路上只通鹿车。警察不会来追,然而可能在荒原上迷失方向,冻死在雪地里。现在正当2月,是暴风雪的季节……

费特医生,一位老革命家,我们这伙流放犯中的一员,教我假装患坐骨神经痛,以便在别辽佐沃多留几天。我成功地完成拟定的计划的一小部分。大家知道,坐骨神经痛是无从检查的。把我送进了医院。医院里的制度非常自由。在我“好一点”的时候,我一连几个钟头外出蹓跹。医生鼓励我多走走。正像我已经说过的,在这种季节不必担心有人会 from 别辽佐沃逃跑。该作出决定了。我主张往西走:直奔乌拉尔。



罗什科夫斯基对当地一个绰号叫“山羊腿”的农民的建议很感兴趣。这个干瘦的办事谨慎的小个儿成了逃跑的组织者。他完全无私地活动着。他所扮演的角色败露后，受到严酷的折磨。十月革命后“山羊腿”并没有很快获悉，10年前他帮助逃跑的那个人正是我。直到1923年他才到莫斯科来找我，我们的会见是非常热烈的。我们送他一套红军的礼服，请他去看戏，送给他一架留声机和其他的礼物。这以后不久老人在自己遥远的北方去世了。

从别辽佐沃出发得坐鹿车。问题在于要找到一位向导，敢于在这种季节里走没有把握的路。“山羊腿”找到了一位泽梁人，他和大多数泽梁人一样是一个机灵的和经验丰富的人。“他会不会是酒鬼？”“怎么会不是呢？一个十足的酒鬼。然而他能流利地讲俄语，讲泽梁语和两种奥斯加克方言：上奥斯加克的和下奥斯加克的，这两种方言之间几乎没有相同之处。要找另一个这样的赶车人是找不到的：这是一个诡计多端的人。”就是这个诡计多端的人后来出卖了“山羊腿”。但是他成功地把我送走了。<sup>①</sup>

预定星期天的午夜出发。那天地方当局举办业余演出。我到充作剧院的军营里，并在那里遇到县警察局长。我对他说，我感到自己好多了，可以在最近到奥勃多尔斯克去了。这是个诈术，但很必要。

当钟楼里敲了12下，我偷偷地来到“山羊腿”的院子。雪橇已经准备好了。我躺在雪橇下，“山羊腿”给了我第二件皮袄，把结了冰的冰凉的干草盖在我身上，然后用绳子捆好，我们就上路了。不久干草上的冰融化了，冰凉的水不住地滴在我脸上。走了几俄里我们停下了。“山羊腿”把雪橇解开，我从干草里钻了出来。我的这位赶车人打了一个口哨，而回答的，咳，是几个人醉醺醺的声音。泽梁人醉倒了，而且还带了好几个朋友。这是一个坏的开端，但已经没有别的选择了。我带着自己不大的行李转乘到轻便的窄长雪橇上去。我穿了

<sup>①</sup> 在我的《1905年》一书中，逃跑这一章故意说得有点出入。那时说出真实情况就意味着引导沙皇警察局来追踪我的同谋。如今我也希望斯大林不要去迫害他们，况且，他们的罪行早已失去追究的意义。再说，我逃跑的最后阶段，列宁也帮助过我，下面将可以看到。——原注

两件皮袄——一件毛朝里,一件毛朝外,毛皮的袜子,毛皮的靴子,双层毛的帽子,还有双层毛的手套,总之,是全副奥斯加克人的冬天装备。在我的行李里有几瓶酒精,这是在雪原中的最可靠的交换物。

斯韦尔奇科夫在回忆录中说:“从别辽佐沃的消防瞭望台上可以看到周围至少一俄里内城里或城外白雪覆盖的地面上的任何活动。有充分理由认为,警察局会问消防队的值班员,这一夜是否有人从城里出去。罗什科夫斯基作了这样的安排,让一个居民在这个时间里把一车小牛肉沿托博尔斯克大道运送出去。这一行动,正如预计的,被发觉了,警察局两天后发现托洛茨基逃跑了,便首先去追运送小牛肉的车,结果又白白地失去了两天时间……”但我只是在许久以后才知道这件事。

我们沿索西瓦河行进。我的向导买的那几头鹿是从几百头鹿中挑选出来的。喝醉了的赶车人起初常常睡着,鹿车也常常停下来。灾祸威胁着我俩。最后连我推他,他都完全没有反应了。于是我从他头上摘下帽子,他的头发很快就结成霜,醉意这才开始消失。我们继续赶路。这是一次真正美好的旅行,白雪皑皑的荒原,云杉树,野兽出没的足迹。鹿儿奔跑得很起劲,舌头拖在一边,常常喘着气:呼哧 呼哧—呼哧—呼哧……道路变得狭窄起来,鹿儿紧靠成一堆,令人惊奇的是它们跑着却并不相互妨碍。神奇的造物,它们不饿也不疲劳。在我们出发之前它们已经一昼夜没吃了,而现在我们又快跑了一昼夜,它们还是没有吃东西。据赶车人说,它们现在才刚刚“来劲了”呢。它们跑得均匀,不知疲乏,每小时8至10俄里。鹿儿自己找食吃,在它们的脖子上系一块劈柴便把它们放走。它们嗅到积雪下有苔藓的地方,用蹄子刨出一个很深的洞,几乎把整个脑袋都伸进洞里去吃。我对这些动物的感情有如一个飞行员在几百米高的海洋上空对待飞机发动机的感情。三头鹿中有一头是主要的,领路的鹿腿瘸了。多么令人担心!必须把它换下来。我们寻找奥斯加克人停宿的地方。他们在这里很分散,彼此相隔几十俄里。我的向导根据觉察到的标志,找到了停宿点。他嗅到几俄里外的烟火味。我们为了更换鹿,丢失了一昼夜还多的时间。然而在清晨我却看到一

幅美丽图景：三个奥斯加克人用套索捕捉住了事先看准的、正在全速奔跑的几百头鹿中的几头。这些鹿是由几条猎狗把它们驱赶到猎人那儿去的。我们又重新时而在森林中奔跑，时而越过白雪覆盖的沼泽地，时而穿过被火烧过的大森林。我们在雪地上烧水，喝雪水煮的茶。我的向导认为还是喝酒好，但我监视着他，不让他喝过头。

道路看上去好像差不多，实际上千变万化。这从鹿身上就可看得出来。现在我们在旷野里行走；在桦树林和河道之间穿行。道路糟糕透了。风在我们眼前把留在雪橇后面的狭窄的痕迹掩盖起来。第三头鹿每分钟都踩在车辙上，它陷在雪地里，深达腹部，或更深一点，它拼命跳了几下，重新爬上道路，却挤了中间的那头鹿，又把领头的那头鹿撞到一边去。下一段路，被太阳烤暖的道路更为难走，雪橇前面的牵曳皮带两次断裂；每次停下来修理，滑木就冻在路上，要拉动雪橇就十分困难。经过头两次折腾，这几头鹿也明显地累了……但是夕阳西下，道路稍稍冻上，越来越好走了。正如赶车人所说的，道路松软但又不泥泞，那是最合适的。鹿儿轻松地拉着雪橇，几乎听不见蹄声。最后不得不把第三头鹿卸下来，把它拴在后面，因为鹿儿无事可干时会冲到一边去，会把雪橇给毁了。雪橇平稳地、无声地滑行，就像一只小船在镜面般的湖面上航行。在浓重的暮色中森林显得越加巨大。我根本看不见道路，几乎感觉不出雪橇在滑行，神奇的树木飞速地向我们驰来，灌木丛一掠而过，白雪覆盖的老树桩和亭亭玉立的小桦树在眼前飞逝。一切都显得非常神秘。呼哧—呼哧—呼哧—呼哧……在寂静的森林夜空回荡着鹿儿不断发出的均匀的喘息声。

旅行持续了一个星期。我们走了700公里，接近了乌拉尔。越来越经常地可以遇到大车队。我自称是从北极探险队来的托利男爵。我们在离乌拉尔不远处碰到一个从前在这个探险队服务的办事员，他知道队里的人员。他向我提了好几个问题，幸好他喝醉了。我靠着那瓶以防万一的罗姆酒，仓促地摆脱了困境。一切都平安无事。沿乌拉尔有一条马车道。现在我装作一名官员，和一名在辖区内巡视的消费税检查官同行，到达窄轨铁路。站上的宪兵漫不经心地看着我脱下奥斯加克人穿的皮袄。

乘上乌拉尔的专用线后,我的处境远远没有保障;在这条支线上,人们对每个“陌生人”都会注意,只要托博尔斯克发来电报,我在每一个站上都有可能被捕。一路上我提心吊胆。但当我一昼夜后来到达彼得姆铁路的舒适的车厢里时,我立刻感到,我逃跑成功了。列车经过不久前宪兵、武装看守和县警察局长如此郑重其事地接待过我们的那些车站。但现在我的旅程却朝另一个方向,别有一番感慨。在最初几分钟,在宽敞的、几乎是空荡荡的车厢里我还是觉得拥挤和闷气。于是我走到车厢的平台上,那里寒风习习,夜色朦胧,我情不自禁地大喊一声——这是欢乐和自由的呼喊!

我在最近一个车站发了一份电报,叫妻子到一个列车交会点的车站上来。她没有料到会打电报去,至少她没有料到会这么快去电报。这也没有什么可奇怪的。我们到别辽佐沃的旅程长达一个多月,彼得堡的一些报纸充满了关于我们向北行进报道。报道还在继续不断地奇来,大家都认为我正在赴奥勃多尔斯克的路上。整个回程我花了11天。很显然,在彼得堡郊外和我见面,妻子一定觉得是难以置信的。这反而更好,我们毕竟见面了。

娜·伊·谢多娃在回忆录中对此事是这么说的:“我是在彼得堡郊外的一个泰里约基的芬兰小镇收到电报的,我在那里孤身一人带着一个很小的儿子,收到电报时真是惊喜万状。就在那一天,我还收到列·达·途中寄来的一封长信,信中除了描写路途的情况外,还要求在动身去奥勃多尔斯克时,给他带去一些书和北方所需要的东西。这么说来,他似乎立即改变了主意,并通过一条不可思议的途径插翅飞回了,甚至决定在火车交会的那个站上与我见面。但令人奇怪的是电文中把站名给漏了。第二天早晨我去彼得堡,想根据旅行指南来查明我该买到哪个站的票。我不敢去问讯,于是在没有弄清站名的情况下上了路。我买了一张到维亚特卡的票,晚上动身。车厢里全是从彼得堡回乡的地主,他们是从食品商店买了东西回自己的庄园去过谢肉节的。谈的全是发面煎饼、鱼子酱、风干的咸鱼脊肉、葡萄酒之类的。听这种谈话实在难以忍受,我为即将到来的相逢激动,又担心发生意外……不过我内心还是相信会见面的。我好不容

易等到黎明，前方来的列车应当停靠在萨米诺车站；我是在路上才听说这个站名的，并且一辈子都忘不了。我们的列车和迎面开来的列车都停下来了。我奔到站上——谁也没有。我跳上迎面开来的那列火车，焦急不安地跑过一节节车厢，没有，还是没有——可是突然在一个包厢里我看到列·达·的一件皮大衣——就是说他在这儿，在这儿，可是在哪里呢？我又从车厢里跳下去，正好碰上从站房奔来的列·达·，他在找我。由于电报失误，他很恼火，想马上去交涉。我好不容易把他劝住了。他打电报给我时，当然，他也想到，来接他的可能不是我而是宪兵，但他认为，和我在一起在彼得堡将会方便些，于是就寄希望于幸福之尾了。我们坐在包厢里一起继续旅程。我很惊奇列·达·举止自如，无拘无束，在车厢里和车站上都是大声地谈话。我希望他做得不要太显眼，藏得好些；要知道，因逃跑他要被处苦役的。而他却抛头露面，并说这是最可靠的保护办法。”

我们从车站直接去炮兵学校，到我们忠实可靠的朋友们那里去。我从没见过像利特肯斯医生一家那样吃惊的。我像个幽灵站在一间大餐厅里，大家都瞧着我，连气都不喘一下。我们互相吻过以后，大家还是感到惊奇，觉得不可思议。最后他们终于相信，这确实是我。而我现在感觉到了，这是个幸福的时刻。但危险还没有过去。医生首先提醒这一点。从某种意义上说，危险现在才开始。当然，别辽佐沃已经来电报告我失踪了。由于我在工人代表苏维埃工作，彼得堡认识我的人太多了。我决定和妻子一起迁到芬兰去，在那里革命争取到的自由比彼得堡保持的时间要长久一些。最危险的地方是芬兰车站<sup>①</sup>。在列车离站之前有几个检查列车的宪兵军官走进我们的车厢。妻子面对着门坐着，我从她的眼睛看出，我们陷入多么危险的境地。当时我们的精神紧张到了极点。宪兵们漫不经心地看了我们一下，就走过去了。这是他们所能做的最大的好事了。

列宁和马尔托夫早已离开彼得堡，住在芬兰了。在1906年4月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上实现的各派联合已经重新发生深刻的裂痕。

<sup>①</sup> 芬兰车站是彼得堡的一个火车站名。——译注

革命的低潮在继续。孟什维克为1905年的疯狂行为表示忏悔。布尔什维克没有什么可忏悔的。我拜访了列宁和马尔托夫,他们住在相邻的村镇上。马尔托夫的房间和往常一样乱七八糟。在角落里堆着一人高的报纸。在谈话时马尔托夫不时地钻到这堆报纸里去拿出他所需要的文章来。桌子上放着手稿,上面沾着烟灰。没有擦拭的夹鼻眼镜挂在瘦削的鼻梁上。和往常一样,马尔托夫有许多很敏捷、很出色的思想。他不知道着手干什么。列宁的房间和通常一样,井井有条。列宁不吸烟。需要的报纸都打上记号放在手边。在这张朴实无华但又不平常的脸上充满着坚不可摧的,尽管是期待着的信心。还不清楚,这是彻底的革命低潮,还是新的高潮之前的短暂的停顿。但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同样需要和怀疑主义者进行斗争,需要对1905年的经验进行理论上的检验,需要为新的高潮和下一次革命培养干部。列宁在谈话中对我在监狱中的工作表示赞许,但责备我没有作出必要的组织上的结论,也就是没有转到布尔什维克方面来。他是对的。在告别时他给了我赫尔辛福斯的地址,这对我是异常重要的。列宁告诉我的几个朋友帮助我和我全家在赫尔辛福斯郊外的奥格尔比悄悄地安顿下来,那个地方在我们之后列宁也曾经住过。赫尔辛福斯的警察局长是一位积极分子,也就是说是一位革命的芬兰民族主义者。他答应如有来自彼得堡方面的危险情况便向我通报。在奥格尔比我和妻子以及我坐牢时诞生的小儿子一共住了几个星期。在这里,在幽居中,我写了《往返》一书,描写了我的旅行经历,我用得到的稿酬取道斯德哥尔摩出国。妻子暂时留在俄国。一位年轻的芬兰女积极分子护送我到边境。在那个时期这都是朋友。1917年他们成了法西斯分子和十月革命的不共戴天的敌人。

登上斯堪的那维亚的一艘轮船,我开始了新的长达10年的流亡生活。

## 第十六章

# 第二次流亡和德国社会主义

1907年党的代表大会在伦敦社会主义教堂举行。这是一次人数很多，会期很长，激烈而又混乱的大会。在彼得堡第二届杜马还存在。革命走向低潮，但对它的兴趣甚至在英国政界也还是非常的浓厚。一些著名的自由主义者把代表大会的有名望的代表请到自己家里，介绍给客人。不过，已开始的革命低潮已经在党的经费拮据上表现出来。不仅回程的旅费没着落，甚至把会议开完的经费都不够。当这一消息在教堂拱顶下传开来时，打断了关于武装起义的讨论，代表们困惑不安地面面相觑。怎么办？难道留在伦敦的教堂里不成？不过出路找到了，而且是出人意料的。一位英国自由主义者同意借钱给俄国革命，记得是三千英镑。但他要求全体代表在革命的借条上签字。这个英国人手里掌握了一份用俄国各民族文字写的几百个人的签名文件。然而清偿这张借条却不得不等很久。在反动年代和战争年代党根本无法考虑偿还这一笔钱。直到苏维埃政府才把伦敦代表大会的那张借条赎了回来。革命是会履行自己的责任的，尽管通常会晚一些。

在代表大会的最初几天，一位身材瘦高、圆脸、高颧骨的戴一顶圆形帽的人，在教堂的回廊里把我叫住。“我是您的仰慕者。”他以一种有礼貌的玩笑口吻说。“仰慕者？”我困惑不解地问。原来，这是指我在狱中写的那些政治性抨击文章。我的这位交谈者就是马克西姆·高尔基。我是第一次亲眼见到他。“我想，不用说我是您的仰慕者。”我以我的敬意来回答他的问好。在那段时期，高尔基接近布尔

什维克。著名的女演员安德烈耶娃和他在一起。我们一起游览了伦敦。“知道吗，”高尔基带着惊讶的神情指着安德烈耶娃说：“她能说各国语言。”高尔基本人只会讲俄语，但讲得非常好。当一个乞丐跟在我们后面把马车上的一扇小门关上时，高尔基恳求说：“给他几个便士吧。”安德烈耶娃回答说：“给了，阿廖申卡，给了。”

在伦敦代表大会上我和罗莎·卢森堡很接近，我在1904年就认识她了。她身材不高，很柔弱，甚至有点病态，有一张气度高贵的脸，一双美丽的眼睛，闪烁着智慧的光芒，她那大无畏的性格和思想令人折服。她那紧张、准确、毫不留情的作风，永远是她的英雄气概的反映。她的性格丰富多彩。革命及其激情，人及其艺术，大自然和它的小鸟、青草都能引起她那有无数琴弦的心灵发出共鸣。她写信给路易·考茨基说，“我需要有个什么人，他相信我只是出于误会才在世界历史的漩涡中旋转的，其实我是为牧鹅而生的。”我和罗莎没有什么密切的私人关系，我们见面的机会太少了。我只是在一旁欣赏她。也许那时我对她的估价还不够高……在所谓不断革命的问题上卢森堡坚持我所坚持的那个原则立场。在回廊里我和列宁在这个题目上产生了半开玩笑的争论。代表们把我们紧紧地围成一圈。列宁谈到罗莎时说，“这一切都是由于她的俄语讲得不太好的缘故。”我回答说：“但她的马克思语言却讲得很好。”代表们都笑了，我们也和他们一起笑了。

在代表大会上我有机会再次阐述我的关于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革命中的作用，包括它对农民态度问题上的观点。列宁在结束语中就这一问题说道：“托洛茨基赞成在当前革命中，无产阶级和农民的利益是一致的观点。”因此，“这里在对待资产阶级政党的态度问题的基本上是一致的。”那种说我在1905年仿佛“忽视了”农民，多么像是一则神话！还要补充一点，1907年我在伦敦所作的纲领性讲话，我认为在今天也是完全正确的，十月革命之后，这一讲话曾作为布尔什维克对待农民和资产阶级态度的典范而一版再版。

我从伦敦到柏林，去同要从彼得堡来的妻子会合。这时帕尔乌斯已逃出西伯利亚。他在德累斯顿社会民主党“卡登”出版社安排出版了我的《往返》一书。我为论述我逃跑的这本小册子写了一篇论革



命本身的序言。在几个月的时间里又把这篇序言发展成《革命中的俄国》一书。我们三人——我妻子、帕尔乌斯和我徒步游览萨克森瑞士山。那是夏末，非常美好的季节，早晨很凉爽，我们喝牛奶，呼吸山上的空气。我和妻子想从没有道路的地方下到谷地去而差点送了命。我们走出去到了波希米亚一个叫希尔施贝格的小城镇，这是小官吏的别墅区，我们在那里住了几个星期。当钱花得差不多时——这是周期性的事，帕尔乌斯或我便赶忙给社会民主党的报刊写文章。在希尔施贝格，我为彼得堡的布尔什维克出版社写了一本关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小书。我在书中再次（第一次是在1905年）说出了这样一个思想，即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庞大机器在资产阶级社会的危急时刻会成为维护旧秩序的主要保守力量。然而，在那个时候，我自己也没有预见到，这一理论假设会在多大程度上得到证实。我们离开希尔施贝格各奔东西。我到斯图加特去参加代表大会，妻子回俄国去接孩子，帕尔乌斯回德国去。

在国际代表大会上还感觉得到俄国1905年革命的气息。大家都向左派看齐，但对革命的方法已明显地感到失望。对俄国革命者还感兴趣，不过其中已经有一种轻微的讽刺色彩：似乎在说，又回到我们这儿来了。1905年2月我路过维也纳回俄国时，我曾问维克多·阿德勒，他对社会民主党参加未来的临时政府是怎么想的。阿德勒以阿德勒的方式来回答我：你们对现存的政府还有太多的事情要做，不必为未来的政府伤脑筋了。在斯图加特我对阿德勒提起了这些话。“我承认，您比我预料的更加接近临时政府。”一般说，阿德勒对我非常好，因为奥地利的普选权实际上是彼得堡工人代表苏维埃争取来的。

英国代表，1902年曾陪我参观英国博物馆的奎尔奇<sup>①</sup>，在斯图加特代表大会上不礼貌地把外交会议称之为强盗会议。这使毕洛公爵<sup>②</sup>

① 哈·奎尔奇(1858—1913年)——英国社会民主联盟和英国社会党的领导人，社会党国际局成员。——译注

② 伯·毕洛(1849—1929年)——1900至1909年任德国和普鲁士首相。——译注

感到不快。符腾堡政府在柏林的压力下驱逐了奎尔奇。倍倍尔马上感到不自在。党没有下决心采取什么措施来反对驱逐,甚至没有举行抗议示威。国际代表大会像是一间教室:一个不礼貌的学生被赶出了教室,其他的人则默不作声。在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数众多的党员背后,可以明显感觉到软弱无力的阴影。

10月(1907年)我已经在维也纳了。不久,妻子带着孩子也来了。我们住在郊外的许特多尔弗,等待着新的革命浪潮的到来。我们等了好久。7年之后,不是革命的浪潮,而是完全另一种浪潮,一种使欧洲大地沉浸在血泊中的浪潮,把我们冲出了维也纳。那时所有其他的流亡者都聚居在瑞士和巴黎,为什么我们要选择维也纳呢?在这一段时期我更接近德国的政治生活。由于政治原因不能住在柏林,我们便留在维也纳了。但是在这7年的时间里,比起奥地利来我更多地注视着德国的生活。奥地利的生活有如小松鼠蹬轮子似地忙碌。

我是从1902年起认识奥地利党的公认领袖维克多·阿德勒的。现在该是认识他周围的人和整个党的时候了。

我认识希法亭<sup>①</sup>是1907年夏,在考茨基的家里。那时,希法亭处于其革命性的最高点,但这并不妨碍他仇视罗莎·卢森堡和蔑视卡尔·李卜克内西。但是那时对于俄国,他像其他许多人一样,准备接受最极端的结论。他赞扬我的一些文章——《新时代》在我逃亡国外之前就已经把这些文章从俄文期刊上翻译过去了。而令我感到突然的是,初次相识他就建议我以“你”相称。由于这一原因我们的关系表面上很亲近。但这种亲近没有任何道义和政治基础。

希法亭在那个时期非常看不起消极被动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并拿奥地利的积极性与之相比。然而这一批评具有狭隘的性质。他的官方职务只是为德国党服务的文字工作方面的官员,仅此而已。希法亭来到维也纳时常来找我,晚上带我去咖啡馆会见他的奥地利马

<sup>①</sup> 鲁·希法亭(1877-1941年)——奥地利和德国社会民主党及第二国际的领袖之一,曾任魏玛共和国财政部长,《金融资本》一书的作者。——译注

克思主义朋友们。我偶尔到柏林去时也拜访过希法亭。我和他一起在柏林的一家咖啡馆会见过麦克唐纳<sup>①</sup>。爱德华·伯恩斯坦担任翻译。希法亭提了一些问题，麦克唐纳回答。现在无论是问题还是回答我都记不得了。因为都是些老生常谈，没有什么值得注意的。我在心里问自己：这三个人中间谁离我所习惯理解的那种社会主义更远？我难以回答。

在布列斯特和谈时我收到希法亭一封信。我并不期待有什么重要的东西，但我还是在不无兴趣地拆开了信封——这是十月变革后第一次直接从西方社会党传来的声音。那么讲些什么呢？在这封信中希法亭要求我释放一名大家都知道的维也纳“博士”亲属中的一名俘虏。关于革命在信中只字未提。信上还是以“你”相称。我很了解希法亭这个人，我觉得，我对他并未有过什么幻想。可我还是不相信自己的眼睛。记得列宁曾兴奋地问我：“据说，您收到希法亭的信了？”“收到了。”“嗯，说些什么？”“为一个被俘的亲戚说情。”“关于革命说了什么？”“关于革命只字未提。”“只字未提？”“只字未提！”“不可能！”列宁睁大眼睛盯着我说。我比列宁优越，我已经懂得，十月革命和布列斯特悲剧，对希法亭来说只是为亲戚求情的一个机会。我这里就不向读者复述列宁解开他的困惑所说的那两三句骂人话吧！

希法亭首先把我介绍给他的维也纳朋友：奥托·鲍威尔<sup>②</sup>、麦克斯·阿德勒<sup>③</sup>和卡尔·伦纳<sup>④</sup>。这是些非常有教养的人物，他们在许多领域比我知道得多。我全神贯注地，几乎可以说是满怀敬意地聆听他们在“中央”咖啡馆的第一次谈话。但很快，我的全神贯注中

① 詹·拉·麦克唐纳(1866—1937年)——英国工党创始人和领袖，1924年、1929年至1931年和1931年至1935年任英国首相。——译注

② 奥托·鲍威尔(1882—1938年)——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的领导人之一，第二国际和社会主义工人国际的组织者和领袖之一，1918—1919年曾任奥地利外长，1934年起流亡国外，晚年修正了自己的一些改良主义观点。——译注

③ 麦·阿德勒(1873—1937年)——奥地利哲学家，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译注

④ 卡·伦纳(1870—1950年)——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的领袖之一，1918—1920年任奥地利总理，1945—1950年任奥地利总统。——译注

又夹杂进困惑。这些人不是革命者。不仅如此，他们是一种与革命者截然相反的那一类人。这表现在所有方面：表现在他们对问题的态度上，他们的政治见解和心理评价上，表现在他们的自满上（不是自信而是自满），我甚至在他们的嗓音里感到有一种市侩的腔调。

我惊奇地发现，这些有教养的马克思主义者一旦着手处理重大的政治问题，特别是在政治中发生革命转折的关头，就完全不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了。首先，我在伦纳身上确信这一点。我们在咖啡馆呆得很晚，通往我住的许特多尔弗的电车已经没有了，于是伦纳建议我到他那里去过夜。那时这位有教养有才智的哈布斯堡王朝的官员还远没有想到奥匈的不幸命运（他是这个帝国的历史辩护人）会使他在10年后成为奥地利共和国的总理。在从咖啡馆出来的路上，我们谈到了关于俄国发展的前景，那时在俄国反革命已经站稳脚跟。伦纳以一个有教养的外国人那种彬彬有礼，然而却是冷漠的态度来谈论这些问题。而他对当时奥地利的贝克男爵内阁却有兴趣得多。他对俄国的观点实质上可以归结为，1907年6月3日国家政变后斯托雷平宪法中所反映的地主和资产阶级的联盟是完全适应国家生产力的发展的。因此这个联盟有一切可能维持下去。我反驳他说，依我看，地主和资产阶级的执政联盟正在为第二次革命作准备，这次革命很有可能使俄国无产阶级执掌政权。我记得夜晚路灯下伦纳那迅速转动的、迷惑不解的和宽厚的目光。他大概认为我的预言是无知的妄想，就像一位奥地利神秘主义者的启示录式的预言那样，这位神秘主义者在斯图加特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前几个月就预言未来世界革命发生的日期和钟点。“您是怎么想的吗？”伦纳问，“当然，也许我不太了解俄国的条件。”他非常有礼貌地补充了一句。我们的脚下没有继续谈话下去的共同基础。我开始明白，这个人离革命的辩证法之远，犹如最保守的埃及法老。

以后只是加深了这些最初的印象。这些人懂得很多，也能（在政治上墨守成规的范围内）写一些不错的马克思主义文章。但是，这是与我格格不入的人。我的交往和观察的范围越扩大，我越坚信这一点。比起文章和讲话来，他们在无拘无束的谈话中显得更为坦率，有

时暴露出赤裸裸的沙文主义，有时是小私有者的吹牛说大话，有时则是在警察面前表现出的诚惶诚恐的战栗，有时又是对女人的下流行为。我在心里惊讶地叹道：“瞧，这样的革命者！”我指的不是工人，当然，他们也会有不少小市民的特点，只不过更加朴实和天真而已。不，我所遇见的是战前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的精华，是议员、作家和记者。通过这些会见我慢慢懂得了，同一个人的心理能够容纳多么不同的种种因素，而且从消极地接受体系的某一部分到整个体系在心理上得到体现，到以体系的精神重新教育自己有多么遥远。马克思主义者的心理类型只能在社会震荡、同传统和习惯实行革命决裂的时代形成。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常常暴露出自己是市侩，他们像有些人研究法律那样，研究马克思的这一部分或那一部分理论，靠《资本论》过活。在这等级森严、忙忙碌碌和图谋虚荣的古老的帝国的维也纳，马克思主义者院士们甜滋滋地相互称呼为“博士先生”。工人们则常常称院士们为“博士先生同志”。在维也纳的7年中，我一次也没有与这些上层中的任何人推心置腹地交谈过，尽管我是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党员，出席这个党的会议，参加它的游行示威，为它的出版物写稿，有时还用德语作简短的报告。我与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们是格格不入的，与此同时，在会议上或五一示威时却不难与社会民主党的工人们找到共同的语言。

在这种条件下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通信集是最需要、最常读的一本书，它不仅可以对我的观点，而且也可以对我的整个世界观进行最大的和最可靠的检验。维也纳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们使用了我也使用的那些公式。但只要把这些公式中任何一个公式围绕轴心转动5度，那么我们会赋予同一个概念以全然不同的内容。我们的一致是暂时的，表面的和虚假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通信对我来说不只是理论上的发现，而且是心理上的启示。Toutes proportions gardées(在相同的条件下)，在每一页都使我确信，有一种直接的心理亲和性把我和这两位联系在一起。他们待人的态度我也感到很亲切。我猜得出他们没有说出来的话，分享他们的欢乐，也和他们共愤怒，同憎恨。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地地道道的革命家。他们丝毫没有

宗派主义或禁欲主义。他们俩，特别是恩格斯在任何时候都可以对自己说，人的一切对他们都不是格格不入的。但深入到骨髓的革命观使他们总是能够超脱命运的偶然性和人为的事务。吹毛求疵不仅和他们不相容，而且和他们的存在也是不相容的。低级鄙俗的东西同他们不沾边。他们的评论，他们的同情，他们的玩笑，甚至是最平常的玩笑，也总是充满了高尚的气度，犹如一股高山上的清新空气。他们可以对一个人做出致命的评论，但他们决不造谣中伤。他们可以严厉无情，但决不背信弃义。对于表面的显赫、封号、官职和称号，他们不屑一顾。他们身上被庸人看作贵族派头的东西，实际上只是他们的革命的优秀品质。其主要特点是在任何时候，任何条件下不依靠官方社会舆论的完全的有机的独立性。读他们的通信，我感到比读他们的著作更加清楚一点：把我和马克思—恩格斯的世界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东西，正是使我和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不可调和地对立起来的東西。

这些人以现实主义和有办事能力而自吹自擂。但就是在这方面他们也是缺乏足够的力量。1907年党为了扩大收入，想开设一家自己办的面包厂。这是最拙劣的冒险，在原则上是危险的，在实践中是不可靠的。我从一开始就反对这种想法，但在维也纳马克思主义者那里遇到的只是充满优越感的故作大度的微笑。差不多20年以后，经过各种各样的挫折，不得不丢人地把自己那亏损的企业转让给私人。为了平息工人对无端遭受这么大损失的不满，奥托·鲍威尔在证明必须放弃这家工厂时，事后引证了当初办厂时对我提过的解释，为什么他没有看到我看到的東西，为什么他没有听从我的警告，这警告决非个人洞察力的产物。我不是从粮食市场情况出发，也不是从党员群众的境况出发，而是根据资本主义社会里无产阶级政党的地位提出这一警告的。这似乎是死守教条，但却是最现实的准则。我的警告得到证实只是意味着马克思主义的方法优于它的奥地利赝品。

维克多·阿德勒在各方面都高于他的同事们。但是他早已是个怀疑论者。他的战士气质都消磨在为一些鸡毛蒜皮小事的奥地利式

的忙碌之中。看不到前景，阿德勒有时便示威性地转过身去不理它。“预言家的职业是一个徒劳无功的职业，尤其是在奥地利。”这是阿德勒讲话中的老生常谈。谈到在斯图加特代表大会的回廊里所说的上述奥地利的预言时，他说，“不管怎样，我个人倒乐意听那些从启示录中得来的政治预言，而不喜欢听根据唯物主义历史观作出的政治预言。”自然，这是开玩笑。但不仅仅是玩笑。正是在这个对我来说极为重要的问题上，我同阿德勒处于截然对立的地位：没有广泛的历史预测，我认为不仅是政治活动，而且连整个精神生活都是不可想象的。维克多·阿德勒成了一个怀疑论者，由于这一缘故，他便容忍一切，适应一切，特别是对腐蚀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民族主义。

我公开反对奥地利—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沙文主义后，我和党的上层关系就越加恶化了。这发生在1909年。在和巴尔干，特别是和塞尔维亚社会党人会见，其中包括和德米特里·图措维奇（后来此人在巴尔干战争中作为一名军官被击毙）会见时，我不止一次地听到愤怒的抱怨，说所有塞尔维亚的资产阶级报刊都幸灾乐祸地援引《工人报》上攻击塞尔维亚人的沙文主义言论，以此证明国际工人的团结不过是虚假的神话。我给《新时代》写了一篇非常谨慎和有节制的反对《工人报》沙文主义的文章。考茨基经过犹豫发表了这篇文章。一位与我交谊很深的俄国老侨民С. И. 克利亚契科告诉我，党的领导层对我极为愤慨。“他竟敢这么做！”……奥托·鲍威尔和奥地利其他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在私下的谈话中承认，国际部编辑莱特纳尔走得太远了。他们这是反映了阿德勒本人的意见，阿德勒容忍极端沙文主义，但又不表赞许。不久以后的一个星期六，奥托·鲍威尔来到咖啡馆，走到我和克利亚契科坐的那张桌子旁，对我进行严厉的申斥。我承认，在他那倾盆大雨似的训词面前我简直不知所措了。使我震惊的与其说是鲍威尔教训人的口气，不如说是他摆出的那套理由。“莱特纳尔的文章有什么意义？”他以一种滑稽可笑的傲慢样子说。“对奥匈来说不存在对外政策。没有一个工人会去读这种文章。它毫无意义。”……我听着，眼睛睁得大大的。这些人原来不仅不相信革命，而且也不相信会发生战争。他们在五一宣言上写了战争和革

命,但是从来也没有认真看待过,而且他们完全没有发现,在他们如此忙碌的蚂蚁堆上面,历史已经拾起一只巨大的军靴准备往下踩了。6年以后他们才懂得,对于奥匈来说,外交政策也是存在的。从战争一开始他们自己就讲起莱特纳尔以及与他那一类的沙文主义者教给他们的最无耻的语言。

在柏林则是另一种精神状态,实质上可能要好一些,不过是另一种的。那里几乎感觉不到可笑的维也纳院士们的官气。关系简单一些。民族主义也少些,至少它没有机会像多种族的奥地利那样经常和尖锐地表现出来。民族感情到时候就仿佛溶化在党的自豪感之中:这是最强大的社会民主党,第二国际的第一小提琴手!

对我们俄国人来说,德国社会民主党是母亲、导师和活的榜样。我们在远处把它理想化了。我们怀着景仰的心情提到倍倍尔和考茨基的名字。尽管上面提到过,对德国社会民主党我有一些令人不安的理论上的预感,但在那个时候我无疑还是倾倒在它的面前的。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以下事实造成的:我住在维也纳,常常到柏林去,对两个社会民主党的首都进行了比较,我自慰地对白己说:不,柏林不是维也纳。

在柏林,我曾参加过一两次左派的星期聚会。这种聚会是每星期五在“金色莱茵”餐厅举行,其主要人物是弗兰茨·梅林。卡尔·李卜克内西也常来,不过他总是迟到早退。第一次是希法亭领我去的。那时他还自认为左派,尽管他那时仇视罗莎·卢森堡的程度已同达申斯基在奥地利培植起来的那种仇视情绪一样了。这些谈话在我记忆里没有留下什么重大印象。梅林的脸颊抽搐了一下(他有抽搐病),讥讽地问我,他的“不朽作品”有哪些俄译本?在谈话中希法亭提到德国的左派时,把他们当作革命者。梅林打断他说:“我们算什么革命者,他们才是革命者。”说着他朝我点点头。我对梅林了解得太少了,我常遇到的那些庸人以嘲笑的态度来看待俄国革命,因此我不知道,梅林是开玩笑呢还是认真地说的。但他是认真地说的,他用以后的生活证明了这一点。

我第一次见到考茨基是1907年。是帕尔乌斯领我去见他的。



当我登上弗里登瑞——幢洁净的小房子的楼梯时，我感到激动。这位白皙、快活的小老头，长着一对明亮的蓝眼睛，用俄语问候我说“您好”。这加上我在他书中所了解的考茨基，形成了一个非常有魅力的形象。他的不慌不忙，从容自若特别博得我的好感，后来我明白了，这是那时他的无可争辩的威望以及由此产生的内心的平静造成的。敌人把考茨基叫做第二国际的“爸爸”。朋友们也常常这样尊称他，不过是以亲热的口吻说的。考茨基的母亲是写倾向性小说的女作家，她把这些小说献给“自己的儿子和自己的导师”，在她 75 岁生日时收到了意大利社会主义者的祝贺，把她叫做 *alla mamma del papa*（爸爸的妈妈）。

考茨基认为自己的主要理论使命是调和改良和革命。但他的思想是在改良时代形成的。对他来说现实仅仅是改良。革命是模糊的历史前景。考茨基把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现成的体系接受下来，像一位教师那样把它通俗化。他无法驾驭重大事件。从 1905 年革命起他就开始走下坡路了。我和考茨基个人之间很少交谈。他的头脑死板，态度冷漠，缺乏机智，不善于揭示人的心理，所作的评价公式化，开玩笑也平淡无味。由于这些原因，考茨基作为一个演说家是极为差劲的。

和罗莎·卢森堡关系融洽的时期正是考茨基精神创作中的最佳时期。但在 1905 年革命之后不久，他们之间的关系就已经出现冷淡的最初征兆。考茨基非常同情俄国革命，并从远处对它作了不坏的评论。但他本能地反对把革命方法用于德国的大地。在去特雷普托公园参加街头游行之前，我在考茨基的住所遇到罗莎同考茨基进行激烈争论。尽管他们仍以“你”相称，并用亲密的口吻说话，但在罗莎的答话中明显地可以听得出克制的愤怒，而在考茨基的答话中则有一种用慌乱的笑话来加以掩饰的内心的窘迫感。我们一起去参加游行——罗莎、考茨基、他的妻子、希法亭、已故的古斯塔夫·埃克斯泰因<sup>①</sup>和我。路上也展开尖锐的交锋；考茨基想只当个观众，而罗莎·

① 古·埃克斯泰因(1875—1916年)——德国社会民主党中派主义理论家。——译注

卢森堡则是参加者。

他们之间的对抗在1910年争取普鲁士的选举权问题上公开化了。考茨基当时发挥了消耗敌人的战略哲学，以抗衡打倒敌人的战略。这是两种不可调和的倾向。考茨基的路线是越来越适应现存制度的路线。在这种情况下“消耗”的不是资产阶级社会，而是工人阶级的革命理想。所有的庸人，所有的官吏，所有争名逐利的人都站在考茨基一边，而考茨基则为他们编织思想的外套来掩盖他们的本来面目。

战争爆发了，政治上的消耗战略被挖掘战壕的战略排挤了。考茨基像过去适应和平一样去适应战争。而罗莎则表明了她是怎样忠于自己的思想的……

我记得在考茨基住所里为累德堡<sup>①</sup>庆祝60岁寿辰的情景。在10来个客人中包括奥古斯特·倍倍尔，他那时已经年逾70了。这是党的鼎盛时期，内部完全一致，老人们回顾以往的成就，充满信心地展望未来。寿星累德堡吃饭时画了一幅滑稽可笑的漫画。在这小型的庆祝会上，我认识了倍倍尔和他的妻子尤莉娅。在座的人包括考茨基都在聆听老奥古斯特的每一句话。我更不用说了。

倍倍尔个人是新阶级自下而上缓慢而又顽强的运动的化身。这个干瘦的老人似乎天生具有认准一个目标之后就锲而不舍的顽强意志。倍倍尔在自己的思维中，在动听的演说中，在文章和书里，决不把自己的精力耗费在与直接为实践任务服务无关的事情上。他的政治热情之特殊处也就在于此。他代表的是没有多少业余时间从事学习的阶级，因而珍惜每一分钟，贪婪地吸收十分必需的知识。一个多么无与伦比的人的形象！倍倍尔死于布加勒斯特和会期间，在巴尔干战争与世界大战之间。我在罗马尼亚的普洛埃什塔赫的火车站上获悉这个消息。这是难以置信的：“倍倍尔去世了，社会民主党怎么办呢？”我立即想起累德堡关于德国党内部生活的話：20%的是激进分

<sup>①</sup> 格·累德堡(1850—1947年)：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德国独立民主党创建者和领袖之一。1900至1918年为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帝国国会议员。——译注

子，30%的是机会主义分子，其余都跟倍倍尔走。

倍倍尔选中哈阿兹<sup>①</sup>为接班人。吸引这位老人的无疑是哈阿兹的理想主义，不是广阔的和革命的理想主义，这是哈阿兹所没有的，而是那种较为狭隘的、较为偏重个人的和日常生活的理想主义，就像他为了党的利益而准备放弃在柯尼斯堡当收入丰厚的律师那样。倍倍尔甚至在党的代表大会（大概在耶拿召开的）上的讲话中也提到这件算不得什么英勇的自我牺牲的事情，并坚持推荐哈阿兹担任党的第二主席，这使俄国的革命者大惑不解。我对哈阿兹相当了解。在一次党代表大会之后我们一起游览了德国的一些地方，一起参观了纽伦堡。在私人关系方面哈阿兹很随和殷勤，而在政治上出于其本性始终是一个老老实实的庸人，一个没有革命气质和理论眼光的外省的民主派。在哲学领域里他羞羞答答地自称为康德的信徒。无论局势多么危急，他总不愿当机立断，而是采取折中观望的态度。后来，独立党人选他为领袖，那是毫不奇怪的。

卡尔·李卜克内西完全是另一种类型的人。我认识他许多年了，不过总要相隔很长一段时间才见一次面。李卜克内西在柏林的住所是俄国侨民的大本营。在需要大声疾呼抗议德国警察为沙皇效劳时，我们首先去找李卜克内西，于是他就四处奔波。李卜克内西是一位知识渊博的马克思主义者，但不是理论家。这是个实干家。他天性易于冲动，充满热情，富有自我牺牲精神，具有政治直觉、对群众和局势的洞察力和无比勇敢的首创精神。这是一位革命家。正因为如此，他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大家庭内总被看成是半个外来人，这个党充满着一种官气十足的从容不迫，而且经常准备退却。我看到有多少庸人和鄙俗之徒用嘲讽的眼光从上到下打量着李卜克内西。

1911年9月初在耶拿召开的社会民主党的代表大会上，根据李卜克内西的倡议，要我做一个关于沙皇政府对芬兰使用暴力的报告。可是在我发言之前收到了一份关于斯托雷平遇刺的电报。倍倍尔马

① 胡·哈阿兹(1863—1919年)——1911至1917年任德国社会民主党主席之一。中派分子。1918年11月革命期间参加人民代表委员会。 译注

上来问我：“谋刺意味着什么？哪一个党要对此负责？我的发言是否会不恰当地招来德国警察局的注意？”我想起奎尔奇在斯图加特的遭遇，便小心翼翼地问老人：“您担心我的发言会引起某种麻烦吗？”“是的”，倍倍尔回答，“坦白地说，我认为您还是不发言为好。”“在这种情况下，根本就轮不上我发言了。”倍倍尔轻松地叹了口气。一分钟后李卜克内西不安地跑来找我。“他们建议您不要发言了，是吗？您同意了？”“我怎么能不同意呢？”我解释说，“要知道，这里的主人是倍倍尔，不是我。”李卜克内西利用发言发泄了自己的愤慨，他不顾主席团的警告无情地抨击沙皇政府，而主席团是不愿意为侮辱一国君主而使情况复杂化的。以后的全部发展都建立在这些小小的插曲上……

※ ※ ※

当捷克的一些工会组织起而反对德国领导时，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在国际主义名义下捏造理由反对工会的分裂。在哥本哈根召开的代表大会上普列汉诺夫就这个问题作了报告。他和所有的俄国人一样，完全无保留地支持德国人的立场，反对捷克人。是阿德勒老人推荐普列汉诺夫的，因为在这种微妙的事情上让一个俄国人作为反对斯拉夫沙文主义的主要控诉人，要方便一些。我，自然，和像涅梅茨<sup>①</sup>、索古普或什麦拉尔<sup>②</sup>这样一些人的可怜的民族狭隘性没有丝毫共同之处，他们坚持要我相信捷克人是对的。但是与此同时我也很了解奥地利工人运动的内部生活，所以我也不会把所有的，哪怕是主要的责任归咎于捷克人。许多事实说明，就大多数党员而言，捷克党比奥地利德国党激进一些，捷克工人群众对维也纳的机会主义领导的正当不满被涅麦茨一类的捷克沙文主义分子巧妙地利用了。

在从维也纳赴哥本哈根代表大会的路上我在一个换车的火车站上意外地与从巴黎来的列宁相遇。我们得在那儿等一个小时左右，于是就作了一次长谈，谈话的第一部分很友好，第二部分则不太融

① 安·涅梅茨(1858—1926年) 捷克右派社会民主党人。1897年起是捷克社会主义党领导人，曾任该党驻第二国际的代表。——译注

② 博·什麦拉尔(1880—1941年) 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创建人之。1922至1935年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和主席团委员。——译注

洽。我证明说，使捷克工会脱离的过错首先要由维也纳的领导承担，他们踌躇满志地号召所有国家的工人，其中包括捷克的工人去斗争，而又总是以和君主制度作秘密交易而告终。列宁极感兴趣地听着。当他迫切地想从交谈者的话中得到他所需要的东西时，他能保持一种特殊的注意力，而眼睛却不看着交谈者，而看着远方。当我向列宁谈到我在《前进报》上发表的关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最新文章时，我们谈话的性质就完全变了。文章是在代表大会之前写的，对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进行了猛烈的批评。文章里特别尖锐的问题是所谓“剥夺”问题。革命失败后武装剥夺和恐怖袭击成了瓦解革命政党本身的武器。在伦敦代表大会上，孟什维克、波兰人和部分布尔什维克以多数票禁止了剥夺行为。有人从座位上喊道：“列宁呢？列宁的意见呢？”而列宁神秘地冷冷一笑。伦敦代表大会之后剥夺仍在继续进行，给党带来了危害。对此我在《前进报》上集中进行了抨击。“难道你真是这么写的吗？”列宁责备地问。当时我根据他的要求凭记忆向他转述了文章的主要思想和提示。“能不能发个电报通知不要发表？”“不，”我回答，“文章今天早晨就要见报了，再说，干吗不发表呢？文章是正确的。”

实际上这篇文章是不正确的，因为它指望消除极端，通过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的联合把党建立起来，而实际上党是通过布尔什维克对孟什维克进行无情的斗争而建立起来的。列宁想让俄国代表团谴责我的文章。这是我一生中与他发生最尖锐冲突的时刻。那时列宁身体不适，牙疼得厉害，头部全用绷带包扎着。代表团对这篇文章和它的作者的态度相当敌对，因为这篇文章主要是针对孟什维克的，所以他们对文章也极为不满。1910年10月阿克雪里罗得写信给马尔托夫说：“你那篇发表在《新时代》上的文章是多么令人气愤，也许比登在《前进报》上的那篇更令人气愤。”卢那察尔斯基说：“最讨厌托洛茨基的普列汉诺夫抓住了这一机会，对他搞了一场审判之类的东西。我觉得这是不公正的，我相当坚决地表示赞同托洛茨基的观点，并和梁赞诺夫一起使普列汉诺夫的计划破产……”代表团的大多数人只是从别人的嘴里了解这篇文章的。我要求宣读这篇文章。季诺

维也纳证明说，为了谴责这篇文章没有任何必要去了解它。大多数人不同意他的说法。记得是梁赞诺夫朗读了这篇文章，并作了翻译。根据先前非正式的转达和传播，大家觉得文章非常糟糕，而读过之后却产生相反的印象：这篇文章没有什么过错。代表团以压倒的多数否决了对文章的谴责。但这并不妨碍我本人现在谴责这篇文章，因为它对布尔什维克这一派的评价是不正确的。

在捷克工会问题上，俄国代表团在代表大会上投票赞成维也纳的决议案而反对布拉格的决议案。我试图作些修正，但没有成功。对社会民主党的整个政策需要作出“修正”，这一点我自己毕竟也还远远没有弄清楚，修正应是对这个党宣布神圣的战争。但只是到1914年我们才走上这条道路。

## 第十七章

# 准备新的革命

反动年代我的工作大部分在阐述 1905 年革命并为第二次革命在理论上铺平道路。

出国后不久我就到俄国侨民区和大学生区作了两次巡回讲演：《俄国革命的命运（论目前的政治局势）》和《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社会革命前景）》。第一次讲演证明，俄国革命前景是不断革命，这已为 1905 年的经验所证实。第二个讲演把俄国革命与世界革命联系起来。

1908 年 10 月我开始在维也纳出版面向广大工人的俄文报纸《真理报》。这份报纸或经过加里西亚边境，或从黑海秘密运入俄国。报纸办了三年半，一个月不超过两期，但出版这份报纸要花很大的劳动，还要细心与耐心。和俄国的秘密通信花去大量时间。此外，我和黑海海员地下工会建立了紧密的联系，并帮助这个工会出版机关报。

我在《真理报》的主要同事是阿·阿·越飞，后来他成了苏维埃著名的外交家。我们的友谊是从维也纳时期开始的。越飞是一个思想境界很高的人，个性温和，对事业忠贞不渝。他不仅把自己的精力，而且把自己的钱财都贡献给《真理报》。越飞患了神经性疾病，在维也纳一位名叫阿尔弗列德·阿德勒的著名心理分析医生那里就医。这位医生是弗洛伊德教授的学生，但后来却与老师分道扬镳，建立了自己的个体心理学学派。通过越飞我了解了一些心理分析方面的问题，我觉得这些问题非常吸引人，尽管在这一领域里很多东西还不清晰、不稳定，而且往往使人想入非非。我的另一位同事是大学生

斯柯别列夫，后来他在克伦斯基政府里当劳动部长；1917年我们相遇时已经成为敌人了。一度在《真理报》当秘书的维克多·柯普，现在是苏维埃驻瑞典的公使。

越飞因维也纳《真理报》的事务到俄国去工作。他在敖德萨被捕，坐了很长时间的牢，后来被流放到西伯利亚，直到1917年二月革命才获释。越飞是十月变革最积极的参加者之一。这位病魔缠身的人的勇敢精神真是无与伦比。我至今还能清晰地回忆起1919年秋天在彼得堡郊外弹坑遍地的旷野上他那笨重的身影。他穿着一套十分精致的外交官服装，安详的脸上堆着微笑，手里拿着一根手杖，就像在林荫大道上散步。他好奇地看着身旁炮弹的爆炸，既不加快，也不放慢脚步。他是一位优秀的、深思熟虑和知心的演说家，而且也是这样的作家。越飞干任何工作都极细致，这是许多革命家所缺乏的。列宁对越飞的外交工作评价很高。在许多年里我和他一直有着紧密的联系。他对友谊的忠诚，对思想的忠诚，都是无与伦比的。越飞悲剧性地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沉重的遗传性疾病损害了他的健康。由于失去与疾病斗争，尤其是失去政治斗争的可能性，越飞在1927年秋自杀了。他临死前写给我的那封信被斯大林的密探从他的床边小桌子上偷走了。信中那些表示友好关怀的话被雅罗斯拉夫斯基以及其他道德败坏的人删去，极尽歪曲和污蔑之能事。这不会妨碍越飞的名字永远载入革命的史册，并且是史册中那些最优秀的名字之一。

在反动年代最沉闷和最黑暗的日子里我和越飞满怀信心地等待着新的革命，1917年的革命，其形式也正是我们所期待的。斯韦尔奇科夫<sup>①</sup>当年是孟什维克，现在则是斯大林分子，他在回忆录中谈到维也纳《真理报》时写道：“他（托洛茨基）在这家报纸里依然坚持不懈地、顽强地宣传俄国革命是‘不断革命’的思想，也就是断言革命既已开始，那么在全世界推翻资本主义和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之前，革命就

<sup>①</sup> 德·费·斯韦尔奇科夫（1882—1938年） 1909至1910年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代表孟什维克）。十月革命后曾在苏联最高法院工作，后任国家文学博物馆副馆长。——译注



不会结束。布尔什维克、孟什维克都嘲笑他，骂他是浪漫主义，犯了弥天大罪，但他顽强地和坚定地宣传自己的观点，对种种攻击无动于衷。”

1909年我在罗莎·卢森堡办的波兰刊物上用以下语句概括了无产阶级和农民的相互关系：“地方性的呆小病这是农民运动的历史病根。庄稼汉在自己的村子里夺取老爷的土地而杀戮他们，而这些人一旦穿上军装，又去枪杀工人，庄稼汉的这种政治局限性使俄国革命的第一个浪潮（1905年）归于失败。革命的全部事件可以看成是一系列残酷的具体教训，历史通过这些教训使农民深刻意识到地方性的土地需要和国家政权的中心问题之间的联系。”

我举了芬兰的例子，在那里社会民主党由于佃农问题上的立场而在农村获得很大影响。我得出结论说：“由于我们党领导了城乡空前广泛的新的群众运动，由于这个运动的结果，我们党对农民产生了多么巨大的影响！自然，如果我们不怕夺取政权，不放下武器，新的浪潮就一定会推着我们迎向政权。”这一切难道是“忽视农民”或者“跳过土地问题”！

1909年12月4日，正当革命似乎毫无希望，已经永远被粉碎的时候，我在《真理报》上写道：“就是在今天，我们也能透过压在我们头上的反动统治的乌云，看到新的十月的胜利的反光。”不仅自由派，而且连孟什维克那时也嘲笑这番话，觉得这些话是鼓动性叫喊，没有内容的空话。米留科夫教授（发明“托洛茨基主义”这一名词的荣誉应归于他）反驳我说：“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要知道这纯粹是一种幼稚的思想，欧洲不会有任何人严肃认真地支持它的。”然而，1917年的事变想必打扰了这位自由派教授的伟大信念。

在反动年代我研究了国际国内的工商业情况。这是革命的利益促使我这样做的：我想弄清楚，工商业的兴衰同工人运动与革命斗争的各个阶段的相互依存关系。在这里就像在所有此类问题上一样，我特别注意防止政治自动依赖于经济的观点。应当从全过程，从整体引出相互作用的结论。当纽约的交易所爆发黑色星期五时，我还在波希米亚的小城希尔施贝格。黑色星期五成了危机的前兆，它不

可避免地会席卷被日俄战争,后来又革命所震撼的俄国。危机的结果将会怎样?在党内,并且是在两派内,占统治地位的观点是危机将加剧革命斗争。我持另一种观点。在大搏斗和大失败时期之后,危机对工人阶级不是起激励作用,而是起消沉作用,使工人阶级对自己的力量失去信心并在政治上瓦解。只有新的工业复苏才能在这些条件下使无产阶级团结起来,振作起来,恢复信心,使他有能力继续斗争。对这一前景的看法受到批评,没人相信。党的一些正统经济学家还发挥这样一种看法,在反革命的制度下,工业是根本不可能得到振兴的。和他们相反,我的出发点是经济复苏是不可避免的;这种复苏一定会使罢工运动进入新阶段,这以后新的经济危机就会成为革命斗争的推动力。这一预见完全得到了证实。1910年工业复苏了,尽管反革命猖獗。罢工斗争也随之而来。1912年勒拿金矿枪杀工人事件引起全国巨大的反响。1914年当危机已经确定无疑时,彼得堡重新成为工人街垒的舞台。战争前夕访问沙皇的彭加勒<sup>①</sup>就是个见证人。

这一理论经验和政治经验对我以后的活动有着无可估量的意义。在第三次共产国际代表大会上,当我坚持战后欧洲经济高涨不可避免,这是以后革命危机的前提这一观点时,绝大多数代表都反对我。最近我又不得不指责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它完全不懂得在中国发生的经济和政治形势的转折,在革命遭到惨重失败之后,却错误地指望由于国内经济危机的加剧,革命会进一步发展。

事物发展进程的辩证法本身并不那么复杂。但说出它的总的特点容易,而每一次依据活生生的事实重新发现它就困难得多了。至少我在这个问题上到今天为止遇到一些最顽固的偏见,这些偏见在政治上铸成大错,造成严重的后果。

在估计以后孟什维主义的命运和党的组织任务上,《真理报》还没有说得像列宁那样的明白无误。我还是希望新的革命像1905年

<sup>①</sup> 雷·彭加勒(1860-1934年) - 法国总理(1912-1913年,1922-1924年,1926-1929年)和法国总统(1913-1920年)。 - - 译注

那样迫使孟什维克走上革命的道路。我对预备性的思想选择和政治锻炼的意义估计不足。在党内发展问题上我的过错在于某种社会革命的宿命论。这是一种错误的立场，但它比没有思想的官僚的宿命论高得多，共产国际的阵营里那些今天批评我的大多数人的特点正是这种宿命论。

1912年当新的政治高涨毫无疑问地出现时，我作了召开由社会民主党所有派别代表参加的统一代表会议的尝试。为了说明那时不只我一个人希望恢复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统一，可以列举罗莎·卢森堡为例。1911年春天她写道：“如果迫使双方共同召开代表会议，那么不管怎样，党的统一还是可以挽救的。”1911年8月，她重申：“挽救统一的唯一道路，就是举行由从俄国派来的人参加的共同的代表会议，因为在俄国的人都希望和平和统一，他们是唯一能够使国外那些好斗的公鸡恢复理智的力量。”

那个时期布尔什维克自身的妥协倾向十分强烈，因此我期望这会促使列宁也参加共同的代表会议。然而，列宁全力反对联合。后来事情的整个发展表明，列宁是对的。1912年在维也纳召开了没有布尔什维克参加的代表会议，于是我便在形式上参加了同孟什维克和几个持不同政见的布尔什维克集团的“联盟”。这个联盟没有政治基础，在所有的基本问题上我都和孟什维克有分歧。代表会议结束后的第二天和他们的斗争就恢复了。社会革命和民主改良这两种倾向的尖锐的冲突与日俱增。

代表会议召开前不久，5月4日阿克雪里罗得写道：“从托洛茨基的来信中我得出一个非常痛苦的印象，他并不愿意真正地、认真地和我们、和我们在俄国的朋友们接近……以共同对敌。”我确实没有，也不可能有联合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作斗争的愿望。代表会议之后马尔托夫写信给阿克雪里罗得抱怨说，托洛茨基正在恢复“列宁—普列汉诺夫那种著作家的个人主义的坏习气。”几年前发表的阿克雪里罗得和马尔托夫的通信证明他们对我的由衷憎恨。尽管有一条鸿沟把我和他们隔开，但我对他们从来也没有过这种感情。就是现在我也是怀着感激之情回想起自己年轻的时代曾得到他们的许多

帮助。

在不肖徒辈掌权的时代，八月联盟这段插曲被收进所有“反托洛茨基主义”的教科书。与此同时，向那些新手和无知的人这样来描述过去的历史：仿佛布尔什维克在走出历史的实验室时已是无所不知的。然而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斗争的历史同时又是不断寻求统一的历史。1917年列宁回到俄国以后又作了最后一次努力来与孟什维克国际主义者达成协议。当我在5月从美国回来，大多数外省的社会民主党组织是由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联合组成的。在1917年3月列宁回来之前几天召开的党的会议上，斯大林鼓吹与策烈铁里领导的党统一。十月革命后，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李可夫、卢那察尔斯基以及其他几十个人狂热地为同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结成联盟而斗争。这些人现在企图借1912年维也纳统一代表会议的可怕的神话来维持自己的思想的存在！

《基辅思想报》建议我到巴尔干去当军事记者。这个建议很及时，因为这时已很清楚，八月代表会议已经流产了。我感到有一种要求，哪怕短时间地离开一下俄国的流亡者的活动也好。我在巴尔干半岛没呆几个月，这是战争的几个月，它们教会我许多事情。

我是1912年9月到东南欧去的，我早就认为战争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不可避免的。可是，当时不知不觉来到贝尔格莱德街头，我看到长长的后备兵队伍，当我亲眼看到，退路没有了，战争将爆发，而且就将在近日内爆发，当我得悉，有几个我非常熟悉的人已经武装起来，到了边界，他们将是第一批杀人和被杀的人——这时候，我在内心和文章中曾经看得如此简单的战争，却使我感到是难以置信的，是不可能的。我瞧着去参加战争的团队（第18步兵团），就像瞧着幽灵一样，他们穿着保护色的军服，脚穿树皮鞋，帽子上插着绿色的树枝。脚上的树皮鞋和帽上的树枝，再加上全副武装，给士兵们一种注定要牺牲的模样。在那一瞬间没有什么能比这树枝和庄稼汉的树皮鞋更令人感到疯狂的战争是如此的无法忍受。现在这一代人离开1912年的习惯和情绪是多么遥远！我那时就非常了解对历史进程所持的人道观点是毫无用处的观点。但问题不在于解释，而在于感

受。内心充满了一种直接的、难以名状的历史悲剧感：在命运面前无能为力，为芸芸众生难受。

两三天后宣战了。“您在俄国了解这一点也相信这一点，”我写道，“而我在这里，在现场，却无法相信。我的脑海里怎么也无法把人们日常生活中所见到的母鸡、香烟，拖着鼻涕的光脚孩子和难以置信的悲惨的战争事实联系在一起。我知道，已经宣战，战争已经开始，但我还没学会相信战争这一事实。但又不得不久久地坚信战争的存在。”

1912至1913年使我有机会直接了解塞尔维亚、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去了解战争。这在许多方面不仅为1914年，而且也为1917年作了重要的准备。我在文章中展开了反对斯拉夫主义的谎言，反对沙文主义，反对战争幻想，反对愚弄社会舆论的科学地组织起来的那套做法的斗争。《基辅思想报》编辑部以非常坚决的态度来发表我的文章，就在文章中我叙述了保加利亚对土耳其伤员和俘虏的暴行，揭露了俄国报纸保持沉默的阴谋。这激起了自由派报纸的强烈愤慨。1913年1月30日我在报上就“斯拉夫人”对土耳其人施暴一事对米留可夫提出了“议会外质询”。这个官方保加利亚的辩护士在回答问题时被逼得走投无路，语无伦次。争论持续了几个星期，政府的一些报纸少不了暗示说，化名安季德·奥托的人不仅是一个流亡者，而且是一个奥匈帝国的密探。

在罗马尼亚度过的一个月使我结识了多勃罗贾努-格里亚<sup>①</sup>，并和从1903年就认识的拉柯夫斯基<sup>②</sup>结下了永恒的友谊。

一位70年代的俄国革命家在俄土战争前“路过”罗马尼亚时留了下来——几年以后我们的这位同胞以格里亚的名字起先在罗马尼亚的知识分子中，后来在先进的工人中取得很大影响。在社会基础

① 多勃罗贾努-格里亚(1855—1920年)——罗马尼亚社会主义运动创始人之一。社会学家，文艺批评家和政论家。——译注

② 克·格·拉柯夫斯基(1875—1941年)——早年参加保加利亚、罗马尼亚、瑞士和法国的社会主义运动。1917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党。十月革命后曾任乌克兰人民委员会主席、党中央委员等职。——译注

上的文字批评是格里亚培养罗马尼亚知识分子中先进群体的觉悟的主要领域。他把人们从美学问题和个人道德问题引向科学社会主义。在罗马尼亚几乎所有政党的大多数政治家年轻时都在格里亚的指导下受过短期的马克思主义教育。不过，这一点也不妨碍他们在成年时执行反动的强盗政策。

克·格·拉柯夫斯基是欧洲运动中最具国际性的人物之一。按出身他是保加利亚人，生于保加利亚的中心城镇科捷尔，但是按照巴尔干地图，他是罗马尼亚国民；按教育他是一个医生；按交往、爱好和文学工作而论，他又是一个俄国人。拉柯夫斯基掌握所有巴尔干语言和四种欧洲语言，在不同时期积极地参加四个社会党——保加利亚、俄国、法国和罗马尼亚社会党的内部生活，后来他成了苏维埃联邦的领袖之一，共产国际的奠基人之一，乌克兰人民委员会主席、苏联驻英国和法国的外交代表，后来也同左翼反对派共命运。拉柯夫斯基的个人特点是具有广阔的国际主义眼光和高尚的品格，这特别引起斯大林的仇视，因为斯大林的性格恰恰与他截然相反。

在1913年，拉柯夫斯基是罗马尼亚社会党的组织者和领袖，这个党后来加入了共产国际。党得到了发展。拉柯夫斯基主编一家日报，办报的钱也是他资助的。拉柯夫斯基在离曼加利亚不远的黑海边继承了一所不大的庄园，庄园的收入被用来资助罗马尼亚社会党和其他国家的一些革命团体和个人。拉柯夫斯基一个星期中有三天是在布加勒斯特度过的，他写文章、主持中央委员会的会议，在群众大会、在街头示威游行中发表演说。然后乘上火车到黑海边，到自己的庄园里取了细绳、钉子和其他日常用具就到旧头去，他检查新拖拉机的工作情况，穿着在城里穿的长礼服，跟在拖拉机后面沿着犁沟跑。过了一天又重新往回赶，深怕误了参加群众大会和会议的时间。我曾陪同拉柯夫斯基作过这样的旅行，我很欣赏他这种充沛的精力，不知疲倦的工作态度，朝气蓬勃的精神状态，以及对小人物的亲切关怀。他在曼加利亚街头同移民、商人交谈，在15分钟的时间里他从罗马尼亚语转到土耳其语，再从土耳其语转到保加利亚语，接着，又改用德语和法语，最后，他又用俄语同近郊的人数众多的俄国阉割派

教徒交谈。他以不同的身份同人交谈：庄园主、医生、保加利亚人、罗马尼亚国民，而更多的则是社会主义者。在我的眼里他像一个活的怪物在这个偏僻的、无忧无虑的和懒洋洋的滨海小城镇奔走。而到夜里他又坐上火车奔赴战场。他在布加勒斯特、索菲亚、巴黎、彼得堡或哈尔科夫都同样感到轻松愉快，信心十足。

※ ※ ※

第二次侨居的年代对我来说是为俄国民主派报刊撰稿的年代。我在《基辅思想报》上发表一篇关于慕尼黑杂志《天真的人》的长篇文章。这本杂志一度非常吸引我，我从第一期起仔细地读了所有各期的内容，那时，T. T. 海涅的绘画还充满着强烈的社会感。也是那个时候，我较为仔细地了解德国的新小说。关于魏德金德<sup>①</sup>我甚至写了一篇社会性评论长文，因为在俄国随着革命情绪的低落，对他的兴趣增加了。

《基辅思想报》是南方传播最广的带有马克思主义色彩的激进报纸。这样的报纸只能在基辅存在，那里有薄弱的工业，阶级矛盾不发达，知识界有激进主义的强大的传统。加以相应的改变，可以说，这张激进报纸办在基辅的原因与《天真的人》办在慕尼黑的的原因是一样的。我在报纸上发表了各种各样的文章，就书报检查的角度来说，有些题材是非常冒险的。一些短文常常是预先做了大量工作的产物。不言而喻，在公开的非党报纸上我不能说我想说的所有的话，但是我从来也不写我不想说的话。我在《基辅思想报》上发表的文章后来由苏维埃出版社出了好几卷。我没有什么要放弃的。现在来提一下下述情况也许不是多余的：我在资产阶级报纸上撰稿是经列宁派占大多数的中央委员会正式同意的。

我已经提到过，我们一到维也纳就搬到郊外，妻子写道：“我喜欢许特尔多夫，住宅比我们能有的要好，因为在这里通常是春天出租别墅，而我们却是租了过秋天和冬天的。从窗户里可以看到群山，一派

---

<sup>①</sup> 魏德金德(1864—1918年) 德国作家，表现主义的先驱，著有反对资产阶级的剧本《青春觉醒》等。——译注

深红色的秋天的景色。穿过篱笆门便能绕过街道到旷野里去。冬天，每逢星期天维也纳人带着小雪橇和滑雪板，穿戴着五颜六色的小帽和运动衫路经这里上山滑雪。四月里由于要支付加倍的房租我们得离开我们的住所，这时花园内外紫罗兰已经盛开，通过打开的窗户满室皆香。谢廖沙是在这里出生的。我们不得不迁到大众化一点的西费林去住。

“孩子们说俄语，同时也说德语。在幼儿园和小学里他们都是用德语交谈的，因此在家里玩耍时继续讲德语，但只要我或父亲和他们说话，他们马上改说俄语。如果我们对他们说德语，他们会感到窘迫而用俄语作答。最后几年他们还掌握了维也纳方言，讲得非常流利。

“他们喜欢到克利亚奇科家里去，在那里无论是主人还是主妇，还有快成年的孩子，大家都对他们非常关心，给他们看许多有趣的东西，同时请他们吃好吃的食品。

“孩子们也很喜欢梁赞诺夫，一位著名的马克思研究家。那时梁赞诺夫住在维也纳，他常用一些体育技巧使孩子们感到惊讶，他那热热闹闹的作风使孩子们很喜欢他。有一次理发师给小儿子理发，我也坐在那里。谢廖沙用手指示意我过去，他对我耳语说，‘我想理像梁赞诺夫那样的发式’。梁赞诺夫那一大块光光的秃顶使他赞赏不已——这和大家不一样，比大家的发型好得多。

“列维克上学后，发生了宗教问题。按那时奥地利的法律，孩子在14岁前必须接受自己父辈的宗教教育。由于我们的护照上没有指明信何宗教，我们就为孩子们选了路德教，因为我们觉得这种宗教对孩子的身心负担来说要轻些。路德教课是在课外上的，尽管课也是在学校里上的，教这门课的是一位女教师。列维克喜欢这门课，这可以从他的小脸蛋上看出来，但他认为没有必要在家里说。有一天晚上，他已经躺在床上，我听到他在喃喃自语。我问他，他回答说：‘这是祷告，你知道，祷文就像诗一样，常常是非常优美的。’”

从我第一次流亡时起，我父母就开始到国外来。他们到巴黎来找我，后来带了我的长女到维也纳来，长女和他们一起住在乡下。1910年，他们来到柏林。这时他们已经完全适应我的命运了。我的



第一部德文著作的出版也许是最后的一个对他们很有说服力的论据。母亲病得很重(放线菌病)。最近10年她带病操劳,这病就像追加在她身上的一种负担。她在柏林切除了一只肾脏。那时母亲60岁,手术后她恢复得极好,这一情况在医学界出了名。但很快又复发,没几个月就去世了。她死在扬诺夫卡,她在那里度过了劳动的一生,在那里养育了儿女。

我在维也纳最亲近的朋友是老侨民C. JI. 克里亚奇科一家,如果不提到这一点,那么我生平中维也纳这一章就是不完整的。我第二次流亡的历史是紧紧地和这一家交织在一起的,这个家庭是广泛的政治兴趣、以至整个思想理论兴趣的中心,是音乐的中心,四种欧洲语言和各种各样欧洲人联系的中心。1914年4月这一家之主谢苗·利沃维奇的死使我和妻子深感悲痛。列夫·托尔斯泰在写到自己才华横溢的兄弟谢尔盖时说,他之所以没有成为一位大艺术家只是由于他身上缺少某些小小的缺点。关于谢苗·利沃维奇也可以这么说,他有成为一名杰出的政治家的所有条件,就少了一些为此所必需的缺点。在克里亚奇科家里我们总是能得到帮助和友谊,而我们常常既需要帮助又需要友谊。

我在《基辅思想报》的收入完全够维持我们简朴的生活。但我常常一连几个月为《真理报》工作,没有可能写有报酬的文章,那时危机就来了。妻子很熟悉到当铺去的路,而我不止一次地到旧书铺去出卖我手头宽裕时买来的书。我们那些简单的家具也常常被拿去抵偿房租。我们有两个年岁很小的孩子,但没有雇保姆。我们的生活重担加倍地压在我妻子身上,但她还要花时间和精力帮助我从事革命工作。

## 第十八章

# 战争爆发

在维也纳的一些围墙上出现了“消灭所有塞尔维亚人”的标语。这成了街头孩子们的口号。我们的小儿子谢廖沙和往常一样，怀着对立情绪，在西费林的小草地上高喊：“塞尔维亚人万岁！”他青一块紫一块地带着国际政治的经验回到家里。

前英国驻彼得堡大使布坎南在回忆录里兴奋地谈到“8月初那些奇妙的日子”，那时“俄国似乎完全变了样”。此类兴奋情绪在其他一些政治活动家的回忆录里也可以看到，尽管他们没有像布坎南那样表现得充分，他们体现了统治阶级那种自满自足的鼠目寸光。在欧洲各国的首都同样有过8月的“奇妙”日子，所有的国家在相互残杀中“变了样”。

奥匈群众的爱国热潮特别出人意料。是什么力量把维也纳的制鞋帮工、德捷混血儿波斯彼什利或我们的小菜贩玛列施太太，或马车夫富朗克尔引到国防部广场去的呢？是民族思想吗？什么样的民族思想？奥匈本身就是对民族思想的否定。不，是另一种推动力。

世上有许多人，他们的整个生活日复一日地在单调和绝望中度过。这些人支撑着当代的社会。动员的警报就像是一种许诺闯入他们的生活。一切习惯了的和令人生厌的东西正在被抛弃，出现了新的和不寻常的东西。前面还会发生不可思议的变化。是向好的方向变还是向坏的方向变呢？自然，是向好的方向变；难道波斯彼什利能过比“正常”时期更坏的生活吗？

我在非常熟悉的维也纳街头漫步，看着对豪华的林格来说很不

平常的、满怀着希望的人群。难道部分希望今天也不能实现吗？难道在别的时间里搬运工、洗衣女工、鞋匠、帮工以及城郊的少年会感到自己是林格的有地位的主人吗？战争席卷了所有的人，所以受生活压迫和欺骗的人感觉到自己仿佛和富人、和有权有势的人平起平坐了。不要认为这是奇谈怪论，在炫耀哈布斯堡武功的维也纳人群的情绪中，我看到了1905年彼得堡十月事件中我所熟悉的那些特点。怪不得在历史上战争常常是革命之母。

然而，统治阶级对待战争和革命是如此不同，准确些说，如此截然相反。布坎南觉得那些日子是奇妙的，而俄国是苏醒了的国家。相反地，维特伯爵在谈到1905年革命的那些最动人心弦的日子时写道：“俄国的绝大多数人都好像发疯了。”

战争有点像革命，它使全部生活，从上到下，统统越出常轨。但革命打击的是现存的政权。相反地，战争在最初阶段是巩固国家的政权，它在由战争造成的混乱中是唯一的坚强支柱……只要这场战争还没有摧毁这个政权。在战争初期，无论在布拉格或的里雅斯特，或者在华沙或梯弗利斯，指望出现蓬勃的社会运动和民族运动是毫无根据的。1914年9月我在寄往俄国的信中写道：“动员和宣战仿佛把国内所有民族矛盾与社会矛盾一扫而光。但这只是历史的延期，是某种政治上的延期支付。票据改写上新的时间，但终归要支付的。”在这些经书报检查的文字里，我指的自然不仅是奥匈，还有俄国，并且首先是俄国。

事变一个接一个。传来了饶勒斯被刺的消息。报道上充满了恶毒的谎言，因此至少还有几个小时的时间可以怀疑和寄予希望。但很快这个可能性消灭了，饶勒斯被敌人杀害了，被自己的党出卖了。

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领导集团对战争持什么态度呢？一些人公开为战争而高兴，对塞尔维亚人和俄国人说下流话，不怎么区别政府和人民。他们本性上是民族主义者，只是稍稍涂上一点社会主义文化的色彩，如今不是一天天地，而是一小时一小时地褪色了。我记得后来像是当上国防部长一类职务的尤利乌斯·多伊奇谈到了这一战争的不可避免性和救世作用，说战争将最终使奥地利摆脱塞尔维亚

的“恶梦”。其他人，以维克多·阿德勒为首，把战争看作是一场外来的灾难，认为需要忍受这场灾难。然而，这种消极等待的态度只是为积极的民族主义派打掩护。有人则深刻地回忆起1871年德国的胜利，这次胜利推进了德国的工业，而同工业一起前进的还有社会民主党。

8月2日德国向俄国宣战。在这之前俄国人就开始撤离维也纳了。8月3日早晨我到维恩柴勒去，想和那里的社会党议员商量，我们这些俄国侨民怎么办。弗里德里希·阿德勒由于惯性作用，还在自己的办公室里继续为不久应在维也纳召开的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而在摆弄书籍、文件和邮票。但召开代表大会已成为过去的事。另外一些力量登上了舞台……老阿德勒建议我马上和他一起去找权威人士，即政治警察总监盖尔。在去警察局的路上，在汽车里我请阿德勒注意战争所引起的某种节日气氛。“高兴的是那些不需要去打仗的人。”他立即回答说，“此外，现在所有喜怒无常的人，所有疯子都走上街头了，这是他们的时代。饶勒斯被刺，只是个开始。战争为所有的本能，为一切形式的疯狂开辟了自由的天地……”

按照医学专业来说，阿德勒是一位精神病医生，他常常以精神病观点来看待政治事件。“特别是奥地利的政治事件”，他讥讽地说。那时他根本想不到自己的儿子会去干政治谋杀。正好在战争前夕，我在由小阿德勒主编的《战斗》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说明个人恐怖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值得注意的是编辑非常赞赏这篇文章。弗里德里希·阿德勒的恐怖行动是陷入绝望的机会主义的大发作，如此而已。阿德勒发泄了一通自己的绝望情绪后，又回到老路上去。

盖尔谨慎地推测，明天早晨可能下令逮捕俄国人和塞尔维亚人。

“这么说，您建议离开？”

“越快越好。”

“好，明天我全家去瑞士。”

“嗯，……我倒希望您今天就走。”

谈话是下午3点钟进行的，而6点10分我已经和全家一起坐在

开往苏黎世的火车上了。7年的交往、书籍、档案以及已着手的著作，其中包括和马萨里克教授关于俄国文化命运的争论，都丢在身后了。

关于德国社会民主党投降的电报比宣战本身更使我感到震惊，尽管我从未天真地把德国社会主义理想化。早在1905年我就写过，并不止一次地重申：“欧洲的社会党养成了自己的保守主义。社会主义吸引的群众越多，保守主义也就越加强烈……由于这一缘故，社会民主党在某个时刻可能会成为工人和资产阶级反动派的公开冲突道路上的障碍。换句话说，无产阶级政党在宣传上的社会保守主义在某种时刻可能阻碍无产阶级争取政权的直接斗争。”我并不期望在发生战争的情况下第二国际的正式领袖们能够表现出认真的革命首创精神。但与此同时我也万万没有想到，社会民主党会拜倒在民族军国主义之脚下。

登载8月4日德国国会会议报道的那期《前进报》到达瑞士时，列宁断定这期《前进报》是德国总参谋部为欺骗和恐吓敌人而伪造的。列宁对德国的社会民主党的信任还是那么坚定，尽管整体上持批判态度。与此同时，维也纳的《工人报》把德国社会主义的投降日宣布为“德意志民族的伟大日子”。这是奥斯特里茨<sup>①</sup>的顶点。他的“奥斯特里茨！”……我不认为《前进报》是伪造的；在维也纳的最初的直接印象已经使我对最坏的情况有了思想准备。然而8月4日的投票仍然是我生平所经历的最可悲的事件之一。恩格斯会说些什么？我问自己。对我来说答案是清楚的。而倍倍尔又是怎样行事的呢？这我就不太清楚了。但倍倍尔已经不在了。只有哈阿兹在，他是一位正直的外省的民主党人，缺乏理论见识和革命气质。在任何危急关头他都不愿作出断然措施，而宁愿采取不彻底的办法和观望等待。他无力对付这些事件。而谢德曼、艾伯特、威尔士之流则走得更远了……

瑞士是德国和法国的缩影，只是表现为中间的形式，也就是方式

<sup>①</sup> 奥斯特里茨是拿破仑于1805年战胜俄奥的地方。——译注

更为温和，规模较小。似乎为了更令人触目，在瑞士议会里有两个同名同姓的社会党议员：苏黎世的约翰·西格和日内瓦的让·西格。约翰是狂热的亲德派，而让则是更加狂热的亲法派。这就是第二国际在瑞士这面镜子里的反映。

大概在战争的第二个月，我在苏黎世的街上碰到老莫尔肯布尔<sup>①</sup>，他是到这儿来制造舆论的。我问他的党是如何设想世界大战的进程的，这位老领导机构成员回答说：“在最近两个月里我们将收拾掉法国，然后转到东方，把沙皇的军人干掉，而再过三个月，至多四个月，就给欧洲以稳固的和平。”这个回答我一字不差地记在日记上。当然，莫尔肯布尔表达的并非他个人的估计。他不过是表达了社会民主党的官方看法罢了。与此同时，法国驻彼得堡的大使以5个英镑同布坎南打赌，说战争将在圣诞节前结束。不，我们这些“空想主义者”比这些社会民主党和外交官先生们要有预见一些。

战时我们在瑞士避难，此地使我想起了芬兰的Rauha公寓，1905年秋天我在那里得到了掀起革命浪潮的消息。当然，在瑞士，军队也动员起来了，而在巴塞尔，甚至可以听到隆隆的炮声。但海尔维第大公寓<sup>②</sup>像被战火包围中的一块安静的绿洲，它所关心的主要是乳酪太多和土豆不足。我问自己，离开瑞士安静的绿洲重新在工学院的大礼堂里与彼得堡的工人们相逢的时刻也许不会太遥远了吧？但这个时刻过了33个月才到来。

为了说清所发生的事情，我得求助于日记。早在8月9日我就在日记中写道：“非常明显，问题不在于失算，不在于个别的机会主义步骤，不在于从议会的讲坛上发出的不恰当的声明，不在于巴登大公园的社会民主党人投票赞成拨款，不在于法国的人阁试验，也不在于某些领袖的叛徒行径——问题在于第二国际在最需要负起责任的时代破产了，对这个时代来说，以往的所有工作仅仅是一种准备工作

① 赫·莫尔肯布尔(1851-1907年)——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曾任党的总书记，党的国会党团主席，社会党国际局成员等职。——译注

② 海尔维第，现瑞士西北部的古称，旧时诗歌中也指整个瑞士。——译注

而已。”

8月11日我在日记中写道：“只有革命的社会主义运动的苏醒，并且这种运动立即采取急风暴雨的形式，才能为新的国际奠定基础。未来的年代将会是社会革命的时代。”

我积极地参与瑞士的社会党的生活。在下层工人中它的国际主义得到了几乎是普遍的同情。每参加一次党的会议我就加倍地确信自己的立场是正确的。我在由各国会员组成的工会 Eintracht（和谐）中找到了第一个支柱。根据与理事会的协议，我在9月初起草了一个反对战争和社会爱国主义的宣言草案。理事会邀请党的领袖们到会，我在会上用德语作了一个维护这一宣言的报告。但领袖们没有到会。他们认为在如此尖锐的问题上表态太冒险，宁可等待观望和局限于在房间里批评一下德国和法国沙文主义的“极端性”。Eintracht 会议几乎一致通过了这个宣言，尽管宣言还有些含糊不清之处，但却成为推动党的舆论的主要力量。这差不多是战争开始以后工人组织的第一个国际主义文件。

在那些日子里我第一次和拉狄克接近，他是战争开始时从德国来到瑞士的。他在德国党内属极左翼，我希望与他成为志同道合者。果然，拉狄克以极端不妥协的精神谴责了德国社会民主党中的统治层。在这方面我们是一致的。但是在交谈中我惊奇地确信，他没有想到因爆发战争而在近期内爆发无产阶级革命的可能性。不，他回答说，整个人类的生产力还没有发展到足以爆发无产阶级革命的程度。对俄国生产力还没发展到工人阶级夺取政权的程度这种说法我已经习以为常了。但是我难以想象这种回答会出自一个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革命政治家之口。在我离开苏黎世不久拉狄克就在那个 Eintracht 工会里作了一个内容广泛的报告，详细地论证了资本主义世界还没有为社会主义革命做好准备。

瑞士作家布鲁普巴赫尔在颇有意思的回忆录中谈到拉狄克的报告时，把它看作是战争初期苏黎世社会主义运动的转折点。奇怪的是布鲁普巴赫尔把我那时的观点称之为……和平主义。对此他是怎么理解的，不得而知。他为一本记述他本人从那时起的发展的书加

了这样一个标题：“从小市民到布尔什维克”。布鲁普巴赫尔当时的观点我是很清楚的，因此我完全同意这一个标题的前半部分。至于这个标题的后半部分，则恕不负责。

当德国和法国的社会党报纸清楚地展示了正式的社会主义在政治上和道德上崩溃的图景时，我放下了日记而去写作以战争和国际为题材的政治小册子。根据第一次和拉狄克谈话得到的印象，我为小册子写了一篇序言，在序言中我更加激烈地强调，目前的战争不是别的，而是世界范围的资本主义生产力一方面反对私有制，另一方面反对国界的起义……《战争和国际》一书和其他书一样，最初在瑞士，而后在德国和法国，再后来在美国，最后在苏维埃共和国都有其独特的命运。所有这一切应当在这里说几句。

我的这本书是一个没有完全掌握德文的俄国人从俄文手稿翻译的。苏黎世教授拉加茨负责对译文进行校订。这就使我有机会认识这位独特的人物。拉加茨信奉基督教，而且就他所受的教育和职业而言是神学家，但与此同时他又属瑞士社会主义的极左翼，承认要以最极端的方法来进行反战斗争，主张无产阶级革命。他和他妻子对待政治问题的严肃认真的态度吸引了我，这种态度与奥地利、德国、瑞士以及其他缺乏思想的社会民主党官僚相比要好得多。据我所知，拉加茨由于自己的这种观点，结果牺牲了自己的大学教席。这对他那圈子的人来说，代价是不小的。但是在我与他进行那些谈话时，除了对这位出众的人物深怀敬意之外，几乎肉体上能感觉到在我们之间存在着—道薄弱的，然而却是绝对不能穿透的帷幕。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神秘主义者，尽管他没有把自己的信仰强加于人，甚至没有提到它，但在他的谈话中武装起义本身也充满了某种从彼岸吹来的微风，它在我身上只能引起不愉快的寒颤。从我开始思考时起，我起初是个直觉的唯物主义者，后来是个自觉的唯物主义者，不仅不觉得有寻求另一个世界的要求，而且从来都无法与那些居然能既承认达尔文，又承认三位一体的人有心理上的联系。

多亏拉加茨，我那本小书得以漂亮的德语问世。1914年12月它已经找到了销往奥地利和德国的道路。首先为此事张罗的是一些



瑞士的左派：普拉滕<sup>①</sup>等人。为德语国家写的这本书首先是反对德国社会民主党这个第二国际的领导党的。记得，沙文主义乐队中的第一小提琴手、记者海尔曼<sup>②</sup>把我的这本书称之为疯子的书，但承认疯有疯的逻辑。我原没指望得到更高的赞誉！当然，也有不少流言，暗示这本小册子是为协约国宣传的巧妙工具。

后来在法国有一天我突然在法文报纸上读到来自瑞士的电讯，说德国的一家法院因为我那本苏黎世的小册子而缺席判我徒刑。我由此得出结论，小册子打中目标了。霍亨索伦王朝的法官们以这一判决免费给我帮了个大忙。协约国的诽谤者和密探力图证明我实际上是德国总参谋部的代理人，现在德国法庭的判决成了他们的绊脚石。

但这并不妨碍法国当局在边境扣留我的书。因为此书“出生于德国”。在爱尔威<sup>③</sup>的报上刊登了一篇语意双关的评论，为我那本小册子辩护，反对法国的书报检查。我想这篇评论是不无名气的沙·拉波波特<sup>④</sup>写的。他几乎是个马克思主义者，至少他是一位毕生致力于创造大量双关语的作者。

十月革命后一位机灵的纽约出版商以漂亮的美国书的装帧出版了我的这本德国小册子。据这位出版商说，威尔逊从白宫打电话给他，要他送这本书的校样去；总统这时正在起草 14 条，据一些消息灵通人士证实说，总统不能容忍布尔什维克率先提出他的方案中的精华。在两个月的时间里这本书在美国发行了 16 000 册。但签订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的日子来到了。美国报界对我进行了疯狂

① 弗·普拉滕(1883—1942年)——瑞士共产党创建人之一。1912至1918年任瑞士社会民主党书记，1919年参加组织共产国际的工作，1921至1923年任瑞士共产党书记。——译注

② 恩·海尔曼(1881—1940年)——德国右派社会民主党人，政治家。1919至1933年任普鲁士议员和社会民主党国会党团主席。——译注

③ 占·爱尔威(1871—1944年)——法国社会党左翼领袖之一，1905至1918年是工人国际法国支部的成员。——译注

④ 沙·拉波波特(1865—1941年)——法国社会党人，哲学上是康德主义者。——译注

的攻击,于是这本书便从市场上消失。

在苏维埃共和国,我的这本苏黎世小册子那时曾多次再版,成了研究马克思主义对待战争态度的参考书。它在共产国际的“市场上”消失是在1924年之后,那时发现了“托洛茨基主义”。现在这是一本禁书,就像革命前那样。这样,我们可以看到,书籍确实是有其自身的命运的。

## 第十九章

# 巴黎和齐美尔瓦尔得

1914年11月19日，我以《基辅思想报》军事记者的身份进入了法国的边界。我欣然接受了报纸的建议，它使我有机会较为接近战争。巴黎一片凄凉，一到晚上街上漆黑一团。齐柏林式飞艇在天空盘旋。自从德国军队在马内被阻后，战争变得越加严酷无情了。在笼罩着欧洲的极端混乱中，在被社会民主党蒙蔽和出卖的工人阶级的沉默下，杀人机器发挥了它的自动力量。资本主义的文明把自己弄到荒谬绝伦的地步，竟企图敲碎人类厚厚的头盖骨。

当德国人临近巴黎，而法国的资产阶级爱国者弃城而跑的时候，两个俄国的流亡者在巴黎办了一份小小的俄文日报。它的任务是对被抛弃在巴黎的俄国人解释正在发展的事态，不让国际团结的精神泯灭。在第一期出版之前报社的“钱柜”里总共只有30法郎整。没有一个“思维健全”的人能相信，靠这么点固定资本就能办一份日报。真的，尽管编辑和撰稿人都是无报酬劳动，报纸还是每周要发生一次危机，仿佛是走投无路了。但出路还是找到了。忠于自己报纸的排字工人忍饥挨饿，编辑们则为筹措几十个法郎而满城跑，于是那一期就出版了。就这样，在资金缺乏和书报检查的打击下，报纸停刊后立即换个名称再出，终于存在了两年，即一直存在到1917年的二月革命。一到巴黎我便在《我们的言论报》竭尽全力地工作，当时该报称《呼声报》。对我来说，这家日报是明确发展中的事态的方向的最重要的武器。《我们的言论报》的经验对我后来从事军事工作非常有益。

我们全家到1915年5月才迁到法国。我们在塞夫勒的一间小屋里住了几个月,这是由我们的一位年轻的朋友、意大利艺术家雷纳·帕列什提供的。孩子们开始到塞夫勒的学校去上学。春光明媚,一片清绿,显得特别可爱。但是穿黑色丧服的妇女的数量却不断增加。不少学生都成了没有父亲的孩子。两年都隐蔽到地下去了。看不到出路,克列孟梭开始在自己的报纸上攻击霞飞<sup>①</sup>。反动的地下组织在策划国家政变。关于这方面的消息到处流传。在《时报》上,在一天或两天的时间里把议会称之为驴子。然而《时报》却严格要求社会党人维护民族的团结。

饶勒斯去世了。我到他被害的克罗桑咖啡馆去,想寻觅他的遗迹。在政治上我与饶勒斯相去甚远,但不能不感觉到这位强有力的人物的吸引力。构成饶勒斯精神世界的是民族传统,道德准则的形而上学,对不幸者的爱以及诗意的想象力,它如此鲜明地表现出贵族的特征,就像倍倍尔的精神面貌是平民的质朴一样。然而他们两人本身都高于他们所留下来的遗产。我在巴黎的人民会议上,在国际代表大会和在委员会上听过饶勒斯的演说,并且总像是第一次听那么新鲜。他不墨守成规,基本上从不重复故态,总是在重新发现自己,总是重新动员自己潜在的精神源泉。在他身上有像瀑布般的巨大的最必要的力量,同时又有许多温情柔意,犹如内心的高度修养的反光在脸上闪烁。他的语言有雷霆万钧的力量,使人有山崩地裂之感,但他自己却从来也不会被震聋,而总是警醒地守卫着,用耳朵敏锐地捕捉着每一个反应,抓住它,反驳反对意见,有时像暴风一样无情地扫荡路上的一切障碍;有时又像老师和兄长那样宽容体贴。饶勒斯和倍倍尔是两个极端,又同是第二国际的顶峰。两人都有着深刻的民族烙印;饶勒斯具有火热的拉丁民族的演说艺术,而倍倍尔则带有新教徒式的干巴巴的色彩。我对这两个人都喜欢,但喜欢的方面是各不相同的。倍倍尔因体力耗尽而死去,饶勒斯在年富力强的时

<sup>①</sup> 约·雅·塞·霞飞(1852—1931年)·法国元帅。1911至1914年任总参谋长,1914至1916年任法军总司令。 译注

倒下。但两个人都死得正是时候。他们的死标志着第二国际进步的历史使命的结束。

法国社会党处于完全瘫痪的状态中。饶勒斯的地位谁也取代不了。老“反军国主义者”瓦扬<sup>①</sup>天天发表充满狂热的沙文主义精神的文章。我是一个偶然的的机会在山党和工团代表参加的行动委员会上认识这位老人的。瓦扬像自己的影子——在雷蒙·彭加勒时代具有长裤汉战争传统的布朗基主义的影子。战前的法国，人口增长停滞，经济生活和思想保守，而瓦扬却觉得法国是运动和进步的唯一国家，是特选的负有解放使命的民族，只要和这个国家一接触，就能唤起其他民族去追求精神生活。他的社会主义是沙文主义的，而他的沙文主义又是救世主式的。马克思主义派的领袖茹尔·盖得<sup>②</sup>毕生致力于反对民主的盲目崇拜的艰巨的长期斗争，结果只是把自己清白的道德声望供奉在护国的“祭坛”之上。一切都弄乱了。《要么创造国王，要么创造和平！》一书的作者马塞尔·桑巴<sup>③</sup>在白里安内阁中对盖得进行场外指导。皮埃尔·列诺得尔<sup>④</sup>暂时当上了党的“领导人”。最终需要有一个人来填补饶勒斯的空缺。列诺得尔竭尽全力地模仿被害领袖的姿态与响亮的声音。龙格<sup>⑤</sup>羞羞答答地追随列诺得尔，还把这种羞涩当作左倾。他以自己全部的行为提醒人们，马克思是不能对自己的外孙负责的。以劳动总联合会主席茹奥<sup>⑥</sup>为代表的官方的工团主义在 24 小时内就黯然失色了。它在和平时期“否

① 爱·马·瓦扬(1840—1915年)——法国社会党人，巴黎公社主要领导人之一，布朗基主义者。——译注

② 茹·盖得(1845—1922年)——法国工人党创建人之一，第二国际中派领袖。——译注

③ 马·桑巴(1862—1922年)——法国社会党改良派领袖，新闻工作者。1914年8月至1917年9月任法国国防政府公共工程部长。——译注

④ 皮·列诺得尔(1871—1935年)——法国社会党右翼领导人之一，1915年至1918年任《人道报》社社长。——译注

⑤ 让·龙格(1876—1938年)——法国社会党和第二国际领袖之一，马克思的外孙。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是和平主义者。——译注

⑥ 莱·茹奥(1879—1954年)——法国劳动总联合会领袖，阿姆斯特丹工会国际右翼领袖之一。——译注

定”政府，为的是在战争时候拜倒在政府面前。革命小丑爱尔威<sup>①</sup>昨天还是极端的反军国主义分子，现在倒了过来，但作为一个极端的沙文主义者依然是一个自满自足的小丑。仿佛是为了更鲜明地嘲弄昨天的思想，他的报纸仍然叫做《社会战争报》。这一切加在一起就像一场穿丧服的假面舞会，死亡的狂欢节。不能不对自己说：不，我们是山更坚硬的材料制成的——事变不会使我们措手不及，我们曾预见某些情况，现在则预见到更多的情况，并在许多方面作好了准备。当列诺得尔、爱尔威和其他人在远处试图与卡尔·李卜克内西称兄道弟时，我们多少次地紧握着拳头！在这里那里，在党内和工团里，有一些零零散散的反对派分子，但他们几乎没有任何活力。

我在巴黎的俄国侨民中间所找到的最大的人物无疑是马尔托夫，他是孟什维克的领袖，是在我的生命旅途中所遇见的最有才能的人之一。这个人的不幸在于命运使他成为革命时代的政治家，然而却又没有为此赋予必要的意志力量。马尔托夫的精神世界是不平衡的，每当重大事情来临时，就会可悲地暴露出来。我在三个历史时期观察了马尔托夫：1905年、1914年和1917年。马尔托夫对事件的最初反应几乎总是革命的。但他还没有来得及把自己的思想写在纸上，怀疑便从四面八方包围了他。他那丰富的、灵活的、多种多样的思想缺乏意志作为主心骨。在第一次革命的高潮时，马尔托夫在1905年写给阿克雪里罗得的信中痛苦地抱怨说，他无法集中自己的思想。直到反动时期到来之前，他确实没能把思想集中起来。战争初期他又向阿克雪里罗得抱怨说，事变把它弄到神经错乱的边缘。最后，在1917年他犹豫不决地向左走了几步，而在自己一派内部则把领导权让给了策烈铁里和唐恩，也就是让给这样两个人，其中前者在才智方面，而后者在所有方面连他的一半都不及。

1914年10月14日马尔托夫写信给阿克雪里罗得说：“比起普

<sup>①</sup> 古·爱尔威(1871—1944年) 法国社会党左翼领袖之一，1905至1918年是工人国际法国支部的成员，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是社会沙文主义者。30年代拥护国家社会主义，主张法国同法西斯德国接近。——译注

列汉诺夫来，我们也许可以更容易地与列宁达成协议，看来列宁准备扮演反对第二国际里机会主义的战士角色。”但这些情绪在马尔托夫身上没有维持多久。我在巴黎遇见他时，他已经处于颓丧状态。我们在《我们的言论报》里的合作从最初起就变成了不可调和的斗争，这种斗争以马尔托夫离开编辑部，后来又退出撰稿人名单而告终。

我到巴黎后不久就和马尔托夫一起寻找工团主义者的杂志《工人生活》的编辑之一莫纳特<sup>①</sup>。莫纳特当过教师，后来是校对员，外表是一个典型的巴黎工人，聪明而有性格，与军国主义和资产阶级国家一分钟也没有妥协过。但出路何在？在这方面我们有分歧。莫纳特“否定”国家和政治斗争。可国家不顾他的否定，在他公开反对工团的沙文主义之后迫使他穿上红裤子从军去了。我通过莫纳特结识了记者罗斯梅尔，他也属于无政府工团主义一派，但正如事件所表明，当时他实际上已经比盖得派更接近马克思主义。从那时起我和罗斯梅尔建立了亲密的友谊，这种友谊经受了战争、革命、苏维埃政权以及粉碎反对派的考验……循着这条线我认识了以前我不知道的法国工人运动活动家：小心谨慎、城府很深、曲意逢迎的五金工会书记梅尔黑姆，他的结局从各方面来说都是非常可悲的；记者吉尔波，此人后来以捏造的“叛国罪”，被缺席判处死刑；桶匠工团书记布尔德朗“老爷子”；在革命社会主义道路上寻找出路的教师洛里欧，还有许多别的人。我们每星期在盖·热马普街晤面，有时人多，就在格龙热-奥-贝尔街。我们交换关于战争和外交工作的“内幕”消息，批评官方社会主义，捕捉社会主义觉醒的征兆，说服动摇者，为未来作准备。

1915年8月4日，我在《我们的言论报》上写道：“在迎接这血腥的周年的时候，我们毕竟精神上没有颓丧，政治上没有怀疑主义。我们革命的国际主义者在这世界浩劫中坚持分析、批判的立场和有预见的态度。我们拒绝戴上总参谋部提供的廉价的，甚至还给补贴的

<sup>①</sup> 皮·莫纳特(1881-1960年) 法国工会活动家和政论家。1904至1914年为法国劳动总联合会的领导人之一。——译注

‘民族主义’的眼镜。我们继续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认识他们，用它们的本名去称呼它们，并预见到它们今后发展的逻辑。”

如今，13年之后，我可以重复的也只是这些话。我们始终觉得自己比官方的政治思想，包括爱国的社会主义高明，这种感觉并不是非分的高傲。在这种感觉中没有任何个人的东西，它来自我们的原则立场，因为我们是站在高高的瞭望台上。批判的观点使我们首先有可能较为清楚地看到战争本身的前景。众所周知，双方都预计迅速取得胜利。可以举出无数轻率的乐观主义的证据。布坎南在回忆录里说：“我的一位法国同事一度非常乐观，拿5英镑来和我打赌，说战争将在圣诞节前结束。”布坎南本人在内心深处也认为战争不会迟于复活节结束。我们和所有官方的预言相反，1914年开始我们在日复一日地断言，战争将毫无希望地拖延下去，战争结束时整个欧洲将千疮百孔。我们在《我们的言论报》上几十次地写道，即使协约国取得胜利，法国在战后，在硝烟消散之后，充其量也只能作为一个大比利时出现在国际舞台上。我们很有把握地预见到美国今后将在世界上的称霸。我们在1916年9月5日第一百次写道：“帝国主义通过这场战争把赌注押在强者身上，世界将属于强者。”

我的家早已从塞夫勒迁到巴黎的乌德里小街。巴黎越来越荒凉。街头的大钟一只接一只地停了。不知为什么贝尔福特狮子的嘴里塞着脏稻草。继续往地下挖堑壕。冲出堑壕，摆脱停滞，跳出坑洼，挣脱静止状态——这是爱国主义的呼声。行动起来！行起起来！于是引出了一场可怕的、疯狂的凡尔登战役<sup>①</sup>，为避开军方书报检查，那些日子我在《我们的言论报》上写道：“不管凡尔登战役的军事意义有多大，但该战役的政治意义却无可比拟地要大得多。在柏林和其他地方（原话！），他们要求‘行动起来’，他们会行动起来的。听！凡尔登的战火正在锻造‘我们的明天’。”

<sup>①</sup> 凡尔登，法国城市和要塞。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1916年2月21日至12月21日德法两军在此激战，双方损失惨重，结果法军基本上恢复了原来的态势。



1915年夏天一位名叫莫尔加利<sup>①</sup>的意大利议员来到巴黎，他是社会党罗马议会党团的书记，一位天真的折中派，来的目的是想拉法国和英国的社会党人去参加一个国际会议。在一条林荫大道上的咖啡馆的凉台上，我们开了一个有莫尔加利参加的几个社会党议员会议，这些议员不知为什么自认为“左派”。当谈话仅限于和平主义的夸夸其谈和恢复国际联系的必要性的老生常谈时，事情进行得很顺利。但当莫尔加利以一种凄凉的低声谈到瑞士之行需要搞假护照时（他显然被“烧炭党”<sup>②</sup>的做法吸引住了），议员先生们板起了脸，有一人——我记不起是谁了——急忙叫来侍者，匆匆付了开会所喝的全部咖啡款。莫里哀的灵魂，似乎还有拉伯雷的灵魂，在凉台上出现了。事情到此结束。我和马尔托夫回家时大笑不止，既高兴又愤慨。莫纳特和罗斯梅尔已经被动员入伍，无法走了。我就和梅尔黑姆以及温和的和平主义者布尔德朗一起去参加国际会议。谁也不需要假护照，因为政府还没有彻底摆脱战前习惯，发给了合法的护照。

会议组织方面的事情由伯尔尼社会党领袖格里姆<sup>③</sup>负责，那时他正竭尽全力提高他的党和他个人，使之超出庸俗的水平。他把代表会议安排在离伯尔尼几十公里远的高山上一个名叫齐美尔瓦尔得的小村庄里。代表们挤在几辆敞篷马车里出发上山。行人好奇地瞧着这一列小小的车队。代表们自己开玩笑说，第一国际成立半个世纪后四辆马车居然可以装进全部国际主义者。但是这些玩笑中并无怀疑主义。历史的线索常常会中断。于是就得打一个新的结。我们在齐美尔瓦尔得做的正是这件事。

代表会议（9月5—8日）开得非常激烈。由列宁领导的革命派和由多数代表组成的和平主义派艰难地达成一份共同宣言，宣言的

① 奥·莫尔加利（1865—1929年）——意大利社会党人，新闻工作者。曾参加意大利社会党的创建工作。1919至1920年任社会党议会党团书记。——译注

② 烧炭党，19世纪意大利的秘密革命组织。——译注

③ 罗·格里姆（1881—1958年）——瑞士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领袖之一。齐美尔瓦尔得（1915年）和昆塔尔（1916年）代表会议主席，中派分子，曾参与组织第二半国际。——译注

草案是我起草的。宣言还没有把该说的话都说了，但它还是标志着大大地向前跨出了一步。列宁站在会议的极左翼。在一些问题上在齐美尔瓦尔得左派内部也只剩下他孤身一人。我在形式上不属于这一派，尽管在所有基本问题上我是和左派相近的。在齐美尔瓦尔得列宁为未来的国际活动上紧了发条。在瑞士的山村里他为革命的共产国际垒上了第一块砖石。

法国代表在自己的报告中指出了出版《我们的言论报》对他们的意义，这家报纸建立了和其他国家的国际主义运动的思想联系。拉柯夫斯基指出，《我们的言论报》在培养巴尔干社会民主党国际主义立场中起了巨大作用。意大利党通过巴拉巴诺娃<sup>①</sup>的大量翻译而了解了《我们的言论报》。然而，引用《我们的言论报》最多的是德国报刊，其中包括半官方的报刊，正如列诺得尔企图依靠李卜克内西一样，谢得曼<sup>②</sup>也不反对把我们称作他的盟友。

李卜克内西本人不在齐美尔瓦尔得。他还没有被投入监狱，就已成为霍亨索伦王朝军队的俘虏。李卜克内西给代表会议发来一封信，这封信标志着他从和平主义路线急剧地转向革命路线。会上不止一次地提到李卜克内西的名字。它已经成为使世界社会主义四分五裂的这场斗争中的普通名词。

严格禁止从齐美尔瓦尔得寄发有关代表会议的信，目的是不让消息事先走漏给报界。不给代表们在回国通过边境时造成困难。几天以后迄今毫无名气的齐美尔瓦尔得的名字传遍了全世界。这使旅馆老板大吃一惊。这位豪迈的瑞士人向格里姆声言，他预料自己的产业会身价百倍，因此他准备把一些钱用作第三国际的基金。不过，我认为他很快会改变主意的。

齐美尔瓦尔得会议大大推动了各国的反战运动。在德国斯巴达

① 安·伊·巴拉巴诺娃(1878—1965年)——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孟什维克，曾是意大利社会党中央委员和该党驻社会党国际局的代表，1917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党，后曾参加共产国际工作。——译注

② 菲·谢得曼(1865—1939年)——德国社会民主党右翼领袖之一。1919年2月至6月任魏玛共和国联合政府总理。——译注

克派<sup>①</sup>广泛开展工作。法国成立了“重建国际联系委员会”，巴黎俄国侨民区的工人更紧密地团结在《我们的言论报》周围，负担了报纸的资金及其他困难。起初热心地参与《我们的言论报》编辑和撰稿的马尔托夫，现在离开了。在齐美尔瓦尔得一些实质上是次要的分歧还把我和列宁分开，不过过了几个月分歧就消失了。

那时在我们头上乌云密布，在1916年期间乌云越来越浓了。反动的《自由报》作为广告刊登了指控我们为亲德派的短文。我们越来越经常地收到匿名的恐吓信。这些指控和恐吓无疑是来自俄国大使馆。在我们的印刷所周围总是有一些可疑的人物在转悠。爱尔威则以警察的黑手来恐吓我们。俄国流放犯问题政府委员会主席迪尔凯姆教授转告我们说，在政府里谈到要查封《我们的言论报》和驱逐编辑。然而，事情拖了下来。没有什么可挑剔的，因为我没有破坏法律，甚至没有破坏无法无天的书报检查。可总需要有一个体面的借口，最后借口找到了，或者说得准确些，制造出来了。

① 斯巴达克派，德国左派社会主义革命组织，其中央委员会的领导人有利卜克内西、卢森堡等。——译注

## 第二十章

# 驱逐出法国

在我到达君士坦丁堡之后，一些法国报刊报道说，事过 13 年之后，把我从法国驱逐出去的命令现在仍然有效。如果这是真的，那就只好再次相信，在最可怕的世界浩劫中并不是所有的宝贝都给毁了。不错，在那些年代里整整几代人死于霰弹之下，整座整座的城市被毁，一只只王冠被抛在欧洲的废墟之上，国家的疆域变动了，禁止我进入的法国的边界也移动了。然而在这巨大的突变中，1916 年初秋由马尔威先生<sup>①</sup>签署的命令还幸运地保存着。马尔威本人在这之后也成了被驱逐者，然后又重新回国，那又怎么样呢？在历史上一个人的双手所干下的事往往比其创造者更有力。

不错，严格的法学家可能会反对说，他不认为该项命令有必要继续生效。例如，1918 年驻莫斯科的法国军事使团把自己的一些活跃的军官交给我调遣。对待一个不准进入法国的“不受欢迎的”外国人未必可以这么做。再如，1922 年 10 月 10 日赫里欧<sup>②</sup>来访时在莫斯科拜会了我，但完全不是为了重提那道把我从法国驱逐出去的命令。相反地，当赫里欧先生盛情询问，我打算何时访问巴黎，这时我向他提及了这一命令。不过我提及此事具有开玩笑的性质。我们俩都笑

---

① 让·路易·马尔威(1875—1949 年)——法国激进社会党人，1914 至 1917 年任内政部长。——译注

② 爱·赫里欧(1872—1957 年)——法国激进党领袖，1916 年起多次任部长，1924 至 1925 年，1926 年和 1932 年任总理，1947 至 1954 年任国民议会主席。——译注

起来了——诚然，笑的原因各不相同，但毕竟在一起笑了。真的，1925年法国大使埃尔贝特先生在沙图拉发电站揭幕典礼上代表出席的外交官以极为客气的贺词回答我的讲话，连最挑剔的耳朵也无法在这贺词中发现马尔威先生命令的任何余音。所有这一切说明什么呢？无怪乎1916年秋天警察局的两个监督官把我从巴黎押送到伊伦时，其中一个对我说：“政府上台下台，警察局却是永存的。”

为了更好地了解我被赶出法国的背景，需要说一下我编辑的那份俄文小报的处境。这份报纸的主要敌人当然是沙皇的大使馆。就是在那里，卖力地把《我们的言论报》上的文章译成法文，加上相应的说明送给外交部和国防部。这两个部里又惶惶不安地打电话给军方书报检查官沙利先生，此人战前在俄国当了好多年的法文教师。沙利从不以果断著称。他犹豫的结果总是宁删不留。遗憾的是他没有把这条规则应用于几年以后他亲笔写的那部蹩脚的列宁传……作为一个胆怯的书报检查官，沙利所保护的不仅有沙皇、皇后、萨宗诺夫<sup>①</sup>、米留可夫的达达尼尔海峡的幻想，而且还有拉斯普廷<sup>②</sup>。可以毫无困难地证明，整个反对《我们的言论报》的斗争（真正的消耗战）不是由于报纸的国际主义，而是由于它反对沙皇制度的革命精神。

当俄国人在加利西亚打了一个胜仗的时候我们遇到了第一次严格的书报检查。沙皇大使馆在军事上取得一点小小的胜利后变得异常蛮横无理了。这一次竟然完全删去我们的维特伯爵讣闻，甚至连文章的标题“维特”两字也不让登。还应当补充的是，就在这个时候，在彼得堡海军部门的官方机关刊物上发表了攻击法兰西共和国的极端放肆的文章，嘲笑议会和它的“可怜的小皇帝”——议员们。我拿着彼得堡的杂志去找书报检查当局要求作出解释。

“其实，此事同我无关。”沙利先生对我说，“有关你们报纸的所有指示都是由外交部作出的。您是否想和我们的一位外交官谈谈？”

① 谢·德·萨宗诺夫(1861—1927年)——1910至1916年任沙俄外交大臣。十月革命后为高尔察克和邓尼金的驻巴黎代表。——译注

② 格·叶·拉斯普廷(1872—1916年)——沙皇尼古拉二世和皇后的宠臣。——译注

半小时以后一位头发花白的外交绅士出现在国防部。我们谈了话，根据谈话后不久所作的追记，内容大致如下：

“您能否给我解释一下，为什么删去我的文章，这篇文章涉及的只不过是一位下台的、已经失宠，而且业已死去的俄国官僚，这一措施同军事行动又有什么关系呢？”

“您知道吗，他们不喜欢这样的文章。”外交官回答说，一面向显然是俄国大使馆的方向含糊地摆了摆头。

“不过，我们正是要使他们不快才写这篇文章的……”

外交官对这一回答宽厚地笑了笑，把它当作一句好听的笑话。

“我们处在战争时期，我们要依靠我们的盟友。”

“您想说，法国内政是受沙皇外交部监督的？在这种情况下，你们的祖先砍下路易·卡佩特的脑袋是否砍错了呢？”

“噢，您夸大了。再说，请您别忘了，我们处在战争时期……”

接下去的谈话就变得没有什么内容了。这位外交官带着一种彬彬有礼的笑容对我解释说，因为达官贵人们是要死的，所以他们活着的时候不喜欢说死人的坏话。这次会晤以后一切如常。检查官照样删稿，报纸常常被删得只剩一张白纸。我们从来也没有违抗过沙利先生的意志，沙利先生更不违抗派他来的那些人的意志。

然而，1916年9月我被叫到警察局，向我宣读了把我驱逐出法国国境的命令。这是什么引起的呢？关于这一点，一个字也没有对我说，后来才渐渐明白，是俄国保安局所搞的恶毒的挑衅造成的。

当议员让·龙格到白里安<sup>①</sup>那里就驱逐我一事提出抗议，确切些说，去哭诉时（龙格的抗议听起来总是很温和的），这位法国总理回答他说：“可您知道吗，在马赛，在那些杀死上校的俄国士兵们身上搜到了《我们的言论报》？”这龙格没有料到。他知道报纸的“齐美尔瓦尔德”倾向，对此他还可以勉强妥协，但打死上校他却不能不感到意外。龙格去询问我的那些法国朋友，他们又来找我，可我对马赛事件

<sup>①</sup> 阿·白里安(1862—1932年)——法国律师，1909至1931年先后11次出任总理，17次任外交部长。——译注

了解得不比他们多。俄国自由派报纸的记者们，敌视《我们的言论报》的爱国派偶然介入了此事，他们查明了马赛事件的全部情况。事情是这样的：沙皇政府在派遣俄国士兵来到共和国土地上的同时，（这支部队由于人数不多，被称为“象征性部队”），急忙动员了相应数量的特务和挑衅者。在他们中间有个从伦敦来的叫维宁格（大概是这个名字）的人，他带有俄国领事的介绍信。起初维宁格企图拉温和的俄国记者在士兵中间进行“革命”宣传。但他马上遭到抵制。他不敢去找《我们的言论报》编辑部，所以我们甚至不知道他这个人。维宁格在巴黎受挫后就到土伦去，看来，在那里他在俄国的水兵中间取得了一点成功，因为水兵们很难识透他。“这里的土壤很适合我们开展工作，请给我寄些革命的书报来。”这是维宁格从土伦写给一些俄国记者的信，想碰碰运气，但没有得到他们的回音。在土伦，俄国巡洋舰阿斯科利特号上发生了激烈的骚动，接着被残酷地镇压了下去。维宁格在这件事上所起的作用是十分明显的，于是他决定及时转到马赛去活动。那儿的土壤也很“适合”。在马赛，俄国的士兵中间也爆发了骚动，结果一名叫克劳泽的俄国上校在兵营的院子里被乱石砸死。在牵连进此案被捕的士兵身上发现了那一期《我们的言论报》。当俄国记者们来到马赛了解情况时，一些军官告诉他们说，在暴动时某个名叫维宁格的人把《我们的言论报》塞给大家，不管他们要不要。就是因为这缘故在被捕者身上搜到了报纸，他们甚至连看都还来不及看的报纸。

需要指出的是，在龙格和白里安谈驱逐我的问题之后，也就是在查明维宁格在这一事件中所起的作用之前，我就在致茹尔·盖得的一封信里提出了一种推测，即《我们的言论报》可能是在需要的时刻被某个挑衅者蓄意散发给士兵们。这一推测从本报凶恶的敌人那里得到了无可置疑的证实，这比我预计的要快得多。但这根本无济于事。沙皇的外交部门使共和国政府十分清楚地懂得，如果它想要俄国士兵，就得立即捣毁俄国革命者的巢穴。目的达到了，到那时为止，一直犹豫不决的法国政府封闭了《我们的言论报》，而内务部长马尔威签署了警察局长预先准备好把我驱逐出法国的命令。

现在内阁觉得已经把事情掩盖得万无一失了。白里安不仅对让·龙格,而且还对其他某些议员,其中包括议会委员会主席莱格指出,马赛事件是驱逐我的原因。这不能不起作用。但由于《我们的言论报》毕竟是经过严格的书报检查,在巴黎报亭自由出售的一份报纸,它不可能号召谋杀上校,所以在挑衅的内幕揭露之前,此事一直是个谜。在议会里也开始知道这一内幕。有人告诉我,那时的国民教育部部长庞莱韦在得知事情的内幕时喊道:“这是耻辱……不能置之不理!”但战争正在进行,沙皇是同盟者,不能揭露维宁格,只能执行马尔维的命令。

巴黎警察局长通知我,说我被驱逐出法国后可到我自己选择的一个国家去。不过,又马上警告我说,英国和意大利谢绝我的光临。只有回到瑞士去了。但是,唉,瑞士的公使馆断然拒绝给予签证。我打电话给瑞士的朋友们,并得到他们令人欣慰的答复:问题将得到积极解决。然而,瑞士公使馆照旧拒绝签证。后来查明,俄国大使馆在协约国的帮助下,对伯尔尼施加了必要的压力,所以瑞士当局故意拖延解决问题,以便有时间把我驱逐出法国。要到荷兰和斯堪的纳维亚去只有取道英国,但英国政府断然拒绝给我通行权。剩下只有西班牙了。但这一回我本人拒绝到比利牛斯半岛去。和巴黎警察局的麻烦持续了6个星期左右。密探寸步不离地跟踪我,在我的住宅和我们报纸的编辑部附近都有人把守。目不转睛地盯着我。最后巴黎当局决定采取强硬措施。警察局长洛朗请我去,警告说:因为我拒绝自愿离开,所以将有两个警察局的监督官来找我,不过是穿“便衣”的。他以尽量客气的口吻补充说,沙皇大使馆达到自己的目的了。我被驱逐出法国。

我根据当时的札记所作的叙述在细节方面可能有一些小地方不太准确,但所有基本事实完全是无可争辩的。并且与此事有关的大多数人都还健在,他们中的许多人还在法国,还有文件保存着,还事实以本来面目是毫不困难的。从自己方面来说,我毫不怀疑,如果从警察局的档案里找出马尔威驱逐我的命令并对这个文件作一次指纹鉴定,那么在某个角落里肯定可以发现维宁格先生的指纹。



## 第二十一章

# 穿越西班牙

两名警察局的监督官在马德里小街我的寓所里等我。一个个子不高，几乎是老头了。另一个是彪形大汉，秃顶，45岁左右，皮肤黑得像焦油。这两人身穿不合身的便服。他们谈话时把一只手举到看不见的帽舌上，像在行军礼。当我和朋友们以及全家告别时，两位警察极有礼貌地躲在门后。那个老警察从门后走出来时，几次脱下帽子说：“对不起，太太。”

两个密探中的一个在最近两个月的时间里一直不知疲倦地死命跟踪着我，现在等在台阶旁。他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友好地整了整毛毯，关上车门。他的样子就像一个把猎物卖给顾客的猎人。我们动身了。

乘的是快车，三等车厢。老监督官原来是位地理学家。托木斯克、喀山、下诺夫哥罗德的集市——这一切他都知道。他讲西班牙语，了解这个国家。另一个，黑皮肤大高个儿好长时间一直沉默不语，皱着眉头坐在一旁。但后来不再拘束了。“拉丁人种在原地踏步，其他人种正在赶上它，”他出其不意地说，一边用戴着几只分量很重的镶嵌宝石戒指的多毛的手拿刀把一块猪肉切成薄片，“你们在文学方面有些什么呢？全都衰落了。哲学方面也是如此。从笛卡尔和帕斯卡里的时代起就停滞了……拉丁人种在原地踏步。”我惊奇地等待着他继续往下说，但他不作声了，开始吃抹上腌猪油的面包。“不久前你们有一个托尔斯泰，可是对我来说，易卜生比托尔斯泰更容易理解。”他又沉默了。

老监督官对这种突如其来的卖弄学识感到不快了，于是谈起西伯利亚铁路的意义。然后，补充同时也为缓和自己同事的悲观结论说：“是的，我们是缺乏创造性。大家都想做官。这很可悲，但不能否定。”我聆听着他俩的交谈，感到颇有意思。

“跟踪？啊，现在不成了。跟踪要不被发觉才有用，不对！应当直截了当地说，地铁破坏了跟踪工作。应当勒令被跟踪的人不许坐地铁，只有这样，跟踪才有可能。”接着黑个子苦笑了一下。老头想缓和一下气氛说：“我们常常跟踪别人，可悲的是连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们警察是怀疑论者，”黑个子又转了个话题说，“您有自己的思想，我们则保卫现存制度。就拿大革命来说吧，那时的思想多活跃！革命14年之后，人民却比任何时候都不幸。请读读泰恩<sup>①</sup>的书，……我们是警察，按职务来说是保守分子。怀疑主义是唯一适合我们职业的哲学。归根到底谁也不能选择自己的道路。意志的自由是不存在的，一切都是由事物的进程决定的。”

他直接对着瓶口喝起红葡萄酒来，然后塞上瓶塞说：“勒南<sup>②</sup>说过，新思想总是来得太早。这是有道理的。”

说到这里，黑个子用怀疑的目光扫了一下我的一只手，我偶然地把手放到门柄上了。为了使他放心，我把手伸进了口袋。

这时老头又抢去了话头，他谈起巴斯克人，谈他们的语言、妇女、他们的头饰以及其他等等。我们快到昂代车站了。

“戴鲁莱德，我们国家的浪漫主义作家，曾经在这儿居住过。他能看到法国的群山就足够了。唐吉珂德则住在自己的西班牙角落里。”黑个子极其宽容地笑着说，“先生，请跟我到车站的派出所去。”

在伊伦，一个法国宪兵向我提问，但我的同伴向他做了一个共济会的手势，便急忙领我穿过本站的过道。

① 伊·阿·泰恩(1828-1923年)——法国文学家、历史学家、实证论哲学家。——译注

② 厄·约·勒南(1823-1892年)——法国作家、宗教史学家、唯心主义哲学家、法兰西科学院院士、彼得堡科学院国外院士。——译注

“我们悄悄地把您送到了，是不是？”黑个子问我，“您可以从伊伦乘电车到圣塞瓦斯蒂安。为了不引起非常多疑的西班牙警察的怀疑，您应当装作一个旅游者。往后我就不认识您了，是这样吗？”

我们冷淡地告别了……

在圣塞瓦斯蒂安我欣赏了海景，但这里的物价却贵得惊人。接着来到马德里，在这里我谁也不认识，连一个人也不认识，也没有人认识我。因为我不懂西班牙语，因此即使在撒哈拉大沙漠或在彼得保罗要塞也不会比这儿更为孤独。只能求助于艺术的语言了。两年的战争使人忘记了艺术在世上的存在。我贪婪地观看马德里的无价之宝，和过去一样感到在这艺术中的“不朽”成分。伦勃朗、里贝拉、博萨·万·阿凯恩的绘画，就其天真的乐观情绪而言，是天才的作品。看门的老人给了我一个放大镜，让我欣赏米尔的作品中画得很小的农民、驴子和狗的形象。这里完全感觉不到战争的存在，一切都原封不动，色彩里充满着一种不受控制的生命力。

下面就是我在博物馆里记在自己笔记本里的内容：

“在我和这些老人之间（决没有排挤和贬低他们之意），在战前出现了一种新的艺术，较为亲密、较个人主义、较多色彩变化、较为主观、较为强化的艺术。战争也许将花时间去洗刷掉这些情绪和风格——用群众的激情和苦难去洗刷，但这决不会意味着简单地回到旧形式上去，尽管这是漂亮的形式，也决不是回到解剖学和植物学意义上的尽善尽美上去，不是回到鲁本斯的大腿上去（尽管大腿在新的、战后的、热烈向往生活的艺术中大概会起很大的作用）。要作出预言是困难的，但从几乎全体文明人类所直接经历的空前的感受来看，必定会诞生一种新的艺术……”

我坐在旅馆里，借助字典读西班牙文的报纸，等待着寄往瑞士和意大利的信的回音。我仍然想去那里。到马德里的第四天我收到一封巴黎来信，信中附有法国社会党人加比尔的地址。他在这儿担任保险公司的经理。尽管加比尔有资产阶级的社会地位，但他坚决反对自己党的爱国主义政策。我从他那儿了解到，西班牙完全处于法国社会爱国主义的影响之下。只有巴塞罗那的工团主义者才是不可

轻视的反对派。我想去拜访社会党书记安吉阿诺，但他由于就某天主教徒发表了不敬的评论而被判处监禁 15 天。要是在过去，安吉阿诺就会被活活烧死。

我等待着瑞士的回信，学习西班牙语，和加比尔交谈，参观博物馆。11 月 9 日加比尔安排我住的那个小公寓的女服务员以一种惊恐的手势把我叫到走廊里去。那里站着两个外貌很特别的年轻人，他们不太友好地请我跟他们走。上哪儿？自然是到马德里的警察局去。在那里他们让我坐在一个角落里。“就是说我被捕了？”我问道。

“是的，一两个小时。”

我在警察局一连坐了 7 个小时，连姿态也没有变换过。晚上 9 点把我领到楼上，我面对着俄林波斯的众神。

“说实在的，你们为什么要逮捕我？”

这个问题把俄林波斯的众神弄得不知所措，他们开始提出各种各样的说法。有一个人说是护照上的麻烦，这里俄国政府对进入俄国的外国人也不放过的。

“如果您知道我们为追捕我们的无政府主义者花了多少钱……”另一个人想得到我的同情。

“不过对不起，要知道我不能同时既替俄国警察局，又替西班牙无政府主义者负责。”

“当然，当然，这只是举个例子……”

“您的观点呢？”局长经过思考以后终于问道。

我通俗地叙述自己的观点。

“嗯，您瞧。”他们回答我。

结果局长通过翻译声明，我必须马上离开西班牙，而在这之前我的自由将受到“某些限制”。“您的思想对西班牙来说是太进步了。”他通过翻译真诚地说。

夜里 12 点，密探用马车把我送往监狱。监狱建成“五角星状”，由五幢四层楼的牢房组成，星的中央即交叉点上对物品进行了例行检查。楼梯是铁制的吊梯。狱中的夜晚死一般寂静，烟雾弥漫，一派恐怖景象。走廊里是几盏半明不暗的电灯。一切都非常熟悉，一切

都是老样子。铁皮的门打开时隆隆作响。一个大房间，半明不暗，难闻的监狱的气味，一张令人生厌的破烂的床。门轰隆一声关上了。这是第几次了？我打开栅栏外的一扇小窗，囚室里凉爽起来。我没有脱衣服，连扣子也没有解开就躺倒在床上，盖上自己的大衣。这时我才明白遭遇之荒唐。在马德里，还是在监狱里，我做梦也没有想到，伊兹沃尔斯基<sup>①</sup>干得真不错。在马德里！我躺在马德里“模范监狱”的床上，开心地笑了起来。一直笑到睡着。

在放风时刑事犯们向我解释说，这个监狱有付费的囚室和免费的囚室。一等囚室一昼夜一个半比塞塔，二等囚室75分。每个囚犯都有权住付费囚室，但无权拒绝住免费的囚室。我住的是一等付费囚室。我又开心地笑了起来。但归根到底是合乎逻辑的。在一个完全建立在不平等基础上的社会里，在监狱面前为什么要平等呢？此外，我还知道，付费囚室的居民每天放风两次，每次一小时，而其余的人总共只有半小时。这又是正常的。每天付一个半法郎的盗用公款者的肺有权比不付费的罢工者的肺呼吸更多的空气。

第二天叫我去作人体测量，还要我在手指上涂上印油，在卡片上按上指印。我拒绝了。于是他们便诉诸“暴力”，不过极为文雅礼貌。我瞧着窗户，而狱卒客气地将我的一个个手指涂上印油并在五花八门的卡片和纸上盖上来十个指印——先是右手，然后是左手。接着又要我坐下，脱掉鞋子。要按脚指印就难一些了。狱吏们围着我忙作一团。最后出人意外地让我去会见加比尔和安吉阿诺，安吉阿诺头一天刚出狱，不过是另一个监狱。他们告诉我说，已开动了所有的机器设法使我获释。在走廊里我碰到监狱里的神甫，他对我的和平主义表示了自己天主教的同情并安慰我说：“忍耐，忍耐。”除此之外现在我也别无他法了。

12日早晨密探告诉我，今天晚上我必须到加的斯去，问我是否愿意自己掏钱买票。但我不打算到加的斯去。我坚决拒绝自己付钱

<sup>①</sup> 董·彼·伊兹沃尔斯基(1856-1919年)——沙俄外交大臣(1906-1910)，曾任驻法大使(1910-1917年)。——译注

买票。在模范监狱花钱坐牢已经足够了。

就这样，晚上我们由马德里动身到加的斯去，旅费由西班牙国王负担。但为什么要到加的斯去呢？我再看了一下地图，加的斯在欧洲西南半岛的最末端。从别列佐沃坐鹿车经过乌拉尔到彼得堡，从那里绕道到奥地利，从奥地利经瑞士到法国，从法国到西班牙，最后穿过整个比利牛斯半岛到加的斯。总的方向是：由东北向西南。接下去大陆已到尽头，前面就是海洋了。忍耐！

护送我的几个密探没有对我们的旅行保密，相反地，只要谁感兴趣，他们都详尽地介绍我的历史，并且从最好的方面加以介绍：说我不是造假币的人，而是个贵族，但是坚持不恰当观点的贵族。大家都安慰我，说加的斯的气候非常好。

“你们到底怎么找到我的？”我问密探。“很简单，根据巴黎来的电报。”我也是这样想的。马德里警察局收到巴黎警察局的一份电报：“一名危险的无政府主义者某某越过圣塞瓦斯蒂安附近的边界，想在马德里住下。”因此，他们早就在等我，到处找我，由于在整整一个星期内找不到人而惶惶不安。法国警察“态度客气地”把我送过边界，一名蒙泰涅和勒南的崇拜者甚至问我：“我们悄悄地把您送到了，是不是？”可是与此同时，同一个警察局却向马德里发电报，说一个“危险的无政府主义者”已经越过伊伦、圣塞瓦斯蒂安。

所谓法警局局长比代—福帕在这件事中起了很大的作用。他是跟踪和驱逐我的首脑。比代与自己的同僚们不同，表现得异常粗暴和凶恶。他企图以沙皇宪兵军官都不允许使用的那种腔调和我说活。我们的谈话总是以破裂告终。离开他时我感觉得到背后那仇视的目光。在监狱中与加比尔见面时我表示确信，我的被捕是比代—福帕安排的。由于我这么一提，这个名字便传遍了西班牙的报纸。不到两年，比代先生的账得到清算，命运给我以出乎意料的满足。1918年夏天有人给陆军人民委员部打来一个电话，说比代，雷神比代，被关在一个苏维埃监狱里了。我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原来，法国政府派他参加军事使团到苏维埃共和国来从事间谍和阴谋活动，而他疏忽大意，被抓住了。不能再从混墨西斯（报应女神）那里得

到更大的满足了，特别是如果再加上签发驱逐我的命令的法国内务部长马尔威本人在这以后不久也被克列孟梭政府驱逐出法国，罪名是搞和平主义的阴谋。真想不到事情会这么巧，好像专供拍电影似的！

当比代被带到陆军人民委员部来见我时，我没有马上认出他来。这位雷神变成了凡人，而且外表邈邈。我困惑莫解地瞧着他。“是的，先生，是我。”他说着垂下了头。是的，这是比代。“但怎么会这样？怎么可能呢？”我真的感到震惊。比代沉思般地摊摊手，以警察的那种斯多噶哲学自信地说：“事变的进程如此。”正是这样！一个非常好的公式！在我的记忆里出现了把我带到圣塞瓦斯蒂安的那个黑个子宿命论者：“没有选择的自由，一切都是预先决定了的。”“但是，比代先生，您在巴黎毕竟对我不很客气啊！……”“唉，这我应当痛苦地承认，人民委员先生，我在牢房里常常反省这一点。”他又意味深长地补充说：“蹲在监狱里了解一下监狱，对一个人来说，有时是有好处的。但是我还是希望我在巴黎的行为不会对我产生可悲的后果。”我叫他放心。“我回到巴黎将不再干我以前干的事。”他向我保证说。“真的吗？比代先生，人总是喜欢重操旧业的。”我常常把这番情景讲给朋友们听，所以我能记住我们的谈话，就像昨天才发生的那样。后来比代在交换俘虏中被释放回法国。他以后的命运我就不得而知了。

然而我们还要从陆军人民委员部回到前面去，回到加的斯去。

加的斯警察局长和省长商量以后通知我说，明天早晨8点钟我将动身到哈瓦那去，非常凑巧，明天有轮船开往哈瓦那。

“去哪儿？”

“哈瓦那。”

“哈—瓦—那？”

“哈瓦那！”

“我不会自愿去的。”

“那我们将不得不把你关进船舱里去。”

谈话时作为翻译在场的德国领事馆的一位秘书、警察局长的朋友劝我“尊重现实”。

忍耐！忍耐！但这已经太过分了。我再一次声明，这样不行。在一个密探的伴随下，我去电报局发电报，在这座迷人的城市的街道上奔跑，却无心观赏景致。我给加比尔、安吉阿诺、保安局局长、内务部长、总理罗曼诺内斯、各自由派报纸、共和国议员们发了加急电报，在电文可以容纳的篇幅内列举各种论据。然后我又向各地发信。我在给意大利议员塞拉蒂<sup>①</sup>的信中说：“亲爱的朋友，请您想象一下，如果现在您在维特尔，处在俄国警察的监视之下，打算把您驱逐到您完全不想去的东京——我目前在加的斯的处境大体上就是这样，现在处在去哈瓦那的前夕。”然后我又和密探去找警察局长。在我的压力下，由我出资，局长给马德里发了一份电报，说我宁可留在加的斯的监狱里等待去纽约的轮船，而不愿去哈瓦那。我不想屈服。这是非常紧张的一天！

那时，共和国议员卡斯特罗维多就我被逮捕和驱逐一事向议会提出质询。报纸上开始发生争论。左翼攻击警察局，但作为亲法派，他们又指责我的和平主义。右翼同情我的“亲德”倾向（我不是平白无故被驱逐出法国的），但害怕我的无政府主义。在这一片混乱中谁也弄不清楚是怎么回事。不过还是允许我留在加的斯，等待最近去纽约的轮船。这是一个重大的胜利！

此后几个星期我一直在加的斯警察局的监视之下，但这完全是和平的和家庭式的监视，与在巴黎时不同。在巴黎的最后两个月里我花了不少力气去摆脱密探。我坐上孤零零的一辆小汽车，跑进漆黑的电影院，在最后一分钟跳进地铁车厢，或者相反，出其不意地跳出车厢，等等。密探也没有打瞌睡，千方百计，想尽办法跟踪我，拦截汽车，在电影院的出口处守候，急急忙忙从电车和地铁里飞跑出来，引起公众和售票员的愤怒。其实，这是为艺术而艺术。我的政治活动完全是在警察的眼皮下进行的。但密探的跟踪激起了竞技的本能。而在加的斯，密探声明他将在什么时候回来，我就得耐心地在旅

<sup>①</sup> 扎·梅·塞拉蒂(1872—1926年)，意大利社会党领导人之一，1924年随社会党内“第三国际派”加入意大利共产党。——译注



馆等他。就他那方面来说，他保护我的利益，在买东西时帮助我，叫我注意人行道上坑坑洼洼的地方。当叫卖油炸小虾的小贩一打虾要收我2个列阿尔时，密探就大骂起来，威胁和挥舞双手，小贩已经走出咖啡馆，他还追出去，在窗下大声叫喊，引来人群围观。

我竭力不使时间白白浪费：在图书馆里研究西班牙史，背诵西班牙文的动词变位，为准备到美国去而温习英语词句。白天在不知不觉中度过，一到晚上我常常伤心地发现动身的日子临近了，而我的学习还进展不大。在图书馆里我总是一个人，如果不把书籍的蛀虫也计算在内的话。这些蛀虫咬坏了好多卷18世纪出的书，有时我常常花很大力气去辨认名字或日期。

我在当时的笔记里找到这样一段备忘录：“一位研究西班牙革命的历史学家谈到了这样一些政治家，他们在人民运动胜利前5分钟还斥责运动为罪犯和发疯，而胜利以后，他们却马上出头露面了。这位老历史学家继续说，这些狡猾的先生们出现在以后所有革命中，而且喊得比谁都响亮。西班牙人把这些狡猾的家伙称之为‘Panistas’——这个词源出于肚皮一词。大家知道，从这个词又派生出我们的老相识桑丘·潘扎<sup>①</sup>的绰号。这一称呼很难翻译（损人利己的家伙，行不行？）但这种困难是语言学上的而不是政治方面的。这种类型的人完全是国际性的。”1917年以后又有不少情况使我对此深信不疑。

值得注意的是，加的斯的报纸对战争一字不提，似乎它根本不存在。当我提醒一些与我交谈的人说，最畅销的《加的斯日报》完全不登战争消息时，他们惊奇地回答我：“是吗？不可能……是的，是的，真是如此。”就是说，他们过去没有发觉。归根结底，战争是在比利牛斯以外的地方进行的。我自己也开始和战争疏远了。

到纽约去的轮船是从巴塞罗那启航的。我得到许可到那里去与家属会面。在巴塞罗那又和警察局发生了新的麻烦，于是再表示抗议，发电报，又来了新的密探。全家都来了。在这段时间里他们在巴

<sup>①</sup> 桑丘·潘扎，塞万提斯的《唐·吉珂德》中的人物。——译注

黎焦急不安,然而现在一切都好了。在密探的伴随下我们参观了巴塞罗那。孩子们对大海和水果十分称赞。到美国去的想法我们已经接受了。我想从西班牙取道意大利到瑞士去,但奔走没有成功。不错,在意大利和瑞士社会党人的坚决要求下,终于允许了,但那时已经是12月25日,我已带了家眷乘上西班牙的轮船离开了巴塞罗那港。这种贻误自然是预谋的。伊兹沃尔斯基在这方面配合得很不错。

在巴塞罗那我被关在欧洲大门之外了。警察局安排我带了家眷乘坐西班牙大西洋运输公司的“蒙谢拉特”号轮船,该轮需17天才能把活货和死货运抵纽约。对克里斯托福尔·哥伦布的时代来说,17天这段时间是很引人入胜的——哥伦布的纪念碑就矗立在巴塞罗那港。在一年中这最坏的季节里大海特别汹涌狂暴。轮船从各个方面向我们提示人生的脆弱。蒙谢拉特号是一艘不宜在大洋里航行的旧船,但在战争时期中立的西班牙国旗降低了被击沉的危险。由于这个原因,西班牙公司船票昂贵,设备却很差,伙食也不好。

旅客形形色色,各色人等很少使人感兴趣。这里有不少各国的避难者,多半是很有地位的人物。一位画家带了自己的画、自己的天才、自己的家眷和自己的财产在老父亲的保护下远离火线;一个拳击手(他也写小说,是奥斯卡·王尔德的堂兄弟)公开承认,宁可在体面的比赛中打碎美国佬的下巴,也不愿让德国人刺伤自己的肋骨。台球冠军,一位无可指摘的绅士对轮到他这种年龄的人服役感到愤怒。为了什么?为了这毫无意义的屠杀?不,所以他表示了自己对齐美尔瓦尔得思想的同情。其他的人也都是这一类的:逃避战争者、冒险家、投机商或被赶出欧洲的“不受欢迎”分子,否则谁会在这个时候乘上可怜的西班牙小轮船去横渡大西洋呢?……

三等舱里更难分辨。这些人拥挤地躺着,很少活动,很少讲话,因为他们的食物不多,从一种贫困,严酷和令人厌恶的贫困,驶往眼下前途渺茫的另一种贫困,因而一个个愁眉苦脸。美国在为烽火连天的欧洲干活,它需要新的劳动力,但必须是不患沙眼,不搞无政府主义,不患其他疾病的。

轮船为孩子们打开了辽阔的视野。他们每一次都会发现新的东西。“知道吗？这里有位司炉工非常好，他是个‘共和者’。”由于他们不断地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所以他们讲一种独特的语言。“是共和主义者？那你们是怎样了解他的呢？”“他所有的事都给我们解释得很清楚，他说起阿尔丰斯<sup>①</sup>，随后就说，呼哨<sup>②</sup>。”“嗯，就是说，真的是位共和主义者。”我赞同说。孩子们给司炉工送去马拉加葡萄干和其他美味食品。他们把他介绍给了我们。这位共和主义者 20 岁左右，原来，他对君主制有很明确的观点。

1917 年 1 月 1 日。轮船上大家互相祝贺新年。开战以来我在法国过了两个新年，第三个新年在大西洋上度过。1917 年将会说些什么呢？

1 月 13 日，星期日。我们快到纽约了。夜里三点我们都醒了，大家站着。漆黑，寒冷，风雨交加。岸上是湿淋淋的高楼大厦。新大陆！

---

① 西班牙国王。——译注

② 射击声。——译注

## 第二十二章

# 在 纽 约

我到了纽约，到了神话般的资本主义自由化城市，在街头立体派的美学理论取得胜利，而在人心中占上风的则是美元的道德哲学。纽约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为它最充分地体现了当今的时代精神。

关于我的传说，大概以我在美国的生活的传说为最多。挪威我只是路过，有发明创造能力的新闻记者却硬说我曾干过洗鳕鱼的行当，在纽约我呆过两个月，报界说我哪一行都干过，而且一行比一行离奇。如果把报界加之于我的奇遇搜集在一起，大概会得到一本比我现在写的更为引人入胜的传说。不过我不得不使美国读者失望。我在纽约的唯一职业是一个革命社会主义者的职业。因为事关“民主”、“解放”战争，所以那时在美国这种职业并不比贩私酒的职业更为有罪。我写文章，编报纸，在工人集会上发表演说。我忙得很，并不觉得自己是异乡人。我在纽约的一家图书馆里勤奋地研究美国的经济生活。美国在战争期间的出口额的增长使我感到惊讶。这些数字对我来说是个真正的意外发现。这些数字不仅注定美国的参战，而且注定美国在战后将在世界上发挥决定性的作用。就在那时我就这个问题撰写了一系列文章，作过几次报告。从这时起，“美国与欧洲”的问题就一直是我主要关注的问题之一。甚至现在我还认真地研究这个问题，希望能写一本书。对理解人类的未来命运来说，没有比这个题目更重要的了。

到纽约后的第二天，我就在俄文报纸《新世界报》上写道：

“我离开了血腥的欧洲，但深信革命即将来临。我踏上这块已够古老的新大陆时，不抱任何‘民主’幻想。”十天以后，我在欢迎我的“国际欢迎大会”上发表如下讲话：“最重大的经济事实是，欧洲经济在彻底破产，而美国正在大发其财。我嫉妒地看着纽约，但依然感到自己是个欧洲人，我彷徨不安地自问：欧洲能维持下去吗？它是否会变为一片墓地？世界的经济和文化重心是否会转移到美国这儿来？”尽管所谓欧洲的稳定有所成就，但是这个问题至今依然存在。

我在纽约各区，在费城和其他邻近的城市用俄语和德语作报告。当时我的英语比现在还差，因此我从未想过用英语发表公开演说。但是我不止一次地看到人们常常援引我在纽约的英语讲话。最近君士坦丁堡的一位报纸编辑向我本人描述了其中一次杜撰的我的演说，还说，他作为美国的大学生出席了这次会议。很抱歉，我没有勇气对他说，他本人就是他自己杜撰的牺牲品。咳！他却更为自信地把他的回忆登上自己的报纸。

我们在工人区租了一套住房，并且以分期付款的办法购置了家具。月租 18 美元的住所配备了欧洲人前所未有的设备：电灯、煤气灶、浴室、电话、自动送运食品和倒垃圾的升降机。所有这一切立即使我们的孩子对纽约产生了好感。电话一度成了他们生活的中心。我们在维也纳和巴黎却还没有这种气派的工具。我们这所房子的门房是个黑人。我妻子预付给他三个月的房租，但是没有拿到规定的收条，因为房东在头一天把收据本拿去查账了。两天后我们搬进这个住所发现这个黑人拿了几家房客的房租逃跑了。除了钱以外，我们还让他保管一些行李。这样一来我们感到惊慌了。这是个不吉利的开端。好在行李还在。我们打开了放碗碟的木箱，发现了我们的美元，它们被仔细地用纸包着，这使我们大为惊讶。门房只拿走那些拿到正式收据的房客的房租。黑人对房东毫不留情，但他不想给房客带来损失。他真是个好心人。我和妻子对他的关怀深为感动，他给我们留下良好的记忆。这件小小的意外事件对我来说具有巨大的征兆性意义。在我面前隐约露出了美国“黑人”问题的一角。

那几个月美国正在加紧备战。和平主义者和往常一样帮了大

忙。他们那种和平比战争好的廉价演说到头来总是许诺，如果战争是“必要”的话，他们将支持战争。布赖恩就是本着这个精神鼓动的。社会主义者为和平主义者帮腔。众所周知，和平主义者只在和平时期才把战争看作敌人。

在德国宣布进行无限制的潜水艇战以后，美国东部地区的各车站和港口，军需物资堆积如山，铁路堵塞。消费品的价格顿时飞涨，我在最富有的纽约看到成千上万个母亲走上街头，推翻小贩摊，捣毁出售消费品的小铺。战后，全世界将成什么样子呢？我一再问自己和其他人。

2月3日，终于宣布了期待已久的与德国的断交。沙文主义的调子唱得越来越高。和平主义者唱的男高音和社会党人唱的假声并没有破坏乐曲的和谐。这一切我早在欧洲就已经看到了，对我来说，美国目前进行的爱国主义动员只不过是老调重弹而已。我在自己的俄文报纸上指出了这一进程的各个阶段，同时思考着人类的愚蠢，他们吸取教训是如此的迟钝。

有一次我从编辑部的窗口看到这样一幅图景：一个眼睛肿胀、须发斑白散乱的老头站在垃圾筒旁边，从里面检出一只大圆面包。老头用手捏了捏面包，接着用牙齿啃这块硬得像石头一样的东西，后来又拿它在垃圾筒上敲了几下。可是无济于事，面包仍然没有变形。于是他回头一看，不知是有点害怕，还是有点窘迫，把捡到的东西塞进褪色上衣里，沿着圣马可街蹒跚而去……这件小事发生在1917年3月2日。它丝毫也没有破坏统治阶级的计划。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和平主义者应当支持这场战争。

布哈林是我在纽约最先遇到的人之一，不久前他刚从斯堪的纳维亚被驱逐出来。早在维也纳时期，布哈林就认识我们一家了，这时他以他所特有的孩子般的兴奋心情来欢迎我们。尽管我们很疲劳，时间又晚，但是布哈林还是在第一天就领我和妻子去参观公共图书馆。从在纽约共事起，布哈林对我的依恋越来越强烈，直到1923年突然转向了反面。这个人的特点就是如此，他总要依靠某一个人，在某一个人领导下工作，粘附在某一个人身上。在这种情况下布哈林

只不过是这个人言行的载体。不过对这个载体必须时刻提防，否则他会不知不觉地落到直接对立的影响之下，就像有的人跌倒在汽车底下一样，以后又会以同样忘我的热情去诽谤他刚刚还在吹捧的偶像。我从未过分认真地看待过他，任他自行其是，而这就意味着让他去受别人的摆布。列宁逝世以后，布哈林成了季诺维也夫的载体，后来又成了斯大林的载体。就在我写这几行字的时候，布哈林又在承受着一场新的危机，一种我还不了解的新的精神流质正在侵入他的机体。

那时候，柯伦泰也在美国。她到处跑，我遇到她的机会较少。大战期间她急剧地向左转，从孟什维克队伍转向布尔什维克的左翼。她懂得多种语言，再加上她的气质，使她成为一个宝贵的鼓动家。她的理论见解总是模糊不清的。在纽约期间，在她看来世上的一切都不够革命。她和列宁通信。她向列宁提供美国的情况，其中包括我的活动情况，但各种事实和思想都经过她那时的极左的三棱镜的折射。在列宁的复信中，可以发现这种显然不恰当的消息的回声。后来，那些不肖徒辈在反对我的斗争中毫不犹豫地利用了列宁所作的分明是错误的评论，尽管他本人已经通过言论和行动表示放弃原先的意见。在俄国柯伦泰从一开始就持极左的反对派立场，不仅对我，而且对列宁。她多次为反对“列宁—托洛茨基体制”而战，然后以动人的姿态拜倒在斯大林体制之下。

美国社会党在思想方面甚至比欧洲社会爱国主义还落后。可是，当时还持中立态度的美国报界对“狂乱的”欧洲所表现出的傲慢态度也反映在对美国社会党人的看法上。像希尔奎特<sup>①</sup>那样的人并不反对自己扮演社会主义的美国大叔的角色，在必要的时刻出现于欧洲，为第二国际彼此敌对的政党进行调停。就是现在，我还是不免回想起美国那些社会主义领袖。那些移民在青年时期曾在欧洲起过一些作用，但在争取胜利的混乱斗争中很快就失去了从欧洲带来的

<sup>①</sup> 莫·希尔奎特(1869—1933年)——美国社会党人，律师。起初倾向马克思主义，后转向改良主义和机会主义。——译注

理论前提。在美国存在一个有成就的和半有成就的医生、律师、牙医、工程师等人的广泛阶层，他们在宝贵的余暇听欧洲明星的音乐会和参加美国社会党的活动。他们的世界观是由他们在学生时代学得的一鳞半爪的知识构成的。由于除此以外他们每人都拥有汽车，他们总是加入各种领导委员会和党的代表团。正是这批高傲的人物给美国的社会主义盖上他们自己的精神印记。对他们来说威尔逊享有的盛望大大高于马克思。实际上这只是巴比特<sup>①</sup>先生的变种，他平时从事商业活动，在星期天则冥想一下人类的未来。这些人生活于小小的民族集团之中，在这里思想的一致往往是商业联系的掩饰。每一个小集团都有自己的领袖，通常就是最富裕的巴比特。他们可以容忍各种思想，只要这种思想不破坏他们的传统权威，不威胁到——上帝保佑——他们个人的安宁。希尔奎特是有成就的牙医们的理想的社会主义领袖，是巴比特的典型。

我同这些人的第一次接触就足以引起他们对我的公然的憎恨。我对他们的感情也许比较平静，但也同样没有多大好感。我们属于不同的世界。在我眼里，他们是过去和现在与之斗争的那个世界的最腐朽部分。

在老一代人中间尤金·德布兹<sup>②</sup>老人是出类拔萃的，他的内心燃烧着永不熄灭的社会主义的火焰。德布兹是个虔诚的革命家，然而是个浪漫主义者和说教者，根本不是政治家和领袖，他容易受那些在各方面都不如他的人的影响。希尔奎特的本领在于使德布兹成为他的左翼，同时又不破坏同龚帕斯<sup>③</sup>在事务上的友谊。德布兹个人很有魅力。见面时他总是拥抱我，吻我；需要指出，这个老人并不是“干巴巴的”人。当巴比特宣布对我实行封锁时，德布兹并不参与，他

① 巴比特是美国小说家辛克莱·刘易斯作品的篇名及主人公，意指现代实业家（气质的）。——译注

② 尤·维·德布兹（1855—1926年）——美国社会党和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创建人之一，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持国际主义立场。——译注

③ 塞·龚帕斯（1850—1924年）——美国劳工联合会创建人之一，长期任该会主席。——译注



只是痛心地退在一旁。

我一开始就参加了俄文日报《新世界报》编辑部，编辑部除布哈林外，还有沃洛达斯基<sup>①</sup>（后来在彼得格勒城郊被社会革命党人杀害）和丘德诺夫斯基<sup>②</sup>（后来曾在彼得格勒城郊受伤，最后在乌克兰被杀害）。该报是国际主义革命宣传的中心。在社会党所属各民族支部中有通晓俄语的工作人员。俄罗斯支部中的许多成员也会说英语。《新世界报》的思想就通过这种途径渗透到广大的美国工人中间。正式的社会党的官员们大为惊慌。他们开始疯狂地策划反对欧洲移民的阴谋，说他们昨天刚刚踏上美国的土地，不懂得美国人的心理，就想把他们的空想的方法强加于美国工人。斗争进行得十分激烈。在俄罗斯支部中“经过考验的”和“劳苦功高的”巴比特们很快就被排挤出去了。在德意志支部中《人民报》总编辑、希尔奎特的战友施留特尔渐渐失势而让位于赞同我们观点的年轻编辑劳勒。拉脱维亚人完全和我们站在一起。芬兰支部倾向于我们。我们越来越成功地打进了力量强大的犹太支部，该支部拥有一幢 14 层楼的大厦，那里每天印出 20 万份《前进报》，散发伤感的市侩社会主义的腐败气味，并时刻准备充当最卑鄙的叛徒。在纯美国工人中间，整个社会党，包括我们革命派的联系和影响都比较薄弱。党的英文报纸《呼声报》持内容空洞的和平主义的中立态度。我们决定着创办一份战斗的马克思主义周刊。准备工作在全速进行。但它被俄国革命打断了。

电报神秘地中断两三天之后，传来了第一批关于彼得格勒改变的消息，但是既模糊、又混乱。人种复杂的纽约工人群情激奋。人们抱着希望，同时又害怕抱有希望。美国新闻界处在茫然失措之中。

① 弗·沃洛达斯基(1891—1918年)——俄国革命活动家。十月革命的参加者，后任出版、宣传和鼓动事务委员。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成员，1918年6月20日被社会革命党人杀害。——译注

② 格·伊·丘德诺夫斯基(1890—1918年)——俄国革命家。十月革命时军事革命委员会委员，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攻打冬宫的领导人之一，参加镇压克伦斯基—克拉斯诺夫叛乱，1918年在乌克兰战线的一次战斗中牺牲。——译注

新闻记者、访员、新闻栏编辑、驻地记者从四面八方涌到《新世界报》编辑部。我们的报纸一时成了全纽约新闻界关注的中心。社会党的编辑部和组织不断打电话询问：

“我们接到电报，说彼得格勒已组成古契柯夫—米留可夫内阁。这意味着什么呢？”

“这就是说，明天将会会有一个米留可夫—克伦斯基内阁。”

“是这么回事！然后呢？”

“然后——然后将是我们。”

“哎哟！”

这样的谈话被重复了数十次。几乎每个和我谈话的人都把我的话当作开玩笑。在可敬的和最可敬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举行的一次小型会议上，我作了个报告，在报告中我论证了在俄国革命的第二阶段无产阶级政党必然夺得政权。它所产生的效果，就像一块石头扔进了一个挤满着妄自尊大而又萎靡不振的青蛙的泥潭之中。英格尔蒙博上毫不迟疑地向会议解释说，我连政治算术的四则运算都不懂，因此不用5分钟就可以驳倒我的梦话。

工人群众对革命前景的态度截然不同。在纽约到处都举行群众大会，无论就其规模，还是就其情绪而言都是不寻常的。红旗在冬宫飘扬的消息到处引起了兴奋的欢呼。不仅是俄国的移民，而且还有他们的常常连俄语都几乎不懂的孩子们也来参加这些集会，共享革命带来的欢乐。

我只能抽出一点点时间回家看看。而家里的生活也是很复杂的。妻子操持家务。孩子们有了新朋友。他们最主要的朋友就是M. 医生的汽车司机。医生的夫人同我妻子一起带孩子们去散步，对他们很亲切。但她只是一个平凡的人。而司机是个魔法师、巨人、超人。他一挥手，车子就听他的。坐在他的身旁是最大的幸福。走进点心铺时，孩子们会委屈地纠缠着母亲问：“为什么司机不和我们一起呢？”

孩子们适应环境的能力是惊人的。在维也纳，我们大部分时间住在工人区，所以孩子们除会讲俄语和德语外，还能讲一口地道的维

也纳土话。阿弗雷德·阿德勒博士非常满意地称赞说，孩子们说起土话来就像一个真正的维也纳老车夫。在苏黎世学校里，孩子们不得不改学苏黎世土话，低年级教的就是这种语言，至于德语，那是作为一种外国语来学的。在巴黎，孩子们又马上学起了法语。几个月内他们完全掌握了法文。看到他们流利地讲法语，我常常感到羡慕。他们在西班牙和西班牙船上，总共才呆了不到一个月时间，但是这点时间他们已足以学到许多最有用的单词和语句了。最后到了纽约，他们在美国学校里上了两个月课，又大致上掌握了英语。二月革命以后，他们成了彼得格勒的学生。学校生活一片混乱。外国语在他们的记忆中消失得比他们以前学得还快。但他们的俄语一如外国人，我常常惊奇地发现，他们所造的俄语句子好像是从法文准确地翻译过来的。然而他们已经不会用法语造这个句子了。我们在国外飘泊的经历，就这样铭刻在孩子们的脑海里，就像写在刮过的羊皮纸上一样。

当我从报社打电话告诉妻子彼得格勒发生革命的消息时，我们那个最小的孩子正患白喉躺在床上。他才9岁，但早已清楚地知道，革命意味着大赦，返回俄国以及无限幸福。他一骨碌爬了起来，在床上跳起舞来，庆祝革命。这表明他是在康复了。我们急于乘第一班轮船回国。我奔走于各领事馆去办护照及签证。启程前夕，医生准许正在康复的孩子出去散步。妻子让儿子出去玩半个小时，自己开始收拾行李。她这样收拾行李已不知多少次了！但孩子没有回来。我当时在编辑部。令人心焦的3个小时过去了。我们家里响起了电话铃，先是一个陌生男子的声音，接着是谢廖沙的声音：“我在这儿。”“这儿”指的是纽约另一端的警察局。孩子利用他第一次外出散步的机会，想解决一下使他苦恼已久的问题：“是否真的有第一条街？”（要是我没有弄错，当时我们住在164条街）。可是他迷了路，向人家问起路来，于是被带到了警察局。幸亏他记得我们的电话号码。当我妻子和大儿子一小时后赶到警察局时，她受到热烈欢迎，就像一位恭候已久的客人那样。谢廖沙脸涨得通红，在同警察下跳棋。为了掩饰由于警察对他的过分关照而引起的腼腆，他与新朋友们使劲

地嚼着咖啡色的美国口香糖。因此他至今还记得我们在纽约住所的电话号码。

要是说我认识了纽约,那是言过其实了。我过快地投身于美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并且专心致志。俄国革命又来得过快。所以我仅仅感觉到被称之为巨大怪物的纽约的一般生活节奏。在我启程前往欧洲时,我感到自己似乎是一个用一只眼睛窥见了锻造人类命运的人。我用以后什么时候还要回来的想法自慰。就是现在我也没有放弃这一希望。

## 第二十三章

# 在集中营

3月25日，我到了俄国驻纽约的总领事馆，那时尼古拉二世<sup>①</sup>的像已从墙上取下，但是那里依然笼罩着浓厚的旧俄警察局的气氛。拖延和争吵是免不了的，最后总领事吩咐发给我返回俄国所需文件。在英国驻纽约的领事馆里，我填好调查表以后，他们对我说，英国当局对我取道英国不会设置任何障碍。这样，一切都安排停当了。

3月27日，我和家眷以及几个同胞一起搭乘挪威“克里斯蒂安尼亚峡湾号”启程了。人们用一束束鲜花和热情洋溢的演说为我们送行。我们回革命的国家去。我们持有护照和签证。革命、鲜花和签证温暖了我们这些游子的心。轮船在哈利法克斯（加拿大）受到英国海军当局的检查，警官们对美国、挪威、丹麦和其他国家乘客们护照的检查只是例行公事，对我们俄国人却是直接审问：我们持何种信仰，有何种政治计划，等等？我拒绝同他们谈论这些问题。有关我的身份的情况尽管问，但除此之外，无可奉告，俄国的国内政治问题暂且还不受英国海上警察监督。可是，在对我再次审问的企图失败之后，侦缉军官们梅琴和韦斯特伍德就向其他乘客打听我的情况。侦缉军官硬说我是可怕的社会主义者。同那些幸而不属于英联邦的乘客相比，对我们的侦讯是如此下流无耻，对俄国革命者是如此歧视，

---

<sup>①</sup> 尼古拉二世（1868—1918年） 俄国末代皇帝（1894—1917），于1917年二月革命中被推翻。 译注

致使某些被审讯者就警探的行为向英国当局提出了强烈抗议。我没有这样做，因为向鬼王别西卡<sup>①</sup>控告恶鬼是无济于事的。那时我们还没有预见到事变以后的进展情况。

4月3日，英国军官带着水兵登上了克里斯蒂安尼亚峡湾号，以当地海军上将的名义要求我和我的家属，以及5名乘客下船。至于这个要求的理由是什么，他们答应到哈利法克斯将对整个事件作出“解释”。我们宣布这个要求是非法的，拒绝服从。于是全副武装的水兵就向我们猛扑过来，在许多乘客高呼“无耻”的喊声中，把我们架到一艘海军快艇上，在巡洋舰护卫下，把我们押送到哈利法克斯。当数十个水兵揪住我的时候，我的大儿子前来帮忙，用小拳头打一名军官，并喊道：“再接他一拳好吗，爸爸？”当时他才11岁。就这样我上了英国民主政治的第一课。

警察把我妻子和孩子留在哈利法克斯。其余的人则用火车送往亚默斯的德国战俘营。在战俘营的办公室里我们受到搜查，这种搜查我甚至在彼得保罗要塞也没有经历过。因为在沙皇要塞里脱光衣服，由宪兵搜身是单独进行的，而在民主的盟国这里，我们却当着十几个人的面蒙受无耻的侮辱。我永远记得那个头戴红色刑警帽子的瑞典籍加拿大中士奥尔森，他是这次搜查的主要头目。在远处指挥此事的坏蛋们清楚地知道，我们是无可非议的俄国革命者，是返回被革命解放的祖国去的。

直到第二天上午，俘虏营长官莫里斯上校才来答复我们再三提出的强烈要求和抗议，正式向我们说明逮捕的原因。他简短地告诉我们：“你们对俄国现政府来说是危险人物。”上校不是个能言善辩的人，从一清早起他的脸上就露出可疑的慌张神色。“可是俄国政府在纽约的代理人已发给我们返回俄国的通行证，还是让俄国政府自己去关心它自己的事吧！”莫里斯上校想了一下，摆了摆下颚，补充说：“你们对所有盟国来说都是危险人物。”始终未出示逮捕我们的任何证件。上校以个人的名义补充说，我们作为政治移民，显然不是无缘

① 别西卡在基督教书籍中为魔王，即地狱统治者的名称。——译注

无故离开自己国家的，所以不必对现在碰到的事感到惊奇。对这个人来说，并不存在俄国革命。我们试着向他解释说，那些在当年把我们弄成政治移民的沙皇大臣们由于来不及逃往国外，现在自己进了监牢。但对这位在英国殖民地和与布尔人<sup>①</sup>战争中高升的上校来说，这些情况是过于复杂了。由于我在和他谈话时没有表示出应有的尊敬，因此他在我背后咆哮道：“要是他在南非海岸上落到我手里就好了……”这是他喜爱的口头语。

我妻子在形式上不是政治移民，因为她是持合法护照离开俄国的。但是她还是和两个孩子一起被捕了，当时一个孩子 11 岁，另一个才 9 岁。说孩子被捕并非言过其实。起先加拿大当局想把孩子同母亲分开，把孩子送进少年收容所。这种前景使我妻子大为震惊，她声明决不允许孩子离开自己。只是由于她的抗议，当局把孩子们和母亲一起安置在一个俄裔英国警探家里，为了防止“非法”发出信件或电报，这个警探不允许孩子上街，即使没有母亲陪同也不许单独外出，除非有人监视。直到 11 天以后，妻子和孩子才搬入旅馆，但必须每天去警察局报到。

亚默斯集中营设在一个从德国老板手中没收的一家铸铁厂的破烂不堪、严重荒废的大楼里。靠大厅的每一面墙都安置了两层三层的简单板床。我们大约 80 人就住在这样的环境里。这种卧室的夜间气味是可想而知的。在过道行走时人们挤成一团，胳膊肘互相碰撞着，有的躺着，有的站着，有的打牌或下棋。许多人在做手工，有些人的手艺还相当高超。至今我还在莫斯科保存着亚默斯俘虏们的手工艺品。尽管被关押的人英勇地努力保护自己的肉体和精神，但还是有 5 个人发了疯。我们和这些疯子在同一室内饮食和睡眠。

在和我一起生活了约一个月之久的 800 名俘虏中，约 500 人是被英国人击沉的德国军舰上的水兵，约 200 人是战争爆发后留在加拿大的工人，还有近 100 人是在被俘的资产阶级出身的文武官员。我

<sup>①</sup> 布尔人是非洲南部荷兰移民的后裔。——译注

们同德国被俘难友的关系取决于他们怎么看待我们作为革命社会主义者被捕这件事。住在木隔板后面的军官和海军上士立即视我们为仇敌。但是普通群众越来越同情我们。我在集中营里度过的一个月就像是参加了一个连续不断的群众大会。我向俘虏们讲述了俄国革命，介绍了李卜克内西、列宁，解释了旧的国际崩溃的原因以及美国参战，等等。除了作公开报告外，我们还不断分组谈话。我们的友谊与日俱增。普通俘虏可以依照他们的情绪分成两类。一些人说：“不，够了，这种局面应该永远结束了。”这些人向往街头，向往广场。另一些人说：“这些事与我有什么相干？不，我以后再不上他们的当了……”“你怎么躲开他们呢？”另一些人问道。煤矿工人巴宾斯基是个身材高大、长着一对蓝眼睛的西利西亚人，他说：“我同妻子、孩子们搬到密林里去，周围设下陷阱，不带枪决不出门。谁也不能走近……”“也不让我进来吗，巴宾斯基？”“也不让你进来，我谁也不相信……”水兵们竭力改善我的生活条件，但由于我的坚决反对，我争得了排队打饭，参加诸如扫地、削土豆、洗碗碟、打扫厕所等劳动的权利。

普通士兵与军官们之间的关系是敌对的，有些军官甚至在被俘后还把“自己的”水兵的表现记入记过簿里。军官们最后向集中营的长官莫里斯上校密告了我进行的反爱国主义的宣传。英国上校立即站到霍亨索伦王朝的爱国主义那一边，禁止我再作公开演讲。不过这已经是我们在集中营的最后几天的事了，它只是使我和水兵、工人的关系更加密切，他们对莫里斯上校的禁令报以530人联名签署的抗议书。在奥尔森中士严厉监督下举行的这种公民投票，使我获得了极大的满足，足以补偿关押在亚默斯期间所受到的一切苦难。

在集中营整个关押期间，当局始终不给我们同俄国政府联系的权利。我们致彼得格勒的电报他们压下不发。我们曾试图在致英国首相劳合·乔治的电报中控诉这一禁令。但是这份电报也被压下了。莫里斯上校在殖民地习惯于简化的人身保护令<sup>①</sup>。加上战争又

<sup>①</sup> 人身保护令规定没有逮捕证不得擅捕公民，被军警机关拘捕的人有权要求在24小时内审讯或释放。——译注



掩护了他。集中营长官在准许我同妻子会见之前规定了条件，我不能让妻子去同俄国领事馆联系。这也许难以置信，但却是事实。我拒绝会见。不消说，领事不会急于来帮我们的。他在等待指令。而指令显然没有下达。

应当说一下，我们被捕和获释的内幕我至今也没有完全弄清楚。英国政府应是在我还在法国工作的时候就把我的名字列入黑名单了。英国政府千方百计地帮助沙皇政府把我撵出欧洲。显然，英国当局依据这张旧名单，还有我在美国的反爱国主义活动的情报，就在哈利法克斯将我逮捕了。当我被捕的消息登载在革命的俄国报纸上时，英国大使馆显然不担心我会回去，就向彼得格勒各报散发了一个公报，说在加拿大被捕的俄国人“领取德国大使馆的津贴，准备回来推翻临时政府”。这至少说得毫不含糊。列宁指导下的《真理报》于4月16日对布坎南<sup>①</sup>作了这样的无疑出自列宁手笔的答复：“托洛茨基在1905年曾担任彼得堡工人代表苏维埃主席，几十年来无私地献身于革命的一位革命家，我们能够相信，哪怕是一瞬间相信他会同德国资助的计划有联系的消息吗？须知这是对一个革命家的公然的、闻所未闻的恶毒诽谤！布坎南先生，您是从哪里获得这条消息的呢？……6个人拖着托洛茨基同志的手和脚走，而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对俄国临时政府的友谊！”

临时政府本身在整个事件中扮演什么角色，这就更不清楚了。关于当时的外交部长米留可夫由衷地赞同逮捕我，这是无需证明的：早在1905年，他就恶毒攻击过“托洛茨基主义”；托洛茨基主义这个名词本身也是他发明的。但是米留可夫要依赖苏维埃，必须小心谨慎地行动，因为他的社会爱国主义的盟友们尚未开始诬蔑布尔什维克。

英国大使布坎南在其回忆录里对这件事是这样描述的：“托洛茨基和其他一些人在哈利法克斯一直拘留到我们查明了临时政府对他

<sup>①</sup> 乔·威·布坎南(1854—1924年)——英国外交家。1910至1918年任驻俄大使。——译注

们的态度时为止。”根据布坎南的说法，立即向米留可夫通报了我們被捕的消息。英国大使似乎在4月8日就向本国政府转达了米留可夫关于释放我们的要求。可是两天以后，同一个米留可夫却收回了他的要求，并表示希望继续把我们拘留在哈利法克斯。布坎南最后说，“所以，他们继续被拘留应该由临时政府负责。”所有这一切很像是真话。布坎南在回忆录里唯一忘记阐明的的问题是：我为推翻临时政府而领取的德国津贴干什么用了。无怪乎被我逼得走投无路的布坎南在我一到彼得格勒，就被迫在报纸上发表声明，关于津贴一事他毫无所知。人们从来没有像在“伟大的”、“解放”战争期间这样说过谎。如果谎言具有爆炸力的话，那么我们的星球早在凡尔赛和约签订之前就已化为灰烬了。

最后，彼得格勒苏维埃进行了干预，于是米留可夫只得屈服。4月29日，我们从集中营获释的时刻来到了。然而，释放我们时也使用了暴力。简单地命令我们收拾好自己的东西，然后押走。我们要求解释清楚，送我们到哪里去，目的地是哪里。我们的要求遭到拒绝。俘虏们感到不安了，以为要把我们送到一个要塞去。我们要求召请离这里最近的俄国领事，又遭到了拒绝。我们有充分理由不相信这些海盗的善意。我们声明，如果不向我们说明此行的目的地，我们就不会自愿前往。集中营的长官下令采用暴力。押送的士兵把我们的行李搬走了。我们还是顽强地躺在铺板上。押送的士兵要执行把我们硬架出去的任务，恰如一个月前把我们从轮船上架下来一样，不过由于这次还要穿过一大群激动的水兵，这个长官才作了让步，以他特有的那种英国殖民地官员的口吻对我们说，他将让我们乘一艘丹麦轮船回俄国去。上校那气得发紫的脸上，肌肉在抽搐。他无论如何也接受不了我们将逃出他的魔掌的思想。要是我们在非洲海岸上落到他手里的手！……

当我们被带出集中营的时候，难友们为我们隆重送行。军官们闭门不出，只有几个人从门缝中伸出了鼻子，但水兵和工人们却在过道两侧排成队伍，临时凑起的乐队演奏了革命进行曲，每个角落都向我们伸出了友谊的手。有个俘虏发表了简短的讲话，向俄国革命致

敬，诅咒德国君主制。即使到现在，每当我回忆起战争期间我们在亚默斯同德国水兵的联欢，还感到无比亲切。在以后的年代里，我还收到过他们中许多人从德国寄来的友好书信。

逮捕我们的那个英国警官梅琴，在我们启程时也在场。作为临别赠言，我威胁他说，我在立宪会议上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就英国和加拿大警察对俄国公民的侮辱向米留可夫外长提出质询。

这个机灵的宪兵回答说：“但愿您永远进不了立宪会议。”

## 第二十四章

# 在彼得格勒

从哈利法克斯到彼得格勒这段路程就像过隧道那样，不知不觉就走完了。这也确实是条隧道——通向革命的隧道。路经瑞典，我只记得粮食配给证，我是第一次看到这样的配给证。在芬兰，我在火车上遇见了王德威尔得<sup>①</sup>和德·曼<sup>②</sup>，他们也去彼得格勒。“您认识我们吗？”德曼问道。“啊，认得，虽然在战争期间人变得很厉害。”我回答说，这句不太礼貌的暗示结束了我们的谈话。德·曼在青年时代曾想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甚至还卖力地攻击过王德威尔得。大战期间，他结束了青年时代在政治上的纯真追求，战后又结束了在理论上的追求。他成了本国政府的一个代理人，仅此而已。至于王德威尔得，他在第二国际领导集团中是个最不出色的人物。他当选为主席只是因为这项职务既不能选德国人，也不能选法国人担任。在理论上，他仅仅是个编纂者。他在社会主义各思想流派之间随机应变，犹如他的政府对列强那样。他在俄国马克思主义者中间从来没有威望。作为一个演说家，王德威尔得充其量不过是个杰出的庸人。大战期间，他不担任国际主席，而改任王国大臣。我在自己办的巴黎报纸上同他进行了不调和的斗争，作为回答，王德威尔得号召俄

---

① 埃·王德威尔得(1866—1938年)——比利时右翼社会党人，比利时工人党领袖，第二国际社会党执行局主席。1914年参加资产阶级政府，历任外交、司法、卫生等部大臣。——译注

② 昂利·德·曼(1885—1953年)——比利时社会党人，1939年起任比利时社会党主席。曾任劳工大臣和财政大臣。——译注

国革命者与沙皇制度和解。现在他赴彼得格勒邀请俄国革命者取代沙皇政府参加盟国行列。我们无话可谈。

由联合派国际主义者和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组成的代表团前来别洛奥斯特罗夫车站欢迎我们。孟什维克，甚至“国际主义者”（马尔托夫等人）都没有派一个人来。我拥抱了老朋友乌里茨基，我和他初次相识是20世纪初在西伯利亚。他是巴黎《我们的言论报》在斯堪的纳维亚的经常撰稿人，大战期间还负责我们与俄国之间的联系。我们这次见面后一年，乌里茨基被一名年轻的社会革命党人杀害了。在这个代表团里，我第一次遇见了卡拉汉<sup>①</sup>，后来他成了一个著名的苏联外交官。代表布尔什维克的是费多罗夫，五金工人，不久当上了彼得格勒苏维埃工人部主席。在抵达别洛奥斯特罗夫之前，我已从最新的俄国报纸得知切尔诺夫<sup>②</sup>、策列铁里<sup>③</sup>和斯柯别列夫<sup>④</sup>加入了临时联合政府。各政治集团的作战部署顿时一清二楚。从头一天起，就面临着同布尔什维克一起展开反对孟什维克和民粹分子的不调和的斗争。

我们在彼得格勒的芬兰车站受到了隆重的欢迎。乌里茨基和费多罗夫讲了话。接着我致了答词，谈了准备第二次革命的问题，这次革命将是我们的革命了。当人们突然抓住我，把我高高抬起来时，我立刻想起在哈利法克斯遇到过同样的情况。但是，这一次是朋友们

① 列·米·卡拉汉(1889—1937年)——1917年十月革命的参加者，当时担任彼得格勒苏维埃秘书、军事革命委员会委员，布列斯特和谈苏俄代表团秘书。1918年至1920、1927至1934年任副外交人民委员。——译注

② 维·米·切尔诺夫(1873—1952年)——社会革命党的创建人之一，该党的理论家。19世纪80年代末投身革命活动。参加过齐美尔瓦尔德和昆塔尔代表会议。1917年任临时政府农业部长，1918年1月任立宪会议主席。后来是几个反革命政府的成员，逃亡国外。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参加过法国的抵抗运动。——译注

③ 伊·格·策列铁里(1881—1959年)——孟什维克领袖之一。第二届杜马代表。1917年任临时政府邮电部长。1918年是格鲁吉亚孟什维克政府首脑之一。1921年移居国外。——译注

④ 马·伊·斯柯别列夫(1885—1938年)——孟什维克，1922年加入俄共(布)。1917年二月革命后任彼得格勒苏维埃副主席、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副主席、临时政府劳动部长。——译注

的手。周围挂着许多旗帜。我看到了妻子激动的脸，孩子们苍白不安的脸，他们不知道是凶是吉，因为革命已经欺骗过他们一回了。我发现王德威尔得和德·曼落在后面，在月台的尽头。他们故意走在后面，看来是不想冒险混入人群。新上任的社会党人部长并没有去迎接比利时的同仁们。王德威尔得昨天所扮演的角色在大家的脑海中仍记忆犹新。

车站上的欢迎仪式刚结束，我就开始卷入漩涡，人人事事就像激流上的木片那样沉沉浮浮。最重要的事件留在个人记忆中的印象反而最淡薄，记忆力就是这样来保护自己，免得负担过重。我好像是从车站径直去执行委员会参加会议的。当时的常任主席齐赫泽<sup>①</sup>冷冰冰地欢迎我。布尔什维克以我在1905年曾任苏维埃主席，提议我参加执行委员会。会场一片混乱。孟什维克同民粹主义者交头接耳议论了一阵。在这段时期里，他们在所有的革命机构里都还占绝对多数。最后决定我参加执行委员会，有发言权。我获得了一张委员证、一杯茶加一份黑面包。

不仅孩子们，连我和妻子都对彼得格勒街头上人们说的俄语和墙上挂的俄语招牌感到新鲜。我们离开首都已经10年，当时大孩子刚刚1岁出头，小的生在维也纳。

彼得格勒有一支庞大然而十分虚弱的卫戍部队。士兵们胸前斜挂着红条带，唱着革命歌曲阔步行进。这一切像梦一样，令人难以置信。电车里塞满了士兵。在宽敞的大街上还进行着操练。步兵们形成散兵线卧倒、跑步、再卧倒。革命背后仍然站着战争这个大恶魔，给革命投下了阴影。但是群众已不再相信战争了，因而继续操练好像只是因为忘了停下来的缘故。战争已不可能再打下去了。不仅立宪民主党人，而且连所谓“革命民主派”的领袖们都不理解这一点。他们死死地抓住协约国的裙摆不放。

<sup>①</sup> 尼·谢·齐赫泽(1865-1926年)——孟什维克领袖之一。1917年任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和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1918年起是格鲁吉亚孟什维克政府首脑。1921年起流亡海外。——译注

我对策列铁里了解得不多，与克伦斯基<sup>①</sup>素不相识，跟齐赫泽颇有交往，斯柯别列夫则是我的学生，至于切尔诺夫，我在国外的几次报告中已同他论战过几次。同郭茨<sup>②</sup>是初次见面。这就是苏维埃民主政权的统治集团。

策列铁里无疑高于其他人一头。我初次遇到他是在1907年伦敦代表大会上，当时他代表第二届杜马的社会民主党党团。早在年轻的时候，他已经是一个卓越的演说家了，并以品德高尚博得人们的好感。服苦役的岁月提高了他的政治威望。当他返回革命舞台的时候，已经成熟了，立即在他的伙伴和盟友中间占据首要地位。在我的对手中，他是唯一需要认真对付的。但是，正如历史上常有的那样，需要革命来证实策列铁里不是个革命家。为了不在革命陷于困境的时候迷失方向，必须从世界的观点，而不是从俄国的观点来看待俄国革命。然而，策列铁里是从格鲁吉亚的经验，再加上第二届国家杜马的经验观点来看待俄国革命的。他的政治眼界十分狭隘，受的是肤浅的文学教育。他对自由主义毕恭毕敬。他用为文化担心的一知半解的资产者的眼光去看待不可避免的革命进程。对他来说，觉醒的群众越来越像铤而走险的无知暴徒。头几句话就清楚表明他是敌人。列宁称他为“笨蛋”。这个称呼虽然严厉，却很准确。策列铁里的才智和诚实都很有限。

列宁称克伦斯基是个吹牛家。对这一点现在还可以作些补充。克伦斯基过去是现在仍然是个偶然冒出的人物，是在一个历史时刻的暂时掌权人。每一个新的革命激浪都吸引了一大群还不能明辨是非的天真无邪的群众，同时也不可避免地要把那些自我陶醉的英雄暂时推向浪峰。克伦斯基继承了加邦和赫鲁斯塔廖夫的衣钵。他使

① 亚·费·克伦斯基(1881—1970年)——俄国政治活动家、律师，第四届国家杜马中劳动派领袖。在临时政府中先后任司法部长、陆海军部长，7月起任总理，8月30日起任最高总司令。十月革命后逃亡国外。——译注

② 阿·拉·郭茨(1882—1940年)——社会革命党领袖之一，1917年二月革命后当选第一届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十月革命后为“拯救祖国和革命委员会”成员，1922年因反对苏维埃政权被捕，赦免释放后从事经济工作。——译注

必然性中的偶然性人格化。他最好的演说只不过是臼中春水，徒劳无益。1917年水沸腾了，上升为蒸汽。一股股蒸汽看起来像个光环。

斯柯别列夫在维也纳参加了政治活动，当时他是个大学生，受我的指导。他离开维也纳《真理报》编辑部，回到了故乡高加索，试图进入第四届杜马。他成功了。在杜马，斯科别列夫受到孟什维克的影响，后来和他们一起参加了二月革命。我们的联系早就中断了。我在彼得格勒遇到他时，他是新上任的劳动部长。在执行委员会里，他向我大步走来，问我对“这个问题”是怎么想的。我回答说：“我想，我们很快就会战胜你们的。”不久以前，斯科别列夫笑着向我提起这个友好的预言，这个预言在6个月以后就实现了。十月革命胜利后，斯科别列夫很快就宣布自己是布尔什维克。我和列宁反接受他人党。现在，他当然是个斯大林分子。在这一点上，事情是顺理成章的。

我和妻儿们住在一家“基辅旅馆”的一个房间，并且还不是一下子就找到的。第二天，一位容光焕发的军官来拜访我们。“您不认识我了？”“我不认得了。”“我是洛基诺夫。”眼前站着的盛装的军官使我想起了1905年的一个青年锻工。他是一个战斗队的队员，曾在街头同警察作过战，并且怀着青年人的满腔热情追随过我。1905年就不见他的踪影了。只是现在，我才从他嘴里知道，他其实不是无产者的洛基诺夫，而是个工学院大学生，名叫谢列布罗夫斯基，出身于富裕家庭，但在青年时期已经和工人打成一片了。在反动时期，他成了一名工程师，早已脱离革命，在战争期间，他是彼得格勒两家最大的工厂代表政府方面的厂长。二月革命微微震动了他，使他回想起过去的岁月。他从报纸上得知我回来的消息。现在他站在我面前，要我全家搬到他的住所里去住，并且现在就去，刻不容缓。我们犹豫了一下，最后同意了。这是一套宽敞而豪华的厂长住宅，谢列布罗夫斯基和他年轻的妻子就住在里面。他们没有孩子。一切都是现成的。在一个半饥饿的破烂不堪的城市里，我们就像进入天堂一样。但是一当谈话转入政治，情况立即就恶化了。谢列布罗夫斯基是个爱国主



义者。后来发现，谢列布罗夫斯基对布尔什维克怀有刻骨仇恨，认为列宁是德国的间谍。不错，在刚一交谈就遭到反击之后，他立即变得谨慎一些了。然而，和他住在一起，对我们来说是不可能的。我们离开了殷勤好客，但同我们格格不入的主人的住所，回到了“基辅旅馆”的房间。这以后，谢列布罗夫斯基再次把孩子们请到自己家里去作客。他用茶和蜜饯来招待他们，孩子们怀着感激之情向他转述了列宁在群众大会上的讲话。他们的脸涨得通红，对谈话和蜜饯感到满意。“但是要知道，列宁是德国的密探。”主人对他们说。这是怎么回事？难道可以这样说吗？男孩推开了茶点。他们跳了起来。“哼，这是猪猡的语言。”大孩子说。他在自己的语录中再也找不到足以应付局面的更好的词了。这下子轮到主人受屈了。我们的结交就到此为止。我们取得十月革命胜利以后，我把谢列布罗夫斯基吸引过来参加苏维埃工作。和许多人一样，他经过苏维埃的工作加入了党。如今他是斯大林的党中央委员，是政权的骨干之一。如果说他在1905年曾被看成无产者，那么现在更容易被看成布尔什维克了。

“七月事变”（关于这一事变后面还要谈）以后，对布尔什维克的诽谤充斥街头。我被克伦斯基政府逮捕了，在从国外归来两个月之后，我又重新进入了非常熟悉的“十字监狱”。亚默斯的莫里斯上校满足地在晨报上谈到这条消息，有这种心情的人还不止他一个人。但孩子们不满意了。他们责问母亲，要是爸爸一会儿被关到集中营，一会儿被关进监狱，这叫什么革命？母亲同意他们的说法，这还不是真正的革命。然而，怀疑论的苦味已潜入孩子们的心头。

从“革命民主制”的监狱里出来以后，我们迁到一幢资产阶级大楼里的一间小套间里，房东是一个自由主义记者的遗孀。这时，正全力以赴地准备十月变革。我担任了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报刊从各个方面提到我的名字。我们的家越来越紧地被敌意和仇视的墙包围着。我们的厨娘，安娜·奥西波夫娜每次去住房委员会领取面包时，总是遭到主妇的攻击。我的儿子在学校里受到攻击，因父亲的缘故也被叫做“主席”。我的妻子在木器工人工会工作，当她下班回来时，看门老头总是用仇恨的眼光看着她。上楼梯真是一种受罪。女房东

越来越频繁地打电话来询问，她的傢具是否被损坏了。我们想搬家，但是搬到哪里去呢？城里没有房子。这种局面越来越难以忍受。然而有一天，确实是美妙的一天，对住所的封锁突然停止了，就像有人用一只万能的手把它解除了。看门的老头遇到我妻子时鞠躬行礼，只有最有权势的房客才能得到这样的礼遇。住房委员会在发给面包时也不再耽搁和进行威吓了。现在，再没有人在我们眼前砰的一下把门关上了。这一切是谁干的，是哪一位魔法师干的？是尼古拉·马尔金。关于他我们应当谈一谈，因为通过他，通过一批马尔金，十月革命才取得了胜利。

马尔金是波罗的海舰队的一个水兵、炮手，又是布尔什维克。他没有一下子被发现。抛头露面完全不是他的本性。马尔金不是个演说家，说起话来很费劲。再说，他是个腼腆和忧郁的人——内心充满了忧郁。马尔金是用整块材料，并且是真正的材料铸成的人。他开始照料我家的时候，我竟然不知道有这么个人。他结识了孩子们，在斯莫尔尼宫的小吃部里他用茶和夹肉面包招待他们，他使孩子们得到了小小的欢乐，在那严酷的年代里，这样的欢乐是不多的。他常常悄悄来询问，是否一切都顺利。我根本没料到他的存在。他从孩子们和安娜·奥西波夫娜那里得知我们住在敌人的营垒里。马尔金去看了看看门老头和住房委员会，并且好像不是一个人，而是带了一队水兵去的。他必定用了很有说服力的语言，因为我们周围的一切突然变了样。还在十月变革之前，在我们这所资产阶级的房子里，可以说已经实行了无产阶级专政。直到后来我们才知道，这是我们孩子的朋友，波罗的海舰队的水兵干的。

彼得格勒苏维埃刚转到布尔什维克手里，敌视我们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便依靠印刷厂的老板，从苏维埃手中夺去了报纸。需要有新的报纸。我找了马尔金。他消失了、隐没了，到需要的地方去，说需要印刷工人，几天之后我们就有了一份报纸。我们取名为《工人和士兵报》。马尔金日日夜夜坐镇编辑部，处理各种事务。在十月的日子里，马尔金那结实的身躯，黝黑而又忧郁的脑袋总是出现在最危险的地方，最需要的时刻。他来我这里只是为了报告一切顺利，以及询问

我还需要什么。马尔金不断推广自己的经验，在彼得格勒逐步建立起无产阶级专政。

街头的渣滓开始向首都和宫殿里的丰富酒库发起进攻。有人领导了这场危险的运动，妄图用酒精的火焰毁灭革命。马尔金立即感觉到这种危险，投入了战斗。他保卫酒库，保卫不住就毁掉。他足蹬高统靴，在没膝的、夹着碎玻璃瓶的美酒中蹦来蹦去。酒顺着小沟流进涅瓦河，浸透了雪。酒鬼们直接舔喝小沟里的酒。马尔金手持左轮手枪为清醒的十月而斗争。他经常浑身湿透，带着一身佳酿美酒的芳香回家，两个孩子总是盼着他的归来。马尔金击退了反革命的酒精攻势。

我受命负责外交部工作的时候，似乎无法着手工作。从部长助理到打字员，大家都参加怠工。柜子上锁了，钥匙也没有。我找来马尔金，他知道直接行动的秘诀。两三个外交官被关了一昼夜，第二天，马尔金就把钥匙送来，请我到部里去。但我在斯莫尔尼宫忙于总的革命工作。于是马尔金就暂时成了非正式的外交部长。他用自己的办法很快弄清了人民委员部的机制，毫不留情地清除了世袭名门和狡猾的外交官，整顿办公机构，没收继续从国外寄来的外交邮包中的私货，把这些东西分给无家可归的人，挑选出大有教益的机密文件，自己负责把这些文件加上自己的批语，用单行本的形式予以出版。马尔金没有学位，甚至在书写中还常有错误。他的批语往往因出乎意外的思想而令人叹服。总的说来，马尔金把自己的外交钉子牢牢地钉在应该钉的地方。屈尔曼男爵<sup>①</sup>和切尔宁伯爵<sup>②</sup>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都贪婪地阅读马尔金的黄皮小册子。

接着国内战争开始了。马尔金堵住了许多缺口。现在，他在遥远的东方建立专政。马尔金指挥着伏尔加河上的一支小舰队，赶走了敌人。每当我得知危险的地方有马尔金在，我就从心底里感到宽

① 理查·屈尔曼(1873—1948年) 1917年8月至1918年7月任德国外交大臣，曾率德国代表团参加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举行的和平谈判。——译注

② 切尔宁(1872—1932年) 1916年12月至1918年4月任奥地利外交大臣。1920至1923年为国民议会议员。——译注

慰和振奋。但是不幸的时刻到了。在卡马河上，敌人的子弹击中了尼古拉·格奥尔吉耶维奇·马尔金，这位身强力壮的水兵倒下了。他牺牲的电报传来时，就像花岗石的柱子在我面前倒塌了。孩子们桌上放着他的照片，头戴有飘带的水兵帽。“孩子们，孩子们，马尔金被打死了！”我至今记得，孩子们听到这个消息后，两张苍白的脸蛋由于突如其来的悲痛而扭曲了。忧郁的尼古拉与孩子们平等相处。他告诉孩子们自己的想法，自己的生活。他含着泪告诉9岁的谢廖沙，他曾经长久地深深地爱过的女人抛弃了他，因此他心里总是很忧郁。谢廖沙惊慌地含泪把这个秘密悄悄告诉了母亲。这位温存的朋友，像孩子们一样，向他们倾吐衷情，同时他又是一个老海狼和革命家，一个真正的英雄，就像最迷人的神话中所描写的那样。难道在外交部的地下室里教他们用手枪和卡宾枪射击的马尔金真的死了吗？噩耗传来的那个沉寂的夜晚，两个小身躯在被子下面嗦嗦发抖。只有母亲听到悲哀的抽泣声。

生活在群众大会的漩涡之中。我到彼得格勒时，发现所有革命演说家都嗓子嘶哑，或者完全失声。1905年革命教会我要注意保护自己的嗓子，多亏这个经验，我差不多没有脱离队伍。工厂、学校、剧院、杂技场、街头和广场，到处举行集会。我经常半夜后才筋疲力尽地回家，常常在半睡半醒的状态中突然发现对付政敌的最好的论据，约摸早上7点钟，有时更早一些，讨厌的、难忍的敲门声就把我从睡梦中唤醒，叫我去参加彼得戈夫的群众大会，或者是喀琅施塔得的水兵们派了一只快艇来接我。每一次都觉得无法再把这次新的集会坚持下来。但是神经中枢的某种潜能突然涌出，于是我讲上一小时，有时两小时，并且在讲话的时候，其他厂或区的代表团已把我团团围住。原来，有数以千计的工人分别等在3个或5个地方，等了一小时、两小时、三小时。在那些日子里，觉醒的群众多么耐心地等待着新的演说。

摩登杂技场举行的群众大会占有特殊的地位。不仅是我，而且我的对手都对这些大会持特殊的态度。他们认为杂技场是我的堡垒，所以从来不想在那里演讲。可是，每当我在苏维埃抨击妥协派

时，我的话总是被凶暴的喊声打断：“这不是您的摩登杂技场！”这成了某种副歌。通常我是在傍晚，有时是在夜里，在杂技场演说。我的听众是工人、士兵、勤劳的母亲、街头的少年、首都被压迫的下层人。那里没有一点点的空地，人们挤成一团。年幼的孩子坐在父亲的肩上，婴儿在母亲怀里吃着奶。没有人吸烟。由于人多超重，看台每分钟都有倒塌的危险。我穿过狭窄的人墙走向讲台，有时是被人们用手从头上举过去的。人们屏声静息地听讲，突然迸发出喊声和摩登杂技场所特有的狂热的尖叫声。我的四面八方严严实实地全是手臂、胸膛和脑袋。我仿佛是在温暖的由人体构成的洞穴里讲话。我每做一个大幅度的手势，就必定会碰到某一个人，而每一个友好的反应都告诉我，用不着因此感到不安，不要中断，要继续讲下去。在这群热情的人们所发出的电压下，任何疲劳会烟消云散。他们想知道、了解和找到自己的道路。有时，单靠嘴唇就可以感觉到这个已经融合成一个整体的人群所具有的强烈的求知欲。这时，在听众表示赞许这一命令式的进逼下，预先准备好的论证用不上了，缩回去了，而从潜意识中冒出了另一些语言，另一些论据，它们出乎讲演者的意料，却又是群众所需要的。此时，觉得自己好像从旁处聆听讲演者的演说，思想跟不上讲演者，又唯恐听到你的长篇议论声，会像梦游者那样从墙檐上掉下来。这就是摩登杂技场。它有自己的特色：炽烈、温情和疯狂。婴儿们安静地吮吸着发出赞许或者威胁的喊声的乳房。群众本身就像婴儿那样用干渴的嘴唇贴住革命的乳头。不过这个婴儿很快就长大起来了。离开摩登杂技场比进去更难。群众不愿意拆散自己的这个群体。他们不愿散去。我筋疲力尽，迷迷糊糊，身不由己地被无数的手托着，在人们头顶上飘浮，一直飘到出口处。有时我在人群中看到两个女儿的面孔。她们跟母亲站在邻近。大的16岁，小的15岁。我只能点头向她们的激动的眼睛打招呼，或者匆匆地握握她们温暖的手。但人群又把我们分开。我到了门外，杂技场里的人则跟着我移动。呼喊声和脚步声使黑夜的街道显得生气勃勃。一扇大门打开了，把我吸了进去，接着又砰的一声关上了。这是我的朋友把我拥进了由尼古拉二世为女芭蕾舞演员克舍辛斯卡娅

建造的宫殿。布尔什维克的参谋部就设在这里，穿灰军装的军人们坐在罩着绸缎套子的傢具上，或者蹬着笨重的靴子踩在早已失去亮光的地板上。在这里可以等到人群散了以后，再继续走。

集会后，我走在空荡荡的街道上，察觉到身后有脚步声。昨天也发生过同样的情况，这好像已是第三天了。我手持勃朗宁手枪，猛一转身，回走了好几步。“您想干什么？”我厉声发问。我面前是一张年轻的、忠实的面孔。“请允许我来保护您，到杂技场来的也有敌人。”他是大学生波兹南斯基。从这时起，他就没有离开过我。在整个革命年代波兹南斯基都在我手下接受各种各样的任务，总是责任重大的任务。他照料我的个人安全，建立行军的秘书处，寻找湮失的军用仓库，弄到需要的书籍，从无到有地建立骑兵补充连，在前线作战，后来他站到了反对派的行列中。如今，他在流放中。希望将来我们能再相会。

12月3日，我在摩登杂技场作了关于苏维埃政府的工作报告。我说明了公布沙皇时期和克伦斯基时期外交信函的意义。我告诉忠诚的听众们，我说了人民不能为他们未曾缔结过，没有读到过，也没有看到过的条约而流血，妥协派在苏维埃对我大喊大叫：别用这种语言对我们说话，这不是您的摩登杂技场。而我则重申自己给予妥协派的答复，我只有革命者的一种语言，我用它来在群众大会上对人民说话，而且还要用它来跟盟国和德国人说话。报纸报道提到此时全场发出热烈的掌声。我只是在次年2月迁往莫斯科以后才中断了同摩登杂技场的联系。

## 第二十五章

# 关于诽谤者

1917年5月初我抵达彼得格勒时，一场为列宁搭乘的“铅封”车厢而展开的斗争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新上台的社会党人的部长们与不让列宁回俄国的劳合·乔治结盟。也就是这批老爷们为列宁取道德国而对他大肆诽谤。我的归国经历可以为列宁的经历作补充，是截然相反的证据。但我也免不了成为同样的诽谤对象。这是布坎南发起的。我用致外交部长（5月，担任外长已不是米留可夫，而是捷列先科）公开信的形式公布了我的大西洋历险记。结尾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

“部长先生，代表英国的竟是一个因无耻诽谤而丢脸，又不设法恢复自己的名声的人，您是否认为这是正常现象？”

没有答复。我也不期待有什么答复。但是，米留可夫的报纸出来替协约国的大使说话，用自己的名义再次提出指控。我决定尽可能郑重其事地把诽谤者拉出来示众。当时正在召开第一届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6月5日，会议厅内挤得水泄不通。我在会议快结束时就个人问题作了发言。瞧，对布尔什维克怀有敌意的高尔基的报纸第二天是怎么描述我的结束语和当时的整个场面的：

“米留可夫指控我们是德国政府雇用的间谍。在这个革命民主法庭上，我要求诚实的俄国报刊（托洛茨基转向记者席）发表我的原话：在米留可夫撤回他的指控以前，可耻的诽谤者的印记将永远留在他的额上。”

“托洛茨基有力、自尊的声明博得全体与会者一致的欢呼

声。整个代表大会，不分党派，报以长达几分钟的暴风雨般的掌声。”

不应当忘记，在这次代表大会上，我们的反对者占了十分之九。不过以后的事变证明，这次的成功是短暂的。这是议会制的一种怪现象。

《言语报》试图应战，第二天便报道了一则消息，说我从德国爱国主义团体获得一万美元的资助以推翻临时政府。这至少是说得清楚的。事情是这样的，在我赴欧洲前两天，曾多次听过我报告的德国工人会同美国、俄国、拉脱维亚、犹太、立陶宛和芬兰的朋友以及他们的拥护者，为我举行了一个告别大会，会上曾为俄国革命募捐，共募得310美元，其中100美元是德国工人通过他们的主席捐献的。第二天，我征得大会组织者的同意，把交我支配的310美元分送给缺少路费的5个回俄侨民。这就是“一万美元”的历史。我当即在高尔基的《新生活报》(6月27日)上叙述了这段历史，并用这样一些劝谕性的话作为结尾：

“为了给今后的说谎者、诽谤者、立宪民主党的报人以及所有的恶棍们加之于我身上的诽谤提供一个必要的校正系数，我认为发表如下声明是有好处的：我一生中不仅没有在同一时间内拥有一万美元，而且也未拥有过这个数目的十分之一。虽然这样的表白可能比米留可夫先生的所有诽谤更能损害我在立宪民主党读者心目中的名声，但是我早就习惯于不靠自由资产者的赞许而生活了。”

从此以后，造谣中伤消失了。我在一本名为《答诽谤者！》的小册子里对这场斗争作了总结，并交付出版。一星期后发生了七月事变，7月23日我被临时政府逮捕入狱，罪名是为德皇效劳。审讯由可靠的沙皇制度的司法人员进行。他们对事实或论据统统不予理睬。那时天又太热。当我看到侦查材料后，指控的卑鄙使我愤慨无比，然而它又愚蠢之极，只能使我付之一笑，以至冲淡了我的愤慨。我在9月1日的预审记录中写道：

“鉴于宣读的第一个文件(叶尔莫连科准尉的证词)毫无疑



问是蓄意伪造的事件，其目的不是澄清案件的真相，而是存心掩盖事实，这个在司法部门某些成员的参与下炮制的文件在诬陷我党和我个人中起了主要作用；鉴于在这个事件中侦察员亚历山德罗夫先生蓄意无视一些最重要的问题和情况，而查明这些问题和情况势必暴露出我素昧平生的叶尔莫连科的证词纯属伪证；鉴于上述情况，我认为，对我来说，出庭受审将意味着自己在政治上和道德上的堕落，与此同时，我保留利用我将拥有的一切手段向社会舆论揭露指控的真实意图的权利。”

这一指控很快在一系列大事变中消失，这些大事变不仅吞没了那些侦察官，而且吞没了整个旧俄罗斯及其像克伦斯基那样的“新”英雄们。

※ ※ ※

我原来并没有打算再回来谈这个问题。但是有个作者在1928年重新提出并附和以前的诽谤。此人名叫克伦斯基。11年前革命事变曾突然把他推出，又理所当然地把他清洗掉，在这以后，在1928年，克伦斯基却要人相信，列宁和其他布尔什维克是德国政府的间谍，和德国参谋部有联系，从那里领取经费，执行它交给的旨在使俄军失败并分解俄罗斯国家的秘密任务。所有这一切在他那令人发笑的书中花了数十页篇幅作了描述，特别在第290至310页上。通过1917年事件我对克伦斯基的智力和道德水平已有足够清楚的了解，但是我压根儿没有想到在事情已过去这么多年之后，如今他竟敢再提出这样的“指控”。然而，这是事实。

克伦斯基写道：“列宁在战争最紧张的时刻背叛了俄国，这是已完全查明的、无可辩驳的历史事实。”究竟是何人何处提供这些无隙可乘的证据的呢？克伦斯基是从大吹大擂的故事开始的，说德国参谋部从俄国战俘中招募间谍，然后再把他们派到俄国军队中去。在这些真的或者假的（他们往往自己也不知道）间谍中，有一人直接向克伦斯基揭发了德国的谍报手段。但是，克伦斯基凄凉地说：这些“揭发并不具有什么特殊意义”。正是这样！即使从克伦斯基的自述中也可以清楚地看出，有一个卑鄙的冒险主义者企图牵着他的鼻子

走。这件事与列宁和布尔什维克有什么关系吗？没有丝毫关系。他为什么要跟我们谈这件事呢？为的是吹嘘他的故事，使他的进一步揭发显得重要一些。

他说，是的，第一件事无关紧要。但是我们从另一个来源得到了具有“很高价值”的情报，那个情报“最终证实布尔什维克同德国参谋部有联系”。请注意：“最终证实”。他接着写道：“他们可以规定保持联系的手段和途径”。“可以规定”这句话是模棱两可的。是否规定了昵？这一切我们现在就会知道的。稍为耐心一些，因为这件揭发出来的事在编造者的内心深处等了11年之久才酝酿成熟。

“4月，一位名叫雅尔莫连柯的乌克兰军官到大本营来见阿列克谢耶夫将军”。我们在前面已经见过这个名字。在我们面前的是整个案子的决定性人物。请注意，克伦斯基即使在不需要出差错的时候，也不能不出差错。他带上舞台的那个卑鄙的骗子不是雅尔莫连柯，而是叶尔莫连柯。至少克伦斯基先生的侦察官的名单上登记的是这个名字。因此，叶尔莫连柯准尉（克伦斯基故意含糊不清地说是“军官”）就以假的德国间谍身份去大本营揭露真的德国间谍。不久极端仇视布尔什维克的资产阶级报刊就不得不把这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者说成是愚昧可疑的人物。此人提供的证词无可争辩地最终证明了列宁不是一个最伟大的历史人物，而是鲁登道夫<sup>①</sup>雇用的间谍。然而，叶尔莫连柯是怎么知道这个秘密的？他提出哪些证据说服了克伦斯基？据叶尔莫连柯说，他接受了德国参谋部关于在乌克兰鼓吹分裂运动的任务。克伦斯基说：“向他提供了同德国领导(!)人保持联系的途径和手段的所有(!)必要的指示，以及关于汇给所必需经费的银行(!)的名称，最重要的间谍的名字，其中有许多乌克兰的分离主义者和列宁。”所有这些内容一字不差地印在这部著作的第295—296页上。现在我们至少知道了德国总参谋部是怎样对待它

<sup>①</sup> 埃·鲁登道夫(1865—1937年)——德国陆军上将。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任兴登堡将军的助手，1914至1916年实际指挥东线军事行动，1916至1918年指挥德国的全部武装力量。参加1920年的卡普叛乱，1923年同希特勒一起在慕尼黑发动法西斯暴乱。——译注

的间谍的。当它发觉间谍的人选是一个无名的和文化不高的准尉时，它不是让德国情报机构里的陆军中尉对他进行监督，而是让他同“德国领导人”联系，并把整个德国间谍网告诉他，甚至向他列举了银行的名字，不是一家银行，不，而是提供德国秘密经费的全部银行。不管怎么样，德国参谋部行事愚蠢之至，这个印象是难以消除的了。然而，之所以会有这个印象，是因为我们看到的不是德国参谋部的实际情况，而是马克斯和莫里茨两个准尉——军事准尉叶尔莫连柯和政治准尉克伦斯基所描绘的形象。

但是，也许叶尔莫连柯虽然没有名气，并且愚昧无知和只是个微不足道的小官，却真的在德国间谍网中担任了某种显要的职务？克伦斯基想让我们这样去思考问题。然而，要知道我们不仅知道克伦斯基的大作，而且也知道它的材料来源。叶尔莫连柯要比克伦斯基直率些。叶尔莫连柯的证词是以浅薄愚蠢的小冒险家的口气提出来的，他在证词里给自己开出了价格：德国总参谋部给了他1500卢布，用当时已大大贬值的这些卢布去策划分离乌克兰、推翻克伦斯基。叶尔莫连柯在证词中（现在已经出版）坦白地说，他虽然伤心地抱怨德国的吝啬，但毫无结果。“为什么这么少？”叶尔莫连柯抗议说。但“领导人”不为所动。不过，叶尔莫连柯没有告诉我们，他同鲁登道夫、兴登堡、皇太子或原德皇直接谈判过没有。叶尔莫连柯避而不谈那些给他1500卢布作为摧毁俄国，以及旅途烟酒开支的“领导人”的名字。我们大胆提出一个假设，这笔钱主要花在酒上，而且当这位准尉口袋里的德国“经费”花光之后，他没有向柏林为他指定的银行求助，而是英勇地跑到俄国参谋部去寻求爱国主义的援军。

叶尔莫连柯向克伦斯基揭露的“许多乌克兰分离主义者”究竟是谁呢？书中对此只字未提。为增加叶尔莫连柯的卑鄙谎言的分量，克伦斯基索性加上自己的谎言。大家从叶尔莫连柯的原证词中看到，他在分离主义分子中提到斯科罗皮西·约尔图霍夫斯基<sup>①</sup>。克

<sup>①</sup> A. P. 斯科罗皮西·约尔图霍夫斯基(1880—?)——乌克兰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分子，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是“乌克兰解放协会”的领导人之一。——译注

伦斯基对这个名字默不作声，因为如果他提及这个名字，他就得被迫承认叶尔莫连柯什么也没有揭露。约尔图霍夫斯基的名字对谁都不是秘密。在战争期间，报纸上曾几十次提到过这个名字。约尔图霍夫斯基没有隐瞒自己与德国参谋部的联系。早在1914年年底，我就在巴黎的《我们的言论报》上痛斥过同德国军事当局勾勾搭搭的乌克兰的分离主义小集团。我列举了这个集团所有成员的名字，其中包括约尔图霍夫斯基。然而我们已经听说了，在柏林不仅向叶尔莫连柯提到“许多乌克兰分离主义者”，而且还提到列宁。为什么向他提分离主义者，这个问题还可以理解：叶尔莫连柯本人就是被派去进行分离主义宣传的。可是为什么向他提列宁呢？对于这个问题，克伦斯基没有回答。这不是偶然的。问题在于，叶尔莫连柯毫无根据地硬把列宁的名字扯进他那混乱不堪的证词中去。克伦斯基的一个鼓舞者叙述了他是怎样为了“爱国”的目的被招募为德国间谍的；他是怎么要求增加自己的“秘密经费”的（1500战时卢布！），又是怎么向他说明日后任务的：间谍活动、炸毁桥梁，等等。接着，同此事毫不相干，按他的说法，有人（谁？）告诉他，他在俄国将不是“孤”军作战，“列宁及其追随者也在俄国干同样的（！）工作”。这就是他的证词内容。这就是说，有人在毫无实际需要的情向下向一个炸桥的小奸细通报了诸如列宁同鲁登道夫有联系这样的秘密……虽然是在某人的笨拙提示下，叶尔莫连柯在证词的结尾部分又一次与整个故事毫无联系地突然加了一段：“有人（谁？）告诉我，列宁参加了柏林会谈（与德国参谋部的代表会谈），并且住在斯科罗皮西·约尔图霍夫斯基那里，此事后来我也亲自证实了。”至于他是怎么证实的，只字未提。侦察官亚历山德罗夫对叶尔莫连柯证词中唯一的“事实性”说明丝毫不感兴趣。他没有提出最简单的一个问题，准尉怎么证实列宁在大战期间到过柏林，并住在斯科罗皮西·约尔图霍夫斯基那里。或许，亚历山德罗夫提出了这个问题（不可能不提！），但只得到含混不清的回答，所以决定不把这件小事载入记录。非常可能！难道我们无权对这种拙劣的作品提个问题：哪个傻瓜会相信？但是竟然有“国务委员”故作相信的姿态，甚至要自己的读者也同样相信。

就这些吗？是的，军事准尉再没别的什么了。政治准尉还有假说和猜想。接着看下去。

克伦斯基说：“临时政府看到自己面临一个困难的任务：需要进一步调查叶尔莫连柯提出的线索，追踪往返于列宁和鲁登道夫之间的密探，并在犯罪现场，在如山的铁证下将其逮捕。”

这种冠冕堂皇的句子是用两股线编织而成的：虚伪和怯懦。这里在故事中第一次提到鲁登道夫的名字。叶尔莫连柯那里没有提一个德国人名，因为准尉脑袋瓜的容量过小。克伦斯基故意用模棱两可的语气谈论那些往返于列宁和鲁登道夫之间的间谍。一方面，可以这样认为，这里谈的是某些已经知道的，只等着罪证在手上时予以逮捕的密探。另一方面，似乎克伦斯基头脑里的间谍只是柏拉图式的空想概念。如果他打算“跟踪”他们的话，那么，追踪的只能是无人知晓、没有姓名的超自然人物的脚印。诽谤者的花言巧语只是露出了他自己的……阿喀琉斯之踵<sup>①</sup>，或者用不太典雅的话说，露出了马脚。

照克伦斯基的说法，此案的侦察以极秘密的方式进行，只有4个部长知道。甚至连可怜的司法部长佩列韦尔泽夫<sup>②</sup>也不知道。这确是真正的国家立场！德国参谋部不仅向随便什么人透露它所委托的银行的名称，而且还透露它与最大的革命政党领袖们之间的全部联系。而克伦斯基则相反，除他自己以外，他只能找到3名老练的部长来跟踪鲁登道夫的间谍。

“这项任务是非常困难、复杂和长期的。”克伦斯基抱怨说。这一次我们可以相信他。然而爱国主义的努力终于大获全胜。克伦斯基就是这么说的：“不管怎么说，取得的成功对列宁来说简直是致命的。

① 阿喀琉斯：希腊神话中的英雄。他的母亲是爱神，她为了使儿子长生不老，曾把他投入斯提克斯河的圣水中，在浸水时，母亲手持儿子的脚后跟，因而这部分未能浸水。他后来因脚后跟中箭而死。所以人们常以阿喀琉斯之踵来比喻唯一致命的弱点。——译注

② 帕·尼·佩列韦尔泽夫——律师，劳动派分子，接近社会革命党人。1917年任第一届临时政府司法部长。——译注

列宁与德国的联系已完全查明。”请牢牢记住：“已完全查明。”

是谁查明的？怎么查明的？克伦斯基在他的那本刑事犯罪小说中提到两个相当知名的波兰革命家加涅茨基<sup>①</sup>和科兹洛夫斯基<sup>②</sup>，以及一个叫苏缅松的夫人，关于她的情况没有人能提供任何消息，就连是否有此人都无从证实。这三个人似乎是负责联络的间谍。克伦斯基根据什么理由把已故的科兹洛夫斯基和尚健在的加涅茨基当成列宁和鲁登道夫之间的联络员呢？不清楚。叶尔莫连柯没有提过这些名字。他们在克伦斯基的书中出现，就像当年在1917年七月事变中他们在报纸上出现那样十分突然，仿佛上帝从机器里冒出来那样突然，并且扮演机器这个角色的显然是沙皇的反间谍机关。瞧，克伦斯基是这么说的：“来自斯德哥尔摩的这个为德国服务的布尔什维克间谍随身所带的文件无可辩驳地证明了列宁与德国指挥部的联系，这个间谍应在俄国与瑞典的边境上予以逮捕。文件我们已准确获悉。”原来这个间谍就是加涅茨基。其四个部长中最聪明的当然要算总理了，我们看到，他们没有白费气力：布尔什维克的间谍从斯德哥尔摩带来了克伦斯基事先已经获悉（“准确获悉”）的文件，这些文件无可辩驳地证明了列宁是鲁登道夫的间谍。但是，为什么克伦斯基不把有关这些文件的秘密告诉我们呢？为什么不透露一点其中的内容呢？为什么他不说明（哪怕给一点暗示），他是怎么知道这些文件的内容的？为什么不解释一下，德国的布尔什维克间谍为何自己携带能证明布尔什维克是德国间谍的文件呢？对所有这些问题，克伦斯基只字不提。不能不再问一下：哪个傻瓜会相信他呢？

可是，斯德哥尔摩的间谍根本没有被捕。这些绝妙的文件尽管克伦斯基在1917年就“准确获悉”，但他的读者到1928年仍然不知道，它们没有被缴获。这个布尔什维克间谍动身了，但没有到达瑞典

① 雅·斯·加涅茨基(1879—1937年)——波兰和俄国革命活动家，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属齐美尔瓦尔得左派。1917年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国外局成员。十月革命后在财政、外贸和外交部门担任负责职务。——译注

② 美·尤·科兹洛夫斯基(1876—1927年)——波兰和俄国革命活动家，法学家。十月革命后任司法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和小人民委员会主席。——译注

边境。为什么？只是因为那位没有追踪本领的司法部长佩列韦尔泽夫过早地向报界泄露了叶尔莫连柯准尉的伟大秘密。而成功本来近在眼前，毫不费力……

“临时政府两个月来揭露布尔什维克阴谋的工作（主要由捷列先科<sup>①</sup>负责）以失败而告终。”（第298页）是的，克伦斯基是说：“以失败告终”。在第297页上说：“这项工作的成功对列宁来说简直是致命的”；列宁与鲁登道夫的联系“已完全查明”，而在第298页上我们看到的是两个月来的工作以“失败”告终……这一切难道不像并不可笑的小丑行径吗？

但是事情还没有结束。在我的问题上，克伦斯基的虚伪和怯懦也许暴露得最清楚。克伦斯基在讲完根据他的命令要逮捕的德国间谍的名单之后，轻描淡写地说：“几天后托洛茨基和卢那察尔斯基也被捕了。”这是克伦斯基把我列入德国间谍网的唯一的一处。他在说此话时，不敢明说，不带雄辩的色彩，也不说“凭名誉保证”。这样做是有充分理由的。克伦斯基不能完全绕开我，因为他的政府不管怎样还是逮捕了我，并且加给我的罪名和列宁的一样。但是他不想也不能详述我的罪证，因为在我的问题上，他的政府特别明显地露出了前面提到过的“马脚”。我的唯一罪证是法院侦察官亚历山德罗夫提出的，即我与列宁一起乘坐火车穿越德国。这条用铁链拴着的沙皇司法部门的老狗一点也不知道，与列宁一起乘坐火车穿越德国的不是我，而是孟什维克的领袖马尔托夫。我是在列宁回国后一个月，从纽约取道加拿大的集中营和斯堪的纳维亚回国的。对布尔什维克的指控就是这帮可怜而又可耻的伪造者们编造的，这些先生们甚至不认为有必要查阅一下报纸，了解托洛茨基是什么时候走哪条路线返回俄国的。我当即当场揭穿了侦察员。我把他那肮脏的小纸猛掷到他脸上，转过身去，不愿意再和他说话。我还当即向临时政府提出了抗议。克伦斯基的过失，他对读者犯下的刑事罪在这一点上表现得

① 米·伊·捷列先科（1886—1956年）——俄国最大的糖厂主。1917年先后任临时政府财政部长和外交部长。后流亡国外。——译注

尤为突出。克伦斯基知道，他的司法部由于对我的指控而威信扫地。这就是为什么他既顺便把我列入德国的间谍网，又只字不提他和他的三位部长如何跟踪我穿越德国，而当时我正被关在加拿大的集中营里。

诽谤者对自己的想法作了概括：“如果列宁没有德国宣传机关和德国谍报机构提供的全部物质和技术力量作为支柱，他是怎么也不可能摧毁俄国的。”克伦斯基宁可相信旧制度（连同他自己）是被德国间谍，而不是被革命人民推翻的。多么令人快慰的历史哲学啊！根据这种哲学，一个伟大国家的生命只是邻国间谍组织手中的玩物而已。然而，如果德国的军事和技术力量能在几个月内推翻克伦斯基的民主制，并人为地培植出布尔什维主义，那么协约国的所有成员国为什么竟不能在12年间推翻这个人工扶植的布尔什维主义呢？但是我们不想深入研究历史哲学。我们还是来谈谈事实吧。德国的技术和财政的援助表现在哪里呢？克伦斯基对此则只字不提。

诚然，克伦斯基引用了鲁登道夫的回忆录。但是从回忆录里只可以看出一点：鲁登道夫希望俄国革命能导致沙皇军队的崩溃。先是二月革命，然后是十月革命。要揭露鲁登道夫的计划无需他的回忆录。一批俄国革命者被准许通过德国这一事实本身就足以说明问题了。从鲁登道夫方面而言，这是因德国严重的军事形势而采取的冒险行动。列宁利用了鲁登道夫的打算，同时也有他自己的打算。鲁登道夫私自盘算：列宁推翻爱国主义者，然后我把列宁和他的朋友们绞死。列宁暗自思忖：我乘坐鲁登道夫的车厢，然后用我的办法对他论功行赏。

两个对立的计划在一个观点上相交了，这个点就是火车车厢，要证实这一点无需克伦斯基的侦探才能。这是历史事实。此后历史已经检验了这两种打算。1917年11月7日，布尔什维克掌握了政权。经过整整一年以后，德国革命群众在俄国革命的强有力的影响下，推翻了鲁登道夫及其主子。再过10年，这位被历史刺伤的民主主义的纳尔苏修斯妄图重新进行愚蠢的诽谤——不只是对列宁，也是对伟大的人民及其革命的诽谤。



## 第二十六章

# 从7月到10月

6月4日，布尔什维克党团就克伦斯基准备在前线发动进攻一事在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宣读了由我提交的宣言。

我们曾多次指出，发动进攻是直接威胁到军队本身生存的冒险行为。但是，临时政府用空话来自我陶醉。部长们把那些受到革命激荡的士兵群众看成是可以随意捏成什么东西的粘土。克伦斯基巡视了前线，恳求、威胁、下跪、亲吻土地，一句话，像小丑一样大耍活宝，但是对于士兵苦恼的问题概不作答。他用廉价的效果来自我欺骗，在确信能得到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支持下，就下令进攻。当布尔什维克预言的灾难降临时，却去谴责布尔什维克。污蔑中伤蜂起。在立宪民主党庇护下的反动势力四面进逼，要我们的脑袋。

群众对临时政府的信任彻底破灭了。在革命的第二阶段，彼得格勒再次处于遥遥领先的地位。在七月事变中这支先锋队同克伦斯基政府发生了公开冲突。这还不是起义，而只是深入的侦察。但是在7月冲突中已经显露克伦斯基身后没有任何“民主”军队；而支持他，反对我们的那些势力是反革命的势力。

关于机枪团的起事以及它向其他部队和工厂发出了的号召，我是7月3日在塔夫利达宫开会时获悉的。我听到这个消息后，感到很突然。示威是自发的，是下面不知名的人发起的。到了第二天，示威游行扩大了，我们党也参加了。塔夫利达宫挤满了人。口号只有一个：“政权归苏维埃！”在宫殿前面，一伙单独活动形迹

可疑分子扣压了农业部长切尔诺夫，把他推进一辆汽车。群众无动于衷地对待部长的命运，无论如何他们是不同情他的。切尔诺夫被捕，并且生命难保的消息传到了宫内。民粹分子决定动用机枪装甲车去营救他们的领袖。声望下降使他们神经过敏起来，他们想显示一下强硬手段。我决定设法跟切尔诺夫一起乘车开出人群，然后释放他。然而有个布尔什维克，名叫拉斯科尔尼科夫<sup>①</sup>，他不安地坚持立即释放切尔诺夫，说否则人家会说是喀琅施塔得水兵逮捕的，他是波罗的海舰队的中尉，率领喀琅施塔得水兵来参加示威游行。我决定照拉斯科尔尼科夫的主意办。下面我还是让他自己来谈吧。这位易冲动的中尉在回忆录中说：“要不是托洛茨基同志出来干预，群众的骚动会持续多久就很难说了。他猛地跳上汽车车身的前部，像一个等得不耐烦的人那样用力把手一挥，让大家静下来。霎时间，一切都平静下来，像死一般的沉寂。列夫·达维多维奇用清晰、洪亮的声音……发表了简短的演说（最后他问：‘谁赞成对切尔诺夫使用暴力？请举手！’）……“谁也不开口”，拉斯科尔尼科夫继续写道，“谁也没有说个不字。托洛茨基严肃地说：‘切尔诺夫公民，您自由了。’同时转向农业部长，作了个手势，请他下车。切尔诺夫已经半死不活了。我扶他下了车，他萎靡不振，筋疲力尽，步履蹒跚地登上宫殿的台阶，在走廊里消失了。列夫·达维多维奇对自己的胜利感到满意，随同他一起走了。”

如果除去过分热情的色彩，那么他对当时情景的描述是准确的。但这并没有妨碍那些敌对的报刊硬说我逮捕了切尔诺夫，要对他动用私刑。切尔诺夫本人羞怯地沉默不语：要一个“人民的”部长承认，他之所以保住脑袋靠的不是他自己的威望，而是布尔什维克的庇护，这太难堪了。

<sup>①</sup> 费·费·拉斯科尔尼科夫(1892—1939年)。十月革命后任副海军人民委员、波罗的海舰队司令员等职。1921至1938年从事外交工作，历任驻阿富汗等国全权代表、共产国际东方部负责人。——译注

一个接一个的代表团，以示威者的名义要求执行委员会执掌政权。齐赫泽、策烈铁里、唐恩<sup>①</sup>、郭茨呆若木鸡地坐在主席团里。他们不给代表团答复，眼望天空或者彼此交换一下不安而神秘的眼色。布尔什维克们则发表讲话支持工人和士兵代表团。主席团成员默不作声。他们在等待。等什么呢？……时间就这样一小时，一小时地过去。深夜，宫殿的拱门里响起了胜利的军号声。主席团成员像触了电似地惊醒过来。有人郑重其事地前来报告，沃伦团从前线回来听候中央执行委员会的调遣。原来在整个庞大的彼得格勒的卫戍部队中，“民主派”没有一支可靠的部队。所以在前线部队开回来之前，只能等待。现在整个局势顿时转变了。代表团被撵了出去，也不再让布尔什维克讲话。民主派的领袖因群众使他们饱受惊吓而决意向我们报复。从执行委员会的讲台上传来的演说声称，一次武装叛乱被忠诚的部队镇压了。布尔什维克被宣布为反革命政党。所有这一切都归功于从前线开来的沃伦团。3个半月以后，这个团一致参加了推翻克伦斯基政府的起义。

5日早晨，我会见了列宁。群众的进攻已经被击退。列宁说：“现在他们要枪杀我们了”，“对他们来说这是最合适的时机。”但是列宁过高地估计了对手，不是过高估计对手的狠毒，而是过高估计了他们的果断和行动能力。他们没有枪杀我们，虽然离枪杀也已相差无几。布尔什维克在街头遭到毒打，被打死。士官生们洗劫了克舍辛斯卡娅宫和《真理报》的印刷厂。印刷厂门面的整条街上撒满了手稿。在遭劫的手稿中有我的一本小册子《告诽谤者》。7月的深入侦察变成了单方面的战斗。对手没费什么劲就成了胜利者，因为我们没有投入战斗。党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列宁和季诺维也夫隐藏起来了。进行了大逮捕，并随之进行毒打。哥萨克和士官生们没收了被捕者的钱财，理由是这是“德国人的”钱。许多同路人和朋友都不理我们了。在塔夫利达宫，我们被宣布为反革命分子，实

<sup>①</sup> 费·伊·唐恩(1871-1947年)——孟什维克首领之一。1917年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22年被驱逐出境。——译注

际上已经不受法律保护了。

在党的上层,情况也不妙。列宁不在。加米涅夫一派抬头了。许多人,干脆躲开事变的风头,以便日后炫耀自己的英明。在塔夫利达宫的大楼里,中央执行委员会里的布尔什维克党团感到自己很孤独。它派了一个代表团来要求我作一个形势报告,尽管当时我还不是个党员:联合的正式决定推到即将召开的党的代表大会上去作出。当然,我一口同意了。我同布尔什维克党团的谈话建立了只有在敌人的沉重打击下才能建立起来的精神上的联系。我说,这场危机之后,等待着我们的迅猛的发展,一旦群众通过事实检验了我们主张的正确性,群众就会加倍地紧随我们不放;在这些日子里应当仔细地注视每个革命者,因为在这样的时刻,人们都会在准确无误的天平上受到衡量。甚至现在我还常常愉快地回想起,整个党团多么热情地欢送我,向我表示感谢。穆拉洛夫曾说:“列宁不在,而在其他人中间,唯独托洛茨基没有惊慌失措。”如果我在另一种情况下写这些回忆录(虽然在其他情况下,我未必会写这些),我会难以转述在这儿页中所写的许多内容。但是,我现在不能撇开那些对过去的历史所作的有组织的广泛的伪造,因为这是不肖徒辈的主要活动之一。我的朋友们不是坐监狱,就是被流放。我不得不谈一些在其他情况下我不会谈的关于自己的一些事。对我来说,这不仅关系到历史真实的问题,而且也关系到仍在进行的政治斗争问题。

从这时候起,我和穆拉洛夫就开始建立起不可分割的斗争的和政治的友谊。关于这个人,我在这里应当说上几句。穆拉洛夫是个老布尔什维克,在莫斯科参加了1905年革命。1906年他在谢尔普霍夫正遇上黑帮<sup>①</sup>的大屠杀——像往常一样,这种屠杀是在警方保护下进行的。穆拉洛夫身材魁伟,胆大心善。他和其他几位左派陷入敌人的包围之中,敌人已把地方自治局的大楼团团围起来了。穆

<sup>①</sup> 1905年革命爆发后成立的俄罗斯人民同盟、米迦勒天使长同盟等极端反动的君主派恐怖组织,以及破坏和镇压革命运动的反动武装匪帮。——译注

拉洛夫手握左轮手枪走出大楼，稳步朝着人群走去。人群慢慢后退了。但是黑帮的突击队截断了他的去路，几个马车夫大喊“逮住他”。“散开！”巨人一边走一边下令，并且举起了握枪的那只手。几个人向他猛扑过去。他当场打死了一个，击伤了一个。人群急速向旁闪开。穆拉洛夫并没有加快步伐，像破冰船一样在人群中劈开一条路，然后步行走向莫斯科。他的案件拖了两年多，尽管反动势力气焰嚣张，最后还是宣告他无罪。穆拉洛夫从所受的教育来说是个农艺师，在帝国主义战争期间是汽车连的士兵，他是莫斯科十月战斗的领导人，胜利后是第一任莫斯科军区司令。他是一位革命战争中的无畏统帅，他一贯待人平等，作风简朴，从不装腔作势。在征战中他用事实进行不倦的宣传；他提出农艺方面的建议，参加收割，空闲时就给人畜看病。在最困难的情况下，他表现镇静，充满信心和热情。战争结束后，我总是设法和穆拉洛夫一起度过空闲的日子。打猎的爱好把我们俩联结在一起。我们一起走遍南北，有时是猎熊和狼，有时打野鸡和大鸨。目前穆拉洛夫是一个被流放的反对派分子，正在西伯利亚打猎……

1917年的七月事变中，穆拉洛夫没有惊惶失措，他使许多人得到鼓舞。在那些日子里，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有极强的自恃力才能不垂头丧气地通过塔夫利达宫的走廊和大厅，才能忍受得住愤怒的眼光，恶毒的耳语，故意用胳膊肘相互推推的示意（“瞧，瞧！”），以及毫不掩饰的咬牙切齿的声音。当一个高傲自大的“革命”庸人发现，曾突然把他抬到顶峰的革命竟然威胁到他那暂时的不可一世的地位时，当然会变得特别疯狂。在那些日子里，通向执行委员会的小吃部的路，就像去小各他<sup>①</sup>一样。那里分发茶和夹奶酪或红鱼子酱的黑面包，红鱼子酱在斯莫尔尼宫，尔后在克里姆林宫是很丰富的。午餐供应菜汤和一块肉。餐厅的服务员是一个叫格拉福夫的士兵。当对我们的中伤最厉害的时候，当列宁被宣布为德国间谍，不得不躲藏在草棚里的时候，我注意到格拉福夫总是给我一杯比较热的茶和一

<sup>①</sup> 各各他：基督蒙难之地，在耶路撒冷城外。——译注

块较好的夹心面包，眼却不朝我看。很清楚格拉福夫是同情布尔什维克的，但又不得不瞒住上司。我开始留心观察。不只是格拉福夫这样。斯莫尔尼宫里所有低层工作人员：看守、信使、卫兵都明显地倾向于布尔什维克。那时我对自己说，我们的事业已经胜利了一半。但暂时还只有一半。

报界对布尔什维克掀起了一场空前恶毒和无耻的反对布尔什维克的运动，其程度只有数年后斯大林反对反对派的运动才过之而无不及。7月，卢那察尔斯基发表了几个模棱两可的声明，报界不无根据地把它们解释为宣布脱离布尔什维克。几家报纸还把此类声明强加于我。7月10日，我写了一封信给临时政府，信中声明，我和列宁完全一致，信的结尾说：“根据法令，列宁、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应予逮捕，你们没有任何理由使我置身法外……你们没有理由怀疑，我和上述同志一样，也是临时政府总政策的不可调和的敌人。”部长先生们从这封信中得出了应有的结论：他们把我当作德国间谍逮捕了。

5月，当策烈铁里迫害水兵们并解除机枪手的武装时，我曾向他预言，过不多久，总有一天他会为了反对一个想绞杀革命的将军，而不得不过来求助于水兵们。到8月，科尔尼洛夫成了这样的将军。策烈铁里向喀琅施塔得的水兵求助。他们没有拒绝。“阿芙乐尔”号巡洋舰驶进了涅瓦河。我只能在“十字”监狱里看到我的预言如此之快地得到应验。“阿芙乐尔”号巡洋舰上的水兵派了一个代表团到我这儿来征求意见：保卫冬宫呢？还是用强攻把它拿下？我劝他们在收拾了科尔尼洛夫之后，再跟克伦斯基算账。“欠我们的跑不了。”“跑不了？”“跑不了。”

我在狱中时，妻子常带孩子们来探望。到这个时候，他们都已有自己的政治经验了。夏天孩子们在郊外我们熟悉的一位退役的上校B.的家里消暑。那里时常有客人去，多半是军官，他们边喝伏特加，边骂布尔什维克。在7月里咒骂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其中有些军官不久到南方去了。未来的白军骨干都集中在南方。一个年轻的爱国者在一次吃饭的时候称列宁和托洛茨基是德国间谍。我的大孩子

抓起一只椅子向他扑去，小的则抓了一把餐刀去帮忙。大人们把他们拉开。孩子们把自己关在房间里，疯狂地嚎啕大哭。他们打算秘密地步行逃往彼得格勒，想知道那里是怎么对待布尔什维克的。幸亏母亲来了，抚慰了一番之后，把他们带走了。但城里的情况也不太好。报纸在猛烈攻击布尔什维克。父亲在坐牢。革命没有实现人们的期望。但这并不妨碍孩子们兴奋地看到妈妈把一把小折刀偷偷地塞过监狱会客室的栅栏交给我。我仍然像往常那样安慰他们说，真正的革命还在前头。

我的两个女儿已经较为严肃地投入了政治生活。她们出席摩登杂技场群众大会，参加示威游行。在七月事变中她们曾陷入危险境地，被人群挤倒在地，一个丢了眼镜，两人都丢了帽子，而且都唯恐失去刚刚在她们视野中出现的父亲。

在科尔尼洛夫向首都进军的日子，监狱的状况也是危险万分。大家都明白，如果科尔尼洛夫进了城，他的头一件事一定是把克伦斯基逮捕的布尔什维克统统杀掉。除此之外，中央执行委员会还担心首都的白卫分子劫狱，派遣了一支偵勤大队去保卫“十字监狱”。当然，这支部队不是“民主派”的，而是布尔什维克的，并且准备随时释放我们。但这一行动就意味着立即起义的信号，然而起义的时机尚未到来。此时，政府开始释放我们了，这和它召集布尔什维克水兵来保卫冬宫的理由一样。我从“十字监狱”真奔不久以前才成立的保卫革命委员会，在那里我跟那些把我作为霍亨索伦王朝的间谍关进监狱，并且还来不及撤销对我的指控的先生们一起出席会议。我得老实承认，对民粹分子和孟什维克的表现，我真巴不得科尔尼洛夫能抓住他们的颈脖子，提到空中抖擻几下。然而，这种愿望不仅欠厚道，而且毫无政治意义。布尔什维克承担起防卫工作，处处站在第一线。科尔尼洛夫叛乱的经验补充了七月事变的经验。再次暴露了克伦斯基及其一伙没有任何独立的武装力量。起来抗击科尔尼洛夫的军队正是以后进行十月变革的部队。我们利用这一危险局面去武装被策反铁里不遗余力地解除武装的工人。

那些日子里，首都平静下来了。人们等待科尔尼洛夫，一些人满

怀希望,另一些人则十分害怕。孩子们听说:“可能明天就来。”到了早晨,他们连衣服也没穿就在窗口窥视;究竟来了,还是没有来?但是科尔尼洛夫没有来。群众的革命热情是如此高涨,以致科尔尼洛夫的叛乱立即烟消云散了。然而,并非毫无影响,它完全有利于布尔什维克。

我在科尔尼洛夫叛乱时曾这样写道:“报应不会太远了。我们的党被排挤、迫害、诽谤,却从未像最近这样迅速地成长。并且这个过程迅速地从首都向各省扩展,从城市向农村和军队扩展……我们党时时刻刻都是无产阶级的阶级组织,与此同时它也在镇压的火焰中变成所有被压迫、被蹂躏、被欺骗和受迫害的群众的真正领袖”……

我们勉强跟上这股潮流。布尔什维克在彼得格勒苏维埃里的人数与日俱增。我们已占了半数。但主席团里还没有一个布尔什维克。改选苏维埃主席团的问题提出来了。我们向孟什维克和民粹派建议组织联合主席团。如我们后来所知,列宁不赞成这个建议,他担心在这个建议背后有调和主义倾向。但是没有达成任何妥协。尽管我们不久前共同抗击科尔尼洛夫,策烈铁里还是拒绝成立联合主席团。这也正是我们所希望的。只有就名单进行表决了。我提出了一个问题:克伦斯基是否列入我们的对手名单之中?他虽然形式上是主席团成员,但是从不出席苏维埃会议,而且用种种办法显示他对苏维埃的蔑视。这个问题使主席团措手不及。大家不喜欢,也不尊重克伦斯基。但不能拒绝承认自己的总理。主席团成员互相低语一阵以后,回答说:“当然列入。”这也是我们所希望的。这是记录中的一段话:“我们曾经相信,克伦斯基已不再是苏维埃成员了(热烈鼓掌)。原来我们错了。克伦斯基的影子在齐赫泽和扎瓦季耶之间徘徊。当人家要你们赞同主席团的政治路线时,请记住,请勿忘记,那就等于要你们赞同克伦斯基的政治路线(热烈鼓掌)。”这样就把另外100名举棋不定的代表拉到我们这边来了。苏维埃的人数远在千人以上。投票是在出口处进行的。大厅里群情极为振奋。问题不在于主席团。问题在于革命。我和一伙朋友在回廊里来回踱步。我们预料,



我们差 100 票可达半数，而且准备把这一点看作胜利。结果我们比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总票数还多 100 余张。我们成了胜利者。我当了主席。策烈铁里在告别时希望我们在苏维埃的时间至少能达到他们领导革命的时间之一半那样长。换言之，我们的对手给我们的期限不超过 3 个月。他们完全错了。我们满怀信心地向政权进军。

## 第二十七章

# 决定性的一夜

革命的时刻临近了。斯莫尔尼宫成了一个堡垒。顶层阁楼上二十余门机枪，那是旧执行委员会的遗物。斯莫尔尼宫的警卫长格列柯夫上尉是个明显的敌人。不过机枪队队长却到我这儿来声明：机枪手支持布尔什维克。我委派一个人（也许是马尔金？）去检查一下机枪。发现由于长期无人照管，机械情况很糟。士兵们懒散，因为他们并不打算保卫克伦斯基。我把一支新编的、可靠的机枪队召到斯莫尔尼宫来。10月24日<sup>①</sup>清晨，天灰蒙蒙的。我一层楼一层楼地巡视，一则想走动一下，一则是查查是否一切安排妥当，同时也为了鼓励那些也许需要鼓励的人。士兵们在没有尽头，半明不暗的斯莫尔尼宫走廊的石板地上推着他们的机枪，发出了精神抖擞的喊声和沉重的脚步声。这是我召集来的新部队。这时，仍然留在斯莫尔尼宫内为数不多的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从门里露出一张张半睡半醒的惊慌的脸孔。这种音乐并非什么好兆头。他们匆匆忙忙地一个接一个地离开斯莫尔尼宫。我们成了大楼的全权主人，这里就要冒出一个俯视全市和全国的布尔什维克的巨头。

清晨，我在楼梯口碰着气喘吁吁地从党的印刷厂跑来的两个工人，一男一女。政府查封了党的中央机关报和彼得格勒苏维埃的报纸。政府的一些代表在士官生的护卫下查封了印刷厂。这个消息最

---

<sup>①</sup> 这是旧历，当时这是俄国的正式历法。按公历是11月6日，因此，有时把革命称作十月革命，有时又称作11月革命。——译注

初造成这样一种印象：这就是法律形式对于社会意识的管制！“难道不能拆封？”一个女工问。“拆吧！为防万一，我们给你们派一支可靠的卫队去。”我回答说。“我们旁边有一个工兵营，士兵们会支持我们的。”印刷女工有把握地说。军事革命委员会当即作出决定：“1. 印革命报纸的印刷厂启封；2. 建议编辑部和排字工人继续出版报纸；3. 保卫革命的印刷厂，防止反革命侵犯，这个光荣的任务交给立陶宛团和第六工兵营的英勇士兵们。”这以后印刷厂不停地工作，继续出版两份报纸。

24日，电话局出现了障碍；士官生死守在那里，在他们保护下，女话务员起而反对苏维埃。她们根本不给我们接线，这是第一起短暂的怠工。军事革命委员会派遣了一支水兵分遣队去电话局，他们在门口架了两门不大的炮。电话正常工作了。就这样开始了后勤机关的接管。

在斯莫尔尼宫三层楼拐角处的房间里，军事革命委员会在不停地开会。关于军队的调动、士兵和工人的情绪、兵营内的鼓动工作、策划大屠杀者的行动计划、资产阶级政客和外国使馆的阴谋诡计、冬宫的生活情况、前苏维埃各党派的会议等所有情报都源源不断地汇总到这里。提供情报者来自四面八方。工人、士兵、军官、管院子的人、信仰社会主义的士官生、女仆、小官吏的妻子纷至沓来。许多人说的纯属无稽之谈，但也有一些人提供了重大而有价值的情报。这一周我几乎没有离开斯莫尔尼宫一步，夜里就和衣睡在皮沙发上，只能断断续续地打盹，不时地被送信人、侦察兵、自行车通讯兵、报务员以及连续不断的电话铃声唤醒。决定性的时刻临近了。十分清楚，已没有后退的余地。

24日夜晚，革命委员会的成员分赴各区。只有我一人留下。稍后，加米涅夫来了。他曾是起义的反对者。但还是来跟我一起度过了这个定局之夜，我俩呆在三楼拐角处的小房间里，这个房间在这个革命的决定性之夜犹如军舰上的指挥楼。旁边的一间大空房里，有一台电话机，不断传来要事和小事。铃声更加显出戒备中的寂静。不难想象当时那空荡荡的夜空下的彼得格勒，灯光暗淡，从海上吹来

萧瑟的秋风。资产者和官吏们蜷缩在床上，竭力猜测神秘而危险的街头出了什么事。工人区沉睡着，做着紧张的军营之梦。在沙皇的宫殿里，各执政党的委员会和会议统统束手无策，在那里，一息尚存的民主幽灵同尚未消逝的君主制的幽灵并存。由于缺煤，大厅的丝绒和金碧辉煌的装饰时时陷入昏暗之中。各区的工人、水兵和士兵的队伍彻夜不眠。年轻的无产者肩上背着步枪和机枪子弹带。街头的纠察队在火堆旁取暖。首都的精神生活就集中在二十来架电话机旁，在这个秋夜，首都把自己的头从一个时代伸向另一个时代。

消息从各城区、郊区和通向首都的要冲汇集到二楼的房间里。仿佛一切都已事先安排好，领导人已各就各位，联络畅通无阻，好像什么也没有忘记。我们在脑海里一再重温。这个夜晚决定一切。头天晚上，我在给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代表作的报告中说：“如果你们不惊惶失措，那就不会发生国内战争，我们的敌人就会立即投降，你们就会坐到理应属于你们的席位上。”胜利是毫无疑问的。只要能保证起义取得胜利，那么胜利就有把握。然而这几个小时还是令人十分紧张不安的，因为未来的一夜将决定一切。

政府在昨天一面动员士官生，一面下令阿芙乐尔号巡洋舰开离涅瓦河。这里说的是布尔什维克的水兵们，8月份斯柯别列夫曾手持帽子毕恭毕敬地请他们来保卫冬宫，抵抗科尔尼洛夫叛乱分子。水兵们问军事革命委员会怎么办。当晚，阿芙乐尔号仍留在昨天停泊的地方。从巴甫洛夫斯克给我来电话说，政府从那里调来炮兵，从皇村调来突击营，还从彼得戈夫的准尉学校调来士官生。克伦斯基把士官生、军官和突击队员集结在冬宫。我命令委员们，往通往彼得格勒各条道路上派遣可靠的军事屏护队，并派遣鼓动员去迎接政府派来的部队。所有的商谈都通过电话，政府的侦探都可以听到。然而他们是否还有能力监控我们的商谈呢？“如果你们用言语挡不住，那就动用武器吧。你们为此要受到惩罚，丢掉脑袋的。”我几次重复这句话。但是我还不完全相信自己命令的力量。革命还过于轻信、宽宏大量、乐观和欠考虑。它更多的是用武器进行威吓，而不是使用武器。它仍然希望，一切问题可以通过语言来解决。到现在为止，它

在这方面是成功的。只要它吹一口气，大批敌对分子就会烟消云散。在24日下午就已发布命令，一旦街道上出现大屠杀的企图，就动用武器，要坚决无情。但是，敌人连想也不敢想在街道上较量。他们都躲起来了。街道是我们的。我们的委员们监视着通往彼得格勒的所有要冲地带。准尉学校和炮兵们没有响应政府的号召。只有一小队奥拉宁包姆的士官生在夜间突破了我们的屏护队，我通过电话监视他们的进一步行动。最后他们派遣了军使来斯莫尔尼宫谈判。临时政府一直寻求支持，但一无所获。它的立足地在塌陷。

斯莫尔尼宫外围的警卫已得到一支新的机枪队的增援。与各卫戍部队的联络始终不断。各团的值班连队彻夜不眠。委员们都守在岗位上。每个部队都派代表驻在斯莫尔尼宫，听候军事革命委员会的支配，以防联络中断。从各区派来的武装部队沿街徐徐推进，他们有时按门铃，有时不按门铃就破门而入，占领了一个又一个机关。这些分遣队几乎处处遇到迫不及待地等待着他们的朋友们。在各车站特派员警惕地注视着来往的火车，尤其是士兵的调动。没有任何令人不安的消息。市内所有最重要据点几乎都转到我们手里，几乎没有遇到抵抗，没有战斗，没有伤亡。电话铃响了：“我们在这里。”

一切好得不能再好了。现在可以离开电话机了。我在沙发上坐下来。紧张的神经渐渐放松了。正因为如此，我深深感到一种极度的疲劳。“给我一支烟！”我对加米涅夫说。那几年我仍抽烟，虽然并不经常。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我刚刚心中对自己说了一句：“这个还不够”，就昏迷过去了。我身体一有病痛，就容易晕倒，这毛病是从母亲那儿继承来的。一位美国医生据此认为我有癫痫病。我苏醒后，看到惊慌的加米涅夫正俯身看着我。“也许得拿点什么药吧？”他问道。我想了一想，回答道：“最好是能弄点什么吃的。”我努力回忆最后一次进食的时间，但是想不起来了。无论如何不会是在昨天。

早晨，我急切地阅读资产阶级和妥协派的报纸。关于已开始的起义只字未见。报上却有武装士兵要动手了，要毁灭了，要血流成河了，要发生政变了之类的大量疯狂的号叫，但他们根本没有注意到事实上已开始的起义。对我们同司令部的谈判报界信以为真，把我们

的外交式声明看作是犹豫不决。与此同时，根据斯莫尔尼宫发出的命令，士兵和水兵的队伍以及赤卫队未经巷战，有条不紊地占领了一个又一个机关，几乎没有放枪，没有流血。

市民们在新制度下擦净恐惧的眼睛。难道，难道布尔什维克掌握了政权？市杜马的一个代表团到我这儿来，向我提了几个古怪的问题：我们是否准备发动，是什么样的，在什么时候？杜马要在“至少24小时之前”知道此事。苏维埃采取哪些措施来确保安全和秩序？等等。我在回答时讲了革命的辩证观点，并邀请杜马派一个代表参加军事革命委员会的工作。这比革命本身更使他们着慌。我像往常一样，以武装防御的精神结尾：“如果政府使用铁，则将报以钢。”“你们会因为我们反对把政权转交给苏维埃而驱散杜马吗？”我回答说：“目前的杜马只反映昨天；如果发生冲突，我们建议居民就政权问题对杜马进行改造。”代表团空手而归，但给我们留下了必胜的感觉。这一夜发生了某种变化。三星期前，我们在彼得格勒苏维埃赢得了多数。我们几乎只是一面旗帜——没有印刷厂、没有经费、没有分部。就在这一夜里政府决定逮捕军事革命委员会的成员，并搜集了我们的地址。而现在市杜马代表团到“被逮捕的”军事革命委员会这里来探问杜马的命运。

政府依旧在冬宫开会，但它已经成为自身的影子。它在政治上已不复存在。冬宫在10月25日这一天内渐渐被我们的军队从四面八方包围了。在午后一点钟，我向彼得格勒苏维埃报告了局势。下面是报纸对这个报告报道：“我代表军事革命委员会宣布，临时政府不复存在了。（鼓掌）有些部长已经被捕。（‘好啊！’）其余部长将在近日或几小时内被捕。（鼓掌）属军事革命委员会调遣的革命卫戍部队解散了预备议会。（掌声雷动）我们在这里彻夜不眠，并通过电话线了解到革命的士兵队伍和工人赤卫队不声不响地执行了自己的任务。市民在安睡，不知道在这段时间内政权易手了。车站、邮局、电报局、彼得格勒通讯社、国家银行均已被占领。（掌声雷动）冬宫尚未占领，但是它的命运在最近几分钟内即将决定。（掌声）”

这篇简短的报道能使人对会议的情绪得出不正确看法。下面是我所记得的一些情况。当我报告了夜间所完成政权更迭的消息后，会场出现几秒钟的紧张沉默。接着响起了掌声，但并不是暴风雨般的掌声，而是一种沉思的掌声。大厅笼罩着激动不安的情绪，在等待着。在准备斗争时，工人阶级满怀一种无法形容的热情。而当我们跨进政权的大门时，这种缺乏考虑的热情就被一种忐忑不安的沉思所取代了。这表现了一种正常的历史本能。须知，前面还可能来自旧世界的顽抗，还会有斗争、饥饿、寒冷、破坏、流血和死亡。我们对付得了吗？许多人都在暗暗自问。由此就出现了忐忑不安的沉思时刻。大家回答说，我们对付得了。远方出现了新的危险。但此时此刻有一种伟大的胜利感，这种感觉使热血沸腾起来。对列宁无比热烈的欢迎使这种感情得以发泄，经过约4个月的缺席之后，列宁首次在会上露面。

深夜，我们在等待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召开，我和列宁在会议厅旁的一间空房里休息，那里除了几把椅子，一无所有。有人为我们在地板上铺上了毯子，还有人，好像是列宁的妹妹，给我们拿来了枕头。我们并排躺着，躯体和都累极了，好像绷得过紧的弹簧那样。这是应得的休息。我们无法入睡，就悄悄地交谈起来。直到现在，列宁才最终认可了延期起义。他的担心消失了。在他的声音里包含着少有的诚恳的语气。他向我详细地打听由赤卫队战士、水兵和士兵混合组成的，配置在各地的纠察队的情况。他怀着深厚的感情重复说：“多壮丽的情景：持枪工人与士兵并肩站在篝火旁！”“士兵终于同工人结合在一起了！”然后他突然想起来了：“冬宫呢？它至今尚未攻占？不会出什么问题吧？”我起身要打电话询问作战行动的进展情况，但是他阻止我。“躺下，我马上派人去打听。”不过也不能躺很久。在隔壁大厅里苏维埃代表大会开始了。列宁的妹妹乌里扬诺娃来叫我。“马尔托夫正在发言，有人叫您呢。”马尔托夫声嘶力竭地斥责阴谋家们，预言起义必定失败。他要我们同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联合。这两个党昨天还执掌政权，迫害我们，把我们投入监狱，而被我们推翻以后，却要求我们同他们妥协。我回答了马尔托夫并借此

回答了革命的昨天：“这里发生的是起义，而不是阴谋。人民群众的起义无需辩护。我们锻炼了工人和士兵的革命毅力。我们公开锤炼群众的起义意志。我们的起义取得了胜利。而现在有人提议：放弃胜利，去达成妥协。和谁达成妥协？你们是可怜的一小撮，你们是破产者，你们的角色已经演完了，到你们应去的地方去吧，到历史的垃圾堆里去吧。”这是从4月3日即列宁到达彼得格勒之日起开始的长期对话中的最后对白。



## 第二十八章

# 1917年的托洛茨基主义

从1904年起，我一直置身于社会民主党两派别之外。我和布尔什维克并肩携手地一起度过了1905至1907年革命。在反动年代，我在国际马克思主义报刊上捍卫革命方法，反对孟什维克。不过我还没有失去使孟什维克左转的希望，并且作了一系列联合的尝试。直到大战期间，我才最终相信这些尝试是没有指望的。在3月初，我在纽约撰写了一系列论述俄国革命的阶级力量和前景的文章。与此同时，列宁从日内瓦给彼得格勒寄去他的《远方来信》。这些论文虽然是在远隔重洋的两个地方撰写的，却作出了同样的分析和预测。所有基本的说法，诸如对农民、对资产阶级、对临时政府、对战争、对国际革命的态度完全相同。这就是检验“托洛茨基主义”对列宁主义态度的历史试金石。这种检验是在纯化学实验的条件下进行的。我不了解列宁的观点。我从自己的前提和自己的革命经验出发。然而，我却提出和列宁相同的前景和战略路线。

也许，这时候这个问题对大家来说已十分清楚，并普遍接受它的解决办法吧？不，恰恰相反。在1917年4月4日以前，即在彼得格勒舞台上出现以前，列宁的观点是他个人的观点，是他单独一人的观点。当时在俄国的党的领导人中间，没有人（没有一个人！）在思想上出现过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革命方针。在列宁抵达俄国前夕召开的党的会议有几十名布尔什维克参加，会议表明，谁也没有超越民主一步。无怪乎这个会议的记录一直隐藏到现在。斯大林一直执行支持古契柯夫—米留科夫的临时政府、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合并

的方针。李可夫、莫洛托夫、托姆斯基、加里宁以及所有其余的目前领导人及半领导人都站在这个立场上，甚至站在更为机会主义的立场上。雅罗斯拉夫斯基、奥尔忠尼启则、乌克兰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彼得罗夫斯基等人，二月革命期间在雅库茨克与孟什维克一起出版了《社会民主党人报》，在报上发挥一种最庸俗的外省的机会主义观点。现在如果重印由雅罗斯拉夫斯基主编的雅库茨克《社会民主党人报》的文章，那就意味着从思想上枪毙这个人，如果思想上的死亡对他来说是可能的话。这就是目前的“列宁主义”近卫军。当然我知道他们在其生涯的各个不同时期里曾重复列宁说过的话或仿效他的手势。但在1917年初，他们是自行其是的。形势是困难的。在这种情况下，需要表明，他们在列宁的学校里学到了什么，以及在没有列宁的情况下，他们能够做些什么。让他们从自己队伍中举出哪怕一个人来吧！这个人能独立地达到由列宁在日内瓦和我在纽约一致阐述过的那种立场。他们举不出来。在列宁回国以前，由斯大林和加米涅夫主编的彼得格勒《真理报》永远是一份有局限性的、盲目无知的和机会主义的文献。与此同时，广大党员和整个工人阶级却自发地站到夺取政权这一边。对党、对国家来说，根本就没有别的道路。

在反动年代里要捍卫不断革命的前景，必须有理论上的预见能力。在1917年3月要提出夺取政权的口号，只要有政治敏感性就行了。现在的领导人中间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人！）显露出预见能力和敏感性。他们在1917年3月没有一个人超越左派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立场。没有一个人经受住历史的考验。

我到达彼得格勒比列宁晚一个月。正是在这段时间，我被劳合·乔治扣留在加拿大。我回来时刚好看到党内状况已发生重大变化。列宁呼吁党内群众反对那些可悲的领袖。他展开了一场持续的斗争，反对那些“我党历史上不止一次起过可悲作用的‘老布尔什维克’的覆辙，他们只会无谓地背诵记得烂熟的公式，而不去研究新的生动现实的特点”<sup>①</sup>。加米涅夫和李可夫试图抵抗。斯大林默默地

<sup>①</sup> 引文见《列宁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38页。 译注

袖手旁观。斯大林那时写的文章没有一篇试图评论自己昨天的政策，并为自己开辟通往列宁主义立场的道路。他只是沉默不语。他在革命的第一个月里因自己的倒霉的领导而影响了声誉。他宁愿退居幕后。他未曾在任何地方起来捍卫列宁的观点。他避开了，在等待时机。在为变革作理论和政治准备的最紧要的几个月中，斯大林在政治上根本就不存在。

在我到达的时候，国内还有许多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联合在一起的社会民主党组织。这是从斯大林、加米涅夫等人不仅在革命初期，而且在战争期间所持的立场中自然得出的结论，虽然应当承认，谁也不知道斯大林在战争期间的立场——对于这个颇为重要的问题，斯大林是只字不提的。目前全世界的共产国际的教科书，斯堪的纳维亚的共青团员和奥地利的少先队员们，老是重复和背诵说，托洛茨基于1912年8月企图使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联合起来。可是没有一个地方，没有一字提到斯大林于1917年3月曾鼓吹同策烈铁里的党联合，也没有提到实际上直到1917年年中，列宁还没有能最终把党从泥潭里拉出来，党是被当时的临时领导人，今天的不肖徒辈拖入泥潭的。在革命初期，他们中间没有一个人理解这场革命的意义和方向，这种情况今天被说成是特殊的辩证法的深刻之处，以对抗托洛茨基主义的异端，托洛茨基不仅敢于了解昨天，而且还敢于预测明天。

我抵达彼得格勒后，曾对加米涅夫说，没有任何东西把我同确定党的新方针的列宁著名的《四月提纲》分开，而加米涅夫只是回答：“那还用说！”在正式入党以前，我曾参加制定最重要的布尔什维主义文献。当时谁也没有想起问我是否放弃了“托洛茨基主义”，就像不肖徒辈没落时期，加香<sup>①</sup>们、台尔曼<sup>②</sup>们以及十月革命的其他一些尾

① 马·加香(1869—1958年)：一法国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活动家，法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1924至1943年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译注

② 恩·台尔曼(1886—1944年)：一德国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活动家，1925年起任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1924至1943年先后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委员和主席团委员。——译注

巴成千上万次地盘问那样。如果说那时也可以偶然遇到把托洛茨基主义同列宁主义对立起来的说法,那只是指4月间党的上层曾指责列宁搞托洛茨基主义。加米涅夫就曾公开地、固执地这么说。其他人则比较谨慎,只在背地里说。几十名“老布尔什维克”在我抵达俄国后曾对我说:“现在是您的好日子了”。我不得不再三向他们证明,列宁并没有“转向”我的立场,而只是发展了他自己的立场,发展的进程用简单的算术取代了复杂的代数的方法,表明我们的观点是相同的。实际情况也是如此。

在我们最初的会面中,尤其是在七月事变之后,列宁给人的印象是聚精会神,专心致志,而外表则显得安静和“平淡无奇”的质朴。在那些日子里克伦斯基一伙似乎是无所不能的。布尔什维克好像是“无足轻重的一小撮”。人们也一本正经地看不起它。党自身还没有意识到自己日后的力量。而这时候列宁却充满信心地引导它去迎接最伟大的任务。我投入了繁重的工作,并协助列宁。

在十月变革之前两个月我写道:“对我们来说,国际主义不是个抽象的思想,它的存在不只是为了在适当时机背叛它(对策烈铁里或切尔诺夫来说就是这样),而是进行直接指导的、深刻的实践原则。没有欧洲革命,要取得稳固的和决定性的成就是不可思议的。”那时我还未能把斯大林这个一国社会主义的哲学家同策烈铁里和切尔诺夫的名字相提并论。文章的结尾是:“不断革命反对不断屠杀!这就是决定人类命运的斗争。”这篇文章9月7日发表在我党的中央机关报上,以后又以小册子形式再版。为什么我现在的批评家们那时对不断革命这个异端口号保持沉默呢?他们在哪儿呢?一些人,如斯大林,在小心翼翼地等待,左顾右盼;另一些人,如季诺维也夫,则躲在桌子底下。但是更为重要的是另一个问题:列宁怎么能默认我的异端宣传呢?在理论问题上,他既不姑息,也不迁就。他怎么能支持在党的中央机关报上鼓吹“托洛茨基主义”呢?

1917年11月1日,列宁在彼得格勒委员会的会议上说,托洛茨基确信布尔什维克不可能与孟什维克统一了,在这以后,“没有比他更好的布尔什维克了”。这个从任何意义上都是历史性的会议的记

录一直隐藏到现在。列宁以此清楚地表明，而且也不是第一次表明，把我们分开的不是不断革命的理论，而是虽然极为重要，但是较为狭隘的关于对孟什维克的态度问题。

变革两年以后，列宁回顾说：“在夺取政权和建立苏维埃共和国的时刻，布尔什维主义是统一的。它把接近自己的各种优秀的社会主义思想流派吸引到自己这方面来”<sup>①</sup>。列宁如此强调的最接近布尔什维主义的流派的优秀代表，首先指的正是现在命名为“历史的托洛茨基主义”的那个流派，对此还能有丝毫疑问么。因为还有哪个流派比我所代表的流派更接近布尔什维主义的呢？列宁指的还会是别的什么人吗？也许是马塞尔·加香吧？或者是台尔曼吧？在列宁评论党的过去整个发展进程时，对他来说，托洛茨基主义并不是敌对的、异己的流派，相反地，是最接近布尔什维主义的社会主义思想流派。

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思想发展的实际进程和不肖徒辈利用列宁之死和反动潮流所进行的欺骗性的丑化毫无共同之处。

<sup>①</sup> 见《列宁全集》第37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07页。——译注

## 第二十九章

# 当 政

无论在国家生活上，还是在个人生活上，那些日子都是不平常的。社会的激情和个人的力量都紧张到了极点。群众开创了一个时代，领导人感到，他们与历史并步前进。那些日子里作出了各种决定，发出了各种指示，它们关系着人民在整个历史时代的命运。然而，这些决定几乎没有经过讨论。我很难说，它们是经过认真斟酌和周密考虑的。它们是仓猝作出的。但它们并不因此而变得坏一些。事变的压力是如此之大，任务是如此清楚，连一些最重要的决定都像不言而喻的东西那样很容易作出，付诸实施，并被接受。道路早已确定，需要的只是说出任务的名称，无需加以论证，也几乎无需号召。群众总是毫不动摇、毫不迟疑地抓住形势向他们提出的任务。在事态的重压之下，“领袖们”只不过是把符合群众需要和历史要求的东西表述出来而已。

马克思主义者把自己看作是无意识的历史进程的有意识体现者。但是“无意识的”进程(从这个词的历史哲学的含义上来说，而不是从心理学的含义上来说)只有在达到其顶峰之时，也就是当群众在自发的压力下冲破社会的墨守成规的大门，并胜利地体现历史发展的最深刻的需要之时，才会与自己的自觉体现相吻合。时代的最高理论意识在这个时刻才会与那些对理论毫无所知的最深层的被压迫群众的直接行动融为一体。这种意识同无意识间的创造性结合便是人们通常所说的灵感。革命就是历史灵感的猛烈喷发。

每一个真正的作家都知道，创作的时机就好像有个高于他的人

手把着手让他写的时候。每一个真正的演说家都体会过这样的时刻，这就是他嘴里说出了比自己平时说的更有力的话。这就是“灵感”。它来自一个人呕心沥血的创造性努力。无意识的东西从深穴里升起，使思想的有意识的工作听命于自己，并使它与自己在某个最高统一体中融成一体。

精神力量的高度集中有时也出现在与群众运动相联系的个人活动的所有方面。十月的那些日子对“领袖们”来说就是这样的日子。机体的潜在力量、根深蒂固的本能、从动物祖先那里承继下来的嗅觉，所有这一切都激发出来了，冲破了心理上的墨守成规的大门，和高级的历史哲学概括一起，为革命服务。这两个过程（个人的和群众的）都是建立在意识与无意识相结合，作为意志的动力的本能与高级的思想概括相结合的基础上的。

从表面上看，这些一点也不动人心弦；人们忍着疲倦、饥饿和身上的污垢，带着熬红的眼睛、满脸的胡子来回奔走。而在事后，他们中间谁都说不大清楚那些最危急的日子和时刻是怎么度过的。

下面是我的妻子在过了相当一段时间以后所记的札记的摘录：

“在准备十月的最后几天里，我们住在塔夫利达大街。列·达·整天守在斯莫尔尼宫。我仍在山布尔什维克领导的细木工工会工作，气氛非常紧张。办公时间都是在争论起义问题。工会主席拥护‘列宁-托洛茨基观点’（当时就是这种说法），我和他一起进行鼓动。到处都在谈论起义——在街头和食堂，在斯莫尔尼宫的楼梯上都在谈。大家吃不好，睡得少，一天几乎工作24小时。我们与孩子们失去了联系，在十月的日子里，我真为他们的命运担心。在他们学习的学校里，总共只有两个‘布尔什维克’——辽瓦和谢廖沙，第三个是他们所说的“同情者”。反对这三个人的是一批抱成一团的执政的民主派、立宪民主党人和社会革命党人的后裔。在出现严重分歧时，照例得用拳头去补充批判。校长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把我的儿子从一大堆向他们扑去的‘民主党派’那里解救出来。孩子们实际上仅仅做了父辈所做的事。校长是立宪民主党人。因此他经常惩罚我的儿子：‘戴上帽子回家去。’变革以后，要再留在学校里是绝对不可能的了。

孩子们转到了国民学校。那里一切都比较简陋。但是呼吸比较轻松。

“我和列·达·根本不在家。孩子们放学回家，找不到我们，也不认为需要留在家里。在那些日子里，游行、冲突和频频的枪击使我为他们的安全担忧，因为他们怀有极端革命的情绪……在匆促的会面时，他们兴冲冲地告诉我们：‘今天和哥萨克同乘一辆电车，看到他们在读爸爸写的号召书《哥萨克兄弟们！》’。‘后来呢？’‘他们看完后又传给别人，好……’‘好！’列·达·认得的工程师 K. 家里有各种年龄的孩子，有保姆等等，是一个大家庭，他建议我们把孩子暂时安顿在他那里，好有个照应。只好采纳这个建议。我每天要去斯莫尔尼宫四五次，为列·达·办各种各样的事。深夜我们才返回塔夫利达，而一早又分手了，列·达·去斯莫尔尼宫，我去工会。随着事态的发展，几乎不能离开斯莫尔尼宫。列·达·连续几天不到塔夫利达来，甚至也不来打个盹。我也常常留在斯莫尔尼宫，我们和衣睡在沙发上和圈椅上。天气已不暖和，但还是干燥，是阴沉沉的秋天，不时刮来阵阵凉风。市中心的街道静悄悄，空荡荡。在这种寂静之中潜藏着高度的警觉。斯莫尔尼宫里热气腾腾。会议厅里成干盏壮丽的枝形挂灯闪闪发光，日夜挤满人群。各工厂气氛紧张。而街道却冷冷清清，仿佛全城都在担惊受怕，把头缩进领子……”

“记得变革后的第二天或第三天早上，我走进了斯莫尔尼宫的一个房间，见到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夫·达维多维奇，好像还有捷尔任斯基、越飞和其他许多人。由于彻夜不眠，大家的脸色苍白，眼睛通红，衣领很脏，房间里烟雾腾腾……有一个人坐在桌旁，旁边站着一群人，在等候指示。列宁和托洛茨基被围在中间。我觉得，一项项指示像在梦中发布的一样。他的举动和说话有点像梦游者，我在一瞬间觉得，所有这一切均系我梦中所见，觉得要是他们再不好好睡一觉，换上干净的领子，革命有可能遭到毁灭；梦境同这些衣领紧紧联系着。记得第二天碰到列宁的妹妹玛丽亚·伊里奇娜，我在匆忙中提醒她，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得换件衣领了。她笑着回答说：‘是的，是的。’不过这时候干净的衣领问题在我眼中已不具有可怕的



作用了。”

政权已经夺得，至少在彼得格勒是这样。列宁还没有来得及更衣领。在他那疲倦不堪的脸上，两只眼睛炯炯有神。他亲切地、温和地瞧着我，带着不自然的不好意思的样子，显出内心的亲密感。他有点犹豫地说：“您知道，从受迫害，从地下，到突然当权……”他在寻找恰当的用语，突然说了句德语“es schwindelt”（弄得头晕目眩），并用手在脑袋上画了一个圆圈。我们相对而视，微微一笑。

所有这一切只不过持续了一两分钟的时间。接着就转入正题。

应当组织一个政府。我们中间有几个中央委员。于是在房间的一角开起了碰头会。

“叫什么好呢？”列宁边想边问，“只是不要叫部长，这是个令人憎恶、声名狼藉的称呼。”

“也许可以叫做委员，”于是我提议说，“只是现在委员太多了。是不是可以叫最高委员？……不，‘最高’这个词听起来也不好。能不能叫‘人民委员’呢？”

“人民委员？不错，看来很合适。”列宁表示同意。“而整个政府叫什么呢？”

“委员会，当然叫委员会……人民委员会，怎么样？”

“人民委员会？”列宁支持这个说法，“太好了，有着强烈的革命气息！……”

列宁不大管革命的美学，或者说不大想玩味它的“浪漫情调”。但是他越是深入地接触到整个革命，就越能准确无误地辨别革命的“气息”。

就在十月革命的头几天，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完全出乎意料之外地问我：“要是白军把您和我都杀掉，斯维尔德洛夫和布哈林能对付得了吗？”

“也许不会杀掉吧。”我笑着回答。

“鬼知道他们。”列宁说着，自己也大笑起来了。

1924年，我在回忆列宁的文章里首次谈到这段插曲。据我后来所知，当时的“三驾马车”成员斯大林、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都因我

提供的资料而深感委屈，虽然他们不敢对它的准确性提出异议。事实总归是事实：列宁只提到斯维尔德洛夫和布哈林。他没想到别的人。

列宁两次侨居国外总共达 15 年之久，中间回国的时间很短，所以他只能通过通信或在国外的很少几次会晤来了解留在国内的党的主要干部。直到革命以后，他才有可能通过工作从近处了解他们。结果他不得不修改以前根据别人的报告得出的看法，或形成新的看法。列宁是一个具有高尚道德情操的人，对人从不采取漠不关心的态度。对人的极端热情是这位思想家、观察家和战略家的特性。克鲁普斯卡娅在回忆录里也提到这一点。列宁对人从来不轻易地下一个粗浅的结论。列宁的眼睛好像是一架显微镜，他可以把在特殊情况下投入他的视野的特点放大许多倍。列宁常常对人产生真正的爱。每遇到这种情况，我总是嘲弄他说：“我知道，我知道，您又在闹恋爱了。”列宁知道自己的这个特点，只好付之一笑，有点发窘，有点生气。

在 1917 年间，列宁对我的态度经历了几个阶段。起先列宁对我有点冷淡，抱观望的态度。七月事变立即使我俩接近起来了。当我反对大多数布尔什维克领导人，提出抵制预备议会的口号时，列宁从他的避难所那里写道：“好样的，托洛茨基同志！”后来，他根据一些偶然的、错误的迹象，觉得我在武装起义问题上似乎推行的是过分等待的路线。列宁在十月所写的几封信里反映出他的这种担心。然而，在革命的那一天，当我们在半明不暗的空房间里躺在地板上休息的时候，他对我的态度突然变得越加明朗、越加热情亲切了。次日，在党的中央委员会会议上，列宁提议任命我为人民委员会主席。我马上站起来表示反对这个对我来说如此突然，如此不合适的提议。“为什么呢？”列宁坚持说，“您是夺得政权的彼得格勒苏维埃的首脑。”我建议不经讨论就否决列宁的提议。事情也就这么办了。11 月 1 日，在彼得格勒党委会上进行热烈讨论的时候，列宁高声赞叹说：“没有比托洛茨基更好的布尔什维克了”。这句出自列宁之口的话，是意味深长的。无怪乎记载这些话的会议记录至今秘而不宣。

夺取政权以后，立即发生了我在政府里担任什么工作的问题。奇怪的是我对这个问题从未考虑过。尽管有1905年的经验，可是我从未把个人前途与政权问题联系起来。从相当早的年代起，确切些说，从童年起，我就梦想成为一名作家。在以后的年代里我把自己的创作活动以及所有其他的活动，都服务于革命的目标。我总在考虑党夺取政权的问题。我在文章和讲话里曾几十次、几百次地谈及革命政府的纲领。但是，夺取政权以后我的个人工作问题却从来也没有在我面前出现过。因此，这个问题使我感到措手不及。革命后我试图不在政府部门任职，而提议让自己领导党的出版工作。也许这是胜利后神经的疲劳反应。前几个月我直接参加了变革的准备工作，浑身都处于紧张状态。卢那察尔斯基在报刊上的一篇文章里写道，托洛茨基走起路来像个电容瓶，一碰到就会引起放电。11月7日松懈下来了。我的感受与做完困难而危险手术的外科医生一样，需要洗洗手，脱下白罩衫，然后休息一下。列宁则相反，他刚从自己的避难所里出来，在那里他隐居三个半月，因脱离实际领导，而感到苦恼不堪。一种情况与另一种情况凑巧同时发生，这就更增强我退居幕后，暂避一时的愿望。但是列宁连听都不想听这个意见。他要我领导内务部门，因为同反革命斗争是当前的主要任务。我提出异议，在列举的许多理由中，我提到了民族因素：如果让敌人抓住我是犹太人这一点作为补充武器，这是否值得？列宁几乎生气了：“我们正在进行一场伟大的国际革命，这种鸡毛蒜皮的小事有什么意义？”于是我们就这个问题展开了半带玩笑的争吵。“革命倒是伟大的”，我回答说，“但傻瓜还是不少。”“但是我们总不能向傻瓜看齐吧。”“我们倒不是向他们看齐，但有时候难免要向愚蠢作一点让步，我们何必一开始就给自己增添不必要的麻烦呢？……”

我已经说过，民族因素虽然在俄国生活中如此重要，但在个人生活中却几乎没起过任何作用。早在少年时期，民族偏见或民族成见曾在我身上引起理性的困惑，有时候变成厌恶，甚至是道义上的厌恶。我所受到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加深了这种情绪，并把这种情绪变成积极的国际主义。我在许多国家生活过，熟悉这些国家的语言、政

治和文化,这使得我同国际主义血肉相连。如果说在1917年及以后,我有时提及自己的犹太人出身作为拒绝某些任命的理由,那纯粹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

我把斯维尔德洛夫和中央委员会的某些成员争取到我这边来了。列宁成了少数派。他耸耸肩膀,叹了一口气,又责备地摇摇头,只好以不管哪个部门都得同反革命作斗争来安慰自己。可是去出版部门工作的想法也遭到斯维尔德洛夫的坚决反对。他说:“我们派布哈林去那里,列夫·达维多维奇应该去对付欧洲,让他去管外交事务。”列宁反驳说:“我们现在有什么外交事务呢?”不过,他还是勉强同意了。我也只好勉强答应下来。就这样,根据斯维尔德洛夫的提议,我领导了三个月的苏维埃外交工作。

外交人民委员部工作对我来说实际上意味着免除我的行政工作。对那些想同我一起工作的同志,我几乎总是建议他们去寻找更好的用武之地。其中有一人在后来写的回忆录里,相当生动地转述了苏维埃政府刚成立时他和我的一次谈话。据他说,当时我曾对他说,“我们会有什么外交工作呢?就是向各国人民发表几份革命宣言,然后我就关门大吉”。我的那位对话人对我如此缺乏外交意识而感到十分不快。当然,我是故意夸张自己的观点,想要强调外交根本不是当前的工作重点。

当时的主要工作是进一步发展十月变革,把它扩展到全国,击退克伦斯基和克拉斯诺夫将军对彼得格勒的进攻,同反革命作斗争。我们解决这些任务不受部门限制,因此我同列宁始终保持着最密切的不间断的合作关系。

在斯莫尔尼宫,列宁的办公室和我的办公室分处大楼的两端。把我们连接,或准确些说隔开的走廊很长,列宁诙谐地建议用自行车来保持联络。我们用电话联系。一天好几次走过这蚂蚁窝似的没有尽头的走廊,到列宁办公室与他讨论问题。一个被叫做列宁秘书的青年水兵不停地来回奔走,给我送来列宁的便条,便条上一些重要的词句下面都画上两三条杠杠,把问题直截了当地提了出来。除便条外还常常送来法令草案,要求马上提出意见。在人民委员会的档

案里收藏着那时的大量文件，其中有列宁写的，也有我写的，列宁起草的文本上有我作的修改，我提的议案中也有列宁所作的补充。

在第一个时期，大约1918年8月以前，我积极参与了人民委员会总的工作。在斯莫尔尼宫时期，列宁迫不及待地力图通过各种法令来回答经济、政治、行政和文化生活中所提出的一切问题。他这样做决不是他热衷于官僚主义的规章制度，而是力图用政权的语言来发挥党的纲领。他知道革命的法令暂且只有很少的一部分能得到贯彻。要使这些法令得到执行和检查，就必须有能正常运转的机关，需要经验和时间。但是谁也无法说清，有多少可供我们支配的时间。在初期，法令更多的是起宣传作用，而不是行政作用。列宁急于告诉人民，新政权是怎么回事，它想干什么，以及它打算怎样实现自己的目标。他从一个问题转到另一个问题，废寝忘食地研究这些问题，召开小型会议，向专家咨询，自己查阅图书。我则协助他。

列宁深信他所从事的事业具有继往开来的意义。作为一个伟大的革命家，他懂得历史的传统意味着什么。我们是否能保持政权或者我们会不会被抛弃，这是无法预见的。所以应当在任何情况下都尽可能地弄明白人类的革命经验。另一些人上来了，他们依据我们所计划和草创的事业，向前迈出新的步伐。这就是革命初期立法工作的意义。也是在这种想法的推动下，列宁迫不及待地要求尽快出版社会主义和唯物主义经典著作的俄译本。他希望在所有城市，如果可能，也在农村建立更多的革命纪念碑，哪怕是最粗糙的纪念碑、半身像也好，使所发生的事能牢固地留在群众的脑海里，尽可能深刻地铭刻在人民的记忆中。

起初人民委员会的成员常作部分更新，人民委员会的每次会议上都会呈现出临时现编各种法案的大场面。一切都得从头开始。不可能找到“先例”，因为史无前例。列宁不知疲倦地一连五六个小时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当时每天都召开人民委员会会议。提到会上讨论的问题通常事先毫无准备，又几乎总是十分紧急的。人民委员会的成员和主席经常在会议开始前都不知道所要讨论的问题本身。辩论总是简短的，主报告只允许讲十来分钟。然而列宁总是能够找

到所必需的轨道。为了节约时间，他常常写简短的便条给与会者，要求提供这种那种资料。这些便条在列宁的人民委员会的立法技术中是一种内容极其丰富的、十分有趣的书信体资料。可惜大部分便条没有保存下来，因为答复往往就写在问题的背面，而且便条常常被主席立即销毁。列宁选择适当的时刻来宣读总是有意用尖锐的文字表述的决议条款，在这以后或是辩论完全停止，或是转入实际建议的具体讨论。列宁的“条款”通常就成为法令的基础。

要领导这项工作，除了别的品质外，还需要具备富有创造性的极大想象力。这种想象力的最宝贵的品性之一，在于能够在即使你从来没有见过的情况下把人物、事物和现象想象得如实际那样。利用自己的全部生活经验和理论观点，把迅速捕捉到的个别的、细小的特征联结起来，按照某种相应的有充足根据的不成文的法律加以补充，从而具体地描绘出人们生活的某一个方面，——这就是立法者、行政领导人员、领袖所不可少的想象力，尤其是在革命时代。列宁的力量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这种现实主义的想象力。

不必说，在这种立法热中难免出现不少差错和矛盾。但是总的说，在斯莫尔尼宫时期，即在革命最激烈、最混乱时期列宁颁布的法令将作为新世界的宣言永垂青史。不仅未来的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而且还有立法家都将不止一次地来阅读这些历史资料。

与此同时，许多实际任务，首先是国内战争、粮食供应和运输任务越来越占据首位。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建立了一些非常委员会，其任务是正视新任务，推动那些在问题面前束手无策、踏步不前的部门开展工作。在那些月份，我不得不领导一系列此类委员会的工作，如粮食供应委员会（第一次参加工作的瞿鲁巴<sup>①</sup>是其成员之一）、运输委员会、出版委员会和其他许多委员会。

至于外交部门，除了布列斯特谈判以外，它占用我的时间不多。

---

① 亚·德·瞿鲁巴(1870—1928年)——苏联国务活动家。1917年任粮食人民委员部副人民委员，1918年起任粮食人民委员，1921年起任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副主席。——译注

但是事情比我预计的还要复杂。在最初几天，我已经不得不出乎意料地去同……“埃菲尔铁塔”作外交谈判。

在起义的日子里，我们还顾不上外国电台。但是，现在我作为外交人民委员，应当注意资本主义世界是怎样看待十月变革的。不用说，哪里也不会发贺电给我们。尽管柏林政府有意向布尔什维克送秋波，但是当皇村电台播送关于我们战胜克伦斯基部队的消息时，他们的瑙恩电台就进行了干扰。如果说，柏林和维也纳在敌视革命和希望缔结一项有利的和约之间仍然举棋不定，那么所有其他国家，不仅交战国，而且还有中立国，都用各种不同的语言播送被我们推翻的旧俄统治阶级的感情和思想。然而在这个大合唱里，“埃菲尔铁塔”特别猖狂，当时这家电台还用俄语广播，显然是想打动俄国人民的心。在听巴黎电台时，我有时觉得克列孟梭<sup>①</sup>本人就坐在塔尖上。我作为一个记者对他是相当了解的，如果不是文风，至少对他的脾气是了解的。广播充满了仇恨，凶狠到了极点。有时候感到，电台这只埃菲尔铁塔上的毒蝎在用自己的尾巴刺自己的头。

我们掌握了皇村电台，我们没有理由保持沉默。我连续几天口授了对克列孟梭辱骂的答复。我对法国政治史的知识足以对主要的当事人作出恰如其分的评价，重提了在他们传记中从巴拿马<sup>②</sup>起那些已经被遗忘的某些事实。一连几天巴黎铁塔和皇村发射塔之间进行了紧张的决斗。作为中立物体的电波一丝不苟地传达了双方的论据。结果如何呢？我自己也没有预料到会有这么快的效果。巴黎突然改变了语气；此后它播送内容仍然是敌对的，但客气了一些。后来我不止一次地愉快地回忆起，我的外交活动是从教埃菲尔铁塔保持文明风度开始的。

11月18日，美国外交使团团团长贾德森将军突然到斯莫尔尼宫

① 乔·邦·克列孟梭(1841—1929年)——1906至1909,1917至1920年任法国总理，多次出任部长。1919至1920年巴黎和会主席。——译注

② 此处系指巴拿马丑闻。1879年一家法国公司为开凿巴拿马运河搞了一场骗局，为了掩盖贪污舞弊和严重财务困难，公司董事会购买了法国的部长们和参议员、众议员及报纸编辑。公司于1888年倒闭。——译注

来拜访我。他首先告诉我，他现在还不能代表美国政府说话，但希望一切顺利。苏维埃政府是否打算和同盟国一起结束战争？我回答说，由于未来的谈判有充分的公开性，因此同盟国能够看到谈判的进展情况，并可在任何阶段参加谈判。最后，这位爱好和平的将军说：“抗议和威胁苏维埃政权的时期已经过去了，如果有过的话。”但是众所周知，一燕不成春，哪怕他是一位将军也无济于事。

12月初，我同法国大使努朗斯(Noulens)举行了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会晤。为了密切同二月革命的关系，这位前激进议员被派来接替一位拜占庭式的人物、公开的保皇党人巴雷洛奎——法兰西共和国利用他来同沙皇建立友好关系。为什么选中努朗斯，而不是别人，这我就知道了。但是他并没有改善我对这些人类命运的主宰者的看法。在他的提议下安排了这次会谈，但是没有取得什么结果。克列孟梭经过一阵犹豫以后，终于转向围着铁丝网的政权。

我在斯莫尔尼宫同法国军事使团团长尼塞尔(Niessel)将军进行了并不友好的谈话。这位将军在后方战斗中锻炼自己的进攻精神。在克伦斯基执政时期，他习惯于发号施令，不愿意放弃坏习惯。作为第一件事，我不得不请他离开斯莫尔尼宫。不久，同法国军事使团的关系变得更加复杂化了。该使团下面的一个情报局，是反对革命、制造恶毒谣言的工厂。所有敌对的报纸每天都刊登“斯德哥尔摩电”，一个比一个离奇、恶毒、愚蠢。当问及“斯德哥尔摩电”的来源时，各报编辑部都一致指向法国军事使团。我就正式质问尼塞尔将军。12月22日，他给我送来一份绝妙的文件作为答复：

“为数众多的持各种观点的新闻记者前来我军事使团索取情报。我受权向他们提供关于西线战场、萨洛尼卡、亚洲的军事情况，以及法国的形势。在有一次(?)来访时，一名(?)年轻军官谈起在城里(?)广为流传的一则消息，此消息来自斯德哥尔摩……”最后，将军含糊其辞地保证“采取措施，以防此类疏忽(?)再度出现”。这太岂有此理了。我们教导巴黎发射塔学点礼仪规矩，并不是为了让尼塞尔将军在莫斯科建立一座辅助性的谎言发射塔。我当天就写信给尼塞尔：

“1、鉴于法国军事使团名曰情报局的宣传机构成为散布流



言蜚语的场所，其目的在于混淆视听，制造混乱，因此必须立即关闭；

2，那个制造谣言的“青年军官”应立即离开俄国国境。请立即告知此军官之姓名；

3，无线电报的接收机必须立即从使团驻地撤除；

4，在内战地区的法国军官应立即召回到彼得格勒，此特别命令须在报上公布；

5，请告知使团所采取的与此信有关的一切步骤。

外交人民委员

列·托洛茨基”。

报出了匿名的“青年军官”的姓名，他作为替罪羊离开了俄国。接收机撤走了。情报局关闭了。军官们被从地方召回中央。所有这一切只是一场小小的前哨战。在我转入军事部门之后，在短期内这种前哨战变成了不稳定的停战。过于坚决的尼塞尔将军被一位温情的拉韦尔(Lavergne)将军所取代。但是停战没能维持多久。法国军事使团以及外交机构不久成了反对苏维埃政权的阴谋活动和武装进攻的中心。不过这是在布列斯特谈判以后，在莫斯科时期，即在1918年春夏才明目张胆地展开。

## 第三十章

# 在莫斯科

布列斯特和约<sup>①</sup>的签订使我提出的退出外交人民委员部的声明失去了政治意义。这时契切林<sup>②</sup>从伦敦回国，成了我的副手。我早就认识契切林。在第一次革命时期，他放弃外交官的职位，加入了社会民主党，并作为孟什维克完全投身于党的国外“协助小组”的工作。在战争初期，他明显地持爱国主义立场，从伦敦发出许多信件，企图为这一立场提供论证。其中一两封信是针对我的。但他较快地转向国际主义者，并成了我在巴黎主编的《我们的言论报》的积极撰稿者。最后他被关进了英国监狱。我要求释放他。谈判一拖再拖，我以惩罚英国人相威胁。英国大使布坎南在日记中写道：“在托洛茨基的论据中毕竟有一点正当的理由：如果我们自命为有权在一个希望继续战争的国家里逮捕一个进行和平主义宣传的俄国人，那么他同样有权在一个希望和平的国家里逮捕进行战争宣传的英国人。”契切林终于获释。他来到莫斯科正是时候。我松了一口气，把外交大权交付给他。我在外交部里根本不露面了。契切林偶尔通过电话同我商量。直到3月13日才公布我辞去外交人民委员的消息，同时任命我

---

① 布列斯特和约，1918年3月3日苏维埃俄国同德国、奥匈帝国、保加利亚和土耳其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签定的条约。根据条约德国并吞波兰、波罗的海沿岸地区、白俄罗斯和外高加索部分领土，索取赔款60亿马克。1918年11月13日苏俄政府废除了该条约。——译注

② 格·瓦·契切林(1872~1936年)。——苏联外交家。1918至1930年为俄罗斯联邦和苏联的外交人民委员，签订布列斯特和约，率领苏俄代表团出席热那亚会议、洛桑会议。——译注

为陆军人民委员和最高军事委员会主席，此最高军事委员会是在前不久根据我的建议成立的。

这样一来，列宁终于达到了自己的目的。我因布列斯特和约上的分歧而提出辞职，列宁则利用我的辞职以实现他原先的想法，只是根据形势作了些变更。由于国内敌人从搞阴谋活动转入建立军队和开辟战场，列宁希望我来领导军事。这次列宁把斯维尔德洛夫争取过来了。我设法推辞。列宁逼问我：“那么究竟谁来承担？您提。”我想了想，同意了。

我是否受过军事工作的训练呢？当然没有。我当年甚至未曾在沙皇军队里服过役。我的应征年龄是在监狱、流放地和国外度过的。1906年法院剥夺了我的公民权和服役权。在巴尔干战争期间，我先后在塞尔维亚、保加利亚，然后在罗马尼亚呆了几个月，那时才开始接触一些军事问题。不过这仍然是从一般政治角度，而不是从纯军事角度去进行研究的。世界大战促使世界上所有人，包括我在内，去研究军事问题。《我们的言论报》的日常工作和为《基辅思想报》撰稿促使我把自已获得的新知识和见闻系统化。不过问题还是首先在于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军队则是政治的工具。至于军事组织和军事技术问题对我来说仍居次要地位。不过我对军队的心理学：营房、战壕、作战、医院等问题十分感兴趣。这些知识后来极有用处。

在议会制国家里，担任陆海军部长的往往是律师和新闻记者，他们像我一样，多半是从编辑部的窗口去观察军队的，只是比较舒适一些而已。然而差别还是明显的。在资本主义国家，问题在于保持现有的军队，即实质上只是在政治上掩护独立自主的军国主义制度。至于我们这里，问题则是彻底扫除旧军队的残余，并在炮火下建立起一支新的军队取而代之，这支军队的模式是目前任何一本书中都找不到的。这足以说明我为什么对军事工作缺乏信心，我之所以同意担任这项工作，是因为没有人可担任此项工作。

我决不认为自己是一个什么战略家，不过我对那些在革命中大批涌进党内的一知半解的战略家也一点不俯就。诚然，我曾在三种

场合,即在同邓尼金<sup>①</sup>作战,在保卫彼得格勒,在同皮尔苏茨基<sup>②</sup>作战中,采取独立的战略立场,并为这一立场而进行了斗争——时而反对指挥机关,时而反对中央委员会中的多数。但是在上述场合,我所采取的战略立场是出于政治和经济上的考虑,而不是出于纯粹的战略考虑。不过需要指出,重大的战略问题是不能用别的方法解决的。

我的工作变动正好发生在政府驻地迁移的时候。把中央政权机构迁移到莫斯科去对彼得格勒来说当然是个打击。几乎所有的人都反对迁都。带头的是当时已当选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的季诺维也夫。他得到卢那察尔斯基的支持,卢那察尔斯基在十月革命后几天就辞去政府的职务,他不愿意承担毁坏(臆想的)莫斯科圣瓦西里·勃拉任纳教堂的责任,而现在,回到工作岗位以后,他却不愿意离开作为“革命象征”的斯莫尔尼宫。另一些人提出了一些较为现实的理由。多数人主要是担心给彼得格勒工人造成不良印象。敌人散布谣言说,我们答应把彼得格勒让给威廉皇帝。我和列宁则相反,认为政府迁往莫斯科不仅能确保政府的安全,而且能确保彼得格勒本身的安全。一举占领革命的首都及其政府对德国,对协约国是极有诱惑力的。单是占领一个没有政府的挨饿的彼得格勒,情况就大不一样了。最后阻力消除了,中央委员会的多数表示赞成迁都,于是在3月12日(1918年)政府迁往莫斯科。为了淡化把十月革命的首都降级的印象,我继续留在彼得格勒一星期或一个半星期。在我启程时,铁路当局使我在车站上多呆了几个小时,怠工虽然减少了,但还是相当严重。我是在被任命为陆军人民委员的第二天到达莫斯科的。

作为革命专政的堡垒的克里姆林宫,四周是中世纪的城墙,加上无数个金色圆屋顶,看上去很不相称。诚然,前贵族女子学院所在地的斯莫尔尼宫过去也不是给工人、士兵和农民的代表用的。1918年

① 安·伊·邓尼金(1872-1947年)——国内战争中反革命的主要组织者之一,中将。1918年4月起任白卫“志愿军”司令,10月起为总司令,1919年1月起为“南俄武装力量”总司令,1920年逃亡国外。——译注

② 约·皮尔苏茨基(1867-1935年)——1919至1922年为波兰国家元首,1920年领导反对苏俄的军事行动。1926至1928年和1930年任总理。——译注

3月以前，我从来没有进过克里姆林宫，对整个莫斯科也不熟悉，只知道唯一的一座建筑物，布特尔解犯羁押监狱，在1898至1899年的严冬，我曾在那个监狱的塔堡里度过6个月。如果是参观者，本可以静静地观赏克里姆林宫的古迹、伊凡雷帝的宫殿以及多棱宫。可是我们得在这里长住下去。两个历史的极端、两种互不相容文化的朝夕相处，既奇特又好笑。当我沿着木块路走过尼古拉时，常常要瞟一下炮王和钟王。从钟的缺口和炮口里可以窥见莫斯科的难以忍受的野蛮性。哈姆雷特王子见此情景也许还会说：“时代的联系被割断了，为什么要生我来把它们连接起来？”可是我们身上丝毫没有哈姆雷特的气质。即使讨论比较重要的问题，列宁也往往只给发言者两分钟的时间。大概只有一两分钟的时间可用来思索一下落后国家在发展中的矛盾，这就是在两次会议之间浮光掠影地谈及克里姆林宫的去，不会有更多的时间了。

游戏宫对面的骑士楼革命前住着克里姆林宫的官吏。整个底层曾被一个宫廷卫队长占用。现在，他的住房分成几个部分。我和列宁分别住在走廊两端的房间里，合用一个餐厅。当时克里姆林宫的伙食很差。没有鲜肉，只供应腌肉。面粉和大米都掺有沙粒。只有红鱼子酱是充足的，因为已停止出口。这种天天供应的鱼子酱赋予革命的最初年代的某种特色，当然它不仅仅留在我个人的记忆之中。

斯帕斯塔上的音乐钟改装了。现在，古钟每隔一刻钟，就奏出缓慢而低沉的《国际歌》，它取代了《神佑沙皇》的乐曲。汽车的通道穿过斯帕斯塔下的拱形门。门洞上有一尊古老的圣像像框的玻璃已碎。圣像前的一盏灯早已熄灭。从克里姆林宫出来往往眼睛看着圣像，而耳朵却听着塔顶上面传来的《国际歌》。在塔顶的钟楼上依然屹立着镀金的双头鹰。只是摘掉了头上的王冠。我建议在双头鹰上面竖起镰刀和锤子，以便从斯帕斯塔的尖顶上显示出时代的反差。但一直无暇去做。

我每天总要在走廊里同列宁遇上十多次，我们互相探访，交换意见，有时谈十来分钟，甚至一刻钟，这对我俩来说已是很长的时间了。那时列宁很健谈，当然，这是就列宁的标准而言。新鲜的事太多了，

陌生的事太多了，必须使自己和别人改用新法办事。因此需要从局部转到一般，并从一般转到局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分歧的一片乌云早已风吹云散。列宁对我和我全家非常亲切、非常关心。他常会在走廊里拦住我的孩子们，和他们一起玩。

我房间里的家具是用名贵的桦木制作的。壁炉上方有一只挂钟，时钟在阿穆尔和普赛克下敲打着，发出银铃般的声音。这一切对于工作来说并不合适。这里的每一把椅子都散发出无所事事的贵族气息。不过我只是有事才回住所，尤其是在最初几年，我只是在从前线回到莫斯科的短暂时间内才在这里过夜。

几乎是在我从彼得格勒抵达莫斯科的第一天，我同列宁站在桦木家具中间谈话。阿穆尔和普赛克用银铃般的悦耳钟声打断了我们的谈话。我们彼此看了一眼，似乎两人都有一种同样的感觉——躲藏在角落里的时代的亡灵在窃听我们的谈话。我们被它从四面八方包围着，而我们对它既无敬意，也无敌意，只觉得有点讽刺意味。要说我们已习惯于克里姆林宫的环境，那是不正确的，我们的生活条件的变化太大，不可能做到。我们没有时间去“习惯”。我们有时瞟一下这些摆设，心里以讽刺和激励的口气对阿穆尔和普赛克说：没有想到我们会来吧？没有办法，你们慢慢习惯吧！我们使周围的一切对我们习惯起来。

克里姆林宫的低级职员仍然留在原处。他们对我们有点惶恐不安。这里的规矩很严格，是农奴制的，职位是父子相传的。在无数的克里姆林宫的奴仆和各种各样的仆役中间，有不少老人曾经先后侍候过几代皇帝。其中一个个子不高，胡子刮得干干净净的老人斯图皮申是一个忠于职守的人，当时曾是个使仆役们畏惧的人物。现在年轻的侍者怀着旧有的敬意和新的挑衅的神情看着他。他不知疲倦地在走廊上轻轻走动，把椅子放到原来的位置上，掸去尘土，维持原先的状态。午餐给我们供应稀菜汤和带皮的荞麦粥，盛在装饰着老鹰的宫廷盘子里。谢廖沙悄悄问妈妈：“瞧，他在干什么？”老头幽灵似地在椅子后面走动，把盘子时而转向这边，时而转向那边。谢廖沙先猜中了：盘子边上的双头鹰要正对着客人。

我曾问过列宁：“您注意到斯图皮申老人吗？”

他带点讥笑地回答：“怎么会不注意到他呢？”

这些失去根基的老人有时也令人同情。斯图皮申很快对列宁产生了好感，而在列宁搬到离人民委员会较近的另一幢大楼以后，他就把依恋心转到我和我的妻子身上，他发现我们喜欢有条不紊，尊重他所张罗的事。

全部服务人员不久被解散。青年人很快就适应了新制度。斯图皮申不愿意退休。他被调到一座已改为博物馆的宫殿里去当看守。他还是常到骑士楼来“探视”。稍后，在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召开期间，斯图皮申在安德列也夫大厅前的宫里值班。他周围的一切又是安排得井井有条，他做的工作和从前侍奉沙皇或大公一样，只是现在是为共产国际服务。他与斯帕斯塔上的大钟的命运一样，从前奏的是沙皇的国歌，现在改奏革命的赞歌。1926年，老人在医院里病逝。病危时我妻子曾给他送去点心，老人流下了感激的泪水。

苏维埃莫斯科以一片混乱来迎接我们。原来，莫斯科有它自己的人民委员会，主席是历史学家波克罗夫斯基，世界上所有的人中他是最不适宜担任这个职务的人。莫斯科人民委员会的权力扩大到莫斯科区域，它的界线谁也无法确定。它北达阿尔汉格尔斯克省，南至库尔斯克省。这样，我们在莫斯科发现了一个政府，它把自己的有问题的权力扩展到苏维埃领土的主要地区。十月变革也感受到莫斯科和彼得格勒之间的历史对立。从前有个时候莫斯科是个大村庄，而彼得格勒是座城市。莫斯科是地主和商人的，而彼得格勒则是文武官员的。莫斯科被看作是道道地地俄罗斯的、斯拉夫的、慷慨好客的，是俄国的心脏。彼得堡则是无个性特点的欧洲人、利己主义者，是国家官僚制度的大脑。莫斯科是纺织工业的城市、彼得格勒则是冶金工业的城市。这种对比是对实际差别的文学性夸张。我们立即感觉到这一点。地方主义也侵蚀了莫斯科本地的布尔什维克。为了妥善处理同莫斯科人民委员会的相互关系，成立了一个以我为主席的委员会。这是一项新奇的工作。我们耐心地把地区的各人民委员部化整为零，把应当归属于中央的职权划归中央。随着这项工作的

进展，人们渐渐看清，无需第二个莫斯科政府。莫斯科人自己也认为必须取消自己的人民委员会。

莫斯科时期是俄国史上再次集中国家权力，建立各种管理机构的时期。列宁对那些继续用一般的宣传公式解答一切问题的人已经不耐烦了，奚落他们，有时干脆侮辱性地把他们撵走。“老兄，您怎么啦，还是在斯莫尔尼宫怎么的？”列宁责备道，严厉而又善良。他经常打断那些东拉西扯的演讲者：“完美无缺的斯莫尔尼宫，醒醒吧，我们已经不在斯莫尔尼宫了，我们已向前走了。”当需要为明天作准备的时候，列宁对于昨天不惜使用强烈的语言。我们在这项工作中同心协力。列宁办事十分认真。而我也许甚至太苛求了。我们对粗枝大叶、骄纵作风进行了不懈的斗争。针对开会迟到和不准时开会的现象，我通过了一些严格的规定。这样，秩序一步一步地战胜了混乱。

在召开讨论原则问题，或讨论因部门间的冲突而具有重要意义的会议之前，列宁总是打电话给我，让我事先了解会议内容。现在关于列宁和托洛茨基间存在分歧的著作纯属谎言。当然，也有过分歧。但更多的是，我们通过电话三言两语地交换意见以后就得出相同的结论，或者各自独立作出相同的结论。得知我们对问题持同样的看法时，那么无论是他，还是我都不会怀疑，我们一定会使需要的决定获得通过。当列宁担心他的方案会遇到某种严重的反对时，他就会打电话提醒我：“这个会议你一定得参加，我让您第一个发言。”会上我讲几分钟，列宁在我发言时插一两次话说：“对！”这样问题也就几乎解决了。这不是因为别人不敢反对我们。当时根本不存在目前这种对长官随声附和，深怕说错话或投错票而使自己遭殃的担心。官场上的奉承拍马现象越少，领导的威信就越高。当我同列宁有意见分歧时，不仅可能爆发争论，而且有时爆发了更大的争论。而当我们一致的时候，讨论时间通常是非常短的。如果我们事先没有来得及商妥，我们就在开会时交换纸条。如果这时发现我们意见有分歧，列宁就设法推迟问题的讨论。有时，我用诙谐的笔调表示不同意他的意见，列宁读这样的条子时，似乎整个身子都在颤动。他很喜欢笑，尤其在疲劳的时候。这是他身上的童心。在这个天下第一大丈夫身



上有许多孩子的性格。我得意地看他如何忍住笑，继续严肃地主持会议。由于忍住笑，他的颧骨就显得更加突出了。

陆军人民委员部设在克里姆林宫外面，我的所有工作——不仅军事工作，而且还有党务、写作等都在这里进行。在骑士楼只剩下我的住所，这儿谁也不来。有事就到人民委员部来找我。谁也没有到我们家里来“做客”，因为我们实在太忙了。我们每天下午5时左右回家。7时又到部里开会。当革命形势稳定下来以后，即过了相当一段时间后，我就用晚上的时间研究理论和从事写作。

我的妻子进了教育人民委员部，主管博物馆和文物保管工作。她的责任是在国内战争的情况下千方百计地保护历代文物。这不是一项轻松的任务。无论是白军还是红军都不很关心历史宅园、外省的内城或古老的教堂。因此，军事部门和博物馆管理局之间就不止一次地发生争吵。宫殿和教堂的保护者指责军队不尊重文化，而军事委员们责难文物保护者偏爱死文物而不顾活人。从形式上看，我同妻子老是为了公事没完没了地争吵。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就闹了不少笑话。

现在我跟列宁主要通过电话进行联系了。我们电话来往，十分频繁，内容涉及各种各样的问题。各部门常常向列宁告红军的状。于是列宁马上打电话给我。5分钟后，他又问我，是否可以了解一下农业人民委员或监察人民委员的新的人选，并告诉他自己的看法？一小时后，他又想知道，我是否注意到关于无产阶级文化问题的理论争论，是否打算参加以反驳布哈林的观点？然后又问，南方战线的军事部门能否调拨载重汽车把粮食运到车站去？再过半小时，列宁又询问，我是否知道瑞典共产党内的分歧？我在莫斯科的时候每天都是这样。

从德国进攻时起，法国人，至少比较理智的法国人的态度突然改变了，他们认识到说我们同霍亨索伦王朝秘密勾结是愚蠢的。他们知道，我们无力打仗。某些法国军官坚持认为我们签订和约是为了赢得时间；一个法国侦察员特别起劲地为这个想法辩护，他是个贵族、保皇党人，装了一只假眼，向我表示愿意去执行最危险的任务。

拉韦尔涅将军接替了尼塞尔，他常常谨慎、委婉地向我提出一些忠告，虽然这些忠告没什么用，但表面上是出于好意的。据他说，法国政府现在承认缔结布列斯特和约这一事实，只想在建立军队方面提供完全无私的援助。他答应派遣人数众多的法国使团的军官供我调遣，这些军官是刚从罗马尼亚回来的。其中两个军官：上校和上尉就住在陆军人民委员部大楼的对面，以随时同我取得联系。老实说，我怀疑他们搞军事间谍活动比搞军事行政工作更内行。他们曾向我提交过几份书面报告，但在那些忙碌的日子里，我没时间翻阅。

在短暂的“停战”期间出现的插曲之一，是会见协约国的各军事使团。协约国军事使团很多，而且每个使团的人数也很多。我的小小办公室里来了大约 20 个人。拉韦尔涅向我一一作了介绍。其中有一些人说了些恭维话。一位虚胖的意大利将军显得很特别，他祝贺我在莫斯科胜利地清除了匪帮。他面带迷人的笑容说：“现在人们可以平平安安地在莫斯科生活，就像世界上所有的首都一样。”我认为，这有点言过其实。接下去我们就不知道相互间再说些什么。客人们也不便就此告辞，而我也不知道怎么摆脱他们。最后拉韦尔涅将军使我们摆脱了困境，他问，如果军事代表们不打算再耽误我的时间，我是否会反对。我回答说，虽然本人不愿同诸位阁下分手，但也只好遵命。每一个人在生活中都会遇到令人啼笑皆非的场面。我同协约国各军事使团的会晤就属于这种场面。

军务占了我主要的时间，由于我得从头做起，所以占去的时间就更多。在技术和作战方面，我认为自己的任务是选派合适的人到合适的岗位上去，让他们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我把组建军队方面的政治工作和组织工作同党的工作完全结合在一起。只有采取这种办法，才可能取得成功。

在许多党务工作者中间，我在军事部门碰见了斯克良斯基军医。尽管他很年轻，1918 年才 26 岁，但他有办事能力，能埋头苦干，对周围人和局势有作出判断的能力，即具备一个行政人员所必备的品质。我在同此类事务的行家斯维尔德洛夫商量后，就选定斯克良斯基做我的副手。此后我从来没有为这件事后悔过。由于我大部分时间都

在前线，副手的职务尤为重要。我不在的时候，他主持革命军事委员会，领导人民委员部的日常工作，主要是前线的军需供应，最后，他还代表军事部门出席列宁主持的国防会议。如果有谁可以和法国革命的拉扎尔·卡诺<sup>①</sup>相比的话，那就是斯克良斯基。他始终一丝不苟，不知疲倦，保持警惕，了解情况。军事方面的大多数命令是他签署的。因为命令都在中央和地方报纸上公布，所以斯克良斯基就闻名全国。像任何一个严肃和果断的行政工作人员一样，他也有不少反对者。这位有才干的年轻人引起了许多可敬的庸人的恼怒。有人在暗中攻击斯克良斯基，尤其当我不在的时候。列宁通过国防会议很了解斯克良斯基，因此每次都尽力维护他。他总是说：“他是一位出色的工作人员，一位杰出的工作人员。”斯克良斯基对这些阴谋不予理睬，他做自己的工作：听取军需人员的报告；收集工业方面的资料；统计总是短缺的弹药数字；他一边不停地抽烟，一边用专线电话通话；叫司令员来接电话，为国防委员会准备资料。可以在夜里两三点钟给斯克良斯基打电话，这时他还坐在人民委员部的书桌旁工作。我问他：“您什么时候睡觉？”而他总是用说笑敷衍过去。

使我感到欣慰的是，军事部门几乎不存在个人派系和勾心斗角，而这在其他部门是相当严重的。工作的紧张性，领导的权威性，正确选拔人才，而不徇私情和不姑息纵容，对事业忠心耿耿，这一切保障了那个笨重、不很协调、人员又庞杂的机制得以不间断地运转。这些成绩很大一部分要归功于斯克良斯基。

国内战争使我离开了人民委员会的工作。我生活在车厢或汽车里。我连续几星期、几个月地外出，对日常政务过于生疏，因此我在莫斯科的短暂逗留期间无法插手此类事务。然而，最重要的问题都事先在政治局里作出决定。有时我应列宁之召专程回来参加政治局会议，或者相反，我从前线带回原则性的问题，通过斯维尔德洛夫召集政治局紧急会议进行讨论。这些年里我同列宁的通信主要是讨论

<sup>①</sup> 拉·尼·卡诺(1753—1823年)——法国数学家、政治和军事活动家，资产阶级共和党人。——译注

国内战争中的紧迫问题，其中有简短的便条，也有很长的电文，它们往往是补充以前的谈话或是为以后的谈话作准备的。虽是简短的公文往来，但是这些文件比任何东西更清楚地揭示了布尔什维克领导集团内部的真实关系。我将在不久的将来，公布这些内容丰富的信件，并附加必要的注释。它也是对斯大林学派的历史学家的一个致命的反驳。

威尔逊提出过各种各样的贫乏的教授的空想计划，其中之一是召集俄国的所有政府举行和解会议，列宁于1919年1月24日往南方战线给我发来密码电报，内称：“威尔逊建议停战，并召集俄国所有政府开会……看来您得去会见威尔逊。”由此可见，尽管在布列斯特时期有过短暂的分歧，但丝毫不妨碍列宁在面临重要的外交任务时来找我，虽然在那个时期我已完全埋头于军事工作。众所周知，威尔逊的和平倡议，如同他的其他的所有计划一样，毫无结果，因此我也无需去了。

至于列宁如何看待我的军事工作，除了列宁本人数以百计的证据外，马克西姆·高尔基有一段极为生动的描述：

他(列宁)用手拍着桌子说：“你说，还有谁能够在一年内组建一支几乎是模范的军队，并赢得军事专家们的尊敬。我们有这样的人。我们什么都有。所以会出现奇迹。”

据高尔基说，列宁在那次谈话中还对他说道：“是的，是的，我知道。关于我和他的关系有人在制造谣言。现在谣言很多，尤其是关于我和托洛茨基的谣言。”今天竟然不顾事实、文件和逻辑，举国崇信我同列宁的相互关系的谎言，如果列宁健在，他会说些什么呢？

革命胜利后的第二天，我以种族因素等为理由，拒绝担任内务人民委员。在军事方面，这个问题似乎会比民事管理问题引起更多的纠葛。结果证明列宁是正确的。在革命高涨的年代里，这个问题是无足轻重的。诚然，白军企图在红军里利用反犹主义进行鼓动，但一无所成。在白卫报刊上可以找到不少有关这方面的证据。在柏林出版的《俄国革命档案》中，有一个白卫分子叙述了这样一段生动的情节：“有一个哥萨克来找我们，人们故意刺激他，说他在一个犹太

人——托洛茨基的指挥下作战，但他激烈地、深信不疑地反驳说：‘没有的事！……托洛茨基不是犹太人。托洛茨基是个战士！……是我们的……俄罗斯人……而列宁，那个共产党员……才是犹太人，托洛茨基是我们的……战士……俄罗斯人……我们的！’”

在我们的很有才华的青年作家巴贝尔的小说《骑兵军》中也可以找到同样的内容。只有在开始对我施加政治迫害后，我的犹太籍问题才起作用。反犹主义是和反托洛茨基主义同时展开的。两者的根源是相同的，都是小资产阶级对十月的反动。

## 第三十一章

# 布列斯特谈判

10月26日苏维埃代表大会通过了和平法令，当时我们手中只有彼得格勒。11月7日，我通过无线电报向协约国和中央帝国呼吁缔结一项普遍的和约。盟国政府通过他们的代理人向总司令杜鹤宁将军宣布，俄国如果进一步采取单独谈判的步骤，那就必将导致“最严重的后果”。于是我向全体工人、士兵和农民发出呼吁，回答他们的威胁。呼吁书的意思是坚决的：我们推翻本国资产阶级，并不是为了让我们的军队听从外国资产阶级的命令去流血。11月22日，我们签署了一份从波罗的海到黑海全线停止军事行动的协议。我们再次向盟国呼吁，建议他们和我们一起进行和谈。我们没有得到答复，但是也不再发出恐吓了。看来协约国政府已经领悟到一些东西了。和谈于12月9日，也就是和平法令通过一个半月后开始，因此对于协约国来说有十分充足的时间来确定自己对问题的态度。我们代表团在谈判一开始就对民主和平的基本原则提出了纲领性的声明。对方要求休会。复会也被一再推迟。四国同盟的代表团在拟定对我们宣言的答复时碰到了各种各样的内部困难。12月25日终于作了回答。四国同盟政府“同意”民主和平的提法：在民族自决的基础上不兼并、不赔款。12月28日，在彼得格勒为民主和平举行了规模盛大的游行。群众虽然不相信德国人的答复，但还是把它看作是革命在道义上的一次伟大胜利。次日早晨，我国代表团从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带来了屈尔曼<sup>①</sup>代表

---

<sup>①</sup> 理·屈尔曼(1873—1948年)：德国外交大臣(1917年8月—1918年7月)，当时率德国代表团参加布列斯特和平谈判。——译注

中央帝国向我们提出的骇人听闻的要求。列宁说：“要拖延谈判，就要有能拖延的人。”应他的坚决要求，我动身前往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坦白地说，我仿佛是去受罪。同外国人和陌生人在一起我总是感到害怕，在这里尤其如此。有些革命者乐意去担任外交使节并且在新环境里如鱼得水，对此我完全不能理解。

以越飞为团长的第一个苏维埃代表团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受到各方面的殷勤款待。巴伐利亚的莱奥波德亲王像接待自己的“客人”那样地接待他们。双方代表团共进午餐和晚餐。霍夫曼<sup>①</sup>将军不无兴趣地注意到那位当年曾行刺萨哈罗夫将军的比岑科的名字。德国人插坐在我们中间，竭力“友好地”探听一些他们所需要的情报。第一个代表团成员中有一个工人、一个农民和一个士兵。这是偶然冒出的人物，因此对德国人要的阴谋毫无准备。一个老农民在进餐时竟然被灌醉了。

霍夫曼将军的司令部专为俄国战俘出版了一份《俄罗斯通报》，该报起初总是以令人感动的同情的语气报道布尔什维克的消息。霍夫曼告诉俄国战俘：“我们的读者问我们，托洛茨基是谁？”接着他以钦佩的口吻向他们介绍了我同沙皇制度斗争的经历，以及我的德文著作《革命的俄国》。“整个革命世界都为他的成功脱逃而欢呼！”接着又说：“沙皇制度被推翻后，沙皇制度的秘密朋友在托洛茨基长期流放回来后不久便把他关进了监狱。”总而言之，再没有比巴伐利亚的莱奥波德和普鲁士的霍夫曼更赤诚的革命者了。这种田园诗没有持续多久。2月7日的布列斯特会议显得毫无诗意，我在会上回顾往事时指出：“我们对德国和奥匈报刊对我们所作的过早的恭维表示遗憾。这于和谈的顺利进行是完全不必要的。”

在这个问题上，社会民主党只是霍亨索伦政府和哈布斯堡政府的影子。谢德曼、艾伯特等人起初还以老大自居，拍拍我们的肩膀。12月15日，维也纳的《工人报》还慷慨激昂地写道，托洛茨基与布坎

<sup>①</sup> 麦·霍夫曼(1869—1927年)——德国将军。1918年是参加布列斯特和谈的德国代表团团长。——译注

南之间的“决斗”是我们时代伟大斗争的象征：“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在屈尔曼和切尔宁<sup>①</sup>在布列斯特扼杀俄国革命的日子里，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只看到托洛茨基同……布坎南的“决斗”。即使在今天，人们也不能不怀着厌恶之感回忆起这种假仁假义。哈布斯堡的马克思主义者这样写道：“俄国工人阶级正在努力打碎英国资本加在它身上的铁锁链，而托洛茨基是表达俄国工人阶级的和平愿望的全权代表。”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甘愿系在德奥资本主义的铁链上，还帮助本国政府强行把链条套在俄国革命身上。在布列斯特谈判最艰难的阶段，当我或列宁偶然见到一份柏林的《前进报》或者维也纳的《工人报》的时候，我们总是默默地把用红铅笔划出来的语句指给对方看，交换一下眼色，然后把目光移开，为这些先生们感到难以形容的羞愧，怎么说他们昨天还是我们国际内的同志。凡是自觉地经历过这段时期的人都清醒地认识到，不管政治局势如何动荡，社会民主党在历史上已寿终正寝了。

为了结束这种不伦不类的假面舞会，我在我们的报刊上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德国司令部能否把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的情况告诉德国士兵？我们就这一问题发表了给德国士兵的号召书。霍夫曼将军的《通报》突然缄口不语了。我一到布列斯特，霍夫曼立即就我们在德国士兵中进行宣传提出抗议。我避而不谈这件事，而是建议将军继续在俄国军队中进行宣传——条件是均等的，只是宣传的性质不同。同时，我提醒他，在某些重大问题上我们的观点并不一致，这早已是众所周知的，甚至德国的一个法庭也证实了这一点，该法庭在大战期间曾缺席判我徒刑。如此不合时宜的提醒引起了一阵骚动。许多官员一时目瞪口呆。屈尔曼（面向霍夫曼）：“您有什么要说的？”霍夫曼说：“够了，没有说的。”

我作为苏维埃代表团团长，决定立即中止在初期无形中形成的亲昵的关系。我通过我们的军事代表暗示、我无意会见巴伐利亚亲

<sup>①</sup> 切尔宁伯爵（1872—1932年）——1916年12月至1918年4月任奥地利外交大臣。1920至1923年为国民议会议员。——译注



王。此事已经知照。我借口需要在休会期间进行磋商，要求单独用餐。这个要求也被对方默然接受。切尔宁在1月7日的日记里写道：“午餐前全体俄国人在托洛茨基率领下来到餐厅。他们立即告示大家，若是今后不来共同进餐，敬请见谅。根本见不到他们了，这一次刮的是全然不同的风，与上次不同的风”。虚伪的友好关系被代之以刻板的官场礼仪。这个转变极为适时，因为应当从学院式的初步谈判转入讨论和约的具体问题了。

屈尔曼比切尔宁，并且也许比我战后所见到的其他外交官员都高出一头。他很有个性，有出色的务实头脑，心狠手辣，不仅对我们（在这里他遇到了反击），而且对自己的亲密盟友也是这样。在讨论被军队占领的领土时，屈尔曼挺起腰来，提高嗓门说：“谢天谢地，我们德国的领土没有被任何人占领任何一块地”，于是切尔宁伯爵立即矮了一截，脸色发青。屈尔曼暗指的正是他。他们之间的关系远不是那么和谐友好。后来当话题转到从两面被外国军队占领的伊朗问题时，我表示，因为伊朗不像奥匈帝国，没有同任何国家结盟，所以我们中间任何一方都不会因为是伊朗土地，而不是我们自己的土地被占领，而感到幸灾乐祸。这时切尔宁甚至猛然欠起身子，叫了一声：“unerhört!”（闻所未闻）。表面上叫声是针对我的，而实质上是针对屈尔曼的。这类插曲是不少的。

屈尔曼像个棋坛高手，但他不得不长期和弱手交锋，在战争期间他仅仅跟奥匈帝国、土耳其、保加利亚和中立国的外交仆从国打交道，因此起初他低估了自己的革命对手，漫不经心地和我们对弈。他玩弄极简单的手法，对对手的心理一无所知，这往往使我惊讶不已，尤其是在开头几天。

我初次与外交官会面，心里感到忐忑不安。我在存衣室遇上了屈尔曼。可是我不认识他。他作了自我介绍，并补充说，他对我的光临“十分高兴”，因为同主人打交道，比同他派来的人打交道要好一些。他的面部表情证明，他对这着想影响暴发新贵心理的“妙棋”颇为满意。而我觉得，好像我的脚踩到什么脏东西上去了。我甚至不由自主地倒退了一步。屈尔曼意识到自己失策了，警觉起来，他的语

调也立刻变得冷淡起来。但这并不妨碍他在接待土耳其代表团团长，一位老资格的宫廷外交家时，当着我的面施展同样的手法。屈尔曼给我介绍他的同僚，等到这位土耳其代表团团长走过去后，便用推心置腹的耳语悄悄地对我说：“这是欧洲的优秀外交家。”他显然希望那个人听见他所说的话。我把这件事告诉了越飞，他笑着回答：“屈尔曼在同我第一次见面时，也完完全全是这么做的。”屈尔曼很像是为了进行某种非柏拉图式的讹诈而给予这位“优秀外交官”以柏拉图式的补偿。也许屈尔曼还想以此顺便达到另一目的，想让切尔宁知道，他决不认为他切尔宁是仅次于自己的优秀外交家。据切尔宁说，12月23日，屈尔曼对他说：“皇帝陛下是全德国唯一英明的人。”可以认为，这些话与其说是说给切尔宁听的，还不如说是说给皇帝本人听的。”外交人员在传递针对某人的恭维话时，总是相互效劳的。Flattez, flattez, il en restera toujours quelque chose. (奉承吧，奉承吧，总会留下点什么的。)

我生平第一次与这一阶层的人直接接触。不用说，我从前对他们也未曾有过任何幻想。我悟到，并非只有上帝才会烧瓦罐<sup>①</sup>。但是还得承认，我把他们的水平想象得高了一些。我可以用如下的话来表述第一次会见时的印象：人们对别人估价很低，而对自己的估价也不怎么高。

谈谈与此事有关的一段插曲不会是多余的。那时维克多·阿德勒竭力想向我表示他个人对我的好感，根据他的倡议，切尔宁伯爵在谈话时顺便建议，把我在战争初期留在维也纳的藏书送回莫斯科。这批图书是我侨居国外长期收集的有关俄国革命的文献资料，有点价值。我还来不及对他的建议略表谢意，他便立即要求我过问两名似乎被我们虐待的奥地利俘虏，当然，不是士兵，而是同切尔宁伯爵关系密切的军官。从图书问题直接，并且我要说，故意引人注意地转到俘虏问题，这对我来说是太不礼貌了。我冷淡地回答，如果切尔宁关于俘虏的消息是确凿的，那么该做的事我一定去做，这是义不容辞

<sup>①</sup> 此语意谓没有学不会的事。——译注

的，但是这个问题同我的图书毫不相干。切尔宁在自己的回忆录里相当准确地转述这段插曲，根本不否认当时他企图把俘虏问题同图书问题联系起来；相反地，在他看来，这是理所当然的。他在故事的末尾写了一句模棱两可的话：“他想要这批藏书”。只是我要补充一句，收到这批图书后，我立即把它们送交莫斯科的一个学术研究机构。

历史局势促使这个人类最革命的制度的代表不得不与所有统治阶级中最反动的阶级的代表坐在一张外交桌旁进行谈判。我们的对手宁可中断谈判，也不愿意把谈判转移到中立国去进行，由此可以证明，他们多么害怕同布尔什维克谈判所产生的爆炸力。切尔宁在回忆录里直截了当地写道：在中立国里，布尔什维克在其国际友人的帮助下必然会把缰绳掌握在自己手里。在正式场合下，切尔宁的借口是，在中立环境里，英国和法国会立即在“幕前幕后”施展各种阴谋。我反驳说，我们的政治根本无需幕后活动，因为在10月25日胜利的起义中，俄国人民已经把这一外交界的旧武器连同许多别的东西一并彻底废除了。但是我们不得不屈服于最后通牒，仍旧留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

除了城郊被德军司令部占据的几幢楼房外，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其实已经不再存在了。沙皇军队在撤退时出于无能的狂暴把整个城市焚毁了。显然，正因为如此，霍夫曼把自己的司令部设在此地，以便于控制。房间的陈设和伙食都极其简单。由德国士兵服务。在他们看来，我们是和平使者，所以他们对我们的抱有希望。司令部大楼四周是高高的铁丝网。早上散步时，我看到一个“俄人闯入，格杀勿论”的告示牌。这是针对俘虏的。我自问，这一告示是否也适用于我，因为我们在这里是半个俘虏，于是转身返回。有一条优良的战略公路贯通布列斯特。头几天，我们乘坐司令部的小汽车出外兜风。但是我们代表团中一位成员为此同一个德军中士发生了冲突。霍夫曼向我递交了一封申诉信。我答复他，今后我们谢绝使用为我们提供的汽车。谈判旷日持久。我们和我们的对手都得通过直通电报与各自的政府联系。电报线往往接不通。我们无法查明，是否都是出

于物理原因，还是我们的对手为了赢得时间而人为制造的障碍。不管怎么说，会谈常常中断，有时持续几天。有一次休会，我去华沙游览了一番。该城生活在德国刺刀之下。市民对苏维埃外交官表现了很大的兴趣，但不轻易流露出来，因为谁也不知道，这一切将怎样的结束。

谈判拖下去对我们是有利的。我正是为此目的到布列斯特来的。但是在这一点上我不能归功于自己。我的对手尽其所能地帮助了我。切尔宁在日记里沮丧地写道：“这里时间是充裕的，有时是土耳其人没准备好，有时又是保加利亚人没作准备，有时则是俄国人在拖，因此会议一再推迟，或是刚刚开始就告中断。”奥地利人在遇到来自乌克兰代表团方面的困难时，也拖延谈判。自然，这并不妨碍屈尔曼和切尔宁在公开讲话中把谈判迁延时日完全归咎于俄国代表团，对此我提出了坚决然而徒劳的抗议。

当谈判将近结束时，在德国半官方报纸上那种说给布尔什维克听的愚蠢的恭维话已无影无踪了——当时除了地下刊物外，所有报刊均属半官方性质。例如《每日评论报》不仅抱怨说“托洛茨基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设了一个可以使自己的声音传遍全世界的讲坛”，号召大家尽快地结束这种状况，而且直截了当地提出：“无论是列宁，还是托洛茨基都不希望和平，因为和平对他们来说很可能预示着绞架或监狱。”社会民主党报纸的调子实质上也是同样如此。谢德曼·艾伯特和施坦普费尔把我们指望德国革命看作是我们的主要罪行。这些先生压根儿没有想到，再过几个月革命将抓住他们的衣领，并让他们去执掌政权。

长期停阅德国报纸后，我又在布列斯特兴致勃勃地阅读起德国报纸，报上对布列斯特和谈精心地作了别有用心地歪曲。可是单单阅读报纸还不能消磨掉我的时间。我决心更加充分地利用这迫不得已的空闲时间，可以预料，这种机会以后不会很快再有的。同我们一起工作的还有几个很不错的女速记员，她们以前是国家杜马的工作人员。我凭记忆向她们口授了十月变革的简史。就这样通过几次口授出了一本首先供外国工人阅读的小册子。向他们阐述所发生的一

切是绝对必要的。我曾同列宁不止一次地谈过这件事，但是我们都无暇顾及。我根本没有想到布列斯特竟成了我写作的地方。当我带着有关十月革命的成稿回来时，列宁确实感到非常高兴。我们都把这本小册子看作是将来为这一痛苦的和约进行革命报复的一个小小的保证。小册子很快被译成 12 种欧洲和亚洲语言。尽管共产国际的所有党，从俄国的党开始，把这本小册子再版了好几次，但是这并不妨碍那些不肖徒辈在 1923 年以后宣布这本小册子是托洛茨基主义的大毒草。现在它已被列入斯大林的禁书目录。从这件小事可以看到思想上准备热月的种种表现之一。为了使热月取得胜利，首先必须割断与十月相连的脐带。

对方的外交官也在寻找办法以消磨在布列斯特的漫长的空闲时间。切尔宁伯爵，如我们在他的日记里所看到的，不仅去打猎，而且还通过阅读法国革命时代的回忆录来扩大自己的视野。他把布尔什维克比作雅各宾分子，企图用这种办法得出令人快慰的结论。这位哈布斯堡王朝的外交家写道：“夏洛特·科尔黛<sup>①</sup>说过：‘我杀的不是人，而是野兽。’这些布尔什维克还会销声匿迹，谁知道，是否会出现一个科尔黛来对付托洛茨基呢。”当然，当时我并不了解这位虔诚的伯爵的劝善的冥想。但我们乐于相信这是他的肺腑之言。

12 月 25 日，德国外交部提出了自己的民主条款，一开始很难理解，他们到底想干什么，但几天后，就暴露出它的狼子野心。就民族自决问题展开理论论战对于德国政府来说至少是冒险的一举，这场论战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由屈尔曼本人挑起的。在这条道路上，霍亨索伦外交是不可能获得巨大成功的，这一点他们事先就应是很清楚的。例如，屈尔曼无论如何想要证明，德国占领波兰、立陶宛、波罗的海沿岸和芬兰不是别的什么，而是这些国家的人民“自决”的一种形式，因为他们的意志通过由……德国占领当局建立的“民族”机构体现出来了。要证明这一点并不容易。但是屈尔曼并没有放下武

① 夏·科尔黛(1768—1793年)——法国女贵族，吉伦特党的狂热拥护者。1893年7月刺杀了法国革命领袖马拉，因而被送上断头台处死。——译注

器。他再三问我，难道我不承认印度的海得拉巴公国的尼赞是印度教徒意志的体现者？我回答说，首先英国军队应当撤离印度，在这以后这位可敬的尼赞未必能呆 24 小时以上。屈尔曼不礼貌地耸耸肩。霍夫曼发出的不快的哼哼声响彻整个大厅。译员在不停地翻译。速记员在不断地记录。讨论在漫无边际地进行。

德国外交官此举的秘密在于屈尔曼看来事先已经深信我们准备和他玩四手联弹了。他大致是这样想的：布尔什维克由于争取和平的斗争而执掌了政权。他们只有缔结和约才能保持政权。诚然，他们在谋求民主的和平。但是，世界上为什么要有外交家呢？他，屈尔曼，将把译成文质彬彬的外交语言的布尔什维克的革命公式送回给他们，而布尔什维克则将给他以隐蔽形式占有土地和百姓的可能性。在全世界眼里，德国的侵占是得到俄国革命的批准的。而布尔什维克则将获得和平。屈尔曼无疑被我们的自由派、孟什维克和民粹派引入了歧途，这些人早就把布列斯特谈判描绘成事先已经分配好角色的喜剧。

我们曾向布列斯特的对手十分明确地说明，对我们来说，问题不在于伪善地掩饰秘密勾结，而在于各民族的共处原则，这时屈尔曼基于原先的出发点，把我们的行为几乎看作是对默契的破坏，而这种默契仅仅存在于他的想象之中。他死死抓住 12 月 25 日声明的民主原则不放。他相信自己出众的诡辩才能，指望向全世界表明，白的就是黑的。切尔宁伯爵拙劣地对屈尔曼进行场外指导，并按照他的委托，每逢关键时刻就发表最激烈、最厚颜无耻的言论。他想以此掩饰自己的软弱无能。而霍夫曼将军倒是给会谈唱些新鲜的调子。将军对外交诡计不感兴趣，曾几次脱下军靴放在谈判桌上。就我方而言，我们一刻也不怀疑，霍夫曼的皮靴正是这次谈判中唯一需要认真对待的现实。

不过，有时候，将军也介入了纯政治性质的讨论。但他是按自己的办法行事的。对民族自决权的问题进行的冗长的空谈，使他失去了耐心。一天早晨（1 月 14 日），他夹着塞满俄文报纸的公文皮包进来，这些报纸大半是社会革命党人办的。霍夫曼俄文读得很流利。

这位将军使用简短的、断断续续的语句，时而粗鲁驳斥，时而发号施令，指责布尔什维克压制言论和集会自由，破坏民主原则，并且用完全赞同的口气援引俄国恐怖党人撰写的文章，而俄国恐怖党人从1902年起已把霍夫曼在俄国的不少志同道合者送进了坟墓。将军愤怒地揭露我们，说我们的政府是靠暴力支持的。这些话出于将军之口，实在是妙不可言。切尔宁在日记里这样写道：“霍夫曼作了一次不幸的发言。为了这个发言，他准备了好几天，并自以为成功而感到自豪”。我回答霍夫曼说，在阶级社会里，任何政府都是靠暴力支持的。唯一的区别在于霍夫曼将军为了保护大私有者的利益而采用镇压手段，而我们是为了保护劳动者的利益。和谈会议有几分钟成了对初学者进行马克思主义宣传的小组。我说：“在我们的行动中引起别国政府震惊和反感的是这样一个事实：我们逮捕的不是罢工者，而是那些大批解雇工人的资本家，我们不去枪毙那些要求土地的农民，而是逮捕那些企图枪毙农民的地主和军官。”霍夫曼气得脸红耳赤。每遇到这种情况，屈尔曼总是故作殷勤地问霍夫曼，对讨论的问题还有什么话要说。将军总是生硬地回答说：“没有，够了！”并且愤怒地望着窗外。在霍亨索伦王朝、哈布斯堡王朝、苏丹和科堡王朝的外交官和将军这伙人中间讨论革命暴力的作用问题，这确实是无与伦比的奇事。一些高官勋爵在整个谈判过程中只是困惑地把目光从我身上移到屈尔曼或切尔宁身上。他们希望有谁能够看在上帝面上，向他们解释这一切究竟是什么意思？毫无疑问，屈尔曼一直在幕后向他们灌输这样的思想：我们只能存在几个星期了，应当利用这短短的时间缔结一项“德国的”和约，以便使布尔什维克的继承人不得不接受它的后果。

在原则问题的辩论上，我的地位比屈尔曼有利得多，正如在军事问题上霍夫曼将军的地位比我有利得多一样。正因为如此，将军迫不及待地竭力要把全部问题归结为力量的对比，而屈尔曼却徒然地想使一个根据军事地图制定的和约装作是依据某种原则制定的和约。为了缓和一下霍夫曼声明所造成的印象，屈尔曼有一次说，士兵所表达的意见必然比外交官表达的意见有力得多。我回答说：“我们

俄国代表团的成员都没有进过什么外交学校，我们倒是认为自己是革命的士兵”，因此我们宁愿听士兵的粗话。不过必须指出，屈尔曼本人的外交礼貌完全是相对的。他给自己提出的任务显然是无法解决的……如果没有我们的协助的话。但是缺的正是这一点。我向屈尔曼解释说：“我们是革命者，但又是现实主义者，因此我们宁愿直率地谈割让，而不愿用虚假的名称来偷换真正的名字。”如果屈尔曼有时摘去外交面具，而恶狠狠地反唇相讥，那是不足为奇的。至今我还记得，他在谈到德国真诚地希望与它的强大的东方邻国恢复友好关系时，用的是什么样的腔调。“强大”这个词是用挑衅的嘲弄口气说出的，致使所有的人，甚至屈尔曼的盟友也都为之愕然。此外，屈尔曼十分害怕谈判破裂。于是我起来应战，再次提请他们注意我第一次发言的内容。我在1月10日说过：“我们没有可能也不打算为下列事实辩解，即我们国家是被那些不久以前还在我国进行统治的阶级所推行的政策削弱的。但是，一个国家的国际地位不仅取决于它今天的技术设备的状况，而且也取决于它的潜在力量，正如德国的经济实力不能只用它当前的粮食资源的情况来衡量一样。一项具有远见卓识的政策依据的是发展趋势、内在力量，这些力量一旦苏醒早晚会显示出强大的威力。”

此后不满9个月，即1918年10月3日，我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会议上提及屈尔曼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的挑战时说：“现在我们中间没有哪一个人会因为德国正在遭受极大的灾难而幸灾乐祸。”无需证明，这场灾祸的主要肇事者是当时在布列斯特参加谈判的德国外交官们，那些文官武将们。

我们对我们的问题表述得越准确，霍夫曼对屈尔曼的优势就越大。他们已不再掩饰相互间的对立情绪，尤其是那位将军。有一次，我在回答他的例行攻击时，无意地提到了德国政府。霍夫曼用穷凶极恶的嘶哑声打断我的发言：“我在这里不代表德国政府，而是代表德国最高统帅部。”这话听起来似乎像石头砸碎玻璃那样刺耳。我瞧瞧桌子对面的对手们。屈尔曼板着脸，眼睛看着台布。切尔宁的表情是既有点发窘，又有点幸灾乐祸。我回答说：“我不认为自己的



使命是评论德意志帝国政府同它的统帅部之间的相互关系，但我只受权同政府进行谈判。”屈尔曼把牙齿咬得嘎嘎作响，表示已注意到我的声明并表示赞同。

当然，夸大外交部同统帅部分歧的深度是幼稚的。屈尔曼多次证明，占领区已通过其拥有全权的国家机构作出了有利于德国的“自决”。霍夫曼则解释说，由于在这些占领区还没有建立拥有全权的机构，因此根本谈不上撤退德国军队的问题。他们的论据截然相反，然而实际的结论却是一致的。在这个问题上，屈尔曼耍了一个初看来似乎是不可思议的诡计。由冯·罗森贝尔格<sup>①</sup>宣读的对我们所提问题的书面答复中说，在西线战事结束以前，德国军队不可能撤离占领区。我由此得出结论：德军将于战争结束以后撤离，并要对方确定撤离的时间。屈尔曼极其兴奋。显然，他指望他的提法起到麻痹作用；换言之，他想用……双关语来掩盖他的并吞野心。当这个花招被戳穿时，他在霍夫曼协助下说明，在战争结束前或结束后都不打算撤军。我打算在1月底取得奥匈政府的同意，前往维也纳与奥地利无产阶级的代表进行会谈，虽然我并不抱成功的希望。最害怕这一出访计划的想必是奥地利社会民主党。我自然遭到了拒绝，而且真叫人难以置信，其理由是我没有被授权进行这样的谈判。于是我给切尔宁写了一封信：

“部长先生：兹随信送上贵国公使馆参赞查基伯爵本月26日来函副本一份，此件看来是阁下对我本月24日电文之答复。为此我谨通知阁下，信中所述贵国政府拒绝批准我为促进民主和约之缔结前往维也纳与奥地利无产阶级代表进行会谈之申请，业已知照。我不得不指出，信中用程序性的考虑来掩盖你们不愿意让俄国工农政府的代表与奥地利无产阶级代表进行私人磋商之真意。至于信中关于我未受全权委托进行谈判的那段说

① 罗森贝尔格(1893—1946年)——德国法西斯主要战犯之一。1923年起为法西斯国家社会主义党中央机关报主编，法西斯主义思想家之一；1923年起为党对外政治部领导人，1941年起任东部占领区部长。被纽伦堡军事法庭判处死刑。——译注

明理由的部分，无论就形式而言，还是就实质而言均无法接受，部长先生，谨提请阁下注意，确定我本人职权范围与工作性质的权力，全然属于敝国政府。”

在谈判最后阶段，屈尔曼和切尔宁手中的主要王牌就是基辅拉达发表的敌视莫斯科的独立言论。拉达的领袖们是克伦斯基主义的乌克兰变种。只是他们更具地方色彩。拉达派往布列斯特的代表只会让资本主义的外交官牵着鼻子走。不仅屈尔曼，而且切尔宁都是怀着俯就的嫌恶感来从事此项交易的。而这些民主主义的傻瓜们竟由于霍亨索伦和哈布斯堡这两家大商行一本正经地提携他们而飘飘然起来。乌克兰代表团团长哥卢博维奇作了例行的简短发言后，就小心翼翼地拨开黑色礼服的长下摆，坐在椅子上，这时人们担心他会由于内心的极度兴奋而忘乎所以。

正如切尔宁本人在日记里所记的那样，他唆使乌克兰人抛出一份公然敌视苏维埃代表团的声明。乌克兰人做得过火了。在一刻钟的时间里，他们的发言人满口粗话，厚颜无耻，颇使那位认真的德国翻译为难，他很难根据这个定音器定好调。哈布斯堡伯爵在描述这个场面时，还说我当时不知所措，脸色苍白，面部抽搐，直冒冷汗，等等。撇开这些夸张之词，我得承认这确实是令人难堪的场面。这倒不是如切尔宁所想的那样是因为我们的同胞当着外国人的面辱骂我们，而是因为这些人不管怎么说还是一个革命的代表，竟在那些蔑视他们的妄自尊大的贵族面前疯狂地自卑自贱，这实在难以忍受。这些一时掌权的不幸的民族民主派像喷泉一样满嘴胡言乱语，还摆出一副得意忘形的奴才相。屈尔曼、切尔宁、霍夫曼等人都像赛马场上押中了赢马的赌徒那样欣喜若狂。乌克兰代表团在48小时内集体炮制了一份充满咒骂的讲稿，乌克兰代表每读一句就要回头看看自己的庇护人，邀功请赏。无可否认，这是我不得不忍受的最卑劣的一幕丑剧。但是即使在侮辱和幸灾乐祸的目光交相袭来的情况下，我丝毫也未曾怀疑，过分热心的奴才很快就会被他们的洋洋得意的主子踢出门外，而这些主子自己也即将从他们世代占据的宝座上被赶下台来……

此时革命的苏维埃部队正向全乌克兰挺进，打开通往第聂伯河的道路。当脓疮完全成熟，并且乌克兰代表已同屈尔曼和切尔宁就出卖乌克兰问题达成协议一事已昭然若揭之时，正是在这一天苏维埃军队占领了基辅。拉狄克用直通电报询问有关乌克兰首都局势的问题，中转站的德国报务员还没弄清对方是谁，就回答说：“基辅死了。”2月7日，我向中央帝国代表团通报了列宁的来电，电文说，苏维埃军队已于1月29日开进基辅，众叛亲离的拉达政府已躲藏起来；宣布乌克兰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为国家最高权力机构，并已迁往基辅；乌克兰政府已经决定同俄国结成联邦，在内外政策方面完全统一。在随后一次会议上，我告诉屈尔曼和切尔宁，他们正在与一个全部领土只局限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范围内的政府代表团进行谈判（按照条约规定，这个城市归属乌克兰）。但是德国政府，确切些说是德国统帅部，当时已决定派自己的军队去占领乌克兰。中央帝国的外交只是为德军准备一张通行证。鲁登道夫干得好极了，他让霍亨索伦王朝的军队作垂死挣扎。

在那些日子里，在德国一所监狱里囚禁着一个人，此人被社会民主党的政客们指责为陷入疯狂的乌托邦，而霍亨索伦王朝的法官们则指控他犯了叛国罪。这个囚徒写道：

“布列斯特的结局并不等于零，即使现在事情发展为缔结一项粗暴的投降的和约也罢。多亏俄国代表团，布列斯特成了举世闻名的革命论坛。它揭露了中央帝国；揭露了德国的贪婪、伪善、狡猾和假仁假义。它宣判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多数派的和平政策的死刑——这一政策与其说具有伪善的性质，不如说是具有厚颜无耻的性质。它有力量在各国发动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它的悲剧性的最后一个行动——对革命的干涉——使社会主义浑身发抖。时间将会表明，当今的胜利者从这次播种中将得到什么样的收获。他们是不会为之高兴的。”（卡尔·李卜克内西：《政治札记》，行动出版社1921年版，第51页。）

## 第三十二章

# 和 平

整个秋天，每天都有前线回来的代表来到彼得格勒苏维埃声明说，要是在11月1日以前还不能缔结和约的话，士兵将返回后方，用他们自己的办法去谋求和平。这成了前线的口号。士兵们成群结队地离开战壕。十月变革在某种程度上煞住了这股风，但是，这种局面自然不会维持多久。

多亏二月革命，士兵们才知道自己受拉斯普廷一帮的支配，这伙人把他们拖进这场无谓的、卑鄙的战争，他们看不出有什么理由要继续这场战争——只是因为一位年轻的律师克伦斯基要求他们这样干的。他们想回家，与亲人团聚，回到土地上去，他们渴望革命，革命曾经向他们许诺过土地和自由，可是迄今为止革命仍让他们呆在饥饿和多虱的战壕里。克伦斯基埋怨士兵、工人和农民，骂他们是“造反的奴隶”。他不懂得一件小事：革命就是奴隶造反，不愿意再做奴隶。

克伦斯基的保护人和鼓舞者布坎南冒失地在他的回忆录里告诉我们，战争和革命对他和他们那一伙人意味着什么。在十月革命几个月后，布坎南对1916年的俄国作了如下的描述：这是可怕的一年，沙皇军队遭到失败，经济崩溃，排长队购物，政府在拉斯普廷操纵下迭次更换。1916年，布坎南是这样记述赴克里木观光一事的：“在我们访问的一座幽雅的别墅里，我们不仅受到用银盘盛放面包和食盐的欢迎，而且在临别时，在小汽车里还发现一打布尔岗陈年红葡萄酒，就是我在早餐时品尝后、赞不绝口的那种酒。回顾这些永远不复返的幸福(!)日子，想起这些热情好客、盛情款待过我们的人们现在

正遭受着贫困和苦难，实在令人沮丧。”

布坎南说的不是战壕里士兵的苦难，也不是排长队挨饿的母亲的苦难，而是在克里木拥有最幽雅的别墅、银盘和布尔岗名酒的前主人的苦难。当你读到这些心平气和、恬不知耻的文字后，你会对自己说：在这世界上十月革命毕竟没有白搞！它不仅把罗曼诺夫王朝，而且把布坎南以及克伦斯基扫除干净也不是徒劳的。

我第一次赴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时，途中经过一段前线，我们在战壕里的同志已不能组织一次多少有点分量的示威来反对德国的骇人听闻的要求，因为战壕几乎空了。在布坎南—克伦斯基试验之后，谁也不敢再说继续战争了，即使是有条件地谈论。和平，不惜任何代价的和平！……后来有一次我从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返回莫斯科时，想请一位全俄中央执委会驻前线的代表发表一篇有力的演说来说支持我们的代表团。他回答说：“不行，绝对不行；我们不能重返战壕，士兵们不会理解我们，他们将会说，我们像克伦斯基那样还在继续欺骗他们……”

不可能继续战争，这是很明显的了。在这一点上，我同列宁之间没有丝毫的分歧。我们怀着同样困惑莫解的心情注视着布哈林及其他一些“革命战争”的鼓吹者。

但是，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霍亨索伦政府在反对我们的斗争中究竟能走多远？那时切尔宁伯爵在给他的友人的一封信中写道，如果他们有足够的力量，就不会同布尔什维克谈判，而是把军队开入彼得格勒，在那里建立新秩序。他们充满敌意。但是，力量够吗？霍亨索伦王朝是否能派兵去反对要求和平的革命呢？二月革命和后来的十月革命对德国军队产生了什么影响呢？这种影响是否会迅速表现出来？这些问题尚无答案。应当在谈判中设法找到答案。为此目的必须尽可能地拖延谈判。必须给欧洲工人以时间去领会苏维埃革命，包括它的和平政策的真谛。这一点尤其重要，因为各协约国的报刊与俄国妥协派和资产阶级的报刊一起事先就把和谈描写为一出精心分配好角色的喜剧。甚至在德国，在当时那些不反对把自己的虚弱转嫁到我们身上的社会民主党的反对派中间，也流传着布

尔什维克与德国政府勾结的流言。但是在法国和英国,这种说法听起来很像真的。事情很清楚,如果协约国的资产阶级和社会民主党能使工人群众对我们感到惊慌不安,那么今后协约国对我们进行军事干涉就方便得多了。因此我认为,如果单独媾和对我们来说是无法避免的话,那么在签字之前我们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地给欧洲工人提供确凿的无可辩驳的证据,表明我们和德国的当权者是死对头。正是出于这种考虑,我才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产生了用如下口号进行政治示威的念头:“我们要结束战争,复员军队,但是不签订和约。”我是这样推论的:如果德国帝国主义不能调动军队向我们进攻,那么这将意味着我已经取得了具有深远影响的巨大胜利。如果霍亨索伦王朝仍有可能攻击我们,那么我们到那时候投降为时也不晚。我跟代表团其他成员,包括加米涅夫在内,进行商讨,得到他们的支持,于是我写信给列宁。他回答说:“等您返回莫斯科后我们再讨论。”

列宁回答我提的论据说:“如果霍夫曼将军无力调兵向我们进攻,那是再好不过的了。但是这种希望不大。他可以为此抽调专门从巴伐利亚富农中精选出来的团队。况且,对付我们是否需要很多兵力呢?您自己说过,战壕里已经空了。而德国人如果恢复战争,我们怎么办呢?”

“那时我们只好签订和约了。但是那时大家将清楚地看到,我们没有其他出路。用这个办法我们就可以给予那种说我们与霍亨索伦王朝进行幕后勾结的神话以致命的打击。”

“当然,这样做有一定的好处,但太冒险了。如果为了德国革命的胜利,我们必须毁灭的话,我们是一定要这样做的。德国革命要比我们的革命重要得多。但它何时来临?不清楚。而目前世界上没有比我们的革命更重要的东西了。应当不惜一切代价地捍卫俄国革命。”

除了问题本身的困难之外,当时党内状况也极端困难。在党内,至少在领导人中间,绝大多数人对签订布列斯特和约持不调和的态度。我们报刊上发表的布列斯特和谈速记记录更加助长并加剧了这

种情绪。这种情绪的最鲜明的体现者是左派共产主义集团，他们提出了革命战争的口号。

党内斗争日益加剧。与后来的神话相反，党内斗争不是在我同列宁之间，而是在列宁同绝大多数党组织的领导人之间进行的。在这场斗争中的一些基本问题上，例如我们目前能否进行革命战争？总的说，革命政权是否可以同帝国主义者妥协，我是毫无保留地站在列宁一边的，我跟他一起，对第一个问题回答是否定的，对第二个问题的回答是肯定的。

1月21日，在党内积极工作人员会议上第一次就党内分歧问题进行了较为广泛的讨论。会上出现了三种观点。列宁主张，设法再拖延谈判，但是一旦提出最后通牒，便立即投降。我认为，即使冒德国再度进攻的风险，也必须设法使谈判破裂，以便在对方明显采用武力面前被迫投降——如果不得不投降的话。布哈林则要求战争，以扩大革命的舞台。在1月21日会上，列宁与革命战争的拥护者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对我的建议只限于批评几句。主张革命战争的人获得32票，列宁得到15票，我得到16票。表决结果尚不能充分地表明在党内占统治地位的情绪。且不说在群众中，就是在党的最高层，“左翼”势力甚至比在这次会议上更强大。由于这一点，我的公式取得了暂时的胜利。拥护布哈林的人把我的胜利看成是实现他们方针的一个步骤。相反地，列宁认为，并且有充分根据地认为，推迟作出最后决定将保证他的观点取得胜利。在当时，我们党需要认清事情真相，其重要性不在西欧工人之下。在党和国家的所有领导机关中，列宁处于少数。在3月5日以前，200多个地方苏维埃应人民委员会之请，就战争与和平问题发表意见。其中只有两个大区苏维埃：彼得格勒和塞瓦斯托波尔（后者带有保留）主张和平。相反，许多大的工人中心，如莫斯科、叶卡捷琳堡、哈尔科夫、叶卡捷琳诺斯拉夫、伊凡诺沃-沃兹涅先斯克、喀琅施塔得等地，绝大多数主张中断谈判。我们党组织内的情绪同样如此。至于左派社会革命党人那就不用说了。在这个时期要实行列宁的观点，就只有实行分裂和国家政变，没有别的办法。但是拥护列宁的人日益增多。在这种情况下，

“不战不和”的公式客观上成了通往列宁立场的桥梁。党内大多数人，至少它的领导人都走过这座桥梁。

“好吧，假定我们拒绝签订和约，而德国人在此后转入进攻。那时您怎么办？”列宁追问我。

“我们只好在刺刀下签字。全世界将会了解我们的处境。”

“到那时您不支持革命战争的口号了吧？”

“决不支持。”

“在这种情况下，您的尝试也许并不那么危险。我们顶多只会冒失去爱沙尼亚或拉脱维亚的危险。”列宁调皮地笑一笑补充说：“为了同托洛茨基和睦相处，失去拉脱维亚或爱沙尼亚也是值得的。”——在以后的几天里，列宁老是重复这几句话。

在1月22日举行的决定性的中央委员会会议上，我的建议得到通过，拖延谈判；一旦德国发出最后通牒，就宣布结束战争，但不签订和约，然后再见机行事。1月25日深夜，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和我们当时的盟友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举行联席会议，会上以绝大多数票通过了同样的提法。按当时的惯例，两个中央委员会作出的这个决定被认为是人民委员会的决议。

1月31日，我从布列斯特打有线电报给在斯莫尔尼宫的列宁：“在德国报刊上的无数谣传和消息中有一条荒唐的报道，说我们打算示威性地拒绝签订和约，似乎在这个问题上，布尔什维克内部有着分歧，云云。我指的是来自斯德哥尔摩的一期电讯，而该份电讯又引自《政治家报》。如果我没有弄错，《政治家报》是霍格伦<sup>①</sup>的机关报。能不能向他打听一下，他的编辑部是怎么会刊登这类荒诞无稽的东西的，如果该报确实登过这样的报道的话。由于资产阶级报刊充斥着各种各样的谣言，因此德国人未必会重视这则消息。但问题是，这则消息出自一家左派报

<sup>①</sup> 卡·塞·康·霍格伦(1884—1956年)——瑞典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左翼领袖。1917、1919年至1924年任瑞典共产党主席，1924年被开除出党。1926年回到社会民主党。——译注



纸，它的一名编辑就在彼得格勒。这就使这则报道具有一定的权威性，它只会造成我们的谈判对手思想混乱。

奥地利和德国报纸连篇累牍地报道了在彼得格勒、莫斯科和整个俄国的灾难，成千上万人死于非命，机枪声不绝于耳，等等。现在看来极需委派一名头脑冷静的人每天为彼得格勒通讯社和电台提供关于国内的局势的报道。如果季诺维也夫同志愿承担这项工作，那是最好不过的。这件事具有重大意义。主要的是，这类报道必须送交沃罗夫斯基<sup>①</sup>和李维诺夫<sup>②</sup>。此事可由契切林经办。

我们只举行过一次完全正式的会谈。德国人竭力拖延谈判，显然由于内部发生了危机。德国报刊大喊大叫，似乎我们根本不希望和平，而只想把革命引向其他国家。这些蠢驴不能理解，正是从发展欧洲革命的角度来看，尽早地实现和平对我们来说有着重大意义。

是否已采取步骤驱逐罗马尼亚大使？我认为罗马尼亚国王正在奥地利。据德国的一家报纸报道，存放在莫斯科的不是罗马尼亚的国家基金，而是罗马尼亚国家银行的黄金储备。德国官方自然是完全支持罗马尼亚的。

您的托洛茨基”

对这封短信需要作些解释。按正式的说法，用休斯式电报机进行商谈是不会被窃听或被截获的。但我完全有理由认为，布列斯特的德国人常常通过直通线路偷阅我们的来往信件，我们对他们的技术是颇为佩服的。把全部信函译成密码是不可能的，再说我们也不太信赖密码。同时霍格伦的《政治家报》极不恰当地发表来自第一手资料的情报给我们帮了倒忙。我写这封短信的目的不单是为了警告

① 瓦·瓦·沃罗夫斯基(1871—1923年)——俄国革命活动家，政论家。参加过《火星报》、《前进报》、《无产者报》和《真理报》的编辑工作。十月革命后历任驻瑞典、挪威、丹麦、意大利全权代表。——译注

② 马·马·李维诺夫(1876—1951年)——苏联外交家，十月革命后历任外交人民委员会部务委员、副外交人民委员、外交人民委员、驻美大使等职。——译注

列宁，说我们决定的秘密已在外国泄露，而且也是为了使德国人受骗上当。我之所以对办报的人使用极不礼貌的字眼“蠢驴”，是为了使文字尽可能“逼真”一些。屈尔曼上当到什么程度，我没法说。无论如何我在2月10日发出的声明给对方造成了意外的印象。切尔宁在2月11日的日记中写道：“托洛茨基拒绝签字。战争已经结束，但没有和平。”

难以置信的是，1924年斯大林和季诺维也夫学派企图把事情说成这样：似乎我在布列斯特的行动违背了党和政府的决定。这些不幸的伪造者甚至懒得去看一眼过去的会议记录或者翻阅一下自己在当时的声明。季诺维也夫在2月11日，即我在布列斯特发表声明后的第二天，在彼得格勒苏维埃上声明：“我们代表团找到了摆脱困境的唯一正确的出路。”季诺维也夫提议通过一项赞同拒绝签订和约的决议，表决结果是多数赞成，一票反对，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弃权。

2月14日，斯维尔德洛夫根据我向中央执行委员会所作的报告，代表布尔什维克党团提出了一项决议案，开头是这样写的：“听取并讨论了和谈代表团的报告，中央执行委员会完全赞同自己的代表在布列斯特所采取的行动方式。”当时没有一个地方组织，党的或苏维埃的组织，在2月11日至2月15日之间不赞成苏维埃代表团所采取的行动的。在1918年3月召开的党代表大会上，季诺维也夫声明：“托洛茨基说，他是按照中央委员会的法定多数所通过的决定行事的，这是对的。对此谁也不会有异议……”最后，列宁在同一次代表大会上说过：“中央委员会接受了关于不签订和约的建议。”所有这一切并不妨碍共产国际内形成一种新的教条，似乎在布列斯特拒绝签订和约仅是托洛茨基一个人干的事。

德国和奥地利的十月罢工以后，关于德国政府是否会决定进攻的问题，无论是我们，还是德国政府本身，都不像现在许多事后诸葛亮所说的那样清楚。2月10日，德国和奥匈帝国在布列斯特的代表团得出结论说：“托洛茨基声明中提出的那种状态应

子承认。只有霍夫曼将军反对这个意见。”据切尔宁说，在第二天，切尔宁满怀信心地在布列斯特举行的最后一次会议上说，必须接受这种事实上的和平。这些情绪立即传到我们耳里。我们代表团都带着德国人不会进攻的印象返回莫斯科。列宁对达到这样的结果感到很满意。

不过他还是问我：“他们不会是欺骗我们吧？”

我们两手一摊。似乎不像。

列宁说：“哦，好吧，要真是这样的话，就太好了：既保全了面子，又退出了战争。”

然而，在一星期的期限届满以前两天，我们收到留守在布列斯特的萨莫伊洛将军的一份电报，说根据霍夫曼的声明，德国人认为从2月18日12时起将同我们处于战争状态，因此要他离开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列宁首先看到电报。我坐在列宁办公室里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谈话。列宁默默地把电报递给我。他的目光立即使我感到来了不祥的消息。列宁匆匆忙忙地结束了同社会革命党人的谈话，以便在他们离开后讨论面临的局势。

“就是说，他们还是欺骗了我们。我们赢得了5天的时间……这头野兽不会放过任何东西。就是说，除了原先的条款上签字外，已经没有别的办法——只要德国人同意保留原先的条款。”

我依然坚持原来的看法，认为应该让霍夫曼发动实际进攻，这样就可以让德国和协约国的工人知道，德国发动进攻是事实，而不是单纯的威胁。

“不！”列宁反驳道：“现在一小时都不能耽误。我们已经进行过试验。霍夫曼不仅愿意打，而且能够打，不能拖延了。这头野兽行动非常迅速。”

列宁在3月召开的党的代表大会上说：“我们之间（即他和我之间）曾经约定：德国人不下最后通牒，我们就坚持下去，等他们下了最后通牒我们再让步。”我在前面已经谈到过这一条件。列宁之所以同意不在党面前公开反对我的提法，只是因为我答应他不支持革命战

争的拥护者。这一集团的正式代表乌里茨基<sup>①</sup>、拉狄克，好像还有奥新斯基<sup>②</sup>曾向我提议建立“统一战线”。我明确无误地告诉他们，我们之间的立场毫无共同之处。当德国统帅部发出结束停战的警告时，列宁向我重提了我们的协定。我回答他说，对于我来说，问题不在于口头上的最后通牒，而是德国人实际上的进攻，这一行动将使我国两国的实际关系不再存在任何疑问。在2月17日中央委员会会议上，列宁把一个预设的问题提交会议表决：“如果德国的进攻已成为事实，而德国又没有出现革命高潮，我们是否签订和约？”布哈林及其同志对这一根本问题的回答是弃权，克利斯廷斯基<sup>③</sup>和他们一起弃权。越飞投反对票。我和列宁一起投赞成票。第二天早晨，我投票反对列宁提出的立即发出我们准备签订和约的电报的建议。可是就在这一天，我们收到了关于德国人已转入进攻，他们夺取了我们的军需品，并且已向德文斯克挺进的电报。晚上我投票赞成列宁的电报，因为现在已经毫无疑问，全世界都已知道德军进攻的事实。

2月21日收到德国提出的新条款，新条款的目的好像是有意使和约无法签订。众所周知，我们代表团回到布列斯特时，这些条款比以前更苛刻了。我们大家，在某种程度上还有列宁，都有这样一种印象，看来德国人已经同协约国商定一起来扼杀苏维埃，并且在俄国革命的尸骨上建立西线和平。如果事情果真如此，不言而喻，我们的任何让步都无济于事。乌克兰和芬兰的事态进程使天平大大地倒向战争。每小时都传来不祥的消息。传来了德军已在芬兰登陆，并开始摧毁芬兰工人的消息。我在离列宁办公室不远的走廊里遇到了列宁。他非常激动。无论是在此以前，还是后来，我从未见到他这样激动。

① 乌里茨基(1873—1918年)——俄国革命运动活动家。1917年7月起为党中央委员，10月起为彼得格勒军事革命委员会的委员。1918年3月起任彼得格勒肃反委员会主席，被社会革命党人杀害。——译注

② 恩·奥新斯基(1887—1938年)——1917至1918年任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译注

③ 尼·尼·克利斯廷斯基(1883—1938年)——十月革命后任财政人民委员、副外交人民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书记等职。——译注

“是啊！”列宁说：“看来是非打仗不可的了，虽然没有人力物力。别的出路是没有的。”

可是过了 10 至 15 分钟，当我再到办公室去找列宁时，他说：

“不，我们不能改变政策。我们采取的行动不仅救不了革命的芬兰，反而肯定会毁掉我们自己。我们将竭尽全力去援助芬兰工人，但是决不放弃和平的立场。我不知道，现在这样做能不能使我们得救，但是无论如何，这是可以设想的使我们得救的办法。”

对缔结和约的可能性，哪怕是以完全投降为代价，我是非常怀疑的。但是列宁决定走投降的道路，而且走到底。但是，由于他在中央委员会不拥有多数，而这个决定能否通过取决于我这一票，所以我决定弃权以保证列宁获得一票的多数。我正是这样说明自己弃权的理由的。我认为，如果投降不能获得和平，那我们就要在敌人强加于我们的武装保卫革命的斗争中整顿党的队伍。

我私下对列宁说：“我觉得，如果我提出辞去外交人民委员的职务，从政治来说是适当的。”

“为什么呢？我希望我们不要采取这种议会手段。”

“但是我的辞职在德国人看来意味着我们政策的根本的转变，这样就能使他们相信，这次我们真的准备签订和约了。”

列宁沉思一下以后说：“也许这是一个严肃的政治理由。”

2月22日我在党中央会议上报告说，法国军事使团向我表示，在我们对德战争中，法国和英国愿意向我们提供援助。我主张接受这一建议，当然，是在我们外交政策完全自主的条件下接受援助。布哈林坚持认为不能同帝国主义者缔结任何协议。列宁十分坚定地支持我，中央委员会以 6 票对 5 票采纳了我的建议。记得列宁口授了如下决议：“授权托洛茨基同志接受法帝国主义强盗的援助去反对德国强盗。”他总是喜欢用毫不含糊的措辞来表述自己的思想。

我离开会场以后，布哈林在斯莫尔尼宫的长廊里追上了我，用双手搂住我，大哭起来。“我们在干什么？”他说：“我们使党成了狗屎堆。”布哈林容易掉眼泪，并且喜欢用自然主义的粗话。但是这一次形势确实非常危急。革命处在左右夹攻之中。

3月3日,我们代表团连看也没看,就在和约上签了字。布列斯特和约很像是刽子手的一条绞索,它预见到克列孟梭的许多主张。3月22日,德国国会通过了这个条约。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对未来的凡尔赛原则预先表示了赞同。独立党人投票反对,他们刚刚开始走上一条最后会把他们引回到原先的出发点去的徒劳往返的曲线。

在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1918年3月),我回顾了走过的道路,十分明确而全面地阐述了自己的立场。我说:“如果我们真的想要获得最有利的和平,那么早在11月就应该达成协议。但在当时,除季诺维也夫外,谁也不主张这么做:我们全都主张进行鼓动,主张促使德国、奥匈和全体欧洲的工人阶级起来革命。但是我们以往同德国人进行的一切谈判,只有在被认为是真的时候才具有革命化的意义。我已经向第三届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党团报告过,前奥匈大臣格拉茨曾对我说过,德国人需要的只是寻找一个借口,以向我们发出最后通牒。他们认为,我们自己在招引最后通牒……认为我们早就认定要签署一切,我们只不过在演出一场革命喜剧。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拒绝签订和约,我们就有丧失雷瓦尔<sup>①</sup>和其他一些地方的危险,而如果过早地签订和约,我们就有失去世界无产阶级或者大部分无产阶级的同情的危险。有些人认为,德国人大概不会进攻,即使进攻,我们也总会有时间来签订和约,虽然条件会坏得多,我是持这种看法的人之一。我说过: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家都会相信,我们没有别的出路。”

值得注意的是,李卜克内西当时在狱中写的一段话:“决不能认为,对今后的发展来说现在的结局比2月初在布列斯特向德国投降更坏。恰恰相反,这样的投降只是说明我们以前所进行的抵抗是无效的,而最后的屈服只是‘出于无奈’。令人发指的犬儒主义,德国最后行动的野蛮性把一切猜疑一扫而光。”

李卜克内西在战争期间有了很大的长进,他最终学会了同那个

① 雷瓦尔:苏联时期改名塔林市。——译注

真诚但优柔寡断的哈阿兹保持很大一段距离。李卜克内西是个无所畏惧的革命者，这是无需赘言的。但是他只是使自己成为一个战略家。这既表现在他的个人命运问题上，也表现在革命政策问题上。他从不考虑个人的安危。他被捕以后，许多朋友对他那种自我牺牲的“鲁莽行为”直摇头。相反地，列宁非常关心使领导机关不受侵犯。他是总司令部的首脑，他始终牢记，在战争时期他必须保障总指挥部的安全。李卜克内西是亲自率领队伍去冲锋陷阵的司令。也正因为如此，他很难理解我们的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战略。起初，他只是希望干脆去向命运挑战，接受命运的摆布。他不止一次地谴责在那个时期的“列宁-托洛茨基政策”，在这个根本问题上并不区分（这也是合乎情理的）列宁路线和我的路线之间的差别。不过后来李卜克内西开始重新评价布列斯特政策。5月初，他已经这样写道：“对于俄国的苏维埃来说，目前最需要的当然不是什么游行示威和点缀品，而是一支坚强的力量。为此，除了毅力以外，无论如何还需要智慧和时间，有了智慧才可以赢得时间，而时间对于最有毅力、最聪明的人都是不可缺少的。”这就是完全承认了列宁坚持的布列斯特政策的正确性，这项政策的目的是为了赢得时间。

真理在为自己开辟道路。但是谬误也能经久不衰。美国教授费舍在他那本描写苏俄初期生活的书里（《苏俄的饥荒》），把苏维埃将永远不进行战争，将永远不同资产阶级政府缔结和约的思想强加于我。这种荒谬的说法费舍和其他许多人一样是从季诺维也夫，从不肖徒辈那里抄来的，还加上一些自己不理解的东西。我的那些事后的批评者早就使我的布列斯特建议脱离具体时间和地点，把它变成一个万能的公式，使之达到荒谬绝伦的地步。然而他们在这样做的时候却没有注意到，“不战不和”，确切些说，“既不签订和约，也不继续战争”，并无任何反常之处。现在我们同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美国和英国的关系就是如此。诚然，这种关系是违背我们的愿望的，但是这并不改变事情本身。然而也有一个国家，是我们主动和它建立“不战不和”关系的，这就是罗马尼亚。我的批评者们把这个在他们看来是荒谬绝伦的万能公式硬加在我身上，但是他们却奇怪地无视

这样的—个事实，他们在处理同许多国家的关系时恰恰在重复这一“荒谬绝伦”的公式。

布列斯特时期过去以后，列宁本人是怎样看这个时期的呢？列宁认为我们之间纯属一时的意见分歧，根本不值一提。然而他却多次谈到，“布列斯特谈判具有很大的鼓动作用”（例如见1918年5月17日的讲话<sup>①</sup>）。在布列斯特和约签订后—年，列宁在党的代表大会上指出：“由于同西欧和其余—切国家隔绝，我们得不到任何的客观材料，无法判断西欧无产阶级革命发展可能有多快，可能采取什么形式。由于这种复杂情况，布列斯特和约问题便在我们党内引起了—些分歧。”（1919年3月18日讲话）<sup>②</sup>

还要问—下，在那些日子里我后来的批评者和揭露者是如何行事的呢？布哈林激烈地跟列宁（和我）斗争了几乎整整—年，并以党的分裂相威胁。占比雪夫、雅罗斯拉夫斯基、布勃诺夫<sup>③</sup>和其他那些—些斯大林主义者都站在布哈林—边。季诺维也夫则相反，要求立即签订和约，放弃布列斯特这个进行鼓动的讲坛。我和列宁—致谴责这种立场。加米涅夫在布列斯特时同意我的提法，而返回莫斯科以后又赞成列宁的意见。季可夫当时不是中央委员，因此没有参加作出决定的会议。捷尔任斯基曾反对列宁，但在最后表决时表示赞同列宁的主张。斯大林持什么立场呢？他像往常—样没有任何立场。他只是等待和见机行事。“老头子仍然希望和平，”他对我说，用头朝列宁那儿点—下，“但他得不到和平”。然后他走到列宁那儿去，大概对我也作了—样的评论。斯大林从来—不发表意见。对他的前后矛盾谁也没有给予特别的注意。我主要关心的是使世界的无产阶级尽可能多地理解我们在和约问题上的做法，毫无疑问，在斯大林

① 应是5月15日，见《列宁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23页。——译注

②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6卷，第120页。——译注

③ 安·谢·布勃诺夫（1883—1940年）——十月革命期间任彼得格勒军事革命委员会委员。后任中央委员会书记、工农红军政治部主任、俄罗斯联邦教育人民委员等职。——译注



看来这是次要的事情。他感兴趣的是“一国和平”，犹如后来的“一国社会主义”一样。在最后表决时，他支持了列宁。直到几年以后，为了同托洛茨基主义进行斗争，他才为自己拟定了在布列斯特问题上的“观点”。

看来没有必要在这个问题上再多费笔墨了。我对布列斯特的分歧的叙述已经占了过多的篇幅。但是我觉得很需要至少充分揭示许多争论中的一段插曲，以便表明这件事的真相，以及后来人们又是怎么描述的。我在这里的一个附带任务是使这些不肖徒辈知道自重。至于对列宁，任何一个严肃的人都不会认为，我和他的关系是受德国人所谓的 *Rechthaberei*（自以为是）的态度所支配的。我远在其他人之先就大声疾呼地评价列宁在布列斯特和谈中所起的作用。1918年10月3日，我在苏维埃政权最高机关的特别联席会议上说：“在这个权威性的会议上，我认为有责任声明，我们中间有许多人，包括我在内，曾对是否需要，是否允许签订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表示怀疑，当时只有列宁同志以他的顽强精神和无比的远见卓识，力排众议，断言我们必须走这条路，才能达到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现在我们应当承认，正确的不是我们。”

没有等待这些不肖徒辈作出为时已晚的启示，我就承认列宁的雄才大略和政治勇气在布列斯特期间拯救了无产阶级专政。在上述讲话中，我承担的责任超过了我所应当承担的，也为他人所犯的错误承担了责任。我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给大家树立一个榜样。速记记录中在这处注明“长时间的热烈欢呼”。党希望以此表明，它理解和赞赏我对列宁的态度，这种大度的或不怀妒忌的态度。我非常清楚地意识到列宁对于革命，对于历史和我个人来说意味着什么。他是我的导师。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只要事后重复他的话和他的手势就行了。我从列宁那里学会了独立地作出与他相同的决定。

### 第三十三章

## 在斯维亚日斯克的一个月

1918年春夏，日子特别艰难。战争所造成的全部恶果渐渐暴露出来。有时有这样一种感觉，一切都在慢慢地移动，在土崩瓦解，什么也抓不住，什么也没法依靠。人们怀疑，这样一个疲惫不堪、破坏殆尽、濒于绝望的国家是否还有足够的生命力来支持新制度和拯救自己的独立？没有粮食，没有军队，铁路完全瘫痪，国家机关勉强建立，到处都有阴谋破坏活动。

在西面，德国人占领了波兰、立陶宛、拉脱维亚、白俄罗斯以及俄罗斯的很大一部分土地。普斯科夫在德国人手中。乌克兰成了德奥殖民地。在伏尔加河流域，1918年夏，法国和英国的代理人策划了由原战俘组成的捷克斯洛伐克军的叛乱。德国指挥部通过其军事代表向我示意，如果白军从东面逼近莫斯科的话，德国人则将从西面，从奥尔沙和普斯科夫，向莫斯科推进，以阻止形成东方战线。我们处于腹背受敌的境地。在北面，英国人和法国人占领了摩尔曼斯克和阿尔汉格尔斯克，并有向沃洛格达推进之虞。在雅罗斯拉夫尔爆发了白卫军的叛乱，这是萨文柯夫<sup>①</sup>根据法国大使努兰斯和英国全权代表洛克哈特的直接要求组织的，其目的在于使北方的军队通过沃洛格达和雅罗斯拉夫尔同捷克斯洛伐克人和白卫军在伏尔加河会合。在乌拉尔，杜托夫匪帮仍在活动。在南方，在顿河一带，爆发了

---

<sup>①</sup> 波·维·萨文柯夫(1879—1925年)——俄国社会革命党活动家。1917年任临时政府陆军部副部长。十月革命后多次组织反革命叛乱。后逃往国外。

由克拉斯诺夫领导的暴动，当时他同德国人建立了直接联盟。7月，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策动阴谋活动，杀死了米尔巴赫伯爵，<sup>①</sup>企图在东方战线发动暴乱。他们想迫使我们同德国人打仗。国内战争的战线渐渐形成一个包围圈，越来越紧地把莫斯科团团围住。

辛比尔斯克陷落以后，决定派我前往伏尔加河前线，那里是主要危险。我得编组一个专列，这在当时是不容易的。什么都没有，确切些说，谁也不知道什么东西在什么地方有。一项最简单的工作往往变成了一件复杂的只能临时安排的事。那时候我也没有想到，我在这辆列车上要度过两年半时间。我于8月7日离开莫斯科，当时还不知道喀山在头一天已经陷落。我是在途中听到这个可怕消息的。那些仓促编成的红军部队未经一战就撤离火线，使喀山暴露出来。司令部中有一部分人由阴谋分子组成，另一部分人措手不及成了俘虏或在枪林弹雨中独自躲了起来。总司令和军队中别的指挥官到哪里去了，谁都不知道。我的火车就停在离喀山最近的一大车站——斯维亚日斯克上。在整整一个月里，这里再次决定了革命的命运。对于我来说，这一个月是个大学校。

驻守在斯维亚日斯克的军队是由辛比尔斯克和喀山撤下来的部队或从各方面而来的增援部队组成的。每支部队都独立存在。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点，这就是希望撤退。敌人在组织上和经验上所占的优势大大超过我们。一些完全由军官组成的白军连队打起仗来勇猛得出奇。连土地本身都染上恐惧症。来时斗志昂扬的红军生力军，也很快地受到退却的消极情绪的影响。农民中有一种谣言说，苏维埃垮台了。神甫和商人们又活跃起来。农村里的革命分子纷纷隐藏起来。一切都在分崩离散，什么也抓不住，局势似乎已无法扭转。

在这里，在喀山城下，人们可以在这一小片土地上观察人类历史因素的多样性，从中找到反对怯懦的历史宿命论的论据，这种历史宿

<sup>①</sup> 威·米尔巴赫(1871—1918年)——德国外交官。曾任驻瑞典大使和驻莫斯科大使，1918年被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瓦·布柳姆金刺死，这是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在莫斯科暴乱的信号。——译注

命论在具体和局部问题上总是以消极的规律性作掩护，却看不到它的最重要的原动力：活生生的、行动中的人。在那些日子里，要推翻革命，难道还缺好多东西吗？它的地域已经缩小到古代莫斯科公国时的范围了。它几乎没有军队。敌人从四面八方包围着它。喀山沦陷后，下一个该是下诺夫哥罗德了。那里有一条几乎是畅通无阻的通往莫斯科的大路。这一次革命的命运取决于斯维亚日斯克一带。在这里，在最危急的关头，革命的命运往往取决于一个营、一个连，取决于一个政委的坚定性，也就是说，处在千钧一发之际。这种局面日复一日地继续着。

尽管如此，革命还是得救了。为此需要什么呢？不多，需要的是使群众中的先进阶层懂得面临的致命危险。取得成功的主要条件是，毫不隐瞒真相，首先是不隐瞒自己的弱点，不要愚弄群众，把一切都公之于众。革命还不能高枕无忧。十月的胜利来得容易。但是革命还不能一举扫除酿成革命的一切灾难。敌人靠我们所缺乏的军事组织取胜。革命在喀山城下学到了这门艺术。

斯维亚日斯克不断发出电报向全国进行鼓动。各地苏维埃、党组织和工会纷纷建立起新部队，并把成千上万名共产党员派往喀山前线。大部分青年党员不会使用武器。但他们具有必胜的信心。而这正是主要的。他们使军队不结实的躯体的脊梁骨挺立起来了。

瓦采季斯<sup>①</sup>上校被任命为东方战线总司令，在这以前他曾指挥过拉脱维亚步兵师。这是唯一的一支由旧军队保留下来的部队。拉脱维亚的雇农、工人和贫农憎恨波罗的海沿岸各国的男爵们。沙皇政府在对德战争中利用了这种社会的仇恨心。拉脱维亚团队是沙皇军队中最精锐的部队。二月革命以后，它几乎全盘布尔什维克化了，在十月革命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瓦采季斯是个有事业心、积极主动和足智多谋的军官。在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叛乱期间他得到了提升。在他指挥下，采用轻武器去对付叛乱司令部。仅仅扫射了几下一

<sup>①</sup> 约·约·瓦采季斯(1873—1938年)——苏联军事家。原为沙俄上校军官，十月革命后于1918至1919年任共和国武装力量总司令。——译注

这是为了威吓，没有造成伤亡，已把暴乱分子吓得狼狈逃窜了。冒险家穆拉维约夫<sup>①</sup>在东线叛变以后，瓦采季斯接替了他的职位。他跟别的军事学院出身的人不同，在革命的混乱中不张皇失措，在困境中总是朝气蓬勃地在其中拼命挣扎，他发号召，鼓励群众，发布命令，虽然有时明知这些命令不可能得到执行。其他“专家”最害怕超越自己的权限，瓦采季斯却相反，他在心血来潮时会下达命令，忘记人民委员会和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存在。大约一年以后，瓦采季斯被指控为居心叵测，形迹可疑，于是被免去职务。但是在这些指控的背后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大事。很可能他在睡前读了一点拿破仑的传记，并与两三个年轻军官交流了一些不知分寸的想法。现在瓦采季斯是军事科学院的教授……

8月6日晚，他是最后撤离喀山司令部的几个人中的一个，这时白军已占领了大楼。他平安地突围，绕道来到斯维亚日斯克，虽然失去了喀山，但是仍然保持着他的乐观主义。我和他一起讨论了一些最重要的问题，任命拉脱维亚军官斯拉文为第五集团军司令，就分别了。瓦采季斯回自己的司令部，我留在斯维亚日斯克。

跟我同车前来的人中还有古谢夫<sup>②</sup>。他被叫作“老布尔什维克”，因为他曾参加过1905年革命运动，后来他脱离了革命，过了十余年的资产阶级生活，不过，他像其他许多人一样，参加了1917年革命。后来由于他要弄小阴谋，被列宁和我调离军事工作，但立即被斯大林选中。如今他的专业主要是伪造国内战争史。他从事这项工作的主要本领就是冷冰冰的犬儒主义。像整个斯大林学派一样，他从来不提他昨天写了些什么，说了些什么。1924年初，对我的中伤已完全公开，古谢夫在其中扮演了一个漫不经心的造谣中伤者，这时虽然事隔6年，但对斯维亚日斯克那些日子记忆犹新，并且也在某种程

① 米·阿·穆拉维约夫(1880-1918年)——沙俄中校。十月革命后任彼得格勒城防司令，东方面军总司令。后在辛比尔斯克发动叛乱(1918年7月10日—11日)，在平定时被击毙。——译注

② 谢·伊·古谢夫(1874—1933年)——十月革命后是红军政治工作领导人之一。后任党中央监察委员会书记，中央报刊部部长等职。——译注

度上使古谢夫感到束手束脚。下面就是他对喀山附近事态的叙述：

“托洛茨基同志的到来使形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托洛茨基同志的列车给偏僻的斯维亚日斯克车站带来了胜利的坚定信念、主动性以及对军队各方面工作的坚决的推动。在塞满无数团队的后勤车队的车站上，拥挤着政治部和供应机关，在前面约15俄里的地方驻扎着部队，从最初几天起在这些地方人们都感到发生某种突然的变化。首先，这表现在纪律上。托洛茨基同志的严厉的工作方法对于盛行游击作风和不守纪律的时代来说是最为适宜、最为必要的。靠说服是无济于事的，况且也没有时间这样做。托洛茨基同志在斯维亚日斯克的25天里做了大量工作，结果使涣散的、瓦解的第五集团军变成了一支有战斗力的部队，并把他们训练好，去攻占喀山。”

在司令部，在指挥人员中以及在周围到处都潜伏着叛徒。敌人知道该往哪里打，而且几乎总是百发百中。这很令人沮丧。我到达后不久便到前沿炮兵连视察。一位有着饱经风霜的脸孔和神秘莫测的眼睛的老资格军官向我介绍了炮位。他要求出去一会儿，说要打电话下达命令。几分钟后，两发炮弹交叉地落在离我们50步的地方，第三发炮弹就落在我们旁边。我赶紧趴下，泥土纷纷落在我身上。那炮兵却纹丝不动地站在一旁，他那黝黑的脸变得苍白起来。很奇怪，我当时竟没有产生丝毫怀疑，还以为这只是一件偶然的事。只是在两年后，我突然想起了这件事的全部细节，这才恍然大悟，这个炮兵原来是敌人，他用电话通过某个中间站给敌人的炮兵连指示了目标。他冒了双重危险：或者被白军的炮弹打中跟我同归于尽，或者被红军枪毙。他的下落如何，我就知道了。

我刚回到车厢，就听到四周响起了枪声。我赶忙冲向车门。只见一架白色飞机在我们头上盘旋，显然想袭击火车。三颗炸弹成弧线地接连落下来，幸好没有造成什么损失。车顶上架设的步枪和机枪一齐向敌机开火。敌机不能接近，但是射击并没有中止。大家像喝醉了一样。我好不容易才制止住射击。也许就是那个炮兵把我返回车厢的时间告诉了敌人。也可能还有其他的告密者。

革命的军事形势越是处于无望的状态，背叛活动就越是猖獗。无论如何必须尽快地制止自发的退却（人们已不相信有可能站稳脚跟），使他们转过身来，朝敌人的胸膛打去。

我在火车里带了50名莫斯科的青年党员。他们忙得不得了，到处补漏洞，我亲眼看着他们消瘦下去，由于英勇的莽撞，且缺乏经验，常常使自己处于受攻击的地位。和他们一起的还有第四拉脱维亚团。它是这个业已四分五裂的师中最糟糕的一个团。步兵们躺在雨天的烂泥地上，要求换防。可是没有换防的部队。团长和团士兵委员会向我递交一份声明，说如果该团不立即换下去，将会产生“危及革命的后果”。这显然是威胁。我把团长和团士兵委员会主席叫到车厢里来。他们仍然固执己见。我当即宣布他们被捕了。列车上的联络官，现在是克里姆林宫的卫队长，立即在我的车厢里解除了他们的武装。车厢里除我们两人外再没人了；整支部队都在阵地上作战。如果被捕者进行反抗，或者全团官兵支持他们并撤离阵地，那么局势就会是极端危险的了。我们就会放弃斯维亚日斯克和伏尔加河大桥。如果我的列车被敌人截获，那当然不会不对我们部队产生一定影响的。通往莫斯科的大路就会被打通。不过逮捕进行得很顺利。我在发布给军队的命令中，通报了关于把团长送交革命法庭一事。结果，该团并没有撤离阵地。团长仅仅被判入狱。

共产党员们不断向周围的人进行说服教育、宣传解释，并且以身作则。但是很清楚，单靠鼓动并不能转变部队的思想情绪，而且形势提供的时间也很有限。因此必须采取一些严厉措施。我发布了一项命令，用我的列车上的印刷机印刷，并发给全军。“我警告，凡部队擅自退却，首先枪毙该部队的政委，其次是司令。英勇善战的战士将提升到指挥的岗位上去。对懦夫、损人利己者和叛徒将严惩不贷。这一点我向全体红军保证。”

当然，转机不是一下子来临的。个别部队仍然无故退却，或者一遇到猛烈攻击就溃不成军。斯维亚日斯克处于危险状态。在伏尔加河上停了一艘为司令部准备的汽船。我的列车上有10名配备汽车的人员守卫着司令部和汽船码头之间的通道。第五集团军军事委员

会决定建议我迁到船上工作。这个措施本是合情合理的,但是我担心这样做将会对神经过敏的、对自己缺乏信心的军队产生不良影响。恰好这时候前线的局势急剧恶化。我们所依靠的生力军在政委和团长带领下撤离了前线,以武力劫持了汽船,带上装备上了船,打算开往下诺夫哥罗德。前线一片惊慌。大家都打量着河面。局势几乎无法挽回了。司令部仍留在原地,虽然敌人只距司令部一两公里,炮弹就在身边爆炸。我跟忠实的马尔金交换了意见。他率领 20 来个战斗队员,登上临时安排的炮艇,追上载着逃兵的汽船,用炮口对着他们,要他们投降。此时此刻,一切都取决于这一内部行动的结果。只要放一枪就足以招致灾难。逃兵没有抵抗,就投降了。汽船停泊在码头,逃兵们上了岸,我任命了战地法庭,它判处了团长、政委和几名士兵死刑。腐烂的伤口只能予以无情割除。我向全团谈了形势,什么也不隐瞒,也不减轻严重性。在士兵中间增添了一些共产党员。团队在新指挥官率领下以新的精神面貌回到了阵地。问题解决得如此迅速,敌人来不及利用这场动乱。

必须建立一支空军。我找来了航空工程师阿卡舍夫。他虽然信仰无政府主义,可是愿意和我们合作。阿卡舍夫很有首创精神,很快就建成了一支飞行中队。在空军协助下,我们终于获得了敌军阵地的情况。第五集团军指挥部摆脱了指挥上的盲目性。飞行员们每天对喀山城进行空袭。城里笼罩着一片惊慌。稍后,在攻克喀山以后,我得到了一批文件,其中有一本一个目睹喀山被围情景的资产阶级小姐写的日记,日记中描述了我们飞行员引起的混乱情景,同时掺杂着调情的韵事。生活并没有停止。几名捷克军官同俄国军官们争风吃醋。浪漫史起初发生在喀山的客厅里,后来在作为防空洞的地下室里慢慢发展,或者了结。

8月28日,白军进行了包抄。卡佩尔上校(后来成为著名的白卫将军)带领了一支精悍部队,在夜色掩护下潜入我们的后部,占领了最近的一个小站,破坏了铁路路基,掀倒了电线杆,在切断我们的退路之后,就向斯维亚日斯克发起了进攻。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在卡佩尔参谋部里还有萨文科夫。我们给打了个措手不及。为了不惊



扰不坚固的前线，我们只从那里撤下两三个连队。我的列车长再次动员了在列车和车站上他手边的一切力量，甚至连炊事员也动员起来了。我们有足够的步枪、机枪和手榴弹。列车小分队是由优秀战士组成的。离列车大约一俄里的地方有一条散兵线，战斗持续了大约8个小时，双方都有伤亡，最后敌人精疲力竭，只好撤退了。就在那时，外界与斯维亚日斯克的联系中断，莫斯科和整个战线都极为不安。许多支小队赶来增援。线路很快修复了。部队得到了充实。当时，喀山的报纸报道，说我被截断了退路，当了俘虏，被打死了，甚至说我乘飞机跑了，不过我的那条狗作为战利品被逮走了。后来这条忠实的狗在内战的各条战线上都被逮走过。它常常是条栗色猛犬，有时又是条圣伯纳狗。这样我受的损失就更小了，因为我压根就没有狗。

那是在斯维亚日斯克形势最危急的一个夜晚，凌晨3点我在巡视司令部时，在作战部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我向您预言，他要闹到当俘虏为止，断送自己，也断送我们。”我在门口停住，屋里面朝我背对地图坐着参谋部的两个很年轻的军官。说话人背着我，隔着桌子，俯身向着他们。一定是他发现交谈者的脸色突然变了，因此就猛然转过身来。这是布拉贡拉沃夫<sup>①</sup>，沙皇军队的陆军中尉，年轻的布尔什维克。他的脸上露出了恐惧和羞愧的神色。他身为政治委员，有责任鼓舞专家们的士气，而他却在危急关头煽动他们来反对我，实质上唆使他们逃跑，并在犯罪现场被我碰上了。我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和耳朵。布拉贡拉沃夫在1917年的表现算得上是个战斗的革命者。在十月变革时，他任彼得保罗要塞的政治委员，后来又参加肃清士官生的叛乱。在斯莫尔尼宫时期，我曾给他许多重要任务。他总是完成得很好。有一次我对列宁说：“这样的中尉会成为拿破仑的。他的姓也不错；Благо—правов 几乎同 Бона—парте（波拿巴）差不

<sup>①</sup> 格·伊·布拉贡拉沃夫（1896—1938年）——十月革命参加者，彼得格勒军事革命委员会委员，彼得保罗要塞政委。1918至1931年在全俄肃反委员会（后国家政治保卫总局）任职。1932至1934年任交通副人民委员。——译注

多<sup>①</sup>。”列宁起初对这一出乎意外的比喻笑了一笑，接着陷入了深思，颧骨显得更加突出，严肃地、几乎带着令人恐惧的语气说：“波拿巴分子我们对付得了，是吗？”我半开玩笑地说：“听上帝的安排。”当东线对穆拉维约夫的叛变尚蒙在鼓里的时候，我恰恰把这样一个布拉贡拉沃夫派了去。在克里姆林宫列宁接待室里，我向他交代了任务。他垂头丧气地回答：“全部问题在于，革命已经走下坡路了。”这是在1918年9月中旬。“难道你这么快地就泄气了？”我气愤地责问他。布拉贡拉沃夫振作起来了，改变了口气，并保证完成交给他的一切任务。这样我才放了心。现在正处在直接背叛边缘的危急时刻让我碰上了。我俩来到走廊里，以便避开军官们把事情说清楚。布拉贡拉沃夫浑身打颤，面色苍白，手托着帽子。“请别把我送交法庭，”他绝望地重复着这句话，“您如果派我去前线当兵，我一定将功折罪。”我的预言落空了：拿破仑的候选人竟然像只可怜虫一样站在我前面。于是我撤了他的职，把他调去干不太负责的工作。革命是一个巨大的吞噬人和消磨人的意志的怪物。它会把最勇敢的人引向毁灭，又会把不大坚强的人的灵魂摧毁。现在，布拉贡拉沃夫是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务委员会委员，现制度的支柱之一。早在斯维亚日斯克时，他就该对“不断革命”论抱敌对情绪了。

革命的命运就在斯维亚日斯克和喀山之间摇摆。没有退路，除非下伏尔加河。集团军革命委员会表示，由于担心我在斯维亚日斯克的安全问题，它的行动自由受到了束缚，因此坚决要求我迁到船上去。这是委员会的权力。我一开始就立了一条规矩，即我来到斯维亚日斯克决不应妨碍或限制军队的指挥。我在前线巡视期间一直遵守这条规矩。所以我服从了，搬到船上工作，但不是那艘专为我准备的客船，而是一艘驱逐舰。4艘小驱逐舰沿马林斯克运河系统，克服了重重困难，驶入了伏尔加河。几艘河轮这时已装备了火炮和机枪。拉斯科尔尼科夫率领的舰队打算在那天夜里进攻喀山。舰队必须通过有白军炮兵连防守的上乌斯隆。过了上乌斯隆河道拐了个弯，一

<sup>①</sup> 此处指字形相似。——译注

下子变得宽阔了。敌人的舰队就停泊在那里。河对岸就是喀山城。打算借夜色悄悄地越过上乌斯隆，摧毁敌人的舰队和两岸的炮兵连，向市区开炮。舰只排成单纵队关掉灯火，摸黑行驶。两个留着稀疏胡子的伏尔加河老领航员站在舰长旁边。他们是被追上船的，提心吊胆，恨我们，又咒骂自己的命运，浑身颤抖。现在一切都取决于他们。舰长时时提醒他们，如果他们使舰艇搁浅，将被就地枪决。我们刚刚驶近在黑暗中依稀可见的上乌斯隆，就听到一阵机枪扫射，仿佛有人用鞭子抽打着河面。接着山坡上也开炮了。我们仍然默不作声地朝前行驶。在我们背后有枪声还击。有几颗子弹散落在保护指挥台的半身高度的铁板上。我们只好蹲下身子。水手长投入了战斗，用他那敏锐的眼光盯着暗处，用压低的柔和的声音跟舰长互相呼应。一过上乌斯隆，我们立即进入了广阔的河区。在彼岸可以看到喀山的灯光。在我们背后响着密集的枪声，从上到下，从下而上。在我们右面不到 200 步的河道上停泊着凭借陡直的河岸作掩护的敌方舰队，黑压压的一大片。拉斯科尔尼科夫命令向敌舰开火。当我们驱逐舰上的大炮第一次发射时，金属的船体发出了怒吼和轰鸣。我们的舰艇颠簸地行驶，从它那钢铁的躯体内不断地痛苦地射出炮弹。熊熊的火焰顿时照亮了黑暗的夜空。这是我们的炮弹击中了装满石油的驳船。一把意想不到，不请自来，然而光彩夺目的火炬在伏尔加河上空燃起。现在我们开始向码头射击。能清楚地看到码头上的火炮，但是它们没有回击。看来炮手已逃之夭夭。整个河面照得通明。我们后面没有一艘舰艇。我们在孤军作战。显然敌人的炮火拦住了其余的舰艇。我们的驱逐舰暴露在明亮的水面上，犹如光亮的盘子里的一只苍蝇。现在我们受到上乌斯隆和码头上的交叉火力的袭击，真叫人不寒而栗。除此以外，我们的舰艇失去了控制。操纵链断了，可能被炮弹打坏的。我们试图用手来操纵船舵，但是船舵被断裂的链条缠得死死的，没法转动。只好关闭轮机。我们慢慢地漂到喀山岸边，船舷撞在一艘半沉的旧驳船上。这时射击完全停止了。四周亮如白昼，静如黑夜。我们陷入了捕鼠器。唯一使人难以理解的是，我们竟没有遭到攻击。我们对这次突袭所造成的破坏和惊恐

估计不足。最后年轻的指挥员们决定推离驳船，交替开动左右两个机器，调节驱逐舰的方向。这个办法成功了。油船还在燃烧。我们驶向上乌斯隆。谁也没有朝我们开枪。过了上乌斯隆，我们终于又进入黑暗之中。从机舱里抬出了一个处于昏迷中的水兵。驻扎在山头的炮兵连没有向我们发射一枪一炮。显然，他们没有发现我们。也许再没有人来监视我们了。我们得救了。这个词写起来极其简单；得救了。有人抽起烟来。我们的一艘临时调来的炮艇被击毁，它那烧焦的残骸令人痛心地搁在河岸上。我们发现另外几艘舰艇上也有几个伤员。这个时候我们才注意到，我们舰艇的头部被一颗3英寸的炮弹击穿了。已是黎明前的时刻，大家都感到自己好像获得了第二次生命。

事变一个接着一个。一个刚下飞机的飞行员给我带来了好消息。哥萨克人阿津指挥的第二集团军下面的一支部队从东北方向前来增援喀山。他们缴获了两辆装甲车、击毁了两门大炮，迫使敌人的一个小分队逃窜，占领了离喀山12俄里的两个村庄。飞行员立即带着指示和传单飞返原地。喀山处于夹击之中。据侦察报告，我们的那次夜袭挫伤了白军的抵抗力。敌人的舰队几乎全部被歼灭，岸上的大炮成了哑巴。伏尔加河上的“驱逐舰”这个词对白军的影响，就像后来在彼得格勒城下“坦克”这个词对年轻的红军所产生的影响一样。有一种流言说，德国人与布尔什维克一起作战。富裕阶层开始从喀山大量逃跑。工人区却振奋起来。火药厂闹起风潮。我们部队有了进攻精神。

在斯维亚日斯克的一个月中有着许多令人不安的插曲。每天都会遇到点事情。有时夜间也不比白天少。我亲临战争第一线还是第一次，这是一次小规模战争。我方参战的不超过2.5万至3万人。然而小规模战争与大规模战争的区别仅在于作战的规模上。它就像是战争的活的模型。正因为如此，我们就亲身感受到战争的波澜起伏和出人意料。小战争却是大学校。这时喀山城下的形势出现了意想不到的好转。杂牌部队变成了正规军。彼得格勒、莫斯科和其他地方的工人党员参加了进去。团队得到了充实和锻炼。在部队中，

政治委员被看作是革命的领袖和专政的直接的代表。法庭告诫大家，在革命的危急关头要求人们作出最大的牺牲。鼓动、组织、革命者的榜样以及惩罚措施互相配合，在短短的几星期里使部队发生了必不可少的转变。一批动摇的、不坚定的、分散的人群被改造成一支真正的军队。我们的炮兵明显地占了优势。我们的舰队控制了河面。我们的空军取得了制空权。我已经毫不怀疑，我们必将收回喀山。9月1日，我突然接到莫斯科来的密码电报：“速回。伊里奇受伤，伤势待查。局势平静。斯维尔德洛夫 1918年8月31日。”接到电报后，我立即启程。莫斯科广大党员的情绪忧郁，然而坚定。这种坚定性在斯维尔德洛夫身上得到充分体现。医生认为列宁没有生命危险，并担保他很快就会康复。我用东线即将取得胜利来使党放心，随即返回斯维亚日斯克。9月10日攻克喀山。两天后我们的邻军，第一集团军占领了辛比尔斯克。这并没有出乎意外。第一集团军司令图哈切夫斯基<sup>①</sup>在8月底保证，至迟在9月12日占领辛比尔斯克。他用电报通知我关于攻克该城的消息：“命令已执行，辛比尔斯克业已攻克。”此时列宁开始康复。他寄来了一份贺电。全线情况均趋向好转。

伊万·尼基季奇·斯米尔诺夫<sup>②</sup>成了第五集团军的主要领导人。这一事实具有巨大意义。斯米尔诺夫是个最完满、最彻底的革命者，三十多年以前他就加入了革命队伍，从不知道休息，也没有寻求过休息。在反动统治的最黑暗的年代里，斯米尔诺夫坚持地下活动。当地下活动遭到破坏时，他并不灰心丧气，而是从头做起。伊万·尼基季奇永远是个责任感很强的人。在这一点上，革命者与优秀的士兵是很接近的，正因为如此，革命者可以成为一名杰出的士

① 米·尼·图哈切夫斯基(1893—1937年)——苏联元帅。1918年起历任集团军司令、工农红军参谋长、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副国防人民委员等职。——译注

② 伊·尼·斯米尔诺夫(1881—1936年)——1899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十月革命后先后任西伯利亚革命委员会主席、党中央候补委员、邮电人民委员等职。——译注

兵。伊万·尼基季奇生性倔强，历来是勇敢和坚强的楷模，但并没有随之而来的那种严厉性。集团军里所有优秀的干部都向这一楷模看齐。拉丽莎·雷斯涅尔<sup>①</sup>在记述喀山围城的情况时写道：“谁也没有像伊万·尼基季奇那样受人尊敬，在最危急的时刻，大家感到他是最坚强、最勇敢的人。”斯米尔诺夫没有丝毫的书生气。他是最善交际、最乐观愉快、最机智风趣的人。虽然他的权威是无可争议的，但它丝毫也不外露，也不颐指气使，因此人们越加乐于服从他。第五集团军的共产党人都团结在斯米尔诺夫周围，形成一个特殊的政治大家庭，今天第五集团军解散已好几年，但这个大家庭在国家生活中仍在发挥作用。“第五集团军军人”在革命词典里具有特殊的意义；它意味着真正的革命者、有责任感的人，而首先是个纯粹的人。在国内战争结束后，第五集团军的军人们随伊万·尼基季奇把他们的全部的英雄主义转到经济工作中去，并且几乎毫无例外地都是反对派的成员。斯米尔诺夫领导过军事工业，然后任邮电人民委员。现在他被流放到高加索。在监狱和在西伯利亚，可以找到许多他的第五集团军的战友。

但革命是一个巨大的吞噬人和消磨人的意志的怪物。最近有消息说，连斯米尔诺夫这样的人也被斗垮了，他也在鼓吹投降了。

拉丽莎·雷斯涅尔称伊万·尼基季奇是“斯维亚日斯克的良心”，而她本人在第五集团军中也居重要地位，如同在整个革命中一样。这位年轻漂亮的女人像在革命夜空闪过的一颗灿烂的流星，曾使许多人眼花缭乱。她有奥林匹斯山女神般的美貌，又有机智的头脑和战上的大无畏精神。喀山被白军占领后，她曾化装为农妇，潜入敌营进行侦察。但是，她的外貌太不寻常了。她被捕了。一个日本侦察官对她进行了审讯。在审问的间隙，她悄悄地溜出了看守不严的大门，并隐蔽了起来。从此以后，她便从事侦察工作。后来她又上了军舰，参加了战斗。她写了一些关于国内战争的特写，这些特写将永远留在文学作品之中。她用同样鲜明的笔调描写了乌拉尔的工业和鲁尔工人的起义。她什么都想看到，什么都想了解，什么都想参

<sup>①</sup> 拉·米·雷斯涅尔(1895-1926) - 苏联女作家，1918年加入俄共。——译注

加。在短短的几年里，她成了一流的女作家。经过出生入死的战斗生活，这个革命的帕拉斯<sup>①</sup>突然在莫斯科平静的环境里染上了斑疹伤寒，还不满 30 岁就去世了。

干部经过了挑选，人们在炮火下一周内就学会了打仗，军队不断壮大。革命的最低潮——喀山陷落之时——现在已经成为过去。与此同时，农民中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白卫军教给了农民初步的政治知识。在以后的 7 个月中，红军夺取了拥有 4 000 万人口，近 100 万平方公里的土地。革命重新发动攻势了。白军在逃离喀山时，带走了自霜夫曼二月进攻时候起贮藏在那里的共和国黄金储备。隔了相当长一段时间，我们又重新把它夺了回来，同时还抓住了高尔察克<sup>②</sup>。

当我终于能够把注意力从斯维亚日斯克移向别处时，我才发现在欧洲已发生某些变化——德军已陷入绝境。

---

① 帕拉斯是古希腊神话中智慧和战争的女神，同时又是守护城市的女神。  
——译注

② 亚·瓦·高尔察克(1874—1920年)：一沙俄海军上将，苏俄国内战争中反革命头目之一，1918至1919年自封为“俄国最高执政”，后被枪决。——译注

## 第三十四章

# 专 列

现在应当谈谈那辆所谓的“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专列”。在革命最紧张的岁月里，我的个人生活是与这辆列车的命运休戚相关的。另一方面，列车又是跟红军的生死存亡紧紧相连的。列车把前线和后方连接在一起，就地解决刻不容缓的问题，对部队进行教育，发出号召，提供军需，进行惩罚和奖励。

没有惩罚就不可能建立军队。如果没有死刑，长官便不能指挥士兵去冲锋陷阵。只要那些为自己的技术而自豪的凶狠的没有尾巴的猴子，也就是人，要建立军队，要打仗，指挥官总要把士兵置于背水一战的地位，前进还有生的希望，后退则是死路一条。但是靠威吓还是建立不起军队的。沙皇军队之所以瓦解并不是因为惩罚得不够。克伦斯基企图以恢复死刑来挽救沙皇军队，可是结果却置之于死地。布尔什维克在大战的废墟上缔造了一支新的军队。对于一个稍懂得历史语言的人，这些事实是无需解释的。这支新型军队的强力胶合剂就是十月革命的思想。专列为前线提供了这种胶合剂。

在卡卢加省、沃罗涅日省或梁赞省，成千上万名青年农民起初不肯响应苏维埃的征兵号召。战争远离这些省份，登记工作做得不好，征兵工作没有认真进行。不应征者是逃兵。对不应征者展开了严肃的斗争。梁赞的兵役局就有 15 000 名这样的“逃兵”。我路过梁赞时打算去看看他们。有人劝我不要去：“可别出什么事”。但是一切进行得再好也没有了。把他们从临时帐篷里叫了出来：“逃兵同志们，去开群众大会，托洛茨基同志来看你们了。”他们像小学生一样，



怀着兴奋的好奇的心情，吵吵嚷嚷地跑了出来。我原先把他们想象得很坏，而他们也把我想象得很可怕。有几分钟时间我被这一群无拘无束，不讲纪律，但丝毫不怀敌意的弟兄们团团围了起来。“逃兵同志们”好奇地望着我，瞪得好像眼珠都要掉出来了。我登上院子里的讲台，向他们发表了约一个半小时的讲话。这是最好的听众。我竭力当场鼓起他们的劲来，最后，我号召他们举起手来，以表示对革命的忠诚。在我看来，他们受到了新思想的感染。他们真是激情满怀。他们送我上车，仔细地看着我，但是已经不感到害怕，而是异常兴奋，大声呼喊，怎么也不想离开我。我后来不无自豪地获悉，教育他们的重要手段是提醒他们：“你是怎么向托洛茨基保证的？”由梁赞的“逃兵”组成的团队后来在前线打得很勇敢。

我想起了敖德萨圣保罗实科中学的二年级。40个学生和别的学生没有什么差别。可是当前额上留有神秘的“X”形伤疤的比南特、班监迈耶尔·威廉、学监卡明斯基和校长什瓦涅巴赫使劲打击比较善于批评和勇敢的一批学生时，那些告密者、嫉妒成性的差生就马上抬起头来——他们领着全班跟自己走。

每一个团、每一个连都有各种各样的人。有觉悟的、有自我牺牲精神的是少数。另一头是极少数腐化分子、自私自利分子或自觉的敌人。居两者之间的则是犹豫不决、摇摆不定的占多数的中间人物。当优秀分子牺牲或遭到排挤，自私自利分子或敌人占上风的时候，部队就会瓦解。在此情况下，中间派就不知道跟谁走，而一旦出现危险，就会惊惶失措。1919年2月24日，我在莫斯科的圆柱大厅里对青年指挥人员说：“给我三千名逃兵，把他们编成一个团，我给它配上一名有斗志的团长、一名优秀的政治委员、合适的营长、连长、排长，那么这三千名逃兵在四个星期之内将在我们这个革命的国家里成为一个出色的团……”我补充说：“最近几个星期我们用纳尔瓦和普斯科夫战区的经验再次作了检验，在那里，我们成功地把散兵游勇训练成有战斗力的优秀部队。”

在两年半的时间里，除了比较短暂的间歇，我一直生活在以前供一位交通大臣使用的火车车厢里。车厢是从使大臣感到方便舒适角

度设计和装备的,但是对工作来说并不适用。我在这里接见中途前来报告的人,与地方的军政当局协商,审阅各种电文,口授命令和文章。我和同事们一起从这里出发乘小汽车巡视前线。我利用空余时间在车上口授了批判考茨基的专著<sup>①</sup>以及其他许多作品。在那些时间里,我似乎永远习惯了在普尔曼式车厢的板簧和铁轨的伴奏声中写作和思考问题。

我的专列是在1918年8月7至8日的夜间在莫斯科匆匆忙忙地组建起来的。第二天早晨,我乘专列前往斯维亚日斯克奔赴捷克斯洛伐克军叛乱的前线。列车以后不断地进行改装,使之复杂化,更加完善起来。在1918年,专列已经成为流动的管理机关。专列上设有下列几个部门:秘书处、印刷厂、电报站、无线电台、发电站、图书馆、汽车库和浴室。

列车太重,需要两个火车头才能拉动。只得把它分成两列。当局势迫使我们在那个战区作较长的逗留时,一台机车就担任通信联络工作。另一台也总是生着火。前线是不断变化的,因此不能轻率从事。

我手头没有专列的历史资料。它保存在军事部门档案馆的什么地方。当时,我的青年助手们曾认真地整理过这些资料。曾画了一张专列行车路线图供国内战争史展览用,据报纸报道,它吸引了许多参观者;后来这张路线图送给了国内战争博物馆。现在,这张图和其他反映国内战争重要时刻,以及同我有某种关系的千百件展品,如招贴画、传单、命令、战旗、照片、电影胶卷、书籍和讲话稿都被藏到偏僻的地方去了。

在1922至1924年期间,也就是在反对派被击溃以前,军事出版社出版了我的有关军队和国内战争的5卷本著作。<sup>②</sup>但这些著作并未谈及列车的历史。我现在只能根据列车上出版的报纸《路途报》所刊载的社论上所标示的部分地点再现当年列车的行车路线:萨马拉、

① 《恐怖主义与共产主义》,彼得格勒1920年版。——译注

② 《革命是怎样武装起来的》,莫斯科1923年版。——译注

车里雅宾斯克、维亚特卡、彼得格勒、巴拉绍夫、斯摩棱斯克，又是萨拉马拉、罗斯托夫、新切尔卡斯克、基辅、日托米尔等，当然还不止这些。我手头甚至没有关于专列在国内战争期间的总行程的准确数字。我的军事著作中有一个脚注，它是这么写的：列车开赴前线 36 次，总行程超过 105 000 公里。我以前的一个同行者这样写道，据他的记忆，我们 3 年内的行程等于绕地球 5 圈半，也就是说比上述数字多了一倍。这还不包括从铁路线乘汽车深入到前线所走的几万公里的路程。由于列车总是开往最危险的地点，因此地图标示出的行程图可以提供一幅相当准确的，同时又是十分形象的各条战线的相对重要性的图景。1920 年，即战争的最后一年，我外出巡视的行程最长。我到前线视察最多的是南方战线，这条战线总是一条最顽强、最危险和拉得最长的战线。

“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专列”在国内战争前线寻求什么呢？总的回答是清楚的：它在寻求胜利。但是它给前线提供了什么呢？它用的是什么样的工作方法？它不断地天南地北地往返行驶的直接目的是什么？这不单单是为了视察部队。不，专列的工作与军队的建设、教育、管理和供应工作有着最密切的联系。我们在重建军队，而且是在炮火下重建的。不仅在斯维亚日斯克如此，在这专列写下了自己第一个月的历程。在所有的战线都是如此。我们把游击队、从白军那里逃出来的士兵、从邻近的县里动员出来的农民、由工业中心派来的工人小分队，以及由一批共产党员和工会工作者在前线就地组编成连、营、团，甚至整个师。在战败和退却以后，惊惶失措、软弱无力的群众在两三个星期内就变成了有战斗力的部队。为此需要些什么呢？可以说很多，也可以说很少。要有一批优秀的指挥员、几十个有经验的战士、十来个有自我牺牲精神的共产党员，让赤脚的战士穿上靴子，要有澡堂，要开展有力的鼓动，要给吃的，给衬衣，给烟叶和火柴。列车就搞这些东西。我们总是储备着一些办事认真的共产党员，以填补空缺，一两百名优秀战士，还备有大批靴子、短皮外衣、药品、机枪、望远镜、地图、表以及各种各样的礼品。当然，列车所带的物资同军队的实际需要相比是微不足道的。但能得到不断的补充。

然而,更重要的是,这些物资曾数十次乃至数百次地起到了雪中送炭的作用。列车上的电报机不停地工作着。我们用直通电报同莫斯科保持联系,我的副手斯克良斯基记下我提出的为军,有时候是为师,甚至是为某个团提供军需品的要求。这些东西要得十分紧迫,如果没有我干预,那是无法实现的。当然这种做法不能说是正常的。书呆子会说,供应工作,如同一切军事工作一样,最重要的是建立一套制度。这是正确的。我本人倒也倾向于这种书呆子气。但问题在于,我们不想在严格的制度建立以前先完蛋。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当时,特别是在初期,用应急措施来代替一整套制度,以便在今后,在此基础上建立一整套制度。

我每次出行都有军队各主管部门,首先是军需部门的领导人员陪同。我们留用了旧军队的军需官员。他们企图用老办法工作,甚至用更荒谬的做法,因为条件比以前困难得多。在旅途中,许多旧专家不得不学习新的工作方法,新手则从生动的经验中学习。每当我巡视了师部和实地摸清了他们的需要之后,我就在司令部或餐车上召开有尽可能多的人出席的会议,包括地方党组织、苏维埃机关和工会代表。这样,我获得的情报不是虚假的,是不加粉饰的。不仅如此,会议还总是取得直接的实际结果。不管地方政权机关多么穷,他们总是能挤压一下,做点牺牲来支援部队。最重要的牺牲是派出许多共产党员来支援部队。从机关中抽调出十来名工作人员,他们当即被编入不稳定的团队。还会有供做衬衫和包脚布的布匹,做鞋底的皮革,外加100公斤的油脂。但是,地方的物资当然是不够的。会后,我通过直通电报向莫斯科发去准确的订货单,当然是在中央的物资储备的限度之内,于是部队便获得了它们急需的东西,而且是如期获得的。前线的指挥员和政治委员从列车的工作实践中学会了如何处理自己的各项工作:指挥、教育、供应和军法工作,不是从上面,从司令部角度,而是从下面,从连和排,从年轻的和无经验的新兵的角度去考虑问题。

这样,便逐步形成了方面军和集团军的多少能正常运行的集中的供应机关。但是光靠这些机关还满足不了,也不可能满足各方面

的需要。在战争期间，即使是最理想的机关也会有运转不灵的时候，特别是运动战期间，因为这种战争完全是建立在运动的基础上的，有时是在完全无法预见的方向运动。此外，还不应当忘记，我们是在缺乏后备的情况下进行战斗的。早在1919年，中央仓库已经空空如也。衬衫刚刚拔下缝衣针便立即运往前线。枪支弹药的供应情况糟透了，只靠图拉工厂的生产来满足当前的需要。没有总司令的签字，连一车厢弹药都不能运往前方。弹药和枪支的供应经常处于紧张状态，犹如绷紧的弦。有时候这根弦会突然绷断。那时候我们就会损兵折将，丧失土地。

如果我们不在各个领域里一而再，再而三地采取应急措施，战争对我们来说就会是不可思议的。专列便是这些应急措施的提出者，同时也是它们的调节者。我们一边推动前线以及与之邻近的后方的主动性，一边设法使这种主动性逐步注入到总体制的渠道中去。我不想再说，我们总是成功地做到这点，但是，正如国内战争的结局所表明的，我们获得了最主要的东西，那就是胜利。

特别重要的是，到那些指挥人员的背叛有时引起惨重的动荡的战区进行视察。1918年8月23日，在喀山战役处于最危急的日子里，我收到了列宁和斯维尔德洛夫发来的密电：

“斯维亚日斯克 托洛茨基收

萨拉托夫前线发生叛乱，虽已及时发现，但仍引起极端危险的动摇。我们认为，您务必立即前往，因为您在前线的出现将对战士和全军产生影响。去其他战线视察之事另议。请用密电回复并告知您的启程日期。

列宁、斯维尔德洛夫

1918年8月22日 第80号”

我认为，我根本不能离开斯维亚日斯克，因为列车一离开，这个本来已面临重重困难的喀山前线就会根本动摇。从各方面看，喀山都比萨拉托夫重要。列宁和斯维尔德洛夫很快就同意了我的意见。我等到喀山收复后才去萨拉托夫。以后列车在行驶途中也经常收到这类电报。基辅和维亚特卡，西伯利亚和克里木都来告急，轮流或同

时要求我们的列车火速前往救援。

战争在我国的边缘地区,而且常常在最偏僻的地区进行,战线绵延 8 000 公里。有些团和师一连几个月同整个世界失去联系。因此它们染上了绝望的情绪。有时它们连供内部需要的电话机也没有。列车对它们来说是来自另一个世界的信使。我们总是带了一批电话机和电线。在一节专用通讯车厢上我们安装了天线,这样我们在途中可以接收到埃菲尔铁塔电台、璜恩电台等总数达 13 个电台发出的电讯,当然,首先是莫斯科电台的电讯。列车总是了解世界上发生的一切事情。我们把最重要的电讯刊登在列车报上,并在文章、传单和命令中加以评论。卡普的盲动、内部的阴谋活动、英国的大选、谷物的征购情况或者意大利法西斯的勾当都及时作了报道,并且把这些事件同阿斯特拉罕或阿尔汉格尔斯克前线的命运联系起来。这些文章同时通过直通线路发往莫斯科,再从那里通过无线电发给全国的报刊。列车的到达使那些与世隔绝的军队同全军联系上了,使他们同全国和全世界生活在一起。令人不安的谣言和疑虑消除了,人们的情绪安定下来了。这样鼓起来的劲可以维持几个星期,有时可以保持到列车第二次到来。其间,方面军或集团军的革命军事委员会成员也进行视察,只不过规模比较小一点罢了。

我在列车上的全部工作,无论是写作还是其他工作,如果没有速记员格拉兹曼、谢尔穆克斯和较年轻的助手涅恰耶夫的协助是无法进行的。他们在行驶着的火车上日以继夜地工作着,在火热的战争中,列车不顾安全规章,沿着被破坏的枕木以每小时 70 公里,甚至更高的速度行驶,使挂在车厢的地图像秋千一样来回摆动。我常常惊异而又感激地注视着助手的工作,尽管列车不停地震动和摇晃,但是仍然能打出很精美的文件。半小时后,当他们把打印好的文稿交给我时,无需作任何修改。这不是寻常的工作,这是一种业绩。格拉兹曼和谢尔穆克斯为自己献身革命的精神而付出惨重的代价:格拉兹曼在斯大林分子逼迫下自尽,谢尔穆克斯被囚禁在西伯利亚的荒野。

列车上还有一个大汽车库,存有若干辆汽车,一个油罐车。这就使我们能够驶离铁路线,去几百俄里以外的地方视察。约有 20 至

30名精锐的狙击手和机枪手，乘坐载重汽车和轻便车随行。在我的汽车里也配备有两名轻机枪手。运动战常常会遇到各种意外。在草原上，我们常常有碰上哥萨克的骑兵侦察班的危险。架有机枪的汽车是很可靠的保护措施，至少在草原变成一片泥泞之前是如此。1919年秋有一天，我们在沃罗涅日省不得不以每小时3公里的速度行驶。汽车深深地陷进了泥泞的黑土里。30个人每次都要从车上跳下来，用肩膀去推车。有一次我们过一条浅河，在河中心陷住了。我火了，责怪汽车的质量太差，可是我的那位出色的司机，一个名叫皮尤维的爱沙尼亚人，却认为这是世界上质量最好的汽车之一。他转过身子，举手向我敬了个礼，用蹩脚的俄语向我报告：“斗胆报告，工程师们没有预见到我们会乘此车过河。”尽管行动不便，可我想拥抱他，因为他说的俏皮话还真有道理。

专列不仅是军事指挥机关和政治机关，而且也是个战斗机关。从它的许多特点来看，与其说是一个流动司令部，不如说是一列装甲列车。事实上它也是有装甲的，至少机车和车厢配备有机枪。列车上的所有工作人员都会使用武器。大家都穿着皮制服，这使他们显得更庄严威武。大家的左袖上佩戴着造币厂精心制作的金属大徽章，这种徽章在军队里极有声望。各车厢间用内部电话和信号装置联系。为了使大家在旅途中保持警惕，白天、黑夜经常发出警报。必要时武装小分队就跳下列车，进行“登陆”作战。每当穿着皮制服的小分队在危险地点出现，总会产生惊人的效果。只要感到专列就在离火线几公里地方，甚至连那些情绪最不稳定的部队，首先是其指挥人员，都会竭尽全力支持下去。在这种不稳定的天平上，只要稍稍加点砝码就能解决问题。在两年中的时间里，列车和它的小分队如果说不是数百次，至少也有数十次地起到了这种砝码的作用。当“陆战队”返回时，我们常常会发现少了些人。专列总共伤亡约15人，其中不包括加入野战部队，因而已处于我们的视野之外的人。例如，从专列上抽调一个小分队去参加以列宁命名的模范装甲列车，另一个小分队又被抽调去补充彼得格勒近郊的野战部队。专列因参加反对尤登尼奇战役有功，曾集体荣获红旗勋章。

有时列车也会被切断同外界的联系，遭到炮击和空袭。无怪乎在外面流传着关于它的种种神话，其中有的是根据已经获得的胜利编出来的，有的则纯属虚构。有多少次师长、旅长，甚至团长要求我在他们的司令部里多坐半个小时，或者要求跟他们一起驱车或骑马到遥远的战区去视察，甚至要求我们列车派几个人带着弹药和慰问品到那里去，为的是把列车到达前线的消息传遍四面八方。指挥员们说：“这可以起一个后备师的作用。”列车到达的消息当然也会传到敌人的队伍里。在那里，把神秘的列车描写得比实际的要可怕得多。这只是增强了列车的精神威力。

列车受到敌人的憎恨，我们为此感到自豪。社会革命党人曾多次企图破坏列车。在对社会革命党人的审判案中，谢苗诺夫详细供认了这个阴谋。此人是刺杀沃洛达斯基<sup>①</sup>和暗杀列宁的组织者，并且参与策划破坏列车。其实，此事并没有多大困难。但是这时社会革命党人在政治上已经削弱，对自己已经丧失了信心，对青年人也没有多大影响力了。

在一次巡视南方途中，列车在哥尔克站颠覆。夜里，我被抛了出去，我感受到一种在地震时才会有的那种恐怖；立足之地没有了，无所依靠。我在半睡半醒中紧紧地抓住床沿。那习惯的车轮转动的隆隆声立即停止了。车厢倒向一侧，动弹不得。在寂静的黑夜中，传来的只是孤独的、微弱的呻吟声。沉重的车厢门也被震歪，怎么也打不开，无法出去。周围没有一个人影，这使我惊慌起来。是不是遇到了敌人？于是我手持手枪跳出了窗口，迎面碰到了一个提着信号灯的人。他是列车长，他无法走到我跟前来。车厢倒在一个斜坡上，3个轮子深深陷在路基里，另外3个则离开铁轨悬在空中。车厢的前后都撞坏了。前面的铁栅栏把一个哨兵紧压在下面。呻吟声就是他发出的，像一个孩子的哭声，在黑暗中传向四方。要把它从铁栅栏下救

<sup>①</sup> 弗·沃洛达斯基(1891—1918年)，俄国革命活动家，十月革命的参加者。后任彼得格勒出版、宣传、鼓动事务委员，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被社会革命党人杀害。——译者注



出来可不是易事。令人吃惊的是，哨兵被救出来后，发现他只有一点表皮伤，受了一点惊吓。总共有 8 节车厢被毁。起列车俱乐部作用的餐车成了一堆碎片。等着换岗的人曾在那里看书或下棋。但是他们所有的人恰好在半夜里，在出事前 10 分钟离开了俱乐部。装有书籍、制服和慰问品的货车也受到惨重的损失。但没有人受重伤。原因显然是扳错了道岔。这是由于粗枝大叶，还是故意破坏，一直没有查明。幸好我们通过车站时的时速为 30 公里。

遇上饥荒、瘟疫、开展宣传、鼓动或召开国际会议时，专列的小分队还要完成许多附带任务。列车还要支援乡镇和儿童之家。列车上的党支部办了一份《警卫报》。报上报道了不少战斗故事和奇遇。遗憾的是，这份杂志如同其他许多杂志一样没有保存在我现在的随身档案内。

当准备向盘踞在克里木的弗兰格尔<sup>①</sup>发动进攻时，我曾在 1920 年 10 月 27 日给《路途报》写过一篇文章：

“我们的列车又奔赴前线了。”

在 1918 年为争夺伏尔加河的艰难的几个星期里，我们列车的战士们曾在喀山城下英勇奋战。这场战斗早已结束了。今天苏维埃政权正向太平洋伸展。

我们列车的战士曾在彼得格勒城下浴血奋战……彼得格勒终于保存下来，近年来有不少世界无产阶级的代表来彼得格勒访问。

我们的列车曾不止一次地奔赴西方战线。现在我们已同波兰签订了一个初步的和约。

当克拉斯诺夫，尔后邓尼金从南方向苏维埃俄国猖狂进攻的时候，我们列车的战士曾转战于顿河草原上。克拉斯诺夫和邓尼金的天下早已一去不复返了。

---

① 彼·尼·弗兰格尔(1878--1928年)——沙俄将军，男爵。1918至1919年在邓尼金的志愿军和南俄军队中任职。1920年在克里木任“南俄武装力量”总司令。1920年侨居国外。——译注

现在只剩下克里木了，法国政府把它当作自己的堡垒。这个法国堡垒的卫戍部队是一个受雇用的德裔俄国将军弗兰格尔男爵指挥的。

我们的列车像一个和睦的家庭再次出征。但愿这是最后一次征战。”

克里木之役的确是国内战争中的最后一个战役。几个月以后专列解散了。在此，我向我的全体老战友致以亲切的问候！

## 第三十五章

# 保卫彼得格勒

战斗在苏维埃共和国各条革命战线上的共有 16 个集团军。伟大的法国革命差不多也有这么多军队：14 个集团军。这 16 个苏维埃集团军都各有其短暂，然而光辉的历史。只要一提起某个集团军，便立即会联想起几十个无与伦比的故事。每个集团军都有自己鲜明、光辉的面貌，虽然也是变幻无常的。

守卫在彼得格勒西面防线的是第七集团军。长期驻守一地，对部队产生了不良影响，警惕性削弱了。从集团军里抽调了一批优秀的工作人员和一些部队，去支援战斗更加激烈的其他战区。一支革命军队需要不断地灌输革命热情，而长期按兵不动经常会导致失败，甚至灾难。这一次的情况也是如此。

1919 年 6 月，芬兰湾上一个很重要的“红山”炮台被白军的一支部队占领了。几天后，这个炮台又被红海军收复。当时发现是第七集团军的参谋长柳德维斯特上校把全部情报直接泄露给了白军。还有几个阴谋分子同他串通一气。这样就动摇了第七集团军。

7 月，尤登尼奇<sup>①</sup>将军被任命为白军的西北集团军总司令，高尔察克委任他为白军的代表。8 月，在英国和爱沙尼亚的协助下，建立了俄国的“西北”政府。芬兰湾上的英国海军答应给尤登尼奇以支持。

---

① 尼·尼·尤登尼奇(1862—1933年)——沙俄将军，国内战争中反革命首领之一。1917年任高加索方面军总司令。1919年任白卫军的西北军总司令。1919年10至11月进犯彼得格勒失败后，于1920年流亡国外。——译注

尤登尼奇趁我们处于极端困难之机，发动了进攻。当时邓尼金占领了奥廖尔，并威胁着军事工业的中心——图拉城。那里离莫斯科已很近。南方吸引了我们的全部注意力。来自西线的当头一棒使第七集团军失去了平衡。它几乎未经抵抗就丢盔弃甲，节节败退。彼得格勒的领导人，首先是季诺维也夫，向列宁报告说，敌人在武装上占了优势，他们有自动步枪、坦克、飞机，侧翼还有英国的浅水重炮舰，等等。列宁得出结论，我们只有用暴露和削弱其他战线，首先是南方战线作为代价才能有效地抵抗拥有最新技术装备，由军官组成的尤登尼奇的军队。但是这样做是不可能的。照他的看法只有一条出路：即放弃彼得格勒，缩短战线。当列宁断定这种苦痛的截肢手术非做不可之后，就开始把其他人拉到自己这一边来。

我从南方回到莫斯科后，坚决反对这个计划。尤登尼奇和他的主子不会满足于占领彼得格勒，他们想和邓尼金会师莫斯科。在彼得格勒，尤登尼奇会得到丰富的工业资源和人力。况且，在彼得格勒和莫斯科之间没有可靠的屏障。由此我得出结论：应当不惜一切代价，捍卫彼得格勒。我的观点得到了支持，当然，首先得到了彼得格勒人的支持。当时的政治局委员克利斯廷斯基赞成我的意见。仿佛斯大林也同意我的意见。在一昼夜内，我向列宁发动了数次进攻。他最后说：“好吧，那就让我们试试吧。”10月15日，政治局通过了我提出的关于前线形势的决议案，其中写道：“鉴于存在严重的军事危险，必须把苏维埃俄国真正变成军营。必须为军事的目的，通过党和工会组织，对党员、苏维埃工作人员、工会工作人员进行逐个登记。”接着列举了一系列具体措施。关于彼得格勒，决议规定“不撤离”。同日，我向国防委员会递交了一份决议草案，内容是：“誓死保卫彼得格勒，决不放弃一寸土地，并准备在市内展开巷战。”我深信，只要进行有力的、有组织的街头抵抗，25 000名白军即使能够进入有百万人口的城市，也必然全军覆灭。与此同时，我认为，为了防备爱沙尼亚和芬兰的进攻，必须拟订一个把军队和工人向南方撤退的计划。这是拯救彼得格勒的工人精华，使其免被完全歼灭的唯一办法。

16日，我抵达彼得格勒。翌日，我收到了列宁的信：

“1919年10月17日。托洛茨基同志：昨夜……通过一项国防委员会决定，并且已用密码拍发给您（……）。您可以看得出来，您的计划已被采纳。但彼得格勒工人撤退到南方一事当然未遭否决（据说这个问题您向克拉辛和李可夫详谈过）；过早谈论此事会影响把斗争进行到底。如敌军试图迂回，切断与彼得格勒的联系，那显然要作相应改变，由您在当地酌情处置……附上国防委员会委托我写的告民众书<sup>①</sup>。仓促而就，写得不好。最好把我的署名放在您的署名下面。敬礼！

列宁”<sup>②</sup>

我觉得，这封信十分清楚地说明，我和列宁之间存在的极为尖锐的一时分歧（这在涉及面如此广的工作中是难免的），是如何在实践中得到克服的，它对我们的个人关系和共事没有留下任何痕迹。我不禁想到，假如在1919年10月，不是列宁反对我，而是我反对列宁，坚持放弃彼得格勒的思想，那么今天就会有大量的著作，用世界上各种语言，来揭露这种招致毁灭的“托洛茨基主义”。

1918年间，协约国把国内战争强加在我们身上，据说是为了打败威廉。可是现在已是1919年，德国早已被击败。然而协约国继续花费数亿金钱在一个革命的国家里制造死亡、饥荒和瘟疫。尤登尼奇是靠英国和法国豢养的一个雇佣兵队长。尤登尼奇背后有爱沙尼亚做靠山，左侧有芬兰作掩护。协约国要求这两个因革命而获得解放的国家帮助宰割俄国。在赫尔辛福斯和累瓦尔<sup>③</sup>进行着无休止的谈判，平时时而倾向这头，时而倾向那头。我们不安地注视着这两个对彼得格勒形成威胁的钳形攻势的小国。

9月1日，我在《真理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意在警告敌人：“目前调往彼得格勒战线的师团中，巴什基尔的骑兵不是无足轻重的，一旦芬兰的资产阶级企图入侵彼得格勒，红色的巴什基尔人将在向赫

① 指《告彼得格勒工人和红军战士》，见《列宁全集》第37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22—223页。——译注

② 《列宁全集》第49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13页。——译注

③ 累瓦尔，苏联时期改名为塔林。——译注

尔辛福斯进军的口号下投入战斗！”

巴什基尔的骑兵师是不久前才建立起来的。一开始，我就想把它调到彼得格勒驻守几个月，让草原居民能够在城市的文明环境里生活一段时间，接触一下工人，看看俱乐部、剧院，参加一些群众大会。现在又增添了一个新的、更为紧迫的考虑，即用巴什基尔人入侵的幽灵去吓唬芬兰资产阶级。

可是，由于尤登尼奇进展迅速，我们的警告就显得无足轻重了。10月13日，他占领了卢加，16日占领了红谢洛和加契纳，直逼彼得格勒，准备切断连接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的铁路线。在发动进攻的第十天，尤登尼奇已进入皇村（儿童村）。他的骑兵侦察队已经可以从高处看到圣以撒大教堂的金圆顶了。

芬兰的无线电报赶在事情发生之前，抢先报道说，尤登尼奇部队已经占领了彼得格勒。协约国驻赫尔辛福斯的使节都向本国政府正式报告了这条消息。整个欧洲，甚至全世界都在流传红色彼得格勒沦陷的消息。一家瑞典报纸大谈“彼得格勒热的世界周”。

芬兰统治集团特别来劲。不仅军界，而且还有政府都主张进行干预。谁也不想放过这块肥肉。芬兰的社会民主党自然答应严守“中立”。一位历史学家写道：“干涉的问题现在已经只是从财政观点进行讨论了。”只要筹集5000万法郎的保证金就行了一这就是协约国交易所里所开出的彼得格勒鲜血的价格。

爱沙尼亚问题同样是个引人注目的问题。10月17日，我写信给列宁说：“如果我们保住了彼得格勒（但愿如此），我们就有可能彻底消灭尤登尼奇。困难在于尤登尼奇在爱沙尼亚有避难权。需要使爱沙尼亚能守住自己的国境，防止其入侵。否则，我们应当保留进入爱沙尼亚追击尤登尼奇的权利。”这个建议在我们的部队赶走尤登尼奇以后被采纳了。但是追赶并没有立即取得成功。

在彼得格勒，我看到人们张惶失措。一切都是慢吞吞的。部队节节败退，溃不成军。指挥人员看共产党员，共产党员看季诺维也夫。季诺维也夫是张惶失措的中心。斯维尔德洛夫对我说过：“季诺维也夫就是惊惶失措。”而斯维尔德洛夫是很了解人的。事情确实如

此，在顺利的时候，用列宁的话来说“在没什么可害怕”的时候，季诺维也夫很容易趾高气扬。而当事情不顺利的时候，季诺维也夫通常躺在沙发上叹息，这是事实，而不是比喻。从1917年起，我可断定，季诺维也夫没有过中间情绪，要么趾高气扬，要么躺在沙发上。这次我碰到他正躺在沙发上。他周围也有一些勇敢的人，如拉舍维奇<sup>①</sup>。但是他们也无所作为。人人都有这种感觉，处处都受到这种情绪的影响。我从斯莫尔尼宫打电话，向军用车库订了一辆汽车。可是汽车没有准时到达。从调度员的声音中，我感觉到一种冷漠、绝望和必定灭亡的情绪控制了行政机关下层工作人员。非采取断然措施不可了，因为敌人就在大门口。同往常一样，在这种情况下，我就依靠我的列车小分队。这些人在最困难的情况下是可以指望的。他们进行检查督促，施加压力，建立联系，并取代那些不称职的人，填空补缺。由于官方机关没有人，我就走出办公室下到基层去，到党的区一级组织，到工厂和兵营去。人们预料到城市会很快地让给白军，因此谁也不敢过分地抛头露面。但是，一旦下面感到，彼得格勒不会放弃，必要时将在市内，在街道，在广场上来保卫它，大家的情绪就立刻改变了。最勇敢和奋不顾身的人抬起了头。一队队男女工人扛起洋镐铁锹走出工厂。那时彼得格勒工人的气色不佳，营养不良，面有菜色，衣衫槛楼，靴子裂口，鞋袜不全。“同志们，我们决不放弃彼得格勒！”“决不放弃！”妇女们的眼睛尤其闪耀着炽烈的火焰。母亲、妻子、女儿不愿意离开他们的并不温暖，但还可以御寒的住所。“决不放弃。”妇女们用尖厉的声音回答说，手紧紧地握着铁锹，就像紧握枪杆一样。不少妇女会使用真正的步枪或者守在机枪旁。全市分为几个区，由工人司令部领导。最重要的场所都布下铁丝网。选了一些地方作为炮兵阵地，并事先确定好射程。在广场和重要的十字路口部署了60多门大炮，上面盖上伪装物。运河、街头、公园、围墙、栅栏和

① 米·米·拉舍维奇(1884-1928年)——1917年任彼得格勒军事革命委员会委员。曾任西伯利亚军区司令、西伯利亚革命委员会主席，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等职。——译注

房屋周围都构筑了工事。城郊和涅瓦河两岸挖了壕沟。城市的整个南部地区变成了堡垒。许多街道和广场修筑了街垒。从工人住宅区到药房、后勤机关和作战部队都呈现出一派新气象。

尤登尼奇已距彼得格勒 10 到 15 公里。这就是我两年前去过的普尔科沃高地，当时革命刚刚取得胜利，正在跟克伦斯基和克拉斯诺夫部队进行殊死的斗争，以求自身的生存。现在彼得格勒的命运又处于千钧一发之际。因此应当无论如何立即摧毁退缩的风气。

10 月 18 日，我下了一道命令，要求“不许谎报军情，不许把一片惊慌失措的地方说成是进行残酷战斗的地方。谎报军情者以背叛罪论处。军事上允许犯错误，但不允许撒谎、欺骗和自欺欺人。”像每次遇到困难时那样，我认为首先必须向军队和国家揭示严酷的事实真相。于是我把发生在当天的愚蠢的退却行为公布于众。“步兵团的一个连因其侧翼受到敌人散兵线的威胁而感到不安。团长下令撤退。全团跑步 8 至 10 俄里，退到了亚历山德罗夫卡。后来查明侧翼驻扎的是我们自己的部队……不过这个向后猛退的团毕竟还不是这样坏。一旦他们恢复了自信，他们便立刻往回跑，有时大踏步前进，有时跑步，尽管天气寒冷，还是满身大汗，一小时行军 8 俄里，击退了为数不多的敌人，占领了原来的阵地，只受了一点小小的损失。”

在这段小小的插曲中，我不得不第一次，也是在整个战争期间唯一的一次扮演了团长的角色。当撤退的散兵线逼近驻扎在亚历山德罗夫卡师指挥部时，我就立刻骑上身边的战马，指挥部队往回开。在最初几分钟里，真是一片混乱，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明白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一些人还在继续后撤。但是我骑在马上，让他们一个一个向后转。当时只有我发现，我的传令兵科兹洛夫，一个莫斯科郊区农民出身的老兵跟在我后面跑。他完全陶醉了。他手握左轮手枪，一面追赶着部队，一面向大家重复着我的号召，手里挥动着手枪，使劲地大声喊叫：“小伙子们，别畏缩，托洛茨基同志在指挥你们”……现在前进的速度如同以前退却的速度一样。没有一个红军战士落下来的。走了大约 2 俄里，开始听到微弱的子弹呼啸声，有人受伤害倒下了。团长变得认不出来了。他出现在最危险的地段，等到以前放弃



的阵地收复，团长的双腿已经受伤。我搭乘一辆卡车返回司令部。我们沿路收容了一些伤员。部队有了动力，我深深感到，我们一定能够保卫住彼得格勒。

在此，我应当谈一下读者可能已经多次产生过的问题，一个领导全军工作的人，是否有权亲临战斗，去冒生命危险？我的回答是，无论平时，还是战时，都没有绝对不变的行动准则。一切取决于具体情况。随同我到前线视察的军官曾不止一次地说过：“从前即使一个师长也不会到这种地方来视察的。”资产阶级新闻记者说我这是“做广告式的宣传”，这些人总是用他们熟悉的语言去描述超越他们常识范围的东西。

实际上，红军产生的条件、军事人员的选拔以及国内战争的性质本身都要求我们这样行事。纪律、战斗素养和军事权威等，一切都要从头建立起来。以前，特别在初期，我们没有力量由一个中心按照计划供给部队一切必需品，现在我同样不能够借助通告或半匿名的宣言，用革命的激情去感染这支在炮火下建立起来的军队。现在必须在战士的心目里树立起这样的权威，这样明天上级长官提出的严格要求在他们眼里才有说服力。在没有传统的地区，需要有鲜明的榜样。个人冒点风险是在通往胜利的道路上必须支付的附加费……

对打了败仗的指挥人员需要整顿、休整和更新。政治委员则需要作更大的调整。派共产党员从内部去加强各支部队。还调来一些主力军。前沿阵地上部署了军校学生。工作松弛的供应机关在两三天内振作起来了。红军战士吃得饱饱地，换了新衣服和新靴子，听完报告之后，士气大振，精神面貌焕然一新，完全成了另外一个人。

10月21日是决定性的一天。我们的部队搬到普尔科沃高地。如果再从这里退却，这就意味着战斗将在市区进行。在这以前，白军在进攻中遭到的抵抗是微弱的。21日我军在普尔科沃一线设防固守，给予反击。敌军的进攻中止了。22日红军转入反攻。尤登尼奇调来了后部部队，密集防守。战斗十分残酷。22日傍晚，我们收复了儿童村和巴甫洛夫斯克。与此同时，邻近的第十五集团军开始从南面进逼，对白军的后方和右翼构成越来越严重的威胁。战局出现

了转机。我们的部队曾被敌人的进攻打得措手不及，并被累遭挫折所激怒，现在它以不怕牺牲的英雄主义的精神与敌人较量。伤亡是惨重的。白军指挥部断言，我方伤亡更大。这很有可能，因为他们有比较丰富的经验和更多的武器。我们的优势则是不怕牺牲。青年工人和农民，莫斯科和彼得格勒的军校生都具有献身精神。他们顶着机枪的扫射冲锋，手持左轮去打坦克。白军司令部把这叫做红军的“疯狂的勇敢”。

前些日子几乎没有抓到俘虏，白军的倒戈分子也很少。而现在倒戈分子和俘虏骤然增加。考虑到战斗的残酷性，我在10月24日发布了一道命令：“凡伤害放下武器的俘虏或倒戈分子者，将予严惩！”

我军继续挺进。无论是爱沙尼亚人，还是芬兰人已不再想干预了。被击溃的白军在两周内已溃不成军，退到了爱沙尼亚边境。爱沙尼亚政府解除了他们的武装。无论是伦敦，还是巴黎，都把他们忘了。昨天还是协约国的“西北军”，如今毁于饥寒之中。后来有14 000名伤寒患者被送进了医院。“彼得格勒热的世界周”就此收场。

白军头目后来都纷纷埋怨英国海军上将科范，说他违背诺言，没有从芬兰湾方向向他们提供足够的援助。这些怨言至少是言过其实的。我们的三艘驱逐舰在一次夜航中被水雷炸沉，550名青年水兵葬身海底。无论如何这应归功于这位英国海军上将。那天我向陆海军发出的悼念会中说：

“红军战士们！你们在各条战线上都遇到了英国的阴谋破坏。反革命军队用英国的大炮来杀害你们。在申库尔斯克、奥涅加、南方战线和西方战线的仓库里，你们可以发现英国生产的军需物资。你们抓获的俘虏穿的是英国制服。阿尔汉格勒和阿斯特拉罕的妇女和儿童被英国飞行员用英国炸弹杀害和致残。英国战舰还炮轰我们的海岸……”

“但是，即使今天，我们同英国雇佣军尤登尼奇进行浴血奋战的时刻，我要求你们永远也不要忘记，世界上有两个英国。除了这个唯

利是图、强权统治、贪污腐化、嗜血成性的英国外，还存在着一个勤劳勇敢、心灵高尚、具有国际团结伟大理想的英国。同我们打仗的是交易所的英国、卑鄙可耻的英国。支持我们的是劳动人民的英国。”（见1919年10月24日给陆海军将士第159号命令）

对于我们来说，进行社会民主主义教育同战斗任务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而那些在战火中进入大脑的思想是牢固的，将永远地保存在头脑之中。

※ ※ ※

在莎士比亚的戏剧里，悲剧和喜剧总是交替出现的，同样道理，在人类的生活中，伟大高尚往往是同渺小卑劣混杂相间的。

季诺维也夫此时已经从沙发上起来，稍许打起点精神，他代表共产国际授予我一份证书：

“保卫住红色的彼得格勒意味着你们为世界无产阶级，从而也为共产国际建立了不可估量的功绩。在保卫彼得格勒的斗争中，起首要作用的当然是您，亲爱的托洛茨基同志。我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名义向您赠送锦旗，并请您把这些锦旗授予在您领导下的那些功勋卓著的红军部队。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 格·季诺维也夫。”

此外，我还得到彼得格勒苏维埃、工会以及其他组织发给的此类证书。我把锦旗发给团队，把证书交给秘书存档。直到后来季诺维也夫改唱另一种调子，这些东西才被清除掉。

现在很难重现，甚至很难回忆起人们当年为彼得格勒的胜利而表现出来的那种欣喜若狂的情景。当时适逢南方战线也开始取得决定性的胜利。革命又重新扬眉吐气。在列宁眼中，战胜尤登尼奇有更重要的意义，因为在10月中旬，他曾认为这几乎是不可能的。政治局决定授予我红旗勋章，以表彰我在保卫彼得格勒中的功绩。这个决定使我非常为难。对于颁发革命勋章的问题，我不无犹豫，因为前不久我们才废除了旧制度的勋章。我想通过颁发勋章来推动那些革命责任感还不够强的人。列宁赞成我的意见。勋章就此流行起来。勋章是发给那些在炮火下直接建立战功的人，至少在那些年代

里是如此。而现在把勋章授予我。我不能拒绝，否则就意味着轻视这种我常常授予别人的代表荣誉的东西。我无可奈何，只好服从这种规定。

在此，我又想起一件事后才明白其真实含义的小插曲。在政治局会议结束时，加米涅夫不好意思地提出了授予斯大林勋章的建议。“理由是什么？”加里宁带着真诚的气愤问道。“我不理解，为什么要授予斯大林勋章？”大家用开玩笑的方式使他安静了下来，并且通过了加米涅夫的建议。布哈林在休息时冲着加里宁说：“你怎么会不理解呢？这是列宁的主意；斯大林这个人，别人有的东西，如果他没有，他是不能活下去的。他不会原谅这点的。”我完全理解列宁，心里同意他的主张。

授奖仪式十分隆重，是在大剧院举行的，我在苏维埃领导机关联席会议上作了军事形势的报告。大会快结束时，主席叫到斯大林的名字，我试图鼓掌。可是响应者寥寥无几，只有两三下鼓掌声。整个大厅冷冷清清，人们困惑莫解，与先前的欢呼场面形成鲜明的对照。斯大林本人很明智地没有出席会议。

使我感到格外高兴的是，我的专列集体荣获红旗勋章。在11月4日颁发的命令中写道：“我们列车的工作人员从10月17日至11月3日参加了第七集团军的英勇斗争。克里格尔、伊凡诺夫和查斯塔尔三位同志在战斗中牺牲。普列杰、德劳金、普林、切尔尼亚夫采夫、库普里耶维奇和捷斯涅克等同志负了伤。阿达姆松、基谢利克同志受挫伤……我不再逐个提名了，因为要提名的话，每个人都应该提到。在前线发生的转折中，我们列车工作人员所起的作用决不是最差的。”

几个月后，有一天列宁打电话给我：“您是否读过基尔捷佐夫的著作？”这个姓没说明任何问题。“这是个白军，是敌人，他的书描述了尤登尼奇进攻彼得格勒的情况。”这里需要说明，一般说来，列宁比我更加注意白军的出版物。过了一天他又问我：“您读了吗？”

“没有。”

“要不要把这本书给您送去？”我应该有这本书，因为我和列宁都

通过柏林得到同样的一些书。“您一定要读一读最后一章：这是敌人的评价，里面也提到您”……但是我还没时间来读完它。说来奇怪，不久前我在君士坦丁堡偶然又看到了这本书。这时我记起，列宁怎么坚持要我读最后一章的。下面就是引起列宁兴趣的尤登尼奇的一个部长，我们的敌人所作的评价：“早在10月16日，托洛茨基就匆忙赶到彼得格勒前线，他的紧张不懈的活动取代了红军司令部的慌乱。在加契纳失守前几小时，他还试图在此挡住白军的进攻，但是一旦察觉到这已不可能时，便急忙地离城到皂村去组织防守。强大的增援部队尚未赶到，但他迅速地把彼得格勒的所有军校生集中在一起，动员了彼得格勒全城的男公民，用机枪(?)把所有的红军部队赶回阵地，并以有力的措施使所有通往彼得格勒的要冲处于防御态势”……“托洛茨基成功地在彼得格勒就地组织了一支有胆量的工人党员队伍，并把他们派到战斗最激烈的地方去。据尤登尼奇司令部证实，不是(?)红军部队，而是这些工人党员队伍，还有水兵营和军校生像雄狮似地投入了战斗。他们手持刺刀爬向坦克，尽管他们成批地被钢铁怪物的猛烈炮火打倒在地，但他们继续顽强地守着自己的阵地。”

谁也没有用机枪驱赶红军。然而我们守住了彼得格勒。

## 第三十六章

# 军事反对派

顺利建设红军的根本问题是正确处理好国内无产阶级和农民的相互关系问题。后来，1923年，编造了一个说我“低估”农民的极为拙劣的神话。其实，在1918至1921年期间，我比任何人都要密切地、直接地接触到苏维埃农村的问题，因为军队主要是从农民中招募来的，并且是在农民周围活动的。我不可能在此详细论述这个大问题。我只想用两三个，但是足够清楚的例子加以说明。1919年3月22日，我用直通电话向党中央提出要求：“由中央执行委员会在伏尔加河地区进行一项调查，并任命一个由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中央委员会组成的有权威的委员会。该委员会的任务要使伏尔加河地区的农民保持对苏维埃政权的信赖，消除各地引人注目的违法行为，惩处严重犯罪的苏维埃政权的代表，听取群众的呼声，收集材料，以制定出有利于中农的示范性的法令。”颇为有趣的是，这次和我通话的是斯大林，我正是向他解释了中农问题的重要性。也正是在1919年，根据我的提议，加里宁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因为他接近中农，很了解他们的需要。然而，更重要的是，早在1920年2月，我通过对乌拉尔农民生活的视察，我坚决主张向新经济政策过渡。在中央委员会里，我仅获得4票赞成，有11票反对。列宁当时反对废除粮食征集制<sup>①</sup>，并且十分坚决。斯大林自然是投反对票的。事隔一年后才改行新经济政策，诚然是一致通过的，不过是在喀琅施塔得叛乱的

---

<sup>①</sup> 亦译作“余粮收集制”。——译注

炮火声中，在全军情绪极其危险的气氛下通过的。

在往后几年里，苏维埃建设中的问题和困难，几乎全部（如果不是全部的话）都首先出现于军事领域，并以简洁的形式表现出来。这个领域的工作通常是不允许拖延的。错误自身立即会得到惩罚，反对这些决定的人是否正确，都会在行动中当场受到检验。整个说来，红军建设的内在逻辑性即由此而来，不能从一个制度跳到另一个制度地折腾。如果当时我们用更多的时间来议论和讨论的话，也许我们会犯更多的错误。

然而党内存在着斗争，而且有时还很激烈。能不这样吗？事情都是新的，困难太大了。

旧军队还分散在全国，散布着对战争仇恨的种子，而我们已经不得不建立新的团队了。沙皇军官不断地被逐出旧军队，到处受到无情的镇压。与此同时，我们不得不邀请沙皇军官担任新军队的教官。在旧的团队里建立委员会被认为是革命本身的体现，至少在革命的第一阶段是如此。在新的团队里建立委员会则是不能容忍的，被看作是军队瓦解的因素。对旧军纪的咒骂声还在耳边回响，我们已开始实行新的纪律了。我们必须在短期内把志愿入伍改为义务兵役制，把游击队改造成为正规的军事组织。我们不断地，日复一日地反对游击作风，这场斗争需要坚持不懈，毫不妥协，而有时需要严酷无情。这种混乱的游击作风是革命队伍内部农民成分的表现。因此反对游击作风的斗争也是坚持无产阶级的国家观念，反对侵蚀它的小资产阶级的无政府主义自发势力的斗争。然而，游击方法和习惯也在党的队伍内有所反映。

军事问题上的反对派早在红军建立初期已经形成。他们的基本观点是，坚持选举原则，反对吸收专家，反对铁的纪律，反对军队的集中制，等等。反对派分子试图找到一个概括的理论公式。他们断言，集中制的军队是帝国主义国家的军队。革命不仅应当埋葬阵地战，而且也应当埋葬集中制的军队。革命应完全建立在灵活机动、大胆进攻和巧妙应对的基础之上。它的战斗力在于队伍人数不多，能够独立作战，配备有各类武器，与基地没有联系，而依靠居民的同情，能自

由出没在敌人的后方，等等。总而言之，小规模战争被宣布为革命的策略。所有这一切是极端抽象的，而实际上是把我们的弱点予以理想化。国内战争中的重要经验很快驳倒了这些偏见。斗争经验很快就清楚地显示出集中的组织和战略比地方性的临时应对，军事上的分离主义和联邦制来得优越。

有数千后来又增至数万旧军官在红军服役。用他们自己的话说，他们中有许多人在两年前还把温和的自由派人士看作是极端革命分子，而布尔什维克对他们来说则属于四维空间的怪物。我曾经写文章反对当时的反对派说：“如果我们不能把成千上万名专家，包括军事专家拉过来的话，那就确实说明我们把自己、把我们的党看得太低了，对我们思想的道德力量，我们革命的道义的吸引力估计过低了。”这不会没有困难，不会没有摩擦，但我们最终无疑会成功的。

共产党人参加军事工作并不是件轻而易举的事。这需要经过挑选和培养。早在1918年8月，在喀山城下时，我就打电报给列宁说：“派到这里来的共产党员应当是能服从命令，吃苦耐劳，不怕牺牲的共产党员，这里不需要浅薄的鼓动员。”一年后，乌克兰无政府主义严重，甚至在党的队伍内也有，于是我在这里给第十四集团军发布了一道命令：“我要告诫大家，每一个被党派道到军队里来的共产党员，都是同样的红军战士，享有跟别的红军士兵同样的权利和义务。如果共产党员违背革命军人的职责、违法乱纪，则将受到加倍的惩处，因为愚昧无知、没有觉悟的人可以原谅，而作为领导全世界工人阶级的党的一员是不能原谅的。”显然，在这个问题上产生了不少摩擦，不满者颇为不少。

例如，现国家银行行长皮达可夫<sup>①</sup>就曾是军事反对派的成员。他参加各种各样的反对派，最后以当一名官员了结。三四年以前，皮达可夫还跟我同属一个派别，我曾开玩笑地预言，一旦发生波拿巴政

<sup>①</sup> 格·列·皮达可夫(1890—1937年)——十月革命后历任乌克兰临时工农政府主席、国家计划委员会和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副主席、副重工业人民委员等职。——译注



变，皮达可夫第二天就会夹着皮包去办公室上班。现在我要郑重地补充一句，如果这件事没有发生，仅仅是因为没有发生波拿巴政变，而决不是皮达可夫本人的过错。皮达可夫在乌克兰有相当大的影响，这不是偶然的，他是一位有相当修养的马克思主义者，尤其是在经济学领域内，他还是个公认的行政人员，很有魄力。在最初几年里，皮达可夫具有充沛的革命精力，不过这种精力很快蜕变成了官僚式的保守主义。我同皮达可夫的半无政府主义建军观点斗争的办法，是立即让他担任重要职务，迫使他从言论转到行动。这个方法并不新鲜，但是在许多场合，它是不可缺少的。行政命令的好处很快就提醒他，应当采用他口头上反对的那种方法。此类转变是不少的。军事反对派中的所有优秀分子都很快就投身到工作中去了。除此之外，我还建议顽固不化分子按照他们的原则建立几个团，并答应给他们提供一切必要的物资装备。只有伏尔加河地区一个县的集团接受挑战，组织了一个团，然而跟其他的团毫无区别。红军在各个战场取得节节胜利，反对派终于化为乌有。

在红军和在军事反对派中，察里津占有特殊地位，那里的军事工作人员集聚在伏罗希洛夫周围。那里的革命部队大部分由北高加索农民出身的前士官率领。由于哥萨克和农民之间的严重对抗，国内战争在南方草原上进行得异常激烈，它深入到每个乡村，常常把全村的男女老幼斩尽杀绝。这是一场有浓厚地方色彩的单纯的农民战争，而且其庄稼汉的凶残程度远远超过国内其他地方的革命斗争。这场战争培养了一大批坚强的游击队员，他们完全胜任地方性的小战斗，但是一旦执行较大规模的军事任务，就显得无能为力了。

伏罗希洛夫是个工人革命家，他领导过罢工，搞过地下工作，坐过牢，还被流放过。但是，伏罗希洛夫跟当今的许多其他领导人一样，至多是一个工人出身的民族的革命民主主义者。这起初在帝国主义战争，后来在二月革命中表现得特别明显。在伏罗希洛夫的正式传记中，1914至1917年这段时期是个空白，现在的大多数领导人也都这样。为什么有空白呢？其秘密在于，在战争期间，这些人大多数是爱国主义者，他们中止了任何革命工作。二月革命期间，伏罗希洛夫

和斯大林一样，从左的方面支持了古契柯夫—米留可夫政府。他们是极端革命民主派，但决不是国际主义者。可以确定这样一条规则：那些在战争期间是爱国主义者，二月变革后是民主派的布尔什维克，现在都成了斯大林的民族社会主义的拥护者。伏罗希洛夫也不例外。

虽然伏罗希洛夫是卢甘斯克工人，是享有比较多特权的上层工人，但是就他的习气和口味而言，他更像个小业主，而不像个无产者。十月变革后，伏罗希洛夫自然成了士官和游击队员组成的反对派的中心，反对要求具备军事知识和较广阔视野的集中的军事组织。察里津反对派就是这样形成的。

伏罗希洛夫那一伙人都带着仇视的态度谈论专家、军事学院、高级参谋部，乃至莫斯科。然而，由于游击队的长官们没有独立的军事知识，因此他们每个人手边都有自己的“专家”，不过这是些次等的“专家”，他们死抱住自己的位置不放，以防更有能力、更精通专业的人取而代之。察里津的军事长官们对待南方苏维埃战线指挥部的态度比对待白军好不了多少。他们与莫斯科中央的关系仅限于要求提供军用物资。我们的物资仅仅够用。工厂生产出来的一切立即送往军队。察里津的部队所消耗的枪支弹药超过任何部队。只要一拒绝他们的要求，察里津就叫嚷什么莫斯科专家背叛了。察里津军队派了一名叫日沃杰尔的水兵长驻莫斯科专事勒索军用物资。当我们加强纪律，日沃杰尔竟投敌叛变。此人后来好像被抓住枪毙了。

斯大林在察里津呆了几个月。他把反对我的幕后斗争与伏罗希洛夫及其亲信豢养的反对派结合在一起，这是他的活动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不过斯大林使自己的行动能随时往回缩。

每天都能收到总指挥部和前线各指挥部对察里津的控告，诸如不执行命令，无法了解那里在干些什么，甚至不回答质询。列宁担心地注视着这场冲突的发展。他比我更了解斯大林，他怀疑察里津人之所以如此顽强，显然是因为有斯大林在幕后指挥。局势已到了不能容忍的地步。我决心对察里津进行整顿。在司令部和察里津再次发生冲突后，我坚持召回斯大林。此事由斯维尔德洛夫经办，他亲自乘特快列车去把斯大林召回。列宁想把冲突缩小到最低限度，他这

样做当然是正确的。而我根本没有想到斯大林。1917年，他像个不引人注目的影子在我眼前闪现。在战火中，我往往把他完全给忘了。我想到的是察里津部队。我需要南方战线有一个可靠的左翼。我去察里津，目的是要不惜任何代价达到这个目的。我在路上遇见了斯维尔德洛夫。他小心翼翼地询问了我的意图，然后建议我找斯大林谈谈，当时斯大林和斯维尔德洛夫在同一列车上。“您真要把他们所有的人都赶走？”斯大林用故意引人注意的顺从的口气问道，“他们都是好样的小伙子。”“可是这些好小伙子将断送革命，而革命没时间等到他们长大成人。我只希望一点：使察里津回归苏维埃俄国。”

几小时后，我见到了伏罗希洛夫。司令部里笼罩着不安的气氛。有一种谣言说，托洛茨基带来了一把大扫帚，随行的有20来个沙皇将军，由他们来取代游击队的长官们，顺便说一下，这些人在我到达之前已匆匆忙忙地自封为团长、旅长和师长。我向伏罗希洛夫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他是怎样对待前线和总司令部的命令的？他开诚布公地对我说，察里津认为只需要执行它认为是正确的命令。这太过分了。我声明说，如果他不保证准确地、无条件地执行命令和军事任务，我将立即下令押送他去莫斯科交付军事法庭审判。后来他们正式保证服从命令，结果一个也没有被扫除。察里津的大多数共产党员并非在威胁之下，而是凭良心地支持我。我视察了所有部队，慰问了游击队员，他们中间有不少出色的战士，只要有正确的领导就行。我就这样回到了莫斯科。在处理此事的整个过程中，就我这方面而言，丝毫不存在个人偏见或好恶。我认为自己完全有理由说，在我的政治活动中个人因素在任何时候都不起任何作用。但是在我领导的伟大斗争中，大本营太大了，我无法从旁边观察它。而我经常地，几乎每走一步都要踩到个人偏见、交情或自尊心的鸡眼上。而斯大林仔细地挑选出那些被踩疼了鸡眼的人。他有充分的时间，也有兴趣干这种事。察里津的上层分子从这时起成了他的一个主要的工具。列宁一生病，斯大林就通过他的盟友把察里津改名为斯大林格勒。广大居民不懂这个名字是什么意思。如今伏罗希洛夫之所以能当上政治局委员，其唯一的原因——别的原因我没发现，是1918年我曾

强迫他服从命令，否则把他押送莫斯科法办。

我想为说明本章所述的军事工作，准确些说，与之相联系的党内斗争，从至今尚未公布的当时党内通讯中摘录几段文字不会没有意义。

1918年10月4日，我从坦波夫通过直线电话告诉列宁和斯维尔德洛夫说：

“我坚决主张召回斯大林。尽管察里津前线兵力充足，但情况仍然很糟。我让他（伏罗希洛夫）再任第十集团军（察里津）司令，条件是必须服从南方战线司令的指挥。迄今为止，察里津人甚至连作战报告都没有送往科兹洛夫。我责成他们每天两次汇报作战情况和侦察情况。如果明天他还不执行的话，我就把伏罗希洛夫送交法庭，并用命令通报全军。可供进攻的时间不多了，一旦秋季泥泞时期到来，骑马或步行都无法通行。没有时间搞外交谈判。”

斯大林被召回了。列宁十分清楚我这样做完全是出于工作上的考虑。与此同时，他自然也为发生的冲突感到忧虑，他很想改善我们之间的关系。10月23日，列宁往巴拉绍夫给我写信说：

“斯大林今天到达，带来了我军在察里津附近取得三次重大胜利的消息……[其实，这些“胜利”是无紧要的——列·达注]。斯大林已说服伏罗希洛夫和米宁（他认为这两人是非常宝贵的和难得的干部）不要离开并完全服从中央机关的命令；据斯大林说，他们俩不满的唯一原因，就是炮弹和子弹到得太晚，甚至不送去，这样，20万人的士气高昂的高加索集团军也同样会覆天的[这支游击队式的军队一遭到敌人的打击就溃不成军，彻底暴露出这支军队完全没有战斗力。——列·达注]。

“斯大林很想在南方面军工作……斯大林希望自己能在工作中证实他的看法是正确的……列夫·达维多维奇，我把斯大林所有这些意见告诉您，请您仔细考虑并答复：第一，您是否同意亲自向斯大林解释一下，他为此同意去您那里；第二，您是否认为在一定的具体条件下有可能消除从前的摩擦并处理好关系。这是斯大林所希望的。至于我，则认为必须竭尽全力处理好

与斯大林的共事关系。 列宁”<sup>①</sup>

我答复说完全同意列宁的意见，于是斯大林被任命为南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可惜，妥协并没有带来什么结果。在察里津事情一点也没有进展。12月14日，我从库尔斯克打电报给列宁说：

“伏罗希洛夫使妥协的一切尝试都化为乌有，在这以后让他继续留下已不可能。必须派出新的革命军事委员会去察里津，并配上新的指挥员，同时把伏罗希洛夫调往乌克兰。”这个建议被一致通过。可是，乌克兰的情况并不好一些。那里的无政府状态本来就已影响军事工作的正常开展。而现在依然由斯大林幕后操纵的伏罗希洛夫反对派，使这项工作完全无法进行。

1919年1月10日，我从格里亚齐车站打电报给当时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斯维尔德洛夫：“我坚决声明，决不允许导致察里津军队彻底瓦解的察里津路线在乌克兰重演……斯大林、伏罗希洛夫及其一伙所推行的路线将毁灭整个事业。托洛茨基。”

从远处考察“察里津人”的工作的列宁和斯维尔德洛夫试图再次求得妥协。遗憾的是，我这里没有他们发来的电报。1月11日，我答复列宁说：“妥协当然是需要的，但不应当是虚假的妥协。实际上，所有的察里津人都集聚在哈尔科夫……我认为，斯大林对察里津派的庇护是最危险的祸害，比军事专家的背叛和出卖要坏得多……。托洛茨基。”

“妥协是需要的，但不是虚假的妥协。”4年后，列宁在谈到斯大林时几乎一字不差地对我说了这句话。那是第十二次党代会召开以前的事。列宁准备粉碎斯大林集团。他在民族问题上发动进攻。当我建议妥协时，列宁回答说：“斯大林会搞出一个虚假的妥协，然后来欺骗我们。”

季诺维也夫当时态度暧昧地同军事反对派调情，1919年3月我在给中央委员会的信里对他的态度表示异议：“对伏罗希洛夫应当属

<sup>①</sup>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8卷，第382-383页。“给列·达·托洛茨基的电报”（10月22日）——译注

于军事反对派中的哪个集团，我不会去作个人的心理调查，但是我要指出，我唯一需要责备自己的是，在事业的利益需要采取果断的组织决定的时候，我却用了过长的时间，即两三个月的时间试图同他谈判，进行规劝和搞个人的联合，等等。因为，归根到底，在第十集团军的问题上任务不在于使伏罗希洛夫回心转意，而是在最短期限内夺取军事胜利。”

5月30日，列宁收到了一份从哈尔科夫拍来的电报，坚决要求成立一个由伏罗希洛夫指挥的特别的乌克兰军队集群。列宁打直线电话到坎捷米罗夫卡车站征询我的意见。6月1日，我答复列宁说：

“某些乌克兰人提出的把第二、第十三和第八集团军合并起来归伏罗希洛夫指挥的强硬要求是完全站不住脚的。我们需要的不是顿涅茨军事行动上的统一，而是反对邓尼金的全盘统一……伏罗希洛夫的军事和粮食专政的思想是顿涅茨的乌克兰民族自决运动的产物，这一运动的目标是反对基辅（即乌克兰政府）和南方面军……我不怀疑，实现这个计划，那就只能增加混乱，并且会彻底破坏作战的领导。请要求伏罗希洛夫和梅日劳克完成交给他们的完全现实的任务。托洛茨基。”

6月1日，列宁致电伏罗希洛夫：“不管怎样应当立即停止空谈，把所有各项工作都转为军事管制……要抛开一切企图建立特别集群和诸如此类以隐蔽手法恢复乌克兰方面军的空想计划……列宁。”<sup>①</sup>

根据以往的经验，列宁确认，对付这些不守纪律，主张乌克兰民族自决的人是非常困难的，所以他当天就召开了政治局会议，通过一项决议，并立即把决议通知伏罗希洛夫和其他有关人员：“6月1日中央政治局开过会，完全同意托洛茨基的意见，坚决拒绝乌克兰人关于……建立特别的顿涅茨统一体的计划。我们要求伏罗希洛夫和梅日劳克完成自己直接承担的任务……明后天托洛茨基将叫你们去伊久姆，他将作比较详细的指示。……受中央政治

<sup>①</sup>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8卷，第657页。· 译注

局委托 列宁。”<sup>①</sup>

第二天，中央委员会讨论了关于集团军司令伏罗希洛夫擅自把从敌人那里缴获来的大部分军用物资拨给自己部队使用的问题。中央决定：“责成拉科夫斯基同志将此事电告伊久姆的托洛茨基同志，请他采取断然措施，把这些军用物资交给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支配。”同一天，列宁通过直线电报告诉我：“德宾科和伏罗希洛夫正在把军用物资运走。一片混乱，没有能真正帮助顿巴斯。列宁。”换言之，乌克兰重演了我在察里津反对过的那种做法。

军事工作使我树敌甚多，这是不足为奇的。平时我不注意左右舍，往往把那些妨碍军事胜利的人推到一边，或者匆忙中踩了游手好闲者的鸡眼，也顾不上道歉。而有些人对这些事情总是耿耿于怀。这些心怀不满、受了委屈的人就去找斯大林，有时也找季诺维也夫。而此两人也有委屈之感。每当前线遭受失败，这些不满分子就要对列宁施加压力。当时斯大林已在暗中领导这些阴谋活动。他们向上面提交了一份报告，指责军事政策不正确，说我包庇专家，虐待共产党员，等等。被撤职的指挥官和当不上红军元帅的人打了一份又一份报告，指控我们的战略计划极为有害，指挥部如何怠工，罗织了许多罪名。

列宁非常关注总的领导问题，所以不能去前线，也无法过问军事部门的日常工作。而我大部分时间都在前线，这就使暗中拨弄是非者有了可乘之机。他们那没完没了的叫喊不能不使列宁偶尔感到不安。每当我回到莫斯科时，他总是积累了无数的疑虑和问题。但是只需半小时的谈话，我们之间就恢复了相互理解和完全的一致。在高尔察克逼近伏尔加河，我们在东方失利之时，列宁在人民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给我写了一张小条子，那次我一下火车就直接去开会了，条子上写道：“我们是否要把所有专家统统赶走，是否任命拉舍维奇为总司令？”拉舍维奇是个老布尔什维克，在“德国”战争中任士官。我在那张字条上写道：“儿戏！”列宁调皮地皱皱眉头瞅了我一眼，并且作了个鬼脸，似乎在说：“您对我太不客气了。”其实，他倒是喜欢这

<sup>①</sup>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8卷，第658页。——译注

种丝毫不容怀疑的直截了当的回答。会后我们又碰了头。列宁详细询问了前线的情况。“您问我，把所有的军官都赶走好不好，可是您是否知道，我们现在军队里有多少个旧军官？”

“不知道。”

“大概多少？”

“不知道。”

“不少于3万人。”

“什么？”

“不少于3万人。如果一个人背叛，要怀疑上一百个可靠的人，一个人投敌，要枪毙两三个人，那么由谁来取代他们所有这些人呢？”

几天后，列宁就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问题发表讲演。他是这样说的：“不久以前，托洛茨基同志告诉我，我们的军事部门有好几万军官。这时我得到了一个具体的启示：利用我们的敌人的秘诀就是……用资本家拣来打我们的砖头建设共产主义！”<sup>①</sup>

在差不多与此同时召开的党代表大会上，列宁热情地捍卫了我所执行的军事政策，批评了反对派的攻击，当时我留在前线，没有出席代表大会。正因为如此，第八次代表大会的军事小组的记录至今没有公布。

※ ※ ※

有一次，明仁斯基<sup>②</sup>到南方战线来找我。我早已认识他。在反动年代，他参加极左集团，或叫前进派集团——这来自他们的杂志名（波格丹诺夫、卢那察尔斯基，等等）。明仁斯基本人倾向法国的工团主义。前进派在波伦亚为10至15名秘密越境的俄国工人办了一个马克思主义学校。这是1910年的事。我在学校呆了两个星期左右，讲了有关办报问题的课，并就党的策略问题举行了座谈。在那里我认识了从巴黎来的明仁斯基。要说他给我留下的印象，最准确的说法是，他没有给我留下任何印象。他看上去很像某一个人的影子，又

<sup>①</sup>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6卷，第49页。——译注

<sup>②</sup> 维·鲁·明仁斯基（1874—1934年）——十月革命后历任财政人民委员、全俄肃反委员会主席团委员，苏联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局长等职。——译注



像是一幅未完成的肖像画的蹩脚画稿。这样的人是有的。有时候，只有他们的讨好的微笑和神秘的眨眼才能显示出此人向上爬的强烈欲望。我不知道他在十月变革时期的表现怎么样，或者当时他是否有所表现。但是在夺得政权以后，他在忙乱中被派往财政部工作。他并没有表现出任何积极性，或者说他仅仅表现了自己的无能。后来捷尔任斯基把他要了去。捷尔任斯基是个意志刚强、充满热情、品德高尚的人。他的形象覆盖了全俄肃反委员会。谁也没有注意默默无闻专心研究文件的明仁斯基。直到捷尔任斯基同他的副手温什利赫特<sup>①</sup>意见相左（这已经是晚期的事了），又找不到人时，才提出明仁斯基当候选人。所有的人都摇头。“还能有别的人吗？”捷尔任斯基辩解说：“没人了。”不过斯大林是支持明仁斯基的。斯大林总是支持那些由于得到机关的恩宠而在政治上得以存在的人。于是明仁斯基就成了斯大林在格伯乌的忠实的影子。捷尔任斯基逝世后，明仁斯基不仅当上了格伯乌的局长，而且还当上中央委员。于是一个不显眼的影子一跃成为官场中的一个人物。

但是10年前，明仁斯基曾企图绕着其他的轴心转。他到我的列车上来向我报告军事特别部队的情况。他谈过公事之后，便带着那种令人吃惊又迷惑不解、曲意奉承的微笑，开始犹豫起来。最后他问我是否知道斯大林正在想方设法算计我。

“什么？”我感到十分困惑不解，因为我当时根本没有想到，或者根本没有诸如此类的担心。

“是真的，他经常在列宁和其他人面前暗示，说你在自己周围集结了不少人专事反对列宁……。”

“您一定是疯了，明仁斯基，请醒醒，我对这件事情连谈都不愿意谈。”明仁斯基尴尬地耸着肩，干咳着走了。我想，从这天起，他另找别的轴心去围着转了。

<sup>①</sup> 约·斯·温什利赫特(1879—1938年)——1919年任立陶宛—白俄罗斯陆军人民委员，1921年起任全俄肃反委员会副主席、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民航总局局长等职。——译注

但是工作了一两个小时后,我感到这里面必有文章。此人轻声而又含糊的话使我感到有些不安,就像我在吃饭时吞下了一块碎玻璃那样难受。我开始想起一些事来,并加以比较。我看到了斯大林的另一侧面。很久以后,克列斯廷斯基<sup>①</sup>对我谈起过斯大林:“这是一个黄眼睛的坏蛋。”明仁斯基拜会我以后,我的脑海里第一次闪现了斯大林那道德上的黄斑。此后我去莫斯科作短暂的逗留,第一件事总是去拜访列宁。我们谈了前线的事情。列宁喜欢听一些不拐弯抹角,能使他立即了解事情本质的生活细节、事例和特征。他不能容忍浮光掠影地对待活生生的生活。他跳过许多环节,向我提出一些特殊的问题,我一边回答,一边欣赏他能一下子抓住事物本质的本领。我们愉快地说说笑笑。列宁总是很愉快,而我也并不认为自己是个闷闷不乐的人。最后我把明仁斯基到南方战线来找我的事告诉列宁。

“难道他说的有一点点是真的?”我立即觉察到列宁激动了,甚至脸也涨红了。

“这是废话。”他反复说这句话,但是有点犹豫。

“我感兴趣的只有一点——我说,——您哪怕会有片刻相信这种荒谬绝伦的想法——我在纠集一伙人来反对您?”

“废话”,列宁回答道,这次的语气很坚定,我立即安心了。仿佛笼罩在我们头上的乌云消散了,我们分别时格外亲切。但是我懂得了,明仁斯基并不是信口开河。列宁否认了,但没有把话说完,这仅仅是因为他担心引起冲突、争吵和个人之间的斗争。在这一点上,我完全支持他。但是,斯大林公然地散布仇恨的种子。只是在很久以后我才明白,他是如何有计划、有步骤地干这种事的。他几乎只干这种事。因为斯大林从来也没有干过正经的工作。布哈林曾经告诉我:“斯大林的第一个特点是懒惰,第二个特点是妒忌,凡是比他知道得多,或者比他能干的人他都要妒忌。他甚至还挖列宁的墙脚呢。”

<sup>①</sup> 尼·尼·克列斯廷斯基(1883—1938年)——1918年起任俄罗斯联邦财政人民委员。1919至1921年任中央委员会书记。1922年起任驻德国全权代表。1930年起任副外交人民委员。 译注

## 第三十七章

# 军事战略上的分歧

在这几页里，我不谈红军的历史，也不谈它的战斗历史。这两个题目是和革命的历史密切相关的，并且远远超出了自传的范围，也许它可以构成另一本书的内容。但是在这里我不能避而不谈在国内战争进程中产生的那些政治战略方面的分歧。革命的命运取决于军事行动的进程。党的中央委员会越来越致力于战争问题，其中包括它的战略问题。主要的指挥职务由旧学校出来的军事专家担任，他们对社会和政治情况不甚了解。党中央里有经验的革命政治家则缺乏军事知识。大规模的战略构想通常是集体工作的结果，并且像在这种情况下经常出现的那样，难免产生分歧和斗争。

在中央委员会内曾产生过四次战略上的分歧，换言之，有几条主要战线就有几次分歧。我这里只能对这些分歧作一非常简要的论述，以便读者了解军事领导人所遇到的那些问题的实质，顺便驳斥后来对我的种种捏造。

中央委员会内第一次激烈的争论发生在1919年夏天，是东方战线的局势问题。当时的总司令还是瓦采季斯。我在关于斯维亚日斯克一章里曾谈到过他。我当时操心的是使瓦采季斯树立起自信心，确信自己的权力和权威。不具备这一点，就不可能指挥。瓦采季斯认为，我们赢得了对高尔察克的头几次重大胜利后，不应过于深入地向东挺进，进军乌拉尔山的另一侧。他想让东方面军在山里过冬。这样便有可能从东方撤回几个师，把它们调往南方，在那里邓尼金已

成为越来越严重的危险。我支持这个计划。可是它遭到东方面军司令，前总参谋部上校加米涅夫，<sup>①</sup>以及军事委员会委员老布尔什维克斯米尔加<sup>②</sup>和拉舍维奇的激烈反对。他们提出，高尔察克已遭惨败，只需派少数兵力去追击就行，最关键的是不能让他们有喘息的机会，否则过一个冬天它就恢复元气了，而到了春季我们又不重新发动东线战役。因此，全部的问题在于要正确地估计高尔察克军队及其后方的状况。我那时已经认为，南方战线的情况要比东方战线严重得多，危险得多。后来的事态完全证实了这点。但是，在对高尔察克军队的估计方面，东方面军指挥部是正确的。中央委员会作出了反对总司令部的决定，这也是反对我的，因为我是支持瓦采季斯的，我的出发点是，在战略等式中有几个未知数，但是必须支持刚刚建立起来的总司令的权威，这是个相当有分量的数。中央委员会的决定是正确的。东方面军抽出了部分兵力支援南方，与此同时胜利地向西伯利亚腹地挺进，追击高尔察克。这场冲突导致了总司令部的改组。瓦采季斯被解职，由加米涅夫取而代之。

分歧本身具有纯业务的性质。它自然丝毫也没有影响我同列宁的关系。可是由于在这些问题上的短暂分歧，阴谋的罗网正在编织。1919年6月4日，斯大林从南方写信给列宁，以军事领导会招致毁灭来恐吓列宁。他这样写道：“现在全部问题在于，中央委员会是否有勇气作出相应的结论。中央委员会是否有勇气，有毅力？”这两句话的意思是很清楚的。他的语气证明斯大林已不止一次地提出这个问题，并且每次都遭到列宁的反对。当时我还不了解这个情况。但是我已感到有人在纠缠不休地搞阴谋诡计。我既没有时间，也没有

① 谢·谢·加米涅夫(1881—1936年)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任团长、国内战争时期，1918至1919年任东方面军司令，1919至1924年任共和国武装力量总司令，1927至1934年任苏联副陆海军人民委员和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译注

② 伊·捷·斯米尔加(1892—1938年) 十月革命后历任俄罗斯联邦人民委员会驻芬兰全权代表、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副主席等职。——译注

愿望去查清这些阴谋活动，我便向中央委员会提出了辞职。7月5日，中央委员会以如下决定作复：

“中央委员会组织局和政治局研究了托洛茨基同志的声明，经全面讨论，一致得出结论说，他们绝对不能接受托洛茨基同志的辞呈和满足他的请求。中央委员会组织局和政治局将提供一切条件，使托洛茨基同志能方便地开展他本人所选择的当前最困难、最危险、最重要的南方战线的工作，以给共和国带来最大的效益。托洛茨基以其陆军人民委员和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身份，完全可以作为南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同由他推荐并得到中央批准的方面军司令一起工作。中央组织局和政治局授权托洛茨基同志，可以用一切手段去做他认为纠正军事问题上的路线所必须做的一切，如果他希望的话，也可以提前召开党的代表大会。

列宁、加米涅夫、克列斯廷斯基、加里宁、  
谢列布里亚科夫、斯大林、斯塔索娃”

在这项决定上也有斯大林的签字。虽然他在背地里进行阴谋活动，并谴责列宁缺乏勇气和毅力，但是他却不敢公开地对抗中央。

如上所述，南方战线在国内战争中居主要地位。敌军由两个独立部分组成：哥萨克，特别是库班的哥萨克，和从全国各地征召的白卫志愿军。哥萨克想要守住自己的边界，抵御工人和农民的进攻。而志愿军则想攻占莫斯科。只有在志愿军同库班的哥萨克在北高加索组成统一的战线时，这两条战线才融合在一起。但是要使库班的哥萨克离开库班对于邓尼金来说是项困难的，确切些说，是项力不胜任的任务。我们的总司令部对待南方战线问题如同对待抽象的战略任务一样，忽视了它的社会基础。库班是志愿军的主要基地。因此大本营决定从伏尔加河给这个基地以决定性的打击。让邓尼金向莫斯科冒进。此时我们则在他的背后扫除他的库班基地。这样，邓尼金就被悬在空中，我们赤手空拳也能逮住他。总的战略意图就是如此。如果不是国内战争，这种做法是正确的。但是对现实的南方战线来说，这纯粹是学院式的计划，帮了敌人的大忙。如果邓尼金无法

说服哥萨克北上远征，那么我们从南面袭击哥萨克老巢，就是帮了邓尼金的忙。从此以后哥萨克就不能只死守自己的土地了。我们自己把他们的命运同志愿军的命运联结在一起了。

尽管我们对军事行动作了周密的准备，集中了重兵和物资，我们还是没有取得胜利。在邓尼金后方，哥萨克筑起了一个强大的堡垒。他们在自己的土地上扎根，死守住这块土地不放。我们的进攻把所有的哥萨克都发动起来了。我们消耗了精力和时间，却把所有能够拿起武器的人都推到白军那里。与此同时，邓尼金的军队横扫了乌克兰，补充了兵员，然后挥戈北上，占领库尔斯克和奥廖尔，威胁图拉。如图拉失守，将是一场大灾难，因为它意味着我们失去制造枪支弹药的最重要的兵工厂。

我一开始提出的那项计划则恰恰相反。我要求通过第一次打击把志愿军同哥萨克分割开来，把哥萨克撇在一边，集中主要兵力去打志愿军。按此计划，主攻方向不是从伏尔加河往库班打，而是从沃罗涅日朝哈尔科夫和顿涅茨煤田地区打。在这块北高加索和乌克兰交界的地区，农民和工人是完全站在红军一边的。红军如朝这个方向挺进，那是不用费多大劲的。哥萨克会留在原地守卫自己的边界以防外人进犯，我们也不会去碰他们。哥萨克人的问题仍然会是一个单独的问题，与其说是军事问题，不如说是政治问题。但是首先得从战略上把此项任务同击溃邓尼金的志愿军区分开来。最后采用的正是这个方案，但那时邓尼金已经威胁图拉，而图拉失守，将比莫斯科失守更为危险。我们损失了几个月的时间，遭到许多不必要的牺牲，还经受了几个星期的严重威胁。

顺便指出，南方战线的战略分歧同评价或者“低估”农民问题有着最直接的关系。我是根据以农民和工人一方，同以哥萨克为另一方，两者间的相互关系制定整个方案的，也正是在这一点上，我提出的方案与得到中央委员会多数支持的由最高司令部提出的抽象的学院式的方案是对立的。有人竭力证明我“低估”了农民，我只要用他们的八分之一的力气，就可以在南方战线分歧的基础上，不仅对季诺维也夫、斯大林等人，而且也对列宁提出同样荒谬的指责。

战略方面的第三次冲突是尤登尼奇进攻彼得格勒引起的。关于这方面的情况前面已有介绍，这里毋须赘述。我只要提一下，当时列宁受了两方面的影响，因而产生了必须放弃彼得格勒以缩短战线的想法，一是南方局势极为严重，主要威胁来自南方，二是彼得格勒的消息说，尤登尼奇军队的武器装备非常精良。季诺维也夫和斯大林支持我，而反对列宁，这也许是绝无仅有的一次，不过几天后列宁自己也放弃了这个显然是错误的计划。

最后一次分歧，无疑也是最激烈的一次分歧，涉及1920年夏季波兰战线的命运。

当时的英国首相博纳·罗<sup>①</sup>援引了我致法国共产党人的信件，以证实我们打算在1920年秋季粉碎波兰。在前波兰军事部长西科夫斯基<sup>②</sup>撰写的一本书里也有这样的说法，但是引的是1920年1月我在国际会议上的讲话。这一切纯属无稽之谈。自然，我从来没有对皮尔苏茨基的波兰表示过好感，因为波兰在爱国主义词句和英雄主义大话的掩盖之下实行压迫和压制。我曾多次发表声明，一旦皮尔苏茨基把战争强加在我们头上，我们将奉陪到底，要找到这样的声明是不难的。这类声明都是针对整个局势的。但要从中得出结论，说我们想同波兰打仗或者准备这种战争，那是无视事实，不合情理的谎言。我们不遗余力地想要避免这场战争。我们为此采取了一切能够采取的措施。西科夫斯基承认，我非常“灵活地”展开了和平宣传。他不理解或佯装不理解，这种“灵活”并没有什么奥秘，那仅仅是因为我们竭尽全力争取和平，哪怕以作出最大的让步为代价。也许我最不愿意打这场战争，因为我非常清楚地认识到，经过三年持续不断的国内战争，再进行这场战争是非常困难的。西科夫斯基自己的著作也清楚地表明，尽管我们为维护和乎作出了不懈的努力，在我们的对

① 博纳·罗(1853—1923年)——英国保守党领袖，1920年间任掌玺大臣，1922至1923年任英国首相。——译注

② 西科夫斯基(1881—1943年)——波兰总理兼军事部长(1922—1923年)，1939至1943年任波兰流亡政府总理，1941年7月30日与苏联签订恢复外交关系的条约。——译注

外改革中体现出耐心和坚忍不拔的精神,但是波兰政府还是蓄意挑起了战争。我们真诚地希望和平。皮尔苏茨基却把战争强加给我们。我们之所以能进行这场战争,只是因为广大人民群众每天都注视着我们同波兰的外交决斗,并坚信战争是强加给我们的,在这一点上,我们丝毫也没有错。

国家又作了一次真正英雄主义的努力。波兰人占领基辅本身没有任何军事意义,但是帮了我们很大的忙,它使全国奋起。我又去巡视军队和城市,动员人员和物资。我们收复了基辅。开始取得节节胜利。波兰人迅速后撤,这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之外,因为我不能设想皮尔苏茨基在进军中竟如此轻举妄动。但是在我们的方面,在初战大捷后,也过高估计了展现在我们面前的可能性。开始出现一种情绪,要把以自卫开始的战争变成一场进攻性的革命战争,并且这种情绪越来越强烈。当然从原则上讲,我没有任何理由来反对这样做。问题在于力量对比。波兰工人和农民的情绪还是个未知数。某些波兰同志,如罗莎·卢森堡的战友,已故的尤·马尔赫列夫斯基<sup>①</sup>就十分清醒地估计了形势。我力求尽快地退出这场战争,他的估计是重要因素之一。但是也有另一种呼声。有人热切希望波兰工人发动起义。至少列宁已经制订了一个强硬的计划:把战争进行到底,即进军华沙,帮助波兰工人推翻皮尔苏茨基政府,夺取政权。政府作出的决定自然会引起总司令部和西方面军司令部的猜想。当我在莫斯科作例行逗留期间,我发现中央有一股把战争进行到底的强烈情绪。我对此表示坚决反对。波兰人已经求和了。我认为,我们已达到了胜利的顶点,要是我们不顾自己的力量,继续进攻,就可能丢掉业已取得的胜利,走向失败。第四集团军通过巨大努力在5星期内推进了650公里,此后它只能靠惯性的力量前进了。一切都只凭借着这一点力量,而这点力量又太小了。只要对方使劲一挡,就足以使我们

<sup>①</sup> 尤·约·马尔赫列夫斯基(1866—1925年)——波兰、俄国和国际革命运动活动家。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主义党的组织者和领导人之一。1907年当选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候补中央委员。德国斯巴达克联盟的组织者之一。1920年任波兰临时革命委员会主席。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译注



的前线动摇，使我们空前的（连福煦<sup>①</sup>也不得不承认这点）进攻变为灾难性的撤退。我要求在部队精疲力竭之前立即尽快缔结和约。记得当时支持我的只有李可夫一个人。其他人当我不在的时候已被列宁争取过去了。作出了决定：进攻。

同布列斯特时期相比，角色颠倒过来了：那时，我要求不要匆匆忙忙地签署和约，哪怕是用割地的代价使德国无产阶级有时间了解局势和发表自己的意见。现在则是列宁要求我军继续进攻，用这种办法使波兰无产阶级有时间来估计局势并行动起来。波兰战争从另一角度证实了布列斯特战争所表明的事实：战争和革命群众运动是以不同的尺度来衡量的。军队的行动是以几天、几星期来计算的，而人民群众的运动通常是用几个月、几年来计算的。如果不正确地估计这种速度上的差异，那么战争的齿轮只会毁坏革命的齿轮，而不是使之运转。至少，短暂的布列斯特战争是如此，较长时间的对波战争也是如此。我们放过了胜利的机会，遭到了惨重的失败。

不能不指出，华沙城下的失败之所以特别惨重，其原因之一是由利沃夫（伦贝格）方向开来的苏维埃军队南方集群指挥上的失误。该集群革命军事委员会内的主要政治人物是斯大林。他打算无论如何要在斯米尔加和图哈切夫斯基攻入华沙之时攻入利沃夫。有些人竟会如此野心勃勃！当图哈切夫斯基的部队面临的危险已经很清楚，总司令部也命令西南方面军改变方向，攻击华沙附近的波军侧翼时，西南方面军司令部在斯大林怂恿下继续向西挺进，他们认为，自己占领利沃夫岂不比帮助“别人”攻占华沙更为重要？直至三令五申之后，西南方面军司令部才改变了进军的方向。但是已耽误了几天，造成了致命的影响。

我军溃退了400多公里。在取得了目前的光辉胜利后，任何人都都不想就此罢休。我从弗兰格尔前线返回莫斯科后，发现有一种再

<sup>①</sup> 斐·福煦（1851—1929年）—法国元帅，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任法军司令、总参谋长、协约军最高总司令。1918至1920年是武装干涉苏俄的策划者之一。——译注

打一次对波战争的情绪。现在李可夫也转到了另一个营垒。他说：“既然开始了，就要干到底。”西方面军司令部给部下鼓劲，说来了大量增援部队，炮兵已经充实，等等。希望什么就相信什么。我反驳说：“我们在西方战线有什么呢？”上气低落的干部，现在补充了一些未经训练的新兵。这样的军队是不能打仗的。确切些说，在撤退以及在后方组织第二支军队时，也许可以用这支军队抵挡一阵，但要这支军队沿着曾丢盔弃甲的道路重新发动进攻，那是不可思议的。我声明，重蹈过去错误的覆辙将使我们付出十倍的代价，我不服从拟议中的决定，并将诉之于党。列宁虽然在形式上仍坚持继续战争，但是已不像上一次那样有信心，那样坚决了。我坚定不移地主张必须缔结和约，哪怕是一个条件苛刻的和约，对列宁产生了应有的影响。他建议暂缓作出决定，等我巡视西方战线和我军的后撤的情况获得直接的印象之后再谈。对我来说，这意味着，列宁实质上已经同意我的立场。

在前线指挥部里，我发现人们的情绪倾向于再打一仗。但是他们没有一点信心，他们仅仅反映了莫斯科的情绪。我沿着军队的阶梯越往下走——从军到师、到团、到连，就越清楚，要打一场进攻性战争是不可能的。我就这个问题给列宁写了一封信，信是用手写的，甚至没有留下抄本，然后就继续去巡视了。我在前线只呆了两三天时间，但是已足以证实我来前线前作出的那个结论。我回到了莫斯科，政治局几乎一致决定立即缔结和约。

在波兰战争中的战略估计上的错误造成了严重的历史后果。皮尔苏茨基的波兰战后立即得到了巩固。相反地，波兰革命的发展却遭到严重的打击。根据里加条约确定的疆界，苏维埃共和国与德国不再接壤，这一事实后来在两国生活中具有特殊的意义……列宁自然比任何人都更了解“华沙”错误的影响，他曾不止一次地想到和谈到这个错误。

在不肖徒辈的著作中，列宁被描绘得有点像苏兹达利圣像画家笔下的圣徒和基督——不是完美的形象，而是一幅滑稽的漫画。尽管圣像画家力求画得高于自身，但是归根到底他们在画板上反映的

只是自己的情趣，因而他们画出的是自己的肖像，只不过加以理想化而已。由于不肖徒辈的领导威信是用禁止人们怀疑它的正确来维持的，所以在他们的著作中列宁不是一个能够天才地洞察形势的革命战略家，而是一个从来不会作出错误决定的机器人。说列宁是天才，是我第一次提出的，当时其他人还不敢使用这个词。是的，列宁是天才，集人类天才之大成。但列宁并不是不犯错误的计算机。他犯的错误比其他任何一个处于他这种地位的人要少得多。但他犯过错误，是很大的错误，是与他工作的巨大规模相当的。

## 第三十八章

# 向新经济政策过渡及 我同列宁的关系

现在已接近我与列宁共事的最后一个时期。这个时期之所以重要，还因为这一时期已经奠定了不肖徒辈在列宁逝世后取得胜利的基础。

列宁逝世后建立了一个旨在歪曲我和列宁关系的设有地方机构的复杂的历史资料组织。其主要手法是从历史中找出我和列宁存在分歧的东西，拿争论中的个别措辞，乃至进行纯粹的捏造，提供一幅两种“原则”进行不断斗争的情景。同这些不肖徒辈的历史著作相比，中世纪辩护士笔下的教会史可以说是科学著作的样板了。由于下列情况，他们在某种程度上干起来要容易些——当我与列宁的意见不一致时，我就直言不讳地说出来，必要时还诉之于党。至于现在的不肖徒辈，他们同列宁发生分歧的次数要比我多得多，而一旦与列宁发生意见分歧，他们通常是避而不答，或者像斯大林那样，绷着脸躲到莫斯科郊外的村子里去隐居几天。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我和列宁各自作出的决定，在所有的基本问题上是一致的。只要一言半语我们就相互理解了。当我感到政治局或人民委员会的决定可能是不正确时，我就给列宁写个小纸条。列宁总是这样回答：“完全正确。请提建议。”有时他会询问我是否同意他的建议，要求我发言支持他。他经常用电话同我一起商量如何处理某个问题，如果问题很重要，他就会一再坚持说：“请您一定来一下，一定。”在我们发表一致的意见

时——在绝大多数原则问题上都是如此，那些对决定不满的人，包括现在的不肖徒弟，就干脆保持沉默。曾经多次发生这样的情况，斯大林、季诺维也夫或加米涅夫在极重要的一些问题上不同意我的观点，但当他们获悉列宁跟我意见一致后，便立即不吭声了。“门徒们”准备为了列宁的主张而放弃自己的意见，对此怎么看都可以。这种准备一点也不能保证没有列宁他们也能够作出列宁式的决定。

在本书中，我同列宁的分歧具有在现实生活中从未有过的那种地位。这有两个原因。发生分歧是一种例外，正因为如此，它引人注目。列宁逝世以后，这些分歧被不肖徒弟夸大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带有一种与我俩毫不相干的独立的政治因素性质。

我曾用单独一章十分详细地叙述了我同列宁在布列斯特和约问题上的分歧。现在应当提一下另一次分歧，这次分歧发生在向新经济政策过渡的前夕，即在1920到1921年之交，这次分歧使我们相互间的对立持续了两个多月左右。

毫无疑问，所谓工会问题的争论曾一度使我俩的关系蒙上了阴影。我俩是革命家和政治家，因此不善于或者说不愿意把私事和公事分开。在这次争论中，斯大林和季诺维也夫获得了可以称为合法的机会，把反对我的斗争从幕后转到台上。他们竭尽全力地利用了这种局势。对他们来说，这是后来反“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预演。但是，正是这方面的问题使列宁最感不安，他采取了一切措施来制止它。

在这场争论的政治内容里竟塞满了大量的垃圾，那些想搞清事实真相的未来的历史学家们的处境是不值得羡慕的。迟些时候，在列宁逝世以后，那些不肖徒弟发现我当时所持的立场“低估”农民，几乎是敌视新经济政策。以后的所有斗争实质上都是建立在这一点上的。事实上，这场争论的根子具有截然相反的性质。为了揭露事实真相，应当稍稍作些回顾。

1919年秋天，损坏的机车数量达百分之六十，当时测定，到1920年春天，损坏的机车数量将达到百分之七十五。这是优秀的专家们作出的判断。在这种情况下，铁路运输已毫无意义。因为百分之二

十五正常的机车只能满足铁路自身的需要，铁路靠笨重的木材作燃料。在那几个月里实际管理运输工作的罗蒙诺索夫工程师向政府展示了一张机车瘟疫曲线图。他精确地指着1920年中的一个点说：“到这里就是死亡。”

“那该怎么办呢？”列宁问道。

“不会有奇迹”，罗蒙诺索夫回答道，“布尔什维克也不可能创造奇迹。”我们面面相觑。我们谁都不懂运输技术，也不懂得如此令人丧气的计算技术，因此情绪就更沮丧了。“但我们还是要试一试创造出奇迹来。”列宁冷冷地说了一句。

可是在后来的几个月里，情况继续恶化。客观原因多的是。但是很可能某些工程师故意使运输情况符合图表上的曲线。

1919至1920年之交的几个月，我在乌拉尔领导经济工作。列宁给我发来一封电报，建议我负责领导运输工作，试用非常措施来振兴交通运输。我在回电中表示同意。

我从乌拉尔带回大量的有关经济方面的考察报告，这些报告的总的结论是：应当抛弃军事共产主义。我在实际工作中看得非常清楚，国内战争的形势迫使我们采取的军事共产主义的方法已经过时，为了发展经济，无论如何必须导入个人物质利益的成分，即在这种那种程度上恢复国内市场。我向中央委员会递交了一个用粮食税取代粮食征收制和实行商品交换的方案。

“……目前实行的按照粮食定额平均征收，用连环保进行收购，以及工业品的平均分配的政策，势必降低农业生产，使工业无产阶级处于涣散状态，有使国家的经济生活遭到彻底破坏的危险。”我在1920年2月给中央委员会的报告中写道。

声明还说：“……粮食资源有枯竭的危险，无论怎样改进征收机关都无法改变这种状况。要制止这种经济衰退的趋势，只有采用下列办法：1. 用按照某种百分比计算的办法（即某种累进的实物所得税）来代替粮食征收制，其计算办法应使较大的播种面积或较好的耕作能得到好处；2. 向农民提供的工业品应和向农民收购的粮食数量相当，这一点不仅适用于乡和村，而且也适用于农户。”

如我们看到的，这些建议是非常谨慎的。但是，不应当忘记，一年后通过的新经济政策的原则刚开始并没有超过它们。

列宁在1920年初坚决反对这个建议。建议在中央委员会里以11票对4票被否决了。后来的事态进程证明中央委员会的决定是错误的。我没有把这个问题提到代表大会上去讨论，这次党代会自始至终都是在军事共产主义的标志下进行的。此后整整一年中，经济仍在死胡同里挣扎。我与列宁的分歧就是由这条死胡同引起的。既然向市场关系过渡的建议被否决了，我便要求正确地、系统地应用“军事”方法，以使经济取得实际成效。在军事共产主义体制下，一切资源至少在原则上是国有化的，并且是按照国家的规定进行分配的，因此我看不出有工会发挥独立作用的余地。如果说，工业的生存有赖于国家保证向工人提供必要的粮食，那么工会就应当纳入国家管理工业和分配粮食的体制。这便是工会国家化问题的实质，此国家化是军事共产主义体制的必然产物，我所坚持的工会国家化的含义也正在于此。

在第九次代表大会上通过的军事共产主义原则是我在交通运输部门工作的依据。铁路工会与行政机关有最密切的联系。整个交通运输部门都采取纯军事纪律的方法。当时最有力、最守纪律的部门是军事部门，我把它同交通运输部门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样做有很大的好处，特别是波兰战争爆发后，军事运输在交通运输工作中又占了主要地位。每天我在军事部门和交通人民委员部之间来回奔忙，军事部门的工作破坏了铁路，而交通人民委员部不仅要竭力拯救铁路线使其免遭彻底崩溃，而且还得提高运输效率。

在交通运输部门工作的这一年对我个人来说是学习的一年。组织社会主义经济中的一切原则问题都在交通运输部门得到最集中的体现。大量的各种型号的机车和车厢塞满了铁路线和修理工厂。在革命前，交通运输部门一半属于国家，一半属于私人，使这个部门的工作正常化，是大量准备工作的对象。机车按型号分类，维修工作比较有计划地进行，维修工厂根据设备情况接受准确的任务。计划花4年半的时间使运输能力达到战前水平。这些措施取得了显著成

效。1920年春夏,交通运输工作开始摆脱瘫痪状态。列宁一有机会就谈论铁路的修复问题。如果说在皮尔苏茨基发动这场战争中的首要目标是摧毁我们的交通运输,而波兰没有得到预期的结果,那么正因为如此,铁路运输的曲线开始稳步上升。我们靠非常的行政措施取得了这些成就,运输部门的严重情况,以及军事共产主义体制本身都要求采取这些措施。

然而经过三年内战的工人群众越来越不能容忍军事命令的方法。列宁凭着他那正确无误的政治本能,感觉到危急关头已经来临。我出于纯经济的考虑,根据军事共产主义原则,竭力使工会进一步鼓起气来,而列宁却基于政治考虑主张减轻军事压力。第十次代表大会前夕,我们的路线发生了对抗性的冲突。党内爆发了一场争论。但争论是完全不切题的。党讨论的是,应当以什么样的速度实行工会国家化,而实际问题却是糊口的粮食问题、燃料问题和工业原料问题。党狂热地争论“共产主义学校”问题,而实际上的问题却是经济灾难已经迫在眉睫。喀琅施塔得和坦波夫省的暴动作为一种最后警告介入了争论。列宁提出了向新经济政策过渡的初步的、非常谨慎的主张。我立即表示赞同。对我来说,这些主张仅仅是重申了我在一年前提出的建议。关于工会问题的争论顿时失去了任何意义。在代表大会上,列宁没有参加这一问题的争论,而是让季诺维也夫去玩弄没有内容的空弹壳。我在大会讨论时告诫说,以多数通过的关于工会问题的决议等不到下次代表大会就会失效,因为新的经济方针要求全面地修正工会的战略。果真如此,几个月以后,列宁就根据新经济政策制定了关于工会的作用和任务的崭新的原则。我完全同意他的决议案。我们之间又恢复了一致。可是列宁担心,由于长达两个月之久的争论,党内会形成稳固的小集团,从而毒化党内关系,使工作难以进行。不过我在大会期间已经停止同那些在工会问题上的观点一致的人会商。代表大会召开以后几个星期,列宁深信,我同他一样关心取消已不具备任何原则基础的临时小集团。列宁马上感到安心了。针对第一次当选中央委员的莫洛托夫对我进行的放肆的批评,列宁指责他过于热心,却缺乏理智,并附带指出:“托洛茨基同志



在党内关系方面的忠诚是绝对无可非议的”。这句话他斩钉截铁地重复了几次。很清楚，列宁回击的不只是莫洛托夫，而且还有其他某些人。因为斯大林和季诺维也夫企图人为地延续争论。

斯大林恰恰是在第十次代表大会上，根据季诺维也夫的推荐，违背列宁的意愿，被推举为总书记的。<sup>①</sup>代表大会深信，这是整个中央委员会提出的候选人。不过谁也没有赋予这次选举以特殊意义。在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上第一次设立的总书记职务，在列宁生前是个技术性的职务，而不具有政治性质。然而列宁还是感到不安，他常常这样评论斯大林：“这个厨师将只做辣菜。”正因为如此，在代表大会后的中央委员会会议上，列宁再三强调“托洛茨基的忠诚”，这是他对令人不能容忍的阴谋活动的反击。

列宁这句话并不是信口而出的意见。在国内战争期间，有一次列宁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在行动上表示了对我的绝对信任，这种信任是一般人不可能从别人那里得到的，也不可能将它给予别人的。这样做的起因还是那个由斯大林幕后操纵的军事反对派造成的。战争时期我手中集中了权力，这种权力实际上可以称之为无限的权力。革命法庭设在我的专列上，前线归我指挥，后方则服从前线，在某些时期，几乎全部未被白军占领的共和国领土都是后方和设防地区。每个被战争的车轮压伤的人都有自己的亲人和朋友，他们尽一切可能去援救自己的亲人。请求书、申诉书、抗议书通过各种途径集中到莫斯科，特别是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那里。最初的几件插曲还同斯维亚日斯克那几个月里所发生的事件有关。我在前面已经谈过，我曾把拉脱维亚第四团团长送交法庭，因他要把该团撤出阵地。法庭判处罪犯5年徒刑。可是才过几个月就来了不少要求予以开释的请愿书。斯维尔德洛夫受到的压力特别大。他把问题提交政治局。我简要地阐述了当时团长以会造成“危及革命的后果”的军事形势来威胁我。在我介绍的过程中，列宁的脸色越来越阴沉下来。我语音

<sup>①</sup> 1922年4月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后的中央全会推选斯大林为党中央总书记，原文有误。——译注

刚落,他就用暗哑的声音(这是他极端气愤的表示)喊道:“让他关在那儿,让他关在那儿”……斯维尔德洛夫看看列宁,又看看我,说:“我的想法也是如此。”

第二件事则更加重要,是由枪决了一名团长和一名政委引起的,这两个人把部队撤离了阵地,并且武装劫持了一艘汽船,准备驶往下诺夫哥罗德。该团是在斯摩棱斯克组建的,此地担负领导工作的是些反对我的军事政策的人,虽然后来他们成了这一政策的热烈拥护者,但在当时他们却在吵吵嚷嚷。中央委员会应我的要求而任命的一个委员会一致承认军事当局采取的行动是完全正确的,即出于整个局势的需要。可是模棱两可的谣言并没有中止。我多次感觉到谣言是在离政治局不远的地方传出来的。可是我没有时间去调查和查明阴谋。只是有一次,我在政治局会议上说,如果不在斯维亚日斯克采取严酷的措施,我们现在就不可能坐在这里开政治局会议了。“绝对正确!”列宁附和说,并当即用红笔在一张盖有人民委员会印记的空白公文纸下方,像通常那样,迅速地写了几行字。列宁是会议主席,因此会议停了下来。两分钟后,他把写有下列文字的公文给了我:

人民委员会主席  
莫斯科,克里姆林宫  
1919年7月……

同志们!

我清楚托洛茨基同志命令的严厉性质,但我相信,而且绝对相信托洛茨基同志的命令是正确的,适当的,对事业的利益是必要的,因此我完全支持这一命令。

弗·乌里扬诺夫·列宁

“这样的公文，要多少我就给您多少。”列宁说道。在国内战争的严峻局势下必须作出匆忙的、不可改变的决定，其中有的还可能是错误的，在这种情况下，列宁在我认为将来有必要采取的任何一个决定上事先签上字。而这些决定又都是关系到人的生死存亡的。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信任有大过于此的吗？列宁之所以会产生给我这种不平常的文件的想法，是因为他比我更了解或者怀疑阴谋的来源，并认为必须给以狠狠回击。但列宁之所以能采取这种措施，只是因为他深信，我不会有不忠诚的行动或者滥用权力。此寥寥数语充分表达了他对我的这种信任。不肖徒辈要在他们那里找到此类文件，那是徒劳的。斯大林在他的档案中只能找到他对党隐瞒的那份列宁“遗嘱”，其中说斯大林是不忠诚的、会滥用权力的人。这两份材料——一份是列宁向我表示的道义上的无限信任，一份是他发给斯大林关于他的品行的“狼的护照”，<sup>①</sup>只要把这两份材料加以对照，列宁对我和对斯大林的态度就一清二楚了。

<sup>①</sup> “狼的护照”即黑籍证，是沙俄时代发给犯人的身份证。——译注

## 第三十九章

# 列宁卧病

1920年春，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前，我得到了第一次休假。在莫斯科郊区住了约两个月。在此期间，我一边治病——大体上从这时起我开始进行认真的治疗，一边仔细地草拟了那篇后来几年代替共产国际纲领的宣言，还打打猎。经过多年的紧张工作，我很想休息一下。但没有休息的习惯。那时散步对我来说不是休息，现在也是如此。而打猎却是诱人的，因为它能对人的意识起到药敷患处的作用……

1922年5月初的一个星期天，我在莫斯科河的老河道畔用鱼网捕鱼。天下着雨，草淋湿了，我在一块斜坡上滑倒了，脚扭了一下。伤不重，只需躺几天。第三天，布哈林来看我。“您也病倒了！”他惊叫道。“除了我还有谁病了？”我问道。“伊里奇情况不好，中风了，不能走路，也不能说话。医生们束手无策。”

列宁非常关心同事们的健康，在这种时候他常常回忆起一个流亡者的话：老人会死绝，年轻人会顶不住的。他常说：“在我们中间是否有很多人了解欧洲的现状，世界工人运动的现状？既然只有我们在搞革命，那我们党上层的国际经验就是无可取代的。”在人们的心目中，列宁是个健壮的人，他的身体似乎是一座坚不可摧的革命砥柱。他总是那么活跃、机警、和蔼、开朗。我只是偶尔见到他忧虑不安。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期间，他精神疲惫，嗓音沙哑，笑容中带有病态，我感到很惊讶。我不止一次对他说，他在次要问题上花费的精力太多了。他同意我的看法，但没有别的办法。他有时诉说头

痛，但经常是顺便提提，还有点不好意思。不过，只要休息两三个星期就好了。列宁的精力似乎是无穷的。

1921年底，他的健康状况恶化了。12月7日，他写了一张便条给政治局委员：“我今天动身。尽管近来我减少了工作，增加了休息，但失眠却更加严重了。我担心，不能到党的代表会议和苏维埃大会上作报告了。”列宁在莫斯科附近的一个村子里住了不少日子，但他仍然密切关注着各项工作的进展情况。当时，正在为热那亚会议作准备。1922年1月23日，列宁给政治局委员写了一封信：

“刚刚收到契切林的两封信(20日的和22日的)。他提出一个问题：可否为得到相当的补偿而同意对我国的宪法作些小的改动，即让寄生分子在苏维埃中有代表权。这样做是为了迁就美国人。我认为，契切林的这个建议表明，应将他(1)立即送进疗养院，这方面的任何姑息、拖延等等，在我看来都是对一切谈判的极大威胁。”<sup>①</sup>这封在政治上毫不留情并带有善意讽刺的信，每一句话都显示出列宁还是生气勃勃的。

他的健康状况继续恶化。3月间，他头痛加剧。但医生却查不出任何器质性的疾病，只能让他长期休息。列宁在莫斯科近郊的一个村子住了下来，深居简出。5月初，他在那儿第一次中风。

看来，列宁中风已经三天了。为什么不马上告诉我？当时我并没有产生任何怀疑。布哈林只是重复“长者们”提示给他的话，但讲得很真诚。在那个时期，布哈林完全以布哈林的方式，半歇斯底里、半孩子气的方式依恋着我。他谈了列宁的病情后，扑倒在我床上，隔着毯子拥抱我，哭着说：“您可别生病，我求求您，别生病啊……有两个人，我一想到他们会死，就感到可怕……这就是伊里奇和您。”我亲切地安慰他，使他平静下来。他妨碍我把注意力集中在他带来的消息所引起的不安上。这是一个令人震惊的打击。革命本身仿佛也屏住了呼吸。

娜·伊·谢多娃在其日记中写道：“最初关于列宁生病的消息只

<sup>①</sup>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52卷，第225页。 一译注

在私下流传。好像从来也没有人曾经想到列宁会生病。许多人都知道，列宁很关心别人的健康，而他自己似乎是不会生病的。由于劳累过度，差不多所有老一辈革命家的心脏都有病。医生们抱怨说：“几乎所有的发动机都运转不灵了。”“只有两颗心脏是完好的”，格季耶教授对列夫·达维多维奇说，“那就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和您的心脏。有这样的心脏可以长命百岁。”外国医生的检查证实，在莫斯科经过他们检查的人中，唯有列宁和托洛茨基的心脏工作特别正常。列宁身体突然垮下来的消息传开后，托洛茨基感到好像革命本身发生了转折。难道列宁他会像其他人一样病倒、死去吗？列宁失去了行动和说话的能力，这令人难以接受。大家坚信，他将战胜病魔，重新站起来，并恢复健康……”这就是当时全党的情绪。

很久以后，当回想起我直到第三天才得知列宁生病的消息时，仍感到很奇怪。对此当时我并没在意。然而这绝非偶然。那些早就准备和我作对的人，首先是斯大林，力图赢得时间。因列宁的病情随时可能产生悲剧性的结局。明天，甚至今天都会直截了当地提出整个领导问题。对手们认为，哪怕争取到一天的时间作准备也是很重要的。他们私下进行了商议，探索斗争方法和手段。可以认为，这时“三驾马车”（斯大林—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就已经萌生了和我作对的想法。但是，列宁康复了。顽强的意志使他的机体作出了巨大的努力，他那因缺血而衰竭并且丧失语言能力的大脑突然恢复了活力。

5月底，我到莫斯科城外80俄里的一个地方去打鱼。那儿有一个以列宁名字命名的儿童疗养院。孩子们陪伴我在河畔散步，他们向我打听列宁的身体状况，还请我把一束野花和一封信转给列宁。那时列宁还不能提笔写字。他通过口授，由秘书给我写了一封短信：“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要我写信告诉您，他同意您的建议，以他的名义送一份礼物给向日葵站疗养院的孩子们。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还请您转告孩子们，说他非常感谢他们热情的来信和鲜花，遗憾的是他不能应邀前来，但他深信，一定能恢复健康，来到他们中间。”

到了7月，列宁已能下床行走。虽然直到10月才正式恢复工作，但他始终注视并研究着一切。在这几个月的休养期间，他最关注

的一个问题是社会革命党人审讯案。社会革命党人杀害了沃洛达尔斯基和乌里茨基，使列宁受了重伤，并曾经两次企图炸毁我的专列。对此我们是不能轻易放过的。尽管我们不像敌人那样以唯心主义观点看问题，但我们知道“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如果听任敌人把我们党的领导人全部杀绝，那会给革命造成多大的危险，我们不能对此熟视无睹。

我们的人道主义朋友们，不管是急性的，还是冷静的，都曾不止一次地对我们说过，对于一般镇压的必要性他们还可以理解，但枪毙抓到的敌人已超过必要的自卫界限。他们要求我们“宽宏大量”。克拉拉·蔡特金以及其他一些欧洲共产党人当时还能畅所欲言，敢于反对我和列宁的意见，坚持要我们饶恕被告的性命，建议我们只把他们判处监禁。这似乎很简单。可是在革命时代，对个人的镇压问题具有十分特殊的性质，在这种特殊性面前，人道主义的一般原则是毫无用处的。当时进行的是直接夺取政权的斗争，这是你死我活的斗争——这就是革命，在这种情况下，对于那些指望在最近几周内夺取政权，把掌权者投入监狱甚至斩尽杀绝的人来说，监禁有什么意义呢？从所谓个人绝对价值的观点看，革命同战争以至整个人类历史一样，都应以“谴责”。然而，个人这一概念本身是由于革命才出现的，并且这一过程远未完成。为了使个人的概念成为现实的概念，为了使“群众”这个有些被蔑视的概念不再成为哲学上的“个人”这个享有特权的概念的对立物，就需要使群众本身通过革命的起重机，确切些说，通过一系列革命，把自身提高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梯。从标准哲学的观点看，这条道路好不好我不知道，并且老实说，我对此也不感兴趣。不过我清楚地知道，这是人类迄今为止所知道的唯一的道路。

这些考虑并不是企图为革命恐怖“辩护”。企图为之辩护，这就意味着理会那些提出指责的人。然而，他们是些什么人呢？是组织世界大屠杀并从中渔利的人吗？是在茶余饭后为表示对“无名战士”的敬意而点燃芬芳的雪茄的暴发户吗？是在和平时期从事反战，并准备再次举办丑恶的假面舞会的和平主义者吗？是自以为有权因霍亨索伦王朝的罪行（和他们自身的罪行）而让德国儿童挨饿的劳合一

乔治·威尔逊和彭加勒吗？是从绝对安全的彼岸煽起俄国国内战争，并从战争的血海中捞取好处的英国保守党人或者法国共和党人吗？这样的点名可以一直点下去。对我来说，问题不在于作哲学上的辩解，而在于作政治上的解释。革命之所以是革命，就因为它把发展中的一切矛盾归结为生与死的抉择。有一些人每隔半世纪用累累白骨去解决阿尔萨斯-洛林的归属问题，可以相信这种人能够仅仅借助于议会上的语言来改造社会关系吗？至少还没有人向我们表明怎么办。我们借助于钢铁和炸药摧毁了古老的顽石的反抗。当敌人用最聪明、最民主国家的步枪向我们射击的时候，我们以同样的方式回敬他们。在这个问题上，萧伯纳对双方都表示谴责，可谁也没去理会他那套神圣的理由。

1922年夏，镇压的问题具有特别尖锐的性质，因为这一次事情涉及到这样一个政党的领袖。这个党曾经同我们一起进行反对沙皇制度的革命斗争，而十月革命以后却把恐怖的武器转向了我们。从社会革命党阵营中叛逃出来的人向我们透露，最严重的几次恐怖行动并不像我们最初想象的那样是个别人搞的，而是社会革命党组织的，虽然这个党没敢对它们所完成的暗杀正式承担责任。法庭判处死刑是必要的，但执行死刑必然会遭到恐怖分子的疯狂报复。如果把惩罚局限于监禁，即使是长期监禁，那简直就是鼓励恐怖分子，因为他们根本就不相信苏维埃政权会长久。在这种情况下没有别的办法，只好宣布是否执行死刑取决于该党是否继续进行恐怖斗争。换言之，该党的领袖成了人质。

列宁康复后和我第一次见面，正好是在审判社会革命党人的时候。他欣然赞同我的主张：“完全正确，没有别的办法。”

身体的康复显然给列宁以鼓舞。但他内心的忧虑依然存在。他困惑地说，“您知道，我现在连说话写字都很困难，一切都得从头学起。”说罢，他迅速向我投来似乎是询问的一瞥。

10月间，列宁已经正式恢复工作，主持政治局和人民委员会。11月发表了纲领性的讲话，这次讲话显然严重影响了他的血管。

列宁当时已觉察到一些蛛丝马迹，知道由于他生病，有人背着他



和我在进行阴谋活动。这些不肖徒辈还没有公开焚烧和炸毁桥梁，但他们在某些地方锯断横梁，在某些地方悄悄地埋下炸药。他们抓住每一个有利机会来反对我，就好像是在锻炼自己的独立性，并精心准备此类示威。随着工作的深入，列宁发现了在最近10个月来所发生的变化，越来越感到不安了，但他暂时还不露声色，以免关系紧张。但他准备给“三驾马车”以回击，并从个别问题入手。

我曾通过党的系统，即不公开地非正式地领导过十来种份外工作，开展反宗教宣传就是其中之一，列宁对这项工作很感兴趣。他不止一次地坚持要我过问这项工作。在休养期间，他不知怎么了解到斯大林在这一部门也玩弄手腕和我作对，用改组反宗教宣传机关的方法把我排挤开。列宁就从乡下给政治局发了一封信，他在信中似乎毫无特殊必要地引述了我那本反对考茨基的专著，对书的作者大加赞扬，不过没有提及书名和作者的名字。应该承认，我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这是列宁以迂回的方式谴责斯大林对我玩弄手腕。那时，推举了雅罗斯拉夫斯基来领导反宗教的宣传工作，好像是以我的副手的身份。列宁恢复工作后听说了此事，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狠狠地批评了莫洛托夫。实际上也就是斯大林：“雅—罗—斯—拉—夫—斯—基？难道你还不了解雅·罗—斯—拉—夫—斯—基吗？这真是荒唐至极！他哪里管得了这项工作？”等等。对不了解内情的人来说，列宁发这么大的火似乎过分了。然而，问题并不在于雅罗斯拉夫斯基，诚然，列宁对他实在难以容忍，问题在于党的领导。这样的事，实在是不少。

实际上，从斯大林较密切地接触列宁之时起，也就是说，尤其是自十月变革以来，他对列宁就一直持无力的，因而更加暴躁的暗中反对立场。他大概想和我接近。我只是很久以后才看清他企图同我建立某种亲昵关系的真实意图。但是我很讨厌他身上那些后来，在衰退时期，成为他的力量之所在特性：兴趣狭窄，经验主义，性格粗暴，以及一种独特的乡巴佬式的犬儒哲学——尽管马克思主义已经使之摆脱了不少偏见，然而并没有以一种经过深思熟虑的和深入到内心中去的世界观去取代它。他提出过一些零零星星的意见，当时

给我的印象是偶然提出的，但事实未必如此。从这些意见可以看出，斯大林企图从我这里寻求支持，以对抗使他感到难以忍受的列宁的监督。每逢他有这样的企图，我都本能地后退一步，从边上绕过去。我想，应从这里寻找斯大林仇视我的根源。同他气味相投的人，希望老老实实生活的头脑简单的人，乃至受委屈的人，都被斯大林有计划地网罗到自己身边。第一种人、第二种人和第三种人为数都不少。

毫无疑问，对于处理日常工作，在许多情况下列宁依靠斯大林、季诺维也夫或加米涅夫比依靠我更合适些。列宁总是非常注意节省自己和其他人的时间，他力图少花精力去克服内部摩擦。我有自己的观点，自己的工作方式，也有自己的办法去贯彻已经通过的决定。列宁对此非常了解，也很尊重。正因为如此，他完全明白，我不适于执行指示。当需要有人去执行他交办的日常任务时，他就去找别人。这种情况有些时候，特别是在列宁和我有分歧的时候，会使他的助手们产生他们同列宁特别亲近的想法。例如，列宁起初让李可夫和瞿鲁巴，后来又增加了加米涅夫，去担任人民委员会主席的副手。我认为这样的选择是正确的。列宁需要顺从的干实际工作的助手。而这种角色对我来说是不合适的。因此我只能感激列宁没有建议我当他的副手。我认为，这里绝对不存在列宁对我的不信任，恰恰相反，这是对我的性格和对我们相互关系的肯定，而不是使我感到不快的评价。稍迟一些的时候，我就得到了一次绝好的机会来证实这一点。在列宁第一次中风后到第二次中风前的那段时间里，他只能用自己以前的一半精力工作。他的心血管系统一直有轻微的、然而又是危险的病症。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他站起身来，要递张纸条给一个人（列宁总是以这种交换纸条的方式来加快工作进程），他稍稍摇晃了一下。我之所以发现这一情况，是因为他的脸部表情瞬间起了变化。这是他的生命中枢发出的许多警告之一。列宁对此并不抱幻想。他从各方面仔细考虑，没有他或他死后工作将如何进行。后来那份以“遗嘱”闻名的文件，就是他在这个时期酝酿出来的。在此期间，即他第二次中风前的最后几个星期里，列宁就我以后的工作问题和我进行了一次长谈。鉴于这次谈话政治上的重要性，我立即将谈话内容

转告给一些人(拉柯夫斯基、伊·尼·斯尔米诺夫、索斯诺夫斯基、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和其他人)。因为多次重复,这次谈话在我的记忆中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事情是这样的。教育工会中央委员会派了一个代表团来见我和列宁,要求我附带管一下教育人民委员部,就像我曾用一年时间领导过交通人民委员部那样。列宁征询我的意见。我对他说,教育事业同所有其他事业一样,困难来自机关。“对,我们的官僚主义太可怕了,”列宁赞同说,“我恢复工作后,感到非常震惊……但正因如此,依我看,除了军事部门,您不应该陷入各个部门的工作。”接着列宁态度坚决,情绪激动,热烈地阐述了他的计划。他能够用于领导工作的精力很有限。他有三个副手。“您了解他们。加米涅夫当然是个聪明的政治家,但他算什么行政领导人呢?瞿鲁巴病了,李可夫也许算得上是个行政领导人,但他还得回到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去。您必须出任副主席。形势就是这样,我们需要对人事作重大的改组。”我再次提到了“机关”,它甚至使我在军事部门的工作都越来越难以开展。“这么说,您可以整肃机关了。”列宁马上用我过去曾经用过的说法表示赞同。我回答说,我指的不仅是国家机关的官僚主义,而且还有党的官僚主义;全部困难的关键就在于这两种机关的结合,在于那些聚集在党的各级书记周围的权势集团的相互包庇。列宁聚精会神地听着,并以那种深沉的发自肺腑的语调确认了我的想法,他只有在相信交谈者完全理解自己的意思,因而无需谈话的俗套,就可以坦率地涉及最重要、最令人不安的问题的时候,才会用这样的语调。列宁考虑了一下,直截了当地问道:“就是说,您建议不仅向国家机关的官僚主义开火,而且还要向中央组织局开火?”由于出乎意料,我忍不住笑了起来。组织局就是斯大林机关的核心。“好像是这样的。”我们直言不讳地点出了问题的实质,这显然使他感到满意,他继续说下去:“那好吧,我提议和您建立联盟——反对所有的官僚主义,特别是反对组织局。”我回答说:“同一个好人结成一个好联盟,我深以为荣。”我们约定过些时候再见面。列宁建议我考虑一下组织方面的事。他打算设立一个直属中央委员会的反官僚主义委员会。我们两人都要参加

这个委员会。该委员会实质上应当成为摧毁官僚主义的支柱——斯大林派系的杠杆，在党内创造条件，使我能成为列宁的副手，按照他的想法是，成为人民委员会主席职务的继任者。

只有看到这一点才能充分理解所谓遗嘱的含义。列宁在遗嘱里一共提到六个人，并且字斟句酌地对每个人作了评价。遗嘱的无可争辩的目的是使我便于从事领导工作。自然，列宁希望在尽量减少个人摩擦的情况下做到这一点。他以非常谨慎的态度谈论每一个人。他使那些实质上毁灭性的评论也具有温和的色彩。与此同时，他十分明确地，然而语气婉转地提出了第一把手的人选。只有在评价斯大林时才用了另一种语气，在后来的遗嘱附言中，这种语气简直是毁灭性的。

关于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列宁似乎顺便提到，他们在1917年的投降“不是偶然的”；换言之，这是他们的本性。这种人显然不能领导革命。但也不必因过去的事而埋怨他们。布哈林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而是烦琐哲学家，但很可爱。皮达可夫是个有能力的行政领导人，但却是一个蹩脚的政治家。不过，布哈林和皮达可夫这两个人还有可能学习上进。最有才能的是托洛茨基，他的缺点是过于自信。斯大林则是粗暴，不忠诚，惯于滥用党的机关赋予的权力。为了避免分裂，必须撤换斯大林。这就是遗嘱的真谛。它补充并阐述了列宁在同我最后一次谈话中的提议。

列宁是在十月革命后才真正了解斯大林的。他赏识斯大林的坚性格和讲究实际的精神——其四分之三是狡诈。与此同时，列宁每走一步，都会看到斯大林的无知，看到他政治上眼界极端狭隘，道德上极端粗暴和放肆。斯大林当选总书记是违背列宁意愿的，列宁之所以容忍，是因为当时党是由他亲自领导的。但在列宁第一次中风后带着病体恢复工作时，就把领导班子的问题全面地提上自己的议事日程。为此他同我谈话。为此他立下了遗嘱。遗嘱的最后部分是1月4日写的。此后又过了两个月，在此期间情况就更加明朗了。这时，列宁不仅准备撤销斯大林的总书记职务，而且还想向全党宣布他没有资格担任这一职务。列宁在对外贸易垄断问题、民族问

题、党内体制问题、工农检察院和监察委员会等问题上进行了系统的、坚持不懈的斗争，准备在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对以斯大林为代表的官僚主义、官官相护、独断独行、恣意妄为和粗暴作风给予沉重的打击。

列宁是否能够实行他所拟定的党的领导层的改组呢？在当时是毫无疑问的。在这方面已有不少先例，其中有一件事我记忆犹新，意味深长。1922年11月，当时列宁还在乡间休养，我也不在莫斯科，中央委员会一致通过了一项决议，使对外贸易的垄断受到难以挽回的打击。<sup>①</sup>列宁和我不约而同地发出警报，接着又互通信件，协调我们的行动。几星期后，中央委员会像一致通过决议时那样，又一致同意撤销这项决议。12月21日，列宁胜利地写信给我：“好像仅仅调动了一下兵力，就一枪不发地拿下了阵地。我建议不要停顿，要继续进攻……。”<sup>②</sup>如果我们在1923年初联合反对中央委员会，胜利是绝对有保证的。不仅如此，我也毫不怀疑，如果在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前夕我以“列宁—托洛茨基联盟”的精神去反对斯大林的官僚主义，那么就是没有列宁直接参加，我也会取得胜利的。至于胜利的巩固程度如何，则是另一个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考虑到国内、工人阶级内和党本身内部的许多客观过程。那是一个独特的大课题。克鲁普斯卡娅在1927年曾经说过，要是列宁还活着，大概也已被关进斯大林的监狱了。我认为她说得有道理。因为问题并不在于斯大林，而在于斯大林所代表的、甚至连他自己都未意识到的那些势力。不过，在1922至1923年间，向当时正在迅速形成的民族社会主义官僚派别、机关的篡权者、十月革命的非法继承人、布尔什维主义的不肖徒辈发起公开进攻，夺取领导地位还是完全有可能的。然而，这样做的主要障碍却是列宁本人的身体状况。大家都盼望他会像第一次中风后那样重新站起来，像出席第十一次代表大会那样出席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他自己也希望能这样。医生还是寄以希望，虽然把握

① 此事应是1922年10月。——译注

②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52卷，第553页。——译注

越来越小。反对机关分子和官僚的“列宁-托洛茨基联盟”的思想，当时只有列宁和我充分了解，政治局的其他委员只是隐约有些感觉。列宁关于民族问题的信，和他的遗嘱一样，还没人知道。我的举动会被看作，确切些说，会被解释成是我为争夺列宁在党和国家中的地位而进行的个人斗争。一想到这一点，我就会不寒而栗。我认为，这会使得我们的队伍陷入思想混乱，这样，即使取得胜利，也将付出惨重的代价。在所有计划和打算中，有一个难以捉摸的决定性因素，这就是列宁本人及其身体状况。他还能发表自己的意见吗？他还来得及吗？党是否会理解，这是列宁和托洛茨基为革命的前途而斗争，而不是托洛茨基在争夺病中的列宁的位置呢？由于列宁在党内所处的特殊地位，他个人病情的捉摸不定，使全党的状况也变得捉摸不定了。临时将就的局面在继续。而拖延时间对那些不肖徒辈是有利的，因为斯大林作为总书记，自然成了整个“王位空缺时期”机关的宫廷大臣。

※ ※ ※

这是1923年3月初。列宁躺在司法大楼自己的房间里，再一次中风即将来临，已经出现过几次小的发作。我也被风湿病困在床上几个星期了。我躺在原骑士楼里，这是我的寓所所在地，我和列宁之间隔着克里姆林宫的巨大庭院。无论是列宁还是我，甚至不能走到电话机旁，再说，医生也严禁列宁打电话。列宁的两个秘书，福季耶娃和格利亚谢尔负责联系。下述内容就是她们告诉我的。对于斯大林为即将召开的党代表大会所作的准备工作，尤其是对他在格鲁吉亚玩弄的派别伎俩，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深感不安。“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准备了一颗在党的代表大会上反对斯大林的炸弹。”这是一字不差的福季耶娃的原话。“炸弹”这个词是列宁说的，而不是她说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请求您亲自处理格鲁吉亚事件，这样他才放心。”3月5日，列宁口授了一封短信给我：

“尊敬的托洛茨基同志：我请您务必在党中央为格鲁吉亚事件进行辩护。此事现在正由斯大林和捷尔任斯基进行‘调查’，而我不能指望他们会不偏不倚。甚至会完全相反。如果您同意

出面为这件事辩护，那我就放心了。如果您由于某种原因不同意，那就请把全部案卷退还给我。我将认为这是您表示不同意。致最崇高的、同志的敬礼！列宁。”<sup>①</sup>

问题怎么会这样尖锐？我问。原来斯大林又一次辜负了列宁的信任：为了确保自己在格鲁吉亚得到支持，他背着列宁和整个中央，在奥尔忠尼启则的帮助和捷尔任斯基的支持下，假借中央委员会的权威，在那里对党的核心发动了一场有组织的政变。斯大林利用病中的列宁难以与同志们会见，企图用假情报来蒙骗他。列宁委托其秘书处收集关于格鲁吉亚问题的全部材料，并决定公开发表讲话。在这种情况下，究竟什么使列宁更加震惊——是斯大林的不忠诚，还是他在民族问题上的粗暴的官僚主义政策，这很难说。确切些说，是两者兼而有之。列宁准备进行一场斗争，但又担心自己不能亲自在党代表大会上发言，这使他焦虑不安。为什么不与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商量一下呢？秘书们这样提示他。但列宁却懊丧地摇摇头。他清楚地预见到，一旦他退出工作，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就会与斯大林组成“三驾马车”来反对我，从而也背叛他。“托洛茨基在格鲁吉亚问题上态度如何，你是否了解？”列宁问道。“托洛茨基在全会上发言完全符合您的思想。”在全会上担任秘书的格利亚谢尔回答说。“您没搞错吧？”“没有，托洛茨基指责奥尔忠尼启则、伏罗希洛夫和加里宁不理解民族问题。”“请再核实一下！”列宁要求说。第二天，中央委员会在我的住所里开会，会上格利亚谢尔递给我一张便条，上面记有我前天发言的摘要，最后问道：“我对您的理解是否正确？”我问：“您这有什么用？”格利亚谢尔回答说：“给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我说：“非常正确。”这时，斯大林不安地注视着 we 交换便条。不过当时我还猜想不到这是怎么一回事……格利亚谢尔后来告诉我：“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看了我和您交换的便条后，感到很高兴：‘好，现在是另一回事了！’他让我把所有的手稿都转交给您，这些手稿本是他打算用于第十二次代表大会的炸弹的组成部分。”此刻，我才完全明白

<sup>①</sup> 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52卷，第554页。——译注

了列宁的意图；他打算以斯大林的政策为例，向党揭露，而且是无情地揭露专政有发生官僚蜕化的危险。

“加米涅夫明天要到格鲁吉亚去参加党的代表会议，”我对福季耶娃说，“我可以把列宁手稿的内容告诉他，促使他在格鲁吉亚采取适当行动。请您去问一下伊里奇。”一刻钟以后，福季耶娃气喘吁吁地跑回来说：“绝对不行！”“为什么？”“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说：‘加米涅夫会马上把一切都告诉斯大林的，而斯大林会作出卑鄙的妥协，进行欺骗的！’”“就是说，事情已经到了这种地步，连伊里奇也认为，即使在正确路线上也不可能同斯大林妥协了吗？”“是的，伊里奇不相信斯大林，他打算在全党面前公开反对他。他正在准备一颗炸弹。”

这次谈话后约一小时，福季耶娃拿着列宁的一封信又来找我，信是写给老革命家姆季瓦尼和其他反对斯大林的格鲁吉亚政策的人的。列宁在信中对他们说：“我专心致志地关注着你们的事。我对奥尔忠尼启则的粗暴，对斯大林和捷尔任斯基的纵容感到愤慨。我正为你们准备信件和发言稿。”<sup>①</sup>这封信的副本不仅给了我，而且还给了加米涅夫。这使我感到意外。“这就是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改变主意了？”我问道。“是的，他的病情每时每刻都在恶化。不要相信医生们安慰人心的说法，伊里奇已经说话都有困难了……格鲁吉亚问题使他焦虑万分，他担心来不及采取任何措施，就倒下不起。他把信交给我的时候说：‘为了不误事，只好提前公开表态了。’”“这就是说，现在我可以和加米涅夫谈一谈了？”“显然是这样。”“您请他到我这儿来一下。”

过了一小时，加米涅夫来了。他茫然不知所措。斯大林、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组成“三驾马车”的主意早就打定。“三驾马车”的矛头是直接指向我的。阴谋家的整个计划是：在获得组织上的充分支持以后，就给“三驾马车”戴上列宁的合法继承人的桂冠。列宁的短信就像一把锋利的楔子嵌入他们的计划。加米涅夫不知如何是好，相当坦率地向我承认了这一点。我把列宁的手稿给他看了一遍。加

<sup>①</sup>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52卷，第556页。——译注



米涅夫是个有相当经验的政治家，他立即明白，对于列宁来说，这不单纯是格鲁吉亚问题，而是关系到斯大林在党内的作用问题。加米涅夫还向我补充了另外一些情况。他刚应娜·康·克鲁普斯卡娅的要求去看望过她。克鲁普斯卡娅甚为不安地告诉他：“弗拉基米尔刚刚向女速记员口授了一封给斯大林的信，要断绝和他的一切关系。”列宁这么做的导因是半私人性质的。斯大林千方百计地切断列宁的消息来源，为此极端粗暴地对待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不过您是了解伊里奇的，”克鲁普斯卡娅补充说，“要是他认为没有必要从政治上摧毁斯大林，他是永远不会决定断绝私人关系的。”加米涅夫激动不安，脸色苍白，站也站不稳了。他不知何去何从。也许，他只是害怕我对他个人采取不友好的行动。我向他说明了我对形势的看法。我说：“有时候人们对臆想中的危险的恐惧，会给自己招来真正的危险。请记住并转告其他人，我并不打算为进行什么组织改组而在代表大会上发动一场斗争。我主张维持现状。如果列宁在代表大会之前能康复——不幸的是，这种可能性很小，那我们就同他重新商量这个问题。我反对罢免斯大林，反对开除奥尔忠尼启则，反对解除捷尔任斯基的交通人民委员的职务。但我实质上同意列宁的意见。我希望根本改变民族政策，停止对反对斯大林的格鲁吉亚人的迫害，停止对党施加的行政压制，推行更坚定的工业化方针，中央的上层要真诚合作。斯大林的关于民族问题决议案根本不行。在这个决议案中，蛮横粗暴的大国主义压制，激起了落后的、弱小民族的强烈抗议和反击。我以修正斯大林决议案的形式提出自己的决议案，使他便于对方针作必要的变动。但必须有急剧的改变。除此之外，斯大林必须立即写信给克鲁普斯卡娅，为自己的粗暴向她道歉，并且在实际上改正自己的行为。不要野心勃勃。不要搞阴谋。需要真诚合作。至于您呢，”我又对加米涅夫说，“应该在第比利斯的代表会议上，彻底改变对那些支持列宁民族政策的格鲁吉亚人的方针。”

加米涅夫松了一口气。他接受了我的全部建议。他唯一担心的是，斯大林会固执己见：“他既粗暴又任性。”我回答说：“我不这么认为，现在斯大林未必会有别的出路。”当天深夜，加米涅夫告诉我，他

已到乡下去见过斯大林，斯大林接受所有的条件。克鲁普斯卡娅已经收到他的道歉信，但她不能把信拿给列宁看，因为他的病情更加恶化了。不过我似乎觉得，加米涅夫的口气已同几小时以前和我分手时不大一样了。后来我才明白，这种变化，是由于列宁病情更加恶化的缘故。加米涅夫在途中，也可能是刚刚抵达第比里斯就接到斯大林的一封密码电报，说列宁再度瘫痪，已不能说话写字。在格鲁吉亚党代表会议上，加米涅夫执行了反对列宁的斯大林政策。以个人的背信弃义连在一起的“三驾马车”已成为事实。

列宁发动的攻势不仅是针对斯大林个人的，也是针对整个斯大林班子，首先是针对他的助手捷尔任斯基和奥尔忠尼启则的。列宁在有关格鲁吉亚问题的信件中多次提到过这两个人。

捷尔任斯基是个火爆性子，他仿佛由于恒量放电而保持着很高的能量。每逢讨论问题，甚至是次要问题，他都会暴跳如雷，鼻孔微微抽动，双眼冒火，常常搞得声嘶力竭。尽管神经如此高度紧张，捷尔任斯基却从没有过情绪低落或冷淡消极的时候，他好像总是处于高度动员的状态。列宁有次把他比作一匹纯种烈马。捷尔任斯基狂热地爱上自己干的一切，并且激烈地、盲目地、不可调和地使自己的同事不受干预和批评，但他所做的这一切没有任何个人因素；捷尔任斯基已完全融化在事业之中。

捷尔任斯基没有主见。他不以政治家自居，至少在列宁在世时是这样的。出于各种动机，他不止一次对我说：“我也许是个不坏的革命家，但我不是领袖，不是国家领导人，不是政治家。”这不仅仅是谦虚。他的自我评价实质上是正确的。捷尔任斯基在政治上总是需要有什么人来直接领导他。他曾追随罗莎·卢森堡多年，不仅和她一起进行过反对波兰爱国主义的斗争，而且还进行了反对布尔什维主义的斗争。1917年他追随布尔什维克。列宁曾极其喜悦地对我说：“在他身上没有留下任何以往斗争的痕迹。”在最初两三年内，捷尔任斯基和我特别接近。最近几年他一直支持斯大林。他领导经济工作的方法完全符合他的气质——号召、推动和鼓动人们去干。他没有一个经过深思熟虑的经济发展的构想。斯大林的所有错误他都

有份，他还以他所拥有的全部热情来为之辩护。他几乎是站着死去的，当时，他在激动地抨击了反对派之后，刚刚离开讲台。

至于斯大林的另一个盟友奥尔忠尼启则，列宁因他在高加索推行官僚主义的独断专行而认为必须把他开除出党。我反对这样做。列宁通过秘书回答我说：“至少开除他两年。”当时列宁怎么也不会想到，奥尔忠尼启则居然能成为监察委员会主席，而列宁要建立这个委员会正是为了开展反对斯大林官僚主义的斗争，体现党的良知。

除了一般的政治任务之外，列宁开仗的直接目的，就是为我的领导工作创造最有利的条件：如果他得以康复，就和他一起领导；而如果病魔战胜了他，就接替他的位子。然而这场斗争还没有进行到底，甚至还没有进行到一半，就出现了直接相反的结局。实际上列宁仅仅来得及向斯大林及其盟友宣战，而且，了解这一情况的只是那些直接有关人士，而不是党。斯大林派——当时还是“三驾马车”派，在受到第一次警告后，彼此抱得更紧了。斯大林控制着机关，以疯狂的速度在机关内进行干部的人工挑选。“三驾马车”越是感到自己在思想上软弱无力，就越是怕我（正因为他们想打倒我，所以他们怕我），就越是不得不把党和国家制度的所有螺丝钉拧得更紧。后来，在1925年的一次私下谈话中，布哈林在回答我对党内压制现象提出的批评时说：“我们没有民主，因为我们害怕您。”“请你们试一下不要害怕，”我劝告说，“让我们好好地工作吧。”但是我的忠告毫无用处。

1923年是紧张地、但又是悄悄地扼杀和摧毁布尔什维克党的第一个年头。列宁在同可怕的病魔作斗争。“三驾马车”在同党作斗争。气氛异常紧张，到秋天，紧张气氛发展成了反对反对派的“争论”。开始了革命的第二个篇章：反对托洛茨基主义的斗争。实质上，这是一场反对列宁思想遗产的斗争。

## 第四十章

# 不肖徒辈的阴谋

那是1923年头几个星期的事。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即将召开。但列宁参加大会的希望很渺茫。于是出现了一个由谁来作基本的政治报告的问题。斯大林在政治局会议上说：“当然是托洛茨基。”他的话立即得到加里宁、李可夫和加米涅夫的支持，不过加米涅夫显然是违心的。我表示反对。“如果我们中间的某一个人想以个人名义代替病中的列宁的话，党会感到不自在。我们这一次就别作导论式的政治报告了。我们就按照议事日程所列的问题作必要的发言。”我补充说，“况且我们之间在经济问题上还存在分歧。”“哪里有什么分歧？”斯大林回答说。加里宁还加上一句：“政治局几乎在所有问题上都通过了您的提议。”季诺维也夫这时在高加索休假。问题没有定下来。不管怎样，我只同意作一个关于工业问题的报告。

斯大林知道有一场来自列宁方面的风暴正向他袭来，因此从各个方面讨好我。他一再说明，政治报告应该由仅次于列宁的最有影响、最孚众望的中央委员，即托洛茨基来作，党不希望，也不理解由其他任何人来作这样的报告。斯大林这种假惺惺的友善态度，比他那露骨的敌对情绪更使我觉得不是滋味，尤其是他的动机也显得太露骨了。

季诺维也夫从高加索回来了。他们背着我不断地举行当时还是范围很小的派别会议。季诺维也夫要求由他来作政治报告，加米涅夫问那些绝大多数已脱党10至15年的可靠的“老布尔什维克”：“难道我们允许托洛茨基成为党和国家独揽大权的领导人吗？”他们开始

越来越频繁地、秘密地翻历史旧账，重提我过去与列宁的分歧。这成了季诺维也夫的专业。与此同时，列宁的病情急剧恶化，因而不再存在来自列宁方面的任何“危险”。于是“三驾马车”决定由季诺维也夫作政治报告。他们在作了一番必要的幕后准备之后，就向政治局提出了这个问题，我没有表示反对。一切都带有临时安排的性质。没有出现明显的分歧，正如“三驾马车”没有自己的路线一样。我的关于工业问题的提纲起初未经讨论就通过了。可是当列宁没有希望恢复工作这一点变得明朗之后，对过于平静的党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感到不安的“三驾马车”，突然来了个急转弯。这时他们已经在寻找机会，以便在党的上层与我对抗。就在代表大会召开前的最后一分钟，加米涅夫把一项有关农民问题的补充加进了我的那项已被通过的决议。对这个修正详加论述毫无意义，它无论在理论上还是政策上都无关紧要，只具有挑衅的性质。它是要为指控我“低估”农民提供依据，当然，暂时还只是在幕后。加米涅夫在和斯大林决裂三年之后，以其特有的那种好心的犬儒主义，把他们如何在暗地里编造这一罪名的经过告诉了我，至于这个罪名本身炮制者们自然谁都不会相信的。

众所周知，在政治生活中运用抽象的道德标准是毫无用处的。政治道德来自政治本身，是政治的从属现象。只有服务于伟大历史任务的政治，才能保证自己的行动方法在道德上是无可指责的。反之，降低政治任务的水平则必然导致道德上的堕落。众所周知，费加罗根本拒绝对政治和阴谋加以区别，然而他是生活在议会制度出现以前的时代！当资产阶级民主的道德家们企图把革命专政看作政治道德败坏的根源时，人们只能同情地耸耸肩。拍一部现代议会制度的电影，哪怕仅拍一年，是很有教益的。不过在通过一项爱国主义决议的时候，摄影机不应对着国会议长的座位，而完全应该对着别的地方：银行家和工业家的办事处，编辑部的幽静角落，红衣主教的宅邸，女政客的沙龙和政府各部，同时还需把各党派领袖之间的秘密通信也拍下来……然而，对革命专政的政治道德提出同议会制的道德截然不同的要求，是完全正确的。要保持专政武器和手段的犀利，就

必须有警觉的防腐蚀剂。一只肮脏的拖鞋并不可怕，但是一把不洁净的剃刀就极其危险了。在我看来，“三驾马车”采用的种种手段正意味着政治上的堕落。

对于这些阴谋家来说，最大的困难是在群众面前公开反对我。工人们都知道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乐意听他们的。但对于他俩在1917年的行为记忆犹新。他俩在党内缺乏道义上的威望。而斯大林，在老布尔什维克的狭小圈子以外，几乎是个无名之辈。我的一些朋友对我说：“他们永远不敢公开反对您。在人民心目中，您和列宁的名字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要把十月革命、红军和国内战争一笔抹煞是不行的。”我不同意这种看法。在政治活动中，尤其在革命的政治活动中，个人权威起着重大的、甚至是巨大的作用，但毕竟不是决定性的。归根到底，较为深刻的，即群众性的进程决定了个人权威的命运。在革命高潮中，对布尔什维克领袖的诽谤，恰恰加强了布尔什维克。而在革命低潮时，对他们的诽谤，却会成为热月反动取得胜利的武器。

国内和世界舞台上的客观进程有利于我的对手。但他们的任务毕竟并不轻松。党的著作、报刊和鼓动员们仍生活在以列宁—托洛茨基为标志的昨天。所有这一切都必须来个180°的大转弯，当然不可能一蹴而就，而要分阶段进行。为了说明转弯的程度，这里有必要至少举几个例子，看看在对待革命领袖人物方面党的报刊上占主宰地位的是什么调子。

1922年10月14日，即在列宁第一次中风后已恢复了工作时，拉狄克在《真理报》上写道：

“如果说，可以把列宁同志称作由意志的传动装置控制的革命理智，那么，托洛茨基同志就可以称作理智支配下的钢铁意志。托洛茨基的演说听起来就像是号召人们工作的钟声。他的演说的全部作用，全部意义以及近年来我们工作的意义，都是显而易见的。”……等等。诚然，拉狄克个人的易冲动是出了名的；他可以这样说，也可以那样说。但更为重要的是，这些话是在列宁生前刊登在党中央机关报上的，当时没有人感到刺耳。

1923年，在“三驾马车”的阴谋已成为事实的情况下，卢那察尔斯基第一个出来抬高季诺维也夫的威信。但他是怎么干的呢？他在评价季诺维也夫时写道：“当然，列宁和托洛茨基已成为我们时代，差不多是全世界最知名的（最爱的或者是最恨的）人物。和他们相比季诺维也夫要稍逊一筹，但列宁和托洛茨基早已被看作是我们队伍里的伟大的天才，无可争辩的领袖，因而他俩在革命时期表现出的惊人的成熟，是不会令人感到意外的。”

我之所以援引这些鉴赏力并不怎么样的浮夸颂辞，仅仅是因为我需要这些颂辞作为全景的组成部分，或者也可以说，作为法庭审讯中的证词。

我还不得不怀着极其厌恶的心情引用第三个证人雅罗斯拉夫斯基的话，他的颂辞也许比他的谤书更难以忍受。此人现在在党内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以其低下的思想水平展示出党的领导的堕落程度。雅罗斯拉夫斯基完全是靠对我的诽谤爬到目前地位的。他作为党史的官方伪造者，把过去描绘成托洛茨基不断反对列宁的斗争，不用说，托洛茨基“低估”农民、“忽视”农民、“不注意”农民。然而，在1923年2月，即雅罗斯拉夫斯基对我和列宁的关系，我对农民问题的观点应该非常了解之时，他却在一篇论述我早期（1900—1902年间）著述活动的长篇文章里，对我的过去作了如下评述：

“托洛茨基同志出色的写作和政论活动使他成了闻名世界的‘小册子之王’——英国作家萧伯纳就是这样称呼他的。观察过他四分之一世纪活动的人，都会信服他那特别卓越的才华……”等等、等等。

“大概许多人看到过广为流传的托洛茨基青年时期的照片……（等等）。在他高高的前额下，当时已具有极丰富的想象力、思想和情感，它们有时使托洛茨基同志稍稍偏离历史的大道，迫使他或者选择过于迂回的道路，或者相反地，迫使他大胆无畏地硬闯那无法通行的地方。不过，在所有这些探索中，我们看到了一个彻底献身于革命的人，一个成熟的宣传家，他那钢一般锋利而柔韧的口才，使对手望风披靡……”等等、等等。

雅罗斯拉夫斯基滔滔不绝地写道：“西伯利亚人津津有味地阅读

这些出色的文章，怀着急切的心情等待以后的文章。只有少数人知道文章的作者是谁，而那些知道托洛茨基的人当时也完全没有料到，他将会成为世界上最革命的军队和最伟大的革命的公认领袖之一。”

更糟糕的也许是，雅罗斯拉夫斯基说我“忽视”农民。我的写作活动就是从写农村开始的。下面就是雅罗斯拉夫斯基的话：

“托洛茨基住在西伯利亚农村，不可能不考察农村生活的一切细枝末节。他首先注意到西伯利亚农村的行政机构。在一系列通讯中，他对这种机构作了一番绝妙的刻画……”接下去写道：“托洛茨基在自己周围所见到的只是农村。他为它的贫困感到痛心。农村所受到的折磨，农村的无权地位使他感到难受。”雅罗斯拉夫斯基还要求把我论述农村的文章编入文选。这都是1923年2月份的事，就在这一一个月里，第一次编造了我忽视农村的说法。不过雅罗斯拉夫斯基当时在西伯利亚，所以还不了解“列宁主义”的方针。

我要引述的最后一个例子涉及到斯大林本人。早在十月革命一周年纪念日，他就写过一篇隐晦地反对我的文章。在说明此事时需要提醒一下，在准备十月变革时期，列宁匿居芬兰，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李可夫和加里宁是起义的反对者，对于斯大林的情况无人知晓。因此，党把十月革命主要同我的名字联系在一起。在十月革命一周年之际，斯大林企图削弱这一印象，他用中央委员会的总体领导来同我对立起来。但为了使大家都多少能接受他的说法，他不得不写道：

“起义的全部实际组织工作都是在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托洛茨基直接领导下进行的。可以肯定地说，卫戍部队迅速倒向苏维埃和军事革命委员会对工作的妥善安排，党首先并且主要要归功于托洛茨基同志。”

斯大林之所以这样写，是因为在当时就连他也不能有别的写法。经过多年的放肆歪曲以后，斯大林才敢于大声宣称：“无论是在党内还是在十月革命中，托洛茨基同志都没有发挥过，也不可能发挥任何特殊的作用。”当人们向他指出前后矛盾时，他却以加倍粗暴的态度予以回答。如此而已。



“三驾马车”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能直接出面和我对抗。他们只能借列宁来和我对抗。可是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使列宁没有可能出来同“三驾马车”对抗。换句话说，他们若要得逞，就必须是要么列宁得了不治之症，要么他那涂上防腐剂的遗体被送进陵墓。但这还不够，还必须在交战的时候，我不在战场。1923年秋这种局面出现了。

我不想在这里谈论历史哲学，只是想以与我密切相关的事件为背景，叙述一下自己的身世。但我不得不顺便指出，偶然性是怎样热心地帮助必然性的。从广义上说，整个历史过程是必然性通过偶然性所产生的折射。如果借用生物学的语言，那就可以说，历史规律性是通过偶然性的自然选择来实现的。人的自觉的活动就是在这一基础上展开的，它使偶然性经受人工的选择……

※ ※ ※

说到这儿，我不得不中断一下自己的叙述，来谈谈我的朋友伊凡·瓦西里耶维奇·扎依采夫，他是杜勃纳河畔卡洛希诺村人。这个地方叫做扎博洛季耶，如这一地名所示，这里沼泽地的野禽非常丰富。这里杜勃纳河泛滥，到处都是芦苇环抱的沼泽地、湖泊和深水河段，像一条宽阔的带子延伸了将近40公里。一到春天，这里挤满了大雁、鹤、各种野鸭子、杓鹬、中沙锥、琉苏鹬以及沼泽地的其他禽鸟。两公里内，在小树林里，沼泽土墩之间，黑琴鸡在越橘丛上发出求偶的鸣叫。伊凡·瓦西里耶维奇常用一枝短桨，沿着沼泽之间的小渠，划着他的独木舟。这条小渠何时开凿，已无从查考，也许开凿于两三百或者更久以前，为免小舟陷进泥里，每年都得疏浚。为了在黎明前赶到窝棚，我们不得不半夜就离开卡洛希诺。我们每走一步，泥炭沼泽晃动的表面就会像肚皮似地鼓起来，这常常使我感到害怕。但伊凡·瓦西里耶维奇一开始就对我说过，大胆地走吧，湖里曾淹死过人，但还从未有人在沼泽里丧命。

独木舟很轻，摇晃不定，因此最好的办法是一动不动地朝天躺着，特别是在刮风的时候。为安全起见，船工通常都跪着划船。唯独伊凡·瓦西里耶维奇是这一带打野鸭子的行家。他父亲、祖父和曾

祖父都以打野鸭为生。想必他的祖先还为伊凡雷帝的餐桌供奉过野鸭、大雁和天鹅吧。扎依采夫对红松鸡、黑琴鸡和杓鹬之类毫无兴趣。“那不是我的行当。”他简短地说。然而他对野鸭子非常熟悉，对鸭子的羽毛、叫声乃至灵魂都了如指掌。伊凡·瓦西里耶维奇站在小船上，划着船一根又一根地从水里捞起鸭毛，看了看说：“我们到古希诺去，昨晚鸭子在那里栖息。”“你是怎么知道的？”“你瞧，浮在水面上的这根鸭毛还没湿呢，是刚掉下来的，这鸭子是傍晚飞过的，除了古希诺，它不会飞到别的地方去。”

就这样，其他打猎者只打到一两对野鸭子，我和伊凡却能打到十只甚至十五只。功劳是他的，荣誉却是我的。生活中常有这样的事。在用芦苇搭起的小窝棚里，伊凡·瓦西里耶维奇把粗糙的手掌贴住嘴唇嘎嘎地学母鸭叫，叫得如此温情脉脉，就连最小心谨慎的，多次遭到射击的公鸭也抵挡不住它的魔力，会来到窝棚周围转悠，甚至径直啾啾一声飞落在五步开外的水面上，弄得我们不忍心开枪。对各种动静扎依采夫都能发觉，都很熟悉，都能感觉到。“准备，”他低声对我说，“公鸭朝你飞来了。”我看见远处树林上面有一对带斑点的翅膀，但认不出这是不是一只公鸭，只有猎鸭专家伊凡·瓦西里耶维奇才分辨得出来。公鸭真的朝我飞来。要是没有射中，伊凡·瓦西里耶维奇就会有礼貌地轻轻哼一声——听到背后那哼哼声，简直是令人无地自容。

战前扎依采夫在一家纺织厂工作。现在每年冬季他到莫斯科去当锅炉工人或到一所发电厂工作。革命后的最初几年，全国各地依然战火纷飞，树林和泥炭沼泽地都在燃烧，田野荒芜，野鸭子根本不来。扎伊采夫对新政权是怀疑的。但从1920年起，野鸭子重新飞来了，确切些说，是像浪潮一样地涌来了，于是伊凡·瓦西里耶维奇完全承认了苏维埃政权。

距这里两公里处，有一年曾开办过一家小小的苏维埃灯芯厂。厂长就是以前的军用列车司机。扎伊采夫的妻子和女儿每人每月可在工厂挣到30卢布。这是笔空前的收入。但是该厂向全区提供的灯芯很快达到饱和，于是就关闭了。鸭子又成了他们家庭生活的

基础。

5月1日，伊凡·瓦西里耶维奇来到莫斯科大剧院，登上嘉宾坐的主席台。他拖着跛腿，坐在第一排，听我作报告，虽然稍稍有点窘迫，但还像往常那样自尊。带他去的是穆拉洛夫，我们常常和他一起分享狩猎的乐趣和痛苦。伊凡·瓦西里耶维奇对我的报告感到满意，对报告的所有问题都完全理解，回到卡洛希诺还说给别人听。这就更加巩固了我们三人的友谊。应该指出，那些老猎手，尤其是莫斯科附近的老猎手，都变坏了，他们混迹于达官贵人之中，成了阿谀奉承、撒谎吹牛的行家。但伊凡·瓦西里耶维奇却不这样。他相当纯朴，很有观察力，也很自尊。这是因为他本质上并不是个手艺人，而是自己事业上的艺术家。

列宁也和扎依采夫一起打过猎，在一间木板棚里，伊凡·瓦西里耶维奇常常指着一块地方说，列宁在那儿的干草上躺过。列宁是个打猎爱好者，但很少去打猎。尽管他在重大问题上很能自我克制，但打猎时却十分急躁。正如大战略家常常是个蹩脚的棋手，政治上有好枪法的天才也可能是平庸的猎手。我记得列宁曾近乎绝望地，仿佛意识到有什么永远无可补救的缺陷似地向我抱怨说，在一次狩猎时，竟连25步开外的一只狐狸都没打中。我理解他。我内心对他深感情。

我从未有机会和列宁一块打猎，虽然我们曾多次商量好并且还约定了。在革命后的最初几年，根本就顾不上。列宁还偶尔离开莫斯科到野外去，而我却几乎从未离开过车厢、司令部和汽车，也从未碰过猎枪。在国内战争结束后的岁月里，又总有一些意料不到的事，妨碍我或其他赴约打猎。后来，列宁开始生病。就在他病倒前不久，我俩还约定开车去特维尔省的绍什河。可是列宁的汽车陷在乡间泥路上，我没有等到他。列宁第一次中风康复后，曾竭力争取打猎的权利。医生终于向他让步，条件是不要疲劳过度。在一次好像是有关农业问题的会议上，列宁在穆拉洛夫身边坐下，问道：“您常和托洛茨基一起去打猎吗？”“有时候去。”“怎么样，能打到东西吗？”“有时候能打到。”“带我去，好吗？”“您可以去吗？”穆拉洛夫小心翼翼地问道。

“可以，可以，已得到准许……那么，带我去吗？”“怎么能不带您去呢？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那我打电话给您，怎么样？”“等您的电话。”但列宁没有打电话。病魔再次来了电话。后来死神又来了电话。

我讲所有这些离题的话是要说明，1923年10月的一个星期天，我怎么以及为什么会呆在扎博洛季耶沼泽地的芦苇丛中。那天夜里天气寒冷，我穿着毡靴坐在窝棚里。但到了早晨，温暖的阳光使沼泽解了冻。汽车在高坡上等着我，那位曾同我一起经历了整个内战的司机达维多夫，像往常一样急不可待地想知道我打到了什么猎物。从独木舟到汽车，必须走一百步左右。但我脚穿毡靴刚踏进沼泽，双脚便浸在冰冷的水中。等我连蹦带跳地跑到汽车跟前时，脚已冻僵了。我坐在达维多夫身边，脱下靴子，用发动机的热气来暖脚。可是我已经受了寒，我病倒了。得了流行性感冒以后，又不知怎地发起烧来。医生禁止我起床。这样秋季剩下的时间以及整个冬季我都卧病在床。这就是说，在1923年反对“托洛茨基主义”的争论中，我一直在生病。革命和战争可以预见，但秋天打野鸭子的后果却是无法预见的。

※ ※ ※

列宁躺在哥尔克，我则躺在克里姆林宫。不肖徒辈正在扩大阴谋圈子。起初，他们小心谨慎，曲意逢迎，在他们的颂辞里掺进越来越多的毒药。就连他们中间最没有耐心的季诺维也夫，也在诽谤时加上许多保留意见。12月15日（1923年），季诺维也夫在彼得格勒党的会议上说：“托洛茨基同志的权威，同他的功绩一样，是众所周知的。在我们中间，这些可以不必详述了。但错误终究是错误。我犯错误时，党曾相当严肃地予以纠正……”如此等等，这种怯懦而具有进攻性的语气，长期以来，已成为阴谋家们的基本腔调。只是在探明了自己的立足点，并占领了更多的阵地之后，他们的口气才变得大胆一些。

创立了一门新的学科：伪造虚假的声望，杜撰离奇的传记，按照指令为领袖们作广告宣传。还有一门关于名誉主席团问题的特殊的小学科。自十月革命以来，把列宁和托洛茨基选人会议的名誉主席

团已成为惯例。人们在日常谈话、文章、诗歌以及民间歌谣里，总是把这两个名字联在一起的。如今，需要把两人的名字拆开，哪怕是机械地拆开，以便以后在政治上使两人相互对立。现在，主席团包括了全体政治局委员。然后，按字母顺序排列名单。以后，又废除了字母顺序，改为按新的领袖等级表排列。季诺维也夫开始坐第一把交椅——在这一点上，彼得格勒树立了榜样。再过了一段时间，托洛茨基的名字开始从名誉主席团名单上消失了。会议成员总是对此提出强烈抗议。有时会议主席不得不说明，把我名字漏掉是个误会。然而报上的报道，自然对此保持沉默。再往后，第一把交椅让给了斯大林。要是大会主席没有领悟该怎么做，报纸的报道也一定会替他纠正过来。人们的升迁和失败取决于名字在名誉主席团名单中的位置。这项最旷日持久、最有系统的工作，是在必须反对“领袖崇拜”的理由下进行的。在1924年1月莫斯科代表会议上，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对不肖徒辈说：“不错，我们反对领袖崇拜，但我们也反对不崇拜一个领袖，而去崇拜其他一些声望较低的领袖。”

“那是一段艰难的日子，”我妻子在札记中写道，“在那些日子里，列·达·在政治局同其他政治局委员进行了非常激烈的斗争。他单枪匹马，抱病和他们全体斗。由于列·达·生病，会议便在我们家里进行，我坐在旁边的卧室里，听得见他的发言。他用整个身心在发言，看来，每发一次言都使他失去一些元气。他是以自己的‘满腔热血’对他们讲话的。但我听到的回答却冷淡无情。要知道，一切都是早就决定了的。他们干吗要激动呢？每当这样的会议结束后，列·达的体温就会升高，他走出书房时浑身湿透，脱了衣服躺在床上。他身上里里外外的衣服就像是被雨淋湿了似的，不得不设法烘干。那时，会议经常在列·达·那间铺着褪色旧地毯的书房里举行，每天夜间，在我的梦里这条地毯就变成了一只活龙活现的豹子——白天的会议夜里变成了恶梦。在这场斗争公开化以前，第一阶段的情况就是这样……”

在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后来反斯大林的斗争中，阴谋的参与者自己揭露了这一时期的秘密。这是一个真正的阴谋。他们组成一

个秘密的政治局(七人团),它包括除我以外的全体正式政治局委员,再加上现任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古比雪夫。所有问题都是由这个秘密中心事先决定的,它的参加者们结成了连环保。他们承诺相互之间不争论,同时要寻找机会攻击我。在地方组织内也有类似的秘密中心,它们按照严格纪律和莫斯科的这“七人团”保持联系。为了进行联络,还使用了专门的密码。这是党的一个十分严密的非法秘密集团,最初是直接反对一个人的。党和国家的负责干部都是根据反托洛茨基这个唯一的标准有组织地进行选拔的。在列宁患病造成的旷日持久的“王位空缺时期”,他们一直孜孜不倦地,同时又谨慎、隐蔽地从事这项工作,以便在列宁恢复健康的情况下,使埋有地雷的桥仍能保持原样。阴谋家们是根据暗示行动的。想谋取这个或那个职位的候选人必须猜出对他们的要求。哪一位“猜中了”,便能得到高升。这样就形成了一种特殊形式的“升官之道”,它后来获得了一个公开的名称“反托洛茨基主义”。列宁的逝世使这一密谋肆无忌惮地公开干了起来。人员选拔的办法每况愈下。现在除非你表明自己反托洛茨基主义,否则就休想获得诸如厂长、车间支部书记、村执行委员会主席、会计乃至打字员的职位。

那些大声反对这个阴谋的党员,则成了奸诈攻击的牺牲品,这些攻击的理由是完全不相干的,而且往往是捏造出来的。相反地,在苏维埃政权最初五年被无情地驱逐出党的那些道德败坏分子,这时只要说一句敌视托洛茨基的话,就可以保住自己。从1923年底开始,共产国际各国党内部也都开展了这项工作,一些领导人被废黜,另一些人接替了他们的位置,唯一的依据就是他们对托洛茨基的态度。于是加紧进行人为的选拔,挑选的不是优秀人才,而是最适合他们需要的人。总的方针是用领导机关一手提拔的庸才去取代有主见、有才干的人。斯大林作为机关庸才的最高体现升上来了。

## 第四十一章

# 列宁逝世和权力转移

人们不止一次地问过我，现在有时也还有人问我：您怎么会失去权力的！在这个问题后面常常隐藏着从手里丢失一件什么东西那样极为天真的想法，失去权力就像丢失一块表或一个笔记本似的。实际上当领导夺取政权的那些革命者在某一阶段开始失去它——“和平地”或灾变地失去它，那么这本身就意味着在革命的当权层中一定的思想影响和情绪的衰落，或者是群众本身革命情绪的衰落，或者是两者兼而有之。走出地下的党的领导干部曾经受到革命趋势的鼓舞，革命的第一个时期的领袖们清楚明确地表达了这些革命趋势，并在实践中得到全面而又成功的贯彻。正是这一点使他们成为党的领袖，通过党成为工人阶级的领袖，通过工人阶级成为全国的领袖。某些人就通过这一途径把权力集中到自己手里。但是革命第一时期的思想不知不觉地失去了对党内直接掌握国家政权的那些阶层的意识的影响。在国内发生了可以总称为反动的过程。这一过程在某种程度上也蔓延到工人阶级，其中包括它的政党。组成权力机关的那个阶层出现了独立自主的目标，力图使革命服从于这种目标。在领袖们和这种机关之间开始出现分裂，领袖们表达了阶级的历史路线，能够站在机关之上来观察问题，而庞大、笨重、形形色色的机关则很容易使一般共产党员丧失进取精神。最初这种分裂更多的是心理上的，而不是政治上的。昨天的情景还很新鲜。十月的口号还没有从记忆中消失。第一时期领袖们的个人威信是很高的。但是在传统形式的掩盖下已经形成另一种心理。国际的前景变得暗淡起来。人们

完全陷入日常工作之中。新的方法本应为老目标服务，却建立了新的目标，首先是新的心理。暂时的形势对许许多多的人们来说，变成了终点站。一种新型的人正在逐渐形成。

革命者归根结底也是由和其他人一样的社会材料制成的。但是他们应当有某些突出的个人特点，这些特点使历史进程有可能把他们和其他人区别开来，并结成单独的集团。相互交往，理论研究，在一定旗帜下的斗争，集体的纪律，在危险的炮火下的锻炼造就了一种革命类型的人。完全可以谈论布尔什维克同例如孟什维克相对立的心理类型。经验丰富的眼光甚至根据外表就可把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区别开来，误差不会很大。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在布尔什维克身上一切都是布尔什维克的，永远是布尔什维克的。使一定的世界观与自己血肉相连，使自己的各个方面都服从于这种世界观，并使个人的感情世界与之协调，这不是所有的人，而只有不多的人才能做得到。在工人阶级那里它为阶级本能所取代，在危机时代这种阶级本能显得特别敏锐。但是，在党和国家内有一个庞大的革命家阶层，他们尽管大都来自群众，但早已脱离了群众，并以自己的地位和他们对立。阶级本能已经从他们身上消失。另一方面他们又缺乏理论上的稳定性和广阔的视野去掌握总的进程。在他们的心理中存在着不少未加保护的地方，异己的和敌对的思想影响通过这些地方（在局势变化的情况下）渗透进来。在地下斗争、起义和国内战争时期这类人物只是党的战士。在他们的意识中几乎只响着一根弦，而这根弦又只随着党的音叉震动。当紧张状态过去，革命的游牧民族转入定居的生活方式时，庸人的特性、自满自足的官僚爱好情趣又在他们身上出现，并活跃和发展起来。

加里宁、伏罗希洛夫、斯大林、李可夫的一些偶尔脱口而出的意见常常使人们不安地警觉起来。这是从哪儿来的？我问自己。这是什么喇叭里出来的？我去参加某个会议，常碰上一些人在扎堆议论，这些议论常常在我出现时猝然中止。在议论中没有任何反对我的内容，也没有任何与党的原则相抵触的内容，但是有一种精神上怡然自得、自满自足和陈腐庸俗的情绪。人们出现一种相互吐露这些新的



情绪的要求，顺便说说，在这些情绪中有不少小市民搬弄是非的成分。以前他们不仅在列宁和我面前有所克制，而且对自己也有所克制。如果，例如斯大林说了什么低级庸俗的话，那么低头看文件的列宁就会头也不抬，用双眼向四周稍稍看一下，仿佛在检查，是否还有别的什么人也对他所说的话感到不可忍受。在这些情况下，只要瞥上一眼或用一种声调就足以无可争辩地显示出我们在心理评价上的一致。

如果说我不参加新的统治阶层风气中日益多见的那些消遣，那倒不是出于道德原则，而是不愿去尝试那穷极无聊的玩意儿。相互作客，热衷于芭蕾舞，集体狂饮，背后议论别人的是非，所有这一切对我毫无吸引力。新的上层感觉到这种生活方式同我格格不入，他们甚至也不想把我拉过去。由于这个原因，我一出现，许多扎堆议论就停了下来，参加者们带着某种窘态和对我的某种敌意散开了。如果愿意的话，可以说这就意味着我开始失去权力了。

我这里仅限于事情的心理方面，而把社会内幕即革命社会的结构变化撇在一边。当然，归根到底起决定作用的是这种变化。但是这些变化一定会在心理上得到直接的反映。内部事变发展比较缓慢，同时也缓和了上层的量的蜕化过程，并且几乎没有为广大群众提供把两种不可调和的立场作对比的余地。对此还应当补充一点，那就是这些新的情绪在很长时间里曾经，而且现在仍然以传统公式作掩护。这就使得更加难以确定，蜕化发展到多么深的程度。18世纪末发生的由先前的革命进程准备好的热月阴谋变成了一次突然打击，并以流血告终。我们的热月却具有持久的性质。至少在一定的时期造谣中伤代替了断头台。用连续不断的办法系统地、有组织地伪造过去的历史成了官方党的思想重新武装的武器。列宁的患病和对他重返领导岗位的期待造成了一种暂时的捉摸不定的局面，这种局面断断续续地持续了两年多。如果革命发展走向高潮，那么拖延对反对派是有利的。但革命在国际范围内一再遭到失败，拖延就对民族改良主义有利了，它不由自主地加强了斯大林官僚反对我和我的政治朋友们的力量了。

对不断革命论庸俗、无知，简直是愚蠢的中伤正是这种心理状态的产物。自满自足的官员在饮酒作乐之时，或者看完芭蕾舞之后，会对另一个自满自足的官员议论我说：“他脑袋里只有不断革命。”与此紧密相联的是关于我不合群、有个人主义、贵族派头的指责。“不能总是一切为了革命，也应当为了自己。”——这种情绪化成了这样的口号：“打倒不断革命！”对这些人来说，反对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的严格要求和革命在政治上的严格要求，逐渐采取了反“托洛茨基主义”斗争的形式。在这面旗帜下在布尔什维克里的市侩得到了解放。这就是我失去权力的原因，它也决定了失去权力的方式。

我已经讲过，列宁在弥留之际把矛头指向斯大林及其盟友捷尔任斯基和奥尔忠尼启则。列宁对捷尔任斯基的评价很高，他们之间的关系冷淡下来是在捷尔任斯基明白到列宁不认为他有能力领导经济工作的时候。这就把捷尔任斯基推到斯大林那一边去了。那时列宁认为需要打击捷尔任斯基，这等于打击斯大林的支柱。奥尔忠尼启则因为表现出总督的毛病，列宁想把他开除出党。列宁在给姆季瓦尼的便条中答应完全支持格鲁吉亚布尔什维克，反对斯大林、捷尔任斯基和奥尔忠尼启则。这四个人的命运清楚不过地暴露了党内斯大林小集团所策划的政变。列宁去世后捷尔任斯基被安排领导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也就是领导全部国家工业。原打算要开除出党的奥尔忠尼启则被委任主持中央监察委员会。斯大林不仅违反列宁的意愿，留任总书记，而且从机关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全权。最后，得到列宁支持的姆季瓦尼现在却被关在托博尔斯克监狱里。此类“重新组合”从上到下在党的各级领导中都在进行，而且也一无例外地在共产国际的所有党内进行。在列宁时代和不肖徒辈时代之间，不仅隔着一道思想鸿沟，而且还有业已完成的组织上的政变。

斯大林是这一政变的主要工具。他天生具有实际工作的才能，顽强的毅力和坚持不懈地追求既定目标的精神。他的政治眼界非常狭窄，理论水平粗浅。他编写的《列宁主义基础》力图尊重党的理论传统，却包含有许多小学生式的错误。他不懂外文，只好根据二手材料来观察其他国家的政治生活。按思维方式来说，这是一位顽强

的经验主义者，他缺乏创造性的想象力。对于党的上层来说（在稍大一些的范围里人们根本不知道有他）他一向是三流人物。如今他充当了第一把手，这与其说表现了他的特点，不如说是表现了政治堕落的过渡时期的特点。爱尔维修<sup>①</sup>就说过：“每一个时期都有自己的伟大人物，如果没有，也会把他们创造出来。”斯大林主义首先是在革命斜坡上没有个性的机关的创造。

※ ※ ※

列宁于1924年1月21日逝世。死亡对他来说只是摆脱肉体上的痛苦和精神上的折磨。他处于无能为力的境地，首先是神志清楚却讲不出话来，他不能不感到这是无法忍受的屈辱。他已经无法忍受医生们，无法忍受他们那保护者的口吻，他们那没味的玩笑以及定能痊愈的虚假保证。当他还能说话的时候，他往往似乎顺便地向医生提一些检验性的问题，抓住他们无意中流露出来的矛盾，要求作进一步的解释，并且自己去查阅医学书籍。就像对待其他任何事情一样，在这方面他也首先要竭力弄清事实真相。他唯一能容忍的医生是费多尔·亚历山德罗维奇·格季耶。这是一位好医生，一个好人，没有廷臣作风，他怀着真正的人性的眷恋热爱列宁和克鲁普斯卡娅。在列宁已经不让其他的医生到他那儿去的时候，格季耶仍然能通行无阻地去探望他。那时格季耶也是我家的亲密朋友，在整个革命年代都是我们的家庭医生。由于这个缘故，我们总是能得到最可靠、最精确的关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状况的报告，补充和纠正官方模糊不清的病情会报。

我不止一次地向格季耶详细打听，列宁如能康复，是否还能保持自己的智力？格季耶大体上是这样回答的：他将极易疲劳，工作不会再像以前那样精细，但巨匠仍然会是巨匠。在第一次中风和第二次中风之间，这一预言完全得到了证实。在政治局会议将结束时列宁给人留下的印象是一个极为疲乏的人。他的面部肌肉松弛，两眼

---

<sup>①</sup> 克·阿·爱尔维修(1715—1771年)——法国唯物主义哲学家，革命的资产阶级思想家，著有《论精神》、《论文》等。——译注

失去了光泽，甚至那宽阔的额头也萎缩了，两肩沉重地往下耷拉着。——脸上的表情和整个身影可以用一个词来概括，那就是疲劳。在这种令人吃惊的时刻，我感到列宁已朝不保夕了。但只要睡一夜好觉，他就又恢复了思考力。他在两次中风之间所写的那些文章达到了他的优秀著作的水平。源泉如故，但流量越来越少。就是在第二次中风以后格季耶也没有完全丧失最后的希望。但他的估计变得越来越悲观。病在拖延着。大自然的盲目力量既无恶意，也不仁慈地使这位伟大的病人陷入虚弱无力和绝境。列宁不能，也不应当作为一个残废人活着。但我们对他的康复仍然没有失去希望。

那时我的病也迟迟不愈。娜·伊·谢多娃写道：“根据医生的要求，把列·达·送到了乡下。格季耶常常到那儿去看望病人，他对这位病人十分关怀和温存。他对政治不感兴趣，但他为我们感到难过，不知道如何表达自己的同情。他根本没想到会对列·达·搞这种迫害。他不理解，他怀着期待，感到苦恼。在阿尔汉格尔斯克他激动地对我说必须把列·达·送到苏呼姆去。最后我们决定这么做。旅程本身就很长，要经过巴库、第比里斯、巴统，积雪使旅程变得更长了。但这次旅行倒起了镇定的作用。我们离莫斯科越远，就越能摆脱近来那沉重的环境。但我的感觉还是在护送一个重病号。使我苦恼的是不知道苏呼姆的生活将是什么样的，我们周围将是朋友还是敌人？”

1月21日我们在赴苏呼姆的途中到达第比里斯车站。我和妻子坐在车厢办公的地方，我发着烧，这在那时是常事。陪我一起去苏呼姆的我的忠实的助手谢尔穆克斯敲了一下门走进来。根据他走进来时那苍白的脸色以及他把一张纸递给我时避开我的那双变得呆滞的眼神，我感到发生什么灾难了。这是斯大林发来的已译好的电报，说列宁已去世。我把电报给了妻子，她已经一切都明白了……

第比里斯当局很快也收到同样的电报。列宁去世的消息迅速传开了。我给克里姆林宫发了直通电报。对我的询问得到的回答是：“葬礼定于星期六举行，您反正来不及赶回来了，我们建议您继续治疗。”因此毫无选择的余地。实际上葬礼到星期口才举行，我完全可

以赶到莫斯科。不管这看来多么不可思议，但他们还是在葬礼的日期上欺骗了我。阴谋家们算准我不会想到去核实日期，而以后总可以想办法进行解释的。我记得，列宁第一次生病到第三天才通知我。这是一种手法。目的在于“赢得时间”。

第比里斯的同志们要求我对列宁的去世马上作出反应。但我只有一个要求：让我一个人安静一下。我无法提笔写字。莫斯科简短的电文在我脑海里轰鸣。然而他们聚在那儿等待我作出表示。他们是对的。列车耽搁了半小时。我写了几行悼文：“列宁不在了。不再有列宁了”……我写完几页悼文就交直达电报发出。

“我们到达目的地时已经精疲力竭。”妻子写道，“我们是第一次见到苏呼姆，金合欢花正在盛开，这种花那儿很多。还有十分华美的棕榈树、山茶花。那是一月份，莫斯科正值严寒季节。阿布哈兹人非常友好地欢迎我们。在休养所的餐厅里并排挂着两幅头像，一幅是披着黑纱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遗像，另一幅是列·达·的。我们想把列·达·的像取下来，但下不了决心，担心这像是一种抗议。”

在苏呼姆我在朝大海的阳台上躺了很多天。尽管是一月份，天空的太阳照耀得既明亮又暖和。在阳台和波光粼粼的大海之间耸立着一排棕榈树。经常感到发烧，现在又加上列宁逝世的噩耗在脑海嗡嗡作响。我一幕幕地回想自己生平各个阶段——和列宁的会见，分歧，争论，接近，共事。一些插曲像梦幻似的浮现。渐渐地，完整的情节开始非常清楚地显现出来。我能极为清楚地想象出那些“学生们”，他们常常是在小事上，而不是在大事上忠于导师。我和大海一起呼吸，整个身心都确信自己反对那些不肖徒辈是历史上是正确的……

1924年1月27日。蔚蓝的天空下棕榈树和大海一片寂静。突然排炮的轰鸣打破了寂静。从下面什么地方，从海的那边一阵接一阵地传来密集的炮声。这是苏呼姆向这时正在莫斯科下葬的领袖致敬。我怀念他，也怀念他的多年伴侣。她通过他而理解整个世界，而现在她在安葬他，在千百万人民中间她不能不感到孤独，尽管千百万人民和她一起感到悲痛，但那是另一种悲痛，和她不一样。我怀念娜

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克鲁普斯卡娅。我想从这里向她表示敬意、同情和慰藉。但我下不了决心。在沉重的现实面前所有的语言都显得微不足道。我怕这些话听起来像是一套程式化的礼仪。几天以后我突然接到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的一封信，感激之情使我完全震动了。下面就是信的内容：

“亲爱的列夫·达维多维奇：

我写这封信是要告诉您，在去世前一个月左右，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曾浏览了您的小册子，他在您评论马克思和列宁的地方停了下来，要我把这一段给他再读一遍，他听得非常仔细，然后自己又看了一遍。

我还想说一下，打从您由西伯利亚到伦敦来看我们时起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和您建立起的关系到死都没有变。

列夫·达维多维奇，祝您精力充沛，身体健康。紧紧地拥抱您。

娜·克鲁普斯卡娅”

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去世前一个月看的那本小册子里，我把列宁和马克思作了比较。我非常了解列宁对马克思的态度：充满学生的感激之情，但有一种距离感。导师同学生的关系由于历史的进程成了理论上的先驱者同第一个实现者的关系。我在自己的文章里打破了传统的距离感。马克思和列宁历史地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与此同时又是如此地不同，对我来说，他们是人的精神力量的两个顶峰。我感到愉快的是列宁在去世前不久仔细地，也许还激动地读我写的评述他的文章，因为在他的眼里马克思是衡量一个人的品性的最高尺度。

现在我仍怀着极为激动的心情阅读克鲁普斯卡娅的信。她提到我和列宁交往的两头：我逃出西伯利亚，在1902年10月的一天清早把列宁从伦敦的那张硬板床上叫起来，和1923年12月底列宁两次读我对他的一生事业所作的评价。在这两头之间经过了20年，起初是在一起工作，后来是激烈的派别斗争，最后在更高的历史基础上重新共事。按照黑格尔的说法，这就是正题、反题、合题。而克鲁普斯

卡娅证明，列宁对我的态度尽管很长时期是反题，但他还是保持着“伦敦”时对我的态度，这是一种热情支持和友好的态度，然而已经是建立在更高的历史基础之上了。即使别的什么也没有，在历史的审判面前，伪造者们所有巨著也压不住克鲁普斯卡娅在列宁逝世几天后写的那张小小的便条。

“由于风雪报纸耽搁了好久才寄达，我们终于看到了讣告、悼词和文章。朋友们等着列·达·回莫斯科，他们以为他会中途折回去的，谁也没有想到斯大林会发电报阻止他回去。记得我们在苏呼姆收到的儿子的一封信。他对列宁的去世十分震惊，当时他正感冒，高烧达40度，穿了一件一点都不暖和的上衣到圆柱大厅去和列宁告别，等待着，等待着，急不可耐地等待着我们回去。从他的信里可以感到痛苦的大惑不解和犹豫的责备。”这是我再一次从妻子的笔记中摘录下来的。

一个中央委员会代表团到苏呼姆来看我，其成员有托姆斯基、伏龙芝、皮达可夫和古谢夫，目的是同我商量更换军事部门的人员。实质上这已纯粹是一出滑稽戏。更新军事部门的人员早就背着我全力进行了，现在做的只不过是礼节性的拜访而已。

在军事部门首先遭到打击的是斯克良斯基。斯大林把自己在察里津的失利，南方战线的失败，利沃夫的冒险首先都迁怒于他。诽谤的毒蛇高高地昂起了它的头。为了陷害斯克良斯基，为了以后进而陷害我，在这之前几个月就把温什利赫特安插进军事部门。这是一个傲慢而又平庸的阴谋家。斯克良斯基被免职了。任命伏龙芝去接替，在这之前他指挥乌克兰的军队。伏龙芝是一个严肃的人，由于过去服过苦役，他在党内的威望比年轻的斯克良斯基要高。此外，伏龙芝在战争中无疑具有统帅的才能。但作为一个军事行政首长，他又远远赶不上斯克良斯基。他热衷于抽象的公式，容易受主要是二流专家的影响。

但我想把斯克良斯基的事讲完。他被粗暴地，即完全按照斯大林的方式，调去做经济工作，事先甚至没同他谈过话。捷尔任斯基为能摆脱自己在国家政治保卫局的副手温什利赫特，也为工业部门获

得斯克良斯基这样一位第一流的行政管理人員而感到高兴，便让他去主管制呢托拉斯。斯克良斯基匆匆忙忙耸了耸肩，便埋头于新的工作了。几个月后他决定到美国去参观学习和购置机器。临行前他来找我，向我告别并听取我的意见。国内战争年代我和他齐心协力地工作。但比起谈纯粹党内问题来，谈得更多的是组建增补连，制定军事条令，加速培养指挥人员，为兵工厂储备铜和铝，供给军服和食品。我们两个人都忙得不可开交。列宁患病以后，不肖徒辈把阴谋的魔爪伸进了军事部门，这时我避免谈论党内问题，特别是避免同军事人员谈论。局势很不明朗，分歧初露端倪，在军队里建立派别隐藏着巨大的风险。后来我生病了。在1925年夏天和斯克良斯基的这次会见时，我已经不担任军事部门的领导工作了，那次我们也谈了许多问题，如果不是所有的问题。

“告诉我，斯大林是什么人？”斯克良斯基问。

斯克良斯基本人相当了解斯大林。他想听听我对斯大林个人所作的鉴定，解释成功的原因。我思索了一下。

“斯大林，”我说，“这是我们党的一个最杰出的庸才。”我是在我们交谈时第一次提出这个具有心理和社会意义的鉴定的。我立刻从斯克良斯基的脸上看到，我帮助交谈者触及某种重要的东西。

“您知道，”他说，“使人感到吃惊的是最近一个时期来，中庸之道，自满自足的庸才在各个领域都占了上风。而所有这一切都以斯大林为领袖。这是怎么造成的？”

“这是对革命最初年代伟大的社会和心理紧张的反动。取得胜利的反革命会有自己的大人物。但它的第一阶段，它的热月需要鼠目寸光的庸才。他们的力量就在于他们在政治上的盲目就像一匹推磨的马，它觉得自己在往上走，而实际上它只是推着向下倾斜的磨盘在走。不遮住眼的马是做不了这种工作的。

在这次交谈中我第一次十分清楚地触及热月问题，我要说，我对此已是坚信不疑的。我和斯克良斯基商量好，等他从美国回来后继续交谈。过了没有几个星期，我收到一份电报，说斯克良斯基在美国一个湖里划船时落水淹死了。生活真会耍恶毒的花样。



斯克良斯基的骨灰盒被运回莫斯科。谁也不怀疑它将安放在红场上克里姆林宫的宫墙上，那里已成为革命的名人墓。但是中央书记处决定把斯克良斯基葬到郊外去。可见，斯克良斯基向我辞行一事被记录在案，被注意到了。仇恨转移到骨灰盒上。此外，贬低斯克良斯基是反对保证国内战争胜利的那些领导人的总的斗争计划的一部分。我不认为斯克良斯基活着的时候会对把他葬在什么地方这个问题感兴趣。但是中央委员会的决定在政治上和个人关系上是卑劣的。我克制着厌恶情绪，打电话问莫洛托夫，但决定仍坚决不改。对这个问题历史会重新审定的。

※ ※ ※

1924年秋天我又发烧了。这时争论重又爆发。这一次它是根据事先制定的计划由上面挑起的。在列宁格勒，在莫斯科，在各省份，事先开了千百次的秘密会议来准备所谓的“争论”，也就是有系统、有计划地整治和中伤，这一次矛头不是针对反对派，而是针对我个人。秘密进行的准备工作完成后，根据《真理报》发出的信号，从四面八方，从所有讲坛，从所有报章杂志，从所有的角落同时展开了一场反对托洛茨基主义的运动。这是一个十分壮观的场面。诽谤诬蔑之词就像火山喷发那样。广大党员群众都震惊了。我发着烧躺着，保持沉默。舆论和发言者们除了揭露托洛茨基主义，别的什么也不干。谁也无法准确地说明这意味着什么。日复一日地端出过去的一件件插曲、列宁20年前所写文章中的论战性的引文，把它们弄乱、篡改、歪曲，而主要是，这一切就像是发生在昨天那样。谁也弄不清楚这是怎么回事。如果这一切是真的，那么列宁定然了解。要知道，十月革命是在所有这一切之后完成的。要知道革命以后是国内战争。要知道托洛茨基和列宁一起建立了共产国际。要知道托洛茨基像和列宁像并排挂在一起。要知道……要知道……但诽谤如冰冷的狂涛涌来。它机械地压制人们的意识，更摧残着人们的意志。

本应把列宁看作革命领袖，但却把他当作宗教领袖看待。他们不愿我的抗议，在红场上建造了不成体统的和有辱于革命意识的陵墓。官方出版的关于列宁的书籍都变成了类似这种陵墓的东西。他

们把他的思想切割成语录，以进行伪善的说教。他们用涂上防腐剂的尸体来反对活着的列宁和反对托洛茨基。群众被弄得晕头转向，迷惑不解，惊恐不已。那些不学无术的粗制滥造的作品以其数量求得政治质量。这种作品震耳欲聋，使人感到压抑，精神沮丧。党只能默不作声。确立了纯粹是机关对党的专政制度。换句话说，党不成其为党了。

每天早晨把报纸送到我床上。我浏览电讯、文章的标题和署名。我相当了解这些人，知道他们心里是怎么想的，他们能说什么和命令他们说些什么。他们中的多数人是已经被革命弄得筋疲力尽的人。有一些是受骗上当的目光短浅的盲从者。有一些是年轻的钻营之徒，他们急于证明自己是没有人可替代的。他们不仅互相矛盾，而且也自相矛盾。但是报纸上狂呼乱叫吵吵嚷嚷地发出喋喋不休的诽谤，竟然压倒其自身的矛盾和空洞的内容。它以数量取胜。

娜·伊·谢多娃写道：“列·达·第二次发病之时，也正是对他展开骇人听闻的中伤之日，我们就像得了重病似地承受着这种中伤。《真理报》铺天盖地而来，没完没了，而上面的每一行字，每一个字母都在撒谎。列·达·保持沉默。但对他来说这种沉默要花多大的代价啊！整天都有朋友们来看望他，有时夜里也来。我记得有人问列·达·，他是否读了今天的报纸？他回答说，他根本不读报。确实如此，他把报纸拿在手里看几眼就扔了，似乎只消看上一眼，就能知道它们的内容了。他太了解做这道菜的厨师了，何况每天烧的是同样的那道菜。他说，读那时的报纸就像‘往喉咙里塞烟卤刷子’。如果列·达·决定作出回答的话，本来可以强迫自己去看报的。但是他却保持沉默。由于精神状态很坏，感冒经久不愈。他极度消瘦，脸色苍白。在家里我们避开造谣中伤这个话题，但是别的任何话题也都无法讲。我记得，我每天到教育人民委员部去上班的感受，那就像遭受夹道鞭笞似的。但是从来没有人进行任何攻击或作出不愉快的暗示——除了一小部分上层持敌意的沉默外，大多数工作人员无疑是同情我的。党内似乎过着双重生活：内部的、隐蔽的和表面的、做样子的，两者是完全相互矛盾的。只有某些大胆的人才敢于揭示绝大

多数人所感觉到和思考的东西，而绝大多数人都把自己的同情隐藏在‘一致’通过的决议的后边。”

这时公布了一封我给齐赫泽的反对列宁的信。这事发生在1913年4月，同在彼得堡出版的一份布尔什维克的合法报纸有关，这份报纸盗用了我在维也纳出版的报名《真理报，工人报纸》。这引起了一场尖锐的冲突，这种冲突在侨民生活中是很多的。我写了一封信给齐赫泽，他曾一度站在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之间，我在信中发泄了自己对布尔什维克中央和列宁的愤慨。要是再过两三个星期，我自己无疑会重新检查这封信的，而如果再过一两年，我会觉得这封信简直滑稽可笑。但是这信却有其特殊的遭遇。警察局截获了这封信，它在警方的档案里一直存放到十月革命。革命后被转到党史研究所的档案库。列宁很了解这封信。对他来说，对我来说，它不过是陈年积雪，如此而已。在流亡年代写的形形色色的信件多着呢！1924年不肖徒辈从档案里取出这封信，把它抛向全党，而那时党内有四分之三完全是新党员。挑选列宁去世后的几个月不是偶然的。这是极其必要的条件。第一，列宁已经无法站起来叫出这些先生们的真实姓名；第二，人民群众对领袖的逝世深感悲痛。群众并不了解党的昨天，他们读到托洛茨基对列宁含有敌意的评论，都感到震惊。不错，评论是12年前写的，在掐头去尾的引文而前时间的概念消失了。不肖徒辈利用我给齐赫泽的信做文章乃是世界历史上最大的骗局之一。法国反动分子在德雷福斯案中抛出的伪造文件同斯大林及其同伙的政治骗局相比真是小巫见大巫。

诽谤只有在迎合某种历史要求的情况下才会有力量。如果诽谤有如此巨大的销路，那就意味着在社会关系或政治情绪中有什么东西起了变化——我这样推想。应当分析诽谤的内容。我躺在病床上有足够的时间来做这件事。所谓托洛茨基想“掠夺庄稼汉”的指责从何而来？——这是一个反动大地主党、基督教社会主义者和法西斯分子用来反对社会主义者，尤其是反对共产主义者的公式。对马克思的不断革命的思想的这种恶毒的中伤是从何而来的？保证建成自己的独特社会主义的这种民族自吹自擂是从何而来的？哪些阶层需

要这种反动庸俗的东西？最后，这种理论水平的下降，这种政治上的愚昧是如何造成的？原因何在？我在床上翻阅自己一些旧文章而且意外地发现我在1909年，在斯托雷平反动的极盛时期写下的以下几行字：

“当历史发展的曲线上升时，社会思想就变得更敏锐、更勇敢、更聪明。它能立即抓住事实，又能立即用概括的线把这些事实串联起来……当政治曲线下降时，社会思想就会充满愚昧。可贵的政治概括才能无影无踪地消失。愚昧变得蛮横起来并龇牙咧嘴地嘲弄任何作严肃概括的企图。它感觉到这个领域已归它所有时，它便开始运用起自己的各种手段。”它最重要的手段之一就是诽谤。

我对自己说：我们正在经历一个反动时期。正在出现阶级的政治变动。阶级意识在变化。在极度紧张之后正在后退。它要退到什么界线？无论如何不会退到出发点。但是谁也不能事先指出其界线的位置。它取决于内部力量的斗争。首先需要弄明白发生了什么。反动的深刻的量变过程正在显露，它们力图消灭或者哪怕是削弱社会意识对于十月革命的思想、口号以及活着的人物的依存关系。这就是正在发生的事情的含意。我们不要陷入主观主义。我们对历史不要挑剔，不要抱怨，历史是通过错综复杂的道路来完成自己的事业的。理解所发生的一切，就意味着一半的胜利已有保证。

## 第四十二章

# 党内斗争的最后时期

1925年1月，我被免除了军事人民委员的职务。这以前的斗争为这一决定作了仔细的准备。除了十月变革的传统，不肖徒辈最害怕的便是国内战争的传统以及我与红军的联系。我未经反抗就放弃了军事职务，我内心反而感到轻松，因为这样我就把对手们散布我想搞军事阴谋的武器夺过来了。为证明自己的行动是正确的，起初不肖徒辈编造了种种无稽之谈，而到后来连他们自己都半信半疑了。我个人的兴趣早在1921年已转到了另一个领域。战争结束了，红军从530万削减为60万。军事工作开始进入官僚主义的轨道。经济问题成了国内的首要问题，战争结束后，我花在经济问题上的时间和精力要比军事问题多得多。

1925年5月，我被任命为租让委员会主席、电工技术管理局局长、工业科学技术管理委员会主席。这三个部门之间没有丝毫的联系。选择这三个部门是背着我，出于独特的考虑而确定的：使我离开党而陷于孤立，使我忙于日常工作，并使我处于特殊的监督之下，等等。尽管如此，我还是认真负责地试图在新的基础上好好地干它一番。我埋头于这三个对我来说陌生的机关工作。我最感兴趣的是各科学技术研究所，由于工业集中，在我国这些研究所的规模颇大。我热心地参观了许多实验室，饶有兴趣地观看了实验，聆听了优秀科学家的解说，并在业余时间仔细研读化学和流体动力学教科书，觉得自己半是行政管理者，半是大学生。我在年轻时曾打算考数理系，这不是无益的。我仿佛摆脱了政治，用研究自然科学和工艺学来休息休

息。作为电工技术管理局局长，我经常视察兴建中的发电站，还去了第聂伯河，那儿正在大兴土木，准备建造一个水力发电站。我在两位船夫帮助下登上了一条渔船，沿着扎波洛什的哥萨克人的旧航道在充满漩涡的激流中航行。这自然是一种纯体育运动的兴趣。但是我对第聂伯河的企业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既从经济角度，也从技术角度。为了防止在水电站建造中出现的计算差错，我组织了美国专家，后来又增加了一些德国专家进行鉴定。我试图把新工作不仅与当前的经济任务，而且也与社会的基本问题联系起来。为反对处理经济问题中的愚蠢的民族观点（通过自满自足的孤立达到“独立”），我提出了拟订我国经济和世界经济的比较系数体系的问题。这个问题是出于正确估计世界市场的必要性提出来的，而这个问题的解决又能反过来为进口、出口和租让政策服务。实质上，比较系数问题是承认世界生产力支配一国生产力引起的，这意味着对“一国社会主义”这一反动理论的进攻。我就自己新的工作中的问题作报告，出版著作和小册子。我的对手们不能，也不愿在这个领域里应战。他们提出了这样一种说法：托洛茨基为自己开辟了新的战场。电工技术管理局和科学研究所也像以前的军事部门和红军一样，使他们忐忑不安。斯大林的机关密切注视我的活动。我采取的每一个实际措施每每引起复杂的密谋活动。每一个理论上的总结都被用来作为制造关于“托洛茨基主义”的愚昧的神话的材料。我的实际工作被置于极端困难的境地。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斯大林及其助手莫洛托夫的很大一部分活动是在我的周围组织直接的怠工。我领导下的机关要得到必要的资金几乎是难以解决的任务。在这些机关里工作的人为自己的命运，或者至少为自己的前途担忧。

我回避政治的尝试显然失败了。不肖徒辈已经不能半途而废。他们对自己的所作所为十分害怕。昔日对我的诽谤成了他们的沉重包袱，今天需要他们加倍地背信弃义。最后，我要求免去我电工技术管理局和科学技术研究所的职务。租让总委员会提供他们要阴谋的机会比较少，因为每一项租让企业的命运都是由政治局决定的。

那时，党内生活出现了新的危机。在斗争时期他们结成“三驾马

车”来反对我。但是在“三驾马车”内部远不是团结一致的。无论是季诺维也夫，还是加米涅夫，在理论上和政治上大概都高于斯大林。但是他俩缺一件小东西，即所谓意志。他们的眼界里国际主义的成分多于斯大林，这是他们侨居国外时在列宁指导下获得的，但这并没有加强，倒是削弱了他们的地位。方针是实现自满自足的民族发展，而旧的俄国爱国主义的蔑视一切的信条“克敌制胜，如探囊取物”，现在正被转译成新的社会主义的语言。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试图哪怕是部分地捍卫国际主义的观点，这就使他们在官僚们眼里变成二流的“托洛茨基分子”。这就使他们更加疯狂地向我发起猛烈攻击，以加强机关对自己的信任。但是这番努力也是徒劳的。机关越来越清楚地看到斯大林和自己血肉相联。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很快就与斯大林处于敌对状态，而当他们企图把争执从三驾马车转到中央委员会去的时候，他们却发现斯大林已拥有不可动摇的多数。

加米涅夫算是莫斯科的正式领导人。但当1923年大部分党员支持反对派的时候，在加米涅夫的参与下莫斯科的党组织被摧毁，这以后莫斯科的一般党员群众忍气吞声地保持沉默。加米涅夫刚开始试图反抗斯大林时犹如悬在空中，无所依靠。列宁格勒的情况则不同。由于季诺维也夫采取了强硬的保护措施，把列宁格勒的共产党员同1923年的反对派隔开了。但是现在轮到他们了。列宁格勒的工人对富农方针和一国社会主义的方针感到不安。工人阶级的抗议与季诺维也夫等高级官员的反抗不谋而合。这样便产生了“新反对派”，起初，它的成员中有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克鲁普斯卡娅。最使大家，首先是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感到惊奇的是，他们不得不逐字逐句地重复老反对派提出的批评，因而不久便被划入了“托洛茨基分子”的阵营。如果说，我们中间有人认为同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接近至少是件怪事，这是毫不奇怪的。在反对派中间有不少人是反对这个联盟的。甚至有人认为可以与斯大林结盟去反对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诚然为数不多。我的一个挚友姆拉奇科夫斯基是个老革命家，也是国内战争中最优秀的军官之一，他反对同任何人结盟，精辟地论证了自己的立场：“斯大林会搞欺骗，季诺维也夫会逃

跑。”但是这类问题最后不是靠心理估计，而是靠政治估计来解决的。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曾公开承认，从1923年起，“托洛茨基分子”反对他们的斗争是正确的。他们接受了我们政纲的基本原则。在这种条件下，我们不能不同他们结成联盟，何况他们得到列宁格勒成千上万名工人的支持。

除了正式会议，我和加米涅夫已有三年没有会面了，最后一次会面是在他动身赴格鲁吉亚的那天夜里，那时他答应支持列宁和我的立场，但在获悉列宁病重后，便倒向斯大林那一边。就在第一次和我会面时，加米涅夫宣称：“只要您同季诺维也夫登上同一个讲台，党就会找到自己的真正的中央委员会。”对于这种官僚的乐观主义，我只能付之一笑。加米涅夫显然是低估了“三驾马车”在三年时期所干的瓦解党的活动。我毫不迁就地向他指出了这一点。

从1923年底开始，即在德国革命失败之后，国际上出现了革命低潮。在俄国，对十月革命的反动却进入了高潮。党的机关越来越向右倾。在这种情况下，要是认为只要我们携手联合，胜利就会像瓜熟蒂落一样来到我们跟前，那就未免太幼稚了。我曾几十次地对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说过：“我们应当有个长远打算，必须准备长期的严肃的斗争。”新盟友凭一时的热情接受了这个观点。可是事隔不久，他们的热情便消失了。它不是一天一天，而是一小时一小时地萎靡下去。姆拉奇科夫斯基对他们个人所作出的评价是正确的：季诺维也夫最后还是逃跑了。但是他并没能把自己的所有志同道合者都拉走。季诺维也夫的两次倒戈毕竟给托洛茨基主义的神话带来了无法医治的创伤。

※ ※ ※

1926年春，我和妻子到柏林去了一次。莫斯科的医生对我发烧持续不退感到茫然，为避免承担全部责任，早就主张让我出国治疗。我也想从绝境中找出一条出路，因为在最危急关头，发烧使我丧失战斗力，成了我的对手的可靠盟友。政治局对出国问题进行了研究。政治局表示，根据它所掌握的情报和从整个政治形势看，我去国外是极端危险的，但表示可以由我本人作出最后决定。政治局的决定后



面附有国家政治保卫总局不同意我出国的意见书。政治局无疑是担心一旦我在国外发生什么不愉快的事，党必然要让政治局承担责任。当时在斯大林这个警察的头脑里还没有想到要把我强行流放国外，更没有想到流放君士坦丁堡。可能政治局也担心我在国外会采取什么行动去联合外国的反对派。不管怎么样，我跟朋友们商量后，还是决定出国。

毫不费力地同德国使馆达成了必要的协议，4月中旬我带上署名为教育人民委员部乌克兰委员会委员库兹涅科的外交护照，偕同妻子出国了。陪同我前往的有秘书谢尔穆克斯，他是我以前的专列车长和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特派员。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前来给我送行，场面颇为感人：他们很不愿意单独同斯大林呆在一起。

在战前的年代，我对霍亨索伦王朝统治下的柏林非常熟悉。它有独特的风貌，虽然给许多人以深刻的印象，但从没有人认为是令人愉快的。如今柏林变了样。现在它根本就没有自己的风貌，至少我没有看到。这个城市像长期患了重病，动过多次外交手术以后，正在慢慢复苏。通货膨胀已经被制止，稳定的马克仅仅是测量普遍营养不良的工具。在街头，在商店，在行人的脸上可以看到穷困的迹象，觉察到一种急不可耐地，有时是热切地想要东山再起的情绪。在战争、失败以及被凡尔赛和约掠夺一空以后的艰难岁月里，德国人的整齐清洁的面貌被贫困淹没了。密密麻麻的人群在顽强地、然而心情压抑地逐步修复被战争的铁蹄所摧毁的大街小巷、走廊和仓库。从街道的节奏、从行人的步态和动作中可以感觉到一种宿命论的悲惨情调：毫无办法，生活就是无期的苦役，应当一切从头做起。

在几个星期里，我在柏林一家私人医院里接受医疗观察。为了找到神秘发烧的原因，医生们轮流对我进行了检查。最后一位喉科医生提出了一种假设，说我发烧的病源是扁桃体发炎，建议我切除它以防万一。一些诊断医师和内科医生却犹豫不决，这是些年过半百的后方医生。一位经历过炮火的外科医师却根本不把他们放在眼里。他表示，现在切除扁桃体就像剃胡子那样容易。我不得不同意进行手术。

助手打算把我的双手捆住，但是手术医生认为有坚强的意志就够了。从外科医生鼓励性的俏皮话中明显地可以感到一种紧张和有克制的激动。最令人不快的是——一动不动地仰卧在手术台上，被自己的血呛得憋气。手术持续了 40 至 50 分钟。一切顺利——撇开这次手术显然无效不论，因为过了一段时期，我又发烧了。

在柏林，确切些说在医院里的这段时间对我来说并没有白度过。我埋头阅读德国的报刊，打从 1914 年 8 月起我几乎没有碰过这些报刊。每天给我送来 20 种德国报纸以及几份外国报纸。这些报纸我读后就扔在地上。前来看病的教授只得在由各种色彩的报纸铺成的地毯上走来走去。实际上，我第一次听见了德国共和主义政策的全部音阶。必须承认，我没有发现有什么出人意外的东西。共和国是军事败局的弃儿，共和派是凡尔赛和约的奴隶，社会民主党人是被他们扼杀的十一月革命的遗嘱执行人，兴登堡是民主制的总统。同我以前所想象的大体相近。但是能就近观察这一切还是很有教益的……

5 月 1 日，我和妻子坐小汽车驶遍城市，游了一些闹市区，观看了游行、招贴画，听了演说，把车又开到了亚历山大广场，混入了人群。我见过许多五一节的游行队伍，都比这里的人数多，且更为动人，更为壮观，但是我已经很久没有机会不引人注意地在群众中间走动，在这里我感到自己是这个整体中的不知名的一员，可以自由地听听看看。只有一次，一位随行人员对我小心翼翼地说：“瞧，在出售您的照片呢。”然而依据这种照片谁也不可能认出教育人民委员部所属委员会委员库兹涅科。万一韦斯塔普伯爵、赫尔曼·弥勒、施特莱塞曼、雷久特洛伯爵、希法亭或其他任何反对放我进入德国的人看到这几行文字，我认为有必要奉告如下：我没有喊过应受指责的口号，没有张贴过令人愤慨的招贴画，我只是一个在几天以后就要动手术的旁观者。

我们还参加了城外的“葡萄酒节”活动。那里是人山人海。尽管阳光和美酒增添了春意，但是在那些游乐的人或者想寻欢作乐的人的脸上仍笼罩着过去岁月的阴影。只要仔细看一下，就可以发现他

们都是在慢慢康复的病人；游乐还得花很大的力气。我们在人群里呆了几个小时，看看，聊聊，品尝纸盘中的小灌肠，甚至还喝了啤酒，从1917年以来我已忘了这种酒味。

手术后我恢复得很快，已确定回国的日期了。但是这时候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这件事我至今还不明白。大约在我动身前一个星期，在医院的走廊里出现了两个身份不明的先生，从他们的外表看显然是警察。我向窗外院子望去，发现院子里至少有6个这样的人，虽然他们不尽相同，但仍极为相似。这时候克列斯廷斯基正在我这儿，我提请他注意这一情况。几分钟后有个助手跑来敲门，激动地说，他受教授委托前来通知，有人准备暗害我。我指着那边许多暗探问道：“但愿不是警方？”医生推测说，警察是防备暗害的。两三分钟后来了一位警事顾问，他告诉克列斯廷斯基，警方确实接到谋害我的情报，已采取特别保护措施。整个医院都行动起来了。护士们互相传递这个消息，并告诉病人，托洛茨基在医院里，由于这个原因有人要往大楼里扔几颗炸弹。造成了一种同一个医疗机构很不相称的气氛。我同克列斯廷斯基商定立刻迁往使馆大楼。医院前的一条马路已被警察封锁。我是由警车护送出去的。

官方的说法大致是这样的。由于破获了一个新的阴谋集团，被捕的一个德国保皇党人似乎向侦查员供述，俄国白卫分子准备在最近几天去谋害在柏林的托洛茨基。需要说一下，同意我去德国的德国外交部门故意不把我的德国之行告诉警方，因为在警察内部保皇党人的影响太大了。警方不相信被捕的保皇党人的供词，但还是去查核我在医院里的说法，使他们大吃一惊的是，被捕者的供词是确凿的。由于教授已被查访过，因而我同时接到两个警告，助手的警告和警事顾问的警告。是否真的有人要来暗害我，警方是否真的从被捕的保皇党人那里打听到我的下落，对于这个问题，我至今都不清楚。不过我猜想事情很简单。可以认为，外交部门没有“保密”，而警方因得不到信任而抱怨，于是决定对施特莱塞曼，对我表明，没有他们的参与，我是不能顺利地摘除扁桃体的。反正，医院被弄得天翻地覆，而我则在对假想敌人严加防范的情况下，迁进大使馆。后来德国报

刊对此只有微弱而犹豫的反应，显然，谁也不愿相信这件事。

我在柏林的日子里，欧洲恰好发生了一些重大的事件：英国工人总罢工，波兰皮尔苏茨基政变。这两件事大大加深了我同不肖徒辈的分歧，也预定了我们以后的斗争将得到更加蓬勃发展。关于这方面的问题，这里需要说明一下。斯大林、布哈林，在初期还有季诺维也夫，都认为苏联工会领导人同英国工联总理事会的外交联合，是我们政策上所取得的突出成就。由于乡巴佬的局限性，斯大林想象珀塞尔以及工联的其他领导人打算或者能够在困难时刻支持苏维埃共和国，反对英国的资产阶级。至于工联的领袖，他们不无理由地认为，由于英国资本主义的危机和群众日益增长的不满情绪，他们还是披上左的外衣为好——同苏联工会领导人建立正式的，然而双方都不承担义务的友好关系。双方小心翼翼地兜圈子，避免触及事情的实质。腐朽的政策在重大事件上已屡遭失败。1926年5月的总罢工不仅是英国生活中的重大事件，也是我们党内生活中的一件重大事件。

战后，英国的命运极其引人关注。英国世界地位的急剧变化不能不引起国内力量的对比发生同样的急剧变化。显然，即使包括英国在内的欧洲在某一个时期内能够达到一定的社会平衡，英国也只有经过一连串最严重的冲突和动荡，才能达到这种平衡。我认为，可以设想，正是在英国，采煤工业内的冲突可能导致总罢工。我由此推断，在最近时期内，在工人阶级的旧组织和它担负的新任务之间必然会暴露出深刻的矛盾。1925年的冬春之交，我在高加索曾写过一本论述这个问题的小册子（《英国往何处去》）。实际上，小册子是反对政治局的官方观点的，他们希望总理事会向左转，希望共产主义逐步地、毫无痛苦地深入工党和工联的队伍。我把该书的手稿交给政治局审查，一方面是为了避免不必要的纠葛，另一方面是为了检验自己的对手。因为现在的问题是预测，而不是进行事后的批评，因此政治局委员中谁也没有发表意见。小册子顺利地通过了书报检查，照原样出版，未作任何删改。不久还出版了它的英译本。英国社会主义的官方领袖把这本小册子看作是一个外国人的幻想，他不懂英国国

情，却梦想把“俄国的”总罢工搬到英伦三岛上来。此类反应，从麦克唐纳本人算起，没有几百，也可以找到几十个。在政治上唱陈词滥调方面，麦克唐纳无疑是首屈一指的。然而，才过了几个月，矿工的罢工就发展成了总罢工。我也没有料到我的预言竟会如此快地得到证实。如果说总罢工证实了马克思主义预言是正确的，证明英国改良主义杜撰是错误的，那么总理事会在总罢工期间的行径则表明斯大林寄予珀塞尔身上的希望的破灭。我在医院里千方百计地收集说明总罢工的进程，特别是群众和领袖关系的所有消息。莫斯科《真理报》上刊登的文章的性质特别使我感到愤慨。该报的主要任务是掩饰破产，维护面子。要达到这个目的就得恬不知耻地歪曲事实。对于一个革命的政治家来说，没有比欺骗群众更能说明其思想之堕落的了！

我回到莫斯科后，便要求立即断绝同工联总理事会的联盟。季诺维也夫经过不可避免的犹豫之后，同意了我的意见。拉狄克表示反对。斯大林抓住联盟不放，甚至竭尽全力地抓住联盟的空架子。英国工联主义者等到摆脱了尖锐的内部危机以后，便不客气地把慷慨然而糊涂的盟友一脚踢开。

与此同时，在波兰也发生了几件同样重要的事件。小资产阶级在胡乱探索出路，走上了起义的道路，并大吹特吹皮尔苏茨基。共产党领袖瓦尔斯基<sup>①</sup>断定，“无产阶级和农民民主专政”已在他眼前发展起来，并号召共产党支持皮尔苏茨基。我早已认识瓦尔斯基了。罗莎·卢森堡在世时，瓦尔斯基还能够在革命队伍中占有一席之地。他本身永远是个微不足道的人。1924年，瓦尔斯基经过长时间的动摇之后宣布说，他终于认识了“托洛茨基主义”的危害，即低估农民在民主专政的事业中的作用。作为对他听话的奖赏，他获得了领袖的地位，并迫不及待地等待适当的时机，来更新迟迟获得的马刺。1926年5月，瓦尔斯基抓住一个难得的机会，使自己蒙受耻辱，玷污党的

<sup>①</sup> 阿·瓦尔斯基(1868—1937年)——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和波兰共产党的创建人之一，波兰共产党中央委员(1919—1929年)和中央政治局委员(1923—1929年)。——译注

旗帜。当然，他还是没有受到处分，斯大林的机关掩护他避开愤怒的波兰工人。

1926年斗争越来越激化。这一年秋天，反对派在党支部会议上公开出击。机关进行了疯狂的反击。思想斗争为行政手段所代替，他们用电话通知党的官僚们参加工人支部的集会，动用大批的小汽车乱敲喇叭，组织一帮人一见反对派分子登上讲台就吹口哨，大喊大叫。执政的派别集团用汽车调集大批人马，以实行镇压相威胁。党内群众还什么都没有来得及听清、领会或说出自己的意见，就为可能发生的分裂和灾难所吓住。反对派只好退却。10月16日，我们发表声明说，我们认为我们的观点是正确的，并保留在党组织内为这些观点而斗争的权利，同时表示不采取会引起分裂的活动。10月16日声明并不是对机关，而是对党内群众说的。它表明我们愿意留在党内，并继续为党服务。虽然斯大林分子在第二天就撕毁了签订的停战协议，但是我们还是赢得了时间。1926至1927年之交，我们有了一个喘息的机会，使我们在理论上能对许多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

1927年初，季诺维也夫已准备投降，不是马上投降，也是一步步地投降。但当时中国发生了惊人的大事。斯大林政策的罪恶已看得很清楚。它暂时推迟了季诺维也夫以及后来所有追随他的人的投降。

不肖徒辈对中国的领导，践踏了布尔什维主义的一切传统。中国共产党被迫违背自己的意愿加入了资产阶级的国民党，并屈从于它的军事纪律。禁止成立苏维埃。建议中国共产党人停止土地革命，未经资产阶级许可不得武装工人。早在蒋介石镇压上海工人并把权力集中在军人集团手中以前，我们就警告过必然会出现这样的结局。从1925年起，我就要求共产党人退出国民党。斯大林和布哈林的政策不仅为蒋介石摧毁革命做了准备并使之易于进行，而且藉助于国家机关的镇压，阻挠我们对蒋介石反革命行径进行批判。1927年4月，斯大林在圆柱大厅召开的党的会议上还为联合蒋介石的政策作辩护，并号召大家相信蒋介石。五六天以后，蒋介石就血洗了上海工人和共产党。

愤怒的浪潮席卷全党。反对派抬起了头。反对派分子顾不上秘

密活动的常规，成批地到租让总委员会来找我，而当时我们已经被迫采用秘密手段，保护在莫斯科的那些反对蒋介石的中国工人。有不少青年同志以为，斯大林政策如此明显地破了产，这一定会加速反对派的胜利。在蒋介石发动国家政变后的头几天，我就向那些头脑过热的年轻人，并且不仅仅是年轻人，大泼冷水。我再三向他们证明，反对派不可能因为中国革命的失败而加强自己的地位。我们的预见得到了证实，这又把一千、五千以至一万个新的同志吸引到我们这边来。但是对千百万人来说，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不是预见，而是中国无产阶级遭到镇压的事实本身。继 1923 年德国革命遭受失败，1925 年英国总罢工遭受挫折，中国的新的失败只会加深群众对国际革命的失望情绪。而这种失望情绪也就成了斯大林民族改良主义政策在心理上的主要根源。

很快就发现，我们作为一个派别确实得到了加强，这就是说思想上更加一致了，人数也增加了。而把我们和政权联结在一起的纽带却被蒋介石的军刀砍断了。他的那位声誉扫地的俄国盟友斯大林只能用从组织上摧毁反对派去补充对上海工人的镇压。一批老革命家是反对派的核心。但我们已不是孤家寡人了。有成千上万新一代的革命家团结在我们周围，十月革命唤醒他们投入政治生活，他们打赢了国内战争，在列宁领导下的中央委员会的崇高威望面前，他们显得毕恭毕敬，只是从 1923 年起，这一代人才开始独立思考，提出批评，开始把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运用于发展的新的转折点，尤其困难的是，他们学习该如何肩负起发挥革命首创精神的重任。现在有成千上万名这样的青年革命家在斯大林制度的监狱和流放地通过理论研究来增加自己的政治经验。

反对派的领导集团密切注视这种结局。我们十分清楚，要使我们的思想成为新一代工人的财富，不能靠外交手腕和影响，而只能通过不顾一切实际后果的公开斗争才能做到。我们明知会遭受直接的失败，但是坚信我们是在为遥远的将来思想上的胜利作准备。

无论在过去和现在，在人类历史上动用物质力量总能起巨大作用的，有时起进步作用，更经常的是起反动作用，这取决于哪个阶级

以及为了什么目的而使用暴力。但是由此远远不能得出结论，似乎暴力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可以克服一切障碍。借助武器可以阻碍历史向进步方向发展。但要永远挡住进步思想的道路是不行的。这就是为什么革命者在为伟大的原则作斗争时只能遵循一条规则：fais ce que dois, advienne que pourra。（不管怎么样，你该干什么就干什么）。

※ ※ ※

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定于1927年底召开，随着开幕日期的临近，党越来越感到自己处在历史的十字路口。广大党员普遍感到忧心忡忡。尽管周围是骇人听闻的恐怖，但在党内还是产生了希望听听反对派意见的愿望。这只有通过非法手段才行。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各个角落里，经常举行工人、大学生的秘密集会，从20人到100人，200人不等，为的是聆听反对派代表的讲话。我经常在一天内参加两三次，有时甚至四次这样的会议。会议通常在工人家里举行。两间小房间经常挤满了人，讲话者只能站在两间房子的中间。大家有时席地而坐，而经常因地方小，只好站着交谈。监察委员会的代表往往也在此类集会上出现，要求大家离开会场。大家则要他们一起参加讨论。如果他们破坏秩序，就把他们撵走。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总共有两万人参加过这种会议。到会人数不断增加。反对派十分巧妙地筹划了一次在高等技术学校礼堂召开的大规模集会。首先从内部占领了礼堂。礼堂里挤满了两千多人。有好多人都只能站在外面大街上。行政当局企图阻挠我们开会，但无能为力。我和加米涅夫讲了约两个小时。最后，中央委员会号召工人用武力驱散反对派的会议。此项号召仅仅是一种掩饰，以便出动国家政治保卫总局领导下的战斗队向反对派发动一次精心准备的进攻。斯大林想用流血的方式来解决这场冲突。我们发出了暂时停止举行大规模集会的信号。但是这已经是在11月7日示威游行以后的事了。

1927年10月，中央执行委员会在列宁格勒召开例会。为庆祝会议召开，举行了群众示威游行。各种情况的偶然巧合，使这次游行出现了完全出乎意料的转折。我同季诺维也夫以及另外几个人一起



驱车在市内转了一下，看看游行的规模和群众的情绪。巡视快结束时，我们慢慢驶过塔夫利达宫，那里用卡车筑起了观礼台，供中央执行委员会成员使用。我们的汽车遇到了一排排散兵线，无法通过。我们还没有考虑好如何摆脱困境，警备司令就匆匆跑到我们车前，老老实实地建议送我们上观礼台。我们还在犹豫，两排警察已为我们打开了一条通向最后那辆卡车的道路，那辆车还空无一人。当群众知道我们在靠边的一个观礼台时，游行队伍顿时起了变化。游行群众冷淡地走过头几辆卡车，不理睬站在卡车上的人的致意，而是赶忙朝我们涌来。在我们卡车旁边很快筑起了一个数千人的大堤。工人和红军战士停下来，抬起头来欢呼，然后在后面迫不及待的队伍的推动下，继续往前走。奉命前来维持秩序的值勤警察自己也完全被周围的气氛吸引住了，对于值勤不表现出任何积极性。当局派出了数百名最忠实的机关代表混入人群。他们拼命吹口哨，但是孤零零的口哨声完全淹没在表示支持的欢呼声中。这种场面越来越使游行的官方领导人无法忍受。最后，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和几个最显要的成员从周围已空无一人的第一个观礼台上下来，爬上我们这个排在最后，专门接待地位最不显要的客人的看台。然而，即使他们迈出这大胆的一步，也挽救不了局面，群众不停地呼喊着名字，自然不是那些官方人士的名字。

季诺维也夫顿时乐观起来，指望这次示威会产生最伟大的后果。我不同意他因一时感情冲动而作出的估价。列宁格勒的工人群众以对反对派领袖表示柏拉图式的同情的形式来表达自己的不满，但他们还不能制止机关对我们的镇压。在这一点上，我不抱任何幻想。另一方面，这次示威游行给了统治集团一个暗示，必须加紧镇压反对派，让群众面对既成事实。

另一个里程碑是为庆祝十月革命10周年在莫斯科举行的游行。游行的组织者、纪念文章的作者和演讲者完全是在十月革命时候站在街垒另一边的人，或者是干脆躲在家里，以待局势明朗化，并且在革命确实胜利后才参加革命的人。当我看到这些食客所写的指控我背叛十月革命的文章或从广播中听到他们的讲话时，我与其说感到

可笑,还不如说感到可悲。要是你理解历史发展的动力,看到你的对手被一只他本人也不知道的手操纵着的绳子牵动时,那么最可恶的卑鄙行为和背叛行为对你就不起作用了。

反对派分子决定举着自己的标语参加游行队伍。这些标语口号决不是针对党的:“向右开火——打击富农、耐普曼和官僚。”“执行列宁的遗嘱”,“反对机会主义,反对分裂,维护列宁党的团结。”如今这些口号成了斯大林派在反对右翼斗争中的官方信条。1927年11月7日,反对派手中的标语牌被夺走,撕成碎片,而举标语牌的人则遭到职业打手队的殴打。列宁格勒游行的经验对官方领导人是有好处的。这一次他们的准备工作比上次要好得多。但群众感到不舒服。他们怀着极其不安的心情参加了游行。在惊慌失措和惴惴不安的群众面前出现了两个活跃的集团:反对派和机关。莫斯科街上明显的非革命分子,乃至纯粹的法西斯分子也作为反“托洛茨基分子”的志愿者前来为机关助威。有一个警察以警告为名,公然向我的汽车开枪。有一个人还在为他指点方向。一个喝醉酒的消防队的官员破口大骂地跳上我的车子的踏板,并把玻璃砸得粉碎。在明眼人看来,1927年11月7日莫斯科街头发生的事件显然是热月的预演。

列宁格勒也举行了类似的示威游行。先期到达的季诺维也夫和拉狄克遭到特遣部队的攻击,并且在防范人群的借口下,在游行期间被锁在一幢大楼里。季诺维也夫当天往莫斯科给我们写信说:“所有情报都告诉我们,他们的这些胡作非为对我们的事业很有好处。我们为你们那里发生的事情感到担心。我们这里的‘结合’(即同工人的秘密谈话)进行得很好。已出现了有利于我们的重大转机。我们暂不打算离开这儿。”这是季诺维也夫身上反对派活力的最后一次表现。第二天他就回到了莫斯科,并坚决主张投降。

11月16日,越飞<sup>①</sup>自杀了,他的死使斗争进一步激化。

越飞身患重病。他是驻日大使,因病重而被送回国。花了很大

<sup>①</sup> 阿·阿·越飞(1883—1927年)——苏联外交家。1918年为布列斯特和谈苏俄代表团首席代表,后历任驻柏林、中国、奥地利的全权代表。——译注

力气才得以把越飞送出国去。出国的时间太短，虽然有些疗效，但很不够。越飞在租让总委员会里充任我的副手。一切日常工作都落在他身上。他对党内危机感到极为痛苦。而背信弃义尤其使他感到震惊。有好几次他曾挣扎着想真正投入斗争。我曾多次劝阻他，因为我为他的健康担心。越飞对于攻击“不断革命论”的运动尤为恼火。他不能容忍坐享革命成果的人去恶意中伤那些很早就预见革命进程和性质的人。越飞曾转告我，他就不断革命的问题同列宁谈过话，这次谈话大概在1919年。列宁对他说：“是的，托洛茨基是对的。”越飞想把这次谈话公布于众，但我竭力劝阻他。我事先想象得出，他一定会遭到大量的恶意攻击。越飞特别顽强，尽管他外表温和，但深藏在内心的是百折不挠的意志。每当出现挑衅性的无礼行为和政治上的背信弃义，他总是带着消瘦的面容，愤愤不平地到我这儿来，一遍又一遍地说：不，应当公布。我再次向他证明，这样的“证词”什么也改变不了，必须重新教育党的年轻一代，眼光要放远点。

越飞在国外未能把病治好，病情日益恶化。到了秋天，他被迫停止工作，后来就完全病倒在床上。朋友们再次提出把他送往国外治疗的问题。但这一回被中央委员会断然拒绝了。现在斯大林分子打算把反对派分子送到另一个地方去。我被开除出中央委员会，然后又被开除出党，这件事给越飞的震动比任何人都大。除了政治上的和个人的愤慨，他现在又十分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已病入膏肓。越飞正确地感觉到，问题涉及到革命的命运。他不能继续战斗了。对他来说，离开了斗争生命就毫无意义。于是他就为自己作出了最后的结论。

那时我已从克里姆林宫搬到我的朋友别洛博罗多夫家里，当时他还被算作内务人民委员，虽然格伯乌的人已在跟踪他。那时别洛博多夫到自己的故乡乌拉尔去了，在那儿在与机关的斗争中他想找到一条通往工人的道路。我打电话到越飞家里，询问他的健康状况。他亲自接电话，电话机就在他床边。在他说话的语气里，有一种异常的、紧张的和令人不安的味道。我到后来才意识到这一点。他要我去一趟。但是一件什么事使我耽搁了，没有立即应他的要求前去。

那是斗争异常激烈的日子，同志们接连不断地到别洛博罗夫家来跟我商量急事。一小时或者两小时以后，一个陌生的声音在电话里告诉我：“阿道夫·阿布拉莫维奇开枪自杀了。在他的小桌上放着一封给您的信。”在别洛博罗多夫住宅里总是有几个带枪的反对派成员在值班。我在市内走动时，他们负责陪同。我匆匆忙忙赶到越飞家里。我们按了门铃，又敲了门，有人在门后面询问我们的姓名，然后才慢慢地把门打开；在门后仿佛发生了一件什么事。只见在一只沾满血迹的枕头上露出了阿道夫·阿布拉莫维奇那安详、极其温厚的脸庞。在他的书桌旁坐着国家政治保卫局的一个姓B的人。小桌上原来放着的一封信也不见了。我要求立即把信还给我。B嘟哝着说，没有任何信件。他的样子和语气清楚表明他是在撒谎。几分钟后，朋友们从全市各个角落里陆续来到这里。外交人民委员部和党务机关的官方代表在一群反对派分子中感到很孤单。当夜有好几千人前来越飞住处。信件失窃的消息传遍全市。外国新闻记者在自己的电讯中也发了这条消息。再要隐瞒信件看来是不可能了。最后，把信的影印件交给了拉柯夫斯基。至于他们为什么把越飞写给我的信，而且信封上又写有我的姓名的信交给拉柯夫斯基，而且为什么不给原件，而只给影印件，我就不妄加解释了。越飞的信是我的已故朋友一生的写照，不过是到临死前半小时为止的一生的写照。越飞了解我对他的态度，一种深切的道德上的信任感把我们联结在一起，这就使我有权利删去信中不必要的或不宜发表的内容。恬不知耻的敌人未能向全世界隐瞒这封信，于是徒劳地企图利用那些恰恰是不供发表的词句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越飞力图以自己的死来为他一生为之奋斗的事业服务。他用那只半小时后朝自己太阳穴开枪的手写下了一个证人的最后证词和一个朋友的最后忠告。下面就是越飞在给我个人的告别信中对我所说的话：

“我敢冒昧地说，几十年的工作和私交把我和您，亲爱的列夫·达维多维奇联结在一起。这使我有权利在诀别时对您说说，我感觉到您的身上的错误。我从未怀疑过您所指出的道路的正确性，您知道，

从‘不断革命’论提出之时起，我和您一起走了二十余年的历程。但我总是认为，您缺乏列宁那种不屈不挠，决不让步的精神，他宁愿在他认为正确的道路上孤军奋战，他预见到将来会拥有多数，将来大家会认识到这条道路是正确的。1905年以来您在政治上总是正确的，我不止一次地对您说过，我曾亲耳听到列宁承认，在1905年，正确的也不是他，而是您。人在临死前是不会撒谎的，因而现在我对您再重复一遍……但是您往往为了您给予过高评价的协议、妥协而放弃自己的正确主张。这是错误的。我再说一遍，您在政治上总是正确的，而且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正确。总有一天党会认识到这一点的，而历史一定会作出评价。所以现在您不必担心，如果有什么人离开您，尤其是，如果加入您的队伍的人不像我们大家所预期的那么多，那么快的话。您是正确的，但是使您的正确主张取得胜利的保证在于决不让步，勇往直前，坚决拒绝一切妥协，这正是列宁取胜的秘诀，望您也照此行事。这一点我曾不止一次地想对您说，可是直到现在我才下决心作为临别赠言说出来。”

越飞的葬礼被安排在一个工作日，在工作时间内举行，为的是不让莫斯科工人参加。但是还是有一万多人参加，成了反对派的庄严的示威游行。

那时斯大林一派正在筹备党的代表大会，迫不及待地要使代表大会面对分裂的既成事实。准备派代表出席代表大会的各地代表会议，在正式宣布展开虚假的“争论”之前就进行了所谓的选举。而在争论的时候，一批批按军队方式组织起来的哨子帮以上足的法西斯方式捣乱会场，很难想象还有什么比筹备第十五次代表大会更不光彩的事了。季诺维也夫及其集团不难猜出，这次党的代表大会只是要使十月革命10周年纪念日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街头开始出现的肉体消灭涂上一层政治色彩而已。现在季诺维也夫及其朋友唯一关心的问题是及时投降。他们不会不懂得，斯大林一伙官僚心目中的真正敌人不是他们这些二流的反对派分子，而是同我相联的反对派的基本核心。他们希望在第十五次代表大会期间以大吹大擂跟我决

裂的办法来赢得对方的赏识，至少取得对方的宽恕。他们没有料到，再次背叛会在政治上毁灭自身。如果说他们的背后袭击暂时削弱了我们的集团，那么他们则在政治上给自己判处了死刑。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决定把反对派全部开除出党。被开除的人则被交给国家政治保卫局处置。

## 第四十三章

# 流 放

关于流放中亚细亚的情况我将完全引用我妻子的记述。

“1928年1月16日，从早晨起一直在收拾行装。我发烧了，由于发烧和虚弱，头晕目眩，刚从克里姆林宫运来的东西和我们准备带走的东 西，现在乱成一团。家具、箱子、衣服、书籍和络绎不绝前来道别的朋友全都挤在一起。我的医生和朋友费·亚·格季耶看我感冒了，天真地劝我们推迟行期。他想象不出来，此行意味着什么，也不知道现在推迟行期意味着什么。我们都希望上火车后我会好得快些，因为在家里，尤其在动身前的‘最后日子’里，我不可能很快康复。眼前掠过又一个又一个陌生面孔，有好多人我还是第一次见到。拥抱，握手，表示同情和祝福……人们送来鲜花、书籍、糖果、暖和的衣服等等，造成更大的混乱。最后一天的忙碌、紧张和兴奋已接近尾声。行李物品已被送往火车站。朋友们也去那儿了。我们全家坐在餐厅里等候格伯乌的代表，准备出发。我们看着钟，9点……9点半……谁也没来。10点钟，已是火车开车的时间了。出什么事啦？改时间了？电话铃响了。格伯乌通知我们，行期推迟，但没有说明原因。列·达·问：‘推迟很久吗？’‘两天，后天动身。’对方答道。半小时后，报信者从火车站跑回来，先是一位青年，接着是拉柯夫斯基等人。火车站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他们在等待高呼‘托洛茨基万岁’。但是没有见到托洛茨基的人影。他在哪儿呢？给我们乘坐的那节车厢被人群团团围住。青年朋友在车厢顶上竖起列·达·的巨幅画像。人们朝着它欢呼‘乌拉’。火车启动了，动了一下，两下……”

向前开了,但突然又停下来了。示威者跑到火车头前,抓住车厢,迫使火车停了下来,他们要见托洛茨基。人群中传说,似乎格伯乌的密探已悄悄地把列·达·带人车厢,不让他向送行者露面,车站上的激动场面难以形容。人们同警察和格伯乌的密探发生了冲突,双方都吃了亏。逮捕了一些人。火车被阻留了约一个半小时。过了一会儿,我们的行李从火车站运了回来。朋友们接连不断地打电话来询问我们是否在家,并把火车站上发生的情况告诉我们。直到深夜我们才睡觉。经过前几天的激动之后,我们睡到第二天11点钟才起床。没有人来电话,一切都很平静。我们的大儿媳妇去上班了,反正我们离启程还有两天时间。但是我们刚刚吃完早餐,门铃响了,P. B. 别洛博罗多娃……接着 M. M. 越飞<sup>①</sup>来了。铃又响了,这下子整个住所都被穿便衣和穿制服的格伯乌的人挤满了。他们向列·达·出示逮捕并立即押送阿拉木图的命令。而格伯乌昨天还说有两天时间呢?又是一个骗局!他们使用军事诈术,是为了避免出发时举行新的示威游行。电话铃声不断。但是电话机旁站着一个人,相当和气地不让接电话。只是由于一个偶然机会,才得以把我们中计并将被强行带走的消息告诉了别洛博罗多夫。后来我们才得知,这次遣送列·达·是由布哈林负责政治领导的,这是完全按照斯大林鬼蜮伎俩行事的……格伯乌的人显得焦急不安。列·达·拒绝自愿离开。他是找借口来彻底揭露事情的真相。事情是这样的,格伯乌力图把流放,至少是把最著名的反对派分子的流放说成是他们自愿同意的。他们就照这个精神向工人介绍流放一事。应当戳穿这个神话,说明事实真相,并且要采用既不能隐瞒,又不能歪曲的形式。因此列·达·决定迫使对方公开使用暴力。我们同两位客人一起把自己锁在一个房间里。通过锁着的门,我们同格伯乌的代表谈判。他们不知道该怎么办,犹豫了一阵以后,就用电话同上司通话,他们得到指示后,声称要砸门,因为必须执行命令。列·达·则在此时口授了反对派今后的行动指示。我们没有把门打开。传来了

<sup>①</sup> M. M. 越飞是阿·阿·越飞的妻子。——译注



锤子声，门上的玻璃被打得粉碎，只见一只穿军服的手臂伸了进来。‘朝我开枪吧，托洛茨基同志，打死我吧！’基什金忙乱而又激动地重复说，他以前是个军官，曾多次陪伴列·达·巡视前线。列·达·平静地回答道：‘别胡说，基什金，谁也不打算打死您，执行您的任务吧。’门被打开了，一群惊慌不安的人冲了进来。格伯乌人员见列·达·穿着便鞋，就找来了皮鞋，给他穿上。又找到了毛皮大衣、帽子……给他穿戴好。列·达·拒绝跟他们走。他们就把他架起来走。我们急忙跟在后面。我披上毛皮大衣，穿上高筒套靴……我身后的门立即砰地一声关上了。门里传出了一阵骚乱声。我朝押送列·达·下楼的人大声喊话，要他们把孩子们放出来，大儿子要跟我们一起去流放地。门打开了，孩子们跳了出来，后面还有我们的两位客人，别洛博罗多娃和越飞夫人。他们是使劲冲出来的。谢廖沙使用了运动员的动作。辽瓦在下楼梯时，按了所有的门铃，并大声喊着：‘把托洛茨基同志带走了。’只见各家门口和楼梯上露出一张张吃惊的面孔。住在这幢大楼里的都是有名的苏维埃工作人员。汽车挤得满满的。谢廖沙被挤得几乎无立足之地。别洛博罗多娃也和我们一起上了车。汽车沿着莫斯科街道行驶。天寒地冻。可谢廖沙连帽子也没有戴，匆忙中忘记拿帽子了，大家都没有穿胶皮套鞋，没有戴手套，没有带一只箱子，甚至连一只手提包也没有带，大家全是轻装。没有把我们带到喀山车站，而是开往另一个方向，好像是雅罗斯拉夫尔车站。谢廖沙试图跳下车去，想到他嫂子的工作单位去，告诉她我们被带走的消息。格伯乌人员紧紧抓住谢廖沙的双手，要列·达·劝他不要跳下汽车。我们到了空荡荡的车站。格伯乌人员还像离家时那样架着列·达·。辽瓦向铁路工人们大声喊道：‘同志们，看看他们是怎样把托洛茨基同志带走的。’有一个曾经陪同列·达·打猎的格伯乌人员揪住他的领子，蛮横地喊道：‘瞧，你这个小矮个。’谢廖沙是个训练有素的运动员，当即打了他一个嘴巴。我们进了车厢。押解人员守卫在我们包房的门窗旁。其余的包房也被格伯乌人员占满了。开往哪儿？我们不知道。行李没有给我们送来。火车头拉着我们乘坐的唯一的一节车厢启动了。已是下午两点钟。原来我们是

在绕道前往一个偏僻的小站，在那儿我们的车厢要挂在一列从莫斯科喀山站开出的邮政车上，然后开往塔什干。5点钟，我们同谢廖沙和别洛博罗多娃告别，他们要乘逆行车返回莫斯科。我们则继续自己的行程。我发烧了。列·达·精神饱满，几乎可以说是情绪愉快。一切已成定局。总的气氛是平静。押解人员变得很殷勤，很有礼貌。我们获悉，我们的行李将由下一次列车运来，那次列车将在伏龙芝（我们火车行程的终点）赶上我们，就是说，在我们旅程的第九天赶上我们。一路上我们没有衣服替换，也没有书可读。而谢尔穆克斯和波兹南斯基那么细心爱护地把书整理好，精心地把书分门别类，一些在路上看，一些供最初几天研究之用，谢尔穆克斯那么认真地为列·达·整理好所用的文具，他对列·达·的爱好和习惯了如指掌。在革命的年代他曾以速记员和秘书的身份多次跟随列·达·到处奔波。列·达·在旅途中总是趁没有电话和来访者之机以三倍的精力工作，这一工作的主要重担首先落在格拉兹曼身上，然后落在谢尔穆克斯身上。而这一次我们在长途旅行中竟没有一本书、一枝笔和一张纸。在我们动身以前，谢廖沙为我们弄到了一本由谢苗诺夫—天山斯基<sup>①</sup>写的关于土耳其斯坦边区的学术著作，我们打算在旅途中熟悉一下我们未来居住地的情况，因为我们对它只是略知一二。可是谢苗诺夫—天山斯基这本书也放在箱子里同其他东西一起留在莫斯科了。我们坐在车厢里，不带行李，仿佛我们是从城市的一端到另一端去。晚上，我们头枕扶手，躺在板凳上。警卫在略微打开的门旁值班。

我们以后的命运将会如何？我们的旅行会是什么性质的？而流放地是什么样的呢？在那里我们的情况又会如何？开端并没有什么好征兆。但是我们觉得自己很镇静。车厢微微摆动。我们躺在长凳上。略微敞开的门使我们想起监狱。近几天发生的种种意外，情况不明，以及紧张不安，使我们疲惫不堪，现在我们可以休息了。车厢

<sup>①</sup> 谢苗诺夫—天山斯基(1827—1914年)——俄国地理学家，曾多次发起前往中亚细亚的考察。——译注

很安静。看守也一声不吭。我有点不舒服，列·达·竭力设法改善我的状况，但他手头一无所有，只能用饱满的精神和亲切的态度来感染我。我们不再注意周围环境，尽情地享受这种宁静。辽瓦在隔壁包房。他在莫斯科时就已全力以赴地投入了反对派的工作。现在，他为了缓和我们的困难处境，陪我们一道流放，甚至来不及和自己的妻子告别。从这时起他成为我们同外界联系的唯一媒介。车厢里几乎是暗的，硬脂蜡烛在门顶上方发出昏暗的光。我们向东驶去。

离莫斯科越远，押送人员就越殷勤。在萨马拉，他们给我们买了替换的内衣、肥皂、牙粉、牙刷等东西。在那里吃了午饭，是在车站餐厅为我们和警卫预订好的。列·达·过去总是不得不严格遵守饮食制度，而现在却高高兴兴地端来什么就吃什么，并且鼓励我和辽瓦。我带着惊奇和恐惧的目光注视着他。在萨马拉为我们购买的那些东西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都给取了特别的名字：明仁斯基毛巾、亚戈达<sup>①</sup>短袜（他是明仁斯基的副手），等等。给这些东西取上这样的名字很能逗人发笑。由于火车遇到了雪堆，大大放慢了行驶速度。但是我们还是一天天地往亚洲深入。

在离开莫斯科前，列·达·要求准许他随身带两个老同事，但遭到了拒绝。于是谢尔穆克斯和波兹南斯基决定自己做主跟我们同车前往。他们在另一节车厢里弄到了座位，目睹了示威游行，但是没有离开自己的座位，估计我们也乘同一次列车。过了一会儿，他们发现我们没有上车，便在阿雷斯下车，等我们乘坐的下一次列车。我们就在这里赶上了他们。只有辽瓦见到他俩，因为他有点行动自由，我们大家都喜出望外。下面便是我儿子当时记述的情景：‘早晨我到车站去，也许能找到我们一路上常常谈起的那些同志，我们为他们的命运感到担忧。来得正好，他们两人坐在车站小卖部的桌子旁下棋呢。我的喜悦心情真是难以形容。我示意不要向我走来，因为我在小卖

<sup>①</sup> 亨·格·亚戈达(1891—1938年)：1920年起在全俄肃反委员会、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和内务人民委员部担任领导工作。1938年3月被处死。· 译注

部露面以后，像往常一样，格伯乌人员的活动就开始加强。我急忙回车厢里去报告我的发现。大家都欣喜若狂。当时他们违背了指示，并且在众目睽睽之下在等待我们，不继续前行，这是不必要的冒险，但是对此连列·达·也不好生他们的气。我同列·达·商量后，给他们写了张条子，准备在天黑以后交给他们。指示内容是：波兹南斯基和我们分道而行，立即到塔什干去，在那里等待信号。谢尔穆克斯不要同我们接触，直接到阿拉木图去。我附带通知谢尔穆克斯，要他在车站后面一个没有路灯的僻静地方跟我会面。波兹南斯基到了指定地点，一下子没有找到对方，我们都很不安，见面后都抢着说话，常常打断对方的话。我说：“砸开了门，架着胳膊拖走了。”他不明白，谁砸了门，为什么要把人拖走。没有时间解释了，我们有可能被发现。总之，会面没有什么收获……”

我儿子在阿雷斯发现了这个情况后，在往后的途中，我们就觉得在同一列车上有一位可靠的朋友。这是令人欣慰的。第十天，我们拿到了行李，便赶忙取出谢苗诺夫一天山斯基的那本书。我们饶有兴趣地阅读了关于自然、居民、苹果园等章节；而最主要的是那里可以进行奇妙的狩猎活动。列·达·高兴地打开了谢尔穆克斯为他收拾的文具。清晨我们抵达伏龙芝（皮什佩克）。这是火车的终点站。天气很冷。照射在皑皑白雪上的阳光使我们睁不开眼睛。给我们送来了毡靴和羊皮袄。衣服的重量压得我几乎喘不过气来，可是路上还是很冷。公共汽车在已被车辆压结实的雪地里缓慢地向前行驶，寒风刺脸。行驶了30公里后，停了下来。天色已暗。我们好像站在一片茫茫白雪覆盖着的沙漠中间。押送队大约有12到15人，其中两人走到我们跟前为难地说，过夜的地方“不太好”。我们好不容易下了车，在黑暗中摸到了邮局的门坎和低矮的门，到了里面，我们把皮袄一脱，总算松了一口气。但是这小屋极冷，没有生火。小小的窗上尽是冰花。墙角边有一个俄国式的大炉子，可惜冷若冰霜。我们喝点茶，吃点东西暖暖身子。我们同邮局的一个女主人（哥萨克人）交谈起来。列·达·向她详细地询问了日常生活情况，顺便也问了打猎的事。一切都使我们感到新奇，而最主要的是不知道该如何结

束这次谈话。我们准备就寝。押送人员也在附近安顿了下来。辽瓦睡在长凳上。我同列·达·睡在铺着羊皮袄的桌子上。我们在这又黑又冷，天花板很低的房间里全部躺下以后，我哈哈大笑起来，说：‘跟克里姆林宫的住所全然不同！’列·达·和辽瓦也跟着笑了起来。黎明时，我们又踏上了旅途。前面是一段最艰难的过程。越过库尔德伊山脉，寒气逼人，身上的衣服重得难以忍受，就像有堵墙压在你身上似的。到了下一站，我们在喝茶时同司机和格伯乌人员聊了一会儿，他们是从阿拉木图来接我们的。我们陌生的生活一点一点地渐渐展现在我们面前……道路对汽车来说是很艰难的，车辙常被积雪堵塞。司机灵活地驾着车子，他对路面特点很了解，他不时用伏特加酒暖暖身子。到夜里天气变得越来越冷。司机意识到在这一片冰雪的荒原上，一切都得靠他，于是便倾吐心中的积怨，对于上级和制度放肆地批评起来……坐在他旁边的那个从阿拉木图派来的长官甚至奉承起他来：‘只要送到就好。深夜两点多钟，汽车在一片漆黑中停下。我们到了。到了什么地方呢？原来我们到了果戈理街‘杰蒂萨’旅馆，房间里陈设的家具确实是果戈理时代的。我们分别住在两个小房间里。隔壁房间住着押送人员和当地的格伯乌人员。辽瓦检查了行李，发现两只装有内衣和书籍的箱子不见了，准是丢在雪地里了。唉，我们又失去了谢苗诺夫一天山斯基的著作，同时丢失的有列·达·的有关中国和印度的地图和书籍以及文具。15双眼睛竟然没有看住箱子……’

辽瓦一早就出去侦察了。他熟悉了一下城市，首先是邮局和电报局，它们在我们生活中占着中心位置。他还找到了一家药房。他不知疲倦地寻找我们的一切必需品：笔尖、铅笔、面包、黄油和蜡烛……最初几天我和列·达·都没有走出房间，后来我们在傍晚出去散散步。我们通过儿子同外界取得联系。

午饭是从最近的一家食堂里送来的。辽瓦整天不在家。我们焦急地等待着他回来。他经常带回来报纸和某些有关城市生活和风俗习惯的有趣消息。我们急切地想知道谢尔穆克斯是否已到达阿拉木图。突然在一天早晨，这是我们到旅馆的第四天，我们听到走廊里传

来一个熟悉的声音。这声音对我们来说是多么的亲切！我们隔着门听谢尔穆克斯说话，他的语调和脚步声。他的到来给我们带来了新的希望。谢尔穆克斯的房间正好在我们对面。我走到走廊，他便从远处向我致意……我们暂且还不敢同他交谈，但我们为他的到来而暗自高兴。第二天，悄悄地让他进入我们的房间，匆匆地交谈所发生的一切，并且商定今后的共同工作。但是，今后竟是如此短暂，当夜10点钟就告终。旅馆静悄悄。我和列·达·坐在房间里，因铁炉烧得太热，我们便把房门朝寒冷的走廊半开着。辽瓦坐在自己的房间里。我们听见走廊里传来一阵蹑手蹑脚走动的毡靴声，我们三人立即警觉起来（后来我们知道，辽瓦也在听着，并且已经猜到发生了什么事）。“来了”我们闪过一个念头。我们听到，有人没敲门就进了谢尔穆克斯的房间，并且对他说“快一点！”谢尔穆克斯回答说：“毡靴总可以穿上吧？”显然他还穿着便鞋呢。又是一阵轻得几乎听不见的脚步声，接着被打破的寂静又恢复了。接着旅馆的看门人把已被带走的谢尔穆克斯的房门锁上。从此我们再没有见到过他。有几个星期他同其他刑事犯一起关在阿拉木图格伯乌的地下室里，半饥不饱地过活，然后被解到莫斯科，一昼夜只给25戈比的食物。这些钱连买面包都不够。后来听说，波兹南斯基也于同时在塔什干被捕，也押解到了莫斯科。3个月以后，我们收到了他们的来信，是从流放地寄来的。幸而在押解到东部时，他们凑巧被安排在同一节车厢，而且座位也正好面对面。他们小别以后重逢，重逢以后又分离，被流放到不同的地方。

就这样列·达·失去了自己的助手。这些助手由于忠诚地为革命服务，与列·达·齐心合作而遭到对手们毫不留情的报复。那和蔼谦逊的格拉兹曼早在1924年就被迫自杀。谢尔穆克斯和波兹南斯基被流放。布托夫，那温和、热爱劳动的布托夫，被捕后要他作伪证，这迫使他进行无限期的绝食，最后死在监狱医院里。这样，“秘书处”终于被摧毁，列·达·的敌人对它怀着一种莫名其妙的仇恨，把它看作万恶之源。敌人认为，列·达·现在在遥远的阿拉木图已被彻底解除武装。伏罗希洛夫曾公开夸口说过：“即使他在那里死了，

我们也不会很快就知道的。”然而列·达·并没有被解除武装。我们组织了一个三人合作社。我们同外界联系的工作主要落在儿子身上。他负责我们的通信联系。列·达·有时称他为外交部长，有时称他为邮电部长。我们的信件很快就大量增加，主要的负担落在辽瓦身上。他还负责警卫工作。也是他，为列·达·挑选出写作所需的材料：到图书馆书架上找书，借旧报纸，作文摘。他同地方当局进行谈判，组织打猎活动，看管猎狗和枪支。除此之外，他还勤奋地自学经济、地理和外语……

抵达阿拉木图几周之后，列·达·已全力进行其学术和政治活动。后来辽瓦找到了一个女打字员。格伯乌没有找她麻烦，但显然责成她上交她在我们这里打印的一切材料。如能听听这位姑娘的小报告，那是很有趣的，她对反托洛茨基主义的斗争实在不在行。

阿拉木图的雪洁白、纯净、干燥，由于很少有人走和车压，整个冬天雪总是那么新鲜。春天白雪换成罌粟花，那么多的罌粟花，草原简直铺上了绵延几公里长的大地毯，红红的一大片。夏季长满了苹果，有名的阿拉木图的阿沱特苹果，又大，又红。市内没有自来水，没有电灯，也没有平整的马路。在市中心的市场上，在土堆上，在商店的台阶上，吉尔吉斯人一边晒太阳，一边在捉身上的虱子。这儿疟疾蔓延，还有过鼠疫。夏季有大量的疯狗。报上曾报导过，这个地区有过多起麻风病病例……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平安地度过了夏季。在山麓，我们向果农租了一幢木屋，那里可以看到终年积雪的高山——天山的支脉。我们同主人家一起，看着水果成熟，还积极帮助他们收摘。果园几经变化。先是覆盖着一片白花，然后垂下累累果实，沉甸甸地把果枝往下压，得用支架撑住。果实摘下后放在树下的草席上，真像铺上了五彩缤纷的地毯，如释重负的树枝又挺直起腰杆。果园里散发着成熟的苹果和梨的香味，蜜蜂和黄蜂在嗡嗡飞舞。我们则在点果酱。

6、7月间，在苹果园里，在一间草篷顶的小屋里，人们紧张地工作者，一架打字机嘀嘀嗒嗒地响个不停，打字机在这些地方还是

件稀罕的东西。列·达·口授批评共产国际纲领的文章,然后修改,再重新打印。信件很多,每天可以收到10至15封信,有各种各样的提纲、批评、内部的争论、莫斯科的消息,以及大量关于政治问题和询问列·达健康状况的电报。重大的世界问题同局部的、琐碎的问题交织在一起,后者在这里也成了大问题。索斯诺夫斯基<sup>①</sup>总是用他那充满激情而辛辣的笔调谈论目前大众关心的问题。我们把拉柯夫斯基<sup>②</sup>精彩的信件用打字机打下来,然后再分送给其他人。低矮的小房间摆满了桌子,桌上堆着各种手稿、文件夹、报纸、书籍、文摘和剪报。辽瓦整天呆在马厩隔壁的小房间里打字、校对打字稿、封邮件、收发邮件,找出必要的引文。邮件是一个残废军人骑马从城里送来的。傍晚,列·达·常常带着猎枪和狗上山,有时由我作伴,有时由辽瓦作伴。我们常常打到鹌鹑、鸽子、石鸡或野鸡。在疟疾发作以前,一切进行得很顺利。

就这样我们在阿拉木图度过了一年,同信件、书籍和大自然打交道。这是个经常发生地震和水灾的城市,位于天山脚下,靠近中国边境,离铁路250公里,距莫斯科4000公里。

虽然我们每走一步都会遇到一些隐藏的朋友(现在来谈此事还为时过早),但从表面看来,我们同周围的居民是完全隔离的,因为每一个想跟我们接触的人都会受到惩罚,有时甚至是极严厉的惩罚……”

※ ※ ※

我再从当时的来往书信中摘引一些段落作为对妻子上述内容的补充。2月28日,我到达后不久,曾给几位流放的朋友写

---

① 列·谢·索斯诺夫斯基(1886-1937年)——1918至1924年任《贫农报》编辑,1927年在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作为托洛茨基反对派骨干分子被开除出党。1935年恢复党籍,1936年再度被开除。——译注

② 克·格·拉柯夫斯基(1873-1941年)——早年参加保加利亚、罗马尼亚、瑞士和法国的工人运动,1917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十月革命后任乌克兰人民委员会主席、党中央委员等职。1927年在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作为托洛茨基反对派骨干分子被开除出党,1935年恢复党籍,1938年再次被开除。——译注



道：“鉴于哈萨克政府即将迁到这里，这儿所有的住宅都要进行登记。只是由于我向莫斯科最高当局发了几个电报，我们在旅馆里住了3个星期后得到了一幢房子。我们不得不买些家具，修复那只破炉子，总的来说，要进行建设，虽然这不在计划之内。这项工作交给娜塔莉亚·伊凡诺夫娜和辽瓦去干。修建至今尚未完成，炉子还是烧不热……”

“我花了很多时间去研究亚洲：地理、经济、历史等等。外文报纸奇缺。我已写信到一些地方，要求寄些报纸来，即使不是最新的也行。邮件来得很晚，看来也不定期……”

“印度共产党的作用极不清楚。报上刊登了关于‘工农党’在各省行动的电讯。这个名称本身就引起理所当然的忧虑。要知道国民党曾一度自称是工农党。但愿历史不要重演。”

“英美之间的对抗终于表面化了。现在连斯大林和布哈林似乎都开始理解问题症结之所在了。然而我们的报纸却常常把问题简单化，似乎英美之间的对抗在不断加剧，必将直接导致战争。毋庸置疑，在这个进程中还会有几个转折点。战争对于双方来说都太可怕了。它们还将继续努力，争取达成协议与和解。但总的看来，事态是在大踏步地朝着流血方向发展。”

“我在路途中第一次读完了马克思写的抨击性小册子《福格特先生》。为驳斥卡尔·福格特<sup>①</sup>的大量诽谤，马克思写了一本长达200页的书，而且铅字排得很密，他收集了文献、见证人的证词，并对直接和间接的罪证进行了分析……假如我们也用同样的办法去驳斥斯大林分子的诽谤，那会怎样呢？那我们大概得出版一部千卷本的百科全书了……”

4月间，我和“参与者”一道分享了狩猎中的甘苦：“我同儿子跑到伊犁河河畔，打算充分利用春季狩猎期。这一次我们随身带了帐篷、羊毛毡、皮大衣等东西，为的是不在毡帐里过夜。可是又下起雪

<sup>①</sup> 卡·福格特(1817—1895年)——德国自然科学家，庸俗唯物主义代表人物，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译注

来，寒气刺骨。这些日子可以说是重大考验的日子。晚上气温降到零下 8 至 10 度。但是我已有 9 天没有进入木房子了。亏得我们穿了暖和的内衣和好多御寒的外衣，我们几乎没有受冻。可是我们的靴子到了夜里就结冰，我们不得不把靴子放在篝火上使冰融化，否则脚也伸不进去。最初我们在沼泽地里打猎，后来转到无冰的湖上。我在小丘上搭起一个掩蔽篷，我在里面候上 12 至 14 小时。辽瓦则干脆站在树下的芦丛里。

“由于气候恶劣和野鸟移栖不定，此行狩猎很不成功。我们带回四十多只野鸭和一对大雁。但是游览给了很大的乐趣，特别是使我暂时回到了野蛮时期：在野外睡，在野外吃，在吊桶里煮熟的羊肉，不洗脸，不脱衣，当然也就用不着穿衣，下了马跳进河去（只有一次，那是在中午，阳光温暖，诱使我不得不脱衣下水），在芦苇塘中的一块小高地上，我差不多度过了一天一夜——这一切是不会经常遇到的。我回家时没有一点儿感冒的迹象。可是到家后第二天，我就感冒了，躺了一个星期……”

“现在我们开始收到从莫斯科、阿斯特拉罕拉柯夫斯基寄来的外国报纸。今天我收到他的一封来信。他正在为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研究一个关于圣西门主义的课题。此外，他还在撰写回忆录。凡对拉柯夫斯基的身世略有所知的人都不难想象，他的回忆录会多么有意思。”

5 月 24 日，我给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写了一封信，当时他的观点已有所动摇，信中我这样写道：“收到您的提纲后，我还没有给任何人写信谈论过这个提纲。第二天，我接到来自卡尔帕绍沃的电报，电文如下：‘我们坚决拒绝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建议和估计，请立即答复。斯米尔加、阿尔斯基、涅恰耶夫。’昨天我收到来自乌斯特——库洛姆的电报：‘我们认为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建议是错误的。别洛博罗多夫、瓦连廷诺夫。’昨天我收到拉柯夫斯基的一封来信，信中没有赞扬您，而对斯大林的‘左的方针’表示了英国式的‘等着瞧’的态度。昨天我还收到别洛博罗多夫和瓦连廷诺夫的来信。他俩对拉狄克寄往莫斯科的情绪不正常信件深感不安。他们大发脾气。如果他们

对拉狄克那封信的内容的转述是准确的，那么我问他们完全一致。我并不建议你们对印象主义者抱宽容态度。

“从打猎回来以后，即自3月底以来，我还没有出过家门，从早晨7至8点到晚上10点钟，一直在看书或写东西。我准备休息几天，现在没什么野味可打，因此我将同娜塔莉亚·伊凡诺夫娜和谢廖沙（他现在此地）到伊犁河畔去钓鱼。这方面的情况我将及时奉告。

“您是否理解法国的大选？我暂时还不理解。《真理报》甚至没有提供参加大选的总人数，无法与上届选举相比，因此我们也不知道共产党人的比例提高了，还是降低了。不过我打算根据外国报纸对这个问题作一番研究，到时候再写信给您。”

5月26日，我给格鲁吉亚的一位老布尔什维克米哈伊尔·奥库扎瓦写了一封信：“斯大林的新方针确定了任务，这无疑是一种想要接近我们提法的尝试。然而在政治上，不仅有解决什么问题，而且还有如何解决，由谁来解决的问题。决定革命命运的主要战斗还在前面呢……”

“我们一向认为，也曾不止一次地说过，不能把执政派在政治上的堕落过程描绘成一条不断下降的曲线。这种堕落不是发生在真空中，而是在阶级社会里，是伴随着深刻的内部摩擦的。党的基本群众根本不是铁板一块，他们在很大程度上不过是一些政治原料而已。在来自右边，也来自左边的阶级撞击的压力之下，他们中间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分化过程。党内最近时期发生的，我们现在正在承受其后果的尖锐事件，只不过是事态进一步发展的前奏曲罢了。正如歌剧的前奏曲奏出了整个歌剧的音乐主题，并扼要点明这个主题一样，我们的政治‘前奏曲’也是先奏出以后将充分展开的曲调，即在严肃的阶级音乐的铜号、低音提琴、鼓以及其他乐器伴奏下展开的曲调。事态的发展已经不容争辩地证实，我们过去和现在都是正确的，不仅应该反对不坚定分子和反复无常分子，即季诺维也夫们、加米涅夫们，皮达可夫们等，而且也要反对亲爱的来自‘左边’朋友，极左的糊涂虫，因为他们想把前奏曲当作歌剧本身，即认为党和国家的全部基本

过程已经完成，认为他们头一次从我们这儿听说的热月已成为既成事实……不要急躁，不要无缘无故地打搅自己和别人，要学习，要等待，要警惕地看着，不让我们的政治路线受到个人愤慨的铁锈侵蚀——这就是我们的行为准则。”

6月9日，我的女儿、我的热烈的志同道合者尼娜在莫斯科去世了。她才26岁。她丈夫在我流放前不久被捕。但她还是继续从事反对派的工作，一直到她病倒。她得了百日痢，这种病在几周时间里就夺走了她的生命。她在医院里写给我的信在路上走了73天，我收到时她已去世。

拉柯夫斯基于6月16日给我发来了电报：“昨天我收到你的关于尼娜病重的来信。我即电告在莫斯科的亚历山德拉·格奥尔吉耶夫娜（拉柯夫斯基的妻子）。今天从报上获悉，尼娜已经结束了自己短暂的生命，走完了革命的旅程。亲爱的朋友，我对你深表同情，难以克服的距离把我们隔开，深感痛苦。一次又一次紧紧地拥抱你。克里斯蒂安。”

两周后，收到拉柯夫斯基的来信：

“亲爱的朋友，我为小尼娜，为你，为你们大家深感悲痛。你早已背上了一个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沉重十字架，现在又第一次饱尝了一个父亲的无限的悲伤。竭诚地和你在一起，我感到痛苦的是，离你那么遥远……”

“谢廖沙可能已经告诉你，他们在莫斯科如此无理地对待你后，又对你的朋友们采取了荒谬绝伦的措施。我是在你离家后半小时到你家的。客厅里有一批同志，多半是妇女，穆拉洛夫也在其中。‘这里谁是公民拉柯夫斯基？’我听到一个声音问道。

‘我就是，您有什么事？’

‘跟我来！’

我被领着穿过走廊，进入一个小房间。在房门口命令我‘举起手来’。搜了我的口袋后，便把我逮捕了。5点钟我被放了出来。穆拉洛夫随后也受到同样的遭遇，一直被拘留到深夜……我喃喃自语：‘他们失去了理智’，我并不感到气愤，倒是为自己的同志们感到

害臊。”

7月14日，我给拉柯夫斯基写信说：

“亲爱的克里斯蒂安·格奥尔吉耶维奇，我已有很久没有给你和其他朋友写信了，而只限于寄些材料。在伊犁河我第一次获悉尼娜病重的消息，从伊犁河回来后，我们立即去别墅。几天后就传来了她去世的噩耗。这意味着什么，你是理解的……但是，需要争取时间为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准备一些文件。这是困难的。但从另一方面来说，由于这项工作无论如何必须完成，它犹如止痛药膏，帮助我们熬过了头几周最痛苦的日子。

“整个7月我们都在等待大女儿季努什卡的到来。可惜我们不得不放弃这个愿望。格季耶大夫坚决要求她立即去结核病疗养院。她得病的过程已经相当长了，后来又去照料尼努什卡三个月，这时医生已宣布尼努什卡没救了，这严重地损害了她的健康……

“现在谈谈代表大会的工作。我决定从批判纲领着手，兼及使我们同官方领导相对立的一切问题。结果我写了一本小册子。总之，我把从列宁离开了党的领导时起近5年内我们集体工作的成果作了一个总结，这期间放肆的不肖徒辈上了台，他们起初吃老本的利息，但不久就吃起老本来了。

“关于告代表大会书，我已经收到了数十封来信和来电。还来不及统计票数。无论在整整100票中只有3人赞成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提纲……

“很可能，在这次会议上，斯大林同布哈林—季可夫集团还保持表面上的团结，以便作最后一次绝望的尝试，用一块‘最后的’墓碑来埋葬我们。但是，正是由于这一新的努力及其不可避免的失败，才可能大大加速该集团的内部的分化，因为在大会结束后的第二天，就更加赤裸裸地提出一个问题：‘往后怎么办？’这个问题会得到什么样的答案呢？我们在1923年错过了德国的革命形势之后，作为补偿，我们在1924至1925年，又走了一个极左的之字形弯路。季诺维也夫的极左方针是靠右倾的酵母发展起来的；打击主张工业化的人，却跟

拉迪奇<sup>①</sup>、拉福莱特<sup>②</sup>、农民国际、<sup>③</sup>国民党等打得火热。当极左派碰得头破血流后，在那一块酵母上又产生了右的方针。然而也决不排除在新阶段，即在新时期在更大规模上再出现极左的可能性，它也是建立在同样的机会主义前提之上的。但是，潜在的经济力量能够突然改变这种极左倾向，把方针向右拉。”

8月，我给几位同志写信说：

“你们当然已经注意到，我们报上根本没有转载欧美各国报刊对我们党内事态的评论。光是这一点就使人们觉得，这些评论并不适合‘新方针’的需要。现在对这一点我已不是在猜想，而是有报纸上的材料作为有力的证据。安德烈钦同志给我寄来了一张从美国《国民》杂志2月份一期上剪下来的材料。这家最著名的左派民主党报纸在简明地阐述了我们最近的事件后说：

“所有这一切把这样一个问题提到了首位：谁在俄国继续实施布尔什维克的纲领，谁是这一纲领的必然反动。美国读者始终认为，列宁和托洛茨基是一回事，连保守的报纸和国家领导人也得出这样的结论。例如《纽约时报》就把托洛茨基终于被撵出共产党看作是元旦值得庆幸的大事，并率直地声称：‘被开除的反对派主张使那些把俄国同西方文明割断的思想和条件永存。’欧洲的大多数大报也作类似的评论。据报导，奥斯坦·张伯伦先生在日内瓦会议期间说过，英国不能同俄国谈判，原因很简单：‘托洛茨基至今还没有被枪毙’。现在张伯伦应当为托洛茨基被驱逐而感到高兴……无论如何，欧洲反动派代表所得出的结论是一致的。即托洛茨基，而不是斯大林，是他们

- 
- ① 拉迪奇(1871—1928年)——赫尔瓦地区(今南斯拉夫)的政治活动家。参与创建克罗地亚农民党，提倡“农民权利”论，1924年参加了农民国际。1925年在塞爾維亞—斯洛文尼亞王国任部长。被大塞爾維亞沙文主义者刺杀。——译注
- ② 拉福莱特(1855—1928年)——美国反对共和党和民主党传统政策的所谓进步运动的首领之一。1901年起任参议员。1924年总统选举的独立候选人。主张限制垄断组织，国内政治生活民主化。——译注
- ③ 农民国际又称国际农民苏维埃。其任务是保护劳动农民的利益，并在“各国农民和工人团结起来”的口号下，组织农民参加革命斗争。该组织于1933年停止活动。——译注

的共产主义的主要敌人。”

这个意思是很说明问题的，不是吗？……

下面是从我儿子札记中摘录的几项统计资料。在1928年4月到10月间，我们从阿拉木图发出了800封政治信件，其中有一些是重要著作。发出的电报约达550余封。收到了1000余封政治信件，有长有短，以及约700份来电，大多数是以集体名义发来的。这些通信主要是在流放地之间进行的，但信件也从流放地传至全国各地。即使在最顺利的几个月内，我们收到的信件也不到半数。此外，我们从莫斯科收到了8至9个密件，即由信使转送来的秘密材料和信件；我们也往莫斯科发出了同样多的密件。密件使我们了解外界所发生的一切事情，并且使我们能够对重要的事件作出反应，虽然时间上要晚得多。

到了秋天，我的健康状况变坏了。这一消息传到了莫斯科。工人们开始在会议上提出了质问。官方的报告人除了用最美好的色彩来描绘我的健康状况之外，别无他法。

9月20日，我的妻子给当时的莫斯科党组织书记乌格兰诺夫发了一份电报：

“您在莫斯科委员会全会上说我的丈夫列·达·托洛茨基生病是虚构的。许多同志感到不安，提出抗议，对此您愤慨地说：‘瞧，他们采取什么手段！’结果在你们看来，采取不体面手段的不是放逐列宁的战友，并使之患病的那些人，反而是抗议这种做法的人。您有什么根据，有什么权利对党、对劳动人民和全世界说，列·达·生病的消息是虚构的？要知道，您这样做是在欺骗党。在中央委员会的档案里存放着我们最优秀的医生对列·达·健康状况所作的诊断。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列·达·的健康关怀备至，遵照他的嘱咐，这些医生对列·达·进行了多次会诊。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逝世后也进行过一些会诊，会诊断定，列·达·患的是结肠炎和新陈代谢不良而引起的痛风。您可能知道，列·达·1926年5月在柏林动过一次手术，想治

治折磨他多年的高烧，但未见效。结肠炎和痛风不是那种能医好的病，尤其是在阿拉木图这种地方。随着岁月的流逝，病情在加重。只有生活制度正常，进行正确的治疗，才能维持一定程度上的健康。可是在阿拉木图并不具备上述两个条件。关于需要正常的生活制度和正确的治疗的问题，您可以向卫生人民委员谢马什柯查问，他曾不止一次地参加过遵照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指示组织的会诊。在阿拉木图，除了上述病痛外，他还得了疟疾，而疟疾不仅影响了结肠炎和痛风，而且有时还引起剧烈的头痛。他往往是有几周、几个月情况比较好一些，接着又是几周、几个月感到很不舒服。这就是事实的真实情况。你们根据第58条，把列·达·作为‘反革命分子’流放。如果你们声明，你们对列·达·的健康不感兴趣，这倒可以理解。这样，你们就前后一致了，但这是一种极有害的前后一致，如果不予以制止，就会不仅葬送最优秀的革命家，而且还会葬送党和革命。然而现在，你们在工人群众的舆论压力下，显然没有勇气做到前后一致。你们不是说托洛茨基生病对你们大有好处，因为疾病可以妨碍他去思考和写作，而是干脆否认他生病。加里宁、莫洛托夫和其他人在发言中也是这么说的。现在你们不得不答复群众的质询，并且如此不体面地胡言乱语，这一事实表明，工人阶级并不相信你们对托洛茨基的政治诽谤。他们也不会相信你们关于列·达·健康状况的谎言。

娜·伊·谢多娃—托洛茨卡娅”



## 第四十四章

# 驱 逐

从10月开始，我们的处境发生了急剧的变化。我们与同志、朋友，甚至与在莫斯科亲属的联系突然中断了，书信和电报再也寄不到了。我们通过特殊渠道获悉，莫斯科电报局积压了拍给我们的数百份电报，特别是十月革命节这一天。包围我们的圈子越收越紧。

1928年，尽管对反对派进行了肆无忌惮的中伤，反对派仍在发展壮大，尤其在大型工业企业里。这便导致了对我们的加紧迫害，其中之一，是完全中断流放者的通信，甚至他们之间的通信。我们预料还会有其他措施接踵而来，我们的估计没有错。

12月16日，从莫斯科派来一名格伯乌的特派员，他以格伯乌的名义，交给我一份最后通牒：停止领导反对派的斗争，以免对我采取使我“脱离政治生活”的措施。然而当时还没有提出驱逐出境的问题，据我所知，还只限于国内的措施。我写了一封信给党中央和共产国际主席团，回答这一“最后通牒”。我认为有必要在此摘录这封信的主要部分：

“今天，12月16日，国家政治保卫局局务委员会的特派员沃林斯基以该委员会名义向我提出如下口头最后通牒：

“您国内同伙的活动（这几乎是他的原话）最近具有明显的反革命性质；您在阿拉木图的条件使您完全有可能领导他们的活动；为此，国家政治保卫局局务委员会决定，要求您完全停止您的活动，否则，委员会将不得不改变您的生活条件，就是说，使您完全脱离政治生活，同时还提出改变您的居住地点的问题。”

“我向这位国家政治保卫局特派员声明，我只有收到国家政治保卫局书面的最后通牒，才能给以书面答复。我拒绝作口头答复，因为根据以往的经验，我相信我的话会被严重歪曲，用来欺骗苏联和全世界的劳动群众。

“然而，不管国家政治保卫总局以后将采取什么行动，它在这件事上并不起独立作用，而只是在技术上执行斯大林狭隘的、宗派的、我早已领教过的老决定，我认为有必要通知联共中央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

“要求我放弃政治活动，这意味着要我放弃 32 年来即在我的全部自觉生活期间，我为国际无产阶级的利益而进行的不间断的斗争。那些企图把这一活动说成是‘反革命’活动的人，就是践踏马克思和列宁的学说的原理，抹杀世界革命的历史意义，抛弃十月革命的传统和遗训，不自觉但更加危险地准备热月而被我在国际无产阶级面前予以痛斥的那些人。

“放弃政治活动就意味着停止反对目前联共领导的盲动性的斗争，联共领导除了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客观困难之外，还由于机会主义者没有能力推行具有巨大的历史规模的无产阶级政策，致使政治上的困难日益增多；

“这意味着放弃反对窒息党的制度的斗争，这一制度反映了敌对阶级对无产阶级先锋队施加的越来越大的压力；

“这意味着消极地顺应机会主义的经济政策，这一政策动摇和危害无产阶级专政的基础，阻挠无产阶级在物质和文化上的发展，同时，沉重地打击了工人和劳动农民联盟这个苏维埃政权的基础。

“党内的列宁派自 1923 年起，即从德国革命遭受空前失败时起，不断受到打击。这种打击的力量在日益加强，这是和国际无产阶级和苏联无产阶级继续遭到失败同步进行的。

“理论理性和政治经验证明，历史的倒退和反冲时期，即历史的反动时期，不仅可能在资产阶级革命以后出现，而且也可能在无产阶级革命以后出现。6 年来，我们生活在日益增长的对

十月的反动的条件之下，这是为热月扫清道路。这种反动在党内最清楚、最完备的表现是野蛮的迫害和从组织上摧毁左翼。

“斯大林派近来企图借用反对派思想中的片言只语，去反击公开的热月分子。它无力创新。反左的斗争使它失去了稳定性。它的实际政策缺乏主心骨，是虚伪的、矛盾的、不可信的。这场吵吵闹闹的反对右倾危险的运动，四分之三是做样子的，它的首要目的是向群众掩饰其对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发动的歼灭战。世界资产阶级和世界孟什维克主义都为这场战争祝福；这些法官早就承认‘历史的正义’在斯大林一方。

如果不是执行那种迎合官僚和市儉的盲目、胆怯和平庸的政策，劳动群众在专政第十二个年头的状况肯定要比现在好得多；军事防御一定比现在巩固和可靠得多；共产国际将站在全然不同的另一个制高点上，而不是在背叛和出卖的社会民主党前节节败退。

“机关反动势力表面强大，但其虚弱是无可救药的，这表现在它自己也不知道它在做什么。它遵照敌对阶级的意旨行事。没有一个派别比脱离革命，又破坏革命的派别遭到历史更强烈的诅咒了。

“目前，反对派尽管表面微弱，可是它是一支最伟大的力量，因为它的指尖已触及世界历史进程的脉搏，清晰地洞察到阶级力量的变动，预见明天，并自觉地为它作准备。放弃政治活动就意味着放弃为明天作准备。

“改变我的生活条件，要使我孤立于政治活动之外的威胁，听起来就像我还没有被流放到远离莫斯科 4 000 公里，离铁路 250 公里，离荒凉的中国西部边境也差不多有这么远的地方，好像我还没有被流放到这恶性疟疾、麻风和鼠疫肆虐的地方。好像斯大林派——它的直接机构就是国家政治保卫局，没有尽一切力量不仅使我脱离政治生活，而且也脱离其他各种生活。莫斯科的报纸送到这里需 10 天至一个月，甚至更长的时间。除少数例外，信件要在国家政治保卫局或中央书记处的抽屉里积压

一两个月，甚至3个月以后才送到我这里。

“从内战时候起，一直跟随我的两个最亲密的工作人员，谢尔穆克斯和波兹南斯基决意自愿陪我到流放地，可是他们一到这里就立即被捕，与刑事犯一起关在地下室里，然后流放到北方边缘的角落去。我的女儿被你们开除出党，解除工作，她在弥留之际从莫斯科医院寄给我的信，73天后我才读到，结果她还没收到我的回信就离开了人间。我的二女儿也被你们开除出党，解除工作，关于她得重病的信，一个月以前才送到我这儿，即从莫斯科发出后第43天才收到。探问我的健康情况的电报常常没有送到我手上。数以千计的无可指责的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也遭到同样的，或者更坏的待遇，他们对十月革命和国际无产阶级的功绩远远超过监禁或流放他们的人。

“列宁在‘遗嘱’中曾称斯大林‘粗暴和不忠’，当时表现的这些毛病还不及目前的百分之一。现在狭隘的斯大林派准备加紧镇压反对派，一直企图借助于国家政治保卫局给反对派加上同无产阶级专政的敌人有什么‘联系’的罪名。现在的领导人在小范围内说：‘这对群众来说是需要的。’有时甚至更加厚颜无耻地说：‘这对傻瓜来说是需要的。’我最亲密的战友，在国内战争期间一直主持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秘书处的格奥尔吉·瓦西里耶维奇·布托夫被捕了，监禁在无法忍受的环境中，要这位纯朴、谦逊的人，这位无可指责的党员去证实根据热月的精神捏造出来的、虚假的、莫须有的罪名。布托夫用英勇的绝食斗争予以回答，斗争持续约50天，致使他在今年9月死在狱中。这位优秀的工人布尔什维克因忠于十月的传统，而遭受暴力，毒打，受尽肉体上和精神上的折磨。用国家政治保卫局的话来说，这就是目前那些‘不妨碍’包括我在内的反对派进行活动的一般条件。

“改变我的生活条件，使我进一步遭受孤立，这种卑鄙的威胁只说明斯大林派决定以监狱来代替流放而已。如上所述，这个决定对我来说并不新鲜。这个决定早在1924年就拟定了，然

后逐步地分阶段地予以贯彻，以便偷偷地使受压制和受蒙骗的党习惯于斯大林的方法，在这种方法里粗暴的不忠现在已发展成官僚的、恶毒的无耻行径。

“我们在递交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的《声明》中，似乎已预料到今天给我的最后通牒，声明一字不差地写道：‘只有完全腐化的官员才能要求革命者放弃这点（放弃政治活动，即放弃为党和国际革命服务）。只有卑鄙的叛徒才会作出此类保证。’

“对这些话我一字也不能改。

“各行其是。你们以后还要唤起敌视无产阶级的阶级力量。我们知道自己的职责，并要奋斗到底。

列·托洛茨基

1928年12月16日于阿拉木图”

回信后，一个月内没有动静。我们同外界的联系，包括同莫斯科的秘密联系完全断绝了。一月份我们只收到莫斯科的报纸。报上关于反右斗争的报道越多，我们就越深信对左派的打击指日可待。这是斯大林政策中的惯技。

莫斯科的国家政治保卫局的特使沃伦斯基一直留在阿拉木图待命。1月20日，他带了一批国家政治保卫局的武装人员来到我这里，他们把守住出入口，把国家政治保卫局1929年1月18日的记录摘要交给我：“事由：公民列夫·达维多维奇·托洛茨基一案，根据刑法典第58条第10款被控从事反革命活动，组织反苏维埃的地下党，该党近来策划反苏维埃的活动，旨在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武装斗争。判决：将公民托洛茨基，列夫·达维多维奇，驱逐出苏联国境。”

接着要我签字以证明我已看到上述决定，我当即在上面写道：“1929年1月20日国家政治保卫局向我宣布了实质上犯罪，形式上非法的决定。托洛茨基。”

我之所以称这个决定是犯罪的，是因为它故意说谎，说我在准备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武装斗争。斯大林需要这种公式来证明驱逐我是正确的，但是这本身就是最恶毒地破坏苏维埃政权。如果由十月革命的组织者、苏维埃共和国和红军的建设者领导的反对派正在准备

推翻苏维埃政权这种说法是正确的,那么这本身就意味着国家处在危难之中。幸好,国家政治保卫局的说法是厚颜无耻的谎言。反对派的政策与策划武装斗争毫无共同之处。我们所持的出发点是,完全相信苏维埃制度具有无限的生命力和适应性。我们选择的道路是内部改革的道路。

我询问他们打算如何驱逐?驱逐到哪里?得到的回答是,到了俄国的欧洲部分,将由前来迎接的国家政治保卫局代表告诉我。第二天一天,我们忙于收拾行装,几乎全是手稿和书籍。顺便说一下,格伯乌人员对我们毫无敌意。22日拂晓,我和妻子、儿子及押解人员乘同一辆汽车出发了。汽车沿着一条压平了的、光滑的雪道行驶,把我们带到库尔德伊山口。在山口,碰上了暴风雪,风雪飞旋。那辆拖我们越过库尔德伊山口的大功率拖拉机和它牵引的7辆汽车几乎都深深地陷进雪堆。在暴风雪中,有7个人和许多马匹冻死在山口。我们只好改乘雪橇,花了7个多小时才前进了大约30公里。冰雪覆盖的路上,到处是翘起车轡的雪橇,还有许多被冰雪覆盖的修建土耳其斯坦-西伯利亚铁路的物资和油桶。人马都躲到附近的吉尔吉斯人的冬营里避风雪去了。越过山口后,我们重新坐上一辆汽车,到了皮什佩克又改乘火车。途中看到的莫斯科报纸证明,正在为把反对派领导人驱逐出境制造舆论。在阿克纠宾斯克区,通过直通电话通知我们,流放的地点是君士坦丁堡。我要求会见在莫斯科的两个家庭成员,我的次子和儿媳。他们被送到里亚日斯克站,在那里,他们受到和我们一样的待遇。格伯乌的新代表布拉诺夫竭力要我相信君士坦丁堡的优越性。我坚决拒绝这种优越性。布拉诺夫通过直线电话和莫斯科商议。莫斯科预见到一切,只是没有预见到因我拒绝自愿出国这一障碍。我们的列车改变了前进的方向,徐徐前进,然后在—一个荒凉的小车站附近的一个偏僻的支线上停了下来,停在两片小树林之间。这样日复一日地等着。火车周围的空罐头盒越积越多。越来越多的乌鸦和喜鹊前来觅食。荒凉而僻静。这里没有野兔,去年秋天的一场传染病使它们大批死去。狐狸却踩出了一条通向列车的可爱的小道。机车每天拖着一节车厢到大站去为我们取午饭和报纸。

我们在车上得了流行性感冒。我们反复读着阿纳托尔·法朗士<sup>①</sup>的作品和克柳切夫斯基<sup>②</sup>的俄国史教程。我初次了解伊斯特拉提。气温降到列氏零下38度。我们的机车在轨道上来回开动，以免冻住。无线电台在太空彼此呼叫，询问我们在哪里。我们听不到这些问题，我们在下棋。即使我们听见了，也无法回答，因为我们是夜里被送到这里来的，我们自己都不知道身在何方。

我们就这样度过了12个日日夜夜。在这里，我们从报纸上获悉新近逮捕了几百个人，其中150人是所谓“托洛茨基中心”的。公布的名单中有前格鲁吉亚人民委员会主席卡夫塔拉泽、前苏联驻巴黎的商务代表姆季瓦尼，我们优秀的文学批评家沃龙斯基等人。他们都是党的重要活动家，十月革命的组织者。

2月8日布拉达夫宣布：尽管莫斯科一再要求，德国政府还是断然拒绝您到德国去；我已接到命令，把您送到君士坦丁堡。

“但我是不会自愿去的，到土耳其边境我还将这么说。”

“这也无济于事，反正要把您送到土耳其。”

“就是说你们已经与土耳其警察串通，强迫我迁居土耳其？”

他做了个支吾搪塞的手势：我们只是执行者。

停留了12个昼夜以后，火车又启动了。在我们的小小列车里人数在不断增多，因为押解人员在不断增加。从皮什佩克站起，在整个旅途中，不准我们离开车厢。现在我们正开足马力向南方疾驶。只在小站停下来，装水添煤。采取这些非常的防备措施是鉴于1928年1月因我的流放而引起莫斯科游行示威的教训。路上看到的报纸给我们带来了新的大规模反托洛茨基主义分子运动的消息。从字里行间可以看出上层在驱逐的问题上展开的斗争。斯大林派是迫不及待的了。它有充分的理由这么干。它既要克服政治上的障碍，也要克服物理上的障碍。派了“加里宁”号轮船把我们送出敖德萨。可是轮

① 阿·法朗士(1844—1924年)——法国作家。——译注

② 瓦·奥·克柳切夫斯基(1841—1911年)——俄国历史学家，莫斯科大学教授，立宪民主党人。——译注

船被冰封住了。破冰船竭尽全力也无济于事。莫斯科不断打电报催促。“伊里奇”号轮船也紧急升火待命。我们的火车于10日夜抵达敖德萨。我透过车窗观看这些熟悉的地方：我在这个城市里度过了7年学生生活。我们的火车一直开到轮船边。天气很冷。虽然已是深夜，格伯乌的人员和军队还是包围了整个码头。在这里要和小儿子和儿媳告别，他们两周来和我们一起分享了监禁生活。我们透过车窗看到等候我们的轮船，同时又想起了另一艘轮船，它也没有按照指定地点把我们运走。那是在1917年3月，在哈利法克斯附近，英国水兵当着无数乘客的面，把我从挪威轮船克里斯蒂安尼亚峡湾号挟持下来。当时我们全家也是这些人，只是大家比现在年轻12岁。

伊里奇号既不装货，也不载客，于深夜一点左右离岸。一艘破冰船在距我们60俄里的地方为我们开路。这里刮起的暴风只是用翅膀最后轻轻地扫了我们一下。2月12日，我们驶进博斯普鲁斯海峡。在比于达卡，土耳其警官登上轮船检查乘客。一船上除了我一家及格伯乌人员外，别无乘客，我把给土耳其共和国总统凯末尔·穆斯塔法的下述声明交给了他们：

“阁下：在君士坦丁堡大门之前，我有幸奉告，我抵达土耳其国境并非出自我的选择，我只是在武力逼迫下才进入贵国国境。总统先生，请接受我的敬意。

列·托洛茨基 1929年2月12日”

这份声明没有得到回音。轮船继续向艄地驶去。经过22天航行，行程6000公里，我们终于抵达君士坦丁堡。



## 第四十五章

# 不给签证的地球

我们到了君士坦丁堡，起初住在领事馆大楼，后来住进一幢私人住宅。下面摘引我妻子对于初期流放生活的记述：“对我们住在君士坦丁堡所碰到的各种周折，如小小的骗局和暴力事件等，也许不值一提。我只想谈其中的一个插曲。在开往放德萨的列车上，格伯乌（国家政治保卫局）特派员布拉诺夫就如何确保在国外的安全的问题谈了各种设想（毫无用处），列·达·打断他说：‘您还是让我的助手谢尔穆克斯和波兹南斯基跟我一道走，这才是唯一的，多少有用的措施。’布拉诺夫立即把这些话报告给莫斯科。在下一站上，他郑重其事地带来了通过直通电报得到的答复：国家政治保卫局，即政治局同意了。列·达·笑着对他说：‘你们反正是在骗人。’看来布拉诺夫真的被刺痛了，高声地说道：‘那样您就叫我恶棍吧！’‘我干吗要侮辱您，列·达·回答说，‘不是您，而是斯大林欺骗我们。’我们到达君士坦丁堡后，列·达·询问了关于谢尔穆克斯和波兹南斯基的情况。过了几天，领事馆的一个代表带来了莫斯科的回电：不放他们走。其余的事也大体如此。”

一到君士坦丁堡，有关我们命运的大量谣传、猜测和杜撰都通过报纸向我们袭来。报界不愿放过任何消息，不遗余力地干得很起劲。为了让一颗种子发芽，大自然要洒下大量的种子。报界就是这么办的。它捡起谣言，一传十，十传百地大量传播。要到可靠的说法确立之后，成千上万的报导才会消失。有时候这要经过若干年的时间。可是，真理永远不出现的情况也是常有的。

在舆论触及要害问题时，最要命的就是人的谎言。我不是怀着任何道德上的义愤，而是以一个确认事实的自然科学家的口吻说这句话的。需要说假话，撒谎成性，这反映了我们生活中的矛盾。可以说，报纸说真话是一种例外的现象。我这么说并非要得罪新闻记者们。他们与其他人没有多大的区别。他们是后者的喉舌。

左拉就法国的金融报刊写道，它可以分为两类：卖身投靠的和所谓“不可贿买”的，即只有在例外的场合以高价出售的。可以说，报纸上的谎言也与此大体类似。黄色的街头小报更是胡编乱造，从不瞻前顾后。像《泰晤士报》这样的报纸，也只是在不重要和微不足道的情况下才讲点真话，为的是，一旦需要，就可有必要的威信去蒙骗公众舆论。

《泰晤士报》后来报道说，我是同斯大林商妥后来君士坦丁堡的，目的是在这里为武装占领近东各国做准备。我同不肖徒辈之间进行的长达六年的斗争，被说成是早已分配好角色的一出简单的喜剧。有的乐观主义者会问，“谁会相信它？”错了，许多人会相信的。丘吉尔也许不相信自己的报纸。但是克林兹<sup>①</sup>肯定会相信它，至少是半信半疑。这就是资本主义民主的奥妙，或者准确点说，是其最主要的动力之一。不过，这只是顺便说说而已。关于克林兹其人我们以后再谈。

我到达君士坦丁堡后不久，在一家柏林报纸上看到国会主席在魏玛国会十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最后一句话是：“也许我们甚至已经到了给托洛茨基先生以自由避难权的时候了（大多数人热烈鼓掌）”。洛布先生的讲话使我感到很突然，因为过去发生的一切使我有理由相信德国政府不让我进入德国。不管怎样，苏联政府的代表就是这样断定的。2月15日，我找来送我到君士坦丁堡的格伯乌代表，对他说：“我必须作出这样的结论，告诉我的情况是假的。洛布的讲话是在2月6日发表的，而我们直到2月10日夜间才离开德萨

<sup>①</sup> 约·罗·克林兹(1869—1949年)——英国工党领袖之一，议员，曾任粮食大臣、掌玺大臣和内政大臣。——译注

赴土耳其的。因此当时莫斯科已获悉洛布的讲话。我建议您立即打电报到莫斯科去，建议他们根据洛布的讲话真正向柏林提出给我签证的申请。斯大林在我去德国的问题上玩弄的阴谋如果就此收场的话，那是最体面的了。”两天后，格伯乌的特派员回答说：“莫斯科回电重申，早在2月初，德国政府已断然拒绝给予签证；新的要求毫无意义；洛布的讲话是不负责任的。您如想查验，可以亲自提出签证的申请。”

我不能相信这个说法。我认为，德国国会主席对本党和本国政府意图的了解应比格伯乌的侦探们清楚一些。我当天打电报给洛布，说根据他的声明，我向德国领事馆提出签证的申请。民主报刊和社会民主党报刊无不幸灾乐祸地指出这样一种情况，即一个主张革命专政的人却不得不到一个民主国家去寻找避难所。有些人甚至希望这一课将教人对民主制度作出较高的评价。我只有等着，看这节课在实际上将是怎样的。

当然，避难的民权利并不在于政府给予同自己思想一致的人以殷勤的款待，这一点连阿卜杜尔·哈米德<sup>①</sup>苏丹也会这么做。也不在于，只有得到放逐政府的允许，民主政府才收容被放逐者。避政权（书面上的）在于，政府也给予自己的反对者以栖身之地，条件是遵守所在国的法律。自然，我只能作为一个社会民主党政府的不可调和的反对者进入德国。德国社会民主党报纸驻君士坦丁堡的代表到我这里来采访，我作了必要的解释。事后，我立即把谈话内容记录下来，现按原样引述如下：

“由于我现在申请到德国去，那里政府的大多数成员是社会民主党人，因此我首先关心的是澄清我对社会民主党的态度。在这方面并没有发生任何变化。我对社会民主党的态度依然如故。此外，我跟斯大林派的斗争仅仅是我跟社会民主党斗争的一种反映。您我都不必含糊其词、吞吞吐吐。

<sup>①</sup> 阿卜杜尔·哈米德（1842-1918年）——土耳其皇帝。1876至1909年在位。——译注

“社会民主党的某些出版物企图在我对民主问题上的原则立场和我提出去德国的申请之间找出矛盾来。这里不存在任何矛盾。我们根本不像无政府主义者(口头上)那样‘否认’民主。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同它以前的国家形式相比,有它的优越性。但它不是永恒的,它必然让位于社会主义社会。无产阶级专政就是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桥梁。

“共产党人在一切资本主义国家中都参加议会斗争。使用避难权同使用选举权、出版和集会等自由权利没有原则差别。”

据我所知,这次采访并没有见报。这没有什么奇怪的。那时社会民主党报纸大声疾呼,主张给我以避难权。有一位社会民主党律师,K.罗森费尔德博士主动为确保我到德国去的权利而奔走。可是他立即遇到了阻力,因为几天后,我接到他的电报,问我在德国居留期间愿接受哪些限制。我回答:“我打算在柏林以外的地方独处,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在公开会议上讲话,仅限于在德国法律范围内从事写作。”

由此可见,问题已不是避难的民主权利,而是在非常的情况下在德国的居留权问题。我的对手要给我上的民主课很快得到有限度的解释。不仅如此,几天后,我又接到电报,询问我是否同意只是为了治病的目的去德国?我回电说:“我请求至少让我在德国治疗一个疗程,这对我来说是十分需要的。”

这样一来,在这个阶段避难权被缩小成治疗权。我提出许多著名的德国医生,他们在最近10年中,曾为我治过病,现在我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他们的帮助。

复活节前,德国报纸又唱起新的调子:在政界人士中,有人认为,托洛茨基并没有病得非要德国医生医治,非去德国疗养不可,3月31日,我打电话给罗森费尔德博士:

“根据报纸报道,我病情还远没有严重到能使我有可能去德国。我要问,洛布给我的是避难权还是墓地权?我同意让任何医生委员会给我作任何检查。我保证疗程一结束,便离开德国。”

这样，在几个星期之内，民主原则就被腰斩了三次。起初避难权变成在非常情况下的居住权；接着变成治疗权；最后成为墓地权。但这意味着，我只能以一个亡命者的身份去充分评价民主制度的优越性了。

我没有收到回电。过了几天，我又打电报给柏林：“我把不给答复看作是不正当的拒绝方式。”

只是在这以后，我在4月12日，也就是两个月之后才收到回音，说德国政府拒绝我的人境请求。我没有别的办法了，于是打电报给德国国会主席洛布：“我很遗憾，未能通过实践领受民主避难权的优越性的教育。托洛茨基。”

这是我第一次试图在欧洲得到“民主”签证的富有教益的简史。

不言而喻，如果给了我避难权，这本身一点也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国家理论已经被推翻。民主制度不是来自独立自主的原则，而是来自统治阶级的实际需要，由于其内在的逻辑也包含有避难权。给无产阶级的革命者提供避难所同民主的资产阶级性毫不矛盾。但是现在不必加以论证，因为在社会民主党领导的德国根本不存在什么避难权。

斯大林于12月16日通过国家政治保卫局建议我放弃政治活动。在报刊上讨论避难权问题时，不言而喻，德国方面也提出同样的条件。这意味着弥勒-施特雷泽曼政府也认为斯大林及其台尔曼们所反对的那些思想是危险和有害的。斯大林用外交手腕，台尔曼们则借助于鼓动，要求社会民主党政府不放我进德国——大概是为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利益吧！另一方面，张伯伦、韦斯塔普伯爵以及诸如此类的人则要求为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利益拒绝给我签证。这样，赫尔曼·弥勒既能使他的右派同伙，也能使他的左翼盟友得到必要的满足。社会民主党政府成了反对革命马克思主义的国际统一战线中的一个联结点。只要看看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的头几行，就可以找到这种统一战线的形象：“旧欧洲的一切势力，教皇和沙皇，梅特涅和基佐，法国的激进党人和德国的警察，都为了驱除这个（共产主义）幽灵而结成了神圣同盟。”名称不同，但实质是相同的。今天

的社会民主党人就是德国的警察，这一事实并不改变任何东西。他们所维护的东西，实质上也是霍亨索伦警察所卫护的。

民主国家拒绝签证的理由是各种各样的。要知道，挪威政府的出发点纯粹是考虑我的安全。我从来也没有想到在奥斯陆的达官显要中居然有对我关怀备至的朋友。挪威政府自然像德国、法国、英国和其他各国政府一样，完全支持避难权。众所周知，避难权是神圣的、不可动摇的原则。但是，流放者应当事先向奥斯陆递交自己不会被人杀害的保证书。那时他就会得到殷勤的接待……当然，如果再也没有别的障碍的话。

挪威议会就我的签证问题进行的两次辩论是一份无与伦比的政治文献。虽然我没能得到我的挪威朋友为我奔走的签证，然而阅读这份政治文献，至少可以得到一半的补偿。

关于我的签证问题，挪威总理首先当然是找秘密警察头子谈话，后者在民主原则方面的权威性是无可争辩的，这一点我要预先承认。据莫温克尔先生说，秘密警察头子提出了这样的主张，即最明智的办法是让托洛茨基的敌人不要在挪威的领土上杀害他。表述得不十分确切，但意思就是这样。司法部长则向挪威议会解释说，保护托洛茨基对挪威的预算来说负担太重。国家节俭的原则也是一个无可争议的民主原则，这一次又与避难权发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至少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谁最需要避难权，谁得到避难权的可能性就最小。

法国政府的做法要聪明得多，它干脆以马尔威所发的把我驱逐出法国的命令尚未取消为由。真是民主道路上无法逾越的障碍！我在前几章中已经说过，我在那次被驱逐出境后，尽管马尔威的命令尚未撤销，法国政府已把它的法国军官交给我支配，法国议员、使节和一位总理还来拜访过我。但是这些现象显然是出现在两个互不相关的领域之内。而现在的形势是这样的，如果警察局的档案内没有那道应沙皇外交部的要求把我驱逐出法国的命令，那么，法国肯定会让我避难的。众所周知，警察局的命令是像北极星一样的东西，取消它，移动它都是完全不可能的。

不管怎么说，避难权被法国驱逐出去了。那么，究竟在哪个国家可以找到避难权呢？也许是英国？

1929年6月5日，麦克唐纳的独立工党主动地正式邀请我去英国，为党校讲课。这份由党的总书记签署的邀请信上写道：“值此英国成立工人政府之际，我们不认为您为此目的来英国访问会有何障碍。”然而，障碍还是出现了。我不仅不能向麦克唐纳的同志发表演讲，甚至不能得到英国医生的诊治。完全拒绝给我签证。工党党员、警务大臣克林兹曾在下院为拒绝签证作辩护。他对民主的哲学本质讲得如此直截了当，真能为查理二世的任何一位大臣增光。照克林兹的说法，避难权不在于被放逐者有要求避难的权利，而在于国家有拒绝接受避难的权利。克林兹所下定义之妙处在于它一举摧毁了所谓民主的基础本身。克林兹式的避难权在沙皇俄国一直存在。当波斯王未能绞死革命者，迫不得已离开他心爱的祖国时，尼古拉二世不仅给了他避难权，而且还让他在敖德萨养尊处优。但是，爱尔兰革命者根本没有想到要在沙俄寻找避难所，因为沙俄的宪法仅限于克林兹的原则，即不管国家政权给他什么，还是向他攫取什么，都应感到满足。不久以前墨索里尼也完全按照这个原则把避难权给了阿富汗国王。

虔诚的克林兹先生至少应当知道，在某种意义上，民主制是从基督教会那里继承了避难权的，诚然，基督教会也是从异教那里继承来避难权以及其他许多东西的。一个逃犯只要跑进寺庙，有时只要摸到寺庙的门环，就可以免受追捕了。由此可见，教会所理解的避难权也就是逃犯的避难权，而不是异教的牧师和基督教祭司随心所欲的行动。迄今为止我一直认为，虔诚的工党党员虽然对社会主义不甚了了，但至少应当是熟悉教会传统的行家。现在我发现，他们连这个也不是。

但是，为什么克林兹在他的国家法理论的头几行就停下来了呢？真没道理。避难权只是民主制度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无论就历史根源，还是就法律本质而言，它都跟言论自由、集会自由等没有区别。可以相信，克林兹先生很快就会得出结论，言论自由并不意味着公民

有申述某种思想的权利，而是国家有禁止其臣民申述这些思想的权利。至于罢工自由，英国的立法早已作出这种结论了。

不幸的是，克林兹不得不公开为自己的做法辩解，因为工党的议会党团中有议员向部长提出了一些问题，虽然语气尊敬，却是令人难堪的问题。挪威总理也处于同样尴尬的局面。德国内阁避免了这种难堪的局面。因为在国会中没有一个议员对避难权问题感兴趣。这一事实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如果还记得早在我提出避难要求以前，国会主席就在多数议员的热烈鼓掌下，答应给我避难权。

十月革命并没有提出抽象民主原则，其中包括避难权。苏维埃国家是公开建立在革命专政权的基础之上的。这并不妨碍王德威尔得和其他社会民主党人到苏维埃共和国来，甚至在莫斯科扮演为杀害十月革命领导人的恐怖分子作辩护的角色。

现任的英国大臣也访问过我国。我记不起所有的来访者的名字，因为我手头没有资料，但我记得其中有斯诺登<sup>①</sup>先生和夫人。这应是1920年的事。我们不仅没有把他们当作普通旅游者，甚至还把它当作贵宾来接待，这也许已经太过分了。在大剧院里为他们安排了包厢。我之所以重提此事，是因为它与一段插曲有关。现在不妨说一说。我从前线回到莫斯科，脑子根本没想到英国客人，甚至不知道这些客人是何许人，因为我几乎没有看报，把精力全都倾注到其他事务了。一个由洛佐夫斯基为首的委员会负责接待斯诺登先生和夫人，大概还有伯特兰·罗素和威廉以及其他许多人。他打电话告诉我，委员会要我到英国客人光临的大剧院去。我想不去，但是洛佐夫斯基坚持说，委员会拥有政治局授予的全权，希望我为他人作出执行纪律的榜样。我硬着头皮去了。包厢中大约有十来个英国客人。剧院座无虚席。我们前线取得了节节胜利，整个剧院对胜利报以暴风雨般的掌声。英国客人把我团团围住，也鼓起掌来。其中就有斯诺登先生。当然，现在他对此事会觉得有点不好意思。但要一笔勾销

<sup>①</sup> 菲·斯诺登(1864—1937年)——英国独立工党主席(1903—1907年，1917—1920年)、第一、二届工党政府财政大臣(1924年，1929—1931年)。——译注



是不行的。然而我却很乐意予以勾销，因为我与工党分子“联欢”不仅是个误会，而且是个政治错误。我尽快摆脱开客人，便径直去找列宁。他很激动：您是不是真的与这些先生（列宁用的是另一个词）在包厢中露面了？我归咎于洛佐夫斯基、中央委员会下的接待委员会和纪律，而主要的是我对于这些客人一点也不了解。列宁对洛佐夫斯基以至整个委员会感到很恼火，而我也久久不能原谅自己的不谨慎行为。

现在的一位英国大臣好像曾几度访问莫斯科，至少在苏维埃共和国休养过，住在高加索，还拜访过我。此人就是兰斯伯里先生。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是在基斯洛沃茨克。他们坚决要我到休养所去一趟，哪怕是呆一刻钟也好，那里有我们的一些党员和几位外宾。有几十人围坐在一张大桌子旁，好像是举行便宴。客人兰斯伯里坐在首席。我来后，客人致祝词，然后说：“为这位大好人干杯！”这就是兰斯伯里先生在高加索时对我表露出来的感情。今天他也许也情愿把这件事忘掉……

应当说一下，我在提出签证的申请以后，曾特别致电斯诺登和兰斯伯里，提醒他们当年曾到过苏俄，其中包括我对他们的款待。我的电报未必会对他们起多大的作用。政治上的回忆同民主原则一样，是无足轻重的。

不久以前，在1929年5月初，悉·詹·维伯先生和比阿特里萨·维伯夫人<sup>①</sup>曾盛情地拜访过我，那已经是在普林吉坡了。我们谈到了工党执政的可能性。我顺便提到，一旦麦克唐纳政府成立，我立即提出签证的要求。维伯先生表示，新建立的政府可能软弱无力，由于它依赖于自由党人，因此也不可能有充分的行动自由。我回答说，一个政党如果无力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也就无权执政。我们的不可调和的分歧无需再检验。维伯终于执政了。我要求签证。麦克唐

<sup>①</sup> 悉·詹·维伯(1859—1947年)和比·维伯(1858—1943年)一夫妇，英国经济学家和社会活动家。悉·詹·维伯是费边社创建人和领导人，1924年、1929至1931年两度出任工党政府大臣。——译注

纳政府拒绝了我的请求，这完全不是因为自由党人不让它显示自己的民主主义。恰恰相反，工党政府不顾自由党人的反对拒绝给我签证。维伯先生没有预见到这样的变化。不过，应当指出，那时候他还没有成为帕斯菲尔德勋爵。

我个人认识这些人中间的一些人。对其余的人我可以以此类推。我认为，我对他们的看法是相当正确的。这些人由于工人组织的发展，同时也由于自由主义在政治上的衰落而升官（特别是在战后）。他们完全失去了他们中间某些人在25年至30年前的那种幼稚的理想主义。取而代之的是他们身上增添了政治上的墨守成规和不择手段。但就眼界而言，他们依然如故，仍然是怯懦的小资产者，他们的思维方法比英国煤炭工业的生产方法还要落后得多。今天他们最担心的是，宫廷贵族和大资本家不把他们当一回事。这不足为奇，因为他们去执政的时候，深感自身的软弱无力。他们没有，也不可能有的执政集团所具有的那些品质，在那些集团中，统治的传统和技巧代代相传，往往取代了智慧和才干。但是他们缺乏那种能使他们成为一支真正力量的东西，即对群众的信赖和自力更生的能力。他们害怕把他们推上高位的群众，就像害怕那些保守党人的俱乐部会以它们的庄严架式摧毁他们那可怜的空想。为了掌权，他们必须向旧的统治阶级表明自己不是革命的暴发户，不，绝对不是的，他们是值得信赖的，他们忠于教会，忠于国王，忠于上议院，忠于封号，就是说不仅忠于神圣的私有制，而且忠于中世纪的所有垃圾。拒绝给一个革命者发签证，对他们来说实质上是再一次表明自己是值得尊敬的极好的机会。能给予他们这样的机会，我感到很高兴。到时候这会受到注意的。在政治上，正如在大自然中一样，什么都不会白扔的……

至于克林兹先生是怎么向他手下的政治警察的头目解释的，那是不难想象的。在这次谈话中，克林兹觉得自己正在经受一场考试，唯恐在主考人面前表现出不够坚定，不符合国家的要求，不够保守。只要政治警察的头目稍许机灵一点，就会向克林兹提示一种能在第二天得到保守党报纸赞扬的解决办法。但是保守党报纸不是简单地

加以表扬。这种表扬令人感到难受，它是在取笑。它并不花力气去掩饰自己对那些如此卑贱地寻求它的赞许的人们的蔑视。例如，谁也不会说《每日快报》是世界上最具有头脑的报纸。然而这家报纸却用极为毒辣的词句表示赞同工党政府，因为该政府如此关怀备至地保护“心胸狭隘的麦克唐纳”，以防在他背后出现一个革命的观察家。

难道这些人的使命是为新的人类社会奠基吗？不，他们只不过提出了旧社会的倒数第二种手段。我之所以说倒数第二，是因为最后一种手段是肉体上的镇压。

我不能不承认，西欧各民主国家在避难权问题上的相互呼应，别的且不说，确实给我带来了片刻的快乐。有时，我仿佛在看“全欧”上演的独幕喜剧，主题是民主原则。这个剧本可以由萧伯纳来写，如果在他的血管中除了费边血液外再注入哪怕是5%的乔纳森·斯威夫特<sup>①</sup>的血液。但是，不管剧本由谁写，这幕戏仍具有很大的教育意义：不给签证的欧洲。美洲则更不用说了。美国不仅是最强大的国家，而且也是最胆小的国家。不久以前胡佛解释说 he 喜欢打渔，因为这项娱乐具有民主性质。假如真是这样（对此我表示怀疑），那就是说，美国至少还存在为数不多的一点儿民主的残余。避难权在那里早已不复存在。欧洲和美洲都不给签证。这两大洲又控制了其余三大洲。这就意味着整个地球都不给签证。

我从许多不同的方面得到解释，不相信民主是我的最大罪孽。许多文章，甚至许多书籍都谈到这个问题。可是，当我请求对我进行直观教学时，却没有一个志愿者挺身而出。原来这是个不给签证的行星。究竟为什么我要相信，富人和穷人之间的争论这个极为重大的问题，只有严格遵守民主的形式和仪式的情况下才能得到解决呢？

难道革命专政产生了人们所预期的后果？我听到有人提过这样的问题。只有考虑到十月革命的经验并尝试勾画出它的前景，才可以作出回答，自传不是探讨这个问题的地方。我将在一本专著中设

<sup>①</sup> 乔纳森·斯威夫特(1667—1745年)——英国讽刺作家。——译注

法回答这个问题，这本书我在中亚时已经动笔了。但是，如果我不先说一说，哪怕用几十行的篇幅说一说，为什么我要完完全全地坚持走我的老路，那我是无法结束本自传的。

在现在已经成年或年近老境的我的这一代人的记忆中所经历的一切，可以简述如下：在 19 世纪末到 20 世纪初的数十年中，欧洲居民经受了工业的严格的纪律的训练。社会教育的各个方面都要服从于劳动生产率的原则。这创造了最伟大的成就，好像为人类开辟了新的可能性。但是，实际上它只带来了战争。诚然，通过战争，人类确信，它完全没有退化，同贫血哲学的不祥预言相反，它生机勃勃，强壮，勇敢，富于进取心。通过这场战争，它信心百倍地看到自己的技术力量。结果，就像一个人为了证明他的气管和食道是正常的，在镜子面前用剃刀切开自己的喉咙一样。

1914 至 1918 年战争结束后，医治创伤被宣布为今后的最高道德，而在前四年中，最高道德则是制造这种创伤。勤劳和节约不仅恢复了自己的地位，而且被穿上了合理化的钢制胸衣。领导所谓“复兴”的也就是那些曾经领导过破坏的阶级、党派，甚至个人。在那些政治制度发生变更的地方，例如在德国，领导复兴的主角，也就是当年曾领导破坏的二三流角色。全部的变化仅仅在于此。

战争消灭了整整一代人，就像是为了在人民的记忆中留下一段空白，为了不让新一代过于直接地看到，他们现在所干的实际上只不过是重演过去的一切，只是在更高的历史阶梯上，因而具有更危险的后果。

布尔什维克领导下的俄国工人阶级试图重建一种生活，使人类有可能避免定期发作的疯狂性的精神病，为较高的文明奠定基础。这就是十月革命的意义之所在。自然，十月革命提出的任务尚未解决；不过，就实质而言，此项任务需要数十年的时间才能完成。此外，应当把十月革命看作人类整个现代史的起点。

三十年战争快结束的时候，德国的宗教改革运动已应当被看作是从疯人院里逃出来的人的事业。在某种程度上，事情也确实如此，欧洲人从中世纪的修道院中逃出来了。如果没有蒙受无数牺牲的宗

教改革运动，那就不可能有现代的德国、英国、美国以至整个人类。假如允许牺牲的话（请求谁允许呢？），那么，牺牲者正是推动人类前进的人。

也需要来谈谈法国革命。那个墨守成规的狭隘的反动分子泰恩<sup>①</sup>，以为他有重大的发现——断定路易十六上断头台后经过若干年，法国人民的境况比在旧制度下更贫困、更不幸了。问题在于，像法国大革命这样的事件，是不能用“若干年”去衡量的。没有这场大革命，就不可能有新的法国，泰恩本人也就仍然是旧制度下包税人手下的一名办事员，而不可能去中伤为他开辟了新的谋生之途的革命。

衡量十月革命需要更长的历史时期。只有无可救药的笨蛋才会指责十月革命在12年内没有带来安定和昌盛。德国的宗教改革运动和法国革命在资产阶级社会发展中代表了两个不同阶段，两者相隔长达三个世纪，如果以此为衡量的尺度，那么人们一定会为一个落后孤立的俄国，在十月革命后经过12年就能保障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不低于战争前夕的水平而表示赞叹。单单这一点，就是一个奇迹。当然，十月革命的意义并不在于这一点。它是新的社会制度的一种尝试。这个尝试会出现变异，可能还要从根本上从头做起。它将在最新技术的基础上呈现出完全不同的性质。可是，几十年，几百年以后，新的社会制度回顾十月革命，就会像资产阶级制度回顾德国宗教改革运动或法国革命一样。这是如此明白，如此无可辩驳，如此不可动摇，以致连历史教授也会理解的，诚然要在许多年之后。

那么，您的个人命运如何呢？我听到过这个好奇又夹杂着讽刺的问题。在此我可以稍为补充一些本书前面已经讲过的内容。我不能以个人的命运作为衡量历史进程的尺度。相反地，我不仅客观地估计自己个人的命运，而且我个人的感受是与社会发展的进程密切相关的。

自流放以来，我曾多次在报上看到关于我所亲身经历的“悲剧”的文章。我不知道个人悲剧为何物。我知道革命的两个篇章的更替。一家美国报纸刊登了我的一篇文章，上面附上意义深刻的注解，大意是尽管作者受到许多打击，但从文章中可以看出，他仍保持着清

楚的思考力。对于把判断力同政府职位，心理的平衡同目前行情联系起来的庸俗做法，我只能表示惊讶。我过去和现在都不知道这样的依从关系。我在监狱里读书写作，心情所感受到的满足同在革命的群众大会上一模一样。在我的感觉中，权力手段与其说是精神上的满足，还不如说是不可避免的负担。关于这一切，也许用别人的话能说得更简单明了。

1917年1月26日，罗莎·卢森堡从狱中写信给一位女友说：

“像这样整天沉浸在庸俗的生活中，我实在无法理解，也不能忍受。例如，看一看歌德是如何平静地超脱于事物之外的。只要想一想，他所经历的是法国大革命，这场革命从近距离看似乎是一场血腥的、毫无目的的滑稽戏，接着从1793年到1815年又是连续不断的战争……我不要求你像歌德那样写诗，可是他对人生的看法——广泛的兴趣，内在的和谐却是每一个人都能够做到的，至少是可以努力做到的。要是你说歌德不是一名政治战士，那么我认为，作为一个战士恰恰应努力凌驾于事物之上，否则，他就要到处碰壁，自然，我这里指的是一个高尚的战士……”

讲得太好了！最近第一次读到它，这些话立即使罗莎·卢森堡的形象在我心目中比过去更加亲近，更加珍贵了。

蒲鲁东这位社会主义的鲁宾逊·克鲁索，就其观点、性格和整个世界观而言，与我是格格不入的。但是，蒲鲁东具有战士的素质，无私的心灵，敢于蔑视官方舆论，最后，他身上那上下求索的火焰从没有熄灭过。这使他有可能超越自己的几经波折的生命，也超越他那个时代的现实生活。

1852年4月26日，蒲鲁东在狱中给一位朋友写道：“运动无疑是不规则的，不是直线的，但方向是不变的。各个政府轮流为革命所做的一切，是不可剥夺的，一切反对革命的企图都将成为过眼云烟。这种景象使我感到愉快，我理解其中的每一个画面；我目睹世上生活所发生的一切变化，仿佛我从上苍那里得到了对这些变化所作的解释；那些使其他人受压的东西，反而越来越抬

高我，给我以鼓舞，增强我的力量；您怎么能要我去责怪命运，抱怨并咒骂人们呢？命运，我嘲笑它；至于人们，他们太无知了，受的奴役太多了，我是不会抱怨他们的。”

尽管这些话带有某种崇敬的情感，但仍不失为真言妙语。我十分赞同。

附录：

## 托洛茨基的流亡生涯 (1929—1940年)

1929年2月10日子夜时分，黑海北岸的港口城市敖德萨在黑夜的笼罩下，万籁俱寂，寒风凛冽，空气凝重。码头上岗哨林立，周围没有一个闲杂人员。不多久，托洛茨基一行人登上了停靠在码头边的伊里奇(列宁)号客轮，客轮随即起航，驶向茫茫大海。天寒地冻，海面上也结了冰，港口当局接到上峰最严厉的命令，不管天气条件如何恶劣，客轮必须夜航离岸。于是，一艘破冰船奉命前来，打出一条60英里的航道，供客轮前行。

海面上狂风呼啸，四周一片寂静。这艘客轮上的乘客，只有托洛茨基和他的妻子娜塔丽娅、儿子辽瓦三人，以及“护送”他们的两名格伯乌人员。苏联当局显然不愿意透露托洛茨基的行踪，以免引起骚动，便这样悄然无声地将托洛茨基押解出境。当客轮驶进波斯普鲁斯海峡时，一名格伯乌人员交给托洛茨基1500美元，说这是苏联政府送给他的礼物，以便“他能在国外生活”。这是托洛茨基从苏联政府手中拿到的最后一笔“工资”。

### 一、在普林吉坡

托洛茨基的第三次海外流亡生活就这样开始了。前两次是受沙皇政府迫害而流亡国外的，此次却是作为斯大林的政敌而被驱逐出国的。托洛茨基到达土耳其后，苏联政府正式公布了托洛茨基被驱逐出国的事，面对既成事实，国内托洛茨基分子的抗议也无济于



事了。

下船后，托洛茨基一家人被安顿在苏联领事馆暂住。尽管领事馆人员对这位不久前在苏联政坛上十分显赫的领袖人物的到来怀有敬畏之情，但对托洛茨基来说，最关心的是两件事：一是立即安顿一个住处，以便对外联络，开始“工作”；二是作为他的“私人物品”随船运送来的几十箱文件档案的安全，这些文献里保存着托洛茨基与列宁及其他领袖之间的往来信件、俄共（布）中央发给他的文件及有关资料。

最初，托洛茨基怀疑此次流亡是斯大林与土耳其政府的合谋，不久，托洛茨基接到土耳其政府的回信说，当初并不知道他被驱逐之事，苏联政府只请求出于“健康考虑”为托洛茨基签发入境签证，出于重视与北方邻邦的友好关系，土耳其政府在不能细究申请动机的情况下发了签证。

托洛茨基到达君士坦丁堡才 10 多天，一些追随者就陆续来到这里，他也开始在《纽约时报》、《每日快讯》上发表文章，以他固有的犀利笔调评述近年来联共（布）党内的斗争，主要矛头自然指向斯大林。这些文章的发表，无疑为斯大林找到了托洛茨基“投靠国际资产阶级，策划反苏阴谋”而被驱逐出境的正当借口。

托洛茨基被逐后，他就谋求在欧美国家定居，以便有一个合适的环境开展活动。可是，他向欧洲许多国家政府递交的入境申请一一遭到拒绝。法国、荷兰、捷克斯洛伐克、奥地利、挪威、卢森堡、德国、美国、英国都以各种借口拒绝给托洛茨基入境签证。有的报纸制造谣言，说什么苏联驱逐托洛茨基是个“苦肉计”，是他与斯大林共谋达成的秘密协议，出国搞革命。丘吉尔以他特有的反共旗手的姿态，声称托洛茨基是“食人恶魔”，如今“像一堆破抹布一样被抛到了黑海岸边”。托洛茨基曾经很想申请到英国定居，那里有他不少左翼朋友，还有他渴望已久的大英博物馆，一些进步人士也为此事奔波，可是当时执政的以麦克唐纳为首的工党政府拒绝了托洛茨基的请求，对此，萧伯纳说：“工党的社会主义政府拒绝为杰出的社会主义者提供避难权，拱手把他送到最反动的对手手中，使自己沦为笑柄。”这一事实表

明，正是由于托洛茨基参与领导了一场伟大的革命，向各国现存制度发起挑战，这样的人即使在流亡中仍使人感到恐惧。这也许就是欧美各国政府拒绝托洛茨基入境的主要原因。

托洛茨基一行在苏联领事馆居住的处境十分尴尬，他既是客人又是囚犯，所以三个星期后就离开了领事馆，在当地一家旅馆和一所公寓里住过一段时间后，4月底，他们在马尔马拉海的普林吉坡岛（意译称“王子群岛”）的北端找到了一所闲置的旧别墅安顿了下来。这一住所十分荒僻，一边靠海，周围没有什么居民，打个电话都要走十分钟的路程。后来，因失火搬至岛上另一处住所，直至1933年7月离开。

托洛茨基在普林吉坡岛住了将近4年半时间，这是他流亡生涯最重要的一段时期。这一时期托洛茨基主要从事两项活动：一是著书写文章，二是与苏联国内和其他国家的托洛茨基追随者和反对派分子交往和联络。

托洛茨基定居下来后，立即着手工作，西方国家一些托洛茨基的追随者和信仰者来到这里，有的住上几天，有的住几个月，不少西方记者也蜂拥而至，荒僻的海岛变得热闹起来。

1929年6月，一本由托洛茨基亲自编辑的《反对派公报》第1期出版。这是托洛茨基评论联共（布）党内事件、阐述托派论点的主要讲坛，也是与反对派成员建立联系、解答疑难问题的阵地，当然也是托洛茨基反对斯大林内外政策的舆论工具。因此，一开始就受到苏联当局的严格禁止，为了偷运入境，还专门刊印了小开本。

到普林吉坡后，托洛茨基立即着手完成他的自传稿《我的生平》。这份自传早在阿拉木图流放时就开始撰写，童年和青少年时代部分已写好，到土耳其后，托洛茨基就聘用了当地的一名俄文打字员玛丽亚，每天早餐后开始口授，这样加快了速度，很快就完成了全部书稿，好几个国外出版商同他签约出版，这使他获得相当优厚的报酬，并以多种文字出版了。接下来，他着手撰写三卷本《俄国革命史》，单美国一家报纸连载，他就获得45000美元的稿酬，这就使他的生活比较宽裕，能够专心致力于著述和其他活动。

接待来自世界各地的来访者，是托洛茨基的一项重要活动。当时共产国际各国党内几乎都有一批反对派，他们对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集中领导表示不满，就把托洛茨基奉为自己的精神领袖。托洛茨基曾经雄心勃勃试图建立一个国际反对派的核心组织，甚至期望斯大林在他之后还会把其他人特别是拉柯夫斯基和拉狄克赶出苏联，在托洛茨基看来，只要他们一出国，国际反对派就会有一个“强有力的领导核心”。但这一期望落空了。斯大林根本不想以新的驱逐来巩固和扩大托洛茨基的阵地。托洛茨基永远是唯一一个被驱逐出国的反对派领袖。随着斯大林统治地位的日益巩固，第一个五年计划和农业全盘集体化的实施，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建立了起来，对反对派的镇压也加强了，他们根本无法活动，更无法与流亡境外的托洛茨基取得联系。

值得注意的是，托洛茨基有一个坚定不移的信念，即认为尽管苏联被斯大林“官僚集团搞得走了样”，但它仍是工人国家。在他看来，苏维埃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是由生产资料的国有制所决定的，只要“十月革命的这一最主要成果”未受侵害，苏联就有发展社会主义的基础。只要公有制能保存下来，工人国家的存在即使不是现实的，起码也是潜在的。这一观点遭到不少追随者的怀疑，但托洛茨基始终坚持，寸步不让。他声称，“无条件地捍卫苏联”和反对资产阶级敌人，是每一个反对派成员的基本职责。在苏联国内，原先的左翼反对派的处境也十分困难，一方面，斯大林对他们一直保持高压态势，使他们难以开展活动；另一方面，自斯大林与布哈林决裂并开展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运动以后，原先左翼反对派的一些政治主张，如高速度工业化、剥夺农民的“社会主义原始积累”、农业的全盘集体化、打击富农等，一一被斯大林捡起并予以实施，当局的政策既然与反对派的政纲趋同，反对派便失去了独立存在的意义和价值，这使流亡国外的托洛茨基处境更加孤立。

托洛茨基在普林吉坡接见许多国家左翼反对派人士，包括1929年秋在这里接见了中国的托派刘仁静，了解了不少各国共产党党内以及左翼反对派内部的状况，他同德国、意大利、荷兰、西班牙、印尼、

印度、锡兰（今斯里兰卡）、美国、加拿大、墨西哥等共产党内的托派一直保持着通信联系，每天都收到来自世界各地的信件和报刊，他从来不忽略答复这些来信中提出的各种问题，通信成了托洛茨基主要工作的一部分。各国托派组织，几乎都有一个通病，内部派系林立，争吵不休，对此，托洛茨基感到忧虑和不安，他曾派人前往柏林、布鲁塞尔等地，试图说服欧洲一些国家的反对派消除内部分歧，建立某种联合，可是，所有这些努力几乎都没有成效。

托洛茨基在普林吉坡的生活是单调的，没有熟人也没有朋友，与周围居民没有往来，除了日常的工作以外，最大的问题是安全问题。威胁托洛茨基安全的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来自侨居土耳其的白俄流亡分子，这些人对苏维埃政权积有冤仇，因而可能威胁托洛茨基的生命安全；另一方面是苏联派来的格伯乌人员。因此，托洛茨基的住所门禁森严，门窗都镶有铁条铁板，花园里有专人巡逻，房屋外面有警察设岗。住所内除了雇用一名俄文打字员、一名希腊籍厨师和一名清洁工外，还有3、4名追随者和志愿者，他们全是凭“信念”而来工作的。晚上托洛茨基入睡时也有人守卫。平日里托洛茨基不出门，唯一的休闲活动是出海捕鱼。每逢出海捕鱼的日子，就租用两艘渔船，停靠在住所码头边，清晨4点半钟就出发，驶向大海。船上有一名土耳其警察负责警戒。待到晨曦初露，就开始撒网，好在那时马尔马拉海上有捕不完的各种鱼群，他们在当地渔夫的指引下每次都能满载而归。他们偶尔也到海上放罾虾篓捕虾，或到近处灌木丛中打猎。

托洛茨基从苏维埃国家的领导人一下子成为沦落境外的流亡者，他的家人命运也因此多灾多难。托洛茨基被逐出国后，他的前妻和两个女儿、一个儿子仍留在国内。1930年年底，托洛茨基的长女季娜携带5岁的儿子来到普林吉坡，此时他的次女尼娜已于不久前在国内病逝，季娜的丈夫因参与反对派活动而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她要照顾自己的两个孩子和尼娜留下的两个孩子，弄得精疲力竭，心力交瘁。小外孙的到来使这所寂静的住宅带来一些欢笑和生机，也给托洛茨基带来新的烦恼。此刻季娜已患病在身，心绪不佳，她自幼跟

着母亲，托洛茨基忙于公务，很少接近自己的孩子，所以父女间互不了解，感情淡薄。和继母（娜塔丽娅）的关系更为微妙。因此她的病情没有好转，反而有所加重。她的精神越来越恍惚，不得不去柏林治病。此前，托洛茨基的儿子辽瓦已离开普林吉坡到柏林求学，并协助托洛茨基在欧洲与各国反对派开展联络。姐弟两人的关系也很淡漠，1933年1月，季娜在柏林自杀身亡。此时，托洛茨基的家庭生活已经破碎。

在土耳其流亡期间，托洛茨基唯一一次离开土耳其到丹麦去，是在1932年11至12月间。当年初秋时分，丹麦社会民主党的一些党员大学生向托洛茨基发出邀请，希望他在十月革命15周年之际去哥本哈根作一次演讲。开始时托洛茨基对此未抱很大希望，因为1932年2月苏联政府已经作出判决，剥夺托洛茨基及其家属的苏联国籍，出访手续比较麻烦。但土耳其政府为其提供了方便，给他以无国籍旅客的身份，用谢多夫的化名签发护照。11月14日，托洛茨基在娜塔丽娅和3名秘书的陪同下乘船离开君士坦丁堡。消息一传出，沿途的政府紧张地准备应对措施，新闻记者更是闻风而动，在托洛茨基各个落脚点守候采访。一时间，流言四起，有说托洛茨基将在欧洲某个地方与斯大林派来的特使秘密会晤，也有说托洛茨基要为反斯大林作最后的准备和部署。法国不许托洛茨基一行人在马赛港上岸，而在公海上用小汽艇接他们上岸，然后让他们坐汽车、火车急速穿越法国全境，到敦刻尔克登上一艘开往丹麦去的轮船。托洛茨基在哥本哈根露面，丹麦王室和苏联政府均表示不满，丹麦政府也竭力限制托洛茨基活动的范围和时间。托洛茨基只能在一次2000人的集会上作了两小时的演讲。到了丹麦，托洛茨基的追随者从欧洲各地赶来与他见面，义务为他担任警卫，当然也作了一些交流和讨论，人们戏称是一次非正式的“国际讨论会”。其实，由于丹麦政府的限制，逗留时间一点也没有延长就原路返回。甚至在法国过境时也不许他与儿子辽瓦见上一面。12月12日，托洛茨基一行人回到了普林吉坡。

1933年6月初，法国作家乔治·西蒙农途经君士坦丁堡，致函托洛茨基要求会见，他要为《巴黎晚报》进行一次采访。托洛茨基于

6月6日接见了他并同他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其间，托洛茨基提出一个重要的论断，他说：“法西斯主义，尤其是德国的纳粹主义正在把欧洲引入无可否认的战争危险之中。作为一个局外人我可能会看错，但是我觉得，人们对危险的程度远没有充分的认识。如果我们不是看几个月而是看几年，当然肯定不需要看几十年，那么我认为法西斯德国发动战争将是绝对不可避免的。这确实是一个决定欧洲命运的大问题。”历史已经证明这一预见的准确性。这是托洛茨基离开普林吉坡前的最后一次公开谈话。

## 二、在法国和挪威

法国达拉第政府组成后，社会党人莫里斯·帕里亚宁发起了一场要求政府批准托洛茨基定居法国的运动，1916年法国政府曾对托洛茨基发出驱逐令，以前的政府都以此为借口拒绝托洛茨基入境。经过多方努力，1933年7月初，帕里亚宁写信告诉托洛茨基，那个驱逐令已经撤销，于是，托洛茨基夫妇就去法国领事馆顺利地办理了护照和签证，并决定于7月17日离开土耳其，结束在普林吉坡相对与世隔绝的生活。托洛茨基即将进入欧洲大陆，引起各方的强烈反应，有支持的，也有更多反对的和抗议的。托洛茨基又一次卷入政治斗争的漩涡，他失去了相对平静地进行思考和写作的机会，他再也没有写出《我的生平》、《俄国革命史》那样大部头著作，原先计划撰写的《国内战争史》、《列宁传》等著作都没有写出来。

托洛茨基一行6人乘坐保加利亚号客轮在海上航行了一个星期，天气炎热，托洛茨基腰痛病发作，不能站立行走，旅途劳顿不说，还深怕什么人走漏消息，他必须隐姓埋名，不参加任何公开活动，才能在法国居住下来，这是他与法国政府事先达成的协议。客轮在快到马赛时，先由汽艇将托洛茨基夫妇接走，直赴辽瓦事先在圣巴莱找到的一处海边别墅。他在这里一边养病，一边接见一些来访者。托洛茨基派人去拜访省长，省长已接到内部通报，告诉他在省里除他而外，没有人知晓托洛茨基的行踪。法国政府还允许他在除巴黎及塞纳省以外的任何一地居住。

进入法国之后，托洛茨基接触到欧洲各种政治思潮和流派，对各

国社会民主党、共产党内的各种派系和主张也有了近距离的接触和了解，各种派别对苏联、共产国际，对斯大林与托洛茨基分歧的态度也有了较深入的了解，在此基础上托洛茨基的思想有一个转变。原先，他主张在共产国际的框架内开展反对斯大林官僚集团的斗争，如今，他改变了自己的政治主张和活动方向，决定建立一个新的国际与共产国际相抗衡。这是一个方向性的转变。托洛茨基居住圣巴莱期间，出席和参与较多的托派集会和会晤，在1934年初的一次讨论新目标的集会上，托洛茨基在分析当前政治形势后说：“这里有一个连带的次要问题，那就是新国际的名称，是否叫第四国际呢？这个名称看来并不十分令人满意。以前我们同第二国际决裂时，我们就改变了我们的理论基础。现在我们也不再以共产国际初期召开的四次代表大会作为自己的理论基础，但是我们还是可以宣称，我们是属于共产国际的，并且自称是共产国际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派。对此有赞成的也有反对的。第四国际的名称比较简洁，也许有利于吸引广大群众，但从另一方面考虑，用现有的共产国际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派和名称也许对于选择干部是有好处的。”这段话说明托洛茨基思想上仍有犹豫。他一心想把分散在各国共产党内反对斯大林主义、拥护托洛茨基的力量联合起来，又要坚持20世纪初俄国布尔什维克的一整套理论、路线和方针，而30年代的欧洲左翼政治力量是决不会完全认同的，因此组建起来的新国际，不论叫什么名称，力量单薄、内部分歧重重将是不可避免的。

11月初，托洛茨基一行人在巴黎附近的巴比松住了下来。新住所坐落在枫丹白露森林边缘的一个小公园里，十分隐蔽和幽静，有哨兵和看门犬警卫，信使定期从城里往返传送信件。冬天，托洛茨基还在别人的护送下到巴黎去了两三次。托洛茨基住在巴比松是得到法国最高当局允许的，但地方当局包括镇长在内都不知道。这儿离巴黎30英里，它既不是巴黎，又离巴黎不远，对外联络和静心写作都是一个理想的居所。托洛茨基打算在这里花一年的时间完成《列宁传》的写作，并从巴黎借来一大批书籍和资料。

可是，这种相对平静的日子不多久突然被打破了。1934年4月

一天晚上，托洛茨基的一名使者因轻微的交通违章被警察局扣留，在审讯中警方得知托洛茨基就住在巴比松的秘密，他们为此感到欣喜，并大张旗鼓地公布了这一发现，于是引起了当地居民和舆论的大哗，甚至德国纳粹党的宣传部长戈培尔也造谣说，托洛茨基正在巴黎策划一场共产党的起义。

4月中旬，警察局命令托洛茨基离开巴比松。由于没有一个欧洲国家政府愿意接纳他，他只得在法国又呆了14个月。这一年多日子可谓颠沛流离，居无定所，又要用假姓名，又要化装，托洛茨基不得不剃掉胡子，经常变换住地，弄得精疲力竭。一会儿住进阿尔卑斯山间的小村庄，一会儿又搬到多门一位乡村教师的家中，过着几乎完全与世隔绝的生活。身边没有秘书，也没有卫兵，没有来访者，秘书隔几个星期才从巴黎到这里来一趟，托洛茨基夫妇两人只能在村庄附近散步，他们在法国所拥有的自由比土耳其还少，托洛茨基感叹地说：“我们在这里的生活与坐牢没有多大差别。”这是托洛茨基平生最消沉的时期，离开土耳其时那雄心勃勃的计划和乐观的希望全部破灭了。

1934年12月，苏联国内发生了基洛夫被暗杀事件，斯大林借此事件对反对派加紧镇压。基洛夫案件很快波及托洛茨基一家的命运。托洛茨基的前妻已年逾60岁，被驱逐出列宁格勒，带了3个外孙和外孙女被流放到鄂木斯克州一个偏远的村庄。厄运落到了托洛茨基次子谢尔盖的身上。谢尔盖是个学者，既不问政治，又避免与其父亲联系。自1929年托洛茨基被逐出苏联后，他就只与母亲通信，向她讲述自己的健康状况和科研工作上的成绩，询问全家人的生活状况，在他所写的全部书信和明信片里，对政治只字不提。基洛夫案件发生后不多几天，他在信中不无忧虑地说：“我的情况很不妙，比所能设想的要糟糕得多。”此后，谢尔盖就杳无音讯，不知下落，失踪了。这无疑是对托洛茨基身心的最大打击。

孤独、焦虑使托洛茨基的心绪十分恶劣，这一时期他的日记里反复思考了老年和死亡的问题。此时他刚满55岁，他在日记里说，列宁曾引用过屠格涅夫的一句话：“你们知道最可怕的罪孽是什么？是



活到 55 岁以上。”他带有几分嫉妒地写道：“可列宁并未活到犯这种罪孽的年龄。”“我的身体状况不容我乐观。犯病的次数越来越频繁，症状越来越厉害，机体的抵抗力越来越弱。我感到最后清账的日子已经不远了。”他估计，一可能死于战乱，欧洲的战云越来越逼近了；二可能死于斯大林对他采取的恐怖行动，至此，他甚至想到自杀。可见，这一时期托洛茨基的情绪已坏到了极点。

1935 年的欧洲形势也日益严峻。法西斯势力抬头，法国当局谋求与苏联改善关系，斯大林对法国施加压力，要法国驱逐托洛茨基。在这样的局势下，托洛茨基已无法在这里居留下去了。此时，挪威刚经过大选，工党上台执政。这个党曾是共产国际的成员，后又脱离了关系。既不是传统的社会民主党，也不是受苏联控制的共产党。所以，托洛茨基向挪威政府提出了避难的要求。在挪威友人的帮助下，几经周折，托洛茨基终于得到了在挪威逗留 6 个月的签证。

一开始就不顺利，挪威当局给托洛茨基规定了许多与法国相差无几的限制。1935 年 6 月 18 日，托洛茨基刚踏上挪威国土，就遭到一些组织的抗议和反对，以至于无法找到一个住处安顿下来。政府要求工党党员、出版家克努德森帮助托洛茨基寻找住处，当发现无法租到合适的住房后，克努德森只得把托洛茨基夫妇安排住在他自己家里。这是离首都奥斯陆 50 英里的村庄，宁静、朴实，主人善良又好客。有了这样的条件，托洛茨基便立即着手写作。《被贩卖的革命》一书就是在这一时期写出来的。

由于托洛茨基遵守了避难期间不干预挪威内政的承诺，外交大臣库特表示满意。政府还主动延长了托洛茨基在挪威逗留的期限。托洛茨基与房东克努德森的关系也相当融洽，1936 年 8 月，他们还一起去南部一个海岛上度假。可是，正当这时，莫斯科的一场政治风暴很快就危及托洛茨基的命运。

1936 年 8 月 15 日，无线电新闻广播里传来莫斯科即将对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 16 名被告进行审讯的公告，称被告犯有所谓叛国罪、阴谋罪和谋杀斯大林罪，并断言，被告的这些罪行都与托洛茨基有关，托洛茨基将恐怖分子和杀手从挪威派往苏联。当天，托洛茨

基立即发表声明否认这一指控。他指出，莫斯科审判案是斯大林一手导演的“世界政治史上最大的假案”。并说：“我郑重担保，自从跨进挪威国土的那一时刻起，我就与苏联没有任何关系了。我甚至连一封信也没有收到过。”可是，托洛茨基厄运难逃。从8月19日正式审讯一开始，苏联当局就把托洛茨基和他的儿子辽瓦与16名被告绑在一起提起公诉。8月21日，《工人报》发表托洛茨基答该报记者问，英国、美国、法国等通讯社也急忙派记者到挪威采访托洛茨基。可是，此时挪威政府做出一个异乎寻常的行动。8月26日，即莫斯科审判结束后的第二天，两名警察局的高级官员来找托洛茨基，他们要求托洛茨基在一份保证书上签名，保证今后不再“直接或间接、口头或书面地干涉别国政治”，保证作为一位政论家“严格地将自己的活动限制在历史著作和一般性的理论见解范围内，而不发表针对某一具体国家的见解”。托洛茨基断然拒绝在这份保证书上签名。于是，警察局宣布对他实行软禁，在门口设了岗，禁止他发表任何公开声明。这件事背后，显然是苏联政府给挪威施加了巨大的压力，大臣们害怕与苏联破裂，便在压力面前屈服了。不久以后，司法大臣下令把托洛茨基夫妇从克努德森家转移到奥斯陆以南20英里的胡鲁姆的一幢房屋内关押，还派了20名警察昼夜监视。

12月，挪威司法大臣两次造访托洛茨基。第一次，司法部长告诉托洛茨基，因无力负担胡鲁姆的“大笔警卫费用”，要将他遣送到挪威北部的偏远地区去。托洛茨基告诉大臣，友人打算请他到墨西哥去。一周以后，这位司法大臣再次造访托洛茨基，通知说墨西哥方面已答应为其提供避难，挪威方面已经租好一艘油轮，第二天就护送托洛茨基夫妇去墨西哥。12月19日，鲁特号油轮驶出挪威海域，船上的乘客只有托洛茨基夫妇和押送他们的警察。驱逐托洛茨基一事搞得十分机密，油轮在茫茫大海中航行了21天，才抵达墨西哥海岸。

还有一件事值得一提，在挪威，托洛茨基通过辽瓦同设在阿姆斯特丹的国际社会史研究所进行谈判，把在1917至1922年间的通信集出售给该所，共计900多份影印件（后来出版了两卷本俄英对照的《托洛茨基收藏文件集》）。1935年底，双方签订了合同。这是托洛

茨基为防止文件散失而采取的一个措施。

### 三、在墨西哥

1937年1月9日，押送托洛茨基的鲁特号油轮缓缓驶进墨西哥的石油大港坦皮科，托洛茨基夫妇还在忐忑不安地等待着下一步的命运安排。此时，一艘小艇载着一位墨西哥将军登上了油轮，他作为墨西哥总统的特使对托洛茨基夫妇表示正式欢迎。在码头上，他们又受到美国和墨西哥一些托洛茨基主义者和追随者的欢迎。刚遭到挪威当局冷酷的驱逐，此刻又置身于墨西哥的热情欢迎，两种境遇，使托洛茨基仿佛处于梦幻之中，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总统专列将托洛茨基夫妇送到城外一个小站上，迭戈·里维拉在这里迎接，并将他们送到自己在首都郊区科约阿坎的“蓝屋”家里。随后的两年里他们都住在这里，再也找不到比这更好的地方来抚慰疲惫不堪的流亡者了。房子很大，充满阳光。房主人里维拉是托洛茨基的好友，托洛茨基的崇拜者，很有名气的墨西哥画家。客人在这里看到到处都是图画、鲜花以及各种艺术品，到处感受到亲切周到的接待，安全工作很到位，工作条件也十分便利。

里维拉夫妇对客人的到来十分殷勤，他们让出“蓝屋”给托洛茨基居住，他们自己则住到另一处住所去。里维拉在艺术上颇有成就，但他又很热衷政治活动，他那桀骜不驯的脾气常常把事情办糟，这种性格最终导致他与托洛茨基的分手。

到墨西哥不到两个星期，托洛茨基的生活刚安顿下来，莫斯科的第二次审判就开始了。这次的被告是拉狄克、皮达可夫、穆拉洛夫、索科里尼科夫等12人，缺席的托洛茨基仍是主要被告，其罪名是与德国希特勒、日本天皇签订了反苏反共的正式协议。这次审判迫使托洛茨基又一次面对大量的、无法想象的种种谎言和荒诞的梦魇，尽管他极度疲劳，发着高烧，仍不知疲倦地投入“战斗”。他发表声明，向斯大林提出引渡自己的要求，他说，倘若国联根据苏联倡议成立一个有关政治恐怖活动的调查委员会，他愿意将自己的机密文件提交给这个委员会。托洛茨基在给纽约的一次群众集会的信中说：“我愿意站在一个在文件、事实、证据各方面都公开的、公正的委员会面前

坦陈事实真相，没有丝毫隐瞒。我声明：我此刻保证，如果这个委员会判定我在斯大林给我捏造的那些罪行中哪怕有丝毫的罪责，我将自动听凭格伯乌刽子手的处置。”托洛茨基和他的秘书们日夜加班，翻阅各种资料和档案，整理批驳的文件，回答外界和报刊的疑问。这些工作十分繁琐和恼人，使托洛茨基在这段时间里性情烦躁，常常发脾气，斥责他手下的人。远在巴黎的大儿子辽瓦，是托洛茨基忠实的信奉者和代理人，辽瓦总是勤恳地完成父亲交待的各项任务。此刻，托洛茨基布置给他的任务更多，要求更高，对他的斥责也更严厉。为此，辽瓦曾写信给母亲诉说自己苦恼。

对莫斯科第二轮审判，许多国家的一些报刊和人士纷纷发表评论，要求揭露事实的真相，还建立了相关的组织。1937年3月，美国、英国、法国和捷克等国的有关人士建立了一个旨在进行反审判的联合调查委员会，年届80高龄的美国著名哲学家、教育家约翰·杜威出任该调查委员会的主席，使这个委员会增添了几分权威性。托洛茨基并不很看重这个委员会，因为它不可能对苏联国内和党内的纷争和斯大林的作为有很深刻的见解。但托洛茨基本人还是十分认真地进行准备，为调查委员会提供有关材料。

4月10日，委员会开始了一系列的听证会。会议在“蓝屋”的托洛茨基的书房里举行，出席会议的约有50人，包括记者和摄影师。杜威在开幕词中说：委员会既不是法庭，也不是裁判官，仅仅是一个调查组织。“我们的任务是听取托洛茨基先生向我们提供的一切证词，向他进行讯问，并提出我们所从属的整个委员会的调查结果。”听证会是按照美国通行的司法程序进行的。听证会持续了一周并举行了13次会议。不少人就莫斯科审判中的有关罪名及证据的所有细节对托洛茨基进行讯问。有时讯问几乎变成了政治辩论。对所有问题托洛茨基都没有拒绝回答或回避，整个会议进行得很平静。他不仅用详尽的材料为反对派辩护，而且做了充满哲理的分析，还对国内反对派分子何以一一供认自己的“罪行”的原因作了深刻的分析。在会议结束时的演讲中，托洛茨基对未来的事业仍充满了信心，他说：“我的生活经历中既不乏成功，也不乏失败，这不仅没有毁掉我对光

辉灿烂的人类未来的信念，反而使它更强烈了。这是对理性、真理、人类和谐的信念，我在 18 岁时就抱着这一信念进入了俄国外省的尼古拉耶夫市的工人区。此后，我一直完全、彻底地坚持这种信念。它更加成熟，而热情却并没有消退。”这一席话使委员们深受震撼，身处如此逆境而信念弥坚。杜威本来打算做个正式总结以结束会议，结果他只说了一句话：“我说什么都只能破坏气氛。”

同年 9 月，杜威的联合调查委员会结束了反审判调查，公布了自己的裁决。委员会明确提出：“根据一切材料……我们认为，1936 年 8 月及 1937 年 1 月的（莫斯科）审判纯属诬陷，我们确认列夫·托洛茨基与列夫·谢多夫（即辽瓦）无罪。”托洛茨基高兴地迎接这个裁决。然而裁决本身的影响很小。除了在美国有一些回响外，在欧洲几乎毫无反响。原因是当时的欧洲，战争的阴云已日益逼近，人们关心着、议论着西班牙内战、慕尼黑事件，对发生在苏联国内的大审判以及远在美国的“反审判”却很少有人关心了。

工作上的劳累、派别内部的纷争，终于压垮了辽瓦，他的健康状况急剧恶化。阑尾炎一再发作，已经到了非开刀不可的地步。辽瓦深怕陷入格伯乌的圈套，不敢到大医院就诊，而在俄侨开的一家小医院开刀。手术进行得很顺利。但是，术后感染发烧，疼痛难忍，神志不清。终于在 1938 年 2 月病逝，年仅 32 岁。辽瓦的死，对托洛茨基夫妇是一次沉重的打击，他的两个儿子、两个女儿都相继逝去，使托洛茨基加速了衰老。

1938 年起，筹建第四国际的各项活动加紧进行。整个夏天，托洛茨基都忙于为成立大会起草纲领和决议的草案。9 月 3 日，第四国际成立代表大会在巴黎附近的别列尼亚的小镇上举行，会场设在阿尔弗雷德·罗斯默的家中，有 21 名代表（代表 11 个国家）出席，它实际上是一个小型的托洛茨基主义者的集会。由于不久前大会组织书记突然失踪和被害，因此，会议在“绝对机密”的条件下持续一整天就告结束。会后发表的宣言中称成立大会在瑞士洛桑举行。托洛茨基本人未出席这次会议。大会通过了对当前形势的估计等报告和相应的决议，但大会的主持者无意中透露，新成立的这一国际组织几乎

是个空架子，它的所有执行委员会与国际局在最近几年没有开展过活动，国际所属的各个支部人数很少，有的只有几十人，多的也只有数百人。因此，第四国际实际上是一个带有强烈世界革命意识的托派国际，是一个思想极端、人数不多的宗派性组织，而不是群众性的政党。

1939年初，托洛茨基生活中发生了三件事。第一件事是与迭戈·里维拉公开决裂。托洛茨基与里维拉关系非同寻常，这是众所周知的。可是，里维拉这位热衷于政治活动的艺术家在政治漩涡中很难把握住自己，特别当他猛烈攻击墨西哥总统的时候，托洛茨基必须证明自己与里维拉反墨西哥总统的言行没有任何瓜葛，他只能选择与里维拉公开决裂来表明自己的态度。第二件事与第一件事相联系。当托洛茨基决心与里维拉分手后，必须从里维拉的“蓝屋”中迁出，另找住房，他在经济上立即感到拮据。托洛茨基在科约阿坎的远郊很偏僻的地段租下一栋房屋，房子很旧，盖得很粗糙，但很牢固和宽敞，可以用围墙与周围隔离开来。但不久听说，格伯乌有可能买下这座房产，以迫使房客离开，于是托洛茨基不得不将这座房屋买了下来，并整体加以改造，增高围墙，建起一座瞭望塔，安装报警器，整个住房就成了一座城堡。因为有消息传来，苏联格伯乌已决心用一切手段从肉体上除掉托洛茨基。第三件事，对托洛茨基而言，除了人身安全，还有他所携带的档案安全也是他的一桩心事。他开始与纽约公共图书馆、哈佛大学和斯坦福大学图书馆联系出售这批档案。几经周折，最后，1940年初，哈佛大学霍顿图书馆以15000美元买下了档案。其中一个条件是，40年后才能公开这批档案，目的是使与他曾有通信来往的人“免受迫害”。

1940年初，也许出于对年老体衰的忧虑，或许出于对自己生命安全的某种担心，托洛茨基出现一种“末日感”的情绪。2月27日，托洛茨基立下自己的遗嘱。遗嘱全文如下：

我的血压高（而且还在上升）的病症蒙蔽了周围的人对我实际状况的了解。我目前精力充沛，还能工作。但末日显然已经临近了。这几行字将在我死后予以公布。

在这里我不需要再一次去反驳斯大林及其代理人愚蠢的恶意的诽谤。因为在我的革命荣誉上，没有丝毫的污点。我从来没有同工人阶级的敌人，不管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在幕后达成协议或者进行谈判。成千上万个斯大林的政敌由于同样的诬告而成为受害者。新的革命一代将为他们恢复政治名誉，同时根据克里姆林宫的刽子手的罪行，给予应有的惩罚。

我深切地感谢在我生命中最困难的时刻仍然忠诚于我的那些朋友，我不想一一列举他们的名字，因为我不能叫出他们所有人的名字。

然而，我认为，我的伴侣娜塔丽娅·伊凡诺夫娜·谢多娃是一个例外。在我作为社会主义事业斗士的幸福之上，命运又额外给予我作为她丈夫的幸福。在我们将近40年的共同生活中，她始终是无限的爱、宽宏与温柔的永不枯竭的源泉。她承受了巨大的痛苦，特别是我们生活的最后时期，但是，使我多少感到欣慰的是，她毕竟看到了幸福的日子。

在我43年的自觉生命中，我始终是一个革命者；其中我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战斗了整整42年。倘若生命能够从头开始，我……会尽量避免重犯这样或那样的错误，但我的基本生活目标不会改变。我将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马克思主义者、辩证唯物主义者，因而也是不妥协的无神论者而死去。与我的青年时代相比，我对人类共产主义前途的信念同样炽烈，而且更加坚定。

娜塔莎刚刚从院子里走到窗户跟前，她把窗户开得更大，以便让空气能更自由地流进我的房间。我能看到墙边青草的一抹翠绿，墙上方湛蓝的天空和洒向四处的阳光。生活是美好的，让后来的人们把其中的邪恶、压迫和暴力清除干净，尽情地享受它吧。

列·托洛茨基

1940年2月27日 科亚阿坎

在遗孀的附录里，有以下一段文字：

我死后留下的所有遗产，所有我的版权（我的著作、文章等的收入）全部由我的妻子娜塔丽娅·伊凡诺夫娜·谢多娃处理。

1940年2月27日

列·托洛茨基

如果我们两人都死去的话……（这一页下面留下一片空白）  
3月3日，托洛茨基对其遗嘱作了一个补充：

我了解我的病情（还在上升的高血压）是这样的，很可能由于脑溢血而突然死亡，这是我自己的设想，也是我所希望的最好的一种结局。然而，也可能我估计错了（我不想去阅读关于这个问题的专门书籍，医生们自然是不会告诉我真实情况的）。假如这种硬化症一直拖延下去，我有长期卧病危险的话（由于高血压的关系，我现在反而感到精力旺盛，但这种情况是不会持久的），那么，我将保留自己决定死亡时间的权利。这种“自杀”（假如在这种场合这个词是适当的话）从任何方面来说都不是失望或绝望的表现。娜塔莎和我不止一次地讲到，一个人的身体状况，可能到这样的地步，以致最好是缩短自己的生命，说得更明确一些，是加速这种过于缓慢的死亡过程……但无论我怎么死去，我对共产主义前途的信念至死也不会动摇。对人类及其前途的这种信念，即使是现在也给了我强大的抵抗力，这是任何宗教都无法给予我的。

列·托洛茨基

#### 四、托洛茨基之死

斯大林已下决心要除掉托洛茨基，1940年初托洛茨基写下遗嘱似乎是一种预兆。危险正在一步步逼近他。

5月23日，托洛茨基的住所遭到一次袭击。当天凌晨4点，一伙武装人员闯入托洛茨基的“城堡”，并对托洛茨基夫妇的房间，外孙谢瓦的房间用机枪猛扫，所幸未有人员伤亡。当墨西哥秘密警察首脑亲临现场调查时，托洛茨基不无幽默地环顾四周，把右手放在嘴边，像透露一项重大秘密似地对调查者低声说：“偷袭的策划者是约瑟夫·斯大林，是格伯乌执行的。”袭击者将警卫者捆绑起来，并将一



个小伙子谢尔顿绑走，他是来自美国的志愿者，志愿为托洛茨基充当警卫，是他为这伙袭击者开了门。有人怀疑谢尔顿是袭击者的同伙，托洛茨基则认定他是一名忠诚的追随者。不久，在一个小农场发现了谢尔顿的尸体，托洛茨基将其运回住地，并为其举行了葬礼。

几天以后，大家仍心有余悸，唯恐袭击者再来。有的美国朋友来访，劝托洛茨基“转入地下”，进行化装，并允诺帮他潜入美国，寻找一个安全的避难所。但这个建议被托洛茨基拒绝，他不愿为保命而躲藏起来，他要公开地面对自己的仇敌和朋友。他勉强地接受朋友们和墨西哥当局的建议，加固他的“城堡”，他一边检查“工事”，一边对秘书说：“这哪是家，这是中世纪的监狱。”显然，他十分厌恶生活在20世纪，人类已步入文明和进步的年代，他还被“囚禁”在塔楼和围墙所包围的封闭的“城堡”中。

6月，托洛茨基曾在墨西哥各地做了一次旅行，途中常常沉睡，显得十分疲惫。一位朋友送给他一件防弹背心，他不愿穿。回家以后，有人建议今后对来访者一律搜身，托洛茨基也不赞成。他在接待客人时，不喜欢警卫人员站在旁边。

这一时期，托洛茨基住所出现一个神秘人物，此人名叫拉蒙·梅尔卡德尔。此人在1938年第四国际成立时，就出现在巴黎的会场周围，伪装成托洛茨基主义的拥护者。他自称是比利时外交官的儿子，是个身材魁梧、仪表不俗的青年，他在这里结识了名叫西尔维娅的姊妹俩，她俩都是美国托派的成员。西尔维娅在大学学过哲学、心理学，懂得俄语、法语和西班牙语，这对托洛茨基特别有用。这个毫无姿色的老姑娘与相貌堂堂的“雅克松”（“雅克松”是拉蒙的化名，他从来不用真实姓名）邂逅，殷勤地追求，使她很快坠入情网。他俩一起在法国度过了几个月如痴如醉的日子。雅克松与报界和商界有关系，但他表现得对政治“不感兴趣”。他平日里挥金如土，对西尔维娅关怀备至，表现出一副绅士的气派。在欧洲、美国辗转一年多以后，他先于西尔维娅来到墨西哥“经商”。当1940年1月西尔维娅来到这里担任托洛茨基的秘书的时候，他开始出现在托洛茨基的住所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情。这个人不容易打听和接近托洛茨基，从不冒

险进入院子，只是驾着豪华轿车在门外迎候西尔维娅，警卫们得知他是“西尔维娅的丈夫”，有时还跟着他去城里兜风，雅克松很快与大家混熟了，人们对他渐渐失去了警觉。

只是在托洛茨基住所遭袭的几天之后，一个偶然的机，雅克松才第一次在院子里见到托洛茨基。见面时他表现得很规矩和有分寸，没有盯着大人物或试图套近乎，只是将一件玩具送给托洛茨基的小外孙。作为礼节，托洛茨基夫妇邀请他与全家及其他客人共进早餐。此后，他来“城堡”的次数并不增多。托洛茨基似乎对此人有所警觉，但也未怀疑，只是觉得他有时比较“轻浮”。

8月17日，雅克松又来到“城堡”的院子里，他请托洛茨基浏览他的一篇手稿并提出修改意见。托洛茨基尽管有些勉强，还是客气地接受了。当雅克松跟着托洛茨基走进书房，两人单独相处的时候，他始终戴着帽子，抓紧着自己的外套，又不安静地坐在椅子上，这些无礼的举动使托洛茨基恼怒，他开始怀疑雅克松是个骗子。托洛茨基这个想法与娜塔丽娅和秘书汉森说过，希望查一下雅克松的背景。可是，杀人凶手比托洛茨基的反应更快，8月20日就下了毒手。

这一天是星期二，天气晴朗，托洛茨基起床后感到格外宁静和安详，白天的工作也很顺利和正常。

下午刚过5点，托洛茨基放下手中的笔，来到兔笼旁喂兔子。这时，雅克松又来了，站在托洛茨基身边与他谈话。娜塔丽娅走近他，问他在这么热的天为什么还是戴帽子、穿外套，回答是“怕要下雨”。他向娜塔丽娅要一杯水喝。雅克松带来几页修改好的打印稿请托洛茨基再看一遍。托洛茨基很不情愿地离开兔笼，同凶手一起走进书房。托洛茨基还没有读完第一页，就感到头上挨了可怕的一击。雅克松后来在供词中说：“我把雨衣放在一件家具上，掏出冰镐，闭上眼睛，用尽全身力气打在他的头上。”凶手本来指望这一下打击会使受害者连哼也不哼一声就死去，他本人可以从容地溜掉。可是，受害者发出了一声“可怕的、尖锐的叫喊”，并抓起一切能抓到的东西——墨水瓶、书籍，甚至录音机掷向凶手，尽管此时托洛茨基的头盖骨已被打碎，血流满面，但他勇猛地向凶手扑去。当娜塔丽娅、警卫们赶来

的时候，托洛茨基仍倚着门框，他不愿在凶手面前倒下去。人们把他轻轻地放到垫子上。

“娜塔莎，我爱你。”托洛茨基突然说出了这几个字，凝重、吃力又充满了感情。“但是我没有让他得逞。”这似乎是一句战斗者宽慰自己的话。他转用英语对秘书说：“这就是终点”，接着又说：“照顾好娜塔丽娅，她跟了我很多、很多年。”秘书回答他，“您放心吧。”此刻警卫人员正扑向凶手，嚎叫和呻吟声响成一片，托洛茨基挣扎着说：“告诉孩子们不要杀了他。”“不，不，绝不能杀死他——必须让他招供。”待医生赶到，将托洛茨基送往医院抢救。

晚上7点多钟，医生们给托洛茨基做了开颅手术。他已陷入昏迷，并再也没有恢复清醒。一天以后，8月22日晚7时25分，托洛茨基的心脏停止了跳动。他的书桌上放着尚未完成的《斯大林》一书。

按照墨西哥的习惯，为托洛茨基举行了葬礼。遗体火化后，骨灰埋在科约阿坎那座“城堡”的地下。一块白色石碑竖立在墓前，墓碑上刻着“镰刀和锤子”的图案。莫斯科的《真理报》只用了寥寥数行字报道了这个事件，说托洛茨基被一个“幻灭的追随者”杀死了。

雅克松被捕后，始终否认自己是格伯乌人员，说他“跟格伯乌没有关系”。墨西哥法庭判处凶手20年有期徒刑。

苏联解体后，一个名叫巴维尔·苏多普拉多夫的原格伯乌高级官员写了一篇回忆录，记载了杀害托洛茨基的凶手拉蒙1960年刑满释放后两人于1969年在莫斯科的一次会面并共进午餐的情景。那是他们分手30多年来的第一次重逢，拉蒙向他讲述了1940年8月20日行刺托洛茨基的经过。

“这一天，拉蒙将一把登山用的冰镐掩在雨衣里，带进托洛茨基的住宅。与人们后来对事情的描述相反，并没有闭上眼睛。……正当拉蒙出手时，托洛茨基的头突然抖动了一下，使这猛烈的一击落偏了，冲力也减弱了。所以托洛茨基不但没有当场断气，而且大声呼救起来，意外的失误使拉蒙紧张过度，竟忘了拔出匕首补上一刀。在应声跑来的托洛茨基的妻子和卫士们面前，他呆若木鸡，连手枪也

没拘。

“拉蒙以‘雅克松’的假身份被捕入狱。按事先编好的话‘招供’，始终没有改口，直到6年后因一名西班牙人的叛变暴露了真实身份。1960年8月20日在墨西哥坐了20年牢的拉蒙刑满出狱，带着妻子到莫斯科定居。

“谈起往事，拉蒙为自己在斗争中担任的角色感到自豪，并不后悔杀死了托洛茨基。

“大约在1975年，拉蒙·梅尔卡德尔离开莫斯科去了古巴。他死于1978年，遗体被秘密运往莫斯科。他的墓碑上镌刻的名字是：‘苏联英雄：拉蒙·伊万诺维奇·罗佩兹’。”

托洛茨基的生平已成为历史，他的功过是非，由历史来评判吧。

（本附录由周尚文根据以下资料编写：[波]伊萨克·多伊彻著：《先知三部曲之三：流亡的先知》，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法]让·范·埃热努尔著：《托洛茨基流亡生涯》，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版；列·托洛茨基：《流亡中的日记》，载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我的生平》下册。）

## 译 后 记

托洛茨基这本自传是他在 1929 年被驱逐出苏联后在土耳其写的。这个译本是从柏林格拉尼特出版社 1930 年出版的俄文版直接译出。全书由中共中央编译局郑异凡研究员精心校阅，华东师范大学政教系周尚文教授指导和审阅，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译者